

第9册 宗教与民俗

第10册 中外文化交流

第1册 历代文化沿革

第3册 民族文化

第4册 制度文化

第5册 教化与礼仪

第6册 学术

第7册 科学技术

第8册 艺术

中华文化通志

第2典

【地域文化】

晋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乔志强
李书吉
等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2

【地域文化】

晋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K203
Z669
:2(3)

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 (2-013)

宁可 主编

晋文化志

乔志强 李书吉等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70 毫米 32 开

字数 386,000

印张 15.75

插页 1

版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208-02271-2/K·490

141551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76760/17

141551

晋文化志

作者简介

乔志强,1928年生。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山西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山西省历史学会理事长、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有(含合著、编著)《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史新编》、《山西通史》等18部。发表论文、译文50篇。

李书吉,1955年生。山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合著有《山西通史》等。发表论文10余篇。

总 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讨。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本书阐述了三晋地区(今山西省境域)自远古时代迄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三晋地区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是夏朝的统治中心,是夏文化的主要考古发掘地,其地下遗存极为丰富,考古价值极高,本书充分地反映了关于这一地区的考古研究成果。三晋地区又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 12 个民族的交会之地,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民族文化的互相渗透对晋文化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书对此亦作了详细阐述。本书对三晋地区的姓氏郡望、石窟艺术、戏剧文物、盐池文化等一些富有特色的内容都作了充分反映。

《中华文化通志》编辑出版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总 决 审	陈 昕				
总 顾 问	余志明				
总 监 制	郁椿德				
编辑部主任	朱金元				
编辑部副主任	虞信棠				
责任编辑	王有为	王界云	孔令琴	叶亚廉	朱子恩
	朱金元	汤中仁	苏貽鸣	杨承紘	李 卫
	李文俊	李远涛	吴书勇	宋慧曾	张 玫
	张 臻	张美娣	陆凤章	胡小静	郝盛潮
	秦建洲	顾兆敏	夏绍裘	唐继无	曹文娟
	曹培雷	屠玮涓	虞信棠		
责任决审	王有为	王树鸣	王界云	宋 存	严忠树
	吴慈生	张 玫	张满鸿	周琪生	柳肇瑞
	胡小静	钱雪门	高登瀛	夏国智	黄行发
	魏允和				
装帧设计	吕敬人工作室				
美术编辑	孙宝堂				
监 制	戴 弘				
技术编辑	沈树德	吴 坚	何永康	姜华生	曹伯祥
责任编辑	王秀菊	张新宇	陆永洲	陆秉熙	顾伟民
	唐毓华	谈 维	陶雪英	龚养耿	
编 务	朱玉堂	张大潮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地理面貌	41
第一节 地域形势	41
第二节 自然形势	49
第三节 文化地理	59
第二章 原始文化	71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文化	72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文化	91
第三章 民族融合.....	110
第一节 晋国的多民族构成.....	111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122
第三节 民族融合的文化成果.....	136
第四章 姓氏郡望.....	148
第一节 姓氏.....	148

第二节 郡望·····	177
第五章 学术思想·····	198
第一节 三晋思想文化的形成·····	198
第二节 “百家异说”时的三晋文化·····	207
第三节 汉唐时期的三晋思想文化·····	221
第四节 理学与三晋文化·····	232
第六章 石窟艺术·····	245
第一节 佛教和石窟寺·····	245
第二节 云冈石窟·····	253
第三节 天龙山石窟·····	271
第四节 中小型佛教石窟·····	277
第五节 道教与龙山石窟·····	280
第七章 文物名胜·····	284
第一节 上古遗迹·····	284
第二节 名山古刹·····	297
第三节 古代建筑瑰宝·····	310
第四节 戏剧文物·····	323
第八章 文学艺术·····	328
第一节 三晋文苑·····	328
第二节 三晋艺苑·····	348
第九章 盐池文化·····	375
第一节 运城盐池与河东文化·····	376

第二节	昔日辉煌的河东盐池·····	381
第三节	封建社会后期的盐池·····	392
第四节	明清运城盐池的各项文化建设事业·····	400
第五节	二十世纪死而复生的盐池·····	406
第十章	煤铁的开发与冶炼·····	416
第一节	晋煤的发现、采掘和利用·····	417
第二节	山西铁冶·····	425
第十一章	山西商人·····	437
第一节	古代晋商·····	437
第二节	步入全盛的山西商人·····	444
第三节	晋商启示录·····	458
第十二章	书院文化·····	467
第一节	宋辽金元的书院初创时期·····	467
第二节	书院的初步发展时期·····	469
第三节	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	472
第四节	书院的败亡与近代山西教育·····	481
参考文献 ·····		486
后 记 ·····		488

导 言

一、晋文化的发展脉络

山西在西周时称唐,春秋为晋(又名并州),战国为三晋(韩、赵、魏)。山西一名专指今山西省地区,始于东汉,以位于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又因为它处于黄河以东,所以也有河东之称。到隋杨广大业十一年(615年)封李渊为“山西东道抚慰大使”,山西东道在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山西之名,由此奠定,元代正式设置“河东山西道”,明有“山西行中书省”,简称山西省,其后相沿不改。

晋文化,泛指山西地区的文化,以历史发展顺序而论,它应当包括旧石器时代的汾河文化(包括西侯度、匭河、丁村文化等);尧舜禹上古神话传说;夏墟考古及夏文化;两周考古及以区系界定的晋文化类型;战国以法家为特征的三晋文化;汉晋时期的河东文化;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文化和隋唐以后走向成熟的山西文化。综合各历史阶段的内容,在横向上它包括:山西的人文地理环境;原始文化遗存;民族融合;学术教育;山西大家族;文学艺术;煤铁盐酒;石窟艺术;文物名胜;山西商人十个方面。由于上述诸类文化形态和各方面的文化内容尚在发掘、研究和探讨中,有些文化形态和文化内容之间限于地下考古发掘不够或文献材料佚缺以及研究上的不足,对于其内在的联系

和沟通还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一致的看法。因而准确把握晋文化的内涵,仍是一个艰巨的工程。

叙述之前,先看看晋文化赖以生成的环境。

地质学上的新生代以来,山西的地理环境是:东部有海拔 1500 米以上的太行山脉,西部有以吕梁山为骨干的黄土高原和山地地形,南有中条山,北有恒山山脉。而中部又有五台山、云中山、太岳山耸立其间。在全省中部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裂谷,在这一裂谷中分布着一系列串珠状的盆地,由北向西南依次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大致轮廓呈平行四边形,南北长 680 公里,东西宽 380 公里,纵跨北纬 $34^{\circ}16'$ — $40^{\circ}44'$ 六个纬度带,横越 $110^{\circ}15'$ — $114^{\circ}32'$ 四个经度线。境内地形高低悬殊,东部为山区、中部平原区、西部高原区。山西又处黄河中游,远古以来,这里大部分地区水源充足、气候温和、林木繁盛、资源丰富,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区。

山西为四山锁闭,境内分布的盆地又自成体系,构成一个相对的封闭系统,但中部的黄河水系(汾河、涑水河、亳清河、沁河)和海河水系(滹沱河、桑干河、漳河)又是从北部边疆通过我国中原腹地的天然“走廊”。前一特点造成晋文化生成有较强的地域特色,而后者又说明晋文化自古就是一个天然的开放系统。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山西自远古以来就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一) 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的“汾河文化”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北起阳高,南至芮城,西自黄河左岸,东抵太行山麓的山西境内发现了旧石器不同时期的遗址和地点 225 处,数量居全国之冠。著名的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西侯度文化、匭河文化,中期的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晚期的峙峪文化、下川文化和薛关文化。

芮城县的西侯度是目前所知中国境内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遗

址。这里出土了大批古脊椎动物化石，32件石制品及带有切割和刮削痕迹的鹿角，这是一处典型的石片石器文化遗址，它的发现说明，早在180万年前的远古时代，山西境内就有了人类的踪迹。匭河文化是在芮城发现的又一处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其16个点分布在以匭河为中心，北起独头北沟，南至涧口南沟，长达13.5公里的范围内，从而构成匭河遗址群。从匭河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石制品138件，工具分为五大类，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大量的是石片石器，其中用投击法生产的一种石片重五公斤，这是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大的一件石片。丁村遗址位于襄汾县汾水河左岸，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共发现遗址16处，获石制品2000余件，人牙化石3枚和1块顶骨化石以及大量动物化石。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比较，丁村人制作石器的技术和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类型也较为稳定。砍砸器和厚尖状器是丁村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工具，其中厚尖状器类的三棱大尖状器和鹤嘴形尖状器被誉为“丁村尖状器”。这一石器文化类型在汾河流域的侯马、静乐、古交都有类似发现，被称为“丁村遗址群”。

丁村遗址一发现就以它鲜明的文化特征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裴文中指出：“无论在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文化，它是在黄河中下游汾河沿岸生活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文化。”^①又因其主要分布在汾河流域，所以有学者将它称为“汾河文化”。

1976年以后，山西省文物部门又对丁村遗址进行了连续数年的调查发掘，发现了分属旧石器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几处。

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认为，丁村文化由匭河文化发展而来，

^① 裴文中：《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而匭河文化早于北京猿人文化,应居于旧石器初期的早一阶段。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就石片文化这一明显的特征而言,匭河文化同西侯度文化极为相似。由此说明,分布在山西南部的西侯度文化同山西西南部的匭河文化、丁村文化是一脉相承、自成体系、自行发展的一种文化形态。

丁村遗址同以后发现的陶寺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曲村一天马(晋国早期都城)、晋侯墓地、侯马晋都新田遗址都分布在汾河大转弯处,这一情况引起考古学界特别的重视。目前我们还没有将汾河文化同以后考古学上的晋文化联系沟通起来的直接依据,但我们也有理由作如是的推测。

(二) 尧舜禹上古神话传说

我国史籍中有关于炎、黄、尧、舜、禹的许多史前神话传说。这些见诸先秦及此后史籍中的神话故事是探索我国上古文明源头的的一个重要线索。大量文献记载都有黄帝为华夏祖先的说法。黄帝究竟有没有?如果有,究竟在何处?这个问题又成了二十世纪后期的一个热门课题。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是个部落联盟。关于黄帝的地望,有陕西说、山西说,也有山东、湖南说等等。我们认为:首先黄帝作为一个部落联盟大致是可信的;其二,黄帝故迹遍布全国,这一方面说明黄帝作为华夏始祖由来已久,另一方面,黄帝作为一个部落联盟集团,还处在游牧部落阶段,就说明他们还没有定居或没有完全定居。所以《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在涿鹿之战后其活动范围“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

山西有关于黄帝的传说,传说中的黄帝在山西的活动范围大致在晋南和晋西南。《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关于“黄帝擒蚩尤”的记载,传说蚩尤为黄帝杀死后,它的血化为卤水,这就是解州盐池。传说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开启了文明的先河,在今临汾南有仓颉故

宅。黄帝后裔中最有声望的一支主要活动在山西。尧的活动据《竹书纪年》说：“封于唐，游居于陶。”前人关于陶唐的地望也有不同说法，归纳起来有三种，即山西临汾说、河北唐县说、湖北随县说，三地之争由来已久。我们仍可作这样的解释，尧居三处都是有可能的，黄帝以来，自尧开始定居，尧有三处都城亦不足为怪，只是湖北随县似远了一点，联系“尧都平阳”的明确记载和都平阳以后的史实，可以推断，平阳是尧定居以后的真正都城。唐朝于显庆年间在平阳大规模修建尧庙，应当是有相当的文献和传说根据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晋卿范宣子（士匄）曾对使晋的鲁大夫叔孙穆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有类似的记载。据此我们推测，上古时代在我国北部有一个陶唐氏的部落，可能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个善于烧制陶器的部落，故以“陶”为名，陶古语为窑，同尧谐音，于是后世遂把作为族名的陶唐氏人格化为传说中的帝尧，或连称“帝尧陶唐氏”。^①

尧以后是舜、禹，史籍有尧都平阳“寝不安席，日思孝民，舜都蒲阪”，“渔雷泽、陶河滨”，禹都安邑“行山表木，导水利川”。今山西临汾有尧庙、尧陵，永济有舜庙，夏县有大禹故迹。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史记》司马迁对商的记载是可信的，那么对夏朝的记载也应当是可信的，再往前推，夏的建立者启之父也不应当是子虚乌有的。近年来考古界关于夏墟、唐国、晋国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已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材料。

（三）夏墟考古与夏文化探索

山西汾河下游和涑水流域，素有夏墟之称。二十世纪初、中期豫西、晋南、晋中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对探索夏墟和夏文化有了重大

^① 李孟存：《晋国史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版。

的、突破性的进展。研究者认为二里头的相对年代正介于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在郑州旭畚王、临汝煤山、洛阳矧李等地都发现了有关的地层关系,即商代早期文化(二里岗文化)叠压在二里头文化之上,二里头文化又叠压在龙山文化之上,这说明二里头文化晚于龙山文化,早于商代早期文化。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据目前已公布的碳-14测定的16个数据中,除ZK257较晚以外,其余15个数据都在公元前2395—公元前1625年之间,这个年代同夏代(前二十一世纪—前十六世纪)纪年基本接近。^①

属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址在山西的分布主要在晋南和晋中两个地区。从1959年以来,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涑水流域,运城盆地,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潞河流域作过较为详细的调查。其中发现夏代遗址35处。发掘4处,有永济县的东马铺头、翼城县里砦乡感军、夏县东下冯和襄汾大柴四个文化遗址,文化内涵相同。其中以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面积最大,文化面貌最典型,研究者认为东下冯遗址的I—IV期在年代上与二里头文化I—IV期基本一致,文化面貌也相当接近或相同。东下冯遗址实际上是二里头文化的分支,把它称为“东下冯文化类型”。

东下冯文化遗存分为六期,遗物以陶器最多,陶质主要为灰陶,器表纹饰以绳纹为主,弦纹、附加纹次之。器类中饮具以单耳罐、双耳罐、深腹罐为多。此外还有深腹盆、大口尊、小口尊、蛋形瓮等。参照二里头文化碳-14年代测定,推测东下冯类型文化的相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十九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基本上在夏代纪年之内。并且,东下冯遗址正处在古文献记载的“夏墟”范围之内。

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晋中考古

^① 参见孙森:《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队又对晋中和晋北的太原东太堡、太谷白燕、忻州的游邀、汾阳的杏花村、峪道河、娄烦的何家庄进行了调查和发掘。上述遗址基本上覆盖了晋中地区。文化面貌有极大的相似性。研究者将晋中地区夏代考古学文化遗址分为三期,年代大约同东下冯类型一、二、三期相对应。陶器主要为灰陶,器表纹以绳纹为主,在陶器组合上以鬲、罍、甗、蛋形瓮为最常见,盆形鼎、盆形豆、盘形豆也时有发现,此外还有扁足鼎、爵,四足方杯等。这些特点是晋中夏文化的主要特点,它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同先商文化漳河型和内蒙古伊克昭盟朱开沟文化有明显的不同。所以有学者将它称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东太堡文化”。^①

综合山西夏文化考古成果有如下几项:(1)古文献所载的夏墟是存在的;(2)夏县的东下冯很可能就是文献所指的夏墟;(3)山西夏文化考古有两个文化系统:一个系统是与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文化遗存,以夏县东下冯文化为代表;另一个系统里既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文化特点,以太原东太堡文化为代表。

夏王朝是我国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个国家形态,夏王朝存在与否的解决对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再审查,对史前文明源头的探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夏墟考古为此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地下资料,为这一问题的解决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是自本世纪初疑古派以来对中国历史科学新视角的又一轮探索。

(四) 两周考古与区系晋文化类型

两周是晋国疆域初步奠定,晋文化特色初步形成的时期,这段历史在广义的晋文化上有显著的地位,考古学上晋文化的提出,使这段

^① 参见杨富斗,《山西的考古与发现·夏商》,载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历史的研究以及整个晋文化的研究迈向一个新台阶。山西两周考古主要是围绕晋文化考古展开的,五六十年代以来到今天晋文化考古有五项最突出的成果。

第一项是晋国侯马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史记·晋世家》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左传·定公四年》有“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汉书·地理志》载:“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这是古籍中关于唐国、晋国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唐国、晋国封地在山西无疑,但究竟在晋的何处,说法很多,归纳起来有两大类:一为晋南说,包括(1)河汾之东说(《史记·晋世家》);(2)永安说,其地在山西霍县(《汉书·地理志》师古说);(3)平阳说(《史记·晋世家》正义);(4)大阳说,山西平陆县(《史记·吴太伯世家》);(5)安邑说,山西夏县(《史记·郑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二为太原说,有郑玄的《诗谱·唐风》、班固《汉书·地理志》、杜预《左传注》、郦道元《水经注》、全祖望《日知录集解》等。

五十年代,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发现和七十年代末以来对该遗址的发掘,为寻找晋国都城遗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在曲村遗址发现房子、陶窑、晋国公族墓、邦国墓,年代从西周早期到两周之交。在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玉器。较重要的有商王康丁祀祖甲的“帝孽”方鼎,“晋中违父”盃,另外还有带“晋侯”铭文的铜壶。晋国公墓区的发现说明,曲村一带是在晋的始封地范围之内。综合现有考古发掘说明,西周时期晋文化遗存的主要分布区是在山西的翼城、曲沃、侯马、闻喜一带。这与文献记载的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范围相吻合。天马一曲村遗址作为故唐国范围已无可置疑。但它作为唐国或晋国都邑却还没有任何直接的依据:其一,唐邑或晋邑是对殷商之唐的取代,但在遗址中没有发现任何殷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二,天马一曲村遗址至今未发现作为都邑的城墙或大型夯土(宫殿)基址以

及与晋都直接相关的建筑遗迹。^①

第二项是侯马晋都新田的发现。《左传·成公六年》有关于晋国由都城故绛迁往新田的记载,迁都时间为公元前585年。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侯马西部发现了牛村、平望、台神、白店、马村、呈王、北坞等七座古城,其中前四座密集分布于古城遗址西部,北坞、马村、呈王三座环列其东。大多数城垣有大片夯土基址,牛村、平望、马村古城内还有远高于地面的夯土台基,应当是宫殿基础。在牛村古城内还发现了铸铜遗址,出土陶范数万块,陶范包括各种青铜礼乐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货币。器型纹饰有数十种,其中饕餮衔凤、饕餮衔虺、夔龙衔虺纹为晋国特有的纹样类型。此外还发现石圭作坊、制陶作坊、骨器作坊居址、墓地等。

晋都新田的发掘和研究,使我们对当时晋国城市结构、阶级关系、手工业发展、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内容有了初步的认识。侯马晋国都城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陶、铜、骨、石器,是研究晋文化的重要资料。两周时期的晋文化是相对周文化而言的。依据上述资料,研究者认为:在西周及春秋早、中期,晋文化是“作为周文化一部分的晋文化”。而到了春秋晚期(侯马晋国都城遗址时期)则全然相反,周文化无论陶器、铜器皆依晋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变化包括器物形态与组合两个方面。就是说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的晋文化完全取代了周文化的地位。同时研究者提出晋国都城遗址有三个突出的方面即:突出防御、突出手工业作坊、突出祭祀。新田遗址的这些特点构成“新田模式”。这一模式对以后战国时列国都城的建筑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如河南新郑的“郑韩古城”,河北邯郸的“赵王城”,河北平山的“三汲古城”(中山国),河北易县的“燕下都”,山

^① 田建文,《晋国早期都邑探索》,载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三晋考古》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西夏县的“禹王城”(魏),山东临淄的“齐故城”,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里程碑。^①

第三项是侯马盟书的发现,六十年代中期,山西考古工作者在侯马晋国遗址发掘出土了我国东周时期的晋国官方文书——侯马盟书。盟书文是用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石片或玉石上的盟辞誓言。当时称“载书”,据《周礼》记载:每篇载书一式两份,副本藏于官府,正本藏于地下。侯马盟书是埋于地下的正本。发掘的侯马盟书共 5000 余件,多数已残缺,其中较为清晰、完整者 650 余件,大多呈圭形,最大的长 32 厘米,宽 3.8 厘米,厚 0.9 厘米。盟书分宗盟、委质、纳室、诅咒、卜筮五大类。大意是春秋晚期赵氏宗室为了防止家臣离心离德,跟随赵尼,因而召集他们会盟宣誓。立盟者为赵氏宗主,参盟者为赵氏家臣。有同姓者,也有异姓者。盟诅对象主要为赵氏家族的另一支赵尼等,盟辞时间为公元前 496 年。侯马盟书是研究春秋晚期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②。它的发现,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结构、古代礼制、古文字和书法等的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材料。八十年代初,在河南温县也发掘了一批属于晋国的盟书,发现盟书万余片,盟誓时间为公元前 498 年,其主盟人是《左传》所说的韩不信。盟诅对象也为赵氏另一支,同侯马盟书打击对象性质相同。两盟书中打击对象中均有邮政。两处盟书反映的都是赵氏同范氏、中行氏的斗争。^③

第四项是 1988 年太原晋国赵卿墓的发掘。据研究,死者系春秋晚期晋国赵卿世族中的某一位,现有赵简子、赵襄子两种意见。从墓

① 田建文:《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载山西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李裕民:《侯马盟书》,《文史知识》1986 年第 3 期;李裕民:《我对侯马盟书的看法》,《考古》1973 年第 3 期;《中国考古四十年·两周》有关部分。

③ 赵世纲、罗桃香:《论温县盟书与侯马盟书的年代及其相互关系》,见《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6 年版。

葬年代和规格看极有可能是烜赫一时的赵简子。该墓是迄今所见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资料最完整的晋国高级贵族墓葬。赵卿墓的随葬品,计有 3100 件,按其质地可分为青铜、黄金、玉石、骨、陶、蚌具六大类,以青铜器为最多,计有 1690 件;按其用途可分为礼、乐、兵、御、工具、装饰、构件、饰件八类。青铜礼器是该墓葬的核心,计有 110 件,20 余种,铜鼎 28 件,其中一号大镬鼎高约 1 米,口径 1.05 米,是迄今所见我国春秋时期最大的铜鼎。晋国赵卿墓的发现,是晋文化考古的又一次重大收获,大大丰富了晋文化研究的资料。

第五项是区系晋文化类型的提出和研究。考古学上区系晋文化类型这一概念,是七十年代以来由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到八十年代逐渐为人们所使用。1985 年苏秉琦将晋文化内涵从考古学上作了概括:“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麦山下犁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①他认为晋文化考古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作为中原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晋文化,(2)作为北方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晋文化,(3)中原和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关于晋文化考古的地区范围他指出:“第一应将分布于山西南部临汾地区的霍山至稷山间约百公里范围内的考古遗存作为一个专题——晋文化考古。第二,这专题可分为两项:(1)陶寺—东许,(2)曲村—侯马。前者是晋文化的原型(雏形),后者是晋文化的主体。第三,前后两项并非互不连贯,同样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②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于晋文化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上作了新的探讨,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王克林认为,空间上应以叔虞封唐的唐地即晋国为中心向四方扩展,时间上由周初经春秋终于战国,而其渊源

① 苏秉琦:《对晋文化的再认识》,见《学术论丛》1995 年第 1 期。

② 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载《三晋考古》第 1 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于土著二里头文化阶段及其龙山文化^①。刘绪认为“严格地讲晋文化的年代就是晋国存在的年代,其上下限应以叔虞被封和桓公被废为标志……广义上讲,三晋文化也属晋文化。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把晋文化的下限断在三晋最后一家被亡之年——公元前 225 年”^②。杨富斗认为:西周时期晋文化是宗周文化的分支,当以周文化在晋始封地出现为起始,以秦文化在晋大量出现为晋文化结束。^③

(五) 战国时期的三晋法家

考古学界基于上述,有学者把两周晋文化作为一个类型,当然也把战国包括在内。我们认为战国三晋文化与传统的晋文化有内在联系是毋庸置疑的,但三晋法家又超出了考古学晋文化的内涵。三晋法家文化是百家之一家。从思想特征划分是儒、法、道、墨四家之一家。

李悝是战国法家之始祖,是战国时魏人,属三晋。《汉书·艺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已亡佚。《晋书·刑法志》云:“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李悝的《法经》有六篇,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这六部法是战国时各国变法的底本。《唐律疏议》说:“商鞅改法为律。”于是将以上六法改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律。这六部法律的基本精神和部分条律都贯穿到秦及秦以后历代的法律中。

法家的另一位人物是申不害,申不害是韩国人,属三晋。《韩非子·定法》云:“今申不害为术,而公孙鞅为法。”申不害称申子,《史记》将老、庄、申、韩同传,当然是属于法家。《申子》之书,《史记》载有两篇,《汉书·艺文志》载有六篇,但都亡佚了。较完整的言论只有《群

① 王克林:见《晋文化研究座谈会开幕词》,见《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

② 刘绪:《晋文化的年代问题》,见《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③ 杨富斗:《关于四十年晋文化考古研究》,见《学术论丛》1995年第1期。

《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一篇，可窥知其思想，申不害是法家中讲“术”的一派开创者，他讲的“术”是帝王南面之术，也即权术。

慎到是法家中主张“势”一派的始祖，是战国时赵人，属三晋。《庄子·天下》将他归入道家又兼及法，韩非把他视为法家，并对他很推崇。慎到的书有通行的《慎子》，慎到讲“势”，主要是强调帝王的名分。《慎势》中说：“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韩非子是综合李悝的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是韩国人，属三晋。韩非子集三家之大成，通行的书有《韩非子》五十五篇，建立起一套系统完整的法家理论。

另外法家学说的实际推行者，最著名的有两位，即吴起和商鞅。吴起曾同西门豹、段干木等在魏文侯帐下做官，以后由魏赴楚，在楚国主持了变法。商鞅，原是卫国国君的后裔，自小好刑名之学，慕名赴魏学法。但到了魏国后李悝已去世，只好在魏相公叔痤门下做家臣，研习李悝《法经》，其后带了《法经》赴秦，主持了有名的秦国商鞅变法。

上述可知，战国时三晋是酝酿、创造、传播法家学说的中心。追溯法家思想的渊源，郭沫若先生认为，李悝、吴起、商鞅是源于子夏之儒，而韩非子、慎到、申不害的思想渊源是老子。法家的形成固然有对道、儒的继承关系，但我们认为战国法家形成还不只是一个对道、儒或其他诸子的思想传承关系，三晋成为法家中心有更深厚的历史渊源。

中国历史上成文法的制定和颁布以郑国子产和晋国范宣子所铸的两个刑鼎为其开端。郑国是战国时的一个小国，是晋国的属国，子产的思想在郑国历史上找不到其渊源。而晋国有悠久的法治传统，这从叔虞初封唐国时，周成王特嘱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可得到说明。

子夏是魏国人，是孔子的门生，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却独无

子夏之儒,把子夏排除在外,这是因为韩非承认法家出于子夏,承认子夏是韩非自己的宗师,所以把他剔除在外了。子夏是孔子有名的门徒,是个儒者,但回到魏国却教出一批大有名头的法家,这也就是说正宗的孔儒一到三晋就变了样,这不能不从晋国的历史传统中找原因。从思想特征看李悝、商鞅确有许多儒家的痕迹,而韩非子和申子等也确有许多道家的痕迹,但不管取于哪家,都不是简单的承袭,法家一经出现,它就已不再是道家或儒家,而是新的一家了。法家是立足于法治对儒、道或其他子学的兼容并蓄和改造利用,这正是晋文化的传统特征和固有的性格。

战国诸子之学,以三晋赵人荀子的学说为终结,给百家争鸣画了一个句号。荀子是儒者,青年时期曾游学于齐,在当时齐国的学术中心稷下讲过学,《韩非子·显学》说他在稷下时“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他的课讲得很好。据说在稷下讲学时曾会过老年孟子,并同孟子谈过人性善恶的问题。荀子作为一个儒者,人们对他的学问很推崇,他的学生甚至说他超过孔子(《荀子·尧问》)。荀子是正宗儒家,是孙氏之儒的开创者(荀卿也称孙卿),后代有人说汉人所传的《诗》、《书》、《礼》、《易》、《春秋》的传授系统,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差不多都和荀卿有关。战国诸子中除孔子和子弓外没有一家没有经过他的批判。

荀子虽是一个儒者,但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他同儒家学说又格格不入。如对天道的认识,他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在人性上,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与儒家一贯讲的人性善是绝对对立的。在政治思想上,荀子对儒家的礼也只接受其一半,主张隆礼和重法。他提出的“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君道》),成了后代帝王所奉守的政治范式。所以他的门徒称赞他说:“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观其善行,孔子弗过。”(《尧问》)郭沫若说:“汉武以后学术思想虽统

于一尊，儒家成了百家的总汇，而荀子实开其先河。”^①历史上荀子发扬晋文化传统是最为典型的。

（六）汉晋时期的并州河东文化

三国时，山西的并州、河东是曹操最早收复的地方。在国家南北大乱之时，河东、并州是少有的一块相对安定的地区。因而这段时期是晋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曹操收复并州前，并州是袁绍的地盘，由其外甥高幹做刺史，高幹其人虽无雄才，但有雄志，贵名好士，招纳了四方来的游士和名流。但他好士而不择人，所以在政治上一无建树。曹操取得并州后，派梁习为并州刺史，梁习一到并州就积极接纳士人，并把一批有学之士送到曹操那里去做官。如常林、杨俊、王凌、王象、荀纬都在曹操的收复区做了县令。

曹操的河东太守杜畿，在河东任职十六年，任职期间，在河东创办了文武学堂，自己也亲自执经讲学，并四方招纳名流。河东名士乐详曾赴南阳向谢该从学《左传》，学成归乡后被杜畿署为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三国志·魏书·杜畿传》注引《魏略》）。黄初年间乐详被聘为博士。“于时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偏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已，惟详五业并授……以是独擅名于远近”（同上）。乐详生历三世，享年90余岁，晚年以老归乡回到河东，从其受教者前后有数千人。

建安十七年，高诱为河东监，高诱自己就是个大学问家，注《淮南子》二十一卷，流传至今；注《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流传到今；注《战国策》三十三卷，流传到北宋。河东是三国时名士云集的地方，汉魏时的大学问家仲长统到此讲过学，玄学大师嵇康也曾避居河东（《晋书·赵至传》）。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

并州、河东文化的发展更主要的表现在并州、河东高门望族的产生、发展以及对魏晋乃至南北朝隋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河东裴家,西晋时裴秀为尚书令,曾绘制《禹贡地域图》18篇。裴颢是西晋玄学家。太原王家,曹魏时著名的有王昶,显于西晋的有王昶子王浑、王济一支,显于东晋的一支有王昶的儿子王湛、王承、王述、王坦之,此外还有王蒙、王湛、王恭等,都是影响魏晋历史的世族大家。贾氏为河东另一著姓,自贾逵仕曹操而贵显,曹操临终时特嘱贾逵与夏侯尚同掌军国大计。西晋时贾逵之子贾充操纵晋中枢达20余年。《晋书·贾充传》载:“贾、裴、王,乱纪纲,裴、王、贾,济天下。”贾、裴、王三家所指就是上述三家。可知当时河东、并州这三大家的权势、地位和影响。

还有一支是河东卫氏,卫觐曾为尚书,卫瓘官至司空。卫氏也是西晋时的书法世家。卫瓘与西晋初敦煌人索靖并称当时书法界的“二妙”。卫瓘的族孙女卫铄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启蒙老师。

(七) 北朝文化

北朝文化既是一个考古学上的概念,也是一个区别于南朝文化的南北朝时期区域综合文化概念。从时间上说它包括从十六国到隋初约三百年的历史。就范围讲主要指长江以北地区的文化。从构成而言,它包括四部分:(1)中原文化,(2)北方游牧文化,(3)一部分江南文化,(4)同佛教一道传来的一部分印度文化。北朝文化的具体形成,一是民族融合,二是佛教东传。

民族融合表现在,第一,民族区域格局被打破,这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五胡大规模内徙,另一方面是汉晋以来的流民狂潮。东汉以来,匈奴南徙后大部分集中在并州北部的汾河流域,西晋时匈奴又有四次大规模的内徙,前后入境的匈奴部落种类有十九种,主要分布于山西的北部和中部。乌桓和鲜卑的入境时间和内迁路线大致相同,西晋以来,主要活动于山西北部,以后逐渐占领山西全境,

并以山西为基地统一北方。建都平城(大同)。在少数民族内徙的同时,汉民族也交错流迁,大量的是北方居民南迁,但也有河南、河北、山西的交错对流。尤其是拓跋族统一北方后,曾经有数十次军事移民,主要将被征服的各族上层包括部分汉族居民迁到平城周围。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是又一次大流动和大迁徙。促进了各民族的杂居。

第二,社会制度的一体化趋势。主要指北方少数民族逐步实现封建化。从十六国开始,但在此前已有三国时曹操对匈奴的五部建制,刘汉政权是匈奴改变自身传统结构的最重要的一次。以鲜卑拓跋族的统一为起点,各民族走上同步化发展的轨道。但在孝文帝改革以前,无论匈奴还是鲜卑拓跋部他们接受的基本上是汉制,即两汉的制度,以集权体制为主要内容,刘渊汉国尤其明显,鲜卑开始也是如此。刘汉和前、后赵政权上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汉、匈民族关系处理得不好。拓跋族前期也是如此,所以才发生了崔浩被杀的事件。孝文帝改革的主要意义不在于汉化,而在于他部分地实现了或说在基本部分实现了魏晋南朝制度化,说他基本部分是指对汉族士族的态度,以及本族贵族的士族化。但孝文帝改革后的北朝毕竟不同于南朝,它有鲜明的北朝特色。如均田、三长和以后的府兵制,是北朝政权所特有的。

第三,佛、道、儒三教合一的趋势。北朝时社会主流是佛教。佛教在北朝的隆盛,很大程度上在于北方统治者的推动。三教合一在历史上一直到宋明时才完成,但南北朝时期是个很重要的时期,南北朝三教的融合,在北朝主要表现在石窟艺术上,而在南朝则主要表现在对佛教义理的研究以及整个学术上。佛教传播以北方少数民族为载体,而北方民族汉化程度的加深,客观上推动了三教的融合进程。

其二是由拓跋族政权带动下的中外文化交流,主要以佛教的传播为载体,将印度和中亚的一些雕塑、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传入,成为北朝文化辉煌的部分。

四至六世纪中国历史上这段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山

西是其大舞台,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成果给古老文明的山西注入了生机,因此使山西在其后的发展进程中保持了蓬勃向上、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八) 唐至明清时期的山西文苑、艺坛

唐以后到明清是晋文化的成熟和发展时期。唐以后的晋文化大体上同祖国文化发展相适应,在诗歌、戏曲、绘画、书法、雕塑、小说等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和贡献。

1. 文苑巨擘

山西的诗歌在中国文坛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出自山西境内的有《魏风》、《唐风》等十九篇。而《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都是长吟不衰的名篇。北朝民歌更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如北朝的《木兰诗》,范文澜给予极高的评价,说“北朝有《木兰诗》一篇,足以压倒南北朝的全部诗人”(《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525页)。到了唐代,在唐诗人作家群中,山西诗人占有很大的比例,收入《全唐诗》的诗作者有2200余人,其中山西籍作者有60余人。清乾隆时蘅塘退士精选的《唐诗三百首》(实数为三百十首),其中就有山西籍诗人的诗作五十余首,仅王维一人就被选三十首。山西绛县的王勃为初唐四杰之一,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维的《渭城曲》、《相思》都是不朽的名篇。

2. 元杂剧的中心和发源地

平阳是元代杂剧的中心和发源地。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曾举“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齐名”,明代将其四人誉为“元曲四大家”。其中关汉卿是山西解州(山西解县)人,白朴是隰州(山西河曲)人,郑光祖平阳襄陵(山西襄汾县)人。其中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六十六部,白朴十五部,郑光祖二十二部,而全元杂剧现有五百三十余部(目),仅他们三人就占去近五分之一。王国维根据《录鬼簿》得元杂剧作家62人,其中北方籍49人,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阳为最

多,其数量占到大都的五分之二。近年来在山西稷山金代墓葬和侯马金代董姓墓中发现了杂剧优伶砖俑。在元杂剧作品中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郑光祖的《迷青琐倩女离魂》、白朴的《梧桐雨》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戏曲佳作。

3. 明小说泰斗

明代小说三部最优秀的作品《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中,《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山西太原人罗贯中著。此外有学者认为另一部巨著《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也是山西籍作家。

4. 书画劲旅

山西的画家一直是中国古代画坛的劲旅,巨匠代有人出。王维、薛稷等是唐代画坛大师,后梁时代今沁水县人荆浩与当时的黄仝、董源、巨然并称“四大画家”,世称他们是“画家正宗”。汤垕《画鉴》称荆浩的山水画为“唐末之冠”,今永济人马远是“南宋四家”之一。马远与其子马麟的宫廷画有“院中独步”之誉。元代著名画师有元六家,山西籍人高克恭为其中之一,有“云横秀岭图”、“春山晴雨图”传世。

山西书法除前述西晋卫氏外,北宋山西籍人薛绍彭与当时称“四大书法家”的苏、黄、米、蔡中米芾齐名。有“薛米”之称。元代沙门大同人李傅光,工草书,有大幅《佛说八大人觉经》为世人称奇,曾被当时最有名望的赵孟頫推荐于忽必烈,受封为昭文馆大学士,赐号“玄悟大师”。

除上述所谈外,山西在史学、文学评论、石窟艺术等领域也都有杰出的贡献,此不详叙。

二、晋文化发展的特点

宏观上看,晋文化是以华夏文化为本,多元融汇、渗透、凝结而成

的一个文化系统。从微观上看,晋文化经历了一个久远的发展时期,是由许多小环节组成的,而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由于历史环境的制约,又有许多自身的特征。这些特点可大致归纳为:开放中的创新;浑厚中的质朴;继承中的保守。

(一) 开放中的创新

远古以来,晋文化就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这首先是由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山西是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黄土高原三个自然单元相衔接的地区。这样一种地理位置,对古代的山西意义是很重大的。它南处中原是华夏民族的核心地区,北邻大漠,与塞外游牧民族相连接。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来自东北地区,因而在历史上当东北游牧民族南下,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山西是保卫汉族政权的前沿阵地,向称“北大门”,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当民族矛盾缓和,各族人民和平相处、密切交往的时候,它又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天然的孔道。

从交通条件看,山西早在古代就为世界交通要道。山西位于万里长城南侧,地处西域和中原东、西交通要道上。山西以晋阳为中心,由晋阳向西南,经汾、绛、蒲津关可通长安。位于晋东南永济县古蒲州城西门外,黄河东岸的蒲津渡,是古代黄河的一大渡口。这个渡口自古以来就是秦、晋之交通要冲。《左传》载“昭公六年,秦公子鍼奔晋,造舟于河。”《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桥”。以后北魏、隋都在此造浮桥。唐开元十二年(724年),为加强对中原以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易笮索为铁链,改木桩为铁牛”,造浮桥。到金元时,它一直是黄河的重要渡口之一。1991年,永济县博物馆发掘出土了唐代蒲津渡口系绳的铁牛。

由晋阳向南,经潞、泽,越太行山天井关可通洛阳。

由晋阳东出井陘关,经保定可通幽州(北京)或东出新罗、日本等。

在南北线上,由广东经开封北上,经太原大同,再由内蒙古归化城北进,可达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尔后经由西伯利亚通欧洲,这是一条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在水上交通还无法取代陆路交通之前,这是一条不亚于河西走廊的重要的交通要道。据解放后在蒙古萨县沟门和包头郊区出土的赵国墓葬,有大批铸有安阳、中都(平遥)、铜鞮(沁县)、藺(离石)、平阳、郛氏(巩县)、襄垣、戈邑等字样的大方足布,并有“安阳”布范的出土,昭盟宁城又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钱范和钱文出土。另外从西伯利亚和山西省发掘出来的许多青铜器等文物中也可以看出,早在汉以前东、西两洋已通过这条商路互相往来。

这条商路到元、明、清时已发展成为南北物质运输的大通道。闽粤和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物资,经水运至汉口、周口,以后由骆驼、驴骡等经开封、怀庆府(沁阳)、泽州(晋城)、潞安北运太谷、祁县,在这里加工后,再继续北上,沿晋北山区,经忻州、原平、代县出雁门关至黄花梁分道,一路去东口(张家口),一路去西口(归化城)。两口进入蒙古,再往西可由归化—包头—宁夏—兰州—敦煌到叶尔羌,或者由归化—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到塔尔巴哈台。往东经张家口—多伦—齐齐哈尔到呼伦贝尔,往北则是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到彼得堡,尔后进入欧洲市场。

苏秉琦在谈到晋的考古地理环境时说:“陕北、晋北、冀北及内蒙古南部,这个大体东、西向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从史前到三国时代历来是北方畜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接壤过渡的地带,它不是一条线而是宽数百公里的带,直到近世,这一地带仍是‘那达慕’盛会的分布地带。”“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带形成了大致南北并行的两个地带,而山西正处在这两个地带的通道之上,形成‘王’字形的态势,在北人南下的过程中,太行山下是一条主要通道,

当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国家后,山西又是他们重要的基地和后方。”^①

五十年代以来,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吕梁地区发现了一批晚商时期的青铜器,在这些青铜器中,其中一些大型的容器与典型的晚商铜器相一致,而大量的小型器件如铃首剑、双环削,以及一些车马器、马铃等,与殷墟铜器风格迥异,而与北方草原的青铜文化即北方系青铜器文化(或称鄂尔多斯青铜器)相似。这表明吕梁山一线青铜文化是与殷墟文化分属不同系统的一支地方性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商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特点。

晋文化所具有的特点,与对邻国的征服和实行充分开放的政策有关。晋国与周围为其兼并的小国有今霍县西南的霍国,山西平陆一带的虢国、虞国,今河津县东北的冀国,今黎城县的黎国,临猗县附近的郇国,还有董、韩、魏、耿、贾、扬等小国。

《国语·晋语》云:叔虞初封的唐国之地,“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晋国周围有许多戎狄部落,见于文献记载,西周时与晋人发生过关系的戎狄有:条戎、奔戎、北戎(一名山戎)、白狄、狐氏戎、骊戎、茅戎、扬拒、泉皋、伊洛、赤狄,这些戎狄分居于今晋南、晋东南、晋中地区。《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晋国把祭祀与处理戎狄的关系作为立国和强国的两件大事。晋国一开始对戎狄的态度是和睦相处的。晋悼公时,魏绛主张和戎,并提出和戎的五利,晋悼公采纳了这个建议,遂派魏绛为使,前往无终(北狄),与其缔结盟好。晋国同戎狄相处除结盟、服属、职贡等外,还同戎狄频繁的通婚。晋献公娶四个戎族之女,重耳娶狄人廛咎如部的季隗为妻。此外还表现在对戎狄中有才识的人的提

^① 苏秉琦:《晋文化与北朝文化研究的新课题》,见《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拔和重用。

晋国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妥善地处理了同周边戎狄的关系，广泛地吸收戎狄之人到晋国参政，为以后三晋的民族融合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借鉴。晋国的开放政策还表现在对别国人才的吸收和重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声子通使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子木曰：夫独无族姻乎？对曰：虽有，而用楚材实多。”这就是春秋时“楚材晋用”的故事。严复在《原富》一书的按语中说：“国之官事，晋用楚材，古今有之。”晋用楚材的故事很为后人所重视，这说明晋国的政策确是一个充分开放的政策。

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曲沃北赵（曲村）晋侯墓地 M64 中，出土了一套共 8 枚有长铭的“楚公逆”甬钟。另外在光绪年间《山西通志》中著录一件铭为“攻吴王夫差择毕吉金自乍御鉴”的吴国兵器，这件兵器出土于代县蒙王村。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忻州原平和晋中榆社又有吴剑出土^①。说明春秋时晋与吴楚有广泛的交流。

山西同匈奴、鲜卑、乌桓、羯、柔然、突厥、蒙古、女真等族有过长时期的交往和融合，影响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战国时期，一次是十六国北朝时期。

战国时三晋的民族融合，首先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是三家分晋后，赵晋的第六代国君，当时赵国处于齐、燕、中山、林胡、楼烦、东胡、秦以及韩、魏的四面包围之中，称“四战之地”。赵武灵王执政后，下决心学习胡人的骑射和装束，用以富国强兵。他先以原阳（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黑水河左岸）作为其胡服骑射的试点，取得成

^① 杨材中：《楚器、吴器在晋文化中的发现》，载《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6 年版。

功后,很快推行全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不仅在于他在本国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增强了军队实力。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改革推向全国,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改革。赵武灵王的改革不仅对中国古代战争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古代的交通运输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春秋时中原地区的马匹只用来驾车,不作骑乘用。唐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纪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者,当是周末时礼。”同时赵武灵王在全国推行胡服,也是中国服装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新,他为后代汉族引进胡服、改革汉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另一项是战国时三晋的变法。战国时的变法是从小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开始的。李悝变法的核心是“食有劳而禄有功”,这是对西周“世卿世禄”制度的根本否定。李悝的改革带动了其他国家的变法。李悝所倡导的这一原则和由此引起的各国的变法,使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所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李悝变法“实开后世布衣将相之局”。战国时三晋是法家的策源地和中心,前已述之。

战国时还有一个学派叫纵横派,属诸家之一家。战国时首先倡导连横的是张仪,他是魏国人,主张合纵的公孙衍也是魏国人。《孟子·滕文公下》载当时人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纵横家在战国虽属独立一派,但它同法家却不无联系,准确地说它是法家法、术在外交活动中的应用。《史记·张仪列传》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是三晋之人也。”所以纵横家大多出在三晋也不是偶然的。

北朝时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这次民族大融合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北魏孝文帝以及北周周武帝的改革的意义,远不在于它对当时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而真正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并进行有效统治的模式。而且北朝在政治制度的建设、民族关系处理等方面也为汉族

统治者提供了借鉴。在很大程度上,隋唐的发展,特别是大唐的繁荣是这个模式的最合理的应用和推行。从隋唐国家的构成看,隋代杨、李两家都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又都是汉化了鲜卑人,据统计,鲜卑人在隋唐两代做官至宰相者 20 余人,此外做官至尚书、侍郎以及地方上的都督、刺史更不胜数。还有北朝的文化政策,主要是思想的宽容、观念的解放。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女皇,这正是北朝文化的产物,是北朝文化开放、宽容的产物,武则天的出现,我们在儒家的思想氛围内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答案的。

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有广泛的联系,如同东北的勿吉、室韦、豆莫娄、地豆于,库莫奚、契丹、乌洛侯等族,西部的氐、吐谷浑、宕昌、邓至、蛮、獠等族,西北的鄯善、高昌、于阗、焉耆、龟兹、车师、渴槃陀、乌孙、悦般、疏勒等族,北部的柔然、高车、突厥等族。此外对外交流也较广泛,如同高句丽、波斯萨珊王朝、印度、南天竺、中天竺、北天竺等国联系频繁。山西地区北朝的考古发现有冯氏永固陵司马金龙墓,库狄迴洛墓、娄睿墓等,在这些遗址中都发现了精美的石雕、壁画和其他青铜、陶制工艺品等。七八十年代在大同北魏墓葬中,陆续出土了属于公元三、四世纪波斯萨珊王朝或安息国的艺术品。有八曲银洗、刻花银碗、鎏金高足铜杯、鎏金高雕高足铜杯,波斯银盘、玻璃碗、银耳杯、石灯台等,充分反映了各族人民和中外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盛况。

北魏除在制度上革新,在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领域内,也进行了一次革新和再创造。康有为在评论北魏书法艺术时,指出其有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远,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润达,血肉丰美等。北魏书法上的这种美,也正反映了整个北朝文化的精神和气势。

每一次民族融合,都是一次对固有制度的革新,一次新文化的生成。赵武灵王在实行胡服骑射时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

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荀子是个儒者，但他所倡导的人定胜天等思想却被后世儒者视为“洪水猛兽”。这些集中反映了晋文化革新、进取、生成的文化内涵。

（二）浑厚中的质朴

晋文化赖以生长的这块黄土地自古以来是极为丰厚的。从地貌形态看，山西是由丘陵、高原、平原、盆地多种地貌构成的地区，适宜于农、林、牧、渔等多种经营。历史上的山西林木繁茂，草场广阔，是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地区，不仅山地、丘陵分布着原始森林，就是汾水、涑水流域也是草木茂盛之地。早在 180 万年前的西侯度遗址中发现的化石动物就有鲤、鸵鸟、剑齿象、纳玛象、鹿、野牛、毛犀、中华长鼻三门马等，在丁村遗址发现貉、梅氏犀、原始牛、印度象等 27 种动物化石。由于地形气候复杂，构成草地的植物种属和生态类型也复杂多样，因而具有丰富的野生经济植物、野生药材和较多的野生动物。山西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因而也是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山西很早以前就是一个较为发达的地区。战国时代孟子就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三国时曹操征汉中，“军食一仰河东”。唐太宗李世民称河东是京城的财源。山西境内有河流 1000 余条，河流面积大于 100 平方公里的有 240 余条，有较好的水利灌溉条件，气候虽然较差，但高温与雨季同期，水热利用效率高，有发展农业较好的条件，较为广阔的晋南、晋中平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

山西的经济优势，更在于取之不竭的矿产资源。总体说来，山西属山地高原地带，山地中的地质结构复杂，地层较为齐全，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形成山西丰富多样的矿产资源，可谓山必有矿。丰厚的矿产资源使山西很早就成为国家燃料、铁冶、银冶、铸币的重要基地。运城盐池早在先秦时代就成为重要的盐业基地，唐代全国有盐池 18 处，而在晋南的解县、安邑就有 5 处。大约在东周末年，山西已用煤炭作燃料炼铜，制造农具、兵器和炊具。西汉在全国设铁官 40 处，河东

郡占4处。北齐时綦毋怀文冶炼的宿铁刀，“斩甲过三十甲”。唐人有诗曰：“安得并州快剪刀，截断吴、浙丰江水。”明洪武元年（1373年），全国设13个铁冶所，其中山西就有5个。其他手工业也繁称发达，宋元时代晋城一带的瓷器非常有名。元、明时代上党盆地共有织机13000台，所产潞州绸驰名中外，是北方最大的纺织业中心。

盐、铁、煤炭、纺织业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特殊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而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这四个生产部门的优势，是这一地区无与伦比的实力体现。

丰厚的物质资源，孕育了厚、重、质朴的晋文化。言其厚，是指晋文化有悠久的历史，涌现了一批高才异质的卓越人物：政治家霍光、武则天、司马光、裴度、狄仁杰等；哲学家韩非、荀况、王通、柳宗元、元好问、傅山；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名将关羽、杨业、薛仁贵、尉迟恭、张辽；音乐家师旷、柳世隆；佛学家法显、慧远、昙鸾；史学家裴驷、裴松之、裴子野；地理学家裴秀、徐继畲；经学家乐详、孙盛、阎若璩；科学家石申、孙威、许国贞；大诗人王勃、王之涣、白居易、王昌龄、温庭筠、卢纶；画坛巨匠荆浩、马远、高克恭；书法家卫觐、卫瓘、卫铄；文学家罗贯中、郭璞、赵树理；纵横家张仪、公孙衍；美学、诗歌评论家张彦远、司空图；经济界巨子段干木、曹三喜、乔贵、孔祥熙。其中许多是一身多艺，在许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如司马光既是宰相又是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作者；王维既是诗人又是画坛巨擘；元好问既是哲学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傅山既是哲学家又是美学家、文学家、医学家。同时还有许多对中国历史进程有过影响的人物，如王允、吕布、贾充、贾南风、石虎、尔朱荣、石敬瑭、阎锡山等。

晋文化的厚，还表现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所发生和流传的许多美妙而神奇的故事，为中国文化保存了珍贵的民间文化素材。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晋祠柳春花马鞭提水；介子推被焚绵山；五台山康熙的无字碑；苏三起解洪洞县；洪洞县大槐树下寻根；永济普救寺

张生和崔莺莺的绵绵情恋；永乐纯阳宫八洞神仙之一吕洞宾；山西孟县的赵氏孤儿；高君宇、石评梅一段美好的情结。这些都为晋文化平添了无限的情趣和神韵。

言晋文化之重，首先表现在山西的高门望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持久而巨大的影响。如闻喜裴氏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声名显赫无与伦比，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难以估量的贡献。其源远流长，宗支昌大，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久盛不衰。据《裴氏世谱》不完全统计，自汉至唐，裴氏家族中历代居宰相者 59 人，大将军 59 人，中书侍郎 14 人，尚书 55 人，侍郎 44 人，皇后、太子妃、王妃 9 人，裴氏子弟尚公主者 20 人。另外金元时期浑源县孙氏家族一门三代为科学世家，山西孔祥熙孔氏垄断近现代中国经济达半个多世纪。

晋文化之重，集中表现在出生于山西解县三国名将关羽，以及关羽崇拜的文化现象上。关羽是三国时豪杰，他言合经义，武能建功，在关羽身上体现的既有华夏民族素来提倡的忠诚信义，也有北方游牧民族那种豪迈、勇武的气质。一定意义上说，关羽是晋文化的产物，他身上集中反映了晋文化厚重、深沉的内涵。关羽死后，特别是到宋以后统治者对关羽的赐封，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不断追封。从北宋哲宗开始，一直到清宣宗约 700 年中，有 16 个皇帝给关羽追加封号 24 次之多。先为忠惠公、义勇武安王，继而协天大帝，接着又是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到顺治时，又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宜镇关圣大帝”，受封头衔达 26 字，褒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儒家把关羽树为同文圣孔子并祀的武圣；佛教把他封为伽蓝神之一，把他塑在十八罗汉旁供奉；道教也把他封为“关帝圣君”祭拜。而社会下层人民，更把关羽奉为“祖师神”、各个行业的保护神，他们建坛立庙，用自己特有的祭拜方式对关羽倾注了无限的敬仰，几乎到了无关庙不成村，“九州无处不焚香”的地步。这比起敬奉孔子的“一

方烟火无庵观”，无疑高出许多。关羽也是金元杂剧、明清小说和民间说唱所讴歌的头号人物。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能像关羽这样，受到统治者如此隆盛的推崇和老百姓如此虔诚的祭拜。再联系薛仁贵三箭定天山，杨家将威镇雁门关，穆桂英挂帅战洪州，应当说这些彪炳史册的忠烈英雄出在山西不是偶然的。“从来燕赵多豪杰”（朱德：《太行春感》），“三晋由来产异才”（司马光诗）。历史上，人们把晋文化养育的这种精神称为“幽并之气”。

朴实是文化上的一种美，而浑厚基础上的质朴又是文学上的一种高境界。

北方民歌是晋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北齐流传到今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老幼皆知的一首北方民歌，是北齐进攻北周之玉壁（今山西稷山县）时将士齐唱的歌。原词是鲜卑语，是用汉语译过来的。这首歌朴实无华，但却气势宏阔，魅力无穷。金元时文豪元好问有首诗评道：“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自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中州集》）

再如产生于黄河边河曲县的二人台《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妹妹实难留，怀抱梳头匣，给哥哥梳梳头。”“走路要走大路，万不能走小路，大路上人儿多，好给哥哥解忧愁。”这首《走西口》创作于咸丰五年（1855年），它反映的是山西大旱灾后太春和玉莲这对新婚夫妇为生活所迫，忍痛别离的一个无限悲苦的场面。歌词凄切、逼真、催人泪下。

现代文学史上有山西的“山药蛋”派，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胡正的《两个巧媳妇》，所描写的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他们所用的语言也都是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群众语言。而这个学派的开创者赵树理，却被称为是

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它所显现的正是一种纯朴无华，但蕴意深刻的晋文化的“本色美”。

（三）继承中的保守

晋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是一份宝贵的财富，但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厚、负累多，便有了积重难返，不愿接受新事物的弊症。近代以来世界新文化的传播渠道是海上新航路，中外文化的接轨处已转移到沿海地区，所以山西在历史上那种多种文化碰撞、吸收、生成、辐射的孔道作用和文化接轨的领先地位，暂时地失去了。

继承上的丰厚多样表现为：

1. 山西的多神信仰

天地信仰：包括崇拜日神、月神、星宿神、太岁（木星）、魁星、文昌帝（文星）、真武（北方玄武七宿）、风雨神、土地神、城隍、山神、水神（包括泉神、河神）、井神、火神（包括祝融、炎帝、回禄、阇伯、灯光爷、旺火、火龙、塔火等火祀方式）。

人神信仰：有关帝（解州关帝庙及民间的不同方式的祭拜），财神，门神，二郎神（祭拜《封神演义》里的杨戩，手里常牵着一头哮天犬），东岳大帝（祭拜商纣大将黄飞虎），孔圣人，姜太公，老子，唐尧（临汾尧庙），虞舜（运城舜帝庙），禹门口（河津县黄河渡口），大禹渡（芮城黄河渡口），稷王庙（在万荣县），成汤（浮山县有禹汤庙），晋祠（唐叔虞），姜邑（叔虞母，晋祠有圣母殿），介子推（介休绵山介子祠），窆大夫祠（太原市上兰村祭祀开渠济民的晋国大夫窆肇），狐突（晋献文公时的大夫），赵武（孟县藏山为赵氏孤儿藏匿处），程婴、韩厥、公孙杵臼（赵武灵王的大臣），赵杲（代县交口乡洪寿村五里处的赵杲观，该寺建筑奇特，该观位于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区），磨笄夫人（定襄县七岩村，宋封为惠应圣母，俗呼七岩娘娘），刘知远祠（太原南郊），唐太宗庙（浮山县），尉迟恭公庙（朔州市），武则天庙（介休、文水），狄

仁杰庙(太原狄村),杨家祠堂(代县鹿蹄涧,内祀杨业、杨宗保、佘太君、穆桂英等),元遗山祠(忻州韩岩村),周遇吉祠(宁武县),傅山祠(内有傅山的诗、文、书、画、医,忻州),民间巫覡的神龛里还有魏徵、唐僧、孙悟空、薛仁贵、樊梨花、赵匡胤、包拯、济公等等。

行业祖师神,有鲁班,织女,梅葛(印刷业),杜康,醋神(帝子),黄帝,神农,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张飞,孙膑,庞涓,蔡伦,吴道子,罗祖(理发师),唐明皇,张果老,师旷,管仲,皋陶,白眉神(妓院祭神),福、禄、寿三星,喜神,命神,龙,土地爷,灶王爷,送子娘娘庙,谷神,牛王,马王,蚕神(嫫祖),树神,花神,虫王。

宗教信仰:佛教,列入中国佛典的佛教胜地,山西有 130 座,五台山现存 47 座。道教有吕洞宾、天龙山道观。此外,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信仰。

鬼神信仰:有祭亡灵,鬼魂,犯鬼,叫魂,解梦,阎王,五道将军等。

2. 山西社火小戏

社火小戏是春节期间民间的自演自娱活动。源于远古对土地和火的崇拜。社是土地神,《左传》记载:“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火是火祖,是传统中最早的火神,《汉书·五行志》云:“帝喾则有祝融,尧时有阍伯,民赖有德,死则以为火祖,配祭火星。”可见此活动由来已久。全省有社火 300 余种。按其形式可分为锣鼓类、秧歌类、车船轿类、阁跷类、灯火类、模拟禽兽类、模拟鬼神类、武林类等几大类。

山西锣鼓历史久远。有“天下第一鼓”之称。《山海经·大荒东经》和《太平御览》卷五八二引《帝王世纪》记载有一段上古神话,说黄帝曾用“声震三千八百里”的鼓声,击败“铜头啖石,飞空走险”的蚩尤。山西锣鼓种类很多,著名的有《威风锣鼓》,源于唐尧时代,流行于临汾地区。威风锣鼓队的锣鼓声,雄浑壮阔,撼天动地,气吞天下,令海外称奇。晋南平陆县的《黄河锣鼓》,在秦、晋、豫的黄河三角地带颇

有名气,是源于春秋时虞国的宫廷锣鼓,迄今有 2000 余年的历史,曲牌有《黄河春潮》、《黄河涛声》、《八面来源》、《砥栏鸣澜》等。另外有《太原锣鼓》,阵容整齐,大气磅礴,乐器有大鼓、大铙、大钹,曲目有“单一二五”、“双一二五”等。《花敲鼓》流行于新绛县一带。

秧歌。全省有《汾孝秧歌》、《太原秧歌》、《大秧歌》、《小秧歌》、《河曲秧歌》等 30 余种。

小戏。全省有小剧种 56 个,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有平陆高调,万荣清戏,晋南眉户,永济道情,左权小花戏,代县道情等。

民间其他艺术形式,有大同城隍庙会,大同人的“踏青逛唱”,九曲黄河灯会,孤山奶奶庙会,五台山节日庙会,高平的九莲灯,襄垣的鼓书。此外还有技艺精湛的民间剪纸,农家的炕围画等。

生活在三晋古老土地的山西人民有丰富的文化积累。一位外地作家到山西体验生活,如是写道:“穿行在吕梁山区的山庄窝铺,徜徉在晋南农村,惊叹那里许多农家和城镇居民的门匾和对联,字体或飘逸俊秀,或苍劲浑厚,挨门走去,好似书法比赛,高低难分。那里许多老先生甚至一些目不识丁的老农,像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一样,擅长板话,出口成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城乡弥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①

3. 土窑洞与山西人

高原居民居住多为窑洞,其历史可上溯到石器时代。近年来在芮城、夏县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土窑洞遗址。清康熙《隰州志》载:“民皆穿土为窑,工贾不省,久者可支百年,有曲折而入如层楼复室者。每过一村,自远视之,短垣疏牖,高下数层,终囊栖屣,历历可指。……平地亦多垒砖为窑,山木难构,且窑中夏凉冬暖也。”在今天的晋南、晋中、晋北、晋西北仍有很多这类住宅。窑洞有多种好处,省材实用,冬

^① 李仁虎:《一言难尽山西人》,见《南人与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 1995 年版。

暖夏凉,坚固不易坏。

4. 足迹遍世界的明清晋商人和固弊自守的近代晋文化

山西人向有经商的传统,从先秦以来,山西商人就足迹遍天下。战国时代魏文侯所尊敬的段干木就是太原豪商。在汉代,山西已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有了贸易往来。自唐、宋迄明清,长城内外的商业大多由山西商人进行。诗人韩愈有诗描绘唐代太原一带的商业繁荣:“郎郎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太原县志·艺文》,明嘉靖版)明清两代晋商是国内三大商帮(晋帮、徽帮、湖帮)之首。德国人李希霍汾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张正明:《晋商兴衰史》)。从食盐、玉石、毛皮、绸缎到当铺、钱庄,山西商人无所不经营。西至阿拉伯,东至日本,北到莫斯科,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到处有山西商人的足迹。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道光初诞生在山西晋中,到二十世纪山西票号已发展到33家,分号多达400余处。“中国二十二行省,支分派别,尤有万里同风一气贯注之势,晋人遂以善贾闻于宇内”(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晋商不仅遍布国内市场,而且触角伸向日本、沙俄、朝鲜、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时称“汇通天下”。

明清山西商人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商帮,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在世界创业史上是罕见的。这确是山西商业史上的一段辉煌历史。但是在近代资本主义贸易支配世界的时候,山西商人却骤然衰落,一蹶不起,个中原因很多。

雍正年间,山西巡抚刘于义曾有一奏折道:“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土风卑靡。”雍正见此特朱批曰:“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雍正朱批谕旨》47册)当时有一乡村教书先生也痛心地说道:“近来吾乡风气大

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退想斋日记》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商贾云集的晋中,流行一句著名的俗谚:“家有三石粮,不做童子王。”

山西这种重商轻学,学而优则商的风气堵塞后备力量的培养,堵塞了知识的更新、观念的更新和科学经营方式的输入。他们带着沉重的传统信仰的负累、落后的行帮习规的束缚,无法适应已经飞速变化的时代,无法迈出新步伐,在近代资本主义贸易竞争规律下必然溃败。

三、晋文化在华夏文化中的地位

(一) 原始文化的源头之一

山西是原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从山西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得到说明,可从下面几方面概述:

1. 旧石器文化遗址遍布山西的晋南、晋西南、晋中、晋北地区

考古学将人类文化诞生距今约 13 万年划入旧石器时代。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址,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发现近 200 处,而在山西境内就有 157 处。在旧石器考古方面,山西省已建立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系统,文化遗址覆盖旧石器早、中、晚三期。

属于旧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址在山西省的分布有:晋南芮城的西侯度、匭河,襄汾的丁村、垣曲盆地,此外还有万荣、新绛、河津、永济;晋中太原的古交、榆社;晋北大同的青瓷窑,河曲的河会等。

属于旧石器中期的,晋南有典型的位于襄汾汾河两岸的丁村遗址群,曲沃里村西沟,霍州赤峪,永济东姚温,侯马南梁;晋北有阳高许家窑,朔州后屹塔峰,静乐凤程山,原平后口;晋中有太原古交,交城范家庄,以及寿阳、平定等。

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有晋北的朔州峙峪,大同小站,大同王龙沟,右玉张家山,大同山自造;晋南有永济下川,吉县柿子滩;晋中有榆次大发等。

2. 山西有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址

山西芮城的西侯度旧石器文化遗址距今 180 万年,比云南元谋人遗址早 100 多万年。考古工作者在西侯度发现 22 件哺乳动物化石和 32 件石制品。位于山西芮城风陵渡附近的匭河遗址的年代,有学者认为它与距今 100 万年前的陕西蓝田公王岭的年代大约相当^①。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在北京猿人的范围之内。^②

3. 山西丁村发现的我国旧石器中期遗址是我国旧石器中期的一处典型的遗存

在丁村遗址,发现属于同一个十二三岁儿童的 3 枚牙齿和大约两岁小孩的右顶骨化石。丁村人的绝对年代据铀系测定为距今 16—21 万年,用氨基酸法测定为距今 7 万年左右,用电子自旋共振测定为距今 7.5—10.4 万年,处于地质时代的晚更新世早期。

4. 山西许家窑文化遗址是我国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最为丰富、规模最大的遗址。在遗址中发现儿童上颌骨 1 块,顶骨 12 块,枕骨 2 块,颞骨 1 块,下颌骨 1 块,左上臼齿 3 枚,下臼齿 1 枚,共 21 件,代表 10 多个不同人体。另有石制品两万余件。

5. 七十年代在丁村遗址又发现属于旧石器早、中、晚三期的文化遗存 12 处。这个发现不但使丁村遗址的范围扩大了一倍多,而且将丁村遗址的文化由旧石器中期拓展为早、中、晚三期,这对探索丁村人的来龙去脉有极重要的意义。

① 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7 页。参见《山西考古四十年·旧石器时代》。

② 邱中郎:《匭河文化遗址的时代问题》,见《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 年 6 卷第 3 期。参见《山西考古四十年·旧石器时代》。

6. 以丁村遗址为代表,从石片打制等技术上看,它不同于我国和世界上目前已发现的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研究者认为,它同之前的西侯度文化、匭河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类型。这说明在山西地区出现的旧石器文化类型是一种独立的、土生土长的、自行发展、自行过渡的一种文化类型。

7. 山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覆盖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

在山西武乡县石门乡牛鼻子湾发现了属于前仰韶时期的石磨盘、石磨棒各一件,在翼城县北橄乡枣园村发现了较为典型的前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在晋西南的芮城东庄和晋南的临汾一带发现了仰韶时期早期的文化遗存。在芮城西王村、翼城县北橄乡、大同马家小村等地发现了属于仰韶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在临汾、运城盆地以及晋中地区发现了大量属于晚期的文化遗存。另外在晋西南地处涑水河流域的闻喜、夏县、运城、永济、临猗、万荣、芮城以及晋中的太谷、汾阳、石楼、娄烦等地发现了处于由仰韶到龙山文化过渡形态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时期的文化在山西地区发现 40 余处,典型的有:芮城南礼教、夏县东下冯、襄汾县的陶寺遗址。

以上考古充分说明,山西是原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探索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

(二) 华夏文明的内核

古文献记载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同尧舜禹的这段历史在春秋以前的古代人眼里是没有问题的,但到孔子整理古籍时,只取《尧典》以下一百篇,割断了此前的历史,而在当时或稍后的诸子书中仍都以炎黄为中华民族之发端。司马迁《史记》亦取诸子之说,以黄帝为我国历史的开始,并在《五帝本纪》中特别作了说明。这段悬案姑且不论,那么尧以下的历史应该是可信的。

五十年代以来的山西考古,为夏代的存在提供了许多有力的地

下材料。先是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六七十年代,属于龙山文化类型的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初步被确定为夏朝文化遗址,目前发现的东下冯遗址达 35 处之多,其中在临汾就有 29 处,这与《禹贡》所载的冀州,周人所说的大夏正相契合。龙山文化类型在山西的另一处遗址是襄汾陶寺遗址。陶寺墓地约三万平方米,发掘墓葬数量一千余座。从墓葬的分布和随葬中反映出严格的等级制度。大型墓葬最少,小型最多,中型居中。在大型墓葬中多出鼍鼓、特磬、土鼓等礼器。研究者推测,其大墓中埋葬的可能是部落联盟首领之类的人物。据此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早期遗存可能和帝尧——陶唐氏有关,而中、晚期遗址可能是夏人的遗存^①。也有的人认为同夏人无关,同唐尧有关^②。总之同古代的尧舜禹有直接的联系。稍后垣曲商城的发现都说明山西是华夏的核心地带。

钩稽古籍有关记载,参照考古材料及研究,有学者提出:《左传》所说的唐、夏墟、大夏实为一个地区,即唐在夏墟之内,夏墟在大夏之地……从平陆一带至霍山周围的河、汾、涑、浍地区,就是夏墟、大夏之所在^③。后人解释帝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章太炎先生说,所谓“华夏”源于华山夏水是极有道理的。黄帝尧舜禹时代是中华文明奠定时代。苏秉琦先生说:“中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主要发展轨迹已相当清楚了,中国考古学已走向成熟了。晋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坐标已可标示出来了。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大约相当距今 4500—2500 年间的山西南部,从最初把‘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名词发展成为北方(中原)一霸,占了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近半。”^④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远古时代的晋文化是形成华夏文明的内核和源头。

①② 见《山西考古四十年·新石器时代》。

③ 《夏县东下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④ 苏秉琦:《对晋文化的认识》,见《学术论丛》1995 年第 1 期。

(三) 中华文明的纽带和火花作用

苏秉琦指出：“从整体上来看(晋文化)它是‘中国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古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对于‘纽带’这一词，如果我们仅仅理解为桥梁，或联结点，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它的重要意义远不止此。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古文明的‘火花’才是它之不大平凡的所在。”^① 他在这里是就晋文化考古而言的。

纽带，是指两种文化的连结，火花则是指两种文化碰撞后的新生成。实际上这两个作用，是由特殊的“走廊地带”形成的。所以这两种特殊的作用不仅是在华夏文化形成时期，而在以后的发展时期仍是这样。晋文化这两个作用大致在五个时期表现得最明显：第一，两周区系晋文化时期；发生在周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之间；第二是战国时期的法家文化，它同齐文化、鲁文化相区别，是法与礼的碰撞与结合；第三是北朝文化，区别于南朝文化，是中原文化同北方游牧文化的碰撞和结合；第四是元代杂剧，是中原汉唐到宋的诗、词、曲同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的一次结合。第五，山西现代的“山药蛋”文学派别，也称“火花派”。它是传统的民族艺术形式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形式的结合。其创始人是赵树理。赵树理的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郭沫若在读完《李有才板话》时惊叫道：“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以后郭沫若又几次称道赵树理的作品，说它表现了“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作世纪”^②。茅盾在《关于李有才板话》一文中写道：它，“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标志了进向民族形式的一步”。“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

^① 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见《三晋考古》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者们,足资借鉴。”^①

文学界把赵树理等的创作作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典型,是不奇怪的,这确是旧传统与新文化的一种完美结合,它所体现的正是晋文化的这种“火花”作用。继赵树理之后,以山西作家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束为等人的创作为核心,最终形成“山药蛋派”,并创办了《火花》杂志。

(四) 对祖国文化的保存和继承

1. 古代建筑的保存。山西古代建筑保存至今的数量占全国的70%,几乎保存了自北魏以来的各代建筑,数量之多占全国之首,其建筑艺术的精妙绝伦也为世界所公认。著名的有大同的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晋祠的圣母殿、鱼沼飞梁,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其中,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座木塔,向有“塔大应县小”之称。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所用斗栱60多种,900多年来,由于其结构巧妙,多次大地震安然无恙。位于永济县的普救寺塔为唐代建筑,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

2. 石窟艺术。位于大同市武州山的云冈石窟是我国中原地区开凿最早的石窟,也是我国由皇室经营的第一所大石窟,它与敦煌、龙门石窟并为我国南北朝大石窟的代表。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旧窟45窟,小龕1100多个,造像五万一千余躯。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昙曜五洞。云冈石窟佛像造型是融印度、希腊、波斯和北方游牧文化及中原文化为一体的东西方文明的结晶。此外,山西境内的石窟还有鹿野苑石窟、天龙山石窟。

3. 名胜古迹。山西有名胜古迹数百处,列入国务院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13处。五台山榜列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五台山有翠岩峰、望海峰、拱月峰、锦绣峰、叶斗峰,五峰耸立。其内寺院林

^①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第164页。

立,景色宜人,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晋祠是全国闻名的胜景,除神态各异的佛教塑像外,晋祠之水亦驰名海外,李白有诗曰:“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泻翠娥。”又如恒山的悬空寺,洪洞的广胜寺,隰县的小西天,芮城的永乐宫,永济的大禹渡,交城的玄宗寺、掛山,忻州的禹王洞、奇村温泉,代县的赵杲观等都是历史名胜。

4. 文物与晋人著述。山西是“中国戏剧的摇篮”,山西保存了不少金元杂剧作品,特别是解放后在晋南发现了宋元时代的戏俑、戏台、杂剧砖雕等罕见的戏剧文物。山西现存的戏曲文物占全国的80%以上。

晋人著述非常丰厚。近年来由刘伟毅主持编写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一书将于最近面世,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收录山西文献 5049 种,其中山西地方志收入 822 种,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多最完全的,佚书 590 种,并收录国内稀见的珍本、孤本、稿本、手写本、批校本等善本秘籍,对研究晋文化学术价值很大。从乾隆《大清一统志》后,山西陆续编写了一大批志书,在嘉、道、同、光四朝,山西有各种志书 150 种,代表性的有光绪《山西通志》,徐继畲的《五台新志》,以及光绪《代州志》、《忻州志》等。民国时,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印了《山右丛书》,计分 10 函,每函 10 册,收集古籍 38 种,其中多为近代山西学者的著作。

第一章 地理面貌

晋,是春秋时期一个诸侯国的名称;三晋,是战国时期韩国、赵国、魏国的合称。晋与三晋,都在今天的山西境内,所以,今天的山西便有了“晋”或“三晋”的别名。

今天的三晋,位于黄土高原的东半部、黄河中上游流域,西限黄河,与秦地两岸相对;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毗邻;东与南,以太行山为界,分别与冀、豫两省接壤,成南北狭长的纺锤形状。全境土地面积15.6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千多万。

第一节 地域形势

一、初民对三晋的开发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告诉我们,中华大地是人类产生的地区之一,而三晋则是中华人类产生的重要地区。根据目前三晋地区的考古发掘发现,全境有10余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存,其中比较著名的文化遗存就有:西侯度人类文化遗存、匠河文化遗存、海峪洞遗存、丁村人文化遗存、许家窑人和峙峪人文化遗存。

西侯度人类文化遗存位于三晋南部、黄河东岸的芮城县境内,属于距今一百数十万年的早更新世人类产生和出现时期。这里发现的人工打击而成的石块、石刃及刮削器物,证明这一时期的人类已经学会使用和制造简单的工具,用这些简单的工具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源。这里还遗留下了经过烧烤的动物的骨骼,由此推测,这里的古人很可能已经开始使用火。

晚于西侯度人类文化遗存,属中更新世早期的人类文化遗存,是匭河文化。匭河文化也在芮城县境内。同西侯度文化遗存比较,这里遗存下来的石制工具不仅有细小的砍斫器、刮削器,还有大型的三棱尖状器、石球等,说明了匭河人的生产规模比西侯度人有所扩大,他们很可能不像西侯度人那样,只满足于用细小的石制工具获取小型动物为生,而用较大的、尖锐的石器猎获大型的甚至凶猛的动物。并且,从制造工具的方法来看,除了像西侯度人那样,使用锤击和碰砧法外,还出现了投击法,这也是很有特色的。值得注意的是,西侯度与匭河都位于芮城县境的黄河东岸,两地成北、南向相对,直线距离约30公里,而且时间顺序大致相连。这就使我们可以推测,两地文化遗存当系一个系统,说明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考古学家们多年来的考察证明,不仅在三晋南部、黄河东岸的芮城有西侯度、匭河等早期人类文化遗存,而且在晋、陕、豫三省交界之处黄河岸边,属于三晋地区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还分布于平陆、垣曲等县境内,像垣曲县南、黄河北岸的海峪洞人居住遗址,就可与北京猿人遗址相对照。这些都说明,三晋地区人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

西侯度和匭河人类文化遗存都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旧石器时代中期三晋境内的人类文化遗存则以丁村文化和许家窑文化为代表。

丁村文化是以丁村为中心,分布于襄汾县境内汾河东岸20处旧

石器文化遗存的总称。这里发现的丁村人化石,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丁村人。丁村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的典型遗存之一”,“石器类型多样,有单边砍砸器、多边砍砸器、石球、多边形器、三棱大尖状器、鹤嘴形厚尖状器、小型尖状器和刮削器等”^①。其中,三棱大尖状器在考古学界被专门命名为“丁村尖状器”。据推测,“丁村尖状器”和鹤嘴形厚尖状器,很可能是用于挖掘植物的。丁村人的生活来源除了依靠猎获鸟兽鱼虾等外,还有大量的野生植物。考古学家还分析研究了丁村人的石器形制,认为这些石器的打击技术都比旧石器时代初期有了明显进步,形制相当规整定型。劳动工具的定型,说明劳动对象的稳定。这种规整定型的石制工具的出现,表明了丁村人有了相对稳定的、能够较长时期地为他们提供生活原料的劳动对象,他们的劳动已经有了一定的自觉性。

属于丁村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系统的,还广泛地分布于汾河流域的侯马市、曲沃县、霍州市、交城市、古交市、静乐县等境内,与丁村文化遗存连成一线,证明汾河流域早在数十万年前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

考古学家们还仔细地考察比较了匭河文化和丁村文化的特点,得出结论说,“初步推定,丁村文化可能渊源于匭河文化”^②。这就告诉我们,三晋境内黄河沿岸与汾河流域的古人是一脉相承的,河、汾地区为他们提供着充足的生活资料,他们也在开发这一地区的过程中不断地成长进化。

除了河、汾地区之外,在今天三晋北部的大同盆地,也有与丁村文化相同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这就是著名的许家窑文化。其分布范围几乎占据了今天的整个大同盆地,“是目前我国旧石器中期古人

^{①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类化石和文化遗物最为丰富、规模又大的遗址”^①。考古学家经过多次发掘,认为许家窑人“既具备一定的原始性,又有接近于现代人的特征”。“许家窑遗存在旧石器文化中增添了很多新内容,特别在工具方面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反映了这个阶段经济领域有较大发展;同时,突出地存在着许多细小石器,已经有了几种细小石器的母型(原始类型),与后来发达的细石器有着文化传统上的密切联系,表明了我国细石器类型文化渊源之长”^②。尽管目前还没有找到许家窑文化的渊源,还不能肯定旧石器初期这一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但可以推断,许家窑文化是某种人类文化的延续。许家窑文化和丁村文化的对应,又说明三晋大地遍布着古人类活动的足迹。

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其典型的文化遗存是位于三晋北部的朔州市境内的峙峪文化。峙峪文化属于细石器工具初期发生、发展阶段,从石器的制作和形制来看,生产力水平有了不断的进步和提高,以渔猎为主的原始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峙峪文化标志着三晋地区的古人类结束了旧石器时代的生活,开始迈向了新石器时代。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已经遍布于今天的三晋境内,山西省已经调查发现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300余处,分别属于仰韶母系氏族文化和龙山父系氏族文化,并且体现了这两种文化的连续性和地方特色。

新石器时代的父系氏族社会,大体与传说时期的三皇五帝时期相当。根据三皇五帝的历史传说,帝尧建都于平阳,帝舜为冀州之人,耕于历山。冀州当今山西、河北境,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历山即今山西南部的中条山,两地均在今山西境内,说明尧、舜时代三晋是中原强大部落的中心。尧、舜是否真有其人,是一个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的问题,然而司马迁认为,文字记载的传说与民间长老的言传都是有根据

^{①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的。至于他们是否在三晋境内建立过都城,也还没有实物证明,但目前的考古已经证明,具备相当规模的城市出现,恰恰就在龙山文化时期。这也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尧、舜时代的都城问题。

总之,从目前三晋境内新、旧石器考古发现来看,不仅文化遗存分布广泛,几乎遍及全境,而且在文化系统上体现出某种联系。石器文化遗存分布的广泛与某种相互联系,说明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活动的持久。他们一代接一代地在这儿繁衍、生活、生产,由盲目地适应自然到比较自觉地制造工具、改造自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经历了一个进化发展的阶段,而原始三晋境土也经历了一个开发变化的阶段。

二、夏墟、唐国与晋

根据七十、八十年代晋南地区“夏墟”考古发现,可以认为晋南地区的一部分曾为夏王朝的直接统治地区。^①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为什么首先在这里诞生?

财产的丰富和分配的不均,会导致社会等级的区分,国家机器正是为了维护少数特权等级而产生的。以渔猎为主的原始生活,没有积聚财产的可能,而只有稳定的农耕为主的生活,才有可能贮积财产。夏朝在这一地区立国,其重要原因是这一地区早期农业生产的发生。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周人的祖先后稷就曾为夏王朝时代主管农业的官吏。夏朝的创立者禹在治平水土之后,让他率领众庶耕植取食。司马迁的记载固然是依据传说,但从早期农业发生的条件来分析,三晋境内的汾河下游地区,水源充足,土质疏松,提供了简单劳动工具下农业产生的基本条件,因此,这个传说是可信的。正由于农业

^① 参见山西考古研究所编:《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生产最早在这里发生,当地经济才有了相对的稳定性,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阶级的分化、国家的产生。而国家一旦产生,就可以把分散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组织起来,扩大生产的规模,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因而,夏王朝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向文明时代的过渡。

夏朝灭亡后,商汤又把帝尧的后代分封到夏朝立国初的地区,因为帝尧号称陶唐,故又将这一地区改称为唐国。

到西周初年,周武王死,周成王继位,商朝遗民反对西周的统治,发动了叛乱,唐国也乘机反周。西周在平定了殷民的叛乱后,一举消灭了唐国,将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分封到这里。《吕氏春秋》说,叔虞所以受封为唐王,是因为他幼时与成王一起玩,成王剪一片桐叶,说待叔虞长大后,他就像剪一片桐叶那样,把唐国分封给他。当时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旦听到成王这样说,虽然觉得是戏言,但为了维护周成王天子的尊严,就主张对叔虞进行实际的分封,这样,叔虞就有了唐国。这故事就是流传至今的“桐叶封弟”。

尽管“桐叶封弟”的故事早有人怀疑,以为对待分封诸侯如此重大的事,绝不可能草率从事,但叔虞受封唐国确是有可靠的记载。《左传·定公四年》卫国的大臣子鱼叙述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情况时,关于叔虞的分封是这样叙述的:“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鞶、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出土的晋公盂铭文也有如此记载:

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蛮,广司四方,至于不庭,莫不来王。〔王〕命唐公,□宅京自(师),□□□邦。

这些足证西周成王之弟叔虞受封唐的真实性。如上所述,唐的封地是夏墟,也就是夏朝立国之地,《史记·晋世家》则更具体地说:“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根据这一记载,历史地理学家们基本考定,这

个“方百里”的唐国，应在今山西翼城县境。那么，夏墟亦当在此。

除了分封土地之外，叔虞还受封了“怀姓九宗”的居民。所谓怀姓，是指尚处于游牧生活状态下的戎狄少数民族，王国维将其考定为隗国居民。因为西周灭唐，将唐国原有居民迁往异地，把西周统治下的少数民族迁移到这里。所以，在政治上要用夏朝的统治方式来统治他们，即所谓“启以夏政”，而在土地的划分上，则依照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习惯，不实行“井田制”，划分为牧地，也就是“疆以戎索”。

叔虞死后，其子燮继位，将唐改称为晋，国都建在翼，即今翼城县境内。到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即位，主持晋国国政，将他的一个叔叔分封到曲沃，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一带，称为桓叔。桓叔是晋昭侯的长辈，他的封邑曲沃又比晋国的都城翼城要大，人口也多，桓叔很快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与晋昭侯相对抗。到桓叔的孙子曲沃武公时期，势力更加强大，将晋国的国君晋哀侯杀掉，占据了国都翼城。曲沃武公死后，其子诡诸继位，称晋献公。晋献公即位后，害怕重蹈晋昭侯的覆辙，将晋国的贵族子弟统统杀害，改都城翼名为绛，并扩大城池规模，修筑了宫殿，晋国以绛都为中心，逐渐开始强盛起来。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当政时期，晋国又把都城迁到新田，称新绛，在今侯马市附近。直到三家分晋之前，晋国的都城一直在这里。

春秋初期，晋国的基本领土是今天的晋南地区。晋献公时，晋国的一位大臣宰孔在谈到晋国的处境时，说晋国是“景霍以为城，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霍指霍山，在今霍县境，为晋国北部边境之城防，汾、河、涑、浍四条河，像沟渠一样灌溉着她的国土，而她的周边，环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经过春秋中期的不断扩张，晋国逐步吞并周边的小国和少数民族，开拓了北边的疆土，占有今天的晋中、晋东南等地区。

三、三 晋

在整个春秋时代,各大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不断地进行着兼并战争。晋国在晋文公重耳当政时期,终于成为中原霸主,左右了中原各国的事务。晋文公之后,晋国的霸业虽然日见衰落,但由于中原众多的小国已被各大国兼并,而晋、秦、齐、楚等大国之间又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所以,晋国的疆土既无多大扩展,也还没有被侵吞。然而,外部的争霸,使得各大国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逐渐加剧,晋国内部的争夺似乎更为激烈。晋国在晋献公时期,曾尽杀群公子,一度翦除了公卿篡夺国政、互相残杀的隐患,但同时,又培植了一些辅佐公室的宰臣,使之成为公卿。到春秋后期,晋国内部已经形成了左右国政的六家卿大夫,即智氏、范氏、中行氏、韩氏、魏氏、赵氏。在公卿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赵氏首先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占有了两家的封邑,而后,又联合韩、魏,消灭了智氏,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形成韩、赵、魏鼎立的局面。公元前403年,名存实亡的东周王室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与晋国国君地位等同。到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便干脆灭了晋国,三分其地。后人称之为“三晋”。

三家分晋前,韩国建都于平阳,在今临汾市,占有今晋南的西部地区;魏国建都于安邑,在今夏县境,占有今晋南的东部地区;赵国建都于晋阳,在今太原市西南,占有今太原以北、以东地区。因为原来的晋国和晋国境内卿大夫的采邑均被三家瓜分完毕,所以,这种格局就决定了韩、魏两国向南发展,而赵国向北、向东发展。三家分晋后,韩国很快向南出兵,消灭了郑国,并迁都到郑,即今河南省新郑县。魏国也为了避开秦国的锋芒,徙都大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赵国则为了向北扩张,建都于邯郸,即今河北省邯郸市。这时,所谓三晋,已经超越了晋的范围,扩展到今天的河南、河北等省境。

三晋向河南、河北等省境扩展,并在这些地区建立都邑的历史,不属于本志述说的范围,这里要说的,是他们在晋地的发展情况。三家分晋的前后,韩、赵两国分别占有今天的晋东南地区,建立了各自的上党郡,而雁北地区则由赵国一家来开拓。

当时的雁北地区还是北方各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分为代国、林胡、楼烦等部族。赵国在赵简子时期,为了稳定北部边境,结好于代国,将他的女儿嫁与代王。赵简子死后,赵襄子继承王位,赵国开始强盛起来,向代地扩张。赵襄子率兵进入今天的雁门关一带,借口与代王相会,乘机杀害了他,吞并了代国。赵襄子之后,赵国在相当时期内由于内乱,对北边的开拓停顿下来。到了战国后期,赵武灵王当政,深感北边林胡、楼烦等民族对赵国的威胁,在军事上锐意改革,改变汉族车战及士兵披甲戴盔的传统,让军士穿起北方少数民族轻便的服装,学习骑马射箭,以适应与这些少数民族骑兵作战,这就是所谓的胡服骑射。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果然练就了赵国的强大的骑兵,一举击败了林胡、楼烦,不仅占据了今天的晋北全境,而且拓地至今内蒙古境内。至此,今天三晋地区的北部界限基本奠定了。

第二节 自然形势

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着一定的精神文化的形成,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造成了区域文化的差别。三晋文化所呈现出的特征,是三晋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孕育的。

一、多样的地形和复杂的气候

今天的三晋,西限大河,东屏太行,境内山峦起伏,高原、丘陵、盆

地犬牙交错,地貌形态复杂多样。三晋的东西两侧,分别是高耸绵延的太行山、吕梁山。其东北部,有号称华北屋脊的太行山支脉五台山,有吕梁山向东延续的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中部有太岳山,又称霍太山;南部是中条山。这些高山峻岭,平均高度在海拔 1500 米以上,山势险峻,雄浑壮观。与上述诸山相连的是高原和丘陵,太行、太岳和中条山之间是晋东南高原,吕梁山以西是晋西高原。三晋的地貌总体来看,高山、高原、丘陵的面积占到全境土地总面积的 72%,堪称高山之区了。

山岭、高原、丘陵相互交错,在它们之间形成了盆地。从北向南,依次有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晋中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这些盆地,都在山间的陷落地带。在远古时期,这些盆地都是面积广大的湖泊或沼泽。诸如大同盆地,在旧石器时代及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还是一片汪洋;晋中盆地,则是著名的昭余祁藪干涸和沉积的结果,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广阔的泽藪还有零星的遗存;临汾、运城盆地,在春秋早期还是水深土浅的沼泽地区。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这些地区的湖泊逐渐变为盆地。除此之外,在晋西高原和晋东南高原上,也有大小不等的一些盆地,它们则是黄土沉积和水流冲积的结果。

三晋境内的气候,除了受纬度带的影响外,还受到地形的影响,形成了复杂多变的气候。从纬度带来看,三晋处于北纬 $34^{\circ}16'$ — $40^{\circ}44'$ 之间,属我国北暖温带到温带的过渡地带。从经度来看,处于东经 $110^{\circ}15'$ — $114^{\circ}32'$ 之间,属大陆东岸温带季风气候区。这种过渡性的气候带,本身就比较复杂,再加上山岭的阻隔,使南北、东西气候呈现显著的差异。南北两个气候带,是以恒山、内长城为分界线的。恒山以北属温带季风型大陆气候,以南为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而且,从地形上看,由南向北海拔高度逐渐增高,南部的运城盆地海拔高度为 200—300 米,而到大同盆地,海拔为 1000 米左右,就更使得南北温差增大,在北部出现了一些高寒地区,南部

出现了一些暖湿区域。从东西方向来看,由于三晋地形南北较长,东西狭窄,东西又有太行山、吕梁山作为屏障,不像南北气候差异明显,但以大同至运城盆地的断陷盆地为界限,东西也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气候带。吕梁山北部和晋西高原与太行山南部和晋东南高原相比较,前者比较寒冷,而后者就比较温暖。太行山以东,是辽阔的华北平原,这里终年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各种农作物生长茂盛,与晋东南高原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由于三晋境内多山,气候的垂直变化也很显著,盆地内与盆地边缘的气候不同,丘陵与高原的气候不同,高原与山岭的气候也不同。五台山及吕梁山脉的一些高峰顶部终年白雪皑皑,而五台山脚下的忻定盆地,吕梁山东部的晋中、临汾等盆地的冬季却比较短促。就全境四季变化情况来看,总的是冬春两季较长,寒冷干燥;夏秋两季较短促,温热多雨。但由于地形高低起伏较大,各地的情况又很复杂。不仅如此,山高、岭多的地形特征,直接导致了全境降雨的不均匀。夏季,受东南季风的影响,是全境雨量较为集中的时期,但由于山岭的阻隔,往往形成东南雨水充足、西北干旱的状态。冬季,受西北寒潮的影响,全境应有多次降雪过程,但也由于山岭的阻隔,西北与东南的降雪往往很不均匀。总之,多样复杂的地形条件,是影响全境气候的主要因素。

大约在人类刚刚出现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其南北温差比现在还要强烈。根据考古报告,那时候,丁村人生活的汾河中下游流域,要比现在温暖湿润,有许多亚热带动植物生存;而许家窑人和峙峪人生活的雁北地区,气候似较现在寒冷。秦汉以后,随着华北地区气温的逐渐降低,三晋地区的汾河中下游流域气候开始变得温暖而干燥,而三晋的北部地区气温也有所增高。

三晋地区这种多样性的地形条件、复杂的气候条件,给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带来了多样性,因而也形成多层次的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

二、水文和植被条件的变迁

除了地形和气候条件外,对三晋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起影响作用的,还有水文和植被条件。水文和植被的变迁,改变着全境的整个自然环境,对人们的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晋的地上水文状况主要是河流,包括汾河、涑水河、朱家川河、三川河、昕水河、丹河、沁水和桑干河、滹沱河、漳河等 10 条大的河流,前七条归属黄河水系,后三条归属海河水系。这些河流大多源于高山峡谷中的泉流与雨季的山洪,有明显的涨水期和枯水期,水流量极不稳定。水量比较恒稳、流域面积最大的是汾河,其次是桑干河、滹沱河、漳河和涑水河。

汾河发源于吕梁山脉北部山峰管涔山南麓,汇集附近众多泉流,成为巨浸,奔腾于峡谷中,至太原一带,流速渐缓,经晋中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汇集晋中盆地上的文峪河、洞涡水,临汾运城盆地上的浍水河、涧河等支流,于运城盆地的西南口注入黄河。全长 716 公里,流域面积 3.94 万平方公里,几乎纵贯三晋南北,不仅是三晋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桑干河发源于恒山西北部的朔州市境,发源处有七大泉流,即《水经注》所说的“洪源七轮”。其上游有两支支流汇入,一支为黄水河,古称漯水或治水,故桑干河又有漯水或治水之称;另一支源于管涔山的高山湖泊,即《水经注》中所说的“天池”,向北流经宁武西境,称恢河,至朔州市注入桑干河。桑干河东北流,经过大同盆地,出省境,进入河北,称为永定河。滹沱河发源于五台山峡谷,西流经繁峙县境,绕五台山,东流经忻定盆地,越太行山,进入河北境,称为子牙河。沁水、漳河都在晋东南高原,向南流出境,分别注入黄河与海河。这些河流,是三晋大地的大动脉,三晋大地

不可或缺的水资源。

汾河、滹沱河、桑干河都曾有长期的航运历史,春秋时期秦国输送大批粮食给晋国,赈济晋国的饥荒,都是通过渭水进入黄河,逆汾流而上,船到达晋国都城新田。两汉时,还兴建过沟通汾河与滹沱河的运河,目的是通过滹沱河、汾河,转运河北的粮食进入关中。可见当时这些河流的水量之大。逐渐地,汾河行船的活动由中游退缩到下游,至今已不复行船了。滹沱、桑干等河行船的历史大致在明清就结束了。其他河流如涑水河、三川河、朱家川河等,也都由长流河变为季节性河流。

随着水量的逐渐减少,流域面积的不断退缩,历史时期流域内星罗棋布的湖沼、水泊,逐渐变少,至今消失殆尽了。远古时期,三晋境内最大的湖泽是汾河中游的昭余祁藪,在《尔雅》里它被列入最大的十藪之列,可见在汉代它的水量还是很大的。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这个原来连成一片的昭余祁藪便分割为邬泽、祁藪、汾陂等沼泽了,以后,逐渐干涸成陆地。除昭余祁藪外,汾河中下游在古代还有很多的湖沼、泽藪,仅就《水经注》记载所见,就有文湖、方泽、王泽、洞涡泽等,其中文湖“东西一十五里,南北三十里”,是较大的湖沼。直到宋代,它还存在,并有鱼蒲之利。到宋以后,为了开辟耕地,人为地将它毁灭了。除汾河流域的湖沼、水泊外,桑干、滹沱及其他河流流域内,古代也都存在过一些积水较多的湖陂,这些湖陂也先后消失了。水文的变化,既是各种自然条件和人们社会活动变化的原因,也是其变化的结果,三晋自然条件的变化、社会面貌的变化,可以说都与水文的变化密切相关。

与水文、气候变化相伴随的,是植被的变化。三晋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地区,今日看来,这块土地沟壑纵横,到处显现出深厚的黄土堆积,但在古代,她的面貌却并非如此。远古时期,三晋虽属荒漠草原地带,但在她的高山河谷间,却生长着茂密的森林;高原和丘陵上,也是

草木茂盛。进入人类历史时期,汾河下游两岸、吕梁山脉、太行山等地,也都是林木集中生长的地区。到南北朝时期,洛阳地区的土木营建所需木材大抵多来自吕梁山脉一带。《北周书·王黑传》记载,当时朝廷任命王黑到西河郡(今吕梁山西部地区)做太守,他没有接受这个官职,别人问他,西河是一个大郡,俸禄优厚,你为什么不就这个职呢?王黑回答说,京都洛阳的材木,全部来自于西河,朝官显贵修筑宅第,都要通过太守这个官从那里索取树木,倘要我自己亲自为他们采办,实在不堪胜任,倘若要百姓们为他们砍伐,那又违犯法禁,这个官不好当,所以我辞掉了。这段记述,虽然没有具体地说明这一带森林的面积,但从洛阳地区从这里伐取材木的情况看,整个吕梁山西部地区,森林的覆盖率是很可观的。同时,也可见对森林的砍伐和毁坏也是相当严重的。直到北宋,这里的林木仍旧是朝廷各种土木营建的主要原材料。

林木茂盛的地区,也是泉源旺盛的地方。三晋的河流,主要源于地下泉流和山洪,茂密的林木,涵养丰富的水源,往往在密林之下,是源渊潭涨的泉流。诸如汾河源头的东西温溪之间,“水上杂树交荫,云垂眼接”;汾水支流原过水的源头,“攒木犹茂”;晋水源头所在地晋祠,“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平阳境内的平水源头,“其地茂林蓊郁,俯枕清流”^①;滹沱河的上源,水流“悬河五丈,湍激之声,响动山谷,樵伐之士,咸由此度”,而森林采伐亦以水流为运道,水流之上“巨木沦漚,久乃方出,或落崖石,无不粉碎也”^②。如此等等,都可看出,在隋唐以前,三晋境内大致凡有河流水源的地方,皆有良好的森林覆盖,用青山绿水来形容,大概不为过分。

除了森林之外,在丘陵和高原地区,亦有良好的灌木和杂草覆

① 《水经注》杨守敬注疏本。

② 《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

盖,形成与山林相间的一些草原地带。诸如吕梁、太行、五台、恒山诸山山麓,都曾是草木茂密的良好牧地。另外像今天的晋西高原、晋东南高原,以及三晋境内一些著名的原、隰之地如晋国王室墓地九原等地也都有良好的草木植被。

随着人类对土地需求的不断扩大,也随着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变化,草原被开辟为农田,森林面积也逐渐退缩,到明清以后,三晋境内的森林、草原面积已经很有限了。与此同时,水资源也愈来愈显得匮乏,黄土裸露,水土流失成为当地的主要问题。

三、自然环境与人文状态

三晋的地形是多样的,气候是复杂的,水文、植被的变化也很显著,这些自然条件,究竟给三晋文化的形成、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晋多山,丘陵、高原、盆地交错,气候温而略寒,是农业、畜牧业发展适宜的地方。

三晋农业的发生,是在黄河流域农业大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开始的,大约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和夏代。而农业文化最早发达的地区是今天的晋南盆地。按照历史传说,尧、舜都曾在今天的晋南地区活动过,在这一时期,已经设立了农官,懂得了按照四时播种百谷,可知那时这一地区的农业已经全面兴起。继尧、舜之后的夏朝是一个依靠农业发展起来的王朝,这个朝代的前期,已经掌握了分辨土壤优劣的知识,能够确定历法、农时,农业生产已有了高度的发展。然而,农业发达的地区仍在盆地,今天的晋南盆地,仍旧是夏王朝农业的集中地,也是其赖以立国的根本之地。夏王朝后期,统治中心转移到今天的豫西平原,而夏朝立国的晋南盆地,也就是所谓故夏墟,分封给曾经为夏朝统治者豢养巨龙的刘累的子孙。因为这里曾是帝尧建都的地方,而帝尧称陶唐氏,所以,夏朝中心地

带转移以后，这里因袭陶唐之号，称为唐国。唐国的文化究竟是农业文化，还是畜牧业文化，史籍没有明确的说明，只是在周初灭了唐国，分封叔虞为这一地区的最高领主时，曾指令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人们因此推测，夏王朝迁徙到豫西平原以后，这里又变为戎人的牧场，从叔虞封唐以后，才把周人的农业经济推广开来，重新进入农业文化状态。因而自叔虞以后的晋文化，应属于周文化的体系，而不是继承夏文化的独立体系。这种推测是否可靠，还得检查一下史实。叔虞封唐，确实受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但这里所说的“戎”，是唐国遗民呢？还是被周人强行迁入这里的少数族呢？按照《春秋左传》的记述，被夏朝分封到故夏墟的刘累的子孙，也是夏族的分支，当是一个经营农业的部族，而周人建国后，唐人是因反对周朝的统治而被灭国的，唐国被消灭之后，唐民就被迁往异地，其中像晋国六卿之一的范氏，其先祖就是唐人而被迁徙到杜地，即今陕西杜县的。这就可以推测，既然唐国遗民被迁出，那就有其他部族迁到这里，所以“疆以戎索”不是针对唐国遗民的，而是针对新迁到这里的少数部族的。又因为夏朝的农业文化不能被人为地割断，所以要实行夏初的统治方法，推行夏文化。换句话说，唐国居人并非以牧业为主的“戎”，他们是继承了夏代的农业文化的。而周人迁徙了部分少数族的“戎”来到这里，虽然不得不暂时按照这些戎族的生产习惯划分土地的疆界，但从长远来说，还是实行夏政，推行夏朝的文化。所以，叔虞以后的晋文化，仍是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而不应为周文化之系统。尽管周文化与夏文化同系农业文化，但其源头不同，其分支属系亦应有所区别。

经过尧、舜的开辟，夏人的经营，唐人的继承，到西周，今天的晋南盆地，也就是河、汾之间“方百里”之地，呈现出“十亩之间，桑者闲闲”，男子稼穡，女子缝裳的农业社会欢乐而繁忙的景象。晋国以此为基业，逐渐地强大起来。经过晋国的长期经营和不断开发，到秦汉时

期,晋南盆地,也即当时的河东地区已是与关中、洛阳等地区势成鼎立的农业经济重心区域了。

三晋的开辟者最先选择了那个河、汾之间“方百里”的地方发展农业,使之形成农业文化体系,是与那里自然条件极其相关的。河、汾之间,当时气候温和湿润,水源充足,土质疏松,为农业的开辟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当农业成为人类社会主要的生产部门之后,这里就很自然地成为农业文化区域。

正由于客观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和限定,三晋地区凡是农业开辟较早、发展较快的地方,大都在自南向北的断陷盆地。河汾之间及由此扩大的河东地区,是率先进入农耕社会的地区。与这一地区相比较,其他盆地诸如晋中盆地、忻定盆地、大同盆地,根据文献记载来推测,进入农耕社会的时间似乎晚了一些,但目前考古资料说明,在这一系列断陷盆地上,散布着众多新石器时代遗迹和遗址,包括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就说明,这些地区在史前也曾出现过农业。是何种原因中断了这些地区农业的发展,未能使它们像河、汾之间那样发展起来,尚待今后的研究。但在这个中断以后,这些地区的农业的普遍繁荣还是要比山区早得多。到了春秋中后期,今天的晋中盆地农田水利灌溉事业已经相当发达,水稻、小麦已成为主要的农作物。滹沱河、桑干河流经的忻定、大同盆地,自春秋战国至秦汉虽然一直是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相互争夺的地区,但农业的发展仍旧比较迅速。而所有这些盆地内的农业区,虽然发展程度有高低之差,但在三晋的早期历史中,却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农业文化体系,与山区的畜牧业文化相对立。

三晋地区广大的山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天然的草场,是畜牧养殖业赖以发展的良好基地。春秋时期,在中条山区有皋落之戎,在黄河东岸、吕梁山区有犬戎,晋东南高原有赤狄、潞狄、铎辰、留吁之戎,常山以北及晋西北黄土高原一带,则有林胡、楼烦之戎,如此

等等。这些少数民族依赖着这些山区丰美的水草,从事畜牧和狩猎,虽然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却也从整体上形成了一种畜牧业文化。只是这种畜牧业文化没有独立地延续下来。因为,一方面,畜牧业比较农业更受自然环境与条件的限制,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更大,随着气候、植被、水文等自然条件的变化,草原变成荒漠,沼泽成为旷土,畜牧业就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转移或者衰竭。另一方面,由于农业文化对畜牧业文化的不断侵袭,也导致了畜牧业文化的不断瓦解和衰落。春秋时期晋国发生的“魏绛和戎”,以晋国无用之“宝货”,易戎狄有用之土地,即是农业文化对畜牧文化的侵袭和瓦解。所以,到战国以后,三晋境内尽管还有不少山区和边境为牧业之地,但那已不应属独立发展的畜牧业文化,而已成为农业文化的附属品了。这种附属品所以仍旧存在,是因为在一些山区和边境,畜牧业的自然条件没有发生毁灭性的变迁,农业文化还不能够侵袭到那里。例如吕梁山区的某些地区,直到汉唐仍是国家放牧马群的场所,就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宜牧而不宜农。但类似这样的场所,已失掉了畜牧业文化的意义,而被农业文化所包含了。

综上所述,三晋地区客观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为盆地内农业文化的发育、山区内畜牧业文化的发育造成了可能,人类对自然的自觉适应和创造能力,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从而在三晋境内形成了以盆地为中心的农业文化区和以山区为主的畜牧业文化区。在这两种文化区域内,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呈现出本质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条件的不断变化,农业区域不断扩大,畜牧业衰落了,全境由单一的农业性物质文化统一起来。而精神文化方面,仍然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差别,纤俭习事,温雅柔顺,那是农业文化的习俗;好气任侠,豪放倔强,则是畜牧业文化的遗风。这种差别即使到了现代工业社会,也还时有所见。

第三节 文化地理

三晋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复杂多样的,三晋人为生存、生活而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出的文化地理景观也是绚丽多彩的,这绚丽多彩的文化地理景观,成为三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聚落与居处

人类在地球上降生,创造的第一种文化景观就是居处与聚落。从穴居野处到高楼广厦,从原始群落到现代化的乡村、城镇,人类的居处形态和由此而组成的聚落形态经历了不断的变换,而每一次的变换,都把人类改造自然的功绩铭刻在这种形态上,从而也记录下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以及每一时代的特征和每一地区的特征。三晋的居处形态和聚落形态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生过多次的变换,而每一次的变换,既反映着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又反映着区域文化的差异性。

根据目前的研究,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原始人就结成一定的社会组织,选择自己的居处,形成一定的聚落。当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原始密林、天然洞穴、河湖之滨,都成为他们的居处所在。根据考古资料,大致可以确定,这一时期,原始人群在三晋经营的聚落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山地洞穴型聚落和河湖之滨的阶地型聚落。前者以芮城匭河遗址和垣曲南海峪遗址为代表,后者以襄汾丁村人和朔州市峙峪人,阳高许家人的聚落为代表。匭河人和南海峪人主要活动于山间谷地,他们选择了山间两旁高地的天然洞穴居住下来,这些洞穴也就成为当时的聚落。而丁村人、峙峪人、许家窑人活动的地方在河、

湖边缘,他们选择了河湖之滨的阶地居住,形成聚落。如丁村人的聚落就是在高出汾河河床十几米到八十米的河床阶地上。但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如何,还不清楚。

进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居民开始了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由渔猎为主过渡到以农耕为主。但人们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仍然有限,不得不依靠集体的力量开荒辟地,火耕水耨。但在生活方式上,随着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从原始群居中分裂出了家庭,每一个家庭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家室,而众多的家室组成一个聚落,以适应集体生产的方式。由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从人们的居处来看,逐渐由地穴型走向半地穴型,而最后建立了地上的堂室。其聚落形态也逐渐向村落过渡。从选址来看,已经由山地、河床阶地逐渐过渡到平地。聚落大致分为氏族公社聚落和单个氏族的聚落。氏族公社聚落中,以氏族公共活动的建筑物和广场为中心,由各氏族和家庭的多间房屋或单间房屋组成圆形或方形外围,成为居民的居住区。在居民区外围,掘有壕沟,用以防御。壕沟之外的高地为氏族墓地。聚落周围都有烧制陶器的陶窑,说明当时手工业的兴盛。单个氏族部落除了没有中心建筑物和广场之外,基本形态与氏族公社聚落相仿佛。除了这两种聚落形态之外,龙山文化时期,还出现了城堡,形成另外一种聚落形态。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进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三晋境内的人类也已经将自己的居处和聚落由山地移向平原,建立了单个氏族或氏族公社的村落,这种村落既与同时代其他地区的聚落有共同性,又具备着自身的特色。据考古报告,七十年代后期,在今襄汾县发现并发掘了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位于襄汾县东北约 7.5 公里,地处汾河东岸的陶寺村,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在这处聚落中,初步清理出白灰面房屋 1 座、窑 4 座、灰坑 24 个、墓葬 109 座以及各种形制的陶器、骨器、玉器等。根据对各种遗物的分析,认为这种文化与河南、陕西龙山文化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又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

考古学上因此将其专列为一个类型,称为陶寺类型。虽然从考古报告中,还不能更详细地了解这种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的聚落形态如何,但很可能是三晋地区特有的一种形态,聚落中窑洞居室的存在,就别具地区特色。而且,据报告,陶寺类型在三晋汾河中下游的翼城、曲沃、侯马、襄汾、新绛等县境普遍发现,说明陶寺型的居室和聚落,其时在三晋境内有相当的普遍性。至于城堡型的聚落,虽则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的传说,有以陶唐城、禹王城命名的古老村庄或城堡,但目前除了一些民间传说之外,还找不出更多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这些村庄或城堡即是当时的城堡聚落。在没有充足的科学依据之前,还不敢肯定那个时候三晋即已兴起了城市。

进入夏、商、周奴隶时代,随着各级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的分封,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封国、采邑,在这些封国和采邑之内,各级奴隶主大兴土木,广泛筑城,使城堡型聚落广泛地分布于中国大地。直到春秋战国,这种筑城热不仅没有缓和下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有所加剧。这一时期,一方面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加剧,旧贵族的城堡还没有毁坏,新贵们的城堡就接二连三地出现;另一方面,是兼并战争的扩大,各国不仅在边境之地大量设立城防,而且在新掠夺来的土地上建立起堡戍。这样,城堡型的聚落就像雨后春笋,一个个从地上冒出来。所以,现代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时,看到了这种筑城的高潮、城堡聚落的普遍,便下结论说,中国在秦汉以前,是一个都市国家,其聚落形态是集村型的都市聚落。那么,何谓集村型的都市聚落,或者都市国家呢?他们举现代意大利西海岸那不勒斯湾的都市群为例,来说明这种都市国家的具体形态:在那里,“从那不勒斯湾到庞培城遗迹,到处都散布着既有一定间隔,又是相互联系的都市群”。“现在的那不勒斯市,作为今天所能见到的古典世界少见的大都市,是一个例外,而其他市的人口大约在六七万之间,如果乘火车旅行的话,每开出二、三里路,就会看到一个繁荣都

市的存在。在这些都市之间的丘陵、水旱田地里,橄榄树繁茂,葡萄丰实,豆麦秀青,其中间或有工人居住的小屋外,看不到任何居住村落。那么,农民们居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都居住在各自的市中。如果人们早晨或傍晚到此地的国道来旅行的话,就会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农夫们赶着马车,车上装载着农具,早晨成群地由市中出去,傍晚则向市的方向回归。在这种地方之所以散布着为数众多的市,而且各市的人口比较多,其主要原因不是由工商业者人口造成的。造成这一现象的最大原因,是几乎全部的农民都远远离开了各自耕作的田地,而居住到了市里”^①。外国学者将这种农夫聚居的市比作现代的村落,因为每个城堡中都集中了好多个这样的市,故称这种聚落形态为集村型都市聚落。

对外国学者的这一研究结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多少根据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从历史记载来看,“国”、“都”及“乡”、“遂”制度至迟在西周就已形成,而这种国与都、乡与遂,正是所谓集村型的都市聚落。所谓“国”,通常指的是最高奴隶主及其分封子弟所管辖的地区,而这个地区在开始时也只不过是一个城堡,即所谓“都”。而在这个国的中心区域,也就是都中,是天子或诸侯的领地,称为“国中”,“国中”之外,城郊之内,称为乡;城郊之外,包括卿大夫的采邑在内,通称为“野”。“野”内居民,又分为“遂”,是一种邻里村社组织。因为卿大夫在其采邑内也要兴筑城堡,所以这种“野”,也是一种集村型的聚落。春秋时代的“国人”、“野人”虽然有等级的区别,即国人与贵族同宗,野人则异姓,但他们多数从事农耕,是都市里的农夫。这种集村型的都市聚落大概存在到战国后期,随着土地买卖的兴起和扩大,一批新的地主和自耕农出现以后,在原来的“郊”和“野”内购买土地,兴建居

^① [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版。

室,形成村落,遂使城市和乡村逐渐地分离开来。

与同时期全国的情况相同,在晋国境内,也出现了大小不等的采邑和封地,从而形成了大小不等的集村型都市聚落。今就晋文公重耳以前,《春秋左传》所出现的采邑或封地列一简表,来说明这种都市聚落的分布。

邑名	今地	设置过程
韩	河津稍东	晋大夫韩万封邑。
耿	河津耿乡城	殷时封国,晋所灭。
冀	河津东北	殷、周封国,晋灭。
芮	芮城东北	
芮伯城	芮城西	古芮国,晋灭,封毕氏。
虞	平陆东北	周初封国,晋灭。
共池	平陆境内	周初虞国大夫封邑。
虢	平陆太阳城	周初封国,晋灭。
郟	平陆东北	虞国大夫封邑。
霍	霍州市西南	殷、周封国。
阴	霍州市南	晋大夫封邑。
吕	霍州市西	晋大夫封邑
令狐	临猗县境内	不详。
桑泉	临猗县境内	不详。
庐柳	临猗县境内	不详。
郤谷	临猗县境内	不详。
瑕	临猗附近	晋大夫封邑。
白衰	永济市解州镇	
贾	襄汾东	叔虞少子封邑。
孤	襄汾县境内	不详。
厨	襄汾县境内	晋大夫厨武子封邑。
受铎	襄汾县境内	不详。
荀	新绛东北	周封国,晋灭。
聚	绛县东南	晋大夫邑。
蒲	郃县西北	晋公子夷吾守地。
北屈	吉县东北	晋公子重耳守地。
南屈	吉县东北	晋公子重耳守地。
鄂	临汾市附近	晋鄂侯居地。
随	介休东南	晋大夫食邑。
翼	翼城县境内	晋国都。
曲沃	侯马市	晋国都。

这是一个简单的统计表,确信还有一些采邑被遗漏了。但就所统计的采邑来看,全部属于筑有城堡的大小城市,这些城堡,有的转化为后代的县、乡、镇等城镇,有的虽则成为村落,但城的名称却留了下来。在当时,人口数量较少,而聚落分布却如此密集,说明都市居民占着大多数。根据目前一些考古发掘的报告来看,这个推断大致是不错的。晋国都城新田的情况是,在今汾河、浍河之间的地区,已经勘察发现有白店、平望、牛村、台神、马庄、呈王等六个城圈。其中,平望、牛村、台神三城叠压于白店之上,说明白店的年代较此三城为早,此三城即是晋迁新田后所建,平望、牛村两城中都有夯土建筑基址,可能是晋国宫殿所在地。台神、马庄、呈王三城,尚不能确定其用途,但从城圈以南浍河岸边广泛分布的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遗迹来看,这些城区很可能为一般国人及各行业百姓的居住区。

这种都市聚落,都有固定的主人,这主人就是受封到那里的卿大夫,其居民一般都是这主人的宗族支庶及其奴隶。因为自西周以来,从国王到诸侯、卿大夫都有严格的等级,所以这些都市聚落,也要依照其主人的地位分等论级,但随着兼并战争的扩大,这种等级逐渐被打破,都市聚落的规模也较西周初期有所发展,都市居民的行业化分离也越来越显著。到了战国,大批奴隶成为自由民,一部分贵族也由养尊处优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变为自食其力的耕农。这样,以经营农业为主的那些居民便先后落脚到田地之间,建立乡村聚落,从而使都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三晋现存的乡村聚落,虽然大多数还追溯不到秦汉,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秦汉以前就有村庄的出现。

自从都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以后,因为平原、盆地提供了较好的农业发展条件,经济增长较快,人口又比较集中,所以,平原、盆地上的都市日渐繁华,而原来用于军事防守或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而建筑于山区的城堡便逐渐衰落了下去,有的变为村庄,有的成为历史遗迹。三晋山区面积广大,从今天的情形来看,大多数较繁华的城市都

集中于平原和盆地,这正是历史过程逐渐形成的。同时,处于盆地内的乡村聚落,也因为自然为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经济发展也较山区乡村快速,有的还逐渐变为城镇、都会。这样,盆地内的聚落和山区内的聚落也就因为经济基础的不同,呈现出各种差别。这种差别,在生产力没有极大提高的情况下,是难以改变的。只有在现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逐步缩小这种差别,改善山区聚落的生产、生活条件。

二、水陆交通

当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之后,相互间便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而为了实现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便需要开辟水陆交通道路,这样,地球上就又增添了一大文化地理景观。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一文化地理景观也愈来愈壮观。

三晋地处四山之中,不仅对外交通多所阻隔,而且内部交通也很迂回曲折。但是,三晋人民并没有因为高山的阻隔而各处一隅,过那种“鸡犬之声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生活,而是努力开山辟路,架桥设渡,开拓水陆交通道路,打通与外界的联系,密切内部的联系。

在陆路交通方面,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有了通往中原各国和边远小国的道路,这些交通道路,大多是利用山间谷地的自然通道,稍加人力的修筑而开辟出来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太行八陉”。

所谓“太行八陉”,是指穿越太行山的八条通道。古人以今河南济源县为太行之首,从此开始,历数八陉的名称为:第一轵关陉,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第四滏口径,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一名望都关,第

七蒲阴陁，第八军都陁。其中，轹关陁当今河南济源县北、山西阳城县南，沁水穿越太行，从此劈开通道。太行陁、白陁 是穿越上党东部与河南东北部的两条通道。溢口陁东对魏县，也就是曹操曾作为都城的邺城，西通今黎城、襄垣等县，有清漳水穿越其间。井陁在今河北井陁县西、山西平定县东，是山西与华北平原的主要交通路线。飞狐陁、蒲阴陁东与现在北京东北相通，战国时，它是赵国与中山国之间的主要通道。军都陁在太行之尾，已不属于三晋向外的通道了。

绵延巍峨的太行山有了这些断缺的陁口，便为人们提供了自然的交通道路。春秋战国时期，晋和三晋交通中原、华北陈、蔡、卫、宋、燕等国，大多道出于此。晋文公图谋霸业，首取南阳，在此设置温县、原县，就是取道轹关陁的。而且，通过中原、华北，还与南方之楚，东方之齐、鲁建立了联系。在利用这些自然通道的过程中，对它们也进行了不断的改造，使之更适应政治、经济的交往。因而，在这一些陁口的通道上，设置了馆驿，接待各诸侯国的来使，为商旅提供歇肩之所，促进了晋国与各国的交往。

利用、改造山间陁口作为通道，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各国为了加强防守，往往又在这些通道上设关置隘，人为地阻碍着道路的畅通。秦汉统一以后，堕毁关梁，撤除大部分险隘，使原来的陆路交通畅通起来。但是，依靠原有的道路交通，远不能适应中央统一政权与各地的联系，因而，在统一的国度里，便有了以中央所在地为中心，向各地区辐射的驿道。并且从此以后，直到近代铁路、公路出现以前，驿道成为全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各地区的交通道路也以驿道为主干线，网络起地方性的交通道路来。

在以长安、洛阳、开封为封建王朝的都城时，三晋通往这些都城的驿道大致是：由今南北同蒲线南下而西转，渡黄河，过渭水霸桥，进入长安；由今晋中南下，入上党，越太行山，进入开封、洛阳。在以北京为封建帝王统治中心的时候，三晋通往京都的驿道主要是穿越太行

山、东出井陘的一条东西通道,也即今天石太线之旧基。有了通往京都的驿道,不仅便利了王命的传达,更有利于商旅往来。在这些驿道上,日夜有车马急速行进的声音,有驿站上招呼叫卖的声音,显示一片繁华热闹的景象,不少驿站因此而发展成为集镇、都市,为三晋带来新的生机。但三晋多山的自然条件,依然严重地制约着交通的发展。

道路交通的另一方面是水路。历史时期,三晋境内主要水上通道是黄河与汾河。

当封建帝都建于长安、洛阳的时候,处于三晋南部的黄河中游段曾经是国家漕粮的主要运输路线,“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那时,三门底柱之限,阻碍着京师的通漕。从秦汉以来,就在三门峡一带不断修筑栈道,开辟河道。到唐代统一,京师粮食主要依靠东南,黄河漕运一时繁忙,疏通三门,扩大河运,成为唐朝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唐朝政府下决心在前代修凿三门的基础上,多次派廷臣率工修凿三门峡,终于开凿出“开元新河”,河运漕粮最高达到每年 250 万石,相当过去水陆运输的总量。

三门峡的开通,为三晋的水运也提供了便利条件,三晋仰赖黄河水运,顺流可达江、淮,逆流可入关中,扩大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唐代的河中府,即今永济市,位于黄河东岸,成为黄河中游漕运的中转地,商旅往来,货物集散,高官出入,骚人会聚,盛极一时,唐因此而定它为中都,一度还有人提议将都城移到这里。

水运的另一条路线是汾河。汾河水运,历史悠久。春秋时期,秦国运输大批粮食帮助晋国度过灾荒的“泛舟之役”,其运粮船只自雍及绛络绎不绝,就是由渭水入黄河,再转入汾河下游的。直到明清时期,汾河下游的水运仍然十分繁忙。晋南各地的商人往往利用汾河下游有利的水运条件,西贾秦陇,南下中原,开通与各地的商贸往来。处于汾河水运中心段的绛州,即今绛县,因此而成为三晋著名的商业

重镇。

三晋处于黄河的半包围圈中,除了利用水运,还不断架设河桥,沟通河道两岸的交通。据李祖桓在《黄河古桥述略》一文中统计,历史上黄河造桥的记载共有 32 起。从这 32 起中,抽桥属于三晋地区的有六起。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唐代以舟为梁,时称黄河三大桥梁之一。“其旧制,横绝百丈,连舰十艘,辘修竿以维之,系围木以距之”,由于水流冲击,桥梁时被冲毁,到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 年),遂改以铁牛系舟,即“结而为连锁,熔而为伏牛,偶立于两岸,襟束于中潭,锁以持航,牛以系缆,亦将压水物奠浮梁”。这座以舟为梁的黄河东西通道,不仅直接沟通了秦晋的往来,而且它那巧夺天工的构造,使世人叹为观止。而设计和制造它的,大多是三晋的工匠。

水陆交通的不断开辟,河桥的架设,扩大了三晋的对外联系,不断地改善着本地区的物质条件。

三、关隘形胜

三晋,自古就有“表里河山,四塞之区”之称,全境由于高山大河的阻限,在军事上具备着天然的防守条件。在历史上,每当国内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之时,三晋之地往往成为一些割据势力的壁垒。另外,三晋又处于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接壤的地带,民族间的斗争往往引起战争的烽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为了保护各自的家园,都在这一地带修筑防御工程,这也给三晋地区增添了一种特殊的地理景观。

三晋地区内,曾经起过重要防守作用的关隘主要有雁门关、平型关、娘子关、天井关等。雁门关位于今代县城西 20 公里处的雁门山腰,是山间的天然隘道。雁门山古称勾注山、西陉山,故雁门关亦有勾注、西陉之称。古人认为,北方有庐龙、飞狐、勾注三大险

隘，而勾注属于其首。传言，如果在关隘两侧设防，即使是雁雀也难以飞过，所以习惯称它为雁门。留在今天的雁门关，是明代的关隘，而在此以前的雁门关，则在其北，后来，随着防守的需要才移到了这里。它在整个历史时期为边防的安宁起了重要的作用。北宋、明朝，分别在今宁武、偏关又设两关，与雁门关遥相呼应，势成犄角，建立了较为坚固的防守区。

平型关位于今灵丘县城西北，属内长城关隘。是五台山与恒山山脉间的险要所在。关隘东通冀北，西接雁门，可谓雁北地区的东大门。娘子关、天井关则是太行山间的关隘。娘子关位于井陘之西，与井陘以太行山为轴而东西对称，既是三晋的险隘，亦为华北的西部防守要地。天井关是上党通中原的关口，也是三晋的南大门，古来兵家争夺中原，往往道出于此。

除了这些关塞险隘外，境内还曾设置过不少各种类型的关塞，所有这些关隘，绝大多数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夷平了，留下来的，也只作为古迹供人们欣赏了。

与关塞险隘相连在一起的，是长城。三晋北部，今天西起偏关，逶迤而东北，经平鲁、朔州、大同，折而到雁门关，都有断垣残壁的内长城遗存。这一线长城多为明朝时修筑，均系版筑土壁。虽经数百年风雨侵剥侵袭，仍然显出当时的雄浑坚固。在历史上，三晋境内的长城代有修筑，保存下来的大概仅有一小部分了。这些内外相接的长城，不仅具有军事防守之功能，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土建工程的美学价值。

关隘、长城之外，在三晋大地上，还曾出现过众多专供军事防守用的城池、堡戍。这些城池、堡戍，一般有坚固的砖石或夯土围墙，有城楼箭垛。军士长期在此屯守，有事则战，无事则耕，开发了城池周围的经济。同时，在民族间和睦相处的情况下，这些城池堡戍又往往是互市的场所，随着边贸的发展，城池堡戍内部的手工

业、商业经济地逐渐发展起来，使得边地繁华起来。这样，国家一旦承平，这些城池堡戍便都成为商业市镇。宋、明两朝在三晋北部所设的军、监和卫所，到后代有的转化为县城，有的转化为市镇，促进了晋北的经济开发。

第二章 原始文化

原始文化是人类最初的文化，也是文化史上最为漫长而艰苦的时代，人类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出现在这一时期：人类的脑量与躯体从猿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进化到与我们毫无差异的现代智人；生产工具由简陋的打制石器到磨制技术的发明，以及农耕、渔猎、手工业诸工具系列的分化和完善；经济生活由单一的原始采集渔猎文化发展到农耕文化的繁荣，并出现了畜牧、制陶、纺织、艺术、建筑等一系列新兴工业，由索取到生产，从游弋逐渐定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我们的远古祖先在不同的生态环境内创造出独具特色、丰富多采、多源而一统的原始文化，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山地、盆地、黄土、黄河是山西地貌的主要特色。旧石器时代的山西，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较现今优越得多，气候宜人、植被茂盛、湖泊河流发育，成群的象、犀牛、马、牛、羊、猪、鹿等有蹄类食草动物遍及全省，为原始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狩猎资源，从而使山西成为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历史舞台。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全球气候逐渐变暖，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黄土的特性与结构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蕴含着较高的自然肥力，四季分明的气候，雨水多集于夏季，这些均为旱作文化区域早期农业的产

生和发展注入了适宜的活力与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山西是中国地下文物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数千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密布于盆地与河谷沿岸，它们是研究中国农业起源、发展以及中国文明兴起的珍贵实物资料。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文化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童年，约在 300 万年前—1 万年前，相当于地质学上第四纪的更新世，发育缓慢的“童年”竟然占据了人类历史的 99.7%。旧石器时代的原始经济为采集和狩猎，打制石器是谋生的主要工具，并辅以骨器、角器、蚌器及木器。这一时代的早期，人类发明了用火；晚期则出现了复合工具、弓箭、艺术装饰及磨制、钻孔技术。

1929 年，杨钟健与德日进在保德、河曲、离石、中阳发现了 4 个旧石器地点，采集了部分遗物，这是山西旧石器发现的最早记录^①，从此，经几代考古学者的辛勤工作，山西已发现 300 余处旧石器地点和遗址，数量居中国之首位。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文化位于山西南部的风陵渡附近。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高等灵长类的祖先“曙猿”的下颌骨化石 1995 年在黄河北岸的垣曲县寨里村出土^②，这些重要发现表明山西是解决人类起源、寻找古老文化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

① P. Teilhard de Chardin and C. C. Young: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Pre-Loessic and Post-Pontian Formations in Western Shansi and Northern Shensi*. Geological Memoirs, Series A, Number 8. 1930.

② K. Christopher Beard, Yongsheng Tong, Mary R. Dawson, Jingwen Wang and Xueshi Huang: *Earliest Complete Dentition of an Anthropoid Primate from the Late Middle Eocene of Shanxi Province, China*. Science, Vol. 272, 5 April 1996.

旧石器晚期,山西境内广泛分布着代表当时生产力最高水平的细石器文化,年代及类型学研究结果,这里可能是东北亚、日本、北美细石器文化的策源地,同时也预示着山西是解决中国农业起源的主要区域之一。

一、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根据生物地层学与年代学的研究,通常将人类文化的诞生至距今 13 万年前划归旧石器时代早期,亦即地质学上更新世早期和中期。这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址在中国共发现 200 处,山西省就占了 150 余处。这些地点主要分布在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晋西南黄河沿岸及汾河流域,此外漳河上游和桑干河流域也有零星发现。大部分文化遗物出自中更新世红色土及河湖相沉积物中,尚未发现人类化石和居住遗迹,我们能见到的只是原始先民的石制品、骨制品以及食用过的动物残骸化石。

(一) 西侯度文化

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文化。1959 年发现于晋南芮城县西侯度村后,六十年代初发掘出土了大批古脊椎动物化石,32 件石制品,带有切割和刮削痕迹的鹿角,火烧过的骨、角、牙等。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古地磁测定的年代为距今约 180 万年。^①

西侯度地处中条山向黄河倾斜的黄土丘陵地带,高出黄河水面大约 170 米,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出自一层河流相交错的砂砾层中。动物化石有鲤鱼、鳖、鸵鸟、巨河狸、剑齿象、平额象、纳玛象、鬣狗、古

^① 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

板齿犀、山西披毛犀、双叉四不像鹿、晋南四不像鹿、步氏真梳鹿、粗面轴鹿、李氏野猪、步氏羚羊、古中国野牛、粗壮丽牛、中国长鼻三趾马、三门马等，绝灭属动物占 47%，能鉴定到种的动物则全部绝灭。哺乳动物中大部分为草原动物，少量适于草原和森林，附近应有广而深的水域，因有大河狸和大鲤鱼的存在，绝大多数种类都是暖温带以北的动物，结合动物群生态分析，当时这里应是四季分明的疏林草原环境。

西侯度文化的石制品以石英岩为主要原料，类型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对石核和石片的分析表明，当时已掌握了直接打击技术的三种方式：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最大的石核为一件重 8.3 公斤的石片石核；最小的仅为 33 克的漏斗状石核，说明当时不仅使用了大型石器，而且也使用了小石片和用小石片加工成的工具。刮削器共 6 件，可分为直刃、凹刃和圆刃三种。砍斫器是这个地点工具的主体，10 件标本中有双面砍斫器、单面砍斫器和有使用痕迹的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只发现一件，大部分仍保留砾石面，只是在尖端施以加工，形成横断面为三角形的对称尖刃，这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的一种传统工具，在陕西蓝田的公王岭、山西的匭河和丁村都有发现。与石制品同层出土的还有两件具有人工痕迹的鹿角，一件的角表面有断面呈 V 形的沟槽，可以肯定是人类用锐利的器物割切或砍斫的结果；另一件角则有很清楚的刮痕，推测当时人类可能会制作骨器了。此外，在文化层中出土了若干颜色呈黑色、灰色和灰绿色的肋骨、马牙、鹿角等，经化验分析，证明是被火烧过的，这样，人类用火的历史便被大大提早，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证据。

西侯度的石器，在制作技术和工具类型方面显得比较原始而古拙，但是从石器生产的全过程观察仍有其进步的一面，石器的主人在诸多的砾石中能选择具有一定硬度和韧性的石英岩、脉石英和基

性喷发岩为原料；制作石片已采用了三种方法；工具数量虽然不多，但类型多样，使用的刃部已有直、凹、凸三种基本形态，说明工具的使用已有一定的分工。这些都说明西侯度的石器尚不是人类最早的工具，最初的石器还应到更新世下伏的上新世地层中寻找。^①

（二）匭河文化

匭河遗址位于芮城县风陵渡西北约7公里的匭河村一带，1957年发现，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进行过多次调查和发掘，石器和化石地点共17处，分布在黄河沿岸北自独头北沟，南至涧口南沟长达13.5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了匭河遗址旧石器地点群，编号为6054、6055、6056等地点作过重点发掘。十余个地点的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基本上都出自红色土以下的砾石层或泥灰岩中。动物化石有对丽蚌、披毛犀、野猪、马、肿骨鹿、扁角鹿、斑鹿、水牛、野牛、师氏剑齿象、纳玛象、三趾马、马鹿等。关于匭河遗址群的时代，至今存在着三种观点：（1）匭河十余个地点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以及石制品原始性综合分析，虽然在时间上各地点有稍早或稍晚的区别，但整体的年代应属更新世中期的最初阶段^②。三趾马牙齿化石发现之后，作者进一步认为其年代与距今10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公王岭大体相当^③。（2）重新探讨了个别古老动物的形态特征，并对匭河与周口店第一地点石制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匭河的时代仍在北京猿人时代（距今70—20万年）的范畴之内^④。（3）通过6056地点的再次发掘和研究，对匭

① 贾兰坡、王建：《上新世地层中应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及文化遗物》，见《文物》1982年第2期。

② 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匭河》，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③ 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④ 邱中郎：《匭河文化遗址的时代问题》，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第6卷第3期；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见《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河的时代提出质疑,地貌地层及动物化石的证据表明 6056 地点的时代应是中更新世晚期,其文化时代相应地划归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较晚阶段^①。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将匭河的时代划入旧石器早期是诸家共同之处,至于稍早或稍晚阶段的讨论,还有待田野工作进一步开展及深入研究。

匭河文化的石制品主要出自 6054、6055 和 6056 地点,1962 年报道的材料大部分来源于前两处地点,共 138 件。这个遗址的石器原料多数为石英岩砾石;制作石片采用了锤击法、碰砧法和投击法;石核利用率较低,石片比较宽大,台面和背面多保留砾石面;加工的石器数量较少,类型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石器大部分由石片制成。砍斫器可分为单面刃和双面刃两种。刮削器均为小型石片工具。三棱大尖状器是匭河文化的代表性工具,其毛坯是巨厚的石片,器身具有三面三缘,断面呈三角形,以交互打击的方式加工而成,可能是一种挖掘工具。这里的石球加工得比较粗糙,重量在 100 克以上,应该是用于狩猎的投掷武器。1994 年报道的 6056 地点新资料,石制品 116 件,石器的尺寸略小,工具类型中除不见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外,其余特征与上述相差无几,应属同一性质的文化。

匭河文化的石制品技术及工具类型与北京猿人文化相比,显得比较原始。与旧石器时代中期汾河流域的丁村文化比较,两地的石器技术较为一致,工具类型也很接近,只是后者加工技术更为娴熟,产品更精致一些,尤其是共有的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可以将二者的垂直关系连贯起来,有迹象表明,丁村文化是由匭河文化逐渐发展而来的。

^① 陈哲英:《独头旧石器的新发现》,见《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三) 丁村早期文化

丁村遗址以其丰富而独特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著称于世。七十年代以来,在丁村一带新发现了几处与丁村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早期文化及含典型细石器的晚期文化,基本上建立起丁村一带完整的旧石器文化序列。

旧石器早期地点 1979 年发现于丁村附近的白马西沟、解村西沟、南寨塌河崖、上庄沟等地,文化遗物埋藏于汾河东岸第四级阶地下部河流相砂砾层中,同年作了探索性发掘,获得一批石制品和动物化石^①。八十年代,在解村西沟又进行了正式发掘,在 1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出 200 余件石制品及纳玛象、犀牛、野马、斑鹿、鼯鼠、鱼类、蚌类等动物化石^②。目前这几批材料正在深入研究之中,这里仅就初步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地质学的观察结果,丁村早期旧石器地点的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较晚阶段。文化遗物均为石制品,器物有三棱大尖状器、大尖状器、斧状器、宽型斧状器、石球以及用双阳面石片加工的锥钻等,砍斫器不发达,是石器类型中最粗糙的工具;上述石制品组合、文化特色与同一分布区域内的旧石器中期丁村文化相比较,不仅性质相通,而且有着清楚的文化传承关系,它们的性质属于同一体系,仅是时间上处于不同时代,为了有别于“丁村文化”,并显示它与“丁村文化”的渊源关系,研究者将其命名为“前丁村文化”。二者共存的三棱大尖状器、大尖状器、斧状器是这一文化纽带的典型器物,其文化传统均能溯源于晋西南的西侯度文化和匭河文化。

^① 王建、陶富海:《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概述》,见《山西文史资料》1991年第6期。

^② 王向前:《襄汾县解村旧石器时代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四) 古交旧石器早期文化

古交市东距太原 40 公里,汾河自西向东在市区北沿穿过,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山间小盆地。八十年代,在古交市西南约 1 公里的汾河第四级阶地中发现两处旧石器早期地点:王家沟与后梁。

王家沟地点的石制品出自阶地的砂砾层中,高出汾河水面 50—60 米。制作石器的原料均为角页岩砾石,石核利用率较低,工具类型非常单调,仅有砍斫器一类,器形硕大,加工简单,将其一侧或一端修整出刃缘即可,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较早阶段。^①

后梁地点发现于 1983 年,同年进行了发掘,在汾河高阶地下部的微红色粘土中出土了 459 件人工石制品。这个地点的石核可分为单台面、双台面和多台面三类,含天然面的占三分之二,石核和石片总体特征应是直接打击的,且以转向打片为主。工具可分为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石锤四大类,前两类工具数量最多,式样复杂。第二步加工以单向为主,复向为辅,器身与手握部分少见修理。后梁地点的时代被置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较晚阶段。文化内涵与北京猿人文化、匭河文化、陕西梁山、垣曲盆地等石器文化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而与同处于汾河流域的丁村文化尚有一定的差别,它的发现将古代先民在汾河中游的生活历史提前到旧石器时代早期,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汾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②

(五) 青瓷窑文化

青瓷窑遗址位于大同市以西 8.5 公里,西距著名的云冈石窟 5 公里,1975 年在桑干河支流十里河左岸青瓷窑村附近发现,文化遗物分布于二级阶地后缘的含角砾粉砂土中。遗址出土近千件石制品,

① 王向前:《古交遗址群文化性质初探》,载《人类学学报》1991 年第 10 卷第 1 期。

② 王向前、陈哲英:《太原古交后梁之旧石器》,见《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伴生的动物化石有狼、古菱齿象、披毛犀、三门马、羚羊和扭角羊。时代处于旧石器早期的后一阶段。^①

经观察和研究的标本共 640 件,大部分选择石英岩和脉石英砾石作为制作工具的原料。石核的形制不太规整;石片中绝大多数为锤击产品,砸击石片很少;经进一步加工的石器大体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和砍斫器。刮削器是工具组合中的主体,约占石器总数的 80%,依据刃部形态,还可进一步分为凸刃、凹刃、直刃、厚刃、圆刃和复刃刮削器 6 个亚类。尖状器大部分是用厚石片制成,根据其形态和尖刃的角度可分为长身锐尖尖状器、短身锐尖尖状器和短身钝尖尖状器。砍斫器大部分由扁平的砾石制成。

青瓷窑文化的石制品具有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共同特色,如以石片石器为主;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次之,砍斫器不占主要地位;第二步加工技术以单面锤击为主等。这批石器也有自身的特点,如石制品大多数保留有砾石面,加工技术比较简单,形制缺乏稳定性。青瓷窑的石制品总体上还显得比较原始,工具技术和类型同周口店第一地点、许家窑、峙峪等遗址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联系。

二、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旧石器时代中期相当于地质学上的晚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距今大约 13 万—14 万年,人类在自身体质进化途中,由猿人阶段跨入早期智人阶段。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山西仍是全国最多的省份,大约有 60 处,主要分布区在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和南中部的汾河流域,

^① 李超荣、解廷琦、唐云俊:《大同青瓷窑旧石器遗址的发掘》,载《人类学学报》1983 年第 2 卷第 3 期。

并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相比,基本上还是早期的一些石器类型,制作技术除略为精细外,尚不见质的突变,反映了原始文化缓慢而渐进式的发展轨迹。

(一) 丁村文化

丁村遗址位于襄汾县汾河左岸的丁村附近。1953年发现,1954年及以后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在北起襄汾县城、南至柴庄约十余公里的汾河沿岸发现大量旧石器时代各时期的遗址和地点,其中有16处属于旧石器中期,亦即我们通常所讲的“丁村文化。”

丁村文化诸地点的埋藏环境基本一致,均来自汾河第三级阶地中部的交错砂层和砾石层中,关于它的时代,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为中更新世晚期;其二为晚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的测试也不尽相同,铀系法测定为距今16万—21万年;氨基酸年龄测定为7万—9万年前;电子自旋共振法的结果是距今7.5万—10.4万年;古地磁推断的年代则为距今约12万年。在意见尚未统一的前提下,我们暂将丁村文化的地质时代置于晚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放在距今约10万年前为宜。

丁村人的化石材料均出自54:100地点,这是山西省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3枚人牙化石分别是上内侧门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2臼齿,全是右侧的且属于同一个体,年龄为12或13岁。门齿呈铲形,舌面具有底结节、指状突等原始形态结构,但不如北京猿人的复杂;臼齿之咬合面呈椭圆形,纹理比较复杂,各齿尖之间的沟呈十字形,齿冠和齿根比较细小。这些特征显示了丁村人处于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中间环节,同时还具有现代黄种人的形态特点^①。丁村人的顶骨化石残片归属

^① 吴汝康:《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见《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于2岁幼儿的头骨右后部，据观察有印加骨的存在，印加骨在中国猿人和早期智人化石中的出现率约占一半，现代人则多见于美洲印加人中，这也反映了丁村人与北京猿人、现代黄种人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①

丁村文化的石制品以石片和石核最多，成器的工具比较少。当时，丁村人主要选用角页岩砾石作原料，以摔砸法、碰砧法和锤击法打制石片，故石片一般都大而宽，石片角也偏大。丁村的石器依毛坯的不同可分为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两大类，前者有砍斫器、厚尖状器、小型尖状器和刮削器，后者包括砍斫器、似手斧、石球等。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对比，丁村人生产工具的技术有了不少的改进，类型更趋于稳定，并能用不同的方法加工不同类型的工具，如砍斫器运用了交互加工的方法，刃缘呈S形扭曲；石球是以砾石的边棱敲击而成；厚尖状器则选用厚大的石片，在两侧边缘单向连续加工，向上交会为锐利的尖部。砍斫器和厚尖状器是丁村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工具，其中后者的三棱大尖状器和鹤嘴形尖状器被称为“丁村尖状器”。^②

近年来，新材料的陆续发表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充实和拓宽了丁村文化的内涵和视野。在打片技术上，大多数学者认为主要是以锤击法产生的。在工具类型方面，识别出两类重要的典型工具，一类是斧状器，其特点是以大型石片为素材，锋利的自然边缘作为刃口，不作加工或仅作局部修整，而在刃部相对的一端或侧边进行把柄或底部的钝化加工，其功能是一种砍剁切割工具。另一类是用双阳面石片制作工具，主要是双阳面石刀。此外，依据新材料分析和统计，更深一步

① 吴新智：《我国在丁村遗址发现新的古人类右顶骨化石》，见《人民日报》1996年11月23日。

② 裴文中等：《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地总结了丁村文化工具群特色：三棱大尖状器、大尖状器是丁村文化中最典型、最富有代表性的工具；斧状器、宽型斧状器较为发达；用双阳面石片制作工具；有丰富的石球；典型的刮削器不多，砍斫器不发达。在文化的发生发展方面，解决了丁村文化的来龙去脉这一重要课题，丁村文化直接承袭了丁村早期文化，并发展到以 77：01 地点为代表的“新丁村文化”，虽然它们之间尚存在较长时间的空缺需要大批新资料来衔接。

丁村文化在汾河下游的襄汾一带、曲沃里村西沟和侯马南梁，中游的交城范家庄、古交盆地，上游的静乐风程山等地有着广泛分布，反映了旧石器中期的丁村人几乎占据了整个汾河流域，故有的学者称丁村文化为“汾河文化”。^①

丁村遗址群出土了大量动物化石，其中有鲤鱼、青鱼、鲢、鳊、鲶鱼；软体动物中的斧足类和腹足类；哺乳动物则有狼、貉、狐狸、熊、獾、河狸、兔、披毛犀、梅氏犀、野马、野驴、野猪、马鹿、大角鹿、四不像鹿、麝、羚羊、转角羊、原始牛、水牛、德永氏象、纳玛象、印度象等。如此复杂的动物群无疑给了丁村人的食谱增添了不少野味佳肴。另一方面，动物群的生态呈现了一种雨水充沛、温暖湿润的草原森林环境。在丁村人生活的时代，汾河水量较现今大得多，虽然有季节性变化，但时常保持着一定深度的水域。附近的山上有浓密的森林，冲积平原上则草木丛生，当时的气候大致与今日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的自然环境相似。

（二）许家窑文化

今日的大同盆地，降水量稀少，地表水系仅有桑干河及其支流

^① 盖培、黄万波：《陕西长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物》，见《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卷第1期。

自西南向东北缓缓淌过,流向自然环境相类似的冀北泥河湾盆地。然而有谁想到旧石器时代早期,这里曾是一望无际的湖泊,100 万年以前,大同湖的东部湖畔就有了人类的踪迹,他们的后裔大约在 70 万年前迁徙到北京周口店一带,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文化。十万多年前,气候变冷,适宜温湿环境的落叶阔叶树林减少,干旱生态中的蒿、藜、麻黄等增多,喜冷的云杉和冷杉大量出现,浩瀚的大同湖渐渐萎缩,桑干河逐步形成。在残存的湖泊边缘为疏林、灌木和草原相交混的地带。疏林里潜伏着虎、野猪、狼;草地里的鼠兔、鼯鼠、田鼠掘洞啮草;野马、野驴、河套大角鹿、马鹿、葛氏斑鹿、普氏原羚、鹅喉羚、扭角羊、原始牛、披毛犀、古棱齿象等食草动物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成群的天鹅嬉游于湖上;北京猿人的后裔许家窑人也生活在这里,靠狩猎草原动物来维持生计,湖边不时地能发现这群人制作石器的废品、遗弃的工具、饱餐后的动物残骸,甚至还有他们同伴的头颅和遗骨,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这些遗物终被厚厚的黄土掩覆于 10 米左右的深处。10 万年后的 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梨益沟两侧的断崖下,发现了上述遗物,并于七十年代末进行了多次发掘,由此便知道了阳高县许家窑遗址、许家窑人和许家窑文化。

许家窑人的化石材料已发现 20 件,其中顶骨 12 块、颞骨 1 块、枕骨 2 块、左上颌骨 1 块、右侧下颌枝 1 块、零星牙齿 3 枚,分属于不同年龄组的十多个个体。在人类进化谱系中,许家窑人处于早期智人阶段。许家窑人头骨的骨壁比较厚,顶骨的弯曲度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顶骨内面脑膜中动脉的分支比北京猿人复杂,但较现代人的简单;脑膜中动脉后枝比前枝大;颞骨的形状与现代人的相同;枕骨圆枕比北京猿人弱;大脑窝比小脑窝大;上颌骨粗壮,吻部前突程度不如北京猿人显著;牙齿粗大,咬合面纹理复杂,和北京猿人的牙齿非常相似。整体特征显示许家窑人是北京猿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

的过渡类型。^①

许家窑文化的遗物包含了 3 万余件石制品和大量骨角器。生产石器的原料以脉石英最多，其次为石英岩和燧石。漏斗状石核与原始棱柱状石核分别是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遗址中普遍存在的锥形石核和棱柱状石核的母型。工具类型繁多、制作精细，组合为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雕刻器、石钻和石球。刮削器可再分为直刃、凸刃、凹刃、两侧刃、龟背状、复刃及短身圆头刮削器；尖状器又分为齿状、鼻形、喙形、两面交互加工等；雕刻器有两类，斜边雕刻器与屋脊形雕刻器；石球发现一千多件，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工具，也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石球最多的一处遗址，它构成了许家窑文化的显著特色。石球最大的重 1500 克以上，直径超过了 100 毫米；最小的重量不足 100 克，直径在 50 毫米以下。有的制作得非常圆，有的是半成品和毛坯，清楚地显示出石球生产的全过程。推测中等大小的石球可作为飞石索；最小的可用作飞石索上握在手中的扣环；大的石球也应是一种狩猎投掷武器。除石制品外，还有不少骨器和角器，如骨制铲式工具、三棱尖状工具、刮削器和尖状器。

除石球外，许家窑文化的工具几乎都是加工精致的细小石器。从制作技术与工具组合的综合分析，这一文化可归入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小石器传统。它有很多旧石器早期北京猿人文化和晚期峙峪文化的成分，如果把原始棱柱状石核、短身圆头刮削器、圆头刮削器—尖状器除外，其余的石制品从器形和技术上很难和北京猿人的石器组合区别开来；同样，如果把峙峪文化中的进步类型楔状石核、斧形小石刀、石镞等除外，其余的制品同许家窑的十分接近，如此看来，许家

^① 贾兰坡、卫奇、李超荣：《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976 年发掘报告》，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 年第 4 期；吴茂霖：《许家窑遗址 1977 年出土的人类化石》，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 年第 3 期；吴茂霖：《许家窑人颞骨研究》，载《人类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

窑文化是北京猿人文化与峙峪文化之间一种过渡类型的文化,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对研究细石器文化的起源和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①

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大约在距今约4万年前,人类历史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至1万年前被新石器兴起的农业文化所替代,打制石器在生产实践中失去昔日霸主风范而从属于磨制工具。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自然环境经历了一次大的气候波动,前期为末次冰期中一个相对温暖的阶段;后期则是末次冰期的极盛期。然而正是在这恶劣的气候环境压力下,我们的先祖们以其聪慧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旧石器时代最为辉煌的细石器文化。

山西这一时期的古遗址多达100处,内涵丰富,分布更为宽广,无论是晋西黄河沿岸、太行山区,还是长城沿线、晋东南一些偏远小盆地,都有人类的踪迹可觅。

(一) 小石器传统文化

1. 峙峪文化

峙峪遗址位于大同盆地西南角的朔州市峙峪村附近。1963年从这里的晚更新世晚期,第二级阶地底部的杂色亚砂土中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包括1.5万件石制品、1块人类枕骨化石、1件石墨装饰品、大量动物碎骨、5000余枚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②。碳-14测定动物骨骼所得结果为距今 28940 ± 1370 年。

^①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② 贾兰坡、盖培、龙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峙峪的石制品以脉石英、石英岩、硅质灰岩、燧石和火成岩为原料。打片技术除传统的锤击法和砸击法外，出现了比较先进的间接制作技术，以剥制更为规则而轻薄的石叶。石制品均是小型的，大型工具罕见。石器的类型主要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小型砍斫器、斧形小石刀和石镞等，后两类工具及扇形石核的出现标志着细石器雏形和复合工具的诞生。由石墨做成的穿孔装饰品，光滑的一面和边缘都有清晰的磨擦痕迹，它表明远在 28000 年前，钻孔和磨制技术已经在中国出现。峙峪文化的主体是利用不规则的小石片制造细小石器，这类工具比例大，加工痕迹细小，可能使用了压剥技术。峙峪文化与内蒙古萨拉乌苏文化、河南的小南海文化以及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许家窑文化有着颇多的共同之处，它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或“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发展到典型细石器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在大量动物碎骨中，有不少标本具有清楚的人工打制痕迹，包括少量骨器。另有数百件骨片的表面具有刻划的道痕，有的学者认为峙峪人可能已经掌握了最简单的数量概念以及原始雕刻艺术。^①

峙峪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有鸵鸟、刺猬、鬣狗、虎、马鹿、河套大角鹿、普氏小羚羊、野牛、水牛、披毛犀、野马、野驴等，都是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动物种类。动物群种类的统计，食草动物占 99%，马类动物又占草食动物 90% 以上，4000 余枚马类牙齿化石至少代表了 130 匹野马和 90 头野驴，如此众多的马类猎获物实乃旧石器遗址所少见，因此峙峪人也被誉为“猎马人”。^②

2. 塔水河遗址

① 尤玉柱：《峙峪遗址刻划符号初探》，载《科学通报》1982 年第 16 期。

② 尤玉柱、李壮伟：《关于峙峪遗址若干问题的讨论》，载《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5 期。

这是一处保存极好的旧石器岩棚遗址。1985年发现于太行山南部陵川县夺火乡塔水河村，1986、1987年进行试掘，在10米的堆积中发现多层灰烬层及文化层。出土的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有犀、马鹿、斑鹿、岩羊和绵羊，绝对年代为距今 26165 ± 1005 年。^①

人类化石仅有一些颅骨碎片，发现于文化层底部，根据所保留的部分矢状缝形态特征，可以断定该头骨属于幼年个体。石制品出土约2000件，原料以黑色燧石为主；体积都比较小，最大的也未超过10厘米；第二步加工过的标本300余件，类型比较简单，仅刮削器、尖状器和锥钻三类，刮削器的数量及式样最多，尖状器器形规整、加工精致。文化遗物的整体风格应归入华北小石器传统，与相邻旧石器文化相比较，可能晚于峙峪文化，早于下川文化。因文化堆积较厚，延续的时间估计较长，需要再作发掘，结合年代学数据印证，才有望彻底解决文化特色及时代问题。

（二）细石器文化

1. 襄汾柴寺

柴寺遗址位于柴寺村南，汾河第二级阶地底部，这一带恰是丁村遗址群的分布范围，因此被纳入丁村编号77：01地点。1977年发现，翌年正式发掘，出土2000余件石制品，碳-14测定绝对年代为距今 26400 ± 800 年。^②

柴寺的文化遗物由两种成分组成，一种是沿袭丁村文化传统的粗大石器，工具主要有大石片、三棱大尖状器、斧状器、双阳面石刀、石球等，与丁村文化一脉相承；另一种是以黑色燧石为原料制作的典

^① 陈哲英：《陵川塔水河的旧石器》，载《文物季刊》1989年第2期。

^② 王建、陶富海、王益人：《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载《文物季刊》1994年第3期。

型细石器,主要有锥状、楔状、船形细石核、细石叶、石核式石器、短身圆头刮削器、修边雕刻器、琢背小刀、石镞等,与下川文化的细石器极为相似。下川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 23000—16000 年,这表明下川文化的典型细石器是由柴寺地点发展传布的。可以设想,丁村文化发展到旧石器晚期,接受了当时业已发达的细石器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创造了柴寺地点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又融入了进步细石器文化的具有双重特性的细石器文化。

2. 下川文化

中国最重要的细石器文化之一,由 20 个地点构成的遗址群散布于中条山主峰历山东麓的山间盆地,因沁水县下川附近发现最为丰富而被命名为“下川文化”^①,碳-14 测定年代距今 23000—16000 年之间。

下川的石制品包括细小石器和粗大石器两大类,但文化的主体是数量众多、类型复杂的细石器工具。在初级产品中,虽然以直接打击法产生的普通石片仍占多数,但锥状石核、柱状石核、楔状石核以及相应的细石叶产品代表了下川文化进步的石器工艺。加工石器的技术中,传统的石锤直接修整法仍未放弃,同时大量运用了压制技术。工具组群中,琢背小刀、石核式石器、圆头刮削器、三棱小尖状器、石镞是下川文化的典型器物。粗大石器仍占一定的比例,砺石和研磨器的发现表明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已广泛应用了磨制技术。

下川遗址出土的 7 件铍状器,除一件原料为燧石外,其余皆为砂岩,形状呈舌形、梯形和长方形,长度大部分在 60—80 厘米间,宽 45—50 厘米,厚 15—25 厘米。这类器物加工精细,类型稳定而规范,可以肯定是一种复合工具,主要功能是刨平木料,是新石器时代以后

^① 王建、毛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载《考古学报》1978 年第 3 期。

石铍、铜铍、铁铍的雏形。^①

3. 薛关遗址

遗址位于蒲县薛关村西约 1 公里的昕水河右岸,1964 年在高出昕水河约 20 米的砂质黄土中发现了石器,1979 和 1980 年作了两次发掘,获得 5000 余石制品及野马、野驴、羚羊、牛、鹿、鸵鸟等化石。碳-14 测定年代距今 13550 ± 150 年,时代处于旧石器晚期之末,或许已步入中石器时代。^②

薛关的石制品原料主要为燧石和石英岩;工具的素材几乎全是石片并以单面加工为主,继承了中国旧石器的传统文化;石器组合中以刮削器为主体,以尖状器为骨干,二者占了全部石器的 96%,其他的尚有雕刻器、琢背小刀和铍状器;细石核以楔状、船底形为代表,锥状石核不发达。薛关的石制品技术特征与沁水下川文化、河北虎头梁文化都有一定的相似内容,而山西西北部、内蒙古清水河等地的尖状器和半月形刮削器与薛关遗址的同类器物具有更近的亲缘关系。

4. 柿子滩遗址

1980 年,在吉县东城乡西村清水河畔的柿子滩发现一处细石器遗址,同年作了局部试掘,出土了虎、鹿、牛、羚羊、犀、鸵鸟等动物化石,1807 件石制品,遗址附近还发现了两幅岩画,是迄今为止山西省最早的美术作品。

文化层位于基座阶地内,自下而上五个层位中均有文化遗物,其中第一、第三层发现了烧石、烧骨和灰烬层。第一层为下文化层,出土了 12 件粗大石制品,因有犀牛和鸵鸟的伴生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

^① 谢飞、石金鸣、李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铍状器的研究》,见《东北亚旧石器文化》,韩国白山文化 1996 年版。

^② 王向前、丁建平、陶富海:《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载《人类学学报》1983 年第 2 期。

期；第二—五层统称为上文化层，石制品以典型细石器为主，未发现磨光石器和陶片，可能处于中石器时代的早一阶段。^①

细石器工业中的石核分楔状、船底形、锥状和漏斗状。刮削器、尖状器、石镞是工具主要类型，且以石英岩石片作为大部分工具之素材。文化内涵与蒲县薛关、山西西北部的同期文化有更多的一致性。岩画共发现两方，其一为女性正面裸体形象；另一方似狩猎格斗图，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与信仰崇拜。

山西南部发现了人与高等灵长类的共同祖先——曙猿。与曙猿化石产地相距不远的西侯度有目前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化。西侯度的石器尚不是人类第一把“石刀”，我们有理由相信山西南部是寻找我们最远的祖先及最古老的“石刀”之希望的田野。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至少存在着两大文化传统的理论早已被世人所认可，大石器传统可溯源于一百万年前的山西南部匭河；小石器传统在一百万年前与大同湖相通的泥河湾同样能找到它们的祖先。丁村人的祖先从黄河岸边迁徙到汾河流域，发展、扩张，创造了三棱大尖状器文化；许家窑人的先辈从泥河湾到周口店，播下“文明”的火种后重返故里桑干河制造了“小刮削器—石球”文化。峙峪文化是小石器传统登峰造极的遗存，它的雏形是许家窑文化；柴寺遗存已是典型细石器文化，而共存的粗大石器与丁村文化一脉相承。中国旧石器时代百万年来两大传统演化的重要曲目均发生在山西这一大舞台上。

距今一二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之末，先进的细石器文化几乎占据了山西省，它们至少代表了三个文化类型：吕梁山西麓的薛关、柿子滩遗存，具有水洞沟文化因素；桑干河流域的神泉堡，受到峙峪文

^① 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山西吉县柿子滩中石器文化遗址》，载《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化一部分影响；山西南部及汾河流域的下川、柴寺，含丁村文化风格。然而令我们困惑的是既不清楚上述细石器文化的直接上承遗存，也未发现它们与新石器早期文化间的纽带遗存。

综观山西旧石器时代诸时期之石器文化，均具中国特色：以石片石器为主；打片和制作工具主要采用锤击法；修整方向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刮削器是工具的主要类型等，而有别于旧大陆西部的手斧文化传统。

中国特色的古文化传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即已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打制石器仍继承了这一传统之精髓。

山西原始文化区域性特色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基本形成。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文化

更新世晚期之末，全球气候转暖，冰川开始大规模消融，人类进入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在新的生态环境下，人类的适应系统也随之进行新的调整，于是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结束及新石器文化的兴起，这一历史事件大约发生于一万年前。

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特征。采集和渔猎经济退居次要地位。在中原地区，这一时代大约结束于公元前 2000 年。

一、前仰韶时期

中国最初的新石器文化在山西尚未被发现，在河北、江西、北京、湖南等地，近两年有所突破，时代为距今约一万年。公元前 6000—前

5000年之间,黄河中游和汉水上游分布着一些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学术界称之为“前仰韶文化”。这时的农业经济已占主导地位并饲养猪、狗等家畜,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比例;生产工具以磨光石器为主,存在着数量不少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工艺比较原始。山西境内分布有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而仰韶时期的遗存更是星罗棋布,其中不乏规模大、堆积厚、遗存丰富的大型聚落,但是前仰韶时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直到近几年才有了较大的突破。

(一) 磁山文化遗存

1984年,在太行山西麓漳河上游,隶属于武乡县石门乡的牛鼻子湾发现了石磨盘和石磨棒各一件,均以红色砂岩制成。这是一套古老的谷物加工用具,磨盘呈圆角长方形,底部置横圆柱状的盘足,形制与河北磁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十分相似,地理位置也在磁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尽管遗物较少,仍能说明前仰韶时期的漳河上游是早期农人的活动地区之一。

(二) 枣园 H1 遗存

因首先发现于翼城县北橄乡枣园村而得名,同类遗存在闻喜的坡底和阳城县大宁也有发现。

枣园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不足1米,1991年5月作了调查和试掘,清理了一座灰坑,编号枣园H1,出土了大量颇具代表性的陶器,此外还有少量的石器、陶质工具及经火烧过的兽骨。陶器中泥质陶约占60%;夹砂陶占40%。红陶为主,褐色的次之,灰陶亦占一定数量。器物均为手制,以泥条盘筑法成形,口部慢轮修整,烧制技术采用了窑外渗碳工艺。陶器烧制火候低,质地疏松、器壁很薄,形制简单,底部多数遗有碎草末印痕。器物类型有壶、直腹罐、鼓腹罐、敞口钵、深腹钵、浅腹钵、折腹钵、假圈足钵、盆、釜、三足孟、器座等。生产工具发现较少,仅有陶错、石刀、石磨棒和陶纺轮。经与相邻区域前仰韶文化比较研究,它们属于前仰韶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

即新石器时代早期之末。

枣园遗址的发现在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中具有突破性意义,不仅将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代提早到前仰韶时期,丰富了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内容,而且由于该类遗存器物特征、陶器组合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文化传统更多地接近仰韶时期盛极一时的庙底沟文化,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庙底沟文化正是以枣园 H1 遗存为基础,在仰韶时代初期吸收了相邻地区诸文化的精华发展起来的。^①

二、仰韶时期

仰韶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这一时期的遗存在黄河中游和上游称“仰韶文化”,因 1921 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时期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以种植粟、黍为主并饲养家畜,兼营采集和渔猎,进行多种手工业生产。生活用具以红色陶器为主,其中泥质红陶上常见黑彩描绘的几何图案和动植物纹样,陶器的主要类型有盆、钵、罐、碗、瓶、壶、瓮、釜、灶、鼎等。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聚落形态和埋葬制度的研究,仰韶时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期,晚期之末渐渐衰落,随之便迈入父系氏族社会的龙山时代。

(一) 仰韶早期

1. 东庄村遗址

位于山西南端芮城县的黄河北岸,1955 年发现,1958 年发掘面积 1000 多平方米,文化堆积由上到下依次为汉代、东周、西周和仰韶

^① 田建文、薛新民、杨林中:《晋南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见《文物季刊》1992 年第 2 期。

遗存,且以仰韶早期文化最为丰富,处于仰韶时代半坡文化向庙底沟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

东庄村仰韶时期的村落面积约5万平方米,遗迹有房址、窖穴、陶窑等。编号为F201的房子平面略呈圆形,最大径 1.8×1.8 米,居住面坚实而平坦并有椭圆形灶坑;房址周边有21个小的柱洞,居住面中央有1个大的柱洞,依次可复原为圆锥状房屋。墓葬发现5座,瓮棺葬1座,单人葬土坑墓2座;双人或多人合葬墓2座,皆为二次葬。所有墓葬均无随葬品。生活用具陶制品有盆、钵、碗、罐、瓮、尖底瓶、鼎、甑等,以前三类最多。制法全部用手制,轮修仅见于部分口沿,有些器物的外表绘有精美的黑色三角形图案、豆荚纹、宽带纹、半月形纹和鱼纹。生产工具存在大量石斧、石锛、石刀、陶刀、弹丸、敲砸器、陶锉、纺线轮以及用石头、动物骨骼制成的箭头。此外,骨笄、牙饰、陶环等装饰品在这个遗址中也有发现。

东庄村遗址的仰韶遗存较为复杂,既有半坡遗址仰韶早期文化因素,也有庙底沟文化代表性器物和花纹,此外仍有较强的个性,故可称之为半坡文化东庄村类型,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受到其东部后岗一期文化的影响。它的前身可能是磁山文化的裴李岗类型。

2. 古城东关遗址

东关遗址处于晋南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浍西河第二级阶地上,隶属于垣曲县古城镇。八十年代中期,在东关第Ⅳ发掘区发现一处大型仰韶早期的聚落遗址,它填补了该地区仰韶文化早期的空白,同时为研究晋南、豫西地区仰韶时代的文化与类型分布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①

这个遗址清理出房址、沟壕、墓葬、灰坑等遗迹,分布密集,打破

^①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山西省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Ⅳ区仰韶早期遗存的新发现》,见《文物》1995年第7期。

关系复杂,但保存完整的不多。房址仅见 F1 一座,呈圆形半地穴式,直径约 5 米,深 0.4 米,平底,面积较大,在大穴室的一侧套有一小穴室,这种独特的建筑结构在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还未见到。沟壕分大型和小型两种,前者呈漏斗形,后者为倒梯形。7 座墓葬皆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仅有 M9 随葬一件黑陶蒜头壶。灰坑发现 120 余个,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三种。灰坑内出土遗物以陶片为主,次为生产工具及野猪、黄牛、斑鹿、狗獾、羊、兔、鲤鱼、鸟类、啮齿类野生动物及猪、家犬等动物骨骼。

仰韶早期遗物极为丰富,生产工具种类复杂,有斧、凿、铲、盘状器、刀、锤、镰、锥、磨棒、矛、镞、石球、弹丸、砺石等,质地包括石、骨、角、蚌、陶。石器分打制、磨制两种,有的经过琢制,石料以石英岩为主,大多就地取材于附近河床。陶器以手制为主,较大器物采用泥条盘筑,较小的则直接捏塑,在少数器物的口沿部可见慢轮修整痕迹。陶器纹饰简单,种类有线纹、弦纹、戳印纹、指甲纹、刻划纹、乳钉及附加堆纹,彩陶仅见宽带状纹样,以红、褐、黑彩施于陶钵的口沿部分。陶器按用途可分为水器、炊器、盛贮器和饮食器,器物造型以小平底器和圜底器居多,有少量三足器、圈足器、假圈足器。陶器种类包括瓶、鼎、罐、盆、瓮、缸、钵、碗、壶、盂、器盖和器座,并以环状口小平底瓶、圜底钵、假圈足盆、尖锥足鼎、夹砂弦纹罐、缸、盔形器盖为主体构成了该遗址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典型器物群。

东关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分布范围大体局限于晋南地区,且以垣曲古城小盆地为中心而又扩展到垣曲周围等地。年代大致与西安半坡遗址早期遗存相当。文化内涵虽然受到来自东、西部同时期不同文化类型的影响,但从典型器物群分析,其文化面貌仍以本地特色为主。从双耳壶和三足钵看,似乎承袭了裴李岗文化的某些因素,至于它的发展趋向,又可看出与庙底沟类型有传承关系,应是本地区庙底沟文化的前身。

晋南临汾盆地近年来也发现不少仰韶时代早期遗存,如侯马褚村、西阳呈、曲沃里村西沟、万荣西解村、襄汾丁村、翼城古暑、西石桥、北橄等,资料多限于调查,未经大规模发掘。1991年在侯马市西北6公里汾河左岸的褚村遗址进行过一次试掘,陶器组合显示褚村早期遗存与半坡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年代同时,但不属于半坡文化范畴而接近于后岗一期文化,可归入磁山—后岗一期文化系统。此外,褚村早期同枣园 H1 遗存有密切的联系和相同的文化特征,属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褚村早期早于庙底沟文化,其文化内涵与庙底沟文化有明显的传承关系。^①

山西中部这一时期的遗址调查材料有太谷县上土河、祁县梁村、娄烦县童子崖、离石县吉家村等,以器物组合与纹饰特点考察,同后岗一期文化颇为接近,而与半坡文化相差较远,以上土河为代表的上述遗存应视为后岗一期文化范畴。^②

(二) 仰韶中期

1. 北橄遗址

遗址位于太岳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山前地带,翼城县东10公里的北橄村南部。1985年发掘,1990和1991年先后两次发掘,古村落面积约40万平方米,在近800平方米的揭露范围内,清理出7座房屋、15个灶坑、13座墓葬、53个灰坑及大量石、骨、陶质生产工具、装饰品及陶器。

北橄遗址的房址分圆形和方形两类。编号F2之房屋为方形半地穴式,面积约34平方米,由居住面、四壁、火塘、门道及柱洞组成。地面和四壁用草拌泥涂抹,中部有四个均匀分布的立柱与四壁外的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侯马褚村遗址试掘简报》,见《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

^② 张忠培:《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见《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见《文物》1989年第4期。

立柱配合,室内有大型火塘和灶坑,并有斜坡状窄门道直通室外,根据遗迹的形态特征可复原为四角、攒尖、四面顶坡的大型房屋。墓葬的特征类似于仰韶时代其他形态,二次葬类的 M13,共有 8 个个体,分属于 5 个成年男性、1 个成年女性和 2 个幼年个体,无任何随葬品。陶器以红陶为主,饰有线纹、绳纹、弦纹、席纹和堆纹,彩绘分白底黑彩和红底黑彩两类,表现形式是竖线、斜线、弧线、宽带、三角、圆点、花瓣、网格等,多数绘于钵与盆的口沿及上腹部。陶器的种类有钵、盆、尖底瓶、葫芦口瓶、壶、罐、盘、缸、甑等。生产工具有石质的铲、斧、镑、凿、刀、磨棒、镞、石拍;陶质的刀、铍、纺轮、网坠;骨质的镞、匕、锥、凿等。此外还出土了骨笄、陶环、石璜、牙饰、蚌饰等装饰品。

北橄的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第一、二期大致相当于仰韶早期的后一阶段;三、四期相对年代处于仰韶中期的前一阶段,第四期与典型的庙底沟文化年代上相同或接近。北橄遗存是一支独立于半坡仰韶文化之外的考古学文化,源于枣园 H1 遗存,在它的形成过程受到半坡仰韶文化的影响,最后发展到分布广泛、盛极一时的庙底沟文化。同时也说明了山西南部是庙底沟文化的发祥地。

2. 西阴遗址

1926 年 10 月 15 日,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1896—1979 年)在夏县西阴村遗址启土发掘,这一日便成为历史的永恒,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的考古发掘,翌年出版了研究报告。西阴村位于夏县北部,南临青龙河,北枕鸣条岗,隶属于尉郭乡。为纪念西阴史前遗存发掘 70 周年和李济诞辰 100 周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 1994 年第四季度对这个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获得一批新的考古资料及新的研究成果。

新材料中的遗迹现象较为简单,房址 2 座,其一为半地穴式圆角长方形。另有陶窑和灰坑。遗物十分丰富,以质地可分为陶、石、骨、蚌等:陶器可复原者百余件,种类较齐全。个体较大的陶器泥条盘筑

成形后再慢轮修整,未见先进的快轮拉坯工艺,一些小陶器如陶球、陶杯及陶环均为手制而成。陶器质地分泥质和夹砂两类,二者之比约3:2。陶色分红、灰、褐三类。纹饰以线纹、彩陶为主,后者多为黑彩,红彩极为少见,并有少量白衣彩陶。纹样最多的是勾叶纹(弧边三角纹)、圆点纹、网纹。彩陶主要饰于盆与钵的器表,有少量壶及个别平底瓶腹部有一道黑彩。线纹主要饰于尖底瓶、平底瓶、罐、釜、釜形鼎、缸等器物,此外还发现了鸟头装饰附件。陶器种类以盆、钵、罐、尖底瓶、器盖多见,其他还有釜、灶、鼎、缸、杯、瓮、甑、壶、缶、器座、纺轮、陶球、陶环。骨器中有笄、锥、镞、牙饰与蚌饰。石器以研磨棒、磨石、石刀、石铲、石斧、石镞最多,其余为石球、石网坠、石纺轮和石杯。

除少量的二里岗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西王村三期文化遗存外,庙底沟文化是西阴遗址最为丰富而典型的遗存。它与庙底沟遗址第一期文化的年代一致。文化的比较研究显示,以西阴遗存为代表的仰韶中期文化源于北橄遗存及东关早期和褚村一期,其源头为枣园H1遗存;向后则发展为西王村上层的第三期文化。

根据西阴遗存的文化特色、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及西阴遗址发掘的历史意义,研究者建议将仰韶中期文化,即庙底沟文化或庙底沟类改为“西阴文化”。

3. 马家小村遗址

马家小村属大同市水泊寺乡,西南距大同10公里,遗址东依白登山,西临桑干河支流御河,面积约5万平方米。1990年发现,第二年作了抢救性发掘。近年来晋北周围的张家口、河套地区、晋中地区的田野工作相继展开并取得诸多成果,而山西北部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这样,马家小村遗址获得的遗物虽然不太丰富,其文化遗存所表现出的地域特色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清理的遗迹现象仅4座残缺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保存稍好的

F3,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复原面积达26平方米。四壁及地面均涂有一层草拌泥并经火焙烧,呈黑色或青灰色,地面平整坚硬。

陶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陶色以红、褐色为主;器表除素面外装饰有线纹、绳纹、弦纹和彩绘,后者有黑、褐、红三种颜色,图案多由弧边三角、圆点、垂弧、勾叶、直边三角、直线和弧线组成,常以圆点纹将单元图案断开。陶器皆以手制,泥条盘筑,器口有的经慢轮修整。器物群包括尖底瓶、钵、盆、夹砂罐、四系罐、四系瓮等。生产工具有石斧、陶刀、石磨盘和石磨棒。根据马家小村的文化遗存之特色与相邻地区文化比较观察,遗址的年代与庙底沟文化相同或略早,与同属桑干河流域的河北三关下层存在着诸多共同文化因素,并有浓厚的地方特色。^①

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发源于山西南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扩张面积最大的考古学文化,它的分布中心为晋南、豫西、陕西东部的中原地区,山西全境几乎都有庙底沟文化分布,如汾阳杏花村、段家庄,柳林杨家坪,离石吉家村等。

(三) 仰韶晚期

1. 西王村遗址

西王村位于芮城县风陵渡东北1.5公里的黄河北岸,遗址面积10万平方米,1960年春发掘,揭露面积近400平方米。这里的文化内涵可分为三个层位,下层为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中层的即仰韶晚期的遗存,代表了庙底沟文化之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前晋南、豫西和关中的新石器文化^②,有的学者称之为“西王村类型”。

晋南地区这一时期的遗存分布较为密集,典型遗存有夏县东下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马家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见《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见《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冯“龙山”早期、垣曲古城东关仰韶晚期、河津固镇等。这一阶段出现地面木构建筑，房屋面积较大，分间布局兴起。陶质生活用具的形态和装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了新的改进，口沿普遍运用轮修技术；彩陶开始衰退，灰陶数量增多；纹饰简朴，附加堆纹和绳纹增多，篮纹次之并出现少量方格纹。最具时代特征的陶器为有流嘴的器物、镂孔圈足豆和喇叭口长颈底钝的尖底瓶。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有较大进步，石器大多磨制，打制石器的比例继续减少，骨角蚌器及陶质生产工具种类增多，制作精细，反映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2. 白燕遗址

1956年发现于太谷县白燕村，八十年代进行了多次发掘，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属于仰韶晚期的内涵。

居住遗址出现窑洞式建筑，编号F504，地穴式窑洞，似穹顶，穴壁下部内凹，门道窄长并有台阶以供上下。陶器特点可分两段，第一段以夹砂灰陶为主，多饰绳纹和附加堆纹；泥质灰陶次之，横篮纹和素面较多；红褐陶少。彩陶为红彩或紫红彩，图案以垂线纹、三角纹常见。典型陶器是宽折沿夹砂罐，泥质篮纹小口壶、敛口钵和深腹缸，大型器上鬃耳发达。第二段陶器则以泥灰陶为主，篮纹增多，黑陶数量增加，鬃耳减少，新出现了平口瓮、釜灶、鼎和豆。

山西中部地区除白燕遗址外，属于仰韶晚期的还有太原义井、汾阳杏花村、离石马茂庄等一系列遗存。根据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分析，这一地区的仰韶晚期遗存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早段以马茂庄为代表；中段以太原义井及太谷白燕早期第一段为主；晚段则以白燕的第二段为标尺。上述三段遗存基本上是连续发展的，演变轨迹概括特点是纹饰中线纹从较多到绝迹；篮纹由少到多；颜色由红而灰；附加堆纹由装饰到加固；尖底瓶、宽沿盆从有到无，平口瓮、豆等从无到有。从上述三段总的文化特征看，晋中地区的仰韶晚期遗存与南部

的西王村类型属于不同的谱系,它接受了西部马家窑文化和北面的海生不浪文化程度不同的影响。而与太行山东麓的大司空文化关系较为密切,尽管如此,其文化的主体,如纹饰彩绘形态又表现出强烈的地方风格,故可称之为“义井文化”。^①

三、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

1953年,河南省陕县庙底沟发现一处古文化遗址,它包含了两个时期的遗存,第一期 of 仰韶文化,第二期文化遗物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因此被定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②。40多年来,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使我们对这类文化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从年代上看,它晚于仰韶文化而早于龙山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000—前2400年。分布范围比较广,但中心是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及陕西关中的中原地区。文化性质具有仰韶向龙山过渡特色,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

山西是发现庙底沟二期文化最多的省份,迄今已发现100余处,晋西南和晋南分布最为密集,晋中盆地和吕梁山西麓黄河东岸近年来也有新的突破。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以灰陶为主,黑陶较少,盛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在这一时期普遍衰退,但在汾河中上游一带仍占一定比例。陶器的纹饰以篮纹最典型,其次是绳纹和附加堆纹。生活用具主要有罐、鼎、盆、钵、甗、釜、灶、甑、壶、缸等。制陶业中开始使用轮制技术。农业生产比仰韶时期有所提高,作为砍伐工具的石斧比过去厚重多

^① 海金乐:《晋中地区仰韶晚期文化遗存研究》,载《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了,发明了木耒,农业收割工具出现了半月形的石刀、石镰和蚌镰。家畜饲养业中品种增加,猪狗牛羊鸡五畜俱全。渔猎经济在当时的经济领域里仍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的住宅建设在继承传统半地穴式的基础上又有不少改进与创造。

山西省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有芮城县西王村、平陆县盘南村、垣曲县东关、丰村和龙王崖、夏县东下冯、襄汾县陶寺、侯马市乔山底、新绛县光村、河津县固镇、石楼县岔沟、太谷县白燕等。

(一) 垣曲东关遗址

东关遗址的庙底沟二期遗存主要分布在Ⅰ区和Ⅱ区,Ⅲ、Ⅳ区较少。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可复原的陶器600余件,另有800多件石、骨、角、蚌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这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是少见的。

通过整理与分析,研究者将这一遗存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发展脉络清晰,更替规律可循,对了解认识完整的文化兴盛及趋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陶器可分为三大类,即炊器(鼎、鬲、釜、灶、甑等)、盛贮器(缸、瓮、罐、大盆等)和一般饮食器(碗、豆、杯、小盆等)。陶器形制以平底器为大宗,其次为三足器,圈足器较少,圜底器几乎不见。典型陶器有鼎、鬲、釜、灶、夹砂深腹罐、小口高领罐、豆、杯和刻槽盆。陶器的纹饰早期多横、斜篮纹,绳纹其次,附加堆纹发达;中期仍以横斜篮纹为主,但竖篮纹比例增加,绳纹及附加堆纹减少;晚期竖篮纹比例约占全部篮纹的一半,绳纹和附加堆纹更少,而方格纹比例明显上升。各期的彩陶非常少见。陶器的制法虽然均以手制为主,但早期的轮修较少,中期增多,晚期则常见。生产工具方面,磨制比例升高,打制比例下降,出现石耜、二齿木耒等新式工具,形制规整的石铲、石镰、蚌镰等广泛使用,反映了生产力水平及农业较前大大提高了一步。

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的直接前身是东关仰韶晚期文化,它的直接承袭者是东关龙山文化。这类遗存主要分布在山西垣曲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河南伊洛平原及周围地区。虽然与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处在同一时代,但文化面貌有许多不同之处。鉴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丰富,资料全面,并具有典型意义,应将该遗址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古城东关类型”。

东关类型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吸收了诸如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及相邻其他类型的文化因素,文化间的频繁交流和影响,促使庙底沟二期文化不断发展,从而迎来了更加灿烂的龙山时代。^①

(二) 乔山底遗址

位于侯马市东南6公里的浍河南岸。八十年代末发现并发掘。这里仅介绍庙底沟二期的大型粮仓。两座粮仓编号为F1和F2,两仓相距11米,均口小底大的袋状坑。F1底部近椭圆形,东西5.6米、南北5.85米,容积在25立方米以上;F2底部近圆形,直径6.4米,容积在40立方米以上。坑的底部都铺垫一层用于防潮的红烧土,再上发现有木板腐朽后留下的白色木灰。大量粟类谷物发现在木灰之上,谷物虽已炭化,但仍清晰可辨,颗粒形态均匀,如玃似珠。新石器时代的粮仓虽然在其他遗址中屡有发现,但无论规模还是容积,乔山底的最为壮观。^②

(三) 岔沟遗址

位于吕梁山西麓石楼县城东约4公里处,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分布区,1980年在这里发掘了20座居住遗址,第一次揭示出吕梁山黄土区内人类的居住状况。

^① 张素琳、佟伟华:《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见《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乔山底遗址1989年Ⅰ区发掘报告》,见《文物季刊》1996年第2期。

遗址分布于黄土坡，窑洞式房址最具本遗址特色。这类房屋是平面呈“凸”字形窑洞，居住面及四壁先涂一层草拌泥，再抹一层白灰面，既能防潮还扩大了采光。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窑洞建筑，它充分利用了当地黄土高原自然资源，因地制宜，施工简便，节省材料，冬暖夏凉等优点，因此为我国黄土高原民众沿用至今。这一组窑洞式的居址群在探讨我国北方民宅建筑史、文化史等方面均有重要地位及意义。^①

（四）白燕遗址

遗迹的重要发现是一种平面呈“吕”字形的双间房屋，由南北两间及中间过道组成。南间为椭圆形袋状，东西口径 3.06 米、底径 3.72 米；南北口径 1.9 米、底径 2.8 米。北间是一个穹庐顶窑洞，圆角方形，边长 2 米左右；从地面到窑顶约 1.86—2.04 米。过道的东北角有一长 1.6、宽 0.7 米的地面灶。住面平坦坚硬，由下而上共有浅黄土、红烧土、草拌泥、硬黑土四层活动面。

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另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黑陶和红陶。夹砂陶多饰绳纹和附加堆纹；泥质陶以篮纹为主。主要器类有夹砂的盆形鼎、釜形鬲、缸、绳纹罐；泥质的长颈壶、短颈壶、盆、豆、器盖等。

关于晋中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至少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第一种是本地区仰韶文化的延续；第二种则与山西南部同类器物相同，如陕县庙底沟和襄汾陶寺的庙底沟二期遗存；第三种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同类器物相似，应是东来的文化因素。总之，晋中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持续存在着自仰韶时代开始的东、西方面的文化交流和渗透，同时南、北方面文化交流渗透的现象也十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石楼岔沟原始文化遗存》，见《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分显著。^①

四、龙山时期

龙山文化因 1928 年山东历城县龙山镇而得名,现在,学术界则以“龙山时代”代替龙山文化。龙山时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各有明确的分布地域,也是民族文化区的萌芽。

约在公元前 2400 年前后,中原地区跨入龙山时期,即原始社会的晚期之末,直到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被夏代文明所代替。龙山时期 300 年的时间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重大时期,是国家和文明形成的前夕。在这个时期,生产力水平得到了飞速发展,由于地域环境不同,战争频繁、财富集中和权力的加强,各地考古学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文化的分化更加明显。

(一) 晋西南三里桥类型

该区以运城盆地为中心,北抵万荣闻喜的峨嵋岭,龙山时期遗存丰富,且有一定的共同特征,主要遗址有芮城南礼教、夏县东下冯、垣曲的东关等,调查过的遗址有 40 余处。

东下冯位于夏县城北约 17 公里,遗址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1975—1977 年发掘了 1000 余平方米。主要遗迹有直径 3—5 米间的房屋,分布密集,排列有序,适于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居住。编号为 F251 的大型房内,对称排列着四块础石,这是目前中国最早在地面上设置柱础的实例。

这一时期石器基本上是磨制的,骨器种类多、数量大、制作规整;轮制陶器比较普遍。生活用具的种类常见炊器中的陶鬲和甗,蒸器中有甗,储藏器类的瓮和罐。纹饰以绳纹、篮纹、方格纹较多,另有少量

^① 许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见《文物》1989 年第 4 期。

弦纹、刻划纹等。

由于晋西南地区龙山遗存的文化面貌同陕县三里桥遗存极为相似,应属同一个文化类型。因此,我们沿用已有的“三里桥类型”来称这一地区的龙山时期考古遗存。它的文化面貌还受到陶寺类型、王湾类型及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影响。

(二) 晋南陶寺类型

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晋南地区,龙山时期的遗址近百处,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陶寺村南,塔儿山西麓,总面积 300 余万平方米,1978 年春至 1984 年冬,共进行了 14 个季度的发掘,发现了陶寺早、中、晚三期文化遗存,其中早期遗存属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了更完整地认识陶寺遗存,在此一并介绍。^①

陶寺遗址的居住区发掘面积共 2000 多平方米,发现有房址、窖穴、水井、陶窑、石灰窑、墓葬等。房屋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窑洞三种,以后两类居多。陶窑发现 11 座,均为火塘在前,窑室在后。石灰窑 1 座,形状同现代石灰窑相似。水井共清理 4 座,井口均为圆形,近底处略呈方形,深约 14 米。井底有护井的木桩或栅栏状木构件。墓葬在居住区发现 20 余座,属小型墓。生产工具中,以扁平的长方形石铲数量最多。生活用品的陶器,平底器和袋足器很发达,也有圈足器和三足器。灰陶占 90% 以上,纹饰以绳纹和篮纹最多。典型陶器有鬲、罍、扁壶、盆、圈足罐、豆、杯等。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见《考古》1980 年第 1 期;《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见《考古》1983 年第 1 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见《考古》1984 年第 12 期;《陶寺遗址 1983—1984 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见《考古》1986 年第 9 期;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见《考古》1983 年第 6 期;高炜:《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载《华夏文明》(1),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陶寺墓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清理墓葬1000余座,皆为土坑竖穴墓,并有大、中、小之分。大型墓有棺无槨,随葬品十分丰富,一般有成套的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骨器。最多的出土近200件,普通的近百件。随葬品类有陶灶、陶甗、陶豆、长颈壶、折沿罐、折肩罐、尊形器、瓶、木案、木仓形器、木豆、木盆、骨匕、玉柄、猪排、猪蹄、猪下颌骨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6座大墓中有5座出有鼉鼓、特磬、土鼓等礼乐器,此外还出土4个彩绘龙盘。中型墓共清理六七十座,随葬品十几件至二十余件不等,随葬品放置有序,头端置一木案,案上放木觚、木勺、木杯、木斗,脚端置陶盆,右下方为一木俎,俎上置石质厨刀,墓的两侧放大口罐、陶甗、彩绘或涂红的折腹盆、陶灶、陶豆等。个别中型墓二层台上放置大量猪下颌骨。小型墓数量最多,一般无葬具,有的仅以植物茎秆编成的帘箔卷尸;多数墓无随葬品,少数陪葬有臂环、指环、颈饰、玉琮、玉璜、石刀、石钺、骨簪、石梳等。小墓里还发现一件红铜铸造的小铜铃,含铜量达97.8%,为探讨中国早期铜器的冶炼铸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陶寺墓地的上述三类墓葬依其规模、随葬品数量和质量,大致呈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应该是当时社会结构的真实反映,埋葬制度显著的差别显示出原始社会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已被破坏,生活中的贫富差别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明显地反映在这些葬具葬品中。大型墓的主人可能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落首领,而占90%的小墓死者则处于社会的最下层,阶级对立已经明显。陶寺类型早期可能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即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阶段,晚期可能已进入夏的纪年之内了。

(三) 晋中白燕类型

白燕的龙山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第一发掘地点。这一地区经正式发掘的还有忻州市游邀遗址。此外,太谷、汾阳、孝义、娄烦、离石及柳林等地曾获得一批调查试掘资料。

白燕遗址的龙山时期遗存主要为陶器。陶质分夹砂和泥质两大类,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最具特色的是红褐胎黑皮陶。器表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次之。器类有鬲、罍、釜灶、罐、瓮、盆、壶、尊、豆、器座、器盖等。器物群形态主要特点是双鬲非常盛行,形态与其他类型区别较大;单把鬲少且形态特独;罍、甗、盃数量较多。晋中地区处于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中介地带,其文化面貌带有一些北方文化的色彩,这也是白燕类型遗存的一个鲜明特征。

(四) 晋东南小神类型

晋东南地区东为太行山,西有太岳山,中部即长治和晋城盆地。龙山时期的遗址仅小神经正式发掘。

小神村位于长治市西北 5 公里的漳河水库南端,八十年代末发掘,揭露面积 600 平方米,发现了仰韶至周若干时期的文化遗存。^①

小神龙山时期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2 座房址均半地穴式,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和凸字形。墓葬 8 座,土坑竖穴,无葬具和随葬品,葬式多仰身直肢。

生产工具有石、骨、蚌器。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另有少量的褐陶和磨光黑陶。绳纹和篮纹是主要装饰纹饰,其他有方格纹、堆纹、弦纹等。炊器以双鬲为主,单把鬲较少,甗的数量较多;储存器盛行瓮、深腹盆等;饮食器有单耳杯、碗、盆、盘豆、三足盘、圈足盘、平底盘等。

小神类型的龙山遗存主要以晚期的为主,从陶器的情况看,它受同一时期分布于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影响较大,多数陶器同后岗类型相似,另有少数同三里桥类型和陶寺类型的相近。考虑到它自身文化特色及晋东南经正式发掘的仅此孤例诸因素,暂称之为“小神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长治小常乡小神遗址》,见《考古学报》1996 年第 1 期。

类型”。^①

就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最迟在 7000 年以前农耕文化即已出现在山西,并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磁山文化和枣园文化。仰韶时代早期,后岗一期文化扩张至山西中部及北部,并渗透到山西南部,随后半坡文化也跨过黄河天险在晋南地区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并试图向北挺进。然而,源于晋南的庙底沟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兼容并蓄、迅速崛起并向四周辐射,终于在仰韶时代中期占据了山西全境。仰韶晚期,庙底沟文化的后裔退守于祖辈的发祥地,山西中部和北部则被义井文化、大司空文化、海生不浪文化交错控制。自此,山西不同空间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开始真正形成,格局相对平稳,不同文化在继承地区传统的基础上互相交流,共同发展。龙山时代,山西南部峨嵋岭南北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三里桥类型和陶寺类型。但是属于“唐尧文化”的陶寺类型异军突起,创造了国家出现之际最为灿烂的中原文明。

^① 宋建忠:《山西龙山时代考古遗存的类型与分布》,见《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

第三章 民族融合

山西位于中国大陆中北部之黄土高原,东逾太行山同河北平原相连,西与陕西高原隔黄河相望,北以长城同内蒙古高原为界,南以黄河中条山与河南为邻。它是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黄土高原三个自然单元衔接的地区,南傍中原是华夏民族的核心地带,北邻大漠与塞外游牧民族相接。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奠定了山西在多民族融合形成的中华民族中的特殊地位。历史上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山西是保卫汉族政权的北大门,而当民族矛盾趋于缓和、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的时候,它又是两种文化汇合的“走廊地带”。

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说明,约在新石器时代,在山西地区就出现了介于北方草原红山文化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两者之间的晋文化类型。夏商考古在吕梁山地区发现了与北方系青铜器文化(或称鄂尔多斯青铜器)相似的青铜器文化类型。这说明从远古以来山西就是连结北方游牧文化同中原华夏文化的一个纽带。根据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山西地区的两周考古发现,对照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我们对古唐国、晋国的活动踪迹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它标明早在两周时期建都于山西的晋国,既是华夏民族的一支主脉,也是一个由众多戎狄部落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那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山西一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基地。北方或东北方各族从

大兴安岭、鄂尔多斯草原,先匈奴,次鲜卑、乌桓,再突厥,后蒙古、女真一批批南下进入中原,而山西往往是他们落脚中原的前站和集结地。也就在这块土地上,北方各族同中原汉民族一次次地碰撞、交往、融合,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





第一节 晋国的多民族构成

一、古唐国的源起和叔虞封唐

古唐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小国,在古籍记载中,它是华夏始祖炎黄后裔中的一个主族系。《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蜎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史记·五帝本纪》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炎帝同黄帝是同一族系的两支,炎帝为神农氏,最先居住在今陕西省渭水流域的姜水沿岸,后迁至陈(今河南淮阳)、曲阜(山东曲阜)。大致在炎帝向东发展的时候,汾河流域也成为炎帝的属地,成为炎帝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后来炎帝族的后代还在这里建立了黄、姒、蓐、沈等国。黄帝族居住在陕西泾水流域的姬水。姬水同姜水都在今陕西省的岐山县。黄帝族开始也隶属炎帝,以后逐渐强大,在涿鹿附近的阪泉之战打败了炎帝,其后又在涿鹿擒杀九黎族的首领蚩尤。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有二十五子,在黄帝后裔中,尧是很有声望的一支。古籍多谓尧都平阳。《帝王世纪》云:尧“都平阳”,《汉书·地理志》云:“河东本唐尧所居。”应劭云:“平阳,尧都也,在平河之阳。”《魏土地记》载:“平阳城东十里,汾河东原有小台,台上有尧神屋石碑。”《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汾水注》、郑康成《诗谱》均持

此说。

古唐国也称“陶唐氏”。陶字古义为，以粘土制成器皿，即在窑火里烧成的器皿。甲骨文无陶字，但有缶字，缶字甲骨文为，金文作，像制陶操作形，缶字亦写作，《说文解字》缶下云：“史篇读与缶同。”即说缶古为一字。《大雅》：“陶为陶穴”。《集传》云：“陶，窑灶也，穴，土窑也。”由此看来，大约在新石器晚期，我国北部称为陶唐氏的部落，可能是一个以烧制陶器而著名的部落。陶唐氏主要活动于山西，联系陕北、山西等黄土高原居住土窑洞的传统，亦可得到说明。有学者认为，帝尧音同窑，于是后世便把陶唐氏人格化为传说中的帝尧，或连称为“帝尧陶唐氏”（《世本》）。大概在夏朝建立时，陶唐氏开始衰落。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有一段文字云：“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豢川，豢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飧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这是说夏中叶陶唐氏的后裔刘累为夏王孔甲之臣，任养龙的御龙氏。后来一条雌龙死了，刘累将龙肉送给孔甲吃。不久孔甲追查死龙事件，刘累吓得逃到了鲁阳（河南鲁山县）。

商代甲骨文中有很多关于唐国的记载，称“侯唐”，如卜辞有：“甲寅卜，般贞，业于唐，一牢其业□。”“贞，勿告于唐。”（《殷墟书契前编》一、四七）又“贞，于唐告”（《殷墟书契前编》二、四五）。《国语·晋语》说：“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山西通志·金石记》记录一只前代出土的《唐子爵》，它的铭文有四字“唐子且（祖）乙”。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断言它是“商世

唐君之器也”。

此外据文献记载,在山西、河北境内还有北唐、南唐、东唐、西唐之说。

上述可知,在周朝以前确有一个小国称唐国,其活动主要在山西,另外在山东、河北等地也都有其遗迹,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唐国都于山西平阳,它同炎黄为同一族系,说明唐国自古是个华夏小国。

《史记·晋世家》说:“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此说叔虞封唐地,也在黄河、汾河之东,即夏墟之地。夏都安邑,正与翼城之唐相邻。

五十年代以来,山西考古工作者,对以侯马为中心的晋南、晋东南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两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翼城、曲沃、侯马、闻喜一带。六十年代在侯马牛村古城南铸铜遗址出土了大量花纹精细、品类齐全的陶范和具有鲜明晋国文化特征的陶器等遗物,并在侯马电厂发现了著名的“侯马盟书”,盟书誓辞中有“晋邦之地”之语,确证侯马乃晋国都城新田^①。在此前后,又在侯马晋国遗址的周邻地区翼城、新绛等地发现了一批西周铜器墓群。七十年代在曲村一天马遗址墓葬中出土大量铜礼器,其中一件“晋中违父”铜盃,还有一件是商王康丁祀其父祖甲的“帝辛”方鼎,是成王封唐时的商王室的重要礼器。八十年代,在天马一曲村遗址发现墓葬 500 余座,在太原市南郊晋祠金胜村发现晋国六卿之一墓,有学者认为是晋国卿赵简子之墓^②。九十年代初又在曲村一天马遗址,发掘了十余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这些墓有一座为“中”字型,其余为“甲”字型大

^{①②} 杨富斗:《关于四十年晋文化考古研究》,见《学术论丛》1995年第1期。

墓,出土了许多有铭文的铜器,有名的晋侯有福、邦父、苏、匹等。有学者由此提出天马一曲村遗址为晋国始封地“唐”,又为“故绛”^①。五十年代以来的这些考古发现说明:(1)天马一曲村遗址为晋国的始封地或迁都新田之前的故绛;(2)侯马一带就是晋国都城新田之所在;(3)侯马晋国遗址的城址布局由牛村、台神、平望、白店、北坞、马庄,呈村等小城组成;(4)基本搞清了晋国开国到三家分晋 600 多年晋国文化的基本面貌。

《左传·昭公元年》称:“迁实沈于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国语·晋语》云:“实沈之墟,晋人是居。”又《太平輿地志》称:“唐始封九州、冀州之域乃大夏之墟也。”这说明古冀州、大夏、唐、参、晋实为同一地区,这与两周考古发掘的研究大致相吻合。

二、晋国与周边小国及戎狄诸部

据文献记载,唐叔虞在位年限,大致与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由其子夔父继位,因夔父做官于晋,于是徙于晋,改称晋侯,同时将唐国改为晋国。

叔虞封唐前后,周王室还在山西境内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以后逐渐为晋国所兼并。这些国家包括:霍国,在今山西霍县西南。虢国,当时有北虢、东虢、西虢,见于记载的有公元前 655 年,晋献公灭北虢,其地大致在今山西平陆、河南、陕西的三门峡市。虞国,在今山西平陆。冀国,在今山西河津。黎国,在今山西黎城。郇国,在今山西临猗。董国,在今山西闻喜,即传说中蒙龙畜龙的地方。韩国,在今山西万荣。魏国,在今山西芮城。耿国,在今河津县东南。贾国,在今山

^① 杨富斗:《关于四十年晋文化考古研究》,见《学术论丛》1995 年第 1 期。

西临汾。杨国，在今山西洪洞。旧唐国、晋国同所征服的这些周邻小国都是华夏族，它们是晋国的主体民族。

西周时在今山西境内还分布着众多的戎、狄，不仅晋北、晋中有，晋南也有。他们有些是在西周以前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西周时的戎、狄，大概是匈奴的几个分支。匈奴是我国北方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起源于我国北方的河套、阴山地区。

大量地下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记载说明，位于我国正北方的河套、阴山文化与中原内地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荤粥，居于北蛮，随水草而转移。”甲骨文有“晕”字，大概指的就是《史记》中说的“晕部落”^①。匈奴有许多称呼，除“晕”、“荤粥”外，还有“豸豸”、“豸豸”、“犬戎”、“狄”、“鬼方”等称呼。这是最早的称呼，战国以后才有匈奴之称。这大概是因匈奴在不断迁徙中，因地殊号，随世异名之故。《诗经·小雅·六月》作“豸豸”，《吕氏春秋·审为篇》有：“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据文献记载：早在传说中的远古时代，活动在北方的匈奴先祖——荤粥、豸豸就和中原内地的黄帝有过往来和声教关系。《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的记载；《墨子·节葬》有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之说。八狄，《周礼·职方氏》作六狄，《诗经·小雅·蓼萧》及《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引李巡注《尔雅》作五狄。并云：“五狄在北方，一曰月氏，二曰秽貊，三曰匈奴，四曰单于，五曰白屋。”其实《墨子》、《周礼》所谓的八狄、六狄，或匈奴、单于都不过是后人的追述之辞，所指的是匈奴的先祖荤粥、豸豸^②。《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

① 李盛铨：《〈山海经〉所见马图腾及其与匈奴先族的关系》，载《山海经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② 参见张碧波、董国尧：《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是更近一层关系的记载。

西周时，晋国境内居住着许多戎狄部落。《国语·晋语》云：“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晋国周围的戎、狄部落有下述诸部：

条戎。活动在今山西绛县、夏县、平陆以及永济的中条山一带。《史记·晋世家》载：“晋穆侯，七年（前805年）伐条，生太子仇。”《古本竹书纪年》载：周宣王三十六年（前782年）“王伐条戎，奔戎”。

白狄。主要散居在今陕西省黄河沿岸，它是犬戎的别部。约在春秋前后分为两支：一支居故地，一支徙居河东，以后又从山西徙至河北正定。东徙的白狄又分为三部，即鲜虞（正定），肥（藁城），鼓（晋县）。肥、鼓两部为晋卿荀吴所灭。鲜虞一部则同晋国经过较长时期的战争，最后建立中山国。

骊戎。居于今陕西临潼县附近，本不与晋接壤，《国语·晋语》载：“献公伐骊戎，克之。灭骊子，获骊姬以归，立以为夫人，生奚齐。”骊本为秦的附庸。以后晋国在逐次灭掉虞、虢、耿、魏时，疆土拓展与骊戎的故地连接起来。

北戎。散居在今山西、河北北部，一名山戎。春秋最强盛的一部叫“无终”（河北蓟县），《竹书纪年》载：晋穆侯时，在公元前790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以后又受到齐国的攻击，一度臣服于赤狄。公元前569年，北戎求和于晋，晋悼公派魏绛北和诸戎。魏绛和戎，使双方维持安定30余年，到公元前541年双方又起战事，和议破裂。

狐氏戎。活动于吕梁山一带。《国语·晋语》载：“狐氏出自唐叔。”大概在唐国初封不久，唐国同狐氏就有了联系。在今交城县北有晋大夫狐突及二子狐毛、狐偃的土冢，该山名为狐偃山。

赤狄。亦称“东山皋落氏”。晋献公时曾派太子申生帅师讨伐。以后赤狄分为五部，有潞氏（山西潞城县东北）、甲氏（山西长子县）、留吁（山西长子屯留附近）、铎辰（山西长治）、廆咎如（太原一带），其中

潞氏最盛。公元前 594 年,晋景公命荀林父伐潞氏,灭潞,随即又灭其余四部,赤狄灭亡后,一部分归晋国,一部分北逃,成为汉代的高车族。

此外,还有活动于今平陆县的茅戎,活动于太行山一带的扬拒、泉皋、伊洛之戎,还有由瓜州(敦煌)迁来至晋之河阴一带的陆渾之戎。

上述诸部除白狄中的鲜虞一支建立中山国外,其余诸部都先后被晋国灭亡,他们的土地被划入晋国版籍,他们的人民成为晋国的编户。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长治市北的分水岭,发掘了春秋时期的赤狄墓。据鉴定,可能是赤狄铎辰部某一铎辰子及夫人墓。男性墓葬中有大量随葬品,腹部、足部有玉环、玉片、玉石等,棺椁间有大量容器、乐器、兵器、铜鼎等,女性墓葬有大量玉石装饰品。墓葬中的铜制容器、兵器如钺斧及矛、镞等与吕梁一线的商代青铜文化有相近的风格。而大量铜礼器却颇具中原地区的特色。表明西周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关系。

晋国在与戎狄长期交往中,互相影响、互相促进。首先表现在,晋国在与戎狄的长期作战中,逐渐受到戎、狄装备、战术、兵种的影响,这无疑是晋国在春秋时期强大的原因之一。公元前 538 年,晋平公曾说:“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济。”(《左传·昭公四年》)这里所指多马,当指戎马。晋国在前 678 年只“作一军”(《左传·庄公十六年》),而到公元前 589 年已“作六军”(《左传·庄公十六年》)。89 年之间增加五倍。考古工作者在太原古晋阳城遗址、春秋晋国 251 号大墓中,发现墓旁车马坑埋战车 13 辆,战马 43 匹。这些马匹无疑源于游牧民族。战术上戎、狄的徒兵战、山地作战方式逐渐为晋国所吸收,从晋献公时就设立徒兵左右行,晋文公时又作“三行”。

另一方面,戎狄进入华夏后,绝大多数开始从事农耕,陆浑戎刚从瓜州迁来伊川,那里还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地方,他们迁来后,劈荆斩棘,驱逐豺狼,垦土种田,走上了农耕的道路。

其次,是晋国实行的和戎政策,晋悼公时卿士魏绛提出和戎,得到晋悼公的同意,出使无终缔结盟好。

第三是晋国开放的婚姻。《国语·晋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姬姓黄帝与姜姓的炎帝族世代通婚,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周代。所以晋国多数国君娶姜姓齐国之女为夫人。晋穆侯娶齐女姜氏,晋文侯亦娶姜氏女称“晋姜”。姬、姜通婚,是晋国婚姻的主渠道,但晋国与周边戎、狄之间也有长久而频繁的婚姻关系。晋献公后宫中有四个戎族之女,娶于犬戎的狐姬生重耳,娶于小戎的小戎子生夷吾,伐骊戎时,又从骊戎娶二女,骊姬生奚齐,其妹生卓子。重耳出奔狄部落后,狄人赐给他唐咎如部族的二女叔隗和季隗。重耳娶季隗为妻,随从重耳逃亡的大臣赵衰娶叔隗。晋景公之妹则嫁给潞子婴儿为夫人。

第四,晋国同戎、狄的关系还表现在大胆地任用戎狄人才。如重耳的舅父狐偃本出于白狄,随重耳逃亡在外 19 年,重耳复国后被任用为晋国心腹大臣,狐偃对重耳的复国匡助尤多。

晋国同戎、狄和睦相处,积极吸取戎、狄长处的传统,到三晋时得到继承和发扬。

战国以后,骑兵已作为一种与车兵并重的作战兵种。

《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十九年(前 307 年)“始出胡服令”,“招骑射”。《战国策·赵策》称:“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四方招募能骑射之兵,并且为骑兵装配长弓、剑矛,改穿上褶下裤、长靴,腰系革带,上配带钩的胡装,这不仅提高了赵国的战斗力,使赵国一举为强国,而且也为三晋及后世引进胡服、改造汉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和戎与法治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两项确是晋国的两件大事。周成王封唐时嘱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也是唐、晋诸国君所奉行的基本国策。也正是这一基本国策实施的延续，形成晋国的法制传统和三晋系统的法家理论。它源之于晋国复杂的国家构成和社会关系。

晋国对周边戎、狄采取的是怀柔和法治并用的办法。魏绛曾指出和戎有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怀威，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事迩安，五也。”（《左传·襄公四年》）

晋国和戎的政策确实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这只是一方面。对已被征服的戎狄也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这些戎狄来自各个部落、不同种姓，身份、地位，习惯亦各各不同，所以，周成王才特许“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晋国究竟如何治理的呢？限于文献记载，无法确知。但从当时几部法典的制定和以后法家的盛行可推知一二。同时由于侯马、河南温县盟书的发现，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在成文法出现以前或真正实施以前，这种局部或由宗族、氏族间自行或在一定程度上自愿举行的盟誓和制定的盟约，无疑是种有效的治理和约束的形式。

迄今为止，我国出土了两批重要的盟书材料。山西侯马盟书发现于1965年，河南温县盟书发掘于1981、1982年。

侯马盟书发现于侯马晋国遗址，主盟人赵鞅，盟誓时间为公元前496年。河南温县盟书有学者认为遗址是赵国之中牟，是赵献侯建都之地，主盟人为赵国人赵浣，盟誓时间与侯马盟书同年为公元前496

年^①。也有学者认为盟书遗址为韩国之州城,主盟人是韩宣子之孙韩简子韩不信,盟誓时间为公元前498年^②。两说分歧,一时难以统一,但都在晋国范围之内。盟誓内容,两地盟辞均反映了春秋末叶赵鞅与中行氏的斗争。打击对象除两地都有邮政外,其余均不同。温县韩不信的打击对象以韩豹为首,还有韩何、韩舀、韩罕等。侯马盟书打击对象为九氏二十一家,赵尼为首要打击对象。据《侯马盟书·人名表》,参盟人152个,据考证这些参盟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低级贵族及高级贵族的远宗^③。盟誓体例:(1)参盟人名字、打击对象;(2)有关参盟人及下属未来行为的一系列规定,每一规定由“敢”字起首,“而”字顺接,“者”字终结;(3)召唤神明落实盟誓规定;(4)诅或自诅为毁盟后果。^④

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原始的盟约形式。但盟约本身所反映的仍是参盟人各自的意愿(虽然是极有限的)和违背这种意愿后的处罚方式。盟誓约定和毁盟都依靠神明的力量。这种盟誓或多或少带有在国家政权无力控制局面的情况下,由氏族或宗族自发地建立一种契约性的盟规来共同调节和约束相互关系的含义。尽管两批盟书所揭示的主盟人、参盟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但不能否认这是国家权力和礼制以外的一种约束行为,无论就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都是早期的一种法律形式。两批盟书都发现于春秋时晋国的地域内,尽管不排除以后其他地方仍会有类似的发现,但出现在晋国范围内,产生在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土壤上,确不是偶然的。它同当时晋国复杂的社会关系、历史环境有必然的联系。侯马盟书发现5000余片,温县盟书发现

① 冯时:《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见《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② 赵世纲、罗桃香:《论温县盟书与侯马盟书的年代及其相互关系》,载《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

③④ [美]罗凤鸣:《侯马和温县盟书的背景研究》,载《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

有万余片,充分反映了其盟誓规模和其广泛性。

晋国在成文法颁定以前有法典五部:

公元前 513 年,晋国把范宣子(士匄)制定的刑书铸在一尊大铁鼎上,这个刑鼎同郑简公三十年(前 534 年)郑国子产铸的刑书被史学界公认为是我国成文法的最初公布。对晋国刑鼎的铸成,孔子曾有一段评语云:“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由此可知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为晋国带来第一部法典。

第二部是公元前 633 年,晋作三军蒐于被庐,晋文公制“执秩之法”,又称“被庐之法”。

第三部是公元前 621 年,晋国执政卿赵盾所制定的“赵宣子之法”,其内容为“制事典、正罪法,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湾、本秩礼、续常职,出滞奄”(《左传·文公六年》)。

第四部是晋景公于公元前 593 年,使士会聘周。士会回国后,按照周礼的精神“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修秩执以为晋法”(《国语·周语》)。

第五部是公元前 573 年,晋悼公命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法”。

战国各国变法的核心是李悝提出的“食有劳而禄有功”,用此以取代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其他变法都是围绕该内容而展开的。由变世卿世禄制而发展为官僚制,官僚的广泛聘用发展为郡县制,最终取代王国制,这是战国社会大变动的一个重要契机。

早在春秋时的晋国就从人事制度开始了它的变革。前述在叔虞封唐时就有一套不同于周王朝的统治政策,自武公以来逐渐形成了较为特殊的公卿主政制。晋文公复国后,“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耆老、礼宾旅、友故旧。胥、籍、狐、箕、栾、郤、栢、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

(《国语·晋语》)。到公元前 633 年,晋文公阅兵于被庐、作三军、谋军师、设六卿,以中军帅为正卿,出则主军,入则主政。使公卿主政制渐趋完善,由此组成的是个充分开放的而又相对稳定的统治集团。

维持这样一个集团的首要条件是选贤任能。战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有句名言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句名言正出自晋国,《史记·晋世家》有“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的记载。晋国对于国内的 11 个旧族都能任人唯贤。而且选材不限于本国,将其他国家的贤士良材荟萃晋国,于是有“楚材晋用”之说。而维持这种政策能持久实施的条件又取决于对官吏的赏罚分明。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一、北方民族向山西的迁徙和移民

西晋永嘉以后,司马氏在江左建东晋,这时东北和北部的少数民族趁势入居中原,他们进入中原的头一个落脚点就是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地区。东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时期。田余庆先生将该期民族大融合分为三段,即从永嘉至后赵亡为第一段,后赵亡到淝水之战为第二段,淝水之战到北魏统一为第三段^①。总称十六国时期。这三个阶段的民族融合,以刘渊政权建立为始点发端于山西,又以北魏统一为标志完成于山西。十六国时期五个主要民族中有三个少数民族主要活动于山西并在山西建立政权。

(一) 匈奴的内徙及其在山西的分布

《晋书·北狄匈奴传》载:“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

^①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8 页。

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国正朔。”匈奴是生活在大漠草原上的一支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冒顿为匈奴单于,他不断进行对外战争和掠夺。相继征服了东至辽水、西达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邻长城的广袤地区。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年),蒙古草原发生大旱灾,匈奴分裂为两支:一支为北匈奴向西方迁移;另一支为南匈奴依附于东汉,先居于五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境内)西部塞,后来不断南移,东汉末年集中到并州北部的汾河流域。建安元年,曹操击败袁绍的外甥高干取得并州,命梁习领并州刺史。梁习对并州境内的匈奴采取恩威并施的措施。为了更有效地安置和控制匈奴,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将匈奴分为五部:其左部居于兹氏(今山西汾阳)、右部居于祁(今山西祁县)、南部居于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居于新兴(今山西忻县)、中部居于大陵(今山西文水县),每部置帅,由匈奴人担任,另派汉人为司马进行监督。关于五部匈奴的人数,《晋书·北狄传》云:其左部都尉统万余落、右部六千余落、南部三千余落、北部四千余落、中部六千余落,近三万余落,约二十万人。

西晋时期南匈奴继续西迁,匈奴在并州的分布已不限于上述五个地区。晋武帝在位期间,匈奴大规模内附就有四次:武帝继位初,先有匈奴大水、塞泥、黑难二万余落归化;太康五年又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余人归化;太康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博大及菱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余万口归化;太康八年又有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并车庐什物前来投奔。

魏晋以来匈奴移民部落,据《晋书·北狄传》载有:屠各、鲜支、寇头、乌谭、赤勒、捍蛭、黑狼、赤沙、鬱鞞、菱莎、秃童、勃蔑、羌渠、贺顿、鍾跋、大楼、雍屈、真树、力羯,凡19种。其中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部落。西晋对内附匈奴安置地区见诸记载的只有最初一

批,“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等诸郡靡不有焉”(《晋书·北狄传》)。由上可知,匈奴在魏晋时在山西的移民分布,北起塞外,包括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南达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等广大地区。《晋书·外戚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太原地区使用胡人田客其数字如此庞大,这说明太原在魏晋时是匈奴移民的主要集中地。

(二) 羯族内徙及其在山西的活动

羯族内徙后居于上党武乡县(今山西榆社县),羯族徙居武乡的时间,仅凭现有文献记载已难以确证。关于羯族的族属问题,史籍记载也极少。《晋书·石勒载记》说:“石勒字世龙,初名匍,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魏书·羯胡石勒传》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乡羯室,因号羯胡。”又考《晋书·北狄匈奴传》所载,云入塞匈奴 19 种,其中有羌渠一支。陈寅恪主张羯人是月氏人^①。唐长孺认为主要为西域胡^②。王仲犛认为羯人是石国人。认为羯人高鼻深目多须、崇袄教,同匈奴不是一个部落;又据《魏书》有者舌国,《隋书》有石国,都柘折城,即今天的塔什干,据此推断,石勒的祖先可能就是石国人。移居中原后,遂以石为姓,其祖并为部落小帅^③。谭其骧认为,羯人是中亚康居人统治下的索格底亚那人。^④

七十年代以来,童超经过多方考证,认为羯人是中亚康居人,但羯人不是被康居人所征服的南部农业居民——索格底亚那人。而是康居(羌渠)游牧人。两汉时期,康居羁属匈奴,因而可能有一部分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30 页。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 416 页。

③ 王仲犛:《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 241 页。

④ 谭其骧:《羯考》,《东南日报》副刊,1947 年。

人随匈奴东来，转战于蒙古草原，其后又随之南迁，逐渐内徙于上党武乡一带，因为他们既是康居人，又是匈奴的附庸，故称：“匈奴别部，羌渠之胄。”^① 这个论证与文献记载更为切近，较为可信。

羯族的活动见于记载的仅有石勒为并州刺史司马腾卖于河北、山东做奴隶。其后石勒先召集王阳等八人为“骑盗”，后又为“二十八骑”。刘渊起兵后，石勒率所部响应，归附刘渊转战于并州。汉国刘聪继位后，两度授石勒为并州刺史。石勒由并州坐大，后又受命都督冀、幽、并、青四州杂夷，受封为上党郡公，又署其长子为上党国世子，移襄国建后赵，但并州、平阳、上党仍是他们的主要据点。

（三）鲜卑拓跋族的内徙、移民和各民族在山西的错居

鲜卑是居于东北大兴安岭一带的少数民族，分东部、北部两支，东汉时匈奴分裂，鲜卑东部一支以檀石槐为首领向南推进至蒙古草原匈奴故地。北部一支由推寅为首领向西南推进，先居内蒙古呼伦贝尔湖附近，以后又向南至匈奴故地内蒙阴山一带。这时檀石槐军事联盟已统治蒙古草原，推寅加入檀石槐联盟，成为其五部大人之一。到拓跋力微时，檀石槐联盟解体，力微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建都，大会诸部。从力微开始同当时中原的政权西晋有了广泛接触。公元261年力微遣长子沙漠汗往洛阳学习，公元269年，沙漠汗二次访晋，在返归盛乐的途中，行抵并州（今山西太原晋源镇），为当时晋征北大将军卫瓘截留。居并州两年。沙漠汗归国后因受拓跋族保守势力的谗言陷害，加上卫瓘重金贿赂离间，被力微杀死。从227年到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近70年时间，拓跋族发生内乱，继任的几位首领致力于内部的整顿，邻边其他鲜卑部落关系也得到改善，而西晋方面一度发生八王之乱，无力北顾，这样拓跋族同晋的联系基本中断。

^① 童超：《关于五胡内迁的几个考证》，见《山西大学学报》1978年4期。

公元 295 年拓跋禄官即位后,将拓跋分为三部。由猗卢统领的西部拓跋,据盛乐故城,以后南入并州,并将并州北部的杂胡迁往云中、五原、朔方。以后又西渡黄河,攻击匈奴。拓跋猗卢的南下使中原形势复杂起来,逐渐形成明显敌对的两个阵营,一方是司马颖,匈奴刘渊、刘聪,羯人石勒;另一方是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军”。当时的并州刺史是刘琨。公元 310 年,猗卢助刘琨击退了进攻新兴(包括今山西岢岚、岚县、忻县、五台等地)、雁门(治阴馆,今山西代县西北)的白部鲜卑和匈奴铁弗部。为此,刘琨同猗卢结拜为兄弟,上表西晋朝廷酬谢鲜卑,晋怀帝遂诏封猗卢为代公,以代郡为其封邑,又将雁门郡所辖陉岭以北的楼烦、马邑、阴馆、繁峙、崞县等五县的汉人迁移到陉南,而把陉北土地全部送给拓跋人。刘琨又受猗卢请求派雁门豪族莫含到代国为官,参与代国的军国大谋。猗卢以后到什翼犍执政时,代国被前秦击败,代国亡。公元 386 年正月,什翼的孙子拓跋珪会拓跋各部于牛川(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境内的塔布河)即代王位,年号登国。

公元 396 年,拓跋珪称帝建魏,在伐燕途中挺进中原,出马邑、逾勾注,直逼晋阳,取得山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天兴元年(398 年)七月,迁都平城(山西大同),以后又击败前秦,相继取得永安(山西霍县)、蒲坂(山西永济),取得河东地区,最后夺得山西全境。拓跋族在援晋战争以来不断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同时也增强了同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联系,并且在军事征服战争中又不断俘获和迁徙被征服民族的居民。从而使民族区域界线被打破。定都平城以后,又把被征服的各族居民强徙平城周围,使山西地区更成为各民族融合的基地。

拓跋族在军事战争中的迁徙和移民大致分三个时期,即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和太武帝拓跋焘时期。

拓跋珪时见诸记载的大规模的俘获、迁徙和移民有 15 次:登国

三年(388年)北征库莫奚,六月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登国三年十二月,讨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数万。登国五年(390年),西征高车袁纥部“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魏书·太祖道武帝纪》)。登国五年十一月,纥奚部大人库寒举部内属。同年十二月纥突邻大人屈地鞬举部内属。登国六年十一月“山胡酋大幡頰、业易于率三千余家降附,出居于马邑”。天兴七年(398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万余口,以充军师。十二月徙山东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平城。天兴二年(399年)破高车、杂种二十余部,获七万余口,又破其残部获二万余口。天兴三年(400年)高车别帅敕力鞬率九百余落内属。

天兴四年(401年)高车部三千余落来降附。天兴五年(402年)获匈奴残部徙民于平城。同年二月讨破多兰部木易于与卫辰、屈丐等部弃国遁走,获其辎重库藏、马四万余匹,骆驼犍牛三千余头,牛羊九万余口,班赐将士各有差,徙其民于京师。十二月越勤部莫弗率其部万余家内属,居五原之北。天兴六年(403年)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余家内属,入居云中。

明元帝时有 22 次徙、移民族属有:昌黎、辽东民,河东蜀民,西河胡,蠕蠕斛律宗党所部,河东薛氏,越勤倍泥部,东平、平昌流民,琅邪民,河南流民,汝南民,氏豪,冀、幽、定三州徒何,冯翊羌族,杏城羌族,济东豪族等。时间从永兴三年(411年)到泰常八年(420年)。

太武帝拓跋焘时有 27 次徙、移民族属有:河南流民,赫连昌部,武都氏族,秦雍士族,沮渠蒙逊所部,蠕蠕大檀部,上郡屠各、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士民,陇西休屠,和龙士民,凉州士民,青徐、长安百工技巧等。时间从泰常八年(422年)至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年)。这些徙民大部分安置在平城周围和河北境内。

二、山西境内各民族社会制度的一体化进程

(一) 匈奴五部建制和汉、前赵政权

匈奴入居中原后主要活动在山西,东汉以来入居中原的南匈奴绝大多数集中在并州北部的汾河流域。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击败高干后,命梁习为别司马领并州刺史。《三国志·魏书·梁习传》载:“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桀跣。习到官,诱谕诏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民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梁习对匈奴采取的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匈奴贵族势力,为以后改变匈奴固有的部落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分匈奴五部的意图和过程,《通鉴》有段记载较为清楚:“初,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固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锦、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司马以监督之。”曹操的五部之制与过去对匈奴的统治有了重大的不同:其一,五部之分实际上剥夺了单于对匈奴本部的统治权利,同时单于被留邺都,虽然还保留其头衔,但实际上是作为人质被监督起来;其二,五部帅虽仍由匈奴屠各贵族担任,但他们已不像原来的部落酋长,他们已属于中央的命官,其任命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三,五部各部一律接受汉人司马的直接监督,这种制度是曹操改造部落组织使匈奴直属于郡县领导的一个重要步骤;其四,《晋

书·刘元海载记》说：“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就是说实行五部以后，五部不管原籍在何地，各部长官必须把家属集中在“晋阳汾涧之滨”作为人质控制起来。

上述可知，曹操五部之制，起到了使匈奴由部落组织向郡县领导过渡的作用，正如刘宣在策动匈奴反叛时说的：“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载记》）西晋初对匈奴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晋书·江统传》载：“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太初之时又增为四。”

公元308年，刘渊在平阳（山西临汾）建汉国，迅速地削弱了匈奴聚族而居的集中状态。刘汉建国的宗旨是“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晋书·刘元海载记》）。从刘汉统治集团的组成看其政权是建立在刘氏宗族和五部贵族的基础上的，但从汉国政权的建国纲领和政权建制看，则体现了匈奴内迁并州以后，长期同汉族人民共处、汉匈融合的许多特征。刘渊起兵是为了“兴邦复业”，他说：“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他即位时的令辞详述了自高祖即位、孝文升平汉道、孝武拓土攘夷，以至王莽篡逆，其后又有光武复兴、黄巾事起、董卓作乱、曹操背逆、司马氏自相残杀等汉以来的一系列历史变故，自谓要“绍修三祖之业”，尊崇华夏正统。他说：“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受耳。”自称他所要恢复的不是冒顿之业，而是“呼韩邪之业”（同上）。汉国建制多承汉制，国号为汉，官制如丞相、相国、司马、司徒等，地方制亦为郡国并行制。这些都说明刘渊匈奴部众深受汉文明的浸染和熏陶。

就客观作用而言，汉和前赵政权的建立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同被征服的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联系，主要表现在：（1）匈奴汉国消灭西晋政权，首先加剧了本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如刘聪继位后，纳靳准二女为贵嫔，又纳刘殷二女、四孙女为贵嫔，立上下左右四皇后，四

后之外又有佩皇后玺者七人,整日与群后四处游猎,汾水观鱼,以烛继昼。这样使本族内部的阶级分化迅速加剧,使匈奴的传统结构解体。(2) 作为五部核心的刘氏集团,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政治风波,在这几次风波中,刘氏上层统治集团几乎被消灭殆尽。公元318年发生的靳准之变,汉国贵族杀刘粲,“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氏在平阳的一支在此事件中几乎全部丧命。第二次是前赵末年石季龙的大屠杀。先是刘曜战败被石勒杀害,石季龙又打败刘曜子刘熙等于上邽(今甘肃天水),杀熙及诸王公侯将相卿校以下3000余人,又坑杀其王公、五郡屠各5000余人于洛阳,并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民、秦雍大族9000余人于襄国。刘氏集团宗族在汉、赵国家建立以来受到的这两次打击,使五部核心瓦解,内部结构解体,从而在客观上推进了五部同汉族的融合。(3) 刘渊起兵是各族人民共同反晋的一次巨大浪潮。其军队组成以匈奴为主,但随着战争的延续和扩展,大量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成员补充了队伍。刘曜强盛时,有兵28.5万人,出兵的时候“临河列阵万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晋书·刘曜载记》)。如此庞大的军队阵营不可能单由匈奴人构成。军队成分的变化,形成军队内部的大混合。汉人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且居于多数,军队中的汉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4) 在政治意识上,汉国政权同西汉匈奴有了显著的不同。汉武帝时,单于遣西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子骄子也,不为小礼所自烦。”表达了匈奴在政治上与汉处于对等地位。但到汉、赵建国时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已完全以华夏正统自居。如前所述,他们所争取的已是中原帝王的继承地位。所以,刘渊在建国时说:“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

(二) 北魏的平城改制和各民族社会制度的同步化建设

北魏自拓跋珪建国,又经过拓跋焘“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檐、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魏书·世祖太武

帝纪》),奠定了基业。其后又经过高宗拓跋浚、显祖拓跋弘两代 20 多年的经营,使拓跋氏在中原的统治初具规模。接着在冯太后亲政、孝文帝在位期间,在平城实施了三项改革措施。

平城改制是北魏改革的主体工程。一是变班赐制为俸禄制。北魏初建诸种制度尚在草创之中。首先北魏对官吏将士没有正式的俸禄制度,实行的是班赐制,这种分配形式弊端很多,远远落后于中原早已实行的官俸制。所以北魏改革首先从官吏的分配制度入手。太和八年(484年)开始实行俸禄制,不久孝文帝又发诏,规定俸禄每三个月发放一次,次年,对皇室的俸禄作了具体的规定;二是变计口授田为均田制,对官吏及百姓的受田和赋税作了具体规定;三是变宗主督护为三长制,这是针对魏晋以来豪强坞堡等进行的一项对地方政权的改革。这三项制度是拓跋珪定都平城以来实行的:“正封畿、制郊甸、端经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魏书·太祖道武帝纪》)。三项改革的中心在于均禄、均田、均政。这三项制度消除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上由不同制度、不同分配形式上造成的障碍,使社会制度走上同步化建设的轨道,为民族融化铺平了道路。

与社会制度划一的同时,北魏统治者对汉、鲜卑社会阶层的结构也进行了调整,北魏进入中原以来,豪门世族已成为封建社会政治中的一支不可取代的力量,鲜卑拓跋族虽然用军事力量征服了中原,但对中原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阶级结构、阶层构成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

拓跋族初历中原,就建立了一项相应的制度,皇始元年(396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魏书·太祖道武帝纪》)天赐元年(404年)八月,又规定分为四等:王、公、侯、子。并将爵位同品位对等,王一品、公二品、侯三品、子四品。但这主要是为拓跋本部而制定的,是将汉族士族排除在外的,所以到拓跋焘时出现了“崔浩事件”,崔浩之死集中反映了北魏统治者内部胡、汉两族的矛盾。《魏

书·卢玄传》载崔浩同卢玄的一次谈话云：“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诎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由此。”崔浩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为郡守，由此同太子晃发生了争执。崔浩“分明姓族”，目的是厘定汉族士族的品位，确立汉族世族在北魏政权中的地位，这在当时是鲜卑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崔浩被杀时，受牵连的有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充分反映了矛盾的由来。但胡、汉矛盾并没有因诛杀崔浩而消失，相反却迫使鲜卑统治者不断地作出让步。北魏均田制规定奴婢和平民一样受露田，而对授田的奴婢人数则没有限制。其本身就承认了拓跋族上层和中原世家大族的特权。而北魏的三长制，刚一实施就受到抵制，“豪富并兼者，尤弗顾也”。抵制最力者是中原豪强。以后孝文帝定姓氏，最终将中原的崔、卢、郑、王同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对等，这固然旨在提高鲜卑贵族的地位，但也同时是对汉族世族的确认。

另外各族人民的反魏斗争也是消除民族隔阂，增强各族人民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北魏政权建立以来，对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军事征服，迫使各族人民不断奋起反抗。孝文帝改革前小股反抗斗争就连绵不断，从世宗太和二十三年到六镇起义前夕，起义斗争就有20余次。参加起义的有汉、鲜卑、氐、羌、匈奴等各族。起义地区遍及幽、梁、齐、郢、豫、泾、汾、瀛、益等广大区域。北魏后期的六镇起义就其持续时间、斗争范围和参加人数而言都是空前的。起义遍及河北、山东、内蒙、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广大省份，参加起义的成分从民族构成看既有鲜卑，又有鲜卑化的匈奴，又有蛮、僚、氐、羌、汉等各族人民，从阶级成分看，既有六镇镇将、镇民、汉族官僚，又有自耕农、寺院僧侣等广大下层人民参加。起义在高峰时人数达数百万，坚持斗争八年之久，在起义斗争过程中，鲜卑和各族人民并肩作战，同呼吸、共命运，促进了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

三、各民族社会风俗习惯的趋同和汉化

各族人民大规模内徙,各种习俗也随之俱兴。二至六世纪以来,在山西错居杂处的各族人民意趣各异、风尚颇殊,经过各族人民的长期共处和北魏一系列改革措施,内徙山西的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中原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和改变了本民族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惯,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传统也为汉族所吸取。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说:“乌丸者,东胡也。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贱老,其性悍鹫。”婚姻习俗:“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且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夫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丧葬习俗:“贵兵死,斂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亡魂归泰山也。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座,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祭祀习俗:“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毕烧之。”

关于鲜卑,同书云:“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但也有些乌丸所没有的习俗:“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关于鲜卑的习俗谈到:“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

上述记载可知,鲜卑、乌桓在初临中原时,生活习俗具有典型的游牧民族的特征。

北魏政权建立以后,统治者一开始就把婚姻纳入封建等级的轨道。和平四年(460年)高宗拓跋浚下诏:“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所以殊等级,示轨仪。今丧葬嫁娶,大礼未备,贵势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谓式昭典宪者也。有司可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成序,著之于令。”不久又下诏:“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魏书·高宗纪》)用法令形式规定良贱不婚这是北魏以前包括汉族的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在婚姻上的等级渗透,鲜卑、拓跋族比汉族统治者亦有过之。

高祖孝文帝时下诏禁令祭祀“不听妇女合杂”(《魏书·高祖纪》)。孝文帝把婚姻的结合看作是推行汉化的组成部分。在定“四海氏族”的同时,鉴于北魏前期鲜卑贵族“拟匹卑滥,舅氏轻微”的状况,广泛推行“胡汉联姻”,正式颁布鲜卑与汉人通婚的规定:王国舍人应娶八族及清修之门。自己将卢、崔、郑、王及陇西李氏女入宫。又令六兄弟分别娶汉族高门为正妃,指定长弟咸阳王元禧聘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元干聘代郡穆明乐女,广陵王元羽娶荥阳郑平城之女,颍川王元雍娶范阳卢神宝之女,始平王元颢娶陇西李冲之女,北海王元祥聘荥阳郑懿女。一般鲜卑也自然要同汉人通婚。并下诏改变“同姓之婚娶”(《魏书·高祖纪》)。其后北魏依据官职品位的高低规定了娶妻数,并对三藩王公妻子的名号也作了具体的规定。

但同时要看到北魏在婚姻上进行大跨度改革的同时,本民族一些固有的婚俗也不同程度地保存下来,并影响到汉族。太和二十年孝文帝下诏:“夫妇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会,礼有达式,男女失时,以礼会之。”(《魏书·高祖纪》)世宗正始元年也有同样的诏令:“男女怨

旷,务令媾会。”(《魏书·世宗纪》)肃宗正光二年诏曰:“男女怨旷,务令合偶。”(《魏书·肃宗纪》)这些鲜卑固有的婚俗的延续为汉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的汉族婚姻注入了生机。

就入居中原的五个主体民族而言,氐、羌内徙最早已有了较高的汉化程度,羯族文献没有多少记载。对比之下,匈奴是个民族凝聚力很强的民族。前赵的建立虽对固有的部落组织进行了重大改造,但在婚姻以及其他习俗上的汉化却较为缓慢。

《汉书·匈奴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无文字,以言语约束,国人不知礼义,食畜肉,衣皮革,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子。《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匈奴“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可知匈奴在东汉入塞以来,习俗无大的变化。经过刘汉、前赵政权,有了明显的变化,但也主要限于匈奴贵族上层。《晋书·刘聪载记》载:“伪太后单氏姿色绝丽,聪悉焉,单氏即义之母也,义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聪悲悼无已。”单氏是刘渊的群妻之一,照匈奴习俗:“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刘聪的行为不违匈奴礼俗,而单氏和刘义却耿耿于怀。这说明至少在匈奴统治者上层,道德准则也发生了变化。

匈奴的祭祀崇拜较为单纯,主要有祭祖先天地鬼神的习惯。有的学者认为,祭天的原始崇拜形式源于匈奴。这种原始崇拜到东汉入塞以来一直保持着。但到了汉、赵建国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匈奴人的原始崇拜已转变为复杂的宗教迷信崇拜。其中有自东汉以来盛行的谶纬崇拜。《晋书·刘聪载记》里讲到一则祥瑞的故事说:“终南山崩,长安人刘终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败赵昌。”此事在朝廷中引起一番争议,多数人认为这是赵国昌盛之祥瑞,而中书监刘均则说是赵国衰败的征象。这说明汉以来祥瑞灾异观念在汉、赵政权中开始兴盛。但这些变化还主要表现在统治者上层,但到北魏统一

北方和一系列汉化政策实施以后,匈奴的整体结构和民族习俗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匈奴人的主体部族是屠各族,在北魏时其分布地区东起山西、陕西渭水流域以北、陇山以东,西至河西走廊,这些屠各族已大部分成为北魏政权下的编户齐民,到北魏后期他们作为一个民族陆续消失了,走完了他们的汉化历程,这是内徙最早的一批匈奴。另有一批匈奴入塞较晚,也不同程度地走上汉化道路。这部分匈奴史籍称“山胡”。《周书·稽胡传》载:“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原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然语类夷狄,因译乃通。虽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赋,有异齐民。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而凶悍恃险,数为寇乱。”上述可知,山胡已大都由游牧转为农耕,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其服饰、葬俗也基本上与汉族趋同,唯语言和婚俗则仍保留一些匈奴的痕迹。但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如“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不见了。而兄死弟继其妻的习俗仍有,这个习俗一直到明清时的江南还有^①。这大概是婚俗上受少数民族影响的一个典型的例证。

第三节 民族融合的文化成果

考古学上的晋文化有两个含义,一是说它是几种文化的汇合;二是几种文化碰撞后出现的“一颗新星”^②。这个课题的提出和研究是个世纪性的突破。山西地区的考古文化南北处于“中原古文化”与“北

^① 参见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5页。

^② 苏秉琦:《晋文化研究问题》,载山西考古研究所编:《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1986年版。

方古文化”两大区系的纽带地域^①，东西则为“秦沂文化区”与“华渭文化区”的割据前沿^②。山西东西有山地，中部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串珠式盆地，是阻碍文化交流的天然屏障，而黄河水系（汾河、涑水河等）和海河水系（滹沱河、桑干河等）又像一个纽带把处于屏障的区域和地理单位连结起来，成为文化交流、传播、辐射的一个孔道^③。前者说明这种文化的封闭性，有相对的独立性，后者又说明它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系统，能不断地吸收、融合和传播。远古以来一直到明清时代，山西地区这种文化上的纽带和火花的作用和功能一直延续和保持着。

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都是一次新的文化的生成。在漫长的民族融合的道路上，许多民族走完了它们的历程，它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消失了，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它们曾经创造的文化也成为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组成部分。北方民族入中原后，他们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十六国时匈奴上层贵族主动向中原士人拜师求学。刘渊就曾“师事上党崔游”（《晋书·刘元海载记》），所学包括《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以及《史记》、《汉书》、诸子之书，无不综览。有些匈奴人，专门治汉学，成就很高。《晋书·艺术·卜瑒传》载：“卜瑒，字子玉，匈奴后部人也。少好读《易》，郭璞见而叹曰：‘吾所弗如也。’”北魏孝文帝元宏，不仅是位政治改革家，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和文学家。《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载：“才藻高贍，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魏书·文苑传》说他的作品是“气韵高擡，掩蹕曹丕”。明人王世贞说他是三代之后，人主文章之美者之二十九位之一。

① 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③ 田建文：《山西考古区系类型问题》，载《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

史载元宏有文集三十九卷，现存诗作仅有《悬瓠方丈竹堂飨侍臣联句》一首，首句为“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末句为“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另一方面北方民族的许多优秀的东西，如服饰、饮食、宅居、建筑、舞蹈等也给华夏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双方的交汇、对流，出现了一批批文化新成果。

一、民俗文化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为后世引进胡服提供了借鉴。以冠服论之，《史记》徐广曰载：先秦赵国“以金铛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中华古今注》载：“搭耳帽之别，本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绝，赵武灵王更以绫绢皂色为始。并立其备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应劭《汉官仪》称汉代貂蝉帽始自此。据载元代以前还有一种姑姑帽，王国维《〈黑鞮事略〉笺证》：“连见姑姑之制，书术为骨，色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直尺长柳或铁打成枝，包以青，其间上人则用本朝翠花或五彩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也当由胡冠演化而来。以衣而论，元以前有种衣服，有衽而无领，旧以毡毛裹以绞丝金线，再包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疑是一种胡装，或由胡服演化而来。

南北朝至隋唐时漠北为柔然、突厥所据，柔然“随水草畜牧，以穹庐居，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靴”（《南史·北狄传》）。突厥“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氍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隋书·突厥传》）。《梦溪笔谈·故事》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鞞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以佩弓箭、帔帨、算囊、刀砺之类。”

我国古代有履无靴,故靴不见于经。《太平御览》卷六九八引《释名》:“鞞(即靴),胡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可知始于赵武灵王。匈奴有靴,鲜卑、柔然等也有靴。北朝时穿靴很盛行。皇帝、百官以及一般男女百姓都穿靴。

魏晋以后,胡服对民间的服装影响很大,穿胡服成为当时一种新潮。《史记·赵世家》中唐人张守节的正义说:“胡服,今时服也。”时服,也即日常穿的衣服。吕一飞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服饰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服饰发生了一场变革。华夏族传统的服饰主流‘上衣下裳制’,发生了变化,逐渐向‘上衣下裤制’转变。这一变革兴于十六国,盛于北朝,从中国北方开始,逐渐向中国南方推进,延至隋唐,大局粗定。”^①

胡床是南北朝时引进的,古代汉族习俗是席地而坐,或席地而跪。其外在饮食、居处、交通等方面受匈奴、鲜卑影响也很大,如饮食上的胡饼、胡饭、奶酪,居处卧具毡帐、毡席,交通上的木制大轮车、皮舟等。

二、北方民族艺术

在音乐舞蹈等艺术方面,少数民族贡献更大。

胡笳,是匈奴的国乐。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有“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的诗句。郭茂倩《乐府诗集》说:蔡文姬从匈奴归汉后,“胡人思慕文姬,卷芦叶而吹笳,奏哀怨之音”。由此看来,胡笳最初是由芦叶卷制而成,后来才改用木管来代替。胡笳吹起来,声音苍凉悠扬,哀怨悲怜,极为感人。它不仅是匈奴人娱乐之乐器,颇能引发人怀念故土的思绪,而且还能充当战斗的号角与武器。有人说它可同

^① 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垓下楚歌相比。《晋书·刘琨传》载：刘琨为并州刺史，在晋阳城被匈奴重重包围，窘迫无计，刘琨乃乘月登楼吹奏胡笳，匈奴兵听了“流涕歔歔，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奔围而走”。

琵琶也是匈奴的乐器之一，刘熙《释名·释乐器》中说：“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南北朝时很盛行。在山西寿阳北齐庾狄迴洛墓葬中就有琵琶俑两件出土。两件体态衣着相同，头戴赭红小冠、梳发，身穿赭红圆领左衽胡袖长袍，下着宽敞肥大的袴，圆头黑鞋，相貌清秀，作宽衣博带怀抱琵琶弹奏姿式。另外在大同发现的司马金龙墓也发现有琵琶和曲颈琵琶俑。

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的发展，也令后人注目。当时的绘画大师有三国时的曹不兴、两晋的卫协、张墨、顾恺之，南朝宋陆探微、宗炳，梁张僧繇等，顾恺之的山水画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的成果。1980年太原南郊晋祠镇北齐右丞相娄叡墓壁画的出土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的绘画和南北艺术交流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娄叡墓壁画有71幅，分布在240平方米的墓壁上。壁画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绘娄叡生前的戎马生涯，北朝显赫的威仪和豪华气魄以及生活场面。墓道东、西壁是一幅横卷式大型连环画，所绘内容为西域出行图和回归图。

西壁出行图上首有三只猎犬开道，继而是浩浩荡荡、络绎不绝的出行队伍。队伍中有一老态龙钟的老妪，身穿深黄窄袖胡服，乘白马居中缓行，有几位面色姣美，服装华贵的少妇、小姐、侍女簇拥前后。在行进的队伍中，有昂首负重的驼队，有双蹄奋起、昂首嘶鸣的马队。有一身材高大、头戴高筒毡帽、高鼻短髭、浓眉深目，看上去极像波斯人的随行者，作张望招呼貌。在出行图中还有沿途山水景色。真实地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中西贸易的繁荣景象。

东壁回归图上，有一奔驰嬉戏，或昂首奋蹄，或回首瞭望的群马

图,图中有身穿红袍手持槊矛、刚下乘骑的使者,有身穿窄袖胡服、腰束革带、牵马缓行的武士。这支由主帅率领凯旋归来的队伍,有文武官员肃立迎候。墓道下层描绘墓主人宫廷内苑生活,包括迎宾、部曲、鞍马、牛马出行,墓主人夫妇宴飨和乐舞图。

第二部分为墓主人死后升仙的祥瑞图两幅。包括獬豸、天河、日象、仙人乘龙、羽人开道、雷公电母,还有维妙维肖的十二生肖图。

整个画面上有人物、车马、伞盖、羽葆、帷幄幔帐、天象、山石、动物、冬树、花卉、仪仗乐器、文武官吏、飞禽走兽,以及雕龙画虎的门庭,天上人间,丰富多采。

绘画中的人物着色大都采用平涂,用色有红、黄、黑、蓝几种,有少数采用了熏色晕染,这种晕染法既沿用了中原地区凹凸画的方法,又糅进了透视学的基本原理。晕染法是由梁张僧繇发明的,在中原使用由来已久。但真品没有保存下来,因而娄叡墓画的晕染法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也是最成熟的方法。娄叡壁画的出土,它将大画师宗炳和张僧繇提出的凸凹画法理论再现出来,是我国绘画史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此外在上述山西寿阳发现的北齐庾狄邈洛墓以及太原南郊发现的其他北齐墓也有类似发现。魏晋南北朝的大画师几乎全部出在南方或南朝,而娄叡墓画以及北齐其他墓画在山西的出土,充分说明了南北朝时的文化交流和山西地区的民族融合。

雕塑艺术是北朝突出的成就,关于云冈石窟的艺术渊源,过去学者多认为,石窟寺艺术是由我国西部传到敦煌,经过消化,中转到麦积山,然后输送到中原,再渐次到达云冈等地,认为云冈石窟是“凉州模式”的翻版。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上述认识过高估计了敦煌石窟在我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事实上敦煌早期洞窟——魏窟,反而受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都——平城(大

同)或洛阳的影响^①。吴焯指出：“云冈大佛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云冈石窟体系，似还不能简单地来源于凉州，还应考虑到河北中山以及直接来自于印度、中亚和西域的文化影响。”^②所论很有道理，一种文化的传播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不能没有联系。从云冈石窟昙曜五窟即 16、17、18、19、20 窟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衣冠服饰、佛像情态、造像风格、雕塑手法看，是中原文化、北方游牧文化、西域文化、印度犍陀罗以及中亚文化的总汇合。它集中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山西地区的民族融合和中外交流的程度。

从戏剧艺术看，元代杂剧的中心在平阳(山西临汾)。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元剧起源于晋南。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曾将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并举。明代将其四人誉为“元曲四大家”。其中关汉卿是山西解州(山西解县)人，白朴是隰州(山西河曲)人，郑光祖是平阳襄陵(山西襄汾县)人。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六十六部、白朴十五部、郑光祖二十二部，而金元杂剧现存五百三十余部(目)，他们三人占近五分之一。王国维根据《录鬼簿》得元杂剧家 62 人，其中北方籍 49 人，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阳为最多，其数量占到大都的五分之二。元人郭嗣兴的《咏临晋》诗有：“使令稀婢仆，歌舞盛优倡。”王恽《元庙秋社》有：“社坛烟淡散林鸦，把酒观多稼，霹雳弦声斗高下，笑喧哗。”是当时社戏盛行的生动描绘。近年来在稷山金墓墓室南壁发现雕刻有四、五个演员正在作杂剧表演的壁雕，表演的有副净、副末、末泥、装旦、装孤五个角色。在杂剧演员后面有“乐床子”与正在伴奏的大鼓、腰鼓、拍板、横笛、箏篥等乐俑。在侯马金代董姓墓也有类似发现，研究者对五个优伶砖俑表现的角色进行分析，推测所表演的剧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

目为“雪花鬻弄”中的某一节目。

杂剧产生于金、元时代辽、金及蒙古统治下的北方不是偶然的。从杂剧艺术本身看，它是唐宋以来高度发展的诗、词文学同自北朝以至金元以来北方民族的音乐舞蹈艺术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杂剧就是这种文学艺术和民族舞蹈艺术在舞台上的最和谐的糅合和统一。

明清以后在山西地区出现的新剧种梆子腔有蒲州梆子（南路梆子）、晋剧（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其中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以慷慨、激越、高亢为基本特征。这正是古代燕、赵地区“慷慨悲歌”的边塞风骨之遗绪。1956年郭沫若在忻县观赏了北路梆子演出后，赋诗赞美称：“激昂慷慨不寻常。”抓住了北路梆子的基本特色。

三、佛、道、儒融合的历程和成果

魏晋南北朝迄明清山西地区民族融合的另一显著的表现是佛、道、儒的融通及其成果。佛教是十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佛教在中土的盛行，同十六国和北魏拓跋族的推动有极大的关系。入居中原的北方民族自觉不自觉地吧佛教作为其自身的宗教，其开始带有同中原固有的儒、道相抗衡的含义。东晋时王谧在答桓玄书中说：“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不与之接。”（《全晋文》卷二〇）反映了这种情况。但在刘渊建汉初，文献中还没有关于崇佛的记载。到刘聪继位时，佛教开始在其政权中产生影响，但不明显。《晋书·刘聪载记》有一段关于宗教的文字，其中夹杂了一些佛教的生死观。比较起来十六国时的北方诸族中刘汉政权有较浓重的华夏正统观念，前已述之。而后赵国的创建者石勒却大为不同，石勒本人对中土文化习染尤浅。石勒起事时曾说：“丈夫行事，当磊磊落

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太平御览》卷一二〇《偏霸部》)所以,石勒不像曹操、司马氏有正统、名分等顾虑,也不像刘渊那样打华夏的旗号。后赵建国时在观念信仰上几乎是个空白,所以佛教便首先受到青睐。佛学大师佛图澄一到赵国,就极受石勒推重。

石虎继位后,中书令著作郎王度上奏说:“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万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石虎诏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华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高僧传·佛图澄传》)反映了十六国时少数民族对待佛教的态度。

历史上主张佛、道、儒合流的,东晋慧远应是第一人。慧远是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人。《高僧传·释慧远传》说他:“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后来从释道安学佛后,便皈依了佛教。南下东晋建庐山东林寺,著书立说,弘扬佛法。在他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与隐士刘遗民等书》)道出他由儒入道,又由道入佛的思想历程。慧远一生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他糅合佛、道,创“法性本体说”,又综合儒、佛,提出“释迦与尧孔,发致不殊”,说儒、佛“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慧远是三教合一的倡始者。

鲜卑拓跋部入临山西时,黄帝、尧、舜、儒、道并崇。《魏书》有很多关于从拓跋珪到孝文帝祭祀黄帝、尧、舜、禹的记载,此不详录。近年来在大同出土的北魏司马金龙墓葬木板漆画上画有“虞帝舜”,“帝舜二妃娥皇女英”,“周太姜”等。《魏书·儒林传》载:北魏初定中原:“以经学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又载:“帝好黄老,颇览佛经。”(《魏

书·释老志》)太宗时“立儒学教授博士”。而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灭佛事件。反映了统治者内部崇道和崇佛的矛盾。由佛、道的冲突引起拓跋族贵族与汉族士族的冲突。但经过长期的碰撞和磨合,佛、儒、道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其主要特征是以儒学为标准,容纳道、佛。北魏僧人法果就认为皇帝就是“当今如来”,应当礼敬。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而道教领袖寇谦之一开始就借老君之口,宣称要“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魏书·释老志》)。寇谦之入见崔浩,“每与浩言,闻其古今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怠”。对浩说:“吾行道隐居,不达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境。”(《魏书·崔浩传》)崔浩本来为儒学世家,最终皈依了道教。

佛、儒的合流还表现在云冈石窟造像上。云冈昙曜五洞的主佛是依照北魏的五个皇帝而塑造的。史载在文成帝恢复佛法的当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兴光元年(454年)又“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魏书·释老志》)。昙曜五洞中由西往东依次为20窟道武帝、19窟明元帝、18窟太武帝、17窟景穆帝、16窟是正在位的文成帝。因此这些佛的相貌既不像佛经中的天竺人,也不像汉人,带有北方鲜卑人的雄厚劲道。这种“以帝为佛”的现象,正是佛教接受汉文化影响、屈服于皇权的典型代表。

迁都洛阳以后,这种“以帝为佛”的现象不见了。而到了唐代受山西文化熏染的武则天却又把这套东西搬了出来。《旧唐书·薛怀义传》载:“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征。”武则天当了皇帝后,自定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帝”,慈氏即弥勒。武则天还以卢舍那佛自比,起名为“武曩”,

璽即光明普照天下之意，与卢舍那教义相同。并用“脂粉钱二万贯”资助造卢舍那大佛，有学者认为此佛可能是模拟武则天形象建造的。^①

另外在佛教造像上也有关于佛、道合流的体现。北魏始光元年(424年)，佛弟子魏文朗“造佛道像一躯”，造像碑上将佛僧与道士等塑在一齐。在五台山一些寺庙殿堂的基石和台阶栏杆部位雕造的一些人物故事里，也夹杂有儒、佛、道三教的内容。

到了宋金时，在山西境内的庙宇内各种崇奉都有，有后土庙、关圣庙、圣母庙、灵观庙、社稷庙、牛王庙、风伯雨师庙、三郎庙、禹庙等，表现了多信仰崇拜。

吕洞宾也是一个三教合一的人物。《道藏·真人本传》载：“吕岳，字洞宾，唐河中府永乐县(山西芮城县永乐镇)人，出身官宦世家，曾祖延之，曾任浙东节度使。祖渭，礼部侍郎。父让，海州刺史。”这样一种家世对吕洞宾迈入仕途是极为容易的。但由于吕洞宾的伯伯吕温卷入牛李党争，为牛党一派，所以吕洞宾一直到64岁，李党失势之后才举进士第，这对吕洞宾的入仕已没有任何意义，遂遁入山林，皈依道教。吕洞宾入道后有许多医治病患，救度穷人的传说，民间把他列入八仙之一。北宋以后又给吕洞宾加了一些修习方术救世济民的内容，又给他涂上了许多儒家入世的色彩。而《真人本传》载：吕洞宾修仙圆满后，钟离权让他飞升仙界，而他却说：“岳之志异于先生，必须度尽天下众生方上升未晚也。”又成了一个普渡众生的仙僧。

体现三教合一的另一个人物是关羽。关羽是山西解县人，关羽在儒家眼里是与文圣孔子并祀的武圣。佛教把他尊为伽蓝神之一，把他与十八罗汉同列供奉。道教把他封为“关帝圣君”祭拜，视作“三界伏魔大帝”。而民间所立的关帝庙几乎遍布城乡各地，仅北京城在清代

^① 参见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就有关帝庙百余处。历史上没有任何人有如此影响,如此殊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晋历史文化渊源之深厚。

三教融合是民族融合的一个深层次的体现。民族文化融合铸成了晋文化这个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第四章 姓氏郡望

姓氏和郡望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山西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早在 180 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了。“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山西。后稷教民稼穡于稷山,嫫祖养蚕于夏县,亦在山西。其后,很多姓氏又起源于山西,很多郡望也出在山西。因此,考察山西的姓氏和郡望,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于了解中华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姓氏

姓氏在我国已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了,人们世代相传,沿用至今。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姓氏有 5662 个,而目前实际使用的汉字姓(不含少数民族的译音姓氏),约 3000 多个。今天的姓氏是历史上姓氏的一个发展,山西的姓氏亦不例外。考察山西的姓氏,也需要从姓氏的由来和演变谈起。

一、姓氏的由来和演变

姓与氏，皆有族号、宗号、家号之含义，同为维系血缘关系之目的而存在。姓起源于图腾，氏则由姓分衍而成。随着历史的发展，姓与氏又合而为一，成为家或族之志号，以区别于其他家或其他族。

在原始社会里，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关系，这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便成为该氏族的图腾，亦即该氏族的保护者和象征。随着族外婚制的广泛推行，作为氏族之标志的图腾，引起了各个氏族的关注，这就是最原始的“姓”，亦即姓之由来和起源。其时，人们只知道生身母亲，血缘关系只能由母亲来确认。所以每个母系氏族，都是由同一个老祖母传流下来的。这时，“姓”作为氏族的标志或徽号，其功能就在于维持这一“姓”的全体氏族成员的共同世系，借以把不同的氏族区别开来。由原始社会的图腾演变为氏族组织，这是姓氏的首次演变，亦即姓的产生。从此，姓即成为血统世系所系之中心。

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随着对偶婚制的确立，男子逐渐成为氏族的主宰，于是又出现了“氏”。“氏”字的本意为木本，即植物的根。用于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氏，由姓分衍而来，但氏又与地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姓族的膨胀，姓族中又形成许多分支。这些分居于各地的族属，若无族号标志，则无以维系其族属。在男子居于主导地位的对偶婚制度下，氏便应运而生。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和氏的形成，母系氏族遂被父系氏族所取代，所有的血缘亲属关系，均由父系来确认。所以，姓族之解体和氏族的兴起，这是姓氏演变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国远古时代的父系氏族社会，以农业的出现与发展为契机，完

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步入了阶级社会。这样,便把远古时代的氏族组织和氏族习俗带入了阶级社会。血缘氏族制度衍化为宗族和宗法制度,氏族习俗则被提取、转化、升华而为系统的理论化的文化形态。

在父系制度下,若干具有近亲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为家族;若干出于同一男性祖先的家族,又组织而为宗族。《尔雅·释亲》规定,由同一个高祖父传下来的四代(或四代以上)子孙,称为“宗族”。在宗族中,所谓“四世同堂”,成为一种典范形式。由远古父系氏族社会中的族长制称家长制,进入阶级社会后,演变为夏、商、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这是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宗法制度是以宗族的亲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其要点是:第一、在历史上,崇敬共同的祖先,以维系血统的亲情;第二、在家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规定宗族成员的不同地位;第三、规定继承者的次序;第四、规定宗族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

《说文解字》云:“宗,尊祖庙也。”宗的本义就是祭祀祖先的场所——祖庙,亦称宗庙。在夏代,同一宗族的标记就是姓氏。同姓者,则有共同的宗庙,祭祀共同的祖先,死后葬于共同的墓地。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在商代后期已被废除。商代最后的四代帝王,即武乙、文丁、帝乙、帝辛,都是父死子继。帝乙的长子微子启,因生母为妾,庶出的长子不能继承王位,遂由较微子启岁数小但系正妻所生的纣继承王位。由此可见,以区别嫡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在殷商末期已经形成。

商王对其祖先的祭祀记录,反映了商朝奴隶主贵族中的宗法制度的发展过程。根据甲骨卜辞,早在武丁时期的祭祀,便以自身所出的直系先王为“大示”,以旁系先王为“小示”。合祭大示的宗庙称为“大宗”,合祭小示的宗庙称为“小宗”,此即宗法制度中“大宗”与“小宗”的起源。

由祭祀仪式中形成的宗法制度,推而广之,也运用于商王与各级同姓贵族之间的关系。商王为“大宗”,各级同姓贵族相对商王而言,则为“小宗”。在各级同姓贵族中,又以同样的方法,来划分各自的“大宗”和“小宗”。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常用“王族”、“多子族”等名称。“多子族”就是王族的同姓分支。在王族和贵族专有的青铜器上,往往铸有族徽铭文,称为“族铭”,这就是商代的姓氏。已发现的殷商族铭,共有 600 多个。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以后,沿袭并完善了商代的宗法制度。西周至春秋时的宗法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严格区分嫡系与庶出,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彻底杜绝了殷商时代的“兄终弟及”现象;第二、在贵族内部,层层分封“大宗”、“小宗”。

在周代,由嫡长子继承君位,守祖庙。非嫡长子都奉“嫡长子”为大宗,自己称小宗。这些小宗称为“别子”,分出去另立支系,即所谓“别子为祖”。这些另立支系的别子,同样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别子的嫡长子继承别祖之位,非嫡长子和庶出子,被封为下一级的卿大夫,领有封邑采地,得到氏的称号,一般多以封邑的地名为氏。他们的嫡长子又奉他们为始祖,继承他们的封邑与氏号,被尊为“大宗”,而孙辈中的非嫡长子、庶出子,又相对地称为“小宗”。这些小宗又要分出去另立新系,受封为再下一级的士大夫,获得新的氏号。一般说来,国君的儿子称为“公子”,非嫡长子的公子,可封为卿大夫;公子的儿子称为“公孙”,非嫡子的公孙可封为士大夫。公孙的儿子,就不一定能够得到封邑和官职,于是他们便以其祖父或王父的“名”或“字”为氏了。此即以名为氏和以字为氏之由来。

在夏、商两代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姓”和“氏”,但数量并不很多,一直传流下来的就更少了。西周初期的大分封,是我国姓氏的大量衍生时期。周初的大分封,史称“封邦建国”,实质上就是比较原始的部落移民。周公和其后的成王,在其征服的广大地区,先后建置了

71 个新的领地，称为“七十一国”。例如，武王弟管叔鲜，封于管国（今河南郑州），为管氏始祖；蔡叔度，封于蔡（今河南上蔡），为蔡氏始祖；曹叔振铎，封于曹（山东曹县），为曹氏始祖；霍叔处，封于霍（山西霍县），为霍氏始祖，等等，周王室的同姓封国，共得 48 氏，亦即 48 个姓的起源。此外，周王室还封了许多异姓封国。例如，封夏禹的后裔东楼公于雍丘（河南杞县），建立妘姓杞国；封虞舜的后裔胡公满于陈，建立妘姓陈国；封姜子牙于齐（山东淄博），建立姜姓齐国，等等。由异姓封国而得氏者，共约 60 个，此即约 60 个姓之起源。由此可见，周初大分封，实为我国姓氏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

从夏代到春秋，姓和氏都为奴隶主贵族所专有。一般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姓用以别婚姻，氏用以别贵贱。郑樵《通志·序》云：“生民之本，在于姓氏。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春秋战国之交，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分封制的废止，氏便失去了用以别贵贱的作用。在新兴的封建制度下，原来的奴隶和贱民都取得了人的地位，也有了获得姓氏的权利，姓与氏的区别日益模糊起来。到西汉时，出现了“姓”即“氏”，“氏”即“姓”的状况。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时，便把“姓”与“氏”混而为一，都具有姓的含义。从此，姓名遂成为我国历史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识别符号。

在我国的汉字姓中，不只有单字姓，而且有双字姓、三字姓、四字姓。这些都是姓氏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春秋时，各诸侯国在分封命氏过程中，原来使用的单音字氏号，出现了重复、混乱等情况，为了克服这种弊端，于是出现了双字姓，诸如：公冶氏、南宫氏、司马氏、公孙氏、叔仲氏，等等。我国是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不断地交融汇合，相互影响。许多兄弟民族的姓氏，译音为汉字，又出现了大批的双字姓、三字姓、四字姓。例如：拓跋氏、独孤氏、贺赖氏，丘

穆陵氏、步六孤氏、吐谷浑氏,胡古口引氏、自死独膊氏、并疆六斤氏,等等。北魏孝文帝在推行改革过程中,下令将各部落的双字姓和多字姓,改为近音的单字姓,例如,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改达奚氏为奚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等等,这样,双字姓和多字姓大大减少。姓氏单音化趋向,是同汉语本身的节律习惯相吻合的。中国人称呼姓名,通常都用两个字或三个字,偶尔也用四个字。除掉名字外,姓氏往往就取一个字了。所以明朝初年,政府曾下令将双字姓改为单字姓,从此,单字姓遂成为我国姓氏的主体部分。

二、山西姓氏概况

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山西全省当前使用的汉字姓共有2363个,其中单字姓2281个,双字姓82个。全省十二个地(市)使用的姓氏,都在600个以上。使用姓氏最多的太原市,达1424个;临汾地区,达1285个。从各个姓氏人口总数统计来看,达30万人以上的姓氏19个,计有:王、张、李、刘、赵、杨、郭、陈、高、马、任、韩、孙、武、贾、郝、阎、冯、梁;达20万至30万人的姓氏12个,计有:宋、吴、白、、薛、崔、周、曹、侯、田、杜、董、胡;达10万至20万人的姓氏24个,计有:牛、段、秦、郑、史、程、范、吕、徐、常、乔、许、贺、樊、朱、魏、石、姚、苏、孟、卫、申、黄、康。以上55个姓氏人口总计2349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2876万的81.7%。此外,姓氏人口总数在1万至10万之间的,计有129个姓氏;1千至1万之间的,计有210个姓氏;千人以下的计有1969个姓氏。其中仅有1个人的姓氏,有481个(见《山西人口姓氏大全》)。

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山西全省按姓氏人口统计,达100人以上者,有如下表:

山西省姓氏人口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1	王	2927402	26	曹	230171	51	孟	126993
2	张	2818765	27	侯	225647	52	卫	118289
3	李	2645270	28	田	222145	53	申	116747
4	刘	1484231	29	杜	221025	54	黄	113870
5	赵	1077586	30	董	205038	55	康	101220
6	杨	942784	31	胡	204357	56	温	95716
7	郭	901023	32	牛	193123	57	安	94121
8	陈	544073	33	段	187715	58	靳	86632
9	高	518694	34	秦	179622	59	何	84588
10	马	443488	35	郑	174406	60	原	82822
11	任	357040	36	史	174340	61	邢	79226
12	韩	351949	37	程	172558	62	柴	78763
13	孙	334862	38	范	167219	63	袁	77986
14	武	328295	39	吕	167044	64	于	77311
15	贾	318163	40	徐	159789	65	焦	76634
16	郝	308295	41	常	156013	66	裴	75683
17	阎	307781	42	乔	152134	67	丁	75424
18	冯	302181	43	许	143496	68	岳	74750
19	梁	301649	44	贺	138398	69	翟	74371
20	宋	298817	45	樊	136104	70	卢	74363
21	吴	266585	46	朱	134932	71	霍	72154
22	白	262453	47	魏	131850	72	谢	71260
23	薛	244490	48	石	129643	73	傅	71055
24	崔	238603	49	姚	129230	74	雷	68255
25	周	230634	50	苏	128266	75	成	66102

(续表)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76	尹	64482	101	祁	35128	126	殷	20625
77	苗	59617	102	席	34427	127	燕	20458
78	潘	56621	103	穆	34026	128	谷	20325
79	罗	56456	104	唐	31921	129	南	20024
80	景	55811	105	毕	31573	130	金	19737
81	庞	55160	106	连	31183	131	余	19680
82	邓	54997	107	邵	30489	132	党	19350
83	尚	51635	108	左	28688	133	蔚	19017
84	师	49394	109	林	27586	134	屈	18906
85	孔	48370	110	柳	27500	135	廉	18746
86	姜	47484	111	文	27435	136	郎	18684
87	耿	47192	112	荆	33314	137	畅	18256
88	关	46884	113	米	26226	138	和	18236
89	宁	46196	114	姬	26163	139	谭	17847
90	路	44401	115	栗	24945	140	叶	17172
91	冀	41980	116	巩	23755	141	严	17163
92	解	41378	117	戴	23057	142	郜	17009
93	吉	40565	118	晋	22142	143	夏	16571
94	彭	39909	119	弓	22011	144	仝	16509
95	齐	39515	120	边	21959	145	曲	16232
96	毛	39417	121	车	21849	146	方	15915
97	蔡	38187	122	萧	21295	147	亢	15857
98	葛	36679	123	司	20917	148	兰	15515
99	聂	36572	124	蒋	20835	149	窦	15479
100	辛	35482	125	沈	20761	150	鲁	15281

(续表)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151	桑	14799	176	索	10670	201	倪	8176
152	寇	14407	177	薄	10668	202	笄	8128
153	阴	14214	178	甄	10585	203	母	7993
154	纒	14149	179	纪	10578	204	池	7970
155	肖	13884	180	管	10315	205	潭	7922
156	蓝	13829	181	渠	10161	206	上官	7915
157	褚	13746	182	钟	10150	207	游	7775
158	陶	13574	183	要	10030	208	丰	7773
159	江	13571	184	邸	10021	209	汪	7764
160	鲍	13212	185	芦	9807	210	暴	7152
161	陆	13057	186	戎	9637	211	雒	7137
162	尉	13020	187	元	9635	212	仇	6911
163	智	12935	188	烛	9610	213	荀	6902
164	荣	12656	189	龚	9451	214	熊	6781
165	万	12541	190	郗	9396	215	延	6637
166	闾	12478	191	钱	9179	216	邹	6609
167	麻	12432	192	狄	9164	217	龙	6569
168	官	12321	193	卜	9156	218	权	6569
169	茹	11747	194	尤	9092	219	盖	6527
170	曾	11688	195	施	9023	220	臧	6521
171	邱	11587	196	顾	8938	221	韦	6482
172	平	11583	197	支	8905	222	伊	6350
173	房	11233	198	单	8519	223	强	6279
174	时	10892	199	古	8395	224	阮	6172
175	逮	10790	200	相	8225	225	来	6093

(续表)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226	班	6044	251	向	4519	276	禹	3324
227	季	6030	252	鹿	4495	277	艾	3210
228	呼	5942	253	降	4334	278	银	3189
229	祝	5886	254	汤	4256	279	郁	3152
230	柏	5883	255	邬	4210	280	辰	3149
231	符	5862	256	娄	4208	281	颜	3092
232	苑	5838	257	付	4206	282	廖	3089
233	宿	5784	258	梅	4132	283	帅	3084
234	皇甫	5529	259	钮	4102	284	门	3076
235	费	5422	260	商	4094	285	庄	3042
236	宗	5272	261	章	4023	286	华	3016
237	籍	5223	262	封	3993	287	蒙	3008
238	闰	5113	263	行	3990	288	滑	2975
239	丘	5108	264	光	3961	289	问	2891
240	刁	5040	265	巨	3915	290	夙	2878
241	药	4914	266	代	3897	291	冉	2853
242	陕	4876	267	明	3887	292	元	2837
243	洪	4740	268	詹	3748	293	郤	2774
244	都	4724	269	粟	3738	294	卞	2707
245	迤	4713	270	盛	3738	295	花	2695
246	惠	4698	271	加	3548	296	仪	2686
247	晁	4686	272	项	3505	297	毋	2644
248	令狐	4652	273	宣	3493	298	栾	2614
249	凌	4637	274	琚	3449	299	童	2610
250	弁	4532	275	靖	3400	300	莫	2551

(续表)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301	赫	2530	326	郅	1975	351	井	1557
302	宇文	2473	327	家	1974	352	沙	1554
303	富	2447	328	伍	1961	353	易	1516
304	公	2361	329	岑	1941	354	勾	1484
305	闻	2354	330	力	1922	355	奥	1473
306	楚	2339	331	介	1905	356	化	1464
307	云	2335	332	淮	1887	357	折	1450
308	檀	2255	333	颌	1882	358	同	1414
309	菅	2213	334	蒲	1853	359	牟	1405
310	桂	2192	335	戈	1846	360	余	1362
311	那	2163	336	刺	1786	361	国	1342
312	嘉	2129	337	候	1785	362	幸	1329
313	滕	2123	338	落	1783	363	计	1327
314	苟	2114	339	威	1738	364	句	1320
315	胥	2101	340	睢	1730	365	黎	1316
316	璩	2054	341	郟	1692	366	鱼	1312
317	斜	2035	342	展	1684	367	卓	1279
318	海	2003	343	覃	1669	368	项	1277
319	酒	2003	344	澹台	1645	369	祖	1244
320	俞	2001	345	舒	1630	370	买	1217
321	甘	1995	346	幸	1627	371	贡	1204
322	包	1993	347	衡	1615	372	郤	1196
323	双	1991	348	佟	1609	373	谈	1188
324	骆	1986	349	全	1593	374	骈	1182
325	翁	1984	350	睦	1563	375	午	1171

(续表)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376	柯	1156	401	仲	900	426	稽	743
377	悦	1154	402	普	898	427	湛	736
378	义	1152	403	韵	890	428	糜	735
379	狐	1117	404	仁	884	429	刁	727
380	欧	1115	405	敬	877	430	铁	727
381	郇	1108	406	李	871	431	鞠	718
382	宇	1086	407	皮	860	432	独	704
383	竹	1085	408	攸	851	433	欧阳	704
384	杭	1083	409	扈	848	434	岂	704
385	乐	1081	410	柔	841	435	寻	692
386	黑	1080	411	可	838	436	虞	692
387	鞠	1067	412	随	835	437	嘉	690
388	次	1065	413	隋	830	438	迪	677
389	帖	1044	414	冷	823	439	芮	649
390	水	1025	415	居	811	440	员	614
391	信	1021	416	宜	808	441	洛	612
392	赖	1014	417	鄢	802	442	库	612
393	庾	1012	418	剧	788	443	台	601
394	俎	998	419	踞	777	444	迟	590
395	布	993	420	蒯	768	445	豆	579
396	由	969	421	仵	762	446	善	579
397	斛	952	422	嘏	754	447	底	574
398	瞿	941	423	拜	751	448	弟	574
399	弋	938	424	达	749	449	刻	568
400	呼延	935	425	满	744	450	皇	564

(续表)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451	查	558	476	晏	450	501	秘	367
452	仙	556	477	涂	448	502	衣	365
453	奚	554	478	土	446	503	隆	359
454	闾	550	479	騫	441	504	年	359
455	饶	547	480	丛	439	505	兀	345
456	浹	534	481	缪	438	506	伦	341
457	巴	532	482	庠	436	507	丹	340
458	简	528	483	咸	433	508	凤	339
459	蒿	528	484	么	431	509	拓	337
460	曾	512	485	京	424	510	初	336
461	弯	510	486	赤	423	511	鐔	336
462	箫	509	487	巢	420	512	鹤	333
463	歧	506	488	瓮	409	513	未	332
464	禾	503	489	喻	407	514	岱	328
465	闪	499	490	敖	405	515	昌	326
466	闫	496	491	广	403	516	战	321
467	瞧	495	492	撒	401	517	让	320
468	闵	495	493	宓	398	518	院	316
469	应	493	494	曳	396	519	阳	312
470	储	484	495	宛	395	520	相里	309
471	侣	483	496	伏	391	521	厉	308
472	纽	479	497	步	389	522	牧	306
473	依	468	498	赫连	381	523	公冶	302
474	屠	457	499	藏	379	524	印	302
475	尉迟	451	500	刑	368	525	练	297

(续表)

序号	姓氏	人数	序号	姓氏	人数	序号	姓氏	人数
526	司马	297	551	虎	242	576	裘	200
527	英	297	552	鄢	242	577	仇	200
528	诸	294	553	慎	236	578	敦	199
529	东	292	554	愈	232	579	菜	197
530	陷	291	555	青	232	580	默	197
531	越	289	556	匡	229	581	钞	192
532	白	289	557	遽	226	582	咎	187
533	哈	284	558	於	225	583	集	185
534	回	275	559	法	223	584	塔	181
535	占	275	560	才	221	585	鄂	181
536	修	271	561	名	221	586	浦	180
537	因	269	562	户	219	587	鲜	180
538	官	264	563	摄	217	588	劣	177
539	多	263	564	松	216	589	冶	174
540	佐	261	565	巫	215	590	涉	171
541	果	258	566	太	215	591	秋	171
542	泰	257	567	种	215	592	麦	166
543	怀	255	568	吝	214	593	恩	165
544	格	254	569	侍	213	594	朴	165
545	针	252	570	从	212	595	禄	164
546	补	247	571	油	212	596	潜	164
547	忽	247	572	洒	206	597	苟	162
548	票	246	573	西	204	598	干	161
549	木	246	574	雪	204	599	斗	159
550	雍	243	575	弥	200	600	督	153

(续表)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序号	姓氏	人 数
601	农	152	618	直	127	635	过	108
602	苍	150	619	远	127	636	寿	108
603	律	150	620	冠	126	637	绳	108
604	茅	148	621	蹇	126	638	汲	107
605	玄	148	622	山	125	639	合	107
606	四	145	623	进	122	640	矫	107
607	湾	143	624	睦	122	641	况	106
608	脱	141	625	第	121	642	廷	106
609	日	140	626	阿	121	643	乜	104
610	朝	140	627	韶	119	644	及	104
611	经	140	628	类	118	645	竺	104
612	缠	137	629	危	118	646	摆	103
613	墨	137	630	佶	115	647	宦	103
614	凡	134	631	逢	113	648	继	103
615	轩	133	632	运	112	649	卿	101
616	散	132	633	楼	110	650	邝	100
617	奕	131	634	漆	110			

注：此表引自秦耀普主编《山西人口姓氏大全》，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

山西全省按姓氏统计，人口总数达 30 万以上的 19 个姓氏，其地理分布如下表：

山西省 30 万人以上姓氏的地理分布

单位:人

地区别	姓 氏								
	王	张	李	刘	赵	杨	郭	陈	高
总 计	2927402	2818765	2645270	1484231	1077586	942784	901023	544073	518694
太原市	278839	277526	232836	142444	105159	76446	82378	53198	48288
大同市	123858	116392	121257	80426	45370	44471	30269	27186	21739
阳泉市	148584	106100	112435	61501	64196	33485	30541	14620	25121
长治市	326665	245939	330684	108981	105618	101739	128594	56957	21224
晋城市	208652	188503	203057	67509	84913	49818	79271	40492	8804
朔州市	64309	52044	64840	41825	31138	16132	16497	12418	14405
雁北地区	192229	187176	171629	128873	67747	66900	43374	34432	31536
忻州地区	261215	308073	215025	166128	115644	92633	83772	47528	61356
吕梁地区	286532	289819	267050	227430	81391	67567	103334	38939	135531
晋中地区	292956	273716	248222	121285	137281	83827	94108	51572	39717
临汾地区	313133	355987	318198	187874	97508	122865	127937	73304	58517
运城地区	430430	417490	360037	149955	141621	186901	80948	93427	52456

山西省 30 万人以上姓氏的地理分布

单位:人

地区别	姓 氏									
	马	任	韩	孙	武	贾	郝	阎	冯	梁
总 计	443488	357040	351949	334862	328295	318163	308295	307718	302181	301649
太原市	42726	28799	36513	32811	49042	28594	40561	46389	22979	29390
大同市	26693	13021	14793	18434	14854	12145	9713	9788	12274	8899
阳泉市	11727	11680	24334	9728	13701	17621	16005	8368	15229	25803
长治市	51117	24817	44568	28811	23170	31085	31177	17564	35209	18996
晋城市	28582	11907	23916	12374	8524	15991	8822	20283	21156	12939
朔州市	10484	5398	7149	7106	7632	10194	4945	8577	4535	6368
雁北地区	37264	20655	22651	36751	19642	16234	16188	14350	17019	12165
忻州地区	29382	24029	38081	27554	27798	38257	38837	31868	21748	27115
吕梁地区	52620	85298	33945	29087	71871	23023	43424	39900	44136	38655
晋中地区	34956	44806	36141	24668	47834	27223	57166	45494	18511	48894
临汾地区	52057	35305	35249	41119	21441	56615	20413	33732	44174	40083
运城地区	65880	51325	34609	66419	22786	41181	21044	31468	45211	32342

注:此表引自秦耀普主编《山西人口姓氏大全》,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

三、起源山西姓氏举要

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省 30 万人以上的姓氏共有 19 个,其中起源于山西的姓氏就有 8 个,兹举要如下。

(一) 王 姓

王氏为姓,意指“王家之后”或“帝王之裔”。王姓历史悠久,支脉繁多。太原王氏系周灵王太子姬晋之后裔。《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曰:“周灵王太子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宗敬死后,葬于晋阳城北,其墓地称“司徒冢”。秦朝大将军王翦,即宗敬之后裔。秦统一六国过程中,王翦征燕国,平楚地,下百越,战功显赫。秦始皇论功行赏,王翦与大将蒙恬共执牛耳。王姓遂与蒙姓同居天下之先。其后,太原王氏之后裔徙居各地,形成许多源于太原王氏之衍派。

秦二世时,夺大将蒙恬的兵权,令王翦之孙王离为大将军。钜鹿之战,王离败于项羽而亡。王离有二子,长曰王元,次曰王威。王元为避乱,徙居山东琅琊,是为琅琊王氏之祖。西汉昭宣时期,王元四世孙王吉,为谏议大夫、经学名家。王吉祖孙三代,禄位弥重,“有累世之美”,开了琅琊王氏显贵的先河。西晋时,王祥位居三公。东晋初,王导任丞相,居中秉政,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这是琅琊王氏的黄金时代。

太原王氏后裔王祐,北宋时大名莘县人,字景叔。据《宋史·王旦传》载,景叔曾在庭院中亲自种植三株槐树,并预言“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后来他的次子王旦果然当了宰相,其孙王素又做了宋仁宗时的工部尚书,曾孙王巩文采出众,与苏轼友善,苏轼为之作“三槐堂铭”,从此三槐堂扬名天下,成为其子孙后代通用的堂名。

开闽王氏是东南沿海及海外侨胞中很有影响的一个王氏家族，闽粤港台以及泰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王氏家族，很多都自认他们是开闽王氏的后裔，都尊奉王审知为他们的始祖。其实，王审知就是太原王氏王翦的后代。《十国春秋·闽国·忠懿王庙碑》载：“审之，字详卿，姓王氏，本琅琊人。秦将翦三十四代孙。高祖暉，唐贞元中为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迁家于是郡，遂为固始人矣。”唐末战乱，王审知跟随其兄王潮率军入闽，王潮死后，王审知袭职。由于王审知在开发和治理福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尊为“开闽王氏之祖”。后来，其子建号称帝，建立闽国，王审知被追认为昭武孝皇帝，庙号太祖。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后，因敬仰王审知的德政，御笔亲题“八闽人祖”四字庙额。从此，闽人对王审知更加推崇。民间崇拜王审知的建筑所在多有，视之如神。由福建徙居港台以及东南亚各地的王氏后裔，都尊奉周灵王太子姬晋，为他们开宗立姓之始祖，王审知为开闽王氏之祖。

王姓出于姬姓者，除周灵王太子晋之外，还有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裔和周考王之弟揭的后裔。此外，还有出自殷王子比干之后裔的子姓之王氏以及出自帝舜之后裔的妫姓之王氏。这些都不是起源于太原的王姓。

（二）张 姓

关于张姓起源，流行较广的是始祖挥公说。唐代林宝撰《元和姓纂》云：“黄帝第五子少昊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因姓张氏”。宋代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张氏出自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欧阳修（1007—1072年）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谱牒学家。他和苏洵（1009—1066年）创立的编写族谱的体例，被尊为“欧苏体例”，广为后世修谱所效法。挥公为张氏开宗立姓之始祖说，自宋代起伴随私修族谱的兴起和盛行，广泛流传开来。根据考古资料，最早的石箭鏃是

在山西朔州峙峪遗址和沁水下川遗址中发现的,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黄帝时代已普遍出现了石箭镞,因此,挥在总结劳动人民实践经验基础上发明弓矢,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挥为张氏开宗立姓之始祖也是可信的。

挥公的封地在何处?很多张氏族谱和方志都记载在太原府太原县尹城里。明嘉靖年间张宪、张阳辉主修的《张氏统宗世谱·本源纪》载:“尹城派,始祖挥公,受封之国在山西太原府属之地。挥生昧,为玄冥师。昧生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嘉之,封诸汾川,掌水旱疠疫之职,即山川之神也。世飨其祀,今太原县有庙存焉。”清乾隆《清河张氏宗谱·古今世表图》载:“挥,封国尹城,在山西太原府。”清嘉庆《张氏合修家谱·宗庙》载:“始赐姓张挥公,庙在山西太原府太原县尹城里。”清光绪《清河张氏宗谱·张氏古今通派分迁地舆图考》载:“山西通派,尹城派,始祖挥公受封之国,昧公居之,在今太原府太原县。”光绪《旌阳张氏通修宗谱·本源宗支》载:“尹城派始祖挥公,所居之地在山西太原府太原县,有庙存焉。”明万历《太原府志》卷八载:“台骀泽,一名晋泽,太原县南十里。晋水下流,汇而为泽……其傍有昌宁公庙,即台骀神也。”清道光《太原县志》卷三载:“汾水川祠即台骀神庙,在晋泽南王郭村。节度卢钧改今名。晋封昌宁公,宋封灵感元应公,赐额曰宣济庙,有掌禹锡所撰碑记。”经实地考察,今太原市南郊区王郭村确有台骀庙即张氏之祖庙存在。因此,张氏始祖挥公受封于太原尹城里,这是明清两代许多主持修谱者和纂修方志者一致的看法。

张氏起源于太原府太原县尹城里,其后迁往全国各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就列举了许多太原张氏之衍派。诸如:“颺,晋散骑常侍,随元帝南迁,寓居江左”,是为江左张氏之始迁祖;颺的“六世孙隆,太常卿,复还河东,后徙洛阳”,是为洛阳张氏之始迁祖;“始兴张氏也出自晋司空华之后,随晋南迁,至君政,因官居于韶州曲江”,

是为曲江张氏之始迁祖；“清河东武城张氏，本出汉留侯良裔孙司徒歆。歆弟协，字季期，卫尉，生魏太山太守岱，自河内徙清河”，是为清河张氏之始迁祖，等等。正因为史籍中有很多源于太原张氏始迁祖的记载，所以明嘉靖时张宪、张阳辉主修张氏统宗世谱时，记载了直接和间接源于太原的衍派达 118 派之多。清光绪年间张廷辉等编修《清河张氏宗谱》时，记载源于太原迁往全国各地的衍派，竟达 231 派，较明嘉靖时增加了将近一倍。

当然，全国的张氏并非都起源于太原，但太原是张氏影响巨大而深远的起源地，则是毫无疑问的。

（三）赵 姓

赵姓起源于山西赵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赵氏出自嬴姓。颛顼裔孙伯益，帝舜赐以嬴姓。十三世孙造父，周穆王封于赵城，因以为氏”。周代赵城，东汉为永安县地，隋为霍邑县地，故址在今洪洞县赵城镇一带。由于造父受封于赵城而得赵姓，下传六世至奄父，名公仲，为周宣王近御，因助“宣王中兴”有功，赵姓初兴。周宣王三十九年（前 789 年），宣王下令伐姜戎，奄父认为条件不成熟，劝阻宣王出兵，宣王不听。结果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王师大败，宣王圣驾亦被打翻，在千钧一发之际，奄父之子叔带护驾突围。宣王为感谢叔带的救命之恩，任其为执政。从此，赵氏家族日益兴盛。宣王死后，周幽王继位，朝纲大坏，叔带被逼逃往晋国。晋文侯慕其才，任用叔带为国卿，叔带遂在晋国发展势力。叔带五世孙赵夙，事晋献公。献公十六年（前 661 年），赵夙受命率晋军伐霍、魏、耿三国，因军功，献公赐赵夙耿地（故址在今山西河津县南）。赵夙之孙赵衰，字子余，随重耳出亡 19 年，终于将重耳扶上王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赐赵衰原伯地（故址在今山西沁水县西北），封为原大夫，任国政。赵衰谢世前两年，赵衰子赵盾已接任国政，为“晋正卿”。从此，赵盾独揽朝政达十余年之久，其时赵姓已成为一个人口众多、势力显赫的大族。

秦灭赵以后,赵姓分为天水和涿郡两大支。秦任用赵衰后裔赵公辅主西戎,号曰赵王,世居陇西天水西县。赵公辅十二世孙赵融,字长,后汉右扶风、大鸿胪。赵融七世孙赵瑶,为后魏河北太守。赵瑶之裔孙赵仁本,为唐高宗时宰相,赵氏遂成为天水望族。徙居涿郡之赵姓,至西汉时,赵广汉任京兆尹,京兆大治,政绩卓越,进爵为关内侯,赵姓成为涿郡望族。赵广汉孙赵贡,亦为汉朝京兆尹,位同宰相。后晋时,有一代名士赵至;隋代有赵世模和赵元淑父子。世模随隋文帝建国,战死疆场,其子元淑袭承父官,授骠骑将军,后因功进位柱国。赵元淑之裔孙赵弘殷,即宋太祖赵匡胤之父。公元960年,陈桥驿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涿郡赵姓成为天下之第一显姓。北宋灭亡后,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称帝,建立南宋。不久又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随着赵宋政治重心的南移,赵姓族人亦随之大举南迁。

(四) 杨 姓

杨,西周时姬姓侯国,其地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范村一带。春秋初被晋国兼并,子孙便以原国名为氏,是为杨姓。

有些史籍和杨氏族谱是以伯侨为始祖记载杨氏世系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晋武公子伯侨生文,文生突,羊舌大夫也。又云晋之公族食邑于羊舌,凡三县:一曰铜鞮,二曰杨氏,三曰平阳。突生职,职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华,为铜鞮大夫,生子容。肸字叔向,亦曰叔誉。鮒字叔鱼。虎字叔黑,号‘羊舌四族’。叔向,晋太傅,食采杨氏,其地平阳杨氏县是也。”杨伯侨,又名文实,晋武公之子,献公之弟。周襄王念其先人功勋,乃封伯侨于杨,为杨侯,承继乃祖爵位,谥贤敬。伯侨长子名文,又名逊,袭侯爵。文生子名突,官拜羊舌大夫,食邑于羊舌,故又称羊舌突,辖铜鞮、杨氏、平阳三邑。突生职,职为晋悼公重臣,辅佐祁奚为中军尉。职生五子,有四子显贵,号称“羊舌四族”,即使楚国人亦称其为“强家”。晋悼公时,叔向以知识

渊博,被任命为太子彪之傅,太子彪即位,是为晋平公,叔向以上大夫为太傅。此后,一直活跃在晋国政坛及各诸侯国之间,是春秋时期颇有见识并受到尊敬的政治家。叔向子名伯石,字食我,号曰杨石,任晋国上卿,因得罪晋贵族而遭迫害,子孙隐居华山仙谷避难,后居华阴。

汉代设弘农郡,华阴隶属弘农。东汉时,杨震一家,“四世太尉,德业相继”,成为弘农望族。杨震裔孙杨骏、杨珧、杨济兄弟三人,辅佐西晋开国君主武帝司马炎,分掌军国大权,势倾天下,时人有“西晋三杨”之称。其后,杨震长子杨牧裔孙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完成统一大业,杨氏家族的权势和声望,达到鼎盛时期。

据《新唐书》记载,有唐一代,杨伯侨之后裔任宰相者 11 人,即恭仁相高祖,师道相太宗,弘武相高宗,执柔相武后,再思相武后和中宗,国忠相玄宗,绾相代宗,炎相德宗,嗣复相文宗、武宗,收相懿宗,涉相哀帝。其间,既有开国兴旺之喜,亦有亡国衰败之忧;既有名臣贤相之誉,又有专权误国之毁。特别是唐玄宗时期,杨家对朝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五代十国时期,吴国开创者杨行密(852—905 年),角逐江淮,有力地推动了杨氏家族的南迁。在宋代,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又为杨氏家族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五) 郭 姓

郭姓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弟虢叔于西虢,封虢仲于东虢。平王东迁,夺虢叔之地予郑武公。楚庄王不满,率军伐周,责平王灭虢。平王遂将虢叔裔孙序,封于阳曲(今太原市阳曲县),号曰郭公。“虢”谓之“郭”,声之转也,是为郭姓。

虢叔所封之西虢,东迁后分为两部分,徙居下阳(今属山西平陆县)者,因滨河之北,称为北虢,系宗庙社稷之所在;徙居上阳(今属河南陕县)者,称为南虢。公元前 658 年夏,晋献公假道于虞(虞,国名,故址在平陆县北,今称古城),以伐虢,克下阳,北虢亡。公元前 655 年,晋献公又假道虞国,克上阳,南虢亡。回师途中又灭虞,虞国亡。晋

献公迁虢国和虞国之民于瓜衍(今汾阳孝义间),虢人聚居地,称曰虢城;虞人聚居地,称曰虞城。此即今汾阳县虢城与虞城之由来。《太平寰宇记》载:“虞、虢二城,相传晋灭虞、虢,迁其民于此,筑城以居之。”如果说阳曲是郭姓得姓之地的话,那么虢城(今属汾阳)则是虢人聚居之地。阳曲和虢城的郭氏都是虢叔之后裔。

东汉末,大司农郭全,即世居阳曲之郭序的后裔。唐高宗时宰相郭待举,即郭全之后裔。唐睿宗时宰相郭元振,即东汉时郭泰之后裔。郭泰(128—169年),字林宗,世居介休。师事成皋屈伯彦,博通典籍,太学生首领,与李膺友善,名震京师。后归乡里,屡拒征召,深得人们敬仰。党锢之祸起,闭门讲学,弟子数千。后周游各地,扬名天下。死后,四方之士,皆来会葬。书法家蔡邕执笔书《郭有道碑》,流传至今,现存太原傅山碑林。明代罗伦撰《郭氏族谱序》云:“郭得姓自周虢叔。林宗振汉,郭子仪鸣唐,太原、汾阳著望天下,上下数千年由二人而郭氏大焉。”

郭子仪(697—781年),华州郑(今陕西华县)人,其先盖出周之虢叔,后转徙于华山之下。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为肃、代、德三朝宰相,一身而系天下安危达二十余年。他驰骋疆场,武功卓著,是平息“安史之乱”的大将,“再造唐室”的勋臣;他出将入相,忠心护主,是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宰相;他襟怀坦白,不计荣辱,是安邦定国的名相。由于他功高盖世,深受皇族青睐。其子孙多与皇室联姻,有的被招为驸马,有的当了贵妃,有的成了皇太后。郭姓与皇室由患难的君臣,发展为割不断的联姻,直至唐亡。五代十国时期,郭氏后裔大批南迁,福建、台湾、广东、香港的郭姓,多为郭子仪的后代。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国的郭姓,很多也是郭子仪的后裔。

(六) 贾 姓

贾姓起源于山西临汾县贾乡一带。周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于

贾地，为贾伯，建贾国。后被晋国所灭，公明子孙被遣散各地。公明后裔遂以原国号为姓，是为贾姓。此即源于姬姓之贾姓。后来，晋公族狐偃之子射姑，又食邑于贾。射姑，字季他，亦号贾季。其子孙亦以贾为姓。此即源于狐偃之贾姓。源于姬姓之贾和源于狐偃之贾，均起源于临汾县贾乡一带。

两汉时，贾姓是个人才辈出的名门大姓。贾谊（前 200—前 168 年），洛阳人，时称贾生，是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通诗书，善文章，被荐于文帝，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屡次上疏，奏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令列侯就国。为大臣所排挤，被贬为长沙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他是与司马相如并称的文章家。他的《过秦论》、《陈政事疏》、《治安策》等都是不朽的名著。后人把社会秩序安宁称作“治安”即由他的《治安策》而来。贾姓的“治安堂”名，亦由此而来。其子贾璠，为尚书中兵郎。其孙贾嘉，为宜春太守，好学，世其家。东汉贾逵（30—101 年），扶风平陵（陕西咸阳西北）人，即贾谊之九世孙。他精通五经，曾在北宫和南宫讲学。历任卫士令、左中郎将、侍中。著有经传义诂及诗、颂、书等，被后世称为通儒。唐德宗时宰相贾耽，亦为贾谊之后裔。

（七）郝 姓

郝姓起于太原郝乡（今太原南城郝庄）。商朝帝乙之世，封子期于太原郝乡，因以为氏，是为郝姓。

子期裔孙郝宴，秦上卿。郝宴孙郝瑗，太原守。郝瑗生夔，汉匈奴中郎将。郝夔裔孙于晋末因官徙润州丹杨（今江苏镇江）。七世孙郝迴，自丹杨徙安陆（湖北安陆县北）。裔孙郝处俊（606—681 年），安陆人，贞观进士，迁吏部侍郎，佐李勣征高丽有功，入拜东台侍郎。唐高宗上元初，迁中书令，兼太子宾客，检校兵部尚书。时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为武后忌恨。高宗开耀元年（681 年）卒。处俊自秉政，在帝前议论谆谆，必传经义，凡所规献，

得大臣体。武后虽忌之，以其操履无玷，不能害。与舅许圜师同里，俱宦达；乡人田氏、彭氏以高资显。故江淮为语曰：“贵如郝、许，富如田、彭。”其孙象贤，垂拱中，为太子通事舍人。因武后忌恨处俊，故因事诛杀之。

郝经，字伯常，陵川（今山西陵川）人。元世祖即位前召他询问经国安民之道，他条陈数十事，世祖大悦。即位后，任其为翰林侍读学士。曾充国使使南宋，被留不屈，居十六年归。留宋期间，著述甚多，其文丰蔚豪宕。故其族人以“丰文”为堂名，此即郝姓“丰文堂”之由来。

（八）阎 姓

阎姓起源有三：周武王封太伯曾孙仲奔于阎乡，因以为氏；又昭王少子生而手文曰“阎”，康王封于阎城，因以为氏；又唐叔虞之后晋成公子懿，食采于阎邑，晋灭，子孙散处河洛，以原封邑为氏，是为阎姓。《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了懿之后裔世系。此即起源于晋之阎姓。阎懿之裔孙阎善，仕后魏，历任魏龙骧将军，云中镇守，因居云州盛乐（忻州市定襄）。阎善裔孙阎毗，为隋将作少监。阎毗长子阎立德，为唐太宗时的工部尚书，次子立行为少府监，三子立本，为唐高宗时宰相。阎毗及其子立德、立本，以擅长工程建筑、工艺、绘画而著称于隋唐时期。阎立本有“右相驰誉丹青”之称，以政治性题材的历史画和肖像画最为著称。他所画的《太宗像》、《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功臣图》、《外国图》等称誉当时。为纪念阎立本这位著名画家，阎氏族人遂以“丹青”为堂名。此即阎氏丹青堂之由来。

此外，按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山西全省 30 万人口以下的姓氏中，还有很多起源于山西的姓氏。诸如：

魏姓，起源于山西芮城。周文王第十五子名毕公高之裔孙毕万，春秋时仕晋，官至大夫。晋献公封毕万于魏（今山西芮城东北），称魏大夫。传至毕斯，建魏国，都安邑（山西夏县），后为秦所灭。原王族散

居山西、河北等地，以国名为姓，是为魏姓。

傅姓，起源于山西平陆。殷高祖武丁的贤相傅说，原来是在傅岩（今平陆圣人涧）从事版筑的奴隶，后被任用为相，天下大治。傅说之后裔，以原居地为姓，是为傅姓。

尹姓，起源于山西隰县。少昊之子殷，被封于尹城（今山西隰县东北），时称尹殷。殷的后裔以封地取姓，是为尹姓。

祁姓，起源于山西祁县。春秋时，晋献公之孙名英，食采于祁（山西祁县），子孙以封邑取姓，是为祁姓，此祁姓之一支。

路姓，起源于山西潞城。黄帝时封炎帝支子于潞地（山西潞城）。春秋时有潞子婴儿，后代子孙以封地为姓，去掉三点水，是为路姓。此路姓之一支。

霍姓，起源于山西霍县。周文王第六子名叔处（又名叔武），与武王是同母兄弟。武王执政，封叔处于霍（今山西霍县），时称霍叔，与管叔、蔡叔监管殷代遗民，史称“三监”。后他们唆使武庚叛乱，叛乱被镇压平息后，霍叔降为庶人，其后子孙以祖上原封地为姓，是为霍姓。

冀姓，起源于山西河津。西周时，周武王封先贤遗孙，把尧的裔孙封于冀（山西河津），建立冀国。春秋时，被晋国所灭。后代子孙以原国名为姓，是为冀姓。此冀姓之一支。

万姓，起源于山西芮城。西周初，有大夫封于芮（山西芮城），伯爵，史称芮伯，为诸侯国。传至芮伯万，其孙便以祖父之字为姓，是为万姓之一支。又晋大夫毕万，辅佐晋献公，封于魏地，是为魏国始祖。秦灭魏国后，毕万后裔以祖字为姓，亦为万姓。

解姓，起源于山西永济。西周时，唐叔虞少子名良，食采于解（山西永济虞乡），时称解良。其后裔以祖上食采地为姓，是为解姓。

裴姓，起源于山西闻喜。出自风姓。周孝王封伯益之后非子之支孙于豳乡，因以为氏，今闻喜裴柏是也。六世孙陵，周僖王封为解邑君，乃去“邑”从“衣”，是为裴姓。裴陵裔孙盖，官汉水衡都尉、侍中。其

九世孙遵，任敦煌太守，自云中从光武平陇、蜀，徙居河东安邑，安帝顺帝之际，徙居闻喜。裴遵曾孙裴晔，任并州刺史、度辽将军，开裴姓显贵之先河。

荀姓，起源于山西临猗。周文王第十七子封于郇，为伯爵，建郇国，史称郇伯，后被晋国所灭。子孙遂以原国名为姓，去掉邑字加上草字头，是为荀姓。荀姓后又分为旬、程、知、智、辅姓。

芮姓，起源于山西芮城。周武王时封文王后裔姬良夫于芮（山西芮城），成王时改为诸侯国，为伯爵，称芮伯。春秋时，芮国被晋国所灭，芮伯之后便以原国名为姓，是为芮姓。

郇姓，起源于山西介休。黄帝裔孙陆终第四子名求言，封于郇邑（山西介休郇城店），子孙以封邑为姓，是为郇姓。另外，春秋时，晋公族祁盈有一同姓家臣名曰臧，因功封于郇（山西介休郇城店），世称郇臧。郇臧子孙以祖上封邑为姓，亦为郇姓。此郇姓之另一支。

蒲姓，起源于山西永济。相传夏代封古帝虞舜后裔于蒲（山西永济县蒲州），子孙以封邑为姓，是为蒲姓。又相传有扈氏的后代，世代为西羌酋长，因家池中生蒲草，长五丈，节如竹形，时人异之，称曰蒲家，遂以蒲为姓。此蒲姓之另一支。

耿姓，起源于山西河津。西周时封姬姓人于耿（山西河津东南山王村一带），春秋时为晋国所灭，原耿国公族以国名为姓，是为耿姓。

唐姓，起源于山西太原。相传舜时封尧之子丹朱为唐侯，其后裔中有一支迁居晋阳。商朝时更名为豕韦氏，西周时复称北唐，位至公爵，称曰唐公。周成王时，居住在今山西翼城西的唐人叛乱，周公旦率部平叛，把唐公及其族人迁于杜城（今属陕西），降爵位为伯，世称唐伯。子孙遂以唐为姓，此为晋唐，亦即出自山西之唐姓。又周成王时，封其弟姬虞于唐，称唐叔虞，号唐叔。子孙遂以唐为姓，此为姬姓唐，即出自姬姓之唐姓。

临姓，起源于山西临县。春秋时，晋国有临邑（属山西临县），居其

地者,有的以居地为姓,是为临姓。

壶姓,起源于山西长治。春秋时,晋国有大夫食采于壶邑(长治壶关),子孙便以食邑为姓,是为壶姓。

清姓,起源于山西稷山。春秋时,晋厉公封大夫沸魑于清(稷山东南),世称清沸魑,子孙遂以清为姓,是为清姓。

鄂姓,起源于山西乡宁。春秋时,晋哀侯曾居于鄂(乡宁鄂城),其支庶子孙以原食邑为姓,是为鄂姓。又,春秋时,晋国大夫顷父之子嘉父叛晋,奔鄂邑,晋人谓之鄂侯,子孙亦以鄂为姓,是为鄂姓。哀侯和嘉父均为姬姓,此即源于姬姓之鄂姓。

曲姓,起源于山西曲沃。春秋时,晋穆侯封其少子成师于曲沃(曲沃古城),成师之后裔以封邑命氏,是为曲姓或曲沃复姓,故曲姓与曲沃复姓同宗,此为出自姬姓之曲姓。

虞姓,起源于山西平陆。周之先祖古公亶父,振兴周族,称太王。太王有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三曰季历。太王欲立幼子季历接任王位,故太伯与仲雍奔江南。季历生姬昌,即周文王。武王执政后,封仲雍庶孙于虞(平陆古城),建立虞国。春秋时,虞国被晋献公所灭。虞国王族后裔以原国名为姓,是为虞姓。此为源于姬姓之虞姓。

侯姓,起源于春秋时晋国。春秋初,晋哀侯及其弟潞侯,被曲沃武公打败并捕杀。其后裔逃难他国,以祖上封爵为姓,是为侯姓。此系源于姬姓之侯姓。

籍姓,起源于春秋时晋国。春秋时,晋国大夫荀林父为中行(中军)伯,其孙伯黶,掌管晋国典籍文献。其后裔以职官为姓,形成典姓与籍姓两支。古时“籍”与“藉”通用,故籍姓亦作藉姓。

令狐姓,起源于山西临猗。春秋时,晋国大夫毕万之后裔名曰果,因生擒秦国大将杜回之军功,封于令狐(临猗令狐城),其后子孙以祖上封邑为姓,是为令狐姓。

其实,起源于山西的姓氏远不止于此。因为山西是中华民族的

发祥地之一，不少古姓起源于山西。例如，上古八大姓之一的妫姓，就起源于山西永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居住在永济南的妫水旁，以居地命氏，是为妫姓。山西是晋国所在地，而晋国又是春秋时文明昌盛的大国，起源于晋国的姓氏很多，除以上列举的以外，还有一些。诸如，唐叔虞的后代，封于河内之温地（河南温县），是为温姓；又，晋国有大夫郤至，亦食采温地，亦为温姓。晋国大夫嘉父之后裔，以字为氏，是为嘉姓。晋国大夫胥臣之后裔，以字为氏，是为胥姓。晋国翼侯居翼城（故址在翼城县东南），其后裔以居邑为氏，是为翼姓。晋靖侯孙名季夙，其后裔以名为姓，是为季夙姓。晋穆侯之庶子名楼季，其后裔以名为姓，是为楼季姓，等等。山西在历史上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交融杂居之地，许多少数民族的姓氏，也起源于山西。例如，长孙姓，起源于代北鲜卑族，本为拓跋氏。北魏孝文帝时，以拓跋为魏皇族宗室之长门，故改姓为长孙氏。又如，尉迟姓，起源于鲜卑尉迟部，系鲜卑族的一支。后随孝文帝入中原，以原族名为氏，是为尉迟复姓，等等。如若把代北旧姓亦视为起源于山西的姓氏，还可列举 200 多个。正因为以上所述，仅为起源于山西姓氏的一部分，故曰举要。

第二节 郡 望

在山西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不仅产生了很多姓氏，而且还是许多姓氏的郡望所在地。

一、郡望的由来和演变

郡，系行政区划；望，指名门望族。郡望系指地方上的名门望族。

郡作为行政建置,发端于春秋时代的晋国。其时晋国在内地设县,在边远地区置郡,均由国君直接统治。这是我国历史上郡县制的形成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赵国在山西境内设有云中、雁门、太原、代、上党五郡。秦统一后,在山西境内设有:河东、太原、雁门、代、上党五郡。西汉至隋统一期间,山西境内郡的建置变化很大。隋统一后,置郡 14,计有:长平郡、上党郡、河东郡、绛郡、文城郡、临汾郡、龙泉郡、西河郡、离石郡、雁门郡、马邑郡、定襄郡、楼烦郡、太原郡。唐初依隋旧制,地方行政区划仍为州(郡)、县二级建制。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改郡为州,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复改州为郡,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再改郡为州。至此,郡作为一级行政建置,就不复存在了。从春秋末年至唐中叶这一千多年间,是郡作为行政建置的存在时期。但郡望作为指地方上的名门望族的用语,一直延续了下来。

在我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谱学的鼎盛时期。早在东汉时,门第观念业已形成。名士之家,往往世代做大官。例如:弘农郡华阴杨氏,连续四代有四人位至三公;汝南郡汝阳袁氏,连续四代有五人位至三公;汝南郡平舆许氏,连续三代有三人位至三公,等等。于是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和许氏,皆为世人所羡慕,成为名门望族。魏晋时期,随着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只有地方上的名门望族,才有资格做官;只有门当户对,才能通婚。这样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门阀势力和士族制度。门阀,即门第、阀阅,特指祖先建立功勋者的家世,也就是名门望族。社会上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有些名门望族,在魏晋六朝时期,世代显赫。例如,琅琊郡临沂王氏,从汉代直至南朝陈,累计有十七代数百人居高官,其中许多人官至丞相、尚书。又如,太原郡晋阳王氏,许多人世代做大官,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家族。与此相伴,攀附名门、假托祖先、任意通谱、冒认同宗等奇特现象,亦广为流行。即便是卓有成就的社会名流,也都以攀附名门、血统高贵为荣。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门阀势力才逐渐衰落下

来。有唐一代,是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时期,随着士族势力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推行,门阀观念逐渐淡薄下来。唐末农民战争后,门阀势力才退出历史舞台。此后,名门望族亦演变为泛指地方上或在政治方面或在经济方面或在文化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姓氏和家族。

在我国历史上,很多姓氏特别是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姓,分布极广,人才辈出,支派繁多,所以很多姓氏的郡望不是一个,而是几个或几十个。《广韵》记载,王姓有二十一望,张姓有十四望,刘姓有二十五望,李姓有十二望,朱姓有九望,周姓有八望,赵姓有五望,等等。

郡望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这不只是由于郡作为一级行政建置仅仅存在于春秋至唐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即或是这一时期郡的设置也是变化很大的。例如,山西的高平郡,北周时设置,隋开皇初废;唐天宝初,又改泽州为高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为泽州。所以,高平郡的望族主要指北周至隋这一时期的望族。

由于郡望系指地方上的名门望族,所以一郡之中,在不同的朝代会出现不同的名门望族。这些不同朝代的名门望族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郡之中出现几个或几十个名门望族的现象。因此,史籍中记载的郡望,都是不同朝代的名门望族的汇总,而不是同一朝代并存的数十个名门望族。山西各郡的名门望族,也都如此。

二、《百家姓》中山西郡望

《百家姓》是北宋以来,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主要读本之一,传播极广,影响极大。《百家姓》出自《兔园集》,系宋初钱塘无名老儒所作。其所以用“赵钱孙李”开头,是因为宋朝皇帝姓赵。钱姓是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的王姓。吴越国据有今浙江大部,是后梁开平元年(907年)由钱鏐创建的。传至其孙钱俶时,国力颇盛。后汉和后周时,累授

吴越王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宋太祖时入朝。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以所管十三州来献阙下,恩礼甚隆,累封邓王,卒谥忠懿。钱俶任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国王凡40年,为元帅35年。在钱塘老儒心目中,是仅次于皇族的显姓,故排为第二。孙姓是钱俶之妃,李姓系南唐后主,所以赵钱之后,排为孙、李二姓。然后才排其他姓氏。

流行于世的《百家姓》本,是明代定型的。其后曾出现过不少《百家姓》改编本,诸如,明末黄周星的《百家姓新笺》,清代以康熙皇帝名义编写的《御制百家姓》,咸丰时由丁宴改编的《百家姓三编》等等,但这些新编的《百家姓》本,都未能取代原本的《百家姓》本,可见原本《百家姓》生命力之强。原本《百家姓》不仅在汉民族中广泛传播,在兄弟民族中也有其注音译本,如《蒙古字母百家姓》、《女真字母百家姓》等。

流行甚广的原本《百家姓》,共收录姓氏438个。其中,单字姓408个,编为102句;双字姓30个,编为15句;最后是“百家姓终”一句,总计118句,472字。鉴于流传极广的原本《百家姓》收录姓氏较少,清代后期又出现了《增广百家姓》,即在原本《百家姓》的“司徒司空”一句之后,新增补了30个双字姓,36个单字姓。加上原有的30个双字姓和408个单字姓,总计收录姓氏为504个。其中单字姓444个,双字姓60个。在这504个姓氏中,郡望在今山西境内者有82个,兹分述如下:

(一) 太原郡(著望30姓)

殷商时为唐国,西周时为北唐,春秋时为晋阳邑,战国时属赵。秦庄襄王四年(前246年),秦国攻克赵国之晋阳及周围大片领土后,始置太原郡。西汉初,改太原郡为国,后又复为郡。西晋时又改为国,北魏再复为郡。隋开皇三年(583年)改为并州,大业三年(607年)复为太原郡。唐初改为并州。

太原郡著望计有：王姓、郝姓、邬姓、祁姓、伏姓、祝姓、郭姓、霍姓、咎姓、弓姓、官姓、武姓、韶姓、郁姓、能姓、阎姓、充姓、易姓、弘姓、沃姓、师姓、缙姓、亢姓、景姓、匡姓、越姓、尉迟姓、澹台姓、令狐姓、呼延姓。

(二) 平阳郡(著望 13 姓)

平阳古为帝尧之都。春秋时为平阳邑。战国属韩。秦置平阳县，属河东郡。三国时魏正始元年(240年)，始置平阳郡。唐武德年间改为晋州，天宝元年(742年)复为平阳郡，乾元元年(758年)，仍改置晋州。

平阳郡著望计有：汪姓、纪姓、解姓、邴姓、巫姓、仇姓、柴姓、步姓、欧姓、勾姓、饶姓、晋姓、牟姓。

(三) 河东郡(著望 13 姓)

河东郡始设于战国时期。战国中期，秦国夺取了魏国的西河和韩国的上党以后，魏国为加强防守，遂置河东郡。其辖境相当于今沁水县以西、霍山以南地区，这里原是魏国的国都安邑所在地。公元前290年，秦昭王任用魏冉为相，白起为将，在兼并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后魏国被迫献出河东地四百里给秦，秦沿袭魏河东郡旧名，置河东郡。治所在安邑(今夏县西北禹王城)，后移治临汾(今曲沃北)。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亦多称河东郡，只是辖境有所不同而已。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为蒲州，天宝元年(742年)又改为河东郡，乾元元年(758年)再次改为蒲州。

河东郡著望计有：卫姓、吕姓、柳姓、廉姓、薛姓、裴姓、陆姓、储姓、蒲姓、堵姓、满姓、聂姓、孟姓。

(四) 西河郡(著望 11 姓)

西河郡始置于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治所在平定(今内蒙古自治区东胜县境)。东汉永和五年(140年)移治离石(今山西离石)。汉献帝末年废。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复置西河郡，治所在兹

氏(今汾阳)。西晋时称西河国,永兴后废。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复置郡,属汾州,北齐废郡,改为西汾州。隋大业初,复置西河郡。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为浩州,三年改为汾州,天宝初复为西河郡,后又改为汾州。

西河郡著望计有:卜姓、毛姓、林姓、靳姓、栾姓、卓姓、池姓、宰姓、通姓、相姓、爰姓。

(五) 雁门郡(著望 8 姓)

雁门郡始置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前 325—前 299 年)改革军制,实行“胡服骑射”后,赵国成为仅次于秦的强国。为加强边防,置雁门郡,治所在今右玉县南。秦汉因之。北周改为肆州,隋开皇五年(585年)改为代州,大业初复为雁门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复为代州,天宝初又改为雁门郡,乾元初再复为代州。

雁门郡著望计有:童姓、田姓、幸姓、薄姓、农姓、鱼姓、衡姓、文姓。

(六) 上党郡(著望 5 姓)

上党郡始置于战国时期。战国时韩国置上党郡,辖区在今山西沁河以东一带地区。韩国上党郡守冯亭,献十七县给赵国。赵国亦置上党郡,与韩国之上党郡相接。公元前 247 年,秦攻取了韩的上党郡;公元前 236 年,秦又攻取了赵的上党郡。上党地区全部为秦占有,遂置统一的上党郡。秦汉魏晋因之。隋开皇初废,大业初复置。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为潞州,天宝初复为上党郡,乾元元年(758年)再次改为潞州。

上党郡著望计有:鲍姓、樊姓、包姓、尚姓、连姓。

(七) 高平郡(著望 2 姓)

高平郡始置于北周。北周时,将北魏时的高都郡改为高平郡,治所在高都(今晋城东北),领有高都、高平二县。隋开皇初废。唐天宝初又以泽州改置高平郡,后又改为泽州。五代时,后唐又置高平郡,不

久复废。

高平郡著望计有：范姓、巴姓。

以上是《百家姓》所载郡望在山西的姓氏。由于《百家姓》包括《增广百家姓》，所收录的姓氏很不完全，自然郡望在山西的姓氏也不可能完全。为了更多地了解山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郡望，有必要对《山西通志》中记载的山西郡望，再进行一些考察。

三、《山西通志》中山西郡望

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刻印的《山西通志》是山西的第一部省志。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编修刻印的嘉靖《山西通志》，设有“艺文”一目，著录三晋文献450余种，是最早的山西文献书目。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修成，崇祯二年(1629年)刻印的万历《山西通志》，出于军事防卫的需要，对边墙、边关、堡塞、隘口等地理形势记载特详。清代又修有康熙《山西通志》、雍正《山西通志》和光绪《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由曾国荃、王轩、杨笃等修。曾国荃，湖南湘乡人，于光绪三年(1877年)任山西巡抚。王轩(1823—1887年)，山西洪洞人，同治二年进士，精通古籍，博学多才，曾主讲晋阳、令德两书院。光绪五年，受聘为《山西通志》总纂，主持编修。杨笃(1834—1894年)，山西乡宁人，同治举人，山西学界一代名流，清末著名的方志学家、金石学家。光绪十三年，总纂王轩逝世，他力挑重担，总揽全局，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终于问世，受到著名学者梁启超的赞誉。《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该志云：“盖不独为《山西通志》之模范，且可为他省志书之准绳。”据光绪《山西通志》卷九记载，山西郡望(含北魏孝文帝迁洛著姓)，以郡统计(同一姓氏著望两郡者，按两郡望计)，多达292个，其分布如下：

(一) 太原郡(著望39姓)

计有：王、郝、祁、伏、祝、郭、霍、管、弓、官、武、温、阎、白、狄、乔、唐、郇、鄆、酉、祭、吞、韶、鬱、易、弘、匡、沃、越、师、秦、元、蓼、毕、廖、令狐、鱼、仪、景。

(二) 河东郡(著望 43 姓)

计有：裴、柳、薛、卫、吕、储、蒲、聂、骐、堵、展、啖、义、亓(本树姓改)、舜、辅、戈、廉、戴、庞、胡、袁、韩、关、罗、滕、周、董、赵、贾、宁、郅、翼、陈、古成(即苦成)、毋丘、费、王、官、景、任、孙、茹。

(三) 上党郡(著望 10 姓)

计有：鲍、樊、包、尚、连、繁、尧、冯、续、上官。

(四) 西河郡(著望 18 姓)

计有：卜、毛、宋、孙、栾、卓、池、宰、通、相、临、贯、理、析、仪、任、马、相里。

(五) 雁门郡(著望 16 姓)

计有：田、薄、农、茹、居、衡、文、续、卑、曲、童、宿、苑、枝、鱼、解。

(六) 平阳郡(著望 23 姓)

计有：汪、纪、解、巫、仇、柴、步、欧、饶、敬、来、乘、牟、囊、丙、路、晋、邓、员、仵城、霍、贾、马。

(七) 高平郡(著望 6 姓)

计有：米、范、巴、翟、过、独孤。

(八) 絳郡(著望 6 姓)

计有：先、侯、铎、郭、尹、卢。

(九) 代北(著望 131 姓)

其中，旧单姓 6，旧复姓 83，旧三字姓 39，旧四字姓 3。

1. 旧单姓 6。

计有：普氏，后改为周；侯氏，后改为亥氏；邢氏，庾氏，闻氏，茹氏。

2. 旧复姓 83。

计有：

托跋氏，后改元氏；纥骨氏，后改胡氏；
拓拔氏，后改长孙氏；达奚氏，后改奚氏；
伊娄氏，后改伊氏；丘敦氏，后改丘氏；
乙旃氏，后改叔孙氏；车焜氏，后改车氏；
贺赖氏，后改贺氏；独孤氏，后改刘氏；
贺楼氏，后改楼氏；是连氏，后改连氏；
仆兰氏，后改仆氏；若干氏，后改苟氏；
拔列氏，后改梁氏；拔畧氏，后改畧氏；
叱罗氏，后改罗氏；贺葛氏，后改葛氏；
是贲氏，后改封氏；薄奚氏，后改薄氏；
乌丸氏，后改桓氏；素和氏，后改和氏；
贺若氏，依旧；谷浑氏，后改浑氏；
匹娄氏，后改娄氏；牒云氏，后改云氏；
是云氏，后改是氏；叱利氏，后改利氏；
副吕氏，后改副氏；如罗氏，后改如氏；
乞扶氏，后改扶氏；阿单氏，后改单氏；
俟几氏，后改几氏；贺儿氏，后改儿氏；
吐奚氏，后改古氏；出连氏，后改毕氏；
贺拔氏，后改何氏；叱吕氏，后改吕氏；
莫芦氏，后改芦氏；莫舆氏，后改舆氏；
纥干氏，后改干氏；是楼氏，后改高氏；
屈突氏，后改屈氏；查卢氏，后改查氏；
解枇氏，后改解氏；奇斤氏，后改奇氏；
涑卜氏，后改卜氏；丘林氏，后改林氏；
尔绵氏，后改绵氏；盖楼氏，后改盖氏；
渴单氏，后改单氏；叱门氏，后改门氏；

秘邗氏,后改邗氏;土难氏,后改山氏;
 乙弗氏,后改乙氏;茂眷氏,后改茂氏;
 宥连氏,后改云氏;庠狄氏,后改狄氏;
 柯拔氏,后改柯氏;尉迟氏,后改尉氏;
 叱干氏,后改薛氏;俟奴氏,后改俟氏;
 展迟氏,后改展氏;费连氏,后改费氏;
 綦连氏,后改綦氏;去斤氏,后改艾氏;
 渴侯氏,后改纛氏;叱卢氏,后改祝氏;
 和稽氏,后改缓氏;冤赖氏,后改就氏;
 温孤氏,后改温氏;达勃氏,后改夔氏;
 贺兰氏,依旧;纥奚氏,后改嵇氏;
 越勒氏,后改越氏;叱奴氏,后改狼氏;
 羽弗氏,后改羽氏;斛律氏,依旧;
 斛斯氏,依旧;尔朱氏,依旧;
 可达氏,依旧;吐万氏,依旧;
 拓王氏,本姓王,后魏赐姓拓王氏。

3. 旧三字姓 39。

计有:

丘穆陵氏,后改穆氏;步六孤氏,后改陆氏;
 勿忸于氏,后改于氏;若口引氏,后改寇氏;
 普陋茹氏,后改茹氏;阿伏干氏,后改阿氏;
 可地延氏,后改延氏;阿鹿桓氏,后改桓氏;
 他骆拔氏,后改骆氏;吐谷浑氏,依旧;
 俟力代氏,后改鲍氏;吐伏卢氏,后改卢氏;
 莫那娄氏,后改莫氏;奚斗卢氏,后改索卢氏;
 步大汗氏,后改韩氏;没路真氏,后改路氏;
 扈地干氏,后改扈氏;俟伏斤氏,后改伏氏;

嘓石兰氏,后改石氏;大莫干氏,后改郤氏;
壹斗眷氏,后改明氏;宿六斤氏,后改宿氏;
树洛干氏,后改树氏;纥豆陵氏,后改窆氏;
侯莫陈氏,后改陈氏;太洛稽氏,后改稽氏;
步鹿根氏,后改步氏;破多罗氏,后改潘氏;
独孤浑氏,后改杜氏;郁都甄氏,后改甄氏;
渴烛浑氏,后改味氏;庠耨官氏,后改庠氏;
乌洛兰氏,后改兰氏,一邢葵氏,后改葵氏;
叱伏列氏,依旧;破六韩氏,依旧;
可朱浑氏,依旧;莫胡卢氏,后改阳氏;
譬历辰氏,后改辰氏或张氏。

4. 旧四字姓 3。

计有:

自死独膊氏;井疆六斤氏;胡古口引氏,后改侯氏。

以上是光绪《山西通志》记载的山西郡望。在中华文明史上,山西是很重要的郡望集中地之一。

四、郡望举例

在中国历史上,山西的很多名门望族,都是影响极大、名扬天下的。兹举数例。

(一)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主要有祁县、晋阳两支。秦朝大将王翦裔孙王霸,定居太原,生有二子,长子王殷,东汉中山太守,食邑祁县,其后裔称祁县王氏;次子王咸,随父居晋阳,其后裔称晋阳王氏。

祁县王氏,自王允始,扬名天下。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汉献帝初平元年(190

年),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以董卓有不臣之心,潜结董卓部将吕布,刺杀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陷长安,吕布奔走,驻马青琐门外。吕布招王允去劝降,王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其以国家为念,遂遇害,时年56岁。长子、次子及宗族10余人皆被诛害。唯兄子王晨、王凌,脱归乡里。天子感痛,百姓丧气。及朝廷平定李傕之乱,帝思王允之忠节,遣使奉策,改殡祭葬,封其孙为安乐亭侯,食邑300户。王允之侄王凌,既免于叔父之难,以才能为魏武帝曹操知遇,任中山太守,有治声,后官至太尉。时人称赞他“文武俱贍,当今无双”。司马懿诛除异己,有不臣之心。他在寿春(安徽寿县)举兵讨伐,后兵败被杀。时论评议他是“固忠于魏之社稷者”。王凌有四子,长子、次子、三子,均才武过人;四子王明山最知名,善书法,被时人视为楷模。后来四个儿子都被司马懿所杀。

王凌之后,王玄谟是祁县王氏中影响很大的历史人物。南朝宋武帝时,南讨有功,封曲江侯。后迁平北将军、徐州刺史,加都督。宋文帝即位,王玄谟官至顾命大臣。明帝即位,四方反叛,以王玄谟为大统,领水军南讨。后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年八十二卒,谥曰庄公。其后,家世相传,显于南朝。王玄谟子王宽,光禄大夫。从弟王玄载,兖州刺史。王玄载弟王玄邈,雍州刺史。曾孙王茂,仕梁朝,为开国元勋。梁武帝以王佐许之,事无大小皆询焉。后徙江州刺史,不取俸,狱无滞囚,宴然有秩,死于州任。赠太尉,谥曰忠烈。与王玄谟同时,汉司徒王允之兄王愨的七世孙王懿,亦显贵南朝。东晋末年,王懿自前秦出奔江南,时值宋武帝刘裕举兵时期,王懿被任为中兵参军,每战必克,后以战功显赫进镇北大将军。卒,谥号桓侯。

南朝梁时,祁县王氏后裔王神念仕梁,为右卫将军,卒,谥号忠公。其子王僧辩,博学,有凌云之气。梁元帝时,为中兵参军,督诸道兵马,平定侯景之乱,功居第一,加侍中、尚书令,累迁大司马,成为出入相、左右时局的大人物。后为取代梁朝的陈霸先所害。王僧辩长

子王颢，在梁朝为侍中；次子王颢，仕周为汉中太守，拜同三司，隋朝时官居代州、齐州刺史。唐太宗时宰相王珪，即王颢之子。王珪卒，唐太宗素服哭别，赠吏部尚书，谥曰懿。后王珪长子王崇基，官至主簿员外郎；次子王敬直，为驸马都尉，封南城县男。

祁县王氏迁居河东的一支，以博学多才，著称于世。王通、王绩兄弟及其孙王勃，是其中的佼佼者。王通的六世祖王玄则，仕南朝宋，历太仆、国子博士，撰《时变论》六篇，言化俗推移之理；五世祖王涣，为江州刺史，著有《五经决录》五篇，言圣贤制述之意；四世祖王虬，于南齐高帝萧道成代宋后，奔北魏，任并州刺史，定居河汾，称晋阳穆公，著《政大论》八篇，言帝王之道；三世祖王彦，官至同州刺史，因悲永安惨案（胡太后杀明帝，尔朱荣沉胡太后和幼主于河，杀王公、官民2000余人），退居龙门，遂为河东龙门人，著《政小论》八篇，言王霸之业；祖父王杰（亦作王一），官济州刺史，谥曰安康献公，受田于龙门，著《皇极说义》九篇，言三才之去就，并有《龙门禹庙碑》传世。父王隆，字伯高，隋开皇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文帝称善。后出任昌乐县令，再迁铜川县令，秩满归里。王通兄弟七人，王通排行第三，王绩排行第五。王通中秀才高第后，于仁寿三年（603年），西游长安，向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稽古验今，文帝大悦。但为公卿所嫉，未被重用。后王通任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弃官归里，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历九载完成其巨著《续六经》。卒后，被尊为“文中子”。王通以明王道为己任，重振孔子之学，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被后人称为隋唐时期儒学复兴的先驱。其孙王勃，才气横溢，文思出众，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被誉为“初唐四杰”。王通之弟王绩，字无功，唐代著名文学家，有《王无功集》（又名《东皋子集》）传世。

太原王氏晋阳支，自东汉始，日益显贵。王咸裔孙王柔、王泽兄弟，博学多才，得名士郭林宗品评而知名。后分别官至北中郎将和代

郡太守,奠定了晋阳王氏显贵的基业。王柔子王机,仕魏,官至东郡太守;王泽子王昶,仕魏,官至司空,著有《治论》和《兵书》,魏末因助司马氏代魏有功,西晋建立后,子孙青云直上,登上了超级贵族之高位。王机子王沈,由叔父王昶收养,事昶如父,以佐命之功迁尚书令、散骑常侍,封博陵郡公。王沈之子王浚,官至大司马,父子皆登三公之位。王昶子王浑,晋武帝时率大军,灭孙吴,实现统一,以军功官司徒,增封京陵侯爵为京陵郡公,食邑 8000 户。王浑子王济,被晋武帝招为驸马,官至骠骑将军。从西晋建立至永嘉之乱的 40 多年间,晋阳王氏,鼎贵一时,是其黄金时代。东晋时,晋阳王氏亦是继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之后,独霸东晋朝政达数年之久的显贵。东晋哀帝、简文帝和孝武帝的皇后,都是晋阳王氏之女。一门三后,其荣贵无双。王述,字怀祖,以门第显贵为司徒王导重用,官至散骑常侍、尚书令。其子王坦之,字文度,与谢安共辅幼主,迁中书令,领丹杨尹。卒,追赠安北将军,谥曰献。王坦之有四子,三子王国宝为安帝重用,参管朝政,威震内外,迁尚书左仆射,领选,加后将军、丹杨尹。自王述至国宝祖孙三世为相,权倾天下。其后因政局变动,连遭家祸。王慧龙渡江北奔,后入北魏,宰相崔浩之弟崔恬,妻之以女,王慧龙遂与北朝首族清河崔氏联姻。王慧龙在北魏被授安南大将军左长史,以军功为太武帝器重,从而奠定了其家族的显贵地位。北魏孝文帝定族姓时,纳慧龙孙王琮之女为妃嫔,从此又得到皇帝的扶持。由于有皇帝的扶持、大族的提携,王慧龙的后裔终于登上了北方一流大族的显贵地位,王氏遂与崔、卢、李、郑四姓,合称北朝五族,即所谓“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王琮后来官至征北将军、中书监、并州刺史,封长杜伯。王琮有四子:遵业、广业、延业、季和,并有时誉,各自分房立支,人称四房王氏。遵业为大房,子孙显贵于北朝至隋唐,十世孙王溥,为唐末昭宗时宰相;广业为二房,显贵略逊大房,后裔知名者有北齐胶州刺史王野父,唐御史中丞王珣儒,中书舍人王孝远,太常博士王仙

客等人；延业为三房，季和为四房。三房和四房无后，故不显于世。晋阳王氏除王琮后裔外，还有多支显贵。如南朝齐，有王道宝，任晋安太守；道宝子王玮，为梁武陵王记室参军；王玮子王元规，为梁陈时名儒，陈文帝时任国子祭酒，入隋后，官至秦王府东阁祭酒。又如，北魏太武帝时，王景仁归魏，官至敦煌镇将；景仁子王公礼，任平城镇司马，因家于平城；公礼子王延，任兰陵郡守；王延子王士良，迁居河右，仕东魏、北齐，又仕北周、隋；士良子王德衡，北周末年任仪同大将军，等等。

唐代是门阀势力衰落、庶族地主兴盛的转折时期，尽管世代相传的豪门大族史不绝书，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家世和门第不再作为选官的凭据，晋阳王氏亦随之而衰落了下來。从汉至唐，太原王氏一直是名声显赫、影响巨大的名门望族。有些本来属于其他衍派的王氏家族，由于本族世系记载不明，加之太原又是王氏开宗立姓之地，所以便将自家的世系直接归系于太原王氏之下。这样就使太原王氏越传越多，越滚越大，以致有“天下王姓出太原”之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在海内外，广为流传。

（二）河东裴氏

河东裴氏，自裴晔始显。裴晔有二子，长子裴羲，任桓帝时尚书令，封开国公；次子裴茂，字巨光，灵帝时历郡守、尚书，因率诸将平定李傕之乱有功，封阳吉平侯。裴茂有四子：徽、潜、辑、绾。其后分房立眷，各领风骚，成为名垂青史的名门望族。

裴茂长子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兰陵武公、金紫光禄大夫。后子孙多仕西凉，故号西眷，裴徽即为西眷之祖。裴徽有子四：黎、康、楷、绰。长子裴黎，字伯宗，游击将军、秘书监。裴黎有子二：粹、苞。裴粹，晋武威太守。粹孙名懂，徙居解县洗马川，号洗马裴，仕前秦，官至大鸿胪。裴懂乃洗马裴氏之祖。裴苞，晋秦州刺史、太子少师，封清河公，赠司空。四世孙裴邕，随晋室南渡，徙居襄阳，任晋州刺史。六世

孙裴叔业，仕南齐，高帝时任骠骑行参军、广平太守；武帝时又任右军将军、东中郎将咨议参军。齐明帝很欣赏叔业的才华，遂以叔业为给事黄门侍郎，封武昌县开国伯，食邑 500 户，齐明帝驾崩，东昏侯萧宝卷继位，滥行杀戮，屡起事端。裴叔业遂北归，事北魏。魏世宗诏拜叔业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豫、雍、兖、徐、司五州诸军事，征南将军，豫州刺史，封兰陵郡开国公，邑 3000 户。因叔业自江南北归，再加上又是驰骋沙场、屡建军功的大人物，叔业之后裔遂称为南来吴裴，叔业，即南来吴裴之祖。可见，洗马裴和南来吴裴，分别出自裴黎之长子和次子，都是裴黎的后裔，都源于西眷。

裴茂子潜，字文行，仕曹魏。他治军有方，为太祖所器重，入朝为散骑常侍。魏明帝继位后，官至尚书令，封清阳亭侯，食邑 200 户。死后又赠开国公，谥曰“贞侯”。其后裔多在中原做官，故归属中眷。

裴茂子馆，东汉献帝时，任尚书令。本人显贵，但无后裔。其兄徽之裔孙裔，仕晋官至咨议参军、并州别驾，号曰中眷。裴裔，即中眷之祖。又裴裔系西眷之祖裴徽之后裔，可见中眷源于西眷，中眷和西眷均系裴徽之后裔。

裴茂第三子辑，东汉献帝时，任工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其后裔为宦者，多在京燕淮襄等处，故称东眷。裴辑，即东眷之祖。

起源于闻喜裴城即裴柏之裴氏，随着时间的推移，定著五房：一曰西眷裴，二曰洗马裴，三曰南来吴裴，四曰中眷裴，五曰东眷裴。尽管世远族分，但都源于裴柏，故有“天下无二裴”之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裴氏家族定著五房的形成和确立时期，同时也是裴氏家族人才辈出、建功立业的时期。诸如，裴潜子裴秀，不仅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而且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地图学家，他提出的制图六体说，一直沿用到明朝末年。裴秀子颉，字逸民，颇有其父之遗风。不仅官至国子祭酒、尚书侍中，而且还是西晋时反对玄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崇有论》，对玄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在中国思想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其子裴嵩，官至黄门中书侍郎，次子裴该，被招为驸马，授散骑常侍。又如，裴松之，字世期，生于世宦之家，祖父裴昧，光禄大夫；父亲裴珪，官员外郎。本人自幼好学，博览典籍。20岁便任殿中将军，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朝廷招社会名流议政，裴松之以才当选，颇得同仁赏识，后拜员外散骑侍郎。刘裕代晋称帝，更国号曰宋。宋文帝刘义隆很器重裴松之，故诏令他为《三国志》作注。他悉心搜寻，补缺漏，条异同，正谬误，论得失，历时三载，书成，注文超越《三国志》正文三倍，被尊为史学大家，成为史学史上史注体例的开创者。其子裴骃，继承家学，在史注体例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以荟萃众说为特点的集解、集注形式，撰《史记集解》八十卷，成为名垂青史的传世之作。其曾孙裴子野，亦以文著称，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再如，裴佗父子，以文学才华，扬名天下。裴佗五举秀才，再举孝廉。以秀才高第拜中书博士，迁赵郡太守。他为政有方，政绩显赫，后以病弃官还乡。生前遗令，死后不要朝廷赠谥，不受他人礼物。其后诸子均遵照执行。裴佗有四子：让之、谏之、献之、谒之，他们都秉承父志，各有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裴氏家族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时期。公卿将相，比肩而立；文史成就，名垂青史。

隋唐时期旧的世家大族犹如江河日下，衰败了下来，然而裴氏家族却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辉，进入它的全盛时代。在隋代，裴政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他的高祖裴寿孙跟从宋武帝刘裕南下，迁居安徽寿县，后仕梁，官至卢江太守；他的祖父裴邃，戍守边关，忠心侍梁，战功显赫，不事二主，是驰骋疆场的英雄；他的父亲裴之礼，仕梁官黄门侍郎、少府卿。裴政一生经历梁、北周、隋三个王朝，他以长于政事、勇于攻战，又明典故，晓刑法，善断案，有政绩，受到三朝帝王的赏识。隋文帝时，他主持编修的《开皇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刑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裴矩，是隋朝杰出的外交家，在通西域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入唐后，又为联络西突厥出谋献策，取得预期效果。唐

太宗继位后,被任为吏部尚书。他撰写的《西域图记》价值极高。原书虽已失传,但从《隋书·西域传》中还能找到它的影子。裴寂,隋大业年间任齐州司户参军、晋阳宫副监时,即与李渊、李世民父子友善,李渊父子起兵后,他运筹帷幄,为李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高祖封他为司空、魏国公,又迁尚书员外郎。太宗继位,又加封裴寂 1500 户。有唐一代,裴氏家族的宰相就有 17 人之多,被欧阳修列为唐朝宰相世系表之首姓。以定著五房计,西眷裴有裴寂、裴矩;洗马裴有裴谈、裴炎;南来吴裴有裴耀卿、裴行本、裴坦;中眷裴有裴光庭、裴遵庆、裴枢、裴贻;东眷裴有裴居道、裴休、裴澈、裴垍、裴冕、裴度。

从东汉时裴羲任尚书令始至唐哀帝时裴枢为宰相止,这一期间裴氏家族先后出宰相 59 人,大将军 59 人,尚书 55 人,侍郎 44 人,御史 11 人,刺史 211 人,太守 77 人。其中封爵为公者,89 人;为侯者,33 人;为伯者,11 人;为子者,18 人;为男者,13 人。有谥号者,59 人。值得注意的是,裴氏家族中这些灿烂的群星,在隋唐时期很多人都是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的。据《裴氏世谱》记载,有进士 68 人,举人 65 人。正因为裴氏家族人才辈出,所以在旧的家世大族急骤衰败的唐代,依然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正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他撰写的《裴柏村记》中所说:“观裴氏之兴,唐存亡亦略可见矣。”

(三) 介休范氏

介休范氏是兴起于明末、鼎盛于清前期的大皇商。它与清廷有过特殊的关系,对清王朝用兵西北有过重要的贡献,对清王室的经济生活有过重大的影响。介休范氏乃是康熙和雍正皇帝的掌上明珠,盛极一时。

介休范氏兴起于范永斗,鼎盛于其孙范毓麟。明朝中叶,张家口已是边界贸易的重镇。介休的范至刚则是经常出入于张家口的商人。范至刚的八世孙范永斗主持范氏家族的商务时,范家已是张家口八大商家之一了。这八大商家都是山西籍人,他们操纵了整个张家口的

贸易活动。明末张家口的贸易,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努尔哈赤在做明朝建州都督时,边界贸易是在明朝指定的抚顺、清河、宽甸、绥阳四关进行的。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后,与明朝处于敌对状态。此时清已据有辽东,交战地带迫近山海关,原来的四关贸易已无法继续进行了。然而,清朝的物资供应却依靠内地,所以张家口一跃而为清与关内贸易的基地。操纵着张家口贸易的八家大商,源源不断地为清朝输送各种物资,特别是军用物资,深受清廷青睐。由于他们经常往返于关内关外,在输送物资的同时,又为清廷提供了各种情报,包括某些军事动态。清廷对张家口八家大商的重要性是了如指掌的。所以,入关后,顺治皇帝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这八家大商,封他们为“皇商”,隶属内务府。范永斗还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这样,范永斗又较其余七家,略高一筹。此后,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而且还凭借皇家威势经营各种买卖,例如经营河东和长芦盐业,垄断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市场,被称为“参商”。转眼间,范永斗便成为百万之富的皇商,成为八大皇商中的佼佼者。

范永斗的儿子名曰三拔,字琼标,是其父的助手。他不仅协助其父经营边界贸易,而且还深入内地市场,进行绸布茶粮等各种贸易。他继承其父的家业后,经营规模和贸易范围都更加扩大,但他体弱多病,力不从心,不久便将家业交给颇有才华的三儿子范毓麟主持,毓麟时年仅二十多岁。范三拔生有五子:长曰毓馨、次曰毓馥、三曰毓麟、四曰毓祺、五曰毓麟,兄弟五人不仅经商有方,而且与清廷打得火热。在范毓麟主持下,范氏的商务经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在运送军粮以及与日本进行铜业的贸易上,范氏大受清廷宠信,备受重用。

范毓麟是康熙四十年(1701年)代其父范三拔主持家业的。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部再度发生骚乱,清军远征,军粮供应便成为军机大事。康熙帝鉴于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御驾亲征准噶尔时,官运军粮

一石,竟需 120 两白银,且尚难如期运到。范毓麟闻讯,依仗自己熟悉塞外之路的优势,便与其弟毓麟联名上奏康熙帝,请求承担运送军粮任务,且费用只需官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康熙帝阅奏大喜,遂准其请。结果范氏家族按照预定计划和用兵要求,出色地完成了运粮任务,为清廷节省了大笔开支。雍正五年(1727 年),清廷再次用兵准噶尔时,范毓麟再次承担运送军粮任务,运送谷米百余万石,较之官运费用节省白银 600 余万两。雍正九年至十年间,又一次用兵准噶尔时,还是由范毓麟承担运粮任务,因北路中计,全军溃退,损失谷米 13 万余石。范毓麟辞谢了雍正帝准其“据实报销”的恩赐,其亏损由自己拿 144 万两白银补偿失数。不仅如此,范毓麟还慨然解囊,为各路运户补交白银 262 万余两。致使军中将帅万分感激范氏兄弟,上奏清廷褒奖其功,雍正帝遂赐范毓麟为太仆寺卿、用二品服,复赐为布政使参政。从此,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名声大振。乾隆年间,范毓麟还为清廷边远仓库运粮,如运粮四万石于鄂尔昆仓内存贮等。

与日本进行的铜的贸易,既是范氏大发横财的一项贸易业务,同时也是范氏家族走向没落的导火索。起初,由日本采买铜是沿海民商承办的。范三拔看到这桩生意有厚利可图,于是联络各家皇商,奏请包办,并提出减价交售清廷的竞争条件。康熙帝鉴于此举可为清廷节省大笔开支。遂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准其所请。从此,由日本采买铜料业务逐渐被皇商包办。康熙四十年,范毓麟代其父主持家业后,借助熟悉铜务和内外关系等优势,每次都能保质保量出色完成任务,深受清廷赏识。其时,范氏拥有贩铜船六、七艘,是皇商中的大户。这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政府铸造铜币的急骤增加,范氏家族大发横财。然而,好景并不长久。康熙五十三年,日本政府颁布了限制铜料出口的政策,规定中国每年由日本采购铜料不得超过三百万斤。而当时清朝每年从日本采购铜料高达六七百万斤。于是皇商包办的从日本采购铜料的任务不能完成。康熙五十五年,清廷撤销了皇商采

购铜料的包办权,交由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八省督抚办理,范毓麟退出了从日本采购铜料的贸易。乾隆皇帝即位后,为扭转铜料短缺、不足鼓铸的局面,重新起用范毓麟办铜,规定每年从日本采买二百万斤。范毓麟为报答皇恩,唯命是从。乾隆三年(1738年),范毓麟毅然再度派船赴日办铜。正当范毓麟为清政府扭转铜料短缺全力拼搏之时,乾隆九年户部提出要范毓麟偿还拖欠旧债114万两白银的奏议,议定以每年办铜料130万斤来偿还,并限定从乾隆十年开始,分六年还清。由于日本限制铜料出口,再加上清廷不公平的待遇,直到乾隆十五年范毓麟逝世,这笔欠款也未还清。

范毓麟逝世后,由其子范清注主持家业,继续承担赴日采铜任务。由于日本铜的产量锐减,价格上扬,而运往日本易铜的中国商品价又被日方一压再压,致使贩铜成本大为增高,而清廷却仍以原价收买,使得范氏入不敷出,亏欠日深。范清注于乾隆二十七年,郁郁而死。范清注死后,由其兄范清洪继续接办铜务。范清洪深知对日贩铜前景暗淡,拟“弃产变价,告退招商”,摆脱是业。但清廷不允。乾隆二十九年,内务府奏请以范毓麟之侄范清济取代范清洪,继续接办铜务。范清济接办时,拖欠清廷白银总计已达到171.5万两之多。清廷责令于二十五年内以每年多交铜5万斤抵偿。范清济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尽管范清济为求转机,“日夜筹思,汗流心裂”,但也未能摆脱困境。清廷鉴于范氏家族已毫无用处,乾隆四十八年,遂下令查抄范氏,没收家产,范清济便由昔日的皇商变成了乾隆皇帝的阶下囚。

介休范氏从范永斗、范三拔、范毓麟到范清注、范清洪、范清济兄弟,四代皇商,效忠清朝,称雄商界长达一个多世纪,是明清时期这一类名门望族的典型代表。

第五章 学术思想

研究中华文化,求其本末,溯其源流,明其表里,索其蕴义,对于三晋学术思想文化的深入研究是绝不可少的。

史前的漫长历史,三晋地域上遗迹很丰富;传说的历史文献资料,与三晋古地多有密切联系;西周以来,在三晋土地上出现了人文荟萃的态势,成为以法家文化为主体及名家、兵家和纵横家的重要策源地;汉唐以来,三晋地域的思想家对儒释道思想的发展,对佛学的中国化的推进方面,都曾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晚期,在中国古代理论思维最发达的理学思想文化形态的形成中,以及丰富发展和总结批判中,三晋思想家都有杰出的贡献。

这些具有三晋地域性的学术思想文化内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三晋思想文化的形成

三晋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有传说中的唐虞遗风,有“启以夏政”的遗教,有融入的戎狄等周边少数民族的遗德。西周以来,晋国雄立,形成了三晋思想文化,并且呈现出一代之盛。

一、“配而不终”的天命论

西周以来,周公在夏、商两代天命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观点与方法。夏、商两代都信从天命论,都禀承上帝的旨意行事,君王都自称是上帝之子。周人灭殷商之后,为了说明此举符合于天意,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观点,他们认为天命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上帝的旨意,就是绝对的命令,说明他们同夏、商一样,都信奉天命论;一层是要求以实际言行体现天道。周人认为纣王无道,违背天意,故而命周代商,说明周人灭商符合天意。周人虽然信奉天命论,但“以德配天”的观点中,含有一种积极能动的精神,这是一大进步。晋人信仰周公的天命论,并将它视为赖以立国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先秦文献中记载西周以来,卜筮活动甚多,《左传》中记载东周列国的活动,就有 80 余次,其中晋人卜筮活动最多,说明晋地宗教活动最多。

晋国在东周以来,天命论由盛而衰,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力得到一定的发展。东周以来,列国为了称雄天下,都重视发展,增强实力,社会经济普遍有所提高,晋国更为显著;二是战争频仍。在争霸的战争中,仍有宗教色彩的活动,但同时存在着相信自己力量的倾向。战争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列国的争战,就直接冲击了浓厚的宗教意识。晋人赞赏“配而不终”(《国语·周语》)的观点,就反映了这一点。经过是这样的:晋成公由周王室返晋继位时,晋国占得“乾”卦,而变卦为“否”卦,卦辞有“配而不终”一语,晋人理解为德虽配天,王位也不能长久保有。《否》卦辞中又有言曰“倾否,先否后倾。”“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周易·否卦》)说明事物的变化,是沿着泰极否来、否极泰来和物极必反的轨迹发展,可见泰未必就吉,否未必都凶,人事的吉凶互变之理,仅仅追求“以德配天”之教是不够的,还需要善守于德业,贞正以自守,再求适时适位的道理。这

里所表明思想观念,虽然仍属于天命论的范围,但其中一方面注意到事物发展的阴阳之道,事物发展中的相反相成的必然性规律;另一方面重视了人自身能动性发挥的作用。这也就是“以德配天”和“配而不终”的不同之处,说明在某种程度上要求人的意志凌驾在神灵之上的意识存在。

天命论在晋国日趋动摇已成事实。晋人有言:“悠悠苍天,曷其有常。”(《左传·僖公四年》)在长期争夺政权和霸权的争战中,百姓苦难深重,他们由怀疑上天发展到质问这个昏乱而无常的天,对晋国统治者也离心离德。这种状况引起晋国上层的高度重视,士蒍说:“诚若如豫,豫而后给。”(《左传·僖公四年》)说明对此与其告诫,不如预先有所准备,这种最好的准备就是重民,重民可存,弃民必亡。师旷也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襄公十四年》)这种重民、爱民的观点,意味着神灵地位的下落,反映出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百姓在争霸中的积极作用,也表现了晋地社会的明显进步。

二、“职竞由人”和“物生有两”的观点

重民轻天的思想,导致了晋地哲学思维的发展。“职竞由人”和“物生有两”观点的提出,表现出这一倾向。这种具有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是当时中原地域先进的思维方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晋国大夫韩简在公元前645年,要人们重视“职竞由人”。他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沓背憎,职竞由人’。”(《左传·僖公十五年》)韩简说明两点,一是“物生有象”的观点,揭示卜筮的象数,不是神秘的,而是人对客观事

物认识的反映。就是说物生有象、有数是龟筮术产生的根源,因此,对于所占的卜筮,从与不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吉卦得而从之,不一定有益处;凶卦避之,也不一定就得福。二是说明人民的灾害,并非是上天降下来的,人事的吉凶祸福是通过人的活动产生的。吉与福,主要是由人的努力促成;凶与祸,主要是由“败德”的积聚而形成。周王室内史叔兴提出“吉凶由人”(《国语·郑语》)的观点,同样说明自然变化是阴阳之事,人间吉凶祸福是由人造成的,这与韩简的观点是一致的,都具有天人相分的意思。这些朴素唯物论因素的见解,表明三晋和中原一带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因为这些观点既是对人民怨天、骂天和怀疑天的存在的理论概括,又促进了这种意识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自然是十分难得的。

晋国史官蔡墨提出的“物生有两”是辩证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客观事物矛盾法则的精辟概括。西周以来,中原地域社会发展很快,同时社会矛盾也不断激化。在三晋地域,民族杂处,主要有治理“戎狄之民”的实际问题。晋国的始封诸侯名姬虞,周成王在策封姬虞典礼上,“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这段文献记载,被认为对研究晋国思想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姬虞的封地在古唐国,而唐国处于夏人故墟的地方,这里一方面既有唐即尧舜时的文教遗风,又有夏文化的遗教,因此具有上古以来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风尚;另一方面这里与戎狄部落相邻共处,唐地的叛乱平息不久,局势仍然不安定,四周民族间矛盾也很尖锐。因此,周成王要求唐叔虞,一定要从唐地的实际出发,用夏政教导夏民,要用戎狄之法治理戎狄之民,继承夏代以来的传统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对晋国初期的发展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形成的三晋思想文化,具有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和宽容博大的特征,都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其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影响更深。东周初晋献公伐骊戎,史苏反对,说“胜

而不吉”(《国语·晋语一》),认为论实力讨伐可以得胜,但并不吉利。之后晋悼公时魏绛反对伐诸戎,他说:“劳师于戎,而失诸华。”(《国语·晋语七》)这种和戎的观点,与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完全一致,并成为三晋思想文化的传统,对理论思维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充实,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蔡墨即史墨,他是晋国的史官,他提出了辩证法的“物生有两”和“陪贰”的命题,是晋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次升华。《左传》记载在公元前510年,鲁昭公被大夫驱逐,流亡在外而死。当时晋国赵简子问于史墨,对于这件事应该如何看待。史墨对此作出回答说:

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史墨对客观事物矛盾性的分析中,首先认为客观世界无论是自然、社会和人自身,都是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中;其次又指出事物的矛盾双方,并不是平列的,而是有主有辅的双方构成;矛盾运动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矛盾推动的。同时,史墨还指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同上)说明君主的王位是可变的,人的社会地位是可能转化的,就是自然也是如此,如在《诗经》的《十月之交》一诗中,有高岸变为洼地、山谷反成山陵的诗句。这里他着重指出矛盾中主辅双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向它的相反的方向转化着。这种转化的辩证法就是“无常”,即常和变的统一,常是事物处于相对稳定时期,这时处于渐变的转化阶段,然后便转向了突变、质变,矛盾双方便发生了主辅易位,从而说明事物矛盾斗争的绝对性,以及矛盾转化的必然性。史墨精辟的辩证法观点,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晋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反映了春秋时代我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水平,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和社会进步阶级的愿望,是晋地在战国时期产

生法家思想的基础。正如窦犇所说：“人之化也，何日之有！”（《国语·晋语九》）人间的变化何日不在发生呢！

三、“修礼以节”的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在夏、商两代已很盛行，西周时达到完善的程度。对于晋地而言，有其地域的特殊性，具有非正统的特征，因为晋文化是建立在夏墟古唐国的基础上，对周礼的贯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但它具有礼乐文化的共性，这是很自然的。

礼乐文化是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兴起的，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便已出现，它是从祭祀文化中的巫祝文化中演化而来。中原华夏先民踏入文明的门槛以后，由于社会真正的分裂，便产生了礼乐文化，可见礼乐文化是在解决社会新矛盾之时应运而生，它与巫祝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巫祝文化祭祀神灵，礼乐文化则是祭神祭祖；巫祝文化属于原始思维，知、情、意浑然一体，它是伴随着上古历史不断发展着；而礼乐文化则属于理性思维形态，具有抽象思维特征，它既保留与发展了巫祝文化祭祀神灵的传统，又增加祭祖祀宗的礼乐文化的内涵，这些意识形态，无论在传说时代或是晋地的古唐邦，都有明显的表现与存在。

晋人论礼，有“从其等，礼也”。还有“修礼以节之”（《国语·晋语八》）等。“从其等”，就是遵循社会结构的规范，“等”，就是社会分裂后所出现的尊卑高下的等级。“修礼以节”，就是用礼节制社会的人的一切行为举止，用以保持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维持社会的秩序。这种状况在晋平公时便明显存在：

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

是以远服而迩不迁。”(《国语·晋语八》)

师旷是当时晋国著名的政治家和音乐家,在列国中也是一位闻名的人物,他对礼乐功能和礼乐关系的论述,在当时具有代表性意义。首先他认为音乐开社会的风气,具有感人心灵的教化功能,反映社会精神风貌,因而受到重视,十分重要。其次,礼乐的关系是礼节制乐,乐必须受礼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的指导,不能偏离礼的规范,而要为礼服务,辅助礼的实施。师旷礼乐文化的言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礼乐文化的本义是祭神祀祖,而这里所展示的是更重视它对社会风尚的影响作用。“新声”的出现,虽然师旷持反对的态度,但说明它的功能已有所变化,逐步由祭祀音乐趋向欣赏性音乐。师旷认为音乐的任何发展,都必须受到礼的节制,这是有道理的,汉唐时期有“文以载道”之说,二者的意思是相通的。二是说明礼乐文化是随同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社会新矛盾的出现,礼乐文化难以维持社会的秩序,社会意识形态就会有新的变化。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反映了礼乐文化的衰落,孔子提出要“克己复礼”,这当然不可能返回到西周时完善了礼制,伦理道德的新规范便会产生。孔子在春秋之末对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晋地,早在西周以来在夏文化的基础上,就有所关注了,并提出一些对礼乐文化补充的观念,用以维系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其中主要的有:

关于忠信的观点。《国语·晋语二》中记载说:“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认定忠信是立国之本,不可或缺。何谓忠信?宫之奇解释说:“除暗以应外谓之忠,定身以行事谓之信。”(同上)祛除自身的愚昧,以应付外界的压力叫做忠,坚持正确的立身之道,以处事待人叫做信。忠信既是立国之本,也是立身之本。晋国大夫荀息又提出“忠贞”,他说:“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无不为,忠也。葬死者,养生者,死人复生不悔,生人不愧,贞也。”(同上)就是说,凡可以有利于国邦,并且竭尽全力以赴者,这就是忠。而贞的含义就是埋葬故世的国君,奉

养继位的国君,这样对死而复生者不会觉得后悔,对生者也不感到有愧。荀息的论述是有所指的,晋献公去世时,晋国政局动荡不安,他企图提倡忠贞之德,用以解决社会新出现的矛盾。与此同时,里克提出义利观,他说:“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国语·晋语一》)里克认为新矛盾集中在义利两个字上,只要正确对待义与利,就可以解决社会危机。他指出义是利的根基,贪利而忘义,就会产生怨恨与不平,废除义就谈不上获得利。他由此警世说,厚贪利,怨恨就产生,这时就如滔滔江河冲决障碍一样,滚滚而奔腾之势是无法阻挡的。晋国在重重的社会矛盾中,提出了忠信、忠贞和义利观,是对礼乐文化的一种重大补充,是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想,且比孔孟提倡要早,说明晋国社会矛盾深刻得多。

重教思想的兴起。晋地重视教化的目的,着意于解决社会的重重危机。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时,晋哀侯的大夫共叔成就曾说:

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国语·晋语一》)

这里一面指出要重视君臣、父子的周礼,一面要重师道,这与后来形成的重视天地君亲师的传统是一致的。还强调了重视师道,重视师长的教诲,认识自己家族的创业历史,继承与发扬优良传统,是谋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这说明自古以来华夏族先民就非常重视历史学的原因,并对后世起了极重要的影响。

晋文公重耳与晋卿胥臣论重教时,胥臣对教育的重要性,作出了自己的阐述,他说:“胡为文,益其质。故人生而学,非学不入。”又说:“夫教者,因体能质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叩浦而后大。”(《国语·晋语四》)他认为文化的真正意义在于文教,文教能使本质更加美好,所以人生在世,就得受教育,认真学习,以使沿着人生正道前进。教育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进行教育,就是根据受教育者内在的性

能和本质等具体特性,加以因势利导,讲求实效,就像河流有它的源头,迎它到江河里,让它汇成大流一样,成大器有大为而滚滚向前。

胥臣在论教中重视“益其质”,共叔成在论教中重视“知生之族也”,所述虽各异,但有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很重视文教,他们倡导文教,都是为着提高后代的文化素质,使后生者在社会历史发展变化中,具有认识与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品格,以便他们继往开来,奋勇前进。

晋人论人的品格时,很重视智、仁、勇三者的统一。申生曾说:“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国语·晋语四》)郤至也曾说:“武人不乱,智人不诈,仁人不党。”(《国语·晋语六》)他们二人在论智、仁、勇是优良品格时都有“吾闻之”、“至闻之”的用语,说明此说由来已久。在晋悼公时,已成为卿大夫自律的一个重要标准。如韩献子因年高,晋悼公使穆子接替,穆子推脱说:“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难;仁不能救,勇不能死。”(《国语·晋语七》)因而固辞不就。又如晋悼公使张孟为晋大夫,他辞曰:“臣不如魏绛。夫绛之智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于刑,其学不废先人之职。若在卿位,外内必平。”(同上)从中可见,智、仁、勇三者统一,成为人的品格的基本条件。至于魏绛其人,确然“多功”,他在和戎狄、修民事、善治军等要事方面,都取得重大功绩。同时晋地对于违背智、仁、勇者被视为一种“大恶”,受到处罚者甚多,说明晋人在人品中重视智、仁、勇已成为一个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一生很注重对智、仁、勇三者的学习和践行,他曾对他的学生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孔子在他学生面前,坦诚说明他没有做到智、仁、勇三者,一方面表现出他谦逊的品格,一方面意在教育他的门徒对此应给以重视。子贡认为,孔子对智、仁、勇三者的论述,正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他就是智、仁、勇的体现,并且已经达到圣人的境界。孔子对此否认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

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对于这段话，孟子曾作过说明，他说：“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孔子和他的弟子都非常重视智、仁、勇品格的修养，而且视之为圣人的基本条件，对于这三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应具备的品格，在晋人中，早已有不断的阐述，并作为维系社会的礼乐文化的一种补充。在晋地的社会进步中，一面促进伦理道德的研究，赵衰曾引《礼志》说：“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国语·晋语三》）这种自尊自立与尊重他人的观点，显然含有人性自由的可贵因素；一面又在寻求公正的社会法则，因此，导致晋地最早地出现了法治主张的法家思想。在晋地保存着我国最早的十分丰富的德治和法治并重的思想资料，这是应该重视的。

第二节 “百家异说”时的三晋文化

荀子在描绘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曾说：“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荀子·解蔽》）荀子所言概括了这一时期和而不同的概况。

这时三晋地域中有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思想的传播，学坛十分活跃，他们或深论哲理，求索天人之道；或注重于人伦，而归于天下之一法；或探究争霸之术，以定存亡之道；或明于名实之辨，求得是非之别；或致兵家之道，阐释奇正之变。这种争鸣学风，使晋地思想文化得到升华，对促进古代中国文化的交融与整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因事制法”的法制观

晋国建国后逐步形成了“观事而制礼，因事而制法”的传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如李离、魏绛等法家的先驱者。李离是晋文公时的法吏，他因“过听杀人”，便自己给自己量刑，治自己死罪。对此，晋文公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史记·循吏列传》）认为这个过错，不仅下吏有过，“寡人亦有罪邪”，不能完全算在李离身上。李离不听从晋文公的劝解，他说：“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当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史记·循吏列传》）遂不听命，伏剑而死。李离这种执法如山的原则精神，表现晋国法制严明，千古以来令后人感动与敬仰。魏绛也是一位执法严明的法吏，也给后人留下美名。晋悼公四年（前570年），晋侯与诸侯会盟之际，晋国是盟主，晋悼公欲显示晋国的实力，借以夸耀个人的权势和地位。然晋悼公之弟杨干却严重破坏了仪卫军队列秩序，在列国诸侯面前造成不良的影响。魏绛为了维护晋国尊严与法制，将杨干的驾车者立即处死。晋悼公得悉后，对羊舌赤愤怒地说：“合诸侯，以为荣也。杨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春秋左传注·襄公三年》）羊舌赤对晋悼公说，魏绛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会来向你禀报的。果然魏绛至，他将报告书交给仆臣转呈悼公，在报告中说明，军旅以法为重，方能显示军威，宁死不犯，才可敬肃军法，为了严明军纪，只有忠于职守。同时又自责说，他未先训示于众，便用钺刑，故而有过失之罪，请给以法办。魏绛的严肃法纪精神，使晋悼公很受感动，他从内室中赤着脚急促出迎魏绛，并说：“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敢以为请。”（同上）从盟会归国，晋悼公在太庙中隆重“礼食”魏绛，并命他担任新军

副帅职务。此事在《左传》、《晋语》等史籍中均有记载,说明晋国君卿之间重视法制的严肃精神。

晋国的法度是随着晋地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就其性质而言,在晋顷公以前(约前 530 年),是以礼治为主、礼法并用的法制,如公元前 633 年,晋文公制定执秩之法,亦称被庐之法,《晋语》中记载说,晋文公变法以礼治为主、礼法并用。晋顷公十三年(前 513 年)时,晋国将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刑鼎上时,标志着晋国由礼治为主转向以法制为主,这是法制思想的历史性转变。对此孔子持反对态度,他说: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九年》)

郑国铸刑鼎虽然早于晋国 23 年,但由于两国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两国的法律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制度是秦汉实行中央集权制的范例,秦统一六国后采用的就是这种统治制度。晋国法典成为韩、赵、魏三国制定新法的依本,三晋大地成为法家名人之乡,李悝、慎到、吴起、商鞅、韩非等人就是在这里接受了法制思想而成长起来,并形成百家争鸣中的法家这一重要学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悝。

李悝又名李克,魏国魏文侯之相,《说苑·臣术》中说:“进李克而魏国大治。”《史记·平准书》中说:“魏用李克尽地力。”《汉书·艺文志》中说:“李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从中可见李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才能,对魏国的一度强盛作过重要贡献。李悝一生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著有《法经》,二是在法治方面的显赫政

绩。李悝主张以法治国。魏文侯问治国之道,《说苑·治理》中记载说李悝概括了两条:一是“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二是“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李悝主张以劳得食,以功授禄,以能得赏。这样便否定了世卿世禄的旧制,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招徕了各种有用人才。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论此举是“开后世布衣将相之局”。荀子在《议兵》中说:“魏国之武卒,以度取之。”李悝改革兵制,军旅成员入伍,由报考者通过制式、体能和军事技术的测试决定。选中者享受免赋、土地和住宅等方面的优惠。成绩优异者,直接任命为将。士卒根据军功提升。李悝的变法,促进了魏国社会的发展,“富国强兵”,使魏国成一代之盛。李悝还将改革的成就进行总结,写成《法经》一书,公布执行。《法经》共六章,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其中主要的内容是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镇压社会的破坏活动,惩处破坏国家法令和军队建设的言行,打击贪污赌博等行为。李悝《法经》思想影响很大,“商君受之以相秦”,商鞅制定的《秦律》就是在《法经》基础上形成的。“法家源自三晋,成就于秦”^①。《晋书·刑法志》中说:“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这个说法符合史实。说明秦统一六国与在三晋形成的法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法学史而言,《法经》是我国古代传统法学的奠基之作,他在法制史上有开创之功,因此日益受到重视。

二、儒法并重的三晋儒学

受业于孔子门下的弟子三千余人,优秀的学者,孔子说 77 人,孔庙图作 72 人。孔子称这些学生是“受业而身通者”(《论语·先进》)。司马迁又说是“皆异能之士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夏作为

^①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5 页。

三晋籍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子夏在孔子辞世后返回三晋,从事于儒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创立了具有三晋思想特征的儒学,推进了对儒学研究的新境界。

对古学的总结研究。子夏对文献典籍深有研究。孔子曾将学问分为德行、政事、言语和文学四科。子夏属于在文学方面最为优异者之一,他对五经都深有研究。他在其师门下时,就有明显的表现: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子夏向他的老师请教《诗经》中《硕人》这首诗的意义时,师生由诗论审美的标准,论及美与礼乐仁义的关系。孔子从中认为子夏已对诗词深有理解,具有分析鉴赏诗词的基础,可以“言诗”。还说“起予者商也”,卜商的见解对他很有启发,流露出作为其师的得意与喜悦。

子夏对五经的研究,在《说苑·敬慎》中刘向有生动的描述,他说孔子在读《易经》时,就“损益”之意对子夏说:“天之道,成者未赏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孔子认为《易》中所说的“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蕴藏着深刻的哲理,并形象地阐述道:“持满之道,抑而损之。”就是“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孔子教导子夏、子路持损益之道,就在于“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之理的辩证思维方法,子夏对此深有领会地说:“善!请终身诵之。”师生如此深入论学,堪称为古代教与学、师与生之间的范例。子夏对于《易》的主体思想中阴阳之道的理解,不仅如孔子所要求的那样识其表,且识其里。

子夏对《春秋》有着自己独特的领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俞序》中说,子夏有“《春秋》重人”的见解;韩非说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矣,有渐而至矣。”

(《韩非子·外储说》)说明子夏对这部经典理解甚深,故而司马迁谈到孔子作《春秋》时写道:“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还说:

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记》,著在《记志》。而此史并不论,空记《论语》小事,亦其疏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司马贞认为子夏对儒家尊奉的五经,有着深入研究和发明,在传授方面也起过重要作用。对于这一点,汉唐时期学者多从儒学师承传统寻求线索,对子夏在这方面的贡献多持肯定的态度,汉代学者尤为如此。近代有些学者,或认为论据不足。不管如何,子夏与儒家经典的密切联系,他对这些经典的阐释,其影响的存在是无疑的,说明后人对五经的重视与子夏有着联系。

子夏的重要观点。子夏有影响的思想观点甚多,这里择其几则并加以说明。

四海之内皆为兄弟的观点。子夏的同学司马牛和他讨论人生观时,子夏说: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

子夏认为人生受命运决定,死生、富贵这些人生中重大问题都受自然法则支配。但人生在世都应有自己的奉献,应有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并尊重他人的恭谨风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这样人间便充满了爱,天下便有如兄弟一般的手足亲情,社会便会和谐。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教,贯穿着儒家仁爱的社会理想,同《礼运》中的“小康”和“大同”理想完全一致。子夏的这个观点,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发挥。

大道小道辩证统一的观点。子夏论学有两层含义,一是注重经典之学,对六经有原则性的领悟与发挥,这是大道;二是注重小道,小道

就是六艺之学,用世技能中有种种小道。子夏重视小道的思想倾向,他就学时孔子便有觉察,曾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八佾》)教导他重视大道,子夏很重视这一点,但他更注重的是大道与小道的统一。子夏重视小道,认为小道是大道的应用,也是由具体到抽象的通途。他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说明社会各种劳动生产,都与道相通,研究这些小道是可以获得大道的。因此他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同上)。离开小道而空疏泛论,是无以为道的。因此他重视两者的协调与辩证统一的研究与运用。在这方面他作了分析,首先他指出识小道是不易的:“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说明小道处于动态之中,日新月异,必须不断学习,求得进步。其次他还指出小道不是认识的终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同上)。“仕”字,许慎在《说文》中说是“学也”。子夏赋予仕双层意义,一是为官,二是学。论者认为从子夏开始,仕单从为官不为学,实际不完全是这样的。子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官者由于他用心在实践中学习,因而取得优异的成绩,但不要停止不前,还需要再学习;学习中由小道达于大道,摆脱了小道的局限,向更高的理论思维发展,这时便可以继续为仕了。可见子夏所说的学与仕的关系,是大道与小道关系的形象说法,就认识论而言,是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含有深刻的哲理和合理意义。就从“学而优则仕”的浅显意义而言,对古代中国社会官吏制度也起过重要的影响。在晋国时代就有唯才是用的传统,子夏此言显然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并成为法家法治方面的一个重要依据,秦汉以来也一直起着实际作用,成为传统文化一个精采的内容。

子夏之学的影响。子夏学有两方面的影响,即在国内与三晋的影响。在国内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是孔子的大弟子,因此,他的言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他的对六经的阐释,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学

而优则仕”的观点，已成为家喻户晓、代代相传的观念，对丰富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一直起着有益的作用。汉代的韩婴曾有一条记载说：“哀公问于子夏曰：必学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然后他列举了黄帝、颡顛、帝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以及他的老师孔子等，都曾得益于老师的教诲。他们如果不受老师的启迪，“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韩诗外传》卷五）。子夏视大道小道辩证统一之学之道，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三晋地域，子夏之学也起了巨大影响。孔子去世之后，子夏回到三晋，在西河郡（今汾阳县）设坛授业，“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之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史记·儒林列传》）子夏在晋地传播儒学，引起上层注意，特别是引起魏文侯的重视，在《史记》、在其他史籍中，多次记述魏文侯拜子夏为师，请教经艺和礼乐文化的故事，使晋地文化更明显的向夏周文化方面融合，就魏文侯思想而言，他的思想更体现了法儒思想融合的实质。他说：“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说苑·政理》）这种注重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的思维方法，体现了晋地的务实学风。魏文侯运用这种思维方法进行社会改革，取得显著进步。他还说：“夫物多相类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黧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类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战国策·魏策》）这段富有哲理的生动文字，说明幼小的莠草像禾苗，黑黄色的牛像虎，死者的骨质像象牙，一种碱石像玉石，所以物以类聚，还得深察，说明确认事物的实质，是认识的最根本的目的。魏文侯的这些观点，体现了子夏之学的主要方面。子夏在三晋传播儒学，形成了儒法并重的三晋儒学，重传统是一大特点，并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基础上，使三晋文化成一代之盛，其贵创与务实的学风，推进了晋地社会的发展。汉代行王道霸道并用而治的主张，这实际上开创于魏文侯时代，对此，司马迁已有所洞察。这与子夏所传

播的儒法并用的三晋儒学思想,显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由此说明子夏之学影响之大了。

三、重整体观的三晋兵家思想文化

在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处在秦、楚、齐大国中间地带,形势严峻。因此三晋各国,特别是魏国,为了生存与发展,一面注重加强综合实力,进行社会改革;一面很重视兵学研究。因此在军事学方面很有成就,在宋代对古代兵书作了学术上的比较研究,确认在宋代以前有七部兵书具有最高的学术水平,统一编辑整理为《武经七书》,颁布于武学即最高军事学院,规定为将校必读的著作,以后一直成为兵家和哲人所重的著作,影响持久而广泛,至今仍受学界重视。其中《吴子》和《尉缭子》两书,都被收入在七部武经之中。《吴子》一书今有英、日、法、俄等文字的译本,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受到国外军事学界的重视。

《吴子》是吴起的军事著作。吴起不是三晋人,但他是子夏的学生,他的兵书又是以魏国的社会背景和军事形势为基础写成的。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吴起是子夏的学生,郭沫若认为此说是可能的^①。在《史记》中,吴起与孙子合列在一传中,司马迁认为他们的军事思想可相媲美。吴起前在鲁国,后在楚国,但他最辉煌时期是在魏国。他由鲁国来到魏国时,适逢具有雄才大略的魏文侯当政,李悝认为吴起虽然以往名声欠佳,但在用兵上就是著名的兵家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于是吴起被魏文侯任命为将军,并为西河郡守。此时,子夏在这里教书,由此吴起遂奉子夏为师,这些条件为吴起在魏国显赫一时提供了机遇。

^① 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

在魏国,吴起思想上逐步成熟起来,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军事方面,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军事上卓著的成就,除了成功的军事实践外,他在军队改制和军事理论两个方面,都有建树。吴起在兵制改革方面,就是建立职业化的“武卒”制,武卒经过应征、选拔,然后用国家税收资金,训练装备精良的常备军,同时给中选的士兵家属以种种优抚,武卒自然战斗力很强。魏惠王时其将军公叔痤曾说:“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战国策·魏策》)吴起“余教”一说,《荀子·议兵》和《汉书·刑法志》中都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的军事制度改革,较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更具深远意义。郭沫若在《青铜时代·述吴起》和《十批判书·前期法家的批判》中,认为这是我国军事史上征兵制的初创,一向受到兵家的重视。吴起在军事理论方面,就是创立整体军事论的思想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有两个层次的区分,一个是“图国”,一个是“料敌”。在图国中吴起集中论述了文德与武备的辩证统一,他认为在战国时代一个国能自立于列国之中,仅有文德或武备一个方面是不成的,只有在文治武备兼有的情况下进行正义的战争,顺乎天理,合乎人情,才能取胜。在料敌中吴起集中论述了敌我双方的辩证统一,我方应根据敌方的军备形势进行充分的备战,战略战术的制定,都要从六国军事实际出发。同时,他对六国的军事形势都作出精确的分析,认为一个将校,必须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与素养,不能只具有单纯的军事观点,要作好应付万变的思想与实际的准备。他特别指出任何一个具体战役,都要从六国军事形势基础考虑与制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保存自己、打败敌人的结果。吴起的军事理论,是古代中国整体系统思维方法的具体表现。

吴起在魏,对周边六国构成很大的威势,引起他们的不安。六国终于离间了魏王与吴起的密切关系,不得已吴起逃楚。吴起在楚被杀后,魏国军民缅怀不已。魏王也“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战国

策·魏策》)。韩非也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说明吴起军事理论的影响之大。《尉繚子》这部著名兵书的问世，就是在这种重视军事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尉繚子》有两个主要贡献，一是对《吴子》军事整体理论的补充与发展，二是对制定军令条例的建设有独特贡献。《尉繚子》与《吴子》在行文体例上是完全一致的。吴起的兵书是以他与魏文侯问答形式展开，尉繚的兵书也是以他与魏惠王问答形式展开。就内容而言，都是从魏国整体中研究军事战争问题的。史家对此也有中肯的评论说：

其书大旨主于分本末，别宾主，明赏罚，所言往往合于正。如云：“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九）

这段对尉繚兵书的概括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认为尉繚的兵书，是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战争，从宏观论述军事，从整体中探讨军事，这一点与吴起的兵书一致；二是对战争性质的分析。对此，孟子、墨子都曾有精辟的论述，但具体从军事学角度作出分析，尉繚虽然具有儒墨的思想因素，但仍有自己的特点；三是他将军事学贯彻在法家思想之中，同社会的改革与社会的经济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尉繚兵书充分体现出法儒共生合一，与吴起兵书的志趣十分一致。二是尉繚制定了军事管理系统的律令，制定了古代军旅在队列、内务、纪律和作战等方面的具体条令，对军队组织训练起了重要作用，在军事史上是一大发展。他说：“出卒陈兵有常令，行伍疏数（读 cù，密）有常法，先后之次有适宜。”（《尉繚子·兵令上》）说明军人出兵列阵有一般法则，队形疏密有一定的标准，先后次序有适当的规定，一切军事都纳入系统的规范之中。这样便可做到“发出号令，信行国内”（《庄子·天

下》),令行禁止。尉繚论制,严格条令,显然是对吴起兵书的补充,形成三晋兵书兵学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征。

四、“天行有常”的哲学宇宙观

在战国百家争鸣时代,理论思维有较大发展,三晋也涌现出众多哲学家,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尸佼和荀况。尸佼是晋地曲沃人,魏惠王时不见用而至秦国,成为商鞅变法的决策者之一,商鞅失败后,他潜逃到蜀地著书立说。荀况是晋国先轸即孙轸之后,是古晋地荀国的后裔,他深受三晋文化熏陶,曾游齐、楚等国,在学术交流中成为大家。尸子在政绩方面曾有光辉的记载,荀子被誉为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尸子成就于西秦,荀子成就于东齐。尽管他们之学各异,但都具有三晋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他们对宇宙观的探讨,综合儒法思想的研究以及务实与开拓奋进的思考,却是基本上一致的,他们的哲学宇宙观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对宇宙观的探讨。先秦对于宇宙观的探讨逐步深入,老子的道说,标志着宇宙论的形成。惠施有“至大无外,谓之大一”(《庄子·天下》)的命题,用“大一”界定宇宙;后期墨家有“久”“宇”的范畴,“久,弥异时也”,“合古今旦暮”;“宇,弥异所也”,“蒙东西南北”(《墨子·经说上》)。这些论述,均不及尸佼的精彩,尸佼提出宇宙的范畴,并对其内涵给以明确的界定,他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卷下)说明时空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是事物的根本属性,一切物质世界都是在时空中运动着。“人待义而生”,说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同,因为它具有社会属性。尸佼对宇宙观的论述具有开创意义,关于“宇宙”的观念至今仍被不断丰富着与沿用着。荀子对于宇宙观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释天上。他认为天是自然界而非上帝。他在《天论》中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天地都是遵循着自身运动规律

发展,规定了它们的物质性、客观性和可变性。他在《礼论》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自然之变,阴阳之化,是产生万物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在《天论》中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性,绝不受人的主观意愿主宰和决定。但是,人在客观规律面前还是有作为的,“制天命而用之”,人只要认识了客观规律,便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才智,使自然为人类服务,造福人类,促进社会的发展。尸子的宇宙论,荀子的天论,是先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概括,是中华民族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飞跃,在文化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儒法并重与融合的观点。东周以来三晋文化向儒法并重方向发展,尸子和荀子都具有这种学术品格的特征。尸子用“从道必吉”的命题来阐述这一观点,他在《贵言》中说:“益天下,以财为仁;劳天下,以力为义。”仁义与创造财富完全一致,义利是统一的。这一见解显然是儒法合一共生的观点。他还说:“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尸子》卷下)并在《明贵》中形象地说:“民者,水也。”这些观点,同孟子“民为贵”和老子“上善若水”的观点完全一致,这里又显示出儒道合一的气象,但尸子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儒法并重,主张德治法治并用,以德柔民,以法范民,以求“保民而王”的实现。荀子在这方面也是十分明显的,他提出“隆礼重法”的观点,他在《成相》中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他指出社会不断产生种种矛盾,治理和解决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仅用礼治难以禁绝奸邪,仅用法治难以得人心。因此,他主张用礼乐、仁义的方法,化恶为善,使人适合社会的规范;用法制,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对违法者依法惩处,保证社会安定。因此他在《君道》中说:“隆礼至治则国有常。”说明突出德治和法治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方法。

尸佼的观点来自于他助商鞅变法的体会,他在总结其变法得失中,已深感到仅用法制治国是难以为继的。荀况的隆礼重法的观点,

对后世影响很大,系统论述王道霸道并重、内圣外王之教者是荀子,他的这一思想观点,在长期的古代社会中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

务实学风的升华。晋地自晋建国以来,务实、注重实用是一个传统,因此晋地思想产生了与唯物论、法制思想与名实论等联系在一起的学术特点。尸佼与荀况,将这种务实的学风与积极进取的精神结合起来,从理论思维的角度进行了概括,从而推进了这种有益于思维方法和社会进步的发展。尸佼这样说:

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覈名,百事皆成;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履实,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复本原始,则言若符节。(《尸子·分》)

尸佼认为实是客观存在,它处在不断变化中,因此对实的认识,必须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才能得到相对的正确结论。这样便可以得到名实、言实相符的认识。对此,荀子也认为关键是一个解蔽的问题。他在《解蔽》中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治则复经,两疑则惑矣。”他认为认识事物的实质,往往受到一些认识中必不可免的局限,因此得到“一曲”,即得片面的认识,只得到事物部分属性的认识,而不能“大理”即全面的实质的认识,只有解蔽,即克服在认识上的障碍,才能“复经”,即得到对事物实质性的认识。荀子从人类认识上的局限性,说明解蔽的必要性,务实必须同“若化”结合,开拓必须同事物规律性联系,因此他们都认为务实与开拓,必须是在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方法指导下才能做到,这就是尸子“不蔽”与荀子“解蔽”的真义所在,从而将三晋务实学风与开拓精神,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百家争鸣中,晋地有儒法道等家相互融合的趋势,在战国后期更为明显,《淮南子》中也指出了这种必然性:“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汜论训》)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学派与地域文化的密切联系,各个学派和各个地域文化的同中有异

与异中有同,有机地构成了绚丽纷呈的中华文化。诸子百家,都为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它们确然是围绕着一个“治”而展开的,都在务实中进行开拓着。三晋学者植根于黄河之水,黄土之原,他们铸成的三晋文化,含有芬芳的泥土气息,富有务实特色,具有豪放的气概,以及质朴勤奋的品格,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依然受到国人的重视与研究。

第三节 汉唐时期的三晋思想文化

汉唐时期由于社会历史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所以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尽管新的思潮不断涌现,但基本上是形成以儒学为主、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学术态势。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融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一、霍光的儒法并用思想

秦始皇统一六国,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新时代,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是秦王朝建立不久,就被推翻了。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成为汉代初期议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有论者认为秦王朝得之于法也失之于法。其实这一论点是不全面的,秦侯以法家之法得天下,又以法家之法失天下,这是事实,但由此而批法非韩,是不正确的。对此,贾谊认为秦王在统一六国后,未能及时调整其施政方针是最大的失策。他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贾谊新书·过秦下》)他认为总结秦王朝覆灭的原因,对于汉王朝的巩固与发展是很重要的。说明汉王朝建立

以后,必须及时调整统治思想及政策,只有因时而变,才能长治久安。西汉初行黄老无为而治,道家学说成一时之盛,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实际上基本上是儒法并用。汉宣帝刘询教诲其子刘奭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汉元帝刘奭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认为其父皇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故而刘询阐述了汉王朝进行统治的基本国策。其实汉初的统治思想,在尸子、荀子的思想中便已形成。荀子曾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霸王道杂之”的思想,就是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回归,这是三晋思想自晋国以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观点。这一点在汉代三晋籍的政治家霍光的活动中可得到印证。

霍光是西汉时有名的政治家,他在汉武帝执政时登上政治舞台,先后达50年之久,做出许多关系汉王朝存亡的大事,现列举其要:其一,汉武帝执政时多次反击匈奴入掠中原,具体组织者就是霍光,他制定以守为攻战略,每战务求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由于策略正确,基本上保持了边境的安宁。遵循武帝“有功乃得封侯”的训令,赏罚一贯严明,提高了军威。在他辅政期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商路,这条丝绸之路,对中外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有益的重大意义,至今仍为中外学界所重视。其二,辅佐幼主,匡正汉室。汉武帝临终前,霍光受遗诏辅佐幼主,“帝年仅八岁,政事一决于光”(《汉书·霍光传》)。他在这个期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粉碎了桑弘羊等与燕王刘旦谋反的政变;二是由于汉昭帝的早逝,迎昌邑王刘贺为帝,但此人行为昏乱,霍光在昌邑王即位后,发现此情,恐危及社稷,当机立断,决定更立武帝曾孙刘询为帝,这就是汉宣帝。宣帝即位时年仅十七岁,后独立执政,行“霸王道”并举的政策,这与霍光深有关系。霍光在维护汉王室统治中,避免了上层的分裂与纷争的发生,这是很不易的。其三,调整政策,缓和矛盾,“而免亡秦之祸”。汉武帝末年,由于外事师旅之累,海内耗虚,户口减半,班固和司

马光在史书上著言曰，王朝已在崩溃的边缘。班固说：“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汉书·昭帝纪》）在这期间霍光还大胆地调整了盐铁酒榷的政策，举行了有名的“盐铁论”会议。在汉武帝时，由于反击匈奴战争的需要，实行了盐铁等官营的经济政策，既稳定了社会，又增加了赋税，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在汉武帝去世后，如果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就会一面形成大官僚与大商人的结党营私，鲸吞社会财富，一面严重侵犯中下层的经济利益，形成“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盐铁论·本议》）的严峻形势。霍光在武帝逝世后不久，敢于正视这一现实，精心组织盐铁会议，通过政府与民间代表长达半年的对话议论，最终修改了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既定政策，剥夺了官商权贵垄断权利，满足了中下层解除疾苦的要求。霍光这一重大决策，修改的是武帝的政策，触犯的是当朝权贵的利益，又需要丰富的管理经济的知识，可想而知难度是很大的，但他还是做到了。新政策稳定了社会的经济秩序，促进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对汉王朝的巩固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司马光对霍光的历史作用曾给予高度评价：“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于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资治通鉴》卷三〇）司马光认为，这时的汉王室之所以“免亡秦之祸”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汉武帝“晚而改过”。他接受了霍光的忠直谏言，积极寻求巩固上层的良策，同时减轻赋役，与民休息，采取了稳定上层和社会的积极措施。二是“顾托得人”。霍光在辅佐幼主期间，继续执行了汉武帝晚年所改的政策，很快达到“稍复文景之业”（同上）的境况。司马光时隔千年后发此议论，理智而公允，符合历史实际，也很有启迪意义。

霍光在辅政的二十余年中,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得到明显进步,这已成为历史定论。霍光儒法并用的思想对汉宣帝刘询深有影响,刘询在霍光去世后,发展了这一思想,社会大治,班固评“可谓中兴”。但刘询之子刘奭继位,是为元帝。刘奭没有能够注重法儒并治的传统,他少而好儒,在位征用儒生为政,故“孝宣之业衰焉”(《汉书·元帝纪》),说明霍光德治法治并用的重要性。

二、玄学时代的三晋思想文化

汉学在东汉末期已不适应社会的要求,冲破经学的束缚,已成为必然趋势,玄学作为一个新思潮,就是在这种思维逻辑发展趋势中产生的。玄学以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三玄为本,玄学家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籍,形成一个非儒非道、似儒似道的玄学时代,这种对时代精神的新审视,是一种思想的解放。综观这种发展,经历了贵无、崇有和有无综合三个阶段,在这个逻辑演化过程中,三晋思想家裴徽、裴颢、孙盛和鲁胜等人,在学坛都有惊人之举,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

贵无论是由何晏、王弼创立的。他们用易老之学通释《论语》,实质上掀起了一个由训诂向义理的流变,玄学与汉学比较,其新意主要就表现在这里。“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这个以无为本的观点,标志着由汉学到玄学的转化,集中体现在由自然的拟人化转向由人的拟自然化,以及由道名分转向了道阴阳。一代名士,都卷入到这个清谈的玄风之中。从裴徽与管辂的议论中,可以窥察时人的心态。管对裴说,以无为本之学,形象地说似一盆水,所见者清,所不见者浊;如欲求一山形,形

不可得,智便由此而发生困惑。所以管辂认为他们“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华而道浮,伪则神虚”(《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注引)。裴徽同意管辂的见解,并说:“诚如来论。吾数与平叔(即何晏)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又时人吸习,皆归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见得清言,然后灼灼耳。”(同上)这里说明以无为本之说,巧而多华,华则道浮,美而多伪,伪则神虚,巧华是褒,浮虚是贬。对于名教出于自然、人拟天化的论点,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对以无兼有即以无统率众有表示了极大的困惑和不解。这揭示了贵无向崇有的转化。裴徽的后代裴颢就是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

裴颢之父裴秀,叔祖就是裴徽。史书记载说:“秀少好学,有风操,八岁能属文。叔父徽有盛名,宾客甚众。秀年十余岁,有诣徽者,出则过秀。语之为后进领袖。”(《晋书·裴秀传》)裴秀虽深悉玄学之理,但其所好却是地理学,他的《禹贡地域图序》遗作,受到当代学坛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集古来制图经验之大成,于是地图之学,遂有理论上之准绳”^①。李约瑟更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之父”。并说:“在中世纪这整整一千年中,当欧洲人对科学的制图学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中国人却正在稳步地发展着他们自己的制图传统,这是一种虽然并非严格按照天文图的原则,但力求尽可能做到定量和精确的制图原则。”^②这体现了从裴潜以来裴氏家族重实际重科学的遗风,对裴颢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裴颢提出崇有论有两点重要思想,一是他认为宇宙是由具体事物的存在而构成,每一事物的功能都有独特的性质,都有一偏,不能兼有它事物的功能,但就客观全体而言,“总混群本,宗极之道”(《广弘明集·老聃非大圣论》),却非偏,而是全。这个总混的全,是一般

①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37页。

② 《中国科学技术史》五卷一分册,第65、66页。

与个别的结合,也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从而否定了王弼对无的一般与个别关系的错误论断。在人生观上裴颢指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不能成立。

王弼等人企图将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结合起来,认为名教和自然一样,是有它自己的本来面貌的,如果两者结合,可以重新整合社会秩序。但在现实社会中,名教作为名分、尊卑的社会规范,与自然面貌是不能一致的,因此嵇康等反对两者结合,主张废除名教,崇尚自然。王弼的名教自然说立论就动摇了。裴颢主张用崇有论重建名教说,他一面认为社会是由具体人组成,人必有贵贱等级之分,使社会处于有序之中;一面又说明,具体的人自治其事,完成分内的社会职责,但他们都思不出其位,行不越其名分,将有为与无为结合起来,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任何社会历史现实,都必然需要规范与制约,没有“名教”的想法显然不现实,所以裴颢反对越名教的观点,自有其积极意义。

贵无说思辨性丰富,对思维起了激活作用,崇有论务实性强,体现了传统哲学重致用的特征,但两者都有缺陷的一面,于是综合有无说便应运而生,孙盛等就是这一学说的重要成员。

孙盛是晋地平遥人,以“善玄言”著名,他说:“余以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也未为得也。”孙盛认为王弼的以无为本,并非老子之学的根本,老子“或言有物,或言无物”(《晋书·王坦之传》)之道,不仅自相矛盾,使人无法理解,而且王弼的贵无,更不合其本意,应用于探讨社会现实更有不良作用,因此贵无之论难立,贵无之用有害。

崇有论有务实特征,它反对玄学以无为本的虚浮之道,但孙盛认为此论不能达到拨乱反正,而有矫枉过正之嫌。他说:

道之为物,唯恍与惚,因应无方,唯变所适,值澄渟之时,则司契垂拱,遇万动之化,则形体勃兴,是以洞鉴虽同,有无之教异陈,圣致虽一,而称谓之名殊。(《广弘明集》辑《老聃非大圣论》)

孙盛再次申言,老子之道不是以无为本。老子所言有无统一,无中有有,有中有无,在运动之中便显现出来,所以“有无之教”,名殊而为一。对此。裴颀将它们绝对的对立起来,结果“矜其一方”,“不达圆化之道”,虽然他想的是“执今之有”,但得到的是“绝古之风”,失之于有无的辩证统一。孙盛对裴颀崇有论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

孙盛在论述中还有更高的思想意蕴,他认为就学问而言,他们各有不同,但实质却有相同之处,甚至老子之作、老彭之道,“以笼罩乎圣教之内矣”。与孙盛同时代的王坦之,对此更有清楚的见识,他说:“群方所资而莫知谁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贯九流,玄同彼我,万物用之而不既,亶亶(音门,山断水路)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晋书·王坦之传》)孙盛和王坦之等人,不仅在综合有无之道,而且在追求思想方面一种新的融合和创新。虽然从总体而言,郭象是玄学思潮的终结,但孙盛亦占有重要地位。

其实在西晋时的鲁胜,对玄学思潮的发展也作出过重大贡献。鲁胜是晋地代郡即今阳高县人,曾任建康令,对天文学颇有研究,著有《正天论》,后辞职,从事形名学即逻辑学研究,著有《墨辩注》一书,此书已佚,仅留《叙》文一篇。鲁胜在思想史上有两点贡献,一是他认为墨辩是“名本”的观点,这很正确,因为后期墨家在墨子思想基础上著成的《墨辩》确实代表了先秦名学的最高水平。二是在正始玄风中,名士个个能言善辩,口若悬河,注而不竭,或对食泛论,食冷而反复热者凡四,至暮而忘餐,还是言不尽意。魏晋玄风盛行之时,论辩之中确实发生了如荀子所说的以名乱名、以实乱名和以名乱实的困惑,出现了如庄子所说的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的状况。鲁胜注《墨辩》就是由此而引发。他对辨同异、别是非的分析,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提出的。他还指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晋书·鲁胜传》)认为进行论辩,首先应该确立一个共同遵守的原则,就学术而言,这是一种学德,就社会而言,

这是一种准绳。企图以逻辑思维的形式对论辩加以规范,有益于玄学思辨性的正常发展。事实上魏晋玄学就是沿着正、反、合即无、有和有无综合的逻辑程序演化而来,鲁胜虽未论及到这一点,但其意图是清楚的,郭象和孙盛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对此作出总结,完成了这一逻辑轨迹发展的进程,这在学术思想史上很有意义,值得研究和总结。

三、唐代文化与柳宗元的社会、哲学及文学观

唐代是古代中国一个盛世,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儒学、佛学和道家并存的文化形态的形成。由于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彼此间相互渗透与交融,呈现出历史上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造就了一代众多的文化名人,柳宗元就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

柳宗元也称柳河东,因为晋地河东是他的家乡;又称柳柳州,因为这里是他的改革失败被贬谪的地方,他在这里兴利除弊,挥就了千古传颂的诗文,至今仍受到广西和海内外文化界的怀念。他在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由于他的杰出历史贡献所铸造而成的。

柳宗元在社会观方面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他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柳宗元集·送薛存义之任序》)他认为做官者拿着百姓的薪水,是人民雇用的役差,是个“民役”,应该为人民做事,而不是“役民”者,因为人民绝不会花钱供养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因此他主张做官者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为民造福,为官一处,造福于一方。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唐代永贞年间,参加了革新的政治运动,企图解决有碍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改革失败后被贬谪到湖南、广西地区时,他竭尽全力为边疆百姓兴办各种事业。因此,他深得当地人民的爱戴,在

他存世时,百姓就为他建造祠堂。但是唐王朝的统治者拒绝接受他的吏为民役的观点,并且倒行逆施。对此柳宗元警告说,如果颠倒了这种关系将会受到“黜罚”的,唐代后期终于激怒了百姓,爆发了以黄巢为首领的农民起义,历史上著名的李唐王朝随之而倾覆。柳宗元的吏为民役的观点,章士钊在其《柳文指要》中给以积极评论,并概括为“以民为主”的思想,肯定和赞扬了柳宗元思想的进步意义。

柳宗元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元气自动”的观点。战国时的文化巨人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种种关于宇宙观的问题,柳宗元以《天对》为题对这些问题作出精彩的回答,其中提出了精辟的“元气自动”说,他一方面指出客观世界“惟元气存”。天即宇宙,是由元气构成,元气是由阴阳二气相互对立与同一,相互交错,不断运动发展,这种元气的自动,便产生了宇宙万物。他在《非国语》中还说,元气的动静、凝结、流动都是自为的,即都是“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都是“元气自动”的结果,说明整个宇宙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明显猜测到物质运动的根源在于其内在的矛盾性,这是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发展。

柳宗元的元气自动说是在唐代儒释道思想交融中产生的,它与刘禹锡的《天论》中所阐述的“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系统学说,使真理的认识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代表了那个社会的时代精神。柳宗元一方面指出宗教在唐代的盛行与泛滥,是科学文化不足的反映,是社会力量不足的表现,在探索宗教产生原因的同时,揭示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些积极的思想,超越了汉代王充无神论中的宿命论,也超越了南北朝范缜无神论中的偶然论,体现了在社会进步中的思想解放。另一方面柳宗元认为宗教是社会的产物,对宗教不能一概排斥。佛学中“诚有不可斥者”,宗教徒也是可以交往的,以“诸子合观”的思维方法对待佛学,借鉴其一切积极的思想因素。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他提出“文以明道”与“奇味”说相统一的方法论与审美

观。因此，他的文史哲的论文恢宏，文体却各异，在他的笔下，既有如《天对》、《封建论》名篇，又有“黔驴之技”等典故，哲理清言，绘声绘色，想象丰富，韵味醇浓，寓言隽永；他的散文游记，更是笔锋清健，生动逼真，情景交融，富有诗情画意；他的传记题跋，开合驰骋，文笔洗练，多有人间风情和生活气息。因此，他的富有文采的许多精品，成为千古传诵的名作。《旧唐书》称誉他“诚一代之宏才”，是当之无愧的。

柳宗元的身上还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以事业为重，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有“异服同志，异音同叹”的宽广胸怀，这在他与韩愈的交往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宋代欧阳修说：“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欧阳修集·集古录跋尾》）清代章学诚在其《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文中也说：“盖韩柳虽以文章互相推重，其出处固自不同，臭味亦非相契，观二公文集，俱可考见。”这两则韩柳的异同说很有见地，但为何他们“为道不同”而又“世称韩柳”呢？二位大家没有作出具体回答，这是值得细察的。

在唐代宇宙观方面的激烈论战，实质是唯心与唯物、有神与无神论的原则辩论。柳宗元明确阐述了他的唯物论无神论的元气自动说。韩愈则提出“人生由命非由他”的天命论观点。在这个原则问题面前，柳宗元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因为在认识论方面，并非都是非此即彼那样简单。特别在探讨哲学根本问题中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需要分析，因为这种哲学问题争论的焦点，往往最终集中在社会的人事上，集中在对待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上。韩愈的天命论遵循天道，是为着维护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因而坚持反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横；同时也表露了他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还有韩愈积极的辟佛活动，显然也是以对现实社会的危害进行揭露，期望得到社会的关注，有益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柳宗元在这个问题上与韩愈论争时，一面坚持他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立场，一面异中求同，从不同角度为国家

民族作贡献,因而保持了他们的友谊和学术思想方面的交往。柳宗元这种原则观是可取的,也是值得后人总结和借鉴的。

在政治见解方面,韩柳二人对立的立场明显存在。史家论“永贞革新”时,柳宗元是革新派,韩愈则是反对派。柳宗元在革新派中是一个中坚分子,他企图通过革新,加强唐王朝的中央集权。韩愈作为一个反对派,在革新失败后撰写的《顺宗实录》中,对革新运动进行了种种贬斥,将革新派人员的关系,描绘成一个阴谋死党集团,进行了口诛笔伐。在这种情势下,柳宗元仍对韩愈保持了信赖与友谊。因为柳宗元洞察到韩愈虽反对革新,但他的所作所为与自己实际上是殊途而回归,如韩愈不畏强暴,坚决反对某些宦官势力,积极参与了平叛的军事行动,并建立了奇功。这些活动有助于维护中央集权制,有益于振兴唐王室。就是韩愈《实录》中的文字,总的来讲还是慎之而又慎,基本符合他的“文惟其是”的原则。在他看来,既然二人都是以为国为民为根本原则,在表现方式上又何必要强求一致,所以他对韩愈的一些非难得以谅解,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的友谊。

在文学艺术方面,韩柳均为古文运动的名将。韩愈提出“文以载道”,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他们为共同的目标不懈的努力。当韩愈《毛颖传》名篇问世后,受到当朝权贵的多方非难,此时正遭贬谪的柳宗元得悉后,却急起声援,写出《题跋》名篇相呼应,并提出“尽天下之味以足其口”,“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的名句,发展了自己的文艺理论。柳宗元处于逆境之中,对韩愈不计前嫌,仍挺身而出,支持韩愈,并且在理论上相互发明,以求文化事业发展的精神,很令人敬佩。

最为感人的是柳宗元临终前,首先想到的友人就是刘禹锡和韩愈。他给刘禹锡遗书中写道:“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书累故人。”将他的全部遗作交给他。刘禹锡竭心尽力,将其遗作辑《柳河东集》三十卷,并撰写了序言。同时柳宗元将评价他一生的《墓志铭》及归葬等大事,全部嘱托韩愈办理。韩愈时已年过半百,他先后撰写了三篇感人

至深的缅怀之作。在《铭》文中写道：“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一旦临小利益，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少愧矣。”没有切身之感者，实难造出这般精彩的文字。刘禹锡也十分赞赏柳宗元的高尚品格，说他“异服同志，异音同叹”。柳宗元的以事业为重的思想境界，以大局为重的气度，至今仍深深地感染着人们。

第四节 理学与三晋文化

理学在宋明以来成为文化主流，三晋学者为构建和发展这一理论形态，曾经充分发挥过独特的创造精神，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一、理学形成时期的三晋文化

汉唐以来，儒家思想文化影响深刻，但在魏晋以后，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文化形态，说明儒家思想处于衰落之中，复兴儒学便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隋代的三晋学者王通是理学思潮的第一个发端者。王通在隋代曾涉仕途，后回故里晋地河津县设坛授业，曾三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名传天下。王通以复兴孔子之学为己任，时称“王孔子”，后世也有“河东道统”之誉。王通在文化史上有两点重要贡献，这就是“三教可一”和“天人之事”。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的观点，说明他所处的时代佛道日兴，儒学每况愈下，他主张以儒学为主的三教合一说。王通反对儒家历来的“辟异端”的方法，认为应该采用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提供的方法，“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中说·周公》）同样，儒

释道三家也是既“不可废”，又“各有弊”，因此应该行“三教可一”，通过交流，取长补短，使儒学在这种思想文化交融中得以完善和发展。这一思维方法对理学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

王通还提出了“天人之事”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天人关系”说的新论。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否定，他在《立命》中说天统元气，地统元形，人统元识，这里说明天人不存在感应，而是相分的。这种观点是与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观点相一致，也为柳宗元、刘禹锡论天的先声。重要的是王通总结了汉代以来的自然观，且在论“人事”中，体现了重人的能动性的意识，反映了人在自然与社会中的位置得到了提高，是古代社会历史阶段性质变的重要标志。王通的思想是探索新的思维方式的先行思想，理学思维发展，就是沿着这一轨迹进行的。

宋代的孙复是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学问成于晋地的平阳，而张于齐鲁的泰山。宋明学者将孙复、石介和胡瑗并称为理学奠基的三先生。黄宗羲论及孙复时说：“理学虽自伊洛而精，实自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又据《宋史·孙复传》说，石介“以先生事复”，石介是孙复的学生，“瑗治经不如复”，说明宋初三先生中，孙复的影响最显著，对于这一点，北宋的周敦颐、程颢和程颐这些著名的理学家，都是一致公认的。黄宗羲将范纯仁、文彦博均归于泰州学派。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曾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文彦博则是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他们的思想不仅受到孙复的影响，也受到晋地文化的影响，都具有重开拓和重实用的思想特点。孙复、文彦博和司马光对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对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作用。

孙复主张抑黜百家，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鼎立的局面，树立儒家道统说。同时他提倡圣人文化，认为神州之人都应为尧舜。如何通往圣人之途，王通曾提出“正心”的主张。孙复认为正心在于“明内”与

“见外”的教化功夫,他说:“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诸内者也;成之于言者,见诸外者也。明诸内者,故可以适其用,见诸外者,故可以张其教。”(《睢阳子集补》)这里提出内外道心的范畴,成为程朱以理解道,陆王以心解道,张载以气解道的先河;而内外之说,内则内省,以理念制欲念,外则张其教,规范以天命为依据的人伦,使性情通于道心,为天理与人欲的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文彦博指出治道有二,即兴教化、兴儒学和严肃刑法,他说:“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文潞公文集·何以见仲尼之志》)他既重视德治和法治,又重视善教和师兴,认为教育是兴天下的基础,多士则兴,乏士则衰。对此,司马光亦有同感,他说:“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莫如得人优”(《司马文正公文集》卷三四、三五)。他们共论用人之事是至关重要之理,而用人的目的是经世济民,这些观点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三晋文化传统,特别是重德治和法治、重教化和重民生的思想。

这里值得重视的有两点:一是在北宋理学形成时期,三晋学者在理论思维方面,很重视建立以儒学为基础的三教合一,综合性与开拓性结合在一起,少门户之见,多优势互补;同时着重解决社会实际的理论问题,诸如政治、经济和教育等经世致用的思想很丰富。对此,南宋的陈亮、叶适的思想也多继承了这一点。但是此后的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和朱熹,对此有所忽视,他们在理论思维方面更注重其体系的完整性和思辨性,使理论达到了古代最发达的形态;同时由于忽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制约了后儒思想的发展,虽然陆王“心即理”中对此有所补救,但这一缺陷制约了理学文化的发展。另一点是史家将司马光与文彦博等思想家列入反对王安石改革的旧党之列。其实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其实司马光、文彦博的改革主张,更适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而王安石的改革则是脱离实际,并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一点,南宋巽斋学派的开创者、文天祥的老师欧阳守道评论王安石说:“申韩

说的不好,却踏着实地。王介甫说的较好,却踏不着实地。”傅山对这句话很重视,说“此语极有斤两”。傅山认为欧阳守道言之有理,同时他还说:“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必有病根,学者不得容易抹过。”(《霜红龕集·杂记一》)北宋的社会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所谓新旧党不协调则是一个重要因素,致使中原地域纷争不绝,严重阻碍了社会历史进程,这不能责怪王安石,更不能责怪司马光,但这个历史教训是很值得重视与总结的。一个重大的社会改革,必然有多种思路,综合各种思路的优点,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是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理学的要旨从王通开始创设,到北宋初的孙复等已初具形态,后经过二程、朱熹等的努力达到完备的形态,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文化中的主流意识。

二、理学发展中的三晋文化

理学是古代社会晚期的社会意识,就其内容而言,一是它注重义理之学,含有自由思想因素,较汉学而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二是注重思辨之理,多有辩证法因素,形而上学较少。这两个方面都克服或超越了汉学的缺陷,理论思维得到明显的进步。这也就是后人称为的宋学。理学兴起于宋代,在元明清长达六百年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同时它还具有动态特点,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这也是它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理学作为宋代的主要思想理论,它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某些积极因素,较汉学而言具有先进性,但它未能拯救宋王朝覆灭,这说明一个王朝的兴衰和更替,思想理论固然十分重要,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就宋王朝而言,还有同相邻的少数民族的统治集团的关系。宋代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蒙古族统治集团的元朝。在元代,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其主要思想倾向是朱熹、陆九渊思想的合

流。对此,黄宗羲认为朱陆“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其子黄百家对此形象地比喻说:朱陆二人,如同被召入同一房室,其所入之途,虽然分有东西门户之异,至室中则为一也。这个比喻就哲学而言,朱以理为本体,陆以心为本体,确实存在着主客观唯心主义的差别,但他们唯心主义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其实元代的思想家如许衡、刘因、吴澄和郝经等人,并不着眼于朱陆之异,更多的注重于他们的同,因为他们当时生活在辽金元统治的北方地域,他们所关心的是中原古代的传统思想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活动对中华文化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郝经的祖籍是太原的郝乡,后迁晋东南的陵川,故亦称郝陵川。他在元代文化史上贡献甚多,其中会通蒙汉文化和对理学的新阐述等方面值得重视。

郝经出身在一个以教书为业的世家,他的祖先“教授乡里,为一郡望族”(《陵川文集·郝公行状》)。因此,尽管当时天下大乱,金与蒙古集团相继与南宋王朝对峙,他还是受到严格的家教,并受到老师刘祁的教诲而成为一个饱学之士。后来他从事教学活动,受到元好问和赵复等名流的赏识。元好问晋地忻州人,是他祖父郝天挺的弟子,时为北方文坛的领袖人物;赵复原为南宋的名儒,在湖北被蒙军俘获后带往北方,主持书院,遂将南方朱陆理学传播到北方。郝经由于受到元、赵两位北方大家的称赞而名气益重,成为颇受学界瞩目的人物。时值忽必烈思治心切,求贤若渴,“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蕃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史·世祖本纪》)郝经受到推荐,并被忽必烈召见。郝经对忽必烈提出诸如《立国规模》等种种重要条陈,其要旨是儒家的正统说和仁政德治的具体见解,如遵用汉法,创法立制,选贤用能,革除弊政,屯田垦殖,减徭削役,协和上层,仁民爱物等。郝经目睹战乱之苦,期望由乱到治,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同时也贯穿着他的会通蒙汉文化的汉化意图。他的这一观点深受其师刘祁的影响。

刘祁是晋地浑源刘氏望族之后,生逢金末元初,很有学问,但未得展宏图的机遇。他的《辨亡》名篇,分析历朝兴亡得失,深论金王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天下的兴与治,一在得士大夫心,二在变家政。他认为入主中原,必须行中国之法;只有行中国之法,才能入主中原。因此他主张用中国之法取代金国之法,用汉族千余年形成的典章制度,便可建立稳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郝经向忽必烈的陈述,大旨是其师刘祁对金国得失的历史总结,因此受到忽必烈的高度重视。元王朝建立中,凡更张制度,采纳其建议者“约十六、七”(《陵川文集·郝公行状》)。郝经的这些建议,对元王朝的政权建设,无疑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在民族文化交融史上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是大有益处的。

郝经的正统论观念,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郝公行状》记载:“公由弱冠,每以陈寿修《三国志》统纪紊乱,尊魏抑汉,后世不公之甚,他日必当改作。乃闻晦庵先生有《通鉴纲目》,尝语人曰:‘《纲目》虽夺魏统而与汉,然一代完书,终未改正。’公乃创作纪传序志论赞其书。”他的《续后汉书》残缺本保留下来,其宗旨就是尊汉抑魏的正统论,这一观念对元明文化有明显影响,这里略述一二,以作明证。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权威论定,元代戏曲奠基者有四,即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除马致远外其余三人均为晋籍人士。就以关汉卿而言,这位伟大的戏曲大师在[不伏老·黄钟尾]中自我表白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一粒铜豌豆。”他的艺术理论与实践已成为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在他的历史戏中就贯穿着儒家的正统论,其三国戏《单刀会》中,确立汉统刘备的地位,高扬关公的神勇精神,塑造了一位浩然正气的崇高形象,在当时对处于蒙古贵族压迫下的汉族人民,自然是一种极大鼓舞,而对后世造就关公文化,在神州众多地域建立关帝庙祭奠,无疑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影响。明代的太原名士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创作,就是在这种正统论基础上形

成的。而这一文化氛围的营造,与刘祁、郝经的理论思维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同郝经《续后汉书》的立论存在着直接联系,值得文化史论者珍视。

郝经在理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与许衡、刘因等思想家一起,在推崇和传播理学思想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具有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具体而言,他在理气关系与经史关系方面,都有自己的新阐述。

首先,他在论述理气关系时,又提出道或太极的最高范畴。他在论道时说:“道统天地万物之理,气统天地万物之形。道入于气,则理入于形。”(《陵川文集·道》)他在论太极时说,太极是“总天地万物之理”(《陵川文集·太极图说》)。太极或道是一个总的理,它是永恒的超时空的和至善至美的,是宇宙间万善的标准,万物皆有太极或道之理,一切人与物,都是它的体现。就理气关系而言,两者各有所属,也各有所司;就它们的功用而言,为大者是理,就其先后而言,理先而气后,有理而后有气。可见,郝经的理气观有理本论倾向,他同时又认为理气同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又具有二元论因素。从中可见,郝经的理学思想中,综合了周敦颐、二程、邵雍和朱熹等主要思想,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

其次,郝经在经史关系上提出“古无经史之分”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他曾说:“孔子定六经而经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至司马迁父子为《史记》,而经史始分矣。”(《陵川文集·经史》)因此,他认为研究经与史应该并行互补,若“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陵川文集·经史》)郝经对经史关系说的观点,在学术史上有重大影响,他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元代中期著名思想家刘因说:“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

(《静修先生集·叙学》)刘因古无经史之分和经皆史的观点,与郝经的经史论实为一脉相承。这一观点对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王夫之、章学诚显然也是有影响的。这种思想在儒家经典备受尊崇时,无疑起到一种冲击作用,有利于在一定范围内思想的自由发展,它不仅对历史学的研究,而且对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元代理学具有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并存的特征,这是朱陆合流的表现,这种学术态势和发展趋势,直接影响了明代理论思维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明代的曹端、薛瑄对理学的恢复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黄宗羲曾说:“愚谓方正学而后,斯道之绝而复续者,实赖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闻先生之风而起者。”(《明儒学案·曹月川端》)黄宗羲指出明代理学兴于方孝孺,后续者是曹端和薛瑄。曹端祖籍豫地渑池,后徙于晋地曲沃等县从事教学与研究活动;薛瑄是河东河津人,曾数度设坛教学,他不仅是政界要人,也是学界名人。薛瑄之学在理学发展史上有两点重要贡献,一是“以复性为宗”(《明儒学案·文清薛敬轩先生》)的观点。对此,近人容肇祖说:“以为学问在心性上用功,本来程颐、朱熹以来有用敬、致知两条路,到薛瑄就把这两条路归并成复性的一条路了。”^① 其实薛瑄的复性说,倡主敬是对心本论的发展,在明代中叶产生过重大影响,王阳明的心学就是沿着这条思路发展而来。二是“理气无缝隙”的观点。他说:“理气二者盖无须臾之相离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后哉!”(《明史·薛瑄传》)薛瑄的这一观点得到罗钦舜的赞同,他在《困学记》中说:“其言当矣!”同时又批评说:“盖文清之于理气,亦始终认为二物,故其言未免时有窒碍也。”认为薛瑄在弥补朱熹理气论的漏洞时,又留下漏洞,罗钦舜可能就是从这个缝隙中走了出来,建立了唯物论的理气观。从中可见,薛瑄之学并非如黄宗羲所言的恪守宋人不前,相反,他对程朱理学多有开创性倾

^① 《明代思想史·明初的理学》,齐鲁书社1992年版。

向,对明代中期以来的学界多有启迪意义,并使理学的发展走向深有影响的阳明学阶段,也使理学中唯物论思想得到了一定的加强,无疑对活跃学坛起了积极作用。

三、理学终结时期的三晋思想文化

明代理学的发展,走向自我否定阶段。一方面由于一些学者追求躬行践履之学,在客观上促进自然科学的兴盛,所以在明代中叶,总结经验科学的巨著相继问世,涌现出一批著名的科学家。这种学术界的盛况,既是市民经济发展的反映,又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时期的要求,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也是对空谈心性的明代理学的一种否定。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学者追求主静求事功之学,注重于身心修养功夫,在客观上由于重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引发了学子追求自由思想一途,人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意识兴起,促进沉寂的文坛活跃和繁荣起来,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古典名著,大多成就于这个时期,一个早期的启蒙思潮,就从这里起步。明初以来黄宗羲所说的“述朱期”难以持续,这时的理学仅是官方的理学了。史家论曰:“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虽数申诡异险僻之禁,势重难返,卒不能从。”(《明史·选举志》)学子冲出理学禁锢的樊篱,掀起一个对传统思想文化总结思潮,理学实际上已面临终结的境地。虽然明清两王朝仍坚持理学为官学的地位,但明清之际已不复存在,“势重难返,卒不能从”,行政干预已不能奏效,最后只得走向“乾嘉学”之途。明清之际的总结批判思潮,虽然感性多于理性,但其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在思想文化史上是罕见的,给近代以来的学者留下不断思考的课题。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这个时期对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全面总结的丰硕成果,值得继续研究和借鉴;二是明清之际新思潮,尽管其形式陈旧,但内容却有新义,它含有近代科学思想文化的蕴义,可

以视为古代思想与理学的终结,也可以视为近代思想的起点。对此,可从当时三晋思想中得到广泛的印证和说明。

明清之际的新思潮中,三晋学者作出了重大贡献,概括而言具有总结性、批判性和开创性三个方面的特点。总结性包容着整个古代传统思想,他们对传统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非常重视先秦诸子之学。傅山提出“餐采说”,他提倡要博采历代各家之长,反对泥古不化和依傍的形式化学风,提倡从中汲取精义,首先要打破经学的神圣地位,恢复经子平等的学术局面,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同时他们对古代著名著作进行认真校勘,广征博引,具体地历史地理解阐述古学,涤除后儒的云雾空谈。傅山和戴廷枏对数十种著作进行了批注和校改,并付梓刊行。傅山对先秦诸子书进行了批注,仅《荀子》一书就有两种注本;对汉唐以来的多种著作,也进行了批注。因此,著名史学家侯外庐评傅山“首创诸子学研究”,这是符合实际的。还有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一书,认定《古文尚书》是伪书,又一次冲击了经书的神圣性。据阎若璩说,他的这一论著的成就,曾有傅山的多次指点和意见。顾炎武被乾嘉学派推为开山者。其实他在中年以后,尝寓居于晋地,并在晋南曲沃县去世。他在晋地,与傅山、戴廷枏交往甚笃,切磋学问十分广泛和深刻,由此可以说考据之学是他们共创的。他们对古学进行过认真的总结性研究。批判性是说明清之际的三晋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同步,对古代思想文化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审视和研究,在他们的议论中,含有可贵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因素,同清代中期对古代全书和类书整理并校勘联系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清理古代学术著作的工程,客观上为近代科学思想文化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值得重视的是他们的批判性不同于以往,因为其中含有一种闪光的具有近代精神的萌芽思想因素,这种深刻的批判意识是古代思想中产生的自我否定意识,是以往历史时期中产生过的任何一种思潮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所谓开拓

性或开创性,就是一种返古开新的活动,他们在批判中有破有立,企图在总结批判中创立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思维方式。魏象枢曾说:“学贵疑,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认为学问的根本在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立足于前进。傅山提出“法本法无法,文章自我开”。认为一切成法,都源于无法,历史上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制度,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从中产生所需要的新法。三晋学子在传统的“恤商”观点基础上,提出一个“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的新观点,傅山认为“无理胜理”(《杂著录·圣人为恶篇》),他指出理与无理是辩证统一的,这与法与无法是辩证统一的属于同一道理,理与法作为一个存在反映的范畴,根据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将随着社会的演变、事物的发展而变成历史的遗迹,无理将会转化为有理,无法将会转化为有法,而明清之际是一个转化的关键时期。三晋学者的这些具有重商倾向的论述,南宋时陈亮、叶适就有明确的论述,黄宗羲也提出“工商皆本”的见解,但三晋学者的这一见解,很可能直接受李贽的影响,李贽在世时曾来过山西,他的著作也在这里刊行过,傅山尊称他为“卓老”,说明深受其影响。李贽曾颂扬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焚书·答耿司寇》)。并断言说,“不言理者,决不能平治天下”(《四书评·大学》)。这与傅山的“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一脉相承,都是主张以市民意识作为主导的意识,创立新的思维方法并取代旧的思维方法。尽管这种思想观点很不成熟,但它毕竟表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动向,反映出思想文化演变的新趋势,因而是很可贵的。

值得称道的是傅山和戴廷栻创立了文化活动中心丹枫阁。丹寓朱明之义,这同傅山加入道教,取朱衣道人的蕴义是一样的;枫,戴廷栻,字枫仲,取其枫仲之一字,表示是由戴廷栻在其祁县故里兴建的,又枫是树木的一种,其木修耸,大者数围,直冲云霄,且干甚坚,其叶经霜后呈红色,很可爱,傅山曾有“霜叶真红二月花”、“傅山彻夜醉霜

红”的诗句,说明用枫还含有坚贞不渝的精神。此阁建立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建阁后学术文化活动十分活跃,王士禛以“山右龙门”题庐,戴廷栻作记,傅山作叙并题匾,“集一朝大声”。王士禛在其《池北偶谈》中有多篇记载,其中有“枫仲建丹枫阁,广延海内名士”的记载。据傅山、戴廷栻和王士禛等人的记载,先后前往者很多,除傅山傅眉父子外,知名者有白孕彩、胡庭、薛宗周、张天斗、李中馥、毕振姬、艾南英、黄道周、马世奇、阎尔梅、顾炎武、施闰章、宋荦、吴姓、王士禛、魏象枢、李孔德、阎若璩等。在傅山文集中还记载着当时访问太原松庄的知名学者有:李因笃、申涵光、朱彝尊、潘耒、谢彬、戴本孝、屈大均等,他们或在傅山住处论学,或饮宴咏诗于太原崇善寺中,这些学者很可能亦造访于丹枫阁,而丹枫阁的常客自然是傅山父子和顾炎武等人。丹枫阁中文物典籍甚丰,也是吸引学者造访的重要原因,据记载阁中藏书达万卷,唐宋以来名画珍品有102帧,其中有著名的《管夫人画》、明宣宗朱瞻基手迹《栗猿》、《西山雪霁》等,藏鼎彝亦丰,著名者有周代遗物多父敦、天马鼎等。这些珍贵文物的获得,戴廷栻有所说明,他说:明代“平定海内,收元之图书珍玩,藏诸御府,诸王分藩,各有所赐,久遂散逸民间,经乱则纷然四出矣。”(《半可集》卷三)原来这些文物是从王府中散落出来,他同傅山积极勤求,并置放在丹枫阁中,供大河南北学者鉴赏,对研究传统文化起了积极作用,丹枫阁及其主人随之也名扬海内。当时海内的名士,北方集于戴廷栻的祁县丹枫阁,南方则多集于江苏冒襄(自号巢民)的如皋水绘园,他们欢聚游宴,谈诗论画,说文究理,风流文采,映照一时,呈一代文化之盛。

三晋文化中对道统说是崇奉的,但并不视为神圣,究其原因是与地缘有关。在先秦时期,晋文化与戎狄文化交融;北宋以后,又处在辽金元的统治之下,与北方少数民族和草原文化交融,由此虽具中华大文化共性特征,但地域性文化明显存在,具有一种豪放、质朴的特色,

形成一种含有“山气”的开阔风范,此风至今犹存。还有,三晋文化自古以来一向有先行的特征,晋文化形成是以法家文化为主体的,具有宏观理论思维品格,重视实功实济的功利主义,重商恤工商,所以明清之际又有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的社会主张,与儒家的基本观点相悖,但法治与德治并用,成为古代重视的并且实际上占着统治地位的意识。从中也体现出三晋文化的开创精神。三晋文化沉积着深厚的丰富文化层,是中华思想文化的宝库中的珍贵精神财富,很值得审视借鉴。

第六章 石窟艺术

第一节 佛教和石窟寺

一、北朝佛教和石窟开凿

(一) 北魏时期

西晋末年，汉族封建贵族和北方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连年征战不息，北方地区出现“十六国”的割据局势，战争频繁，民众苦不堪命。祈求乐土平安成为民众的愿望，西来佛教得以传播，尤其以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地区的佛教活动更为兴盛。拓跋鲜卑在数十年战乱之后统一北方广大地区，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这是一个以鲜卑拓跋部贵族集团为主、汉族地主阶级为辅的统治机构。

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期间开始接触佛教，注意依赖宗教神学作为统治工具，佛教以继承前秦、后秦、北凉地区为主。《魏书·释老志》称，拓跋珪转战河北、山东期间，“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佛教传入中国初始，僧徒遵照佛教戒条不奉世俗礼法，所以也不拜父母、不敬王者。针对这个问题，佛教习俗和儒家礼教在礼敬王者的态度上是

有区别的。东晋咸康六年(340年),曾在朝廷里兴起一场沙门是否应礼敬王者的辩论,江南庐山僧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阐明佛教礼俗,最后被执政的桓玄确认。与东晋相比较,北魏佛教对皇权有一种特殊的依附性,主要偏重兴办福业、奉行禅行神异,宣传律己禁欲,不敬王者的戒条被沙门自己破坏。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期间,利用佛教收揽人心,重用赵郡沙门法果,封他为道人,即僧徒的统治者,开始实施僧官管理制度。从此,佛教开始顺从时势,迎合统治者的需求,《魏书·释老志》曰:“初,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北方僧侣领袖自己带头礼拜帝王,遂渐成为一时风尚,与南方僧徒不敬王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天兴元年(398年),北魏都城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人口、财富随之大量迁移。注重建造传播佛教思想的佛塔殿、讲堂和禅堂,寺院经济逐步完善。明元帝拓跋嗣继道武帝后,仍崇奉佛教,僧侣人数逐渐增加,并在都城的四方建立佛像,进行佛事活动。明元帝之后的太武帝拓跋焘,也信奉佛教,常与僧徒谈论佛经;还将佛教重镇凉州居民迁至都城,促使佛教迅速发展。太武帝执政后期非常信任崇奉道教的司徒崔浩,逐渐由信任佛教而改信道教。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因怀疑僧侣参与谋反,下诏废佛教,诛杀长安及各地沙门,焚毁寺庙,这就是著名的太武灭佛事件。

灭佛事件发生六年后,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他非常了解利用佛教为皇权服务的重要性,马上颁布昌兴佛教的诏书,修复被毁坏的寺庙与佛塔,允许民众出家。文成帝将佛教和皇权有机地紧密结合,《魏书·释老志》有这样的记载,他命令“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兴光二年(454年),又敕有司在京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他还命擅长禅法的昙曜任沙门统,翻译佛经《付法藏传》,并且在京城西武州山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文成帝之

妻文明皇后冯氏借助佛教祈求功德修福，“冯太后称制。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冯氏的方山永固陵墓内，到处雕刻莲花、莲瓣、莲蕾等佛教题材，足以体现佛教在北魏上层社会中蔓延程度。北魏的各代皇帝中，对佛教的大力扶植和信奉，应首推孝文帝元宏。他组织讲经释义，造窟建寺，亲自在永宁寺内为僧尼剃发。经济上要求“僧祇户”交纳“僧祇粟”给管理僧尼机构，又强令一些犯重罪的人和官奴为“佛图户”，以充作寺院的杂役和从事耕作活动。此时寺院经济发展较前更加巩固。孝文帝迁都洛阳前，佛教活动达到高潮，各地寺庙已达六千余所，僧尼达到近八万人。

孝文帝统治时期的北魏王朝，政治上和军事上与南朝刘宋、南齐汉族政权相互抗争。南朝汉族政权先进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深深感染着北魏社会。为了适应北魏的社会发展，孝文帝施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太和七年（483年），诏令鲜卑人禁止同族相婚；八年，规定百官奉给有差；九年，颁布均田法；十年，孝文帝始服袞冕，班赐百官，始制五等公服。同时，立党、里、邻三长制，定民户籍。孝文帝改制将强烈的汉文化气息传播到北魏社会中，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砚、青瓷唾壶、石棺床、石柱础、漆屏风以及漆画等，反映出南朝汉文化和北魏鲜卑文化的交流。云冈石窟的雕凿也强烈反映出汉文化改制的作风。政治制度的改革加快了北魏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步伐，国都平城地理位置偏北，政治、军事上很难控制全局，为了摆脱鲜卑贵族守旧势力的影响，出于争夺封建正统的需求，太和十七年（493年）秋天，孝文帝以讨伐叛逆为由，开始迁都洛阳。翌年，孝文帝宣布正式迁都。南迁后的国都，佛事繁盛，讲义释经，建造寺庙。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翔实地介绍了当时佛教兴盛的场面。孝文帝之子宣武帝元恪选择洛阳南郊伊阙山，按平城云冈石窟的样式建造龙门石窟。龙门石窟的开凿与云冈石窟一样，体现出佛教在北魏时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北魏时期佛教活动在规模上、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前代,以一种国教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南朝僧人佛事活动注重义理,北魏僧人则重视形象宣传和实践。北魏僧人的主要宗教活动内容是禅修,其以继承凉州佛教传统为主,主张寂坐修心的一种思维形式。僧人习禅选择郊外山林幽静清雅之处进行观像思维,佛经中《佛说作佛形像经》、《佛说造立形像佛报经》非常讲究造像功德,认为作佛形像有“恒生大富家、遵贵无极珍”,“作大闻名王”等诸多益处。《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则更详细说明修禅应选择山居,并在石窟中忍受风寒。北魏皇帝笃信佛教,更尊重禅僧,最早受道武帝礼敬的赵郡沙门法果,是一位著名的禅僧,还有号称白脚禅师的惠始。文成帝复法后重用的师贤和昙曜,以前都是著名的凉州禅师。最高统治者不惜动用人力、财力为僧人修禅创造条件,祈求功德。文成帝时的云冈石窟是在以禅业见称的昙曜主持下,以国家财力进行开凿,可居修禅者三千余人。献文帝时期,据《魏书·释老志》记载:“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开凿石窟进行修禅,从北魏建国到后期一直没有间断,修禅是北魏佛事的主要活动;凉州禅僧修造石窟有两个作用,第一是做功德,第二是为供僧人习禅;北魏诸帝修禅开窟说明禅僧倍受皇帝的礼敬,又可认为修窟习禅是北魏佛教注重“德政”的体现。禅僧开窟的目的是为皇帝祈福,再者为自己修持过程中观像、礼像创造条件。北魏禅僧开造石窟规模大、数量多,计有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中的早期石窟;有著名的云冈石窟和龙山石窟;还有巩县石窟。大型石窟的开凿反映了北魏佛教附属于世俗王权的特点,反映出王权和教权在思想领域中的一致性。北魏晚期开凿者除皇室外,尚有官吏、上层僧尼和在俗的邑义信士等。佛教具有一定普遍性和民众性,在山西境内,有高平羊山头石窟和平定开河寺石窟等的建筑,开凿造像已达到十分繁盛程度。

(二) 东、西魏,北齐和北周佛教

北魏晚期政治斗争日趋尖锐,统治者内部日益分化,孝静帝元善见时分裂为东、西魏。东魏政权实际操纵在高欢手中,他东迁孝静帝于邺都(今河北临漳县),致使洛阳僧尼大半随迁,寺塔竞立,一时间邺都成了佛教重镇。东魏的夏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也是政治、军事重镇,同样建窟立寺,开始对天龙山石窟的开凿。西魏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大量建寺度僧,加速对敦煌莫高窟的开凿,石窟内北朝唯一的纪年窟(285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四年(538年)。麦积山西魏石窟则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535年),应与西魏皇后出家为尼有密切关系。

东魏武定八年(550年),北齐取代东魏,佛法依然兴盛,统治者愈加看重佛教的影响。文宣帝高洋以国储的三分之一供养僧尼,邺都有寺院四千所,僧尼近八万人。高洋自己崇佛达到极点,他敬重僧尼,亲自请稠禅师授菩萨戒法,还亲书《华严斋记》、立华严斋会、行华严忏法,甚至还断肉禁酒。在邺城附近,开凿了响堂山石窟,还有水浴寺、小南海石窟。《北齐书》记载,在陪都晋阳开凿天龙山石窟的同时,又雕凿了太原童子寺附近的明仙村北齐石窟,还大量建造寺院,“壮丽逾于邺下”;在开凿西山大佛像时,“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西山大佛遗址今位于太原南郊,大佛头部已失落,但仍可看到耸立于半山的露天雕像。

北周取代西魏,灭北齐后,佛教仍作为主要宗教出现在政治社会中,境内寺院林立,度僧众达数万人,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仍继续开凿,写佛造像非常流行。北周社会佛教极盛,最后导致周武帝灭佛事件。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位极有政治作为的封建统治者,在位期间(560—578年)为北周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据《周书·武帝纪》记载,他赞许还俗沙门卫元嵩关于“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的建议,决定改变崇佛的政策,而奉行以儒教为先的政策。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又诏僧道集合于京师,斥佛教不净,下诏禁止佛教,

《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次灭佛：“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并将寺院充作宅第赐与王公，令僧尼还俗编民。武帝死后，在其继位者主持下，佛教又陆续恢复起来。

二、隋唐佛教与石窟盛衰

（一）隋 代

公元 581 年，隋国公杨坚废除了不满 10 岁的周静帝，建立了隋朝。隋朝建立后，逐渐统一中国，战乱平止，政治和经济上相对稳定，统治者开始利用佛教思想控制社会。《长安志》记载：“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隋文帝诏令恢复佛教，“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扬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隋文帝自幼受佛教影响较深，在位期间数次下诏造寺建塔，据统计立寺 3792 所，建塔 113 座。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对佛教也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自己崇拜佛教，自称“菩萨戒弟子”。他在长安、扬州等地，用国家财力立寺度僧，建造佛像，译经释义。隋朝前后经历 37 年，政治上采取扶植佛教政策，逐渐使南北佛教互相交融，使北周武帝灭佛后的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石窟寺建造主要在敦煌莫高窟进行，隋窟数量众多，约占莫高窟总数的五分之一。而中原北方地区建造石窟，仅在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中进行个别洞龕的雕凿。隋代石窟呈现出从北朝向唐代过渡的特征，进入石窟建造的创新阶段。

（二）唐 代

武德元年（618 年）唐王朝建立，统治者在政治上采取儒佛道三教并用的政策。武德七年唐高祖李渊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基本上确立了以儒为主体，对佛教、道教以调和并用的政策。李渊将佛教寺院纳入统一管理范围，虽然

在太史令傅奕上书反对佛教后,曾下《沙汰僧道诏》,颁布了一些条例,但并未真正贯彻实施。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对待佛教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采取扶植态度。他曾两次下诏,为战争中阵亡者建立寺庙,以超度他们的亡灵;并要各地善度僧尼,允许出家。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亲临弘福寺,自称菩萨戒弟子,为太穆皇后追福。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自召见去印度求法而载誉归唐的玄奘。此后,玄奘的译经和讲经事业得到唐太宗人力和物力上的赞助。玄奘译出经后,唐太宗亲自作《大唐三藏圣教序》,表示对佛教的敬意和支持。

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倡导佛教,他们赞助玄奘译经,甚至耗费财富数万亿营造寺庙。将佛教推向新的发展高度者,应推唐代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参预朝政近40年,当皇帝20年,其间依仗佛教为其统治大造舆论。载初元年(689年),沙门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称经中讲净光天女,得佛受记,以女身为转轮王,为菩萨身化现,应为当今的武则天。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特别得意《大云经》的编造,“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以后,她又据《宝雨经》为自己当女皇制造依据。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以《大云经》制造言论有功,诏令佛教升于道教之上,证圣元年(695年),她亲自组织对《华严经》的翻译。法藏创立华严宗实得力于武则天的支持。《新唐书》记载,武则天称帝期间,“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她还耗用国家财力制作夹纆大像。在龙门奉先寺开凿卢舍那佛像,并亲自主持了“开光”仪式,顶礼拜佛达到穷奢极侈的地步。

开元、天宝之际,国力强盛,经济发达,致使寺院经济进一步发展。佛教宗派纷纷创立,他们各自阐述教义,竞争激烈,佛教因此传播迅速,影响扩大。天宝五载(746年)玄宗请来华的不空在皇宫举行“灌顶”仪式。唐玄宗对佛教的利用和支持,使盛唐寺院数量激增。唐宪宗时佛教活动频繁,元和十四年(819年),朝廷亲自将藏在咸阳法门寺的佛骨迎入长安禁中供养三日。多次举行佛教活动,使大量的国

家财力耗竭。寺院经济的高度发展开始与国家经济利益产生矛盾,佛教传播和影响与国家政治思想宣传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导致了唐武宗灭佛事件的发生。

唐代中期以后朝政腐败,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唐朝国势日益衰败。国内战乱,徭役日重,而寺院经济高度发展,僧尼人数大量增加,田园不断扩充,严重削弱了国家的统治基础和经济发展。据统计全国诸州寺院已达 5358 所之多,招提、若兰 4 万余所。佛教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唐武宗时决定废除佛教,《旧唐书·武宗本纪》称他信奉道教,“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又由于道士赵归真屡次劝说,遂导致武宗灭佛事件。会昌二年(842 年),诏令僧尼中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会昌四年敕令毁拆部分寺院。会昌五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灭佛措施。使灭佛运动达到高潮。灭佛的结果,天下所拆寺 4600 余所,还俗僧尼 260500 人,拆招提、若兰 4 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 15 万人。这次灭佛被称为“会昌法难”,给佛教以很大打击。虽然以后数代皇帝下敕恢复佛教,佛教有所回升,但随着唐朝的消亡,中国佛教由鼎盛阶段逐渐走向衰落。

唐代石窟寺的建造与佛教的发展一样经历了由创新到鼎盛阶段,最终走向衰落。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倡导下,开窟造像祈福和求取功德,成为佛教崇拜者的夙愿,由于佛教流传已普及广大民众中,开窟者已不限于皇室和官吏,而具有普遍性。石窟寺主要集中在中原和河西走廊地区,龙门石窟是皇室经营的大型石窟群,从唐太宗至玄宗的一百余年间,造像达到鼎盛阶段。大规模的开凿主要是在武则天时期,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龕规模宏伟,是龙门石窟的杰作,主像高达 17.14 米,俨然是帝王身份的象征,显示出盛唐时期的强盛和经济繁荣。

唐代石窟造像中山西境内石窟占很重要地位,太原是李氏集团起兵灭隋的军事重镇,石窟造像非常盛行,唐高宗和武则天亲临太

原,瞻礼童子寺大像和开化寺大像,盛唐时期天龙山石窟开凿达到高潮,开凿总数占天龙山石窟的三分之二。此外,延续对高平羊头山石窟的开凿,还雕凿了榆社县庙岭山石窟,静乐县净居寺石窟等。晚唐以后,随着佛教衰落,石窟寺建造也接近尾声。

第二节 云冈石窟

一、历史概况

云冈石窟在大同市西郊 16 公里的武周山南麓北崖,因武周山最高处称云冈,石窟寺则以云冈为名。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 1 公里。现存主要洞窟 45 个,分为东、中、西三区,东部 4 窟(1—4 窟),中部 9 窟(5—13 窟),西部 32 窟(14—45 窟)。此外,还有许多小型洞窟。共计 1100 多龛,大小造像 51000 多尊,包含了北魏时期和唐代以后的佛教雕刻,被誉为中国三大石窟之一。

北魏王朝在长期的混战中,逐步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天兴元年(398 年)国都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境内)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从此平城作为北魏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迄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 年)南迁洛阳,平城作为北魏国都经历 96 年的岁月。北魏王朝建立后,将佛教作为统治思想的工具,最高统治者皆尊奉佛教。道武帝网罗北中国的人才、工巧,《魏书·释老志》记载:“始作五级佛图,耆闍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绘饰。”明元帝修建佛教建筑同时,在“京邑四方建立图像”。自太武帝以来,佛教传播达到极盛时期,太延元年(435 年),北魏攻陷佛教盛行的和龙,将僧徒和人口迁居平城。太延五年,北魏灭掉了佛教发达的北凉,“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平城佛教活动的过度繁盛,导

致了太武帝废佛事件的发生。但不久文成帝即位后,佛教重新恢复。和平初年(460年)，“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云冈石窟建造正式开始,文成帝以降,冯太后称制和孝文帝迁洛以前,北魏诸帝开凿大小窟室数百座。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记载^①,石窟内所存遗刻的最迟纪年是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由此可知,自和平初年始到正光五年结束,前后共计64年的时间。

北魏迁都洛阳后直到北魏灭亡,平城为恒州治所所在地。东魏时仍沿用北魏旧制,北齐废恒州为恒安镇。唐朝贞观十四年(640年),设云中郡辖恒安镇,从此平城为云中郡治所,唐朝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局部维修和雕凿。咸亨三年(672年)据《古清凉传》记载,朔州人俨禅师在云冈石窟整修,“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辽代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云州为西京,在城内修建大华严寺,《金碑》记载,在云冈石窟内建寺十座,“一通乐、二灵严、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官、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这十座寺均为石窟前建木构窟檐式寺院,同时对部分佛像进行整修。保大二年(1122年),辽金战争中,金兵攻占平城,寺遭焚劫。金代仍以大同为西京,皇统三年(1143年),请惠公法师住持,重修灵岩大阁等建筑。元代信奉藏传佛教,云冈石窟寺仍维持原貌。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正式改武州山石窟寺为云冈石窟,崇祯十七年(1644年),云冈寺院再度毁于兵燹。直至清顺治八年(1651年),才重修第五、六窟窟檐木结构楼阁。本世纪初,云冈石窟部分雕像被盗卖出国,引起国人震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冈石窟始受国家保护,成立了专门维护云冈古迹机构。1961年,国务院公布云冈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首次拨

^①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见《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1期。

款维修石窟。目前,国家科研机构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和传统保护方法相结合的方案,对石窟加固保护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二、石窟研究

有关云冈石窟的文献记载,从北魏已经开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酈道元在《水经注·灋水》中最早描述云冈石窟:“武周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崖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以后史学家魏收著《魏书·释老志》,以及学问僧道宣著《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著作,对云冈石窟均有详细的记载。唐代文人宋昱途经云冈石窟时题五言诗一首:“梵宇开金地,香龕凿铁围。影中群像动,空里众灵飞。帘牖笼朱旭,房廊炼翠微。瑞莲生佛步,宝树挂天衣。邀福功虽在,兴王代久非。谁知云朔外,更睹化胡归。”唐代云冈石窟的规模和佛像引起世人瞩目。辽金时代,金人曹衍撰《金碑》得以流传。清代学者朱彝尊著《曝书亭集》中有《云冈石佛记》,对云冈石窟中佛像、规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记载。

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考察山西石窟,1902年写了《云冈旅行记》,率先向世界介绍云冈石窟。接着法国学者沙畹于1909—1915年发表《北中国考古图录》,刊登一批云冈石窟照片和解说文字。1919年,中国学者陈垣撰写《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归纳集中了历史上有关云冈石窟的文献资料,阐述研究成果。1925年,瑞典学者喜龙仁著《五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国雕刻》;日本学者美野贞和常盘大定合作出版《支那佛教史迹》和《支那文化史迹》,以图版和文字对云冈石窟进行概括性介绍。1933年,中国学者梁思永发表《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史角度研究云冈石窟建筑,是专题性研究云冈石窟的开始。以后,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从石窟特点、

艺术源流、造像服饰、千佛题材、佛塔建筑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对云冈石窟进行论述,水野清一于1941年著《云冈石佛群》,长广敏雄于1946年著《大同石佛艺术论》。五十年代,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合作出版卷帙浩大、内容广泛的十六卷本《云冈石窟》,这是国外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集大成之作。全书论及云冈开凿的历史、地理背景;还有昙曜与云冈石窟,云冈石佛寺,云冈装饰纹样,云冈佛寺雕刻,云冈图像学;以及云冈雕刻的西方样式,从云冈样式到龙门样式、中国的石窟寺院等;并从石窟艺术风格角度出发,以“样式”学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分期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在云冈石窟研究工作中取得突破性成就。1956年,宿白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对新发现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进行系统介绍,对重点内容予以肯定;弥补了云冈历史自唐迄金一段的空白,还应用这段的文字资料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依据《金碑》的新文字资料,1978年,宿白又著《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82年,还撰有《〈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学者研究分析云冈石窟,认为应以石窟形制,主要形象和形象组合(布局和题材),纹饰与器物,艺术造型与技法诸方面入手,还应考虑反映社会意义的物质文化材料,力求对石窟的研究达到正确、合理、全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成就:第一,研究云冈石窟历史并进行重新分期;第二,确立云冈模式,探索石窟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第三,阐述云冈石窟的性质及其内容。^①

云冈石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就,调查者在武州川北岸,由云冈石窟西行4公里发现吴官屯石窟;再向西行在距云冈15公里的高山镇北,发现焦山石窟;武州川南岸,位于云冈西南

^① 丁明夷:《云冈石窟研究五十年》,载《中国石窟·云冈石窟》,日本平凡社版。

还有鲁班窟石窟。这样云冈石窟东西连接,其范围绵延 15 公里,与《水经注》、《大唐内典录》等文献记载完全吻合。调查者在大同市西北约 10 公里的雷公山脉北端大石崖背沟北山崖面上发现鹿野苑石窟,在大像窟两侧有容禅僧坐禅使用的禅室,开凿时间与《魏书·显祖纪》中的记载“皇兴四年(470 年)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相符,当属献文帝时期。云冈石窟窟前遗址的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发掘者共揭露面积近万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数千件,发现北魏文化层,唐代过渡层,辽金时期文化层。在石窟窟口发现北魏时期的石雕瓦垄、椽檐遗迹和仿木结构屋形窟窟面。还发现属于辽代的十处具有一定规模后接洞窟的木建筑遗址,从而确定了《金碑》记载的十寺位置。《金碑》中有关金代禀慧法师重修灵岩大阁九楹的记录,在云冈石窟第 3 窟前发掘东西向面阔九间建筑遗址时,也得到证实。窟前遗址的发掘,初步探明了窟前遗址的发展脉络,对研究云冈历代建筑、规模和石窟的盛衰演变提供了大批实物资料。^①

三、造像内容

云冈石窟造像以高大奇伟、雕刻精美而名冠于世。僧人造像是为了弘扬佛法,禅经中《坐禅三昧经》明确声称:“若初习行人,将至佛像所,或教令自往,谛观佛像相好。”规定修禅必须先观像,观像如同见佛;观像必须造像,造像是禅僧积功德的一种表现;禅僧在佛像面前进行礼拜和供养。《观佛三昧海经》:“造立形像,幡花众香持用供养,是人来世必得念佛清净三昧。”由此看到,建造佛像,在观像过程的礼拜和供养,是僧人必修的一种功德。云冈石窟造像的主持者昙曜是位德高望重的禅僧,他是皇帝任命的僧人的统治者,又是亲自参与翻译

^① 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付法藏传》、《大吉义神咒经》的学僧。因此，昙曜建造佛像时，既要表现佛教依附世俗王权的特点，又强调遵循佛教经文中的条例，使教权与王权保持一致。

昙曜开凿云冈石窟时，恰逢太武帝灭佛之后，文成帝兴佛之时。昙曜本人是修行颇深的禅僧，所以建造石窟的目的是要宣传佛教渊源久远，传世无穷。为了使造像不易破坏，须建造坚固持久的石窟石像。大窟大像的佛教场所，又可以广聚沙门同修定法，宣传教义。北魏和平初年（460年），开始建造著名的昙曜五窟。据《魏书·释老志》记载，石窟的造像是以帝王形象为蓝本进行雕造。

云冈石窟造像的主佛释迦牟尼披上了皇帝的外衣，《魏书·释老志》载，佛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据记载，文成帝脸上和脚下有黑痣。石窟造像中除释迦像外，还有释迦与多宝佛、十方三世诸佛、无量寿佛、四方佛、七佛和弥勒菩萨，其余种类有菩萨、罗汉、天龙八部、佛教故事等。

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被奉为“世尊”，又称“如来”。他的形象在佛教中是主要的题材，往往被列入主尊。主要有坐和站两种姿势，最常见的坐势为结跏趺坐和半结跏趺坐，其次为善跏趺坐，就是两足下垂，又称倚坐。手印多为“禅定印”、“说法印”、“无畏印”和“无畏与愿印”。云冈 20 窟大佛高 13.7 米，呈结跏趺坐姿势，高大威武，是云冈释迦牟尼佛像的代表作。造像高肉髻，面形丰满，额部方广平正；眉间有圆形白毫，眉修长而清晰，眼相分明，凝重有神，注视前方；口唇端好，唇上颚际轮廓清楚，唇薄而闭，嘴角微翘，略带微笑；颈项圆润，臂修长而圆柔，肩宽厚平直，手指长短参差适度；像身端坐，袒露右肩，斜披袈裟，内着僧祇支，庄严而又稳定。莲花像座有莲瓣形身光及圆形项光，其间刻有化佛、比丘及化菩萨，作飞旋状，光焰雕成火焰纹。坐像上身微向前倾，似俯察阎浮世界一切众生。造像的神态庄严静穆，令人肃然起敬。16 窟立像大佛，高达 13.5 米，面目清秀，相

好分明,姿态英俊,立于莲花座上。

多宝为东方宝净世界之佛。《法华三昧观法》曰:“修行,正忆念法华经者,当念释迦牟尼佛于耆闍崛山与多宝佛在七宝塔共坐。”释迦与多宝同置一龕,并坐说法是云冈石窟多见的题材。云冈第2窟中心塔柱下层正中龕,心柱雕成七宝塔,塔内释迦与多宝共坐。第11窟南壁浮雕宝塔形龕,内有释迦与多宝共坐像。第19窟西小窟内释迦与多宝共坐。其中个别窟内并坐说法像外侧雕刻七佛、天龙、供养菩萨、千佛等众多人物,以烘托二佛并坐说法的情景。

按照佛经理论,三世佛就是过去迦叶佛、当今释迦牟尼佛和未来弥勒佛,修习这种观,名为“菩萨念佛三昧”。在造像中,如果正壁塑一佛,左右壁各塑一佛和一弥勒佛,表示佛的过去、当今、未来,历经三世,往世不绝。三世佛是昙曜禅师针对废佛前“胡本无佛”的言论,以三世佛昭示佛教谱系源远流长,使三世佛成为北魏至北周石窟造像中流行的题材。云冈石窟造像中三世佛占比例较大,布局多种多样。17窟正中为菩萨装束的交足弥勒像,高达15.6米,倚坐于须弥座上,头戴宝冠,身着璎珞。窟内东西两壁佛龕内各雕佛像一尊,东为坐佛像,西为立佛像。19窟主佛像为坐姿,高达16.8米,是云冈石窟第二大雕像,窟内东西耳洞亦雕刻有高达8米的坐佛。20窟正壁雕一坐佛,左右壁各雕一立佛。十方无量诸佛是同三世佛具有密切关系的题材,在佛经中称“三菩提”。云冈第15窟南壁、西壁密雕小佛像是十方诸佛闻佛说法的例子,人称“万佛洞”。

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人往生“西方净土”,故又称“接引佛”。石窟造像中无量寿佛像与释迦牟尼像相似,云冈第17窟前壁左右侍立与无量寿佛相联系的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观世音戴化佛冠,大势至宝冠上置宝瓶。

四方佛代表东、南、西、北方的四方面佛。云冈第6窟中心柱窟,心柱四面各开一龕,龕内各造一佛,有身光和项光,足下有莲花。与

《禅秘要法经》卷中“于四方面生四莲华，其华金色，亦有千叶，金刚为台，有一金像结跏趺坐，身相具足，光明无缺，在于东方，南、西、北方，亦复如是”记载相符。

七佛是佛教造像常见的题材，佛经曰“七佛天中天，照明于世间”。他们是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和释迦牟尼佛。七佛能给人间带来光明，还能为众生祛除病魔。云冈第13窟南壁窟门上部和第10窟主室南壁雕刻七尊并列立佛像或坐佛像，手作施无畏印或结定印，佛像制作精致，通脱潇洒、庄重不凡。

弥勒佛是将继承释迦佛位而从事“宣说法教”和“住持教化”的未来佛。他成佛以前，被称为弥勒菩萨，所以有时被塑成菩萨像，有时雕作佛像。据《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称，其原出生于婆罗门家庭，后为佛弟子，先佛入灭，上生于兜率天内院，经过漫长岁月后降生人间，于龙华树下成佛。北魏早期流行弥勒菩萨像，为坐式交脚菩萨造型。石窟中的弥勒像，一般雕塑在中心柱或窟壁上层龕中，表示弥勒高居“兜率天”。北魏中晚期弥勒像数量逐渐增多，造像亦十分流行，以释迦、弥勒为主要造像的石窟较普遍。云冈第9窟前室西壁上层的弥勒像雕成交脚像，头部有高肉髻，弥勒穿上佛装。第4窟东壁的交脚弥勒像大约镌雕于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4年）。

菩萨是未来成就佛果的修行者，以佛道来成就众生。佛经说：“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救众生”。菩萨造像在北魏主要有弥勒、文殊、普贤、观世音和大势至等，还有供养菩萨。弥勒在北朝时期，从菩萨装到佛装。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则多作为佛像的胁侍出现，属于成铺的组合，供养菩萨多作持物供奉状。云冈第7窟后室正壁上层刻文殊菩萨，座下骑狮，姿态优美逼真；而南壁拱门上部6躯供养菩萨造像自然得体，文静典雅。第11窟有大势至、观世音、文殊菩萨的组合造型，这是北朝较早的组合。

罗汉是修行者达到涅槃的佛弟子，他们能破除一切烦恼，解脱生

死轮回。罗汉造像在北朝非常流行,作为佛的胁侍出现。云冈 18 窟东壁十大弟子雕像,运用写实和夸张的雕刻手法,反映了十大罗汉不同的性格。十大罗汉分别是舍利弗、目犍连、摩诃迦叶、阿那律、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优婆离、罗睺罗和阿难陀。罗汉中两弟子形象则为阿难陀(简称阿难)、摩诃迦叶(简称迦叶),他们是北朝造像中常见的题材。

天龙八部是佛教中的护法神,佛经中的八部护法形象是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闥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睺罗迦。在佛教雕塑作品中常见的主要是天、龙、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和紧那罗。天是指天上的天神,云冈第 8 窟窟门两侧,浮雕骑牛的摩醯首罗和骑金翅鸟的鸠摩罗。龙在石窟中通常雕塑在窟顶、门拱、龕楣等位置,是传统造型艺术的形象。乾闥婆是石窟顶或佛背光中的飞天,人物动态自如,飘逸潇洒。阿修罗是三头四臂,似神似鬼似人而又丑陋的怪物。迦楼罗在释经中称金翅鸟,云冈第 6 窟后室中心塔柱有形象古朴生动的迦楼罗浮雕,展翅欲飞。紧那罗就是伎乐天,云冈 34 窟窟顶雕饰演奏乐器,歌舞散花的伎乐天神,姿态生动,自然舒展,在石窟中居于从属地位。

佛传故事在石窟造像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主要内容从释迦牟尼诞生到降魔成道,初转法轮结束。云冈第 6 窟雕刻出依据《过去、现在因果经》的佛传故事,从中心柱下层龕楣两侧开始,自右顺序开凿,再从四壁下层到明窗两侧,最后以东、西两壁中层佛传龕结束。浮雕的内容主要有释迦牟尼腋下降生、七步莲花、九龙灌顶、骑象回城、仙人观相、乘象游荡、太子学艺、箭射铁鼓、宫中嬉戏、父子对话、出游四门、耶输陀罗惊梦、逾城出家、雪山苦行、菩提树下成佛、鹿野苑说法、双林入灭等共 39 幅佛传故事,是一幅巨大的石雕连环画。

云冈石窟造像以场面博大、气势恢宏而撼动人心;在石窟的藻井、平棊、龕楣、背光等部位的装饰图案,则给石窟内部带来一种活

力。图案中的莲花,是圣洁的表现。忍冬缠枝纹的连绵不断,则增强了各造像之间的联系。云冈 9、10 两窟是一组双窟,俗称“五华洞”。前室门拱两柱为八角形,东西两壁上部和后室门楣上刻有仿木构屋宇建筑,余壁精雕植物花纹图案,结构严谨,富于变化。值得一提的是第 10 窟门楣雕刻的图案,以护法天神帝释天所居住的须弥山为中心,山间雕刻着许多虎、豹、熊、鹿、兔等动物,增加了须弥山的气势。装饰性图案,或繁或简,或断或连,虚实结合,对称均衡,使造像艺术达到完美的境界。

四、时代特征

云冈石窟是北魏的中后期开凿,在国家主持下经营,大窟多建成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之间,较小窟龕的开凿则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末年(524年),前后共 62 年的时间。研究石窟的时代特征,主要针对石窟形制、主要形象与形象组合(布局与题材)、装饰纹样、艺术造型与技法(个体形象)等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排比。研究者将北魏时期的石窟分为三期。^①

(一) 开创期

云冈石窟第一期。北魏建都平城开始,聚集充足的人力、物力;最高统治者注意将政治与佛教紧密地结合起来,尊奉佛教程度超过南朝;建寺造像频繁,并且与流行佛教的西域诸国往来密切。文成帝(452—465年)继位后,大肆昌兴佛教,诏令禅师昙曜,在京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昙曜为皇室开五所五窟,即著名“昙曜五窟”,现在石窟编号的 16—20 窟。

位于云冈石窟西部的“昙曜五窟”,窟室面积较大,窟室形制呈橢

^①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见《考古学报》1978年1期。

圆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形式；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和千佛，第16、18、20窟皆以释迦为主像，第17窟以未来佛弥勒菩萨为主像，唯第19窟满雕千佛；主像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面积的大部分。佛像为广颐、短颈、宽肩、厚胸，造型雄健；流行通肩或右袒服饰，菩萨斜披络腋，胸前饰短瓔珞，戴臂钏，下着羊肠大裙；衣纹厚重凸起，线条简洁。从造像特点中，可以看到既有中亚犍陀罗艺术造像风格，又有印度笈多时期流行的衣着，还有仿造皇帝形象的特征。这种吸收西方先进技艺，融和自身特色的石窟形制，构成第一期云冈石窟的开创阶段，筑成新一代楷模。

（二）鼎盛期

云冈石窟第二期。具体时间，大约自文成帝以后迄太和十八年（465—494年）迁都洛阳以前的孝文帝时期。文成帝卒后，虽然献文帝继位，实际上政治权力落入文成帝后冯氏手中。北魏延兴元年（471年）孝文帝即位，冯氏被尊为文明太皇太后，据《北史·后妃传》记载：“自太后临朝专政，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一家世代奉佛，对云冈石窟开凿起到了积极的倡导作用，工程规模超过了第一期。太后临政达十余载，《魏书》中将孝文帝与冯氏称为“二圣”或“二皇”，云冈石窟中出现了与“二圣”有关的双窟形式。太和十四年（490年）太后卒后，孝文帝的政治地位正式确立，太后临政时期执行的汉化政策，得到进一步深化。云冈石窟中受汉化政策影响较大，服制改革在大型佛像雕造中体现出来，出现了褒衣博带式的新服饰。孝文帝迁洛以前，北魏社会稳定，经济兴盛，石窟建造达到鼎盛阶段。这一阶段窟室、龕像数目增多，皇室仍然是主要的开窟者，官吏、上层僧尼、在俗信士为求取功德也积极参与开窟造像，佛教的普遍性与民众性超过了前期。

鼎盛期的主要石窟为成组的大窟，位于石窟群中部东侧，主要有5组，其中4组为双窟，1组为3个窟。分别是7、8窟，9、10窟，5、6

窟,1、2窟;这4组为双窟。11、12、13窟呈组窟。此外,云冈石窟最大的第3窟,主要工程也在此期内进行。11至13窟外壁崖面上的小窟、龕像及20窟以西的个别小窟,也在这一期晚些时候开凿。它们的特征是汉化趋势迅速发展,雕刻造型注重追求工丽,渊源于西方的佛教石窟逐步被吸收,开始进入东方化时期。

此期石窟平面多作方形,窟内或前后室、或中部雕制塔柱,窟顶多雕平棊,多数分层布龕。主像位于后室后壁,盛行释迦多宝对坐、维摩文殊论辩、下龕释迦多宝和上龕弥勒等组合造像,主像仍为三世佛和交脚弥勒。龕下或礼拜道壁面雕造佛教本生、佛传及七佛、供养天人,浮雕附有榜题。窟内布局紧密、工艺精细,造像题材依据《法华经》、《维摩诘经》和《法华三昧观》等佛经。第一期出现的雄伟大像少见,佛、菩萨面相丰瘦适宜,表情温和恬静。太和十三年(489年)出现褒衣博带式佛装。菩萨头戴花鬘冠,着帔帛,大裙下摆飞扬。佛装在二期晚段直接采用汉族士大夫阶层的中原样式,体现了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风貌。

《金碑》是云冈石窟历史研究和分期的新资料,尤其对第二期石窟提供了历史依据^①。第7、8窟被定为二期中最早一组,约完成于孝文帝初期,双窟与二圣有关。窟前外壁左右立双塔,造像面型丰瘦适宜,中国式床帐的盖顶帷幕。这组双窟最先出现了佛装的交脚弥勒像,还有天龙八部护法像和大型供养人行列。菩萨、飞天等,上身除斜披络腋外,有的还披帔帛,自两臂绕向身后。9、10窟略晚于7、8窟,根据《金碑》推断,建于太和八年(484年),完工于十三年,为孝文帝时开凿。9窟主像是释迦,10窟是弥勒菩萨,为新出现的组合。在这组双窟中,出现石雕窟檐、屋形龕等装饰,均属仿汉民族木结构的建

^①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见《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筑形式。双窟内的各种造像,身形雍容俊秀,衣纹流畅劲健,达到了新的水平。5、6窟双窟的造像与孝文帝太和十年(468年)服制改革相一致,主像三世佛的服装雕成褒衣博带式,大衣内着僧祇支由衣内引出下垂的双带,采用汉族士大夫服装式样。5窟正中释迦坐像高达17米,为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6窟的佛传故事,采用浮雕和佛龕雕刻相结合的方法,代表了北魏石窟佛教题材的艺术成就。丰圆而适中的造像,直平阶梯式的衣纹,显示出南北不同造像风格的融合,以及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的发展和改进。

(三) 渐进期

云冈石窟第三期。开凿于迁都洛阳后至正光末年(494—524年)。孝文帝因政治原因迁都洛阳,平城仍作为北都,属北魏佛教要地。此期多中小型窟室,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地区。第4、14、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窟、龕像,4至6窟间的小窟,大都雕凿于这一期,中小窟室的总数在150座以上。许多第一期、第二期开凿的窟室内、窟口两侧也多有第三期补凿的小龕,其数量不下200个。昙曜五窟外壁崖面的千佛,也归此时雕造。与前二期比较,此期没有开凿大型窟室。但雕造数量和窟室内部样式的繁杂,均超过前二期,给人们显示出石窟并未衰落的迹象。因此,可以认为是石窟雕造的渐进阶段;随着龙门石窟的开凿,重心才逐渐转移。

第三期石窟为中小型,多不成组,洞窟内部方整。流行塔庙、三壁三龕及重龕式的洞窟。造像趋于瘦削,衣服下部的褶纹重叠繁复;佛像面形消瘦,长颈,削肩,“秀骨清像”型,着褒衣博带式服装,大衣下摆延昌(512—515年)以后为密褶式平行线条。菩萨面形亦为清瘦型,细颈,削肩,上身着短衫,帔帛交叉处穿壁,大裙下摆呈锯齿状,两角向外飞扬。造像题材流行释迦、多宝与维摩、文殊,佛传故事较多,弥勒与释迦并重。

此期窟龕按类型可分四种。第一种,4窟及4、5窟之间的塔洞和

39窟是塔庙窟,4窟中有正光年间(520—524年)弥勒像,是云冈现存纪年最晚的造像。第二种,14、15窟为千佛窟,尤其15窟是典型千佛洞,四壁皆千佛,后壁弥勒龕,东、西壁凿释迦龕。第三种,约有二十余座三壁三龕式洞窟,窟室为方形,平顶。后壁主像多为释迦、多宝,也有释迦龕。第四种,约有十余座四壁重龕式的中小洞窟。后壁主像多为上龕弥勒,下龕释迦造像。

第三期石窟开凿数量超过前二期,从数量分析,平城地区中下阶层信仰佛教人数日益增多,从现存铭记观察官职最高为将军、太守,而中下层人士开窟凿龕数量增多,或为亡者祈冥福,或为生者求平安。铭记中出现与净土宗信仰有关题款,表明南方地区流行的净土宗佛教思想,在平城蔓延开来。从造像内容观察,主像以及“雕鹫怖阿难”、“释尊慈慰”等内容,进一步符合禅观佛教思想。

第38窟是雕刻精美、题材丰富的代表性小窟。窟门外部两侧分别雕力士形象,窟内平面作长方形,平顶雕方格平棊藻井。正壁龕内为释迦、多宝并坐像,龕侧雕涅槃像。东壁上层雕弥勒,下层雕释迦,西壁龕中雕倚坐佛,东壁和北壁佛龕下部雕男女供养人行列,中间雕树上伎乐人奏乐和爬杆倒舞的“幢倒伎神”杂技图像。南壁窟门东、西两侧分别雕“降伏火龙”、“雕鹫怖阿难”、“三道宝阶”和鹿野苑初转法轮像。窟顶以大圆莲为中心,围绕化生童子、诸天仆乘,四周还雕飞舞奏乐的伎乐天形象。窟内布局简练,杂而不乱,主题鲜明,丰富多变,充分代表了北魏晚期佛教艺术的发展变化,更体现了中国石窟艺术民族化的特征。

北魏灭亡后,云冈石窟工程一度中止,仅在唐初贞观十四年(640年),据《金碑》记载开始进行局部的雕凿工程。第3窟后室的三尊大像,为初唐时对北魏未完工程的继续雕造。三尊造像,面容亲切,形体丰硕,正中倚坐佛高约10米,为阿弥陀佛像;左右二胁侍菩萨立像各高六米左右,身肢丰满,上披络腋,帔帛绕肩,宝冠正中分别饰化佛与

宝瓶,表明应为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辽代对佛像进行修整和彩绘,并建木结构窟檐,辽末毁于兵火。金代重建窟檐建筑,明末又因战乱化为灰烬,现存木构建筑为清代重建云冈寺院建造。

五、艺术风格

云冈石窟以气魄宏伟著称于世,其内容充实,雕凿富丽,它是研究北魏时代石窟寺艺术的重要场所,综述艺术风格,大约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石窟构造

佛教石窟是僧徒礼拜释迦牟尼的场所,石窟内石质坚硬牢固,能够精雕细刻,使佛像长期保存。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三世纪,盛于五一八世纪,云冈石窟雕凿时代恰好在我国石窟盛行期间。云冈石窟构造主要分三类,第一类为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第二类为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第三类是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佛像的大像窟。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经营的佛教场所,因而以大像窟最负盛名。文献记载北魏灵岩寺(即云冈石窟)可居三千人,东头佛寺可容千人。巨大的窟室,又是禅师为了广聚沙门同修禅法的场所。

大像窟空间感、立体感强,场面宏伟,主像高大,与左右两侧佛像,构成三世佛,这是“昙曜五窟”常见的组合。主佛高大威严,浑厚朴实,是帝王的象征。孝文帝时期的石窟出现双窟,主像是释迦、多宝并坐说法,出现了佛装的交脚弥勒、护法诸天和大型供养人行列,还分层分段大面积布置佛教本生故事。迁洛以后的石窟则多中、小型化。云冈石窟洞室内,大多立体感很强,正壁和左右两壁正中雕塑立体的佛和胁侍菩萨弟子,其下浮雕供养人,四壁上端浮雕天宫伎乐,有的壁面满雕千佛。窟顶藻井中心多雕覆莲,周围伎乐天起舞。至尊佛像

多端坐，两眼前视，嘴角上露出一丝发自内心的微笑；菩萨弟子肃静而立，而供养人则虔诚拜佛，俯首听法。洞窟构造展现出一组浑然天成的“佛国世界”。

石窟内主体造像采取突出中心的左右对称式构图，以佛为中心，在左右两侧，从早期两侧各一坐佛，再到左侧弥勒菩萨，右侧坐佛。晚期演变为由近及远侍列成对的弟子、菩萨和力士。在佛教组合造像中，神与神有主和仆之分，也有尊和卑之别。这种组合造像称作整铺，一般多一铺三身，即一佛二菩萨或二弟子；其次为一铺五身，即一佛二菩萨二弟子，或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佛高居其中，多为结跏趺坐或善跏趺坐于高座上，端严无比。弟子菩萨侍立两侧，形象都小于佛，而且多面向佛。雕刻技法上，主佛作半圆雕，余为高浮雕或浅浮雕，供养人行列多以浅浮雕、凸平面雕或线雕手法进行。佛经故事则据故事顺序进行构图，云冈第6窟浮雕出39幅佛传故事是依洞窟形制，按顺序进行雕造的故事图。

（二）造像演变

云冈石窟造像艺术渊源，应与古代印度、中亚佛教艺术有关；探其近源则与中国新疆地区、河西地区及南方等地区的佛教艺术有关。

北魏迁都平城后，将百工伎巧十万户迁到平城。太延五年（439年），道武帝灭北凉，迫使凉州佛教文化大转移，北魏已成为当时中外文化中心地带。经常往来中西交通要道的商贾汇入平城，接着西域、印度等国沙门、使者接踵而来。据《魏书·释老志》称，太安初年（455年），今斯里兰卡国僧人5人，“奉佛像三，到京师”。还有喀什的僧人，“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西域僧人携带佛像，应属西域佛教艺术的高水平。云冈“昙曜五窟”造像，反映出西域凉州造像以至犍陀罗造像的特点，又注入中国化造像的新特征。佛像高肉髻，面相丰圆，身体壮硕，同敦煌莫高窟及麦积山、炳灵寺早期造像相似。菩萨像圆脸、短

身,头戴宝冠,接近龟兹壁画中菩萨像。20窟主佛质料厚重的衣着,凸起的衣服,反映了犍陀罗造像和中亚服装的特点。18窟主佛服装轻薄贴体,衣纹紧密,反映了印度恒河流域一带笈多造像的某种特征。佛像的服装,或右袒,或通肩,则代表了平城佛教造像艺术家的新技法和新风格,他们继承汉画像石传统技法,以阴线刻画衣纹,增加服装的质感,给人新鲜明快的印象。观察“昙曜五窟”造像,可以认为保留较多的外来因素,尤其受中国境内新疆龟兹石窟、河西凉州石窟体系影响较深。

孝文帝时期积极推行汉化改革政策,出现一种新造型、新题材、新服制的造像,则是南方汉文化影响的产物。南方地区的佛教造像,在东晋十六国以来,在规模和技术上都达到了超越前代的水平,以戴逵、顾恺之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注重“传神写照”,绘塑出中国式的佛像体系,以适应社会需求和审美情趣。南朝造像形体秀俊,强调装饰性,是一种“秀骨清像”式的风格。孝文帝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更多地汲取南朝文化因素,云冈石窟造像创造出被称为“太和造像”的新风格。一种面相清瘦,褒衣博带,眉目开朗,神采飘逸的形象,追求形式严整,强调装饰化作风的造像出现。这种造像直接影响到孝文帝迁洛后建造的龙门石窟造像,而且远及敦煌北魏石窟。在雕刻技法上,艺术家将凸起的繁细衣纹加以简化,用雕刻较深的直平阶梯式衣纹,来增加造像的立体感和现实性。平城的雕刻者们,继承古代雕刻艺术的优良传统,吸收和融合外来艺术技巧,创造出独特的雕塑艺术风格,为隋唐以后雕刻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云冈模式

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国家营建的大石窟,石窟位于国都平城西郊,它的开凿在当时具有深远的政治、文化影响。研究云冈石窟,对中国佛教艺术的渊源有重要意义。研究者以历史文献、造像铭记、文字记录为依据,用考古学的标型学、年代学的方法,把云冈石窟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昙曜五窟，约于北魏文成帝、献文帝时期，相当于北魏中期。石窟规模宏伟，造像融合中西文化，有自己的显著特色，构成以云冈为中心的新模式，是石窟的初创期。第二阶段相当于孝文帝汉化改革初期，迁都洛阳以前，属北魏中后期。石窟完全融入西方因素，汉化趋势发展迅速，雕刻追求工丽，进入石窟建凿的全盛期。第三阶段约于迁都洛阳之后的孝文帝、宣武帝时期，相当于北魏后期。石窟开始中小型化，样式繁杂，“秀骨清像”造像完全占据主流，属于石窟风格渐变期，云冈模式完全形成。^①

开凿石窟雕造佛像是石窟寺艺术的主流，石窟寺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依传统的观念，应该大体上自西向东逐渐延伸，由我国新疆地区的拜城、库车的龟兹石窟开始，传到敦煌、麦积山石窟后，经河西走廊输送到中原地区，到达云冈、龙门、巩县乃至响堂、天龙山等处。云冈早期的昙曜五窟的艺术风格，证实与新疆龟兹石窟有一定联系。但是，平城进入孝文帝汉化改革阶段以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成为北方地区的中心地带。孝文石窟和太和式造像，其盛行范围逐渐扩大。孝文帝迁洛以后，龙门石窟仿照云冈石窟进行雕凿，甚至传播到石窟开凿较早的河西地区。

孝文帝时期的平城是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有条件聚集、招揽天下名僧巨匠；当时的平城附近广建佛寺，工程日趋精丽。在冯氏临政期间，其宠臣钳耳庆时（王遇）是位精于监造设计石窟、佛寺的巧匠。《水经注·灤水》记述：“（平城）东郭外，太和中闾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祇洹舍于东皋，椽瓦梁栋、台壁椽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图制可观。”孝文帝崇佛拜佛，重视义理之学，使北魏佛教走上禅、理并重的阶段。北魏佛教逐渐盛行起讲论之风，《成实》、《涅

^①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载《中国石窟·云冈石窟》，日本平凡社版。

槃》和《法华》、《维摩》经受到重视。在平城讲经的高僧逐渐增多,先后有僧渊、昙度、慧记、道登等,他们对孝文帝影响颇深,此时孝文帝崇法已深涉义理,使平城的佛事活动进入高潮。由于汉化政策的推广,北魏与西域关系远不如过去密切,佛事交往逐渐减弱。平城这座北魏都城,一时间成为国内、国际间交流的汇集点,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并且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佛教石窟改变了过去自西向东的流传路线,从云冈石窟模式到龙门石窟,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展逐步深入,逐渐在中国石窟中占主导地位。

第三节 天龙山石窟

一、历史概况

天龙山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36 公里,系吕梁山脉的分支,海拔 1700 米。在天龙山东西两峰陡峭的悬崖腰部,分布着大小不等、高低错落的石窟。其中东峰 12 窟,西峰 13 窟,共计 25 洞窟,包含了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以及隋、唐近 5 个世纪的佛教雕刻艺术品。

北魏永熙元年(532 年),东魏高欢消灭盘踞在晋阳(今太原市)的北魏权贵尔朱氏,同时在晋阳建大丞相府。大约永熙元年至东魏武定五年(547 年)前后近十五年的时间,高欢坐镇晋阳。虽然永熙三年(534 年)东魏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但晋阳仍是实际上的政治中心,被称为夏都。高欢崇拜佛法,据《资治通鉴》记载:“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俱徙。”可见当时晋阳佛寺林立,僧尼颇众。晋阳与邺城是东魏的两个政治中心,因而众多的僧侣往来于两城之间,《续高僧传·慧光传》记录了高僧慧光和弟子灵询曾一度居住晋

阳。高欢执政晋阳，曾建避暑宫于天龙山^①。因此推测，天龙山石窟的开凿应在高欢宣政晋阳期间。

东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欢死后，其子高洋废东魏而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文宣帝高洋仍以晋阳为陪都，崇尚佛法，于晋阳大兴寺塔，开窟造像。天保二年至皇建二年(551—561年)之间，先后兴建晋阳开化寺、崇福寺、童子寺，依山刻佛像，缘山凿石室，其规模宏伟，为当时罕见。天龙山石窟北齐造像主要开凿于这段时期，它与邺都附近造像遥相呼应，兴盛不衰。武成帝高湛、后主高纬时期，佛寺繁盛，并于晋阳西山开凿大佛，使天龙山石窟受到冷落。

北齐隆化元年(576年)十二月，北周攻入晋阳，次年北齐灭亡。北周武帝宇文邕推行灭法政策，天龙山石窟在北周期间基本没有营建。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581年)废周自立，弘扬佛法。其次子杨广封为晋王，镇守晋阳，他竭力倡导佛事，营建寺塔。天龙山第8窟前廊有隋开皇四年开窟造像碑文，表明当时曾大量雕造石窟。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反隋，攻取长安后建立唐朝。初唐时期采取的抑佛扬道的政策，一度使佛教受到限制。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则信崇佛法，唐僧人为了迎合武则天当皇帝的需要，编造《大云经》，称武则天是弥勒转世。因此，盛唐时出现以弥勒为主的造像，这种内容的造像在武则天死后逐渐停止。天龙山最大石窟主像以弥勒像为尊，说明开凿于盛唐时期。武则天时代僧人在太原大肆建筑寺塔和开凿佛像，使天龙山石窟开凿达到了高潮。

宋元以降，石窟造像日益衰落，窟前楼阁日渐破损，虽然各朝略有修葺，但已达不到往日的辉煌。本世纪初，外国学者涉足天龙山石窟。先后有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和田中俊逸，瑞典学者喜龙仁

^① 避暑宫见于五代北汉广运二年(975年)，尚书左仆射李焯撰《北汉英武皇帝新建天龙寺千佛楼碑》。

等,相继发表天龙山石窟图片和文章,遂使名播海外。二十年代始,石窟灾难降临,外国文物窃贼与当地劣僧勾结,大量精美雕刻品被盗凿劫往国外,散布在日本和欧美各国。据国外有人统计,损失石像达150件,它是国内石窟中破坏最严重的一处。八十年代开始,有关文物部门对部分石窟开始修复,现列入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时代特征

天龙山石窟是集建筑、雕塑为一体的宗教艺术,其中雕塑占主体地位。雕塑的题材和对象是佛教尊奉的诸佛和诸神,主要造像有佛教的造创者释迦牟尼像,其次是弥勒佛、阿弥陀佛;还有胁侍观音、大势至、文殊和普贤菩萨、供养菩萨以及佛的诸位弟子。再者是护法天神、力士、飞天、地神和供养人像。天龙山石窟大约经历五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按时代划分四个时期。^①

(一) 东魏时期

开凿于东魏后期高欢摄政时代,位于天龙山东峰的第2、3窟。东魏石窟造像题材范围比较狭窄,是北魏云冈石窟模式的延续。一般多以释迦牟尼的说法像为主尊,两侧分别是禅定像和胁侍菩萨造像,是一佛二菩萨的组合造像。第2、3窟形制为方形,凿出莲花藻井,窟内四周底部凿出沿着壁面下部的一个低坛,坛上正壁、左壁、右壁各开一龕,是三壁三龕式的石窟。三尊造像,正壁、右壁是结跏趺坐,左壁是倚坐像。窟内雕塑简洁明快,朴实庄重。以第3窟为例,龕内一佛二菩萨像,龕外雕二供养人像。佛像面相清瘦,身体修长,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衣纹平直阶梯形;菩萨袒上身,下着长裙,披巾于腹部穿环;飞天发髻作双结,上身直,腿弯屈,着紧身裤;供养人举手作揖,屈膝

^① 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见《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欲跪，神态喜悦。石窟造像风格与云冈三期(494—524年)、龙门二期(516—528年)、敦煌北朝三期(525—545年)相近，早于安阳宝山灵泉寺东魏武定四年(546年)大留圣窟。

(二) 北齐时期

开凿于北齐高洋以晋阳为陪都期间，位于东峰的第1窟和西峰的第10、16窟。石窟仍以北魏流行的前后室方形窟为主，三壁三龕，造像题材为释迦多宝、交脚弥勒和倚坐佛。前室廊凿八角柱，刻仰莲、替木，承接替木的额枋上有斗拱；斗拱分别一斗三升和“人”字形。窟门两侧雕力士像，窟顶雕飞天。譬如第10窟，正面坛基上镌刻释迦多宝说法像为主尊，坛前正中刻摩尼珠，侧面浮雕二蹲狮奉博山炉。两侧一佛二立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立菩萨；坛前刻乾闥婆伎乐人像，细腰鼓、都昙鼓、琵琶、瑟等乐器清晰可辨。门内左右两侧雕持叉二天神像，门外左右为力士像。佛像肉髻低平，肩宽腹鼓，着褒衣博带式袒右肩式袈裟，腿部出现双阴线衣纹；菩萨头戴花冠，披巾自然下垂；天王力士深目高鼻，均着菩萨装，衣纹稀疏。石窟造像风格与响堂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安阳小南海石窟的北齐、北周时期造像雷同，其绝对年代应属北齐期间(550—577年)。

(三) 隋代

位于东峰第8窟，据前廊东壁造像碑文《石室铭》记载，应为隋开皇四年(584年)仪同三司真定县开国侯刘瑞等人开凿。窟形是天龙山唯一的前后室中心塔柱窟，前后室作三间仿木式前廊，建筑特征与北齐石窟相似。主室呈方形，三壁三龕，龕内或一佛二弟子、或一佛二弟子二立菩萨。中心塔柱四面各开一龕，后壁龕较特殊，佛像右侧原有一天王像。佛像面相略显方圆，素面低平肉髻，袒右或内着僧祇支，衣纹简洁朴拙；菩萨头戴花冠，斜披络腋，双肩垂挂穗状璎珞；弟子着袒右式偏衫。窟内造像形式多变，雕刻细致实用，体现了隋代造像风格。

(四) 唐 代

位于东峰第4—7号窟,西峰9、11—15号窟、17—21号窟,其中有4个窟未编号,合计凿窟19个。石窟形制分别为方形前后室、圆形前后室和圆形单室三种。造像组合以三壁三佛为主,主尊佛像为结跏趺坐式的释迦多宝、弥勒、阿弥陀佛,其组合有一佛二立菩萨二坐菩萨、一佛二弟子二立菩萨二坐菩萨等形式。佛、菩萨头与身体比例和谐,面相丰腴。佛像水波纹或旋涡纹高肉髻,着袒右式或通肩式袈裟,裙摆覆座前呈倒山字形,衣纹立体感强烈。菩萨头束高髻,颈饰花形项圈,披巾婉转自如。力士上身裸,下着袍。唐代石窟中西峰第9窟属中晚唐杰作,其以规模宏伟,气势恢弘蜚声中外。石窟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弥勒大佛坐像,高约8米,面相方圆、丰润雍容,足踏莲花;下层主像为十一面观音,左雕文殊骑狮,右镌普贤坐像。观音菩萨像为站姿,通高11米,上身披瓔珞,下裙贴双腿,身体轻纱透体,弯曲自然优美。文殊菩萨含笑凝眸,普贤菩萨端坐,神态怡然自得。唐代佛教崇拜观音,从永徽年间(650—655年)开始,观音造像有增无减,天龙山各窟观音体态婀娜多姿,容颜妩媚动人,反映了唐代造像风格。唐代各种石窟在窟形和造像上,与龙门、庆阳、须弥山唐代石窟有相似之处,推测其年代应在盛唐至晚唐期间。

三、艺术特征

天龙山石窟依山开凿,岩石易雕凿,也易风化,属灰白色沙岩。造像的雕刻技艺可分为圆雕和浮雕两大类,圆雕以贴壁圆雕为主,塑造大型佛像和菩萨像;浮雕多用于建筑构件、羽人、龕楣花纹等。造像大至数米,小仅盈寸,从佛像到花纹均反映出南北朝至唐代石窟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

(一) 写 实 性

东魏时期雕刻属贴壁圆雕和浮雕技艺结合手法,造像面相削瘦,褒衣博带式袈裟衣蔽全身,雕刻线条清晰;浮雕中的树下思惟菩萨、维摩、文殊像,神态各异,造型生动;体现了东魏继承北魏的传统雕刻技法,结构紧凑、刀法纯熟,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北齐造像面相浑圆,袒右式斜披佛衣,雕刻线条硬直;浮雕前廊中的“人”字形拱和一斗三升拱构造尺寸与实际建筑相近,建筑风格具有时代感,代表了北齐的木构建筑风格。隋代造像则呈现出向唐代过渡性特征,形体方整,衣纹简练,虽然具有呆板的风格,但给人以时代写实感。唐代造像制作技艺精纯,雕刻圆熟,比例适当,造型准确,更具有写实性。第18窟造像安然闲坐,形象逼真,在质感极强的薄纱衬托下,丰润的肌肤似有弹性,是唐代最具写实风格的杰出代表。第17窟造像则衣纹清晰,线条深刻,以犍陀罗式的纹饰为基础,渗入中国传统式的表现手法。最大的第9窟释迦牟尼大像是仅有的圆雕造像,面相圆润柔和,体态威严端庄,圆而丰满的面庞是中外文化结合的典范。十一面观音立像,面目清丽,文静典雅;体态优美轻盈,右腿微弯,臀部略向左扭,重心稍偏向左脚,强调了谦虚而自然的立意;璎珞和飘带周身披挂,罗纱转折自如平整,加强了本体的性格。雕像极富质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雕凿技艺鬼斧神工,其写实技法可与西方雕刻相媲美。

(二) 装饰性

天龙山石窟造佛以形象生动而具有强烈的写实性,佛像装饰的华美更具有感染力。佛装的褒衣博带,菩萨、伎乐的花冠、璎珞和披巾,窟前八角廊柱、一斗三升拱及“人”字形叉手,龕楣火焰宝珠与莲花纹,均以雕刻细微的手法,作为一种装饰形式起到美化佛龕的作用。值得注目的是唐代菩萨的装饰性效果,给人们显示出一种富丽、华贵的气势。唐代的仕女造像,无论是卷轴、壁画和镌凿雕像,都具有华美浓艳的装饰风格。流行至今的唐代著名作品《簪花仕女图》,是唐代高手周昉的杰作,仕女盛装浓抹,发髻上插着荷花、牡丹,身着纱衣

长裙,打扮得华丽入时,装饰气氛浓厚。天龙山石窟唐代菩萨像,头束高髻,面相丰腴,花饰项圈下接连珠纹璎珞,披巾婉转自如,络腋斜披透体。从整体构思观察,菩萨优美的体态、华丽的装饰,体现了唐代气势宏大、豪放飘逸的装饰风格。

第四节 中小型佛教石窟

一、羊头山石窟

山西高平县东北 15 公里李家庄村北的山巅,刻有状如伏羊的巨石,故山以“羊头”为名。高峰凸起的山巅、山腰遍布石刻造像和石塔,故名“羊头山石窟”。据县志记载,羊头山原为清化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 年),现仍可见唐代殿基。从明代碑刻可知该寺在万历年间(1573—1620 年),尚具有一定规模,近世寺院俱毁,故又称“清化寺石窟”。现按山体形状大致划分 9 区,共有较大窟龕 22 个,小型佛龕 80 余个,千佛碑 1 通,石塔 4 座,时代约从北魏至唐代陆续开凿,现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窟寺依山势排列,每个洞窟均开凿于裸露岩石的侧面,一般为—石—窟,个别有一石二窟或三窟。洞窟平面多正方形,窟门多雕有门框,门顶刻火焰纹饰。龕壁雕—佛二菩萨或—佛二弟子。窟外雕众多小龕,龕内雕大小不同的佛、菩萨、弟子、天王、供养人等。

第 1 区位于山峰顶部,有石塔、佛龕,梯形塔身四壁为龕,内凿—佛二菩萨,造像形制颇具北魏风格。第 2 区为西南山巅,凿佛龕 87 个,与主佛共 88 尊,又称“八十八佛窟”。佛像造型清秀,身体纤细修长,应属北齐至隋代遗物。第 3 区在山腰,为千佛洞,窟内呈方形,四壁满雕佛龕,正面佛像 5 尊,左右壁镌刻胁侍菩萨。佛像面相丰满,结

跏趺坐姿，胸部隆起，刀法流畅，似唐代风格。第4区在千佛洞南侧，为方塔窟区。南北对峙方塔，塔下雕佛龕，置一佛二菩萨，时代与第3区相当。第5区在千佛洞东南部，为圆塔窟区。崖面雕小佛龕，内刻佛、菩萨、金刚等，属北朝作品。第6区在圆塔窟区东，内雕释迦多宝对坐像，称多宝龕窟区。洞窟平面长方形，面积较大，洞口龕楣雕印度式尖拱状，内龕雕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面容略瘦，发髻较平，衣纹简洁而流畅，是北魏晚期的造像风格。该区还有少数唐代补造的造像。第7区在清化寺遗址西南，为大石窟区。洞龕内坐佛和菩萨，系北齐造像。窟门外小龕俱为隋唐时代雕凿。第8区在清化寺遗址南，因依崖满雕佛像称佛山区。龕分上下二层，上层是主体佛龕，雕释迦结跏趺坐说法像，两侧胁侍菩萨，呈北朝风格；下层佛像风格略有差异，系唐代作品。第9区在清化寺遗址南，多数小龕造像，属唐代风格，称唐代龕区。

该石窟除九区遍布佛龕外，尚有北朝风格千佛碑，高约6米。还存唐代石塔4座，分别为密檐式与楼阁式。该石窟规模、数量均不及大型石窟，但其时代跨度较长，经历北魏、北齐、隋、唐各代，反映了该地区的佛教文化特色，为研究石窟寺艺术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地域性资料。

二、开河寺石窟

山西平定县东北8公里岩会乡乱流村西河槽，分布着30余米狭长地带的石窟，这里曾建有开河寺，故称开河寺石窟。据有关史料记载，开河寺创建于北魏至北齐，“堂上古佛像高丈八，下列石佛百余尊。”现寺庙建筑已毁，石窟依岩开凿，有32个中小型石窟，摩崖造像80余尊。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石窟内佛像俱遭受破坏，残缺不全。佛像最高达5米，矮者1

米左右。造像未经破坏处,可见双颌下垂,袒右式袈裟痕迹,雕刻形态生动,线条流畅,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现发现可辨认刻字三处,分别为“大魏武定五年(547年)岁次”、“建于皇建二年(561年)”、“大齐河清二年(563年)岁次”等字样,可知该石窟建造时代属东魏、北齐年间。

三、庙岭山石窟

在山西省榆社县西南5公里城关镇桑村沟的庙岭山腰,分布数处石窟造像,因而称庙岭石窟。该石窟凿造于北魏迄唐代,据记载,原有寺院,名“响堂寺”,因凿石为室,其状若瓮,满堂皆响,而得名。又称“响堂寺石窟”。

石窟范围内,今存摩崖造像一尊,高3.3米,面形方圆,肩披袈裟,轻纱贴体,结跏趺坐姿,形态逼真,雕刻刀法细腻,属唐代造像上乘之作。有称“石室方丈”千佛洞一处,洞窟分前后室,前室平面近方形,西南角辟门,窟内满壁镌刻千佛达1090尊,高者逾一米,低者数厘米。造像高鼻深目,褒衣博带,形象生动,初看千人一面,细观各显千秋,为北魏晚期造像。后室与前室平面相同,内存后代壁画。石窟附近东北山巅有唐代禅师塔。

庙岭山石窟是一处北魏、唐代风格的佛教造像石窟,是研究地区性石窟的重要资料,现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处山峰险峻,苍松蔽日,众山合围,曲径通幽,又为游览胜地。

四、石佛寺石窟

山西省左权县城西3.5公里井沟村西南的山冈,雕凿着两个石窟,据辽县(今左权县)县志记载:“城西七里许,山有石洞,中镌石佛,因名石佛寺。”石佛寺原有木构建筑数处,近代遭受破坏遂成废墟。

第1窟,平面呈方形,圆拱龕形窟门,两侧各雕一力士像;窟内三壁三龕,释迦、思惟菩萨、弥勒像三佛组合,两侧胁侍弟子和菩萨。佛像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裙摆呈八字形斜向展开,具有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造像风格。第2窟,平面略呈梯形,圆拱龕形窟门。窟内三壁三龕,正壁结跏坐佛二弟子二菩萨,左壁半跏坐菩萨二菩萨,右壁倚坐佛二菩萨。造像风格与第1窟有别,表现出许多唐宋时期的造像特征。^①

北魏时期由于云冈石窟的影响,山西境内开凿石窟数量增多,尤其北魏晚期至东魏、北齐时期,太原和邺城成为当时政治、军事中心,来往于两者之间的佛事增加,石窟开凿数量增加也当在情理之中。除我们介绍的中小型石窟外,还有左权的“高欢云洞”石窟、榆社圆子山石窟,这些均属于东魏、北齐时期的石窟。唐代的山西具有重要军事地位,太原是著名军事重镇,又是李氏起兵之地,所以,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天龙山石窟的开凿在唐代达到高潮。此外,山西境内还开凿了静乐县净居寺石窟、陵川县灵泉山石窟、乡宁县千佛洞,这些石窟虽属小型石窟,但它们反映了唐代石窟寺艺术风格。研究中小型石窟,对了解北朝、隋唐石窟寺造像的特征、演变、地域性特征,均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节 道教与龙山石窟

一、道教

道教是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① 李裕群:《山西左权石佛寺与“高欢云洞”石窟》,见《文物》1995年9期。

道教将老子或元始天尊视为宇宙的创造者,《魏书·释老志》说:“道家之原,出于老子。”

汉末黄巾起义首领张角,以《太平清领书》为主要经典,用符水治病,创立太平道。张修、张鲁的五斗米道也成为早期道教的一个派别。道教活动以下层民众为对象,很快得以发展,并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旗帜。东晋建武元年(317年)葛洪撰《抱朴子》内篇,丰富了道教思想。北魏太平真君(440—450年)时期,道士寇谦之改造道教,赢得上层统治者支持。唐朝时期,李渊自称李耳的后裔,打起“太上玄元皇帝”尊号,利用道教为唐王朝服务,以道教抑制佛教的发展。唐朝在诸州建筑道观,令士庶家藏《老子》一书,道教地位逐渐提高。北宋真宗开始,后来徽宗继续崇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且刊行道教书籍,置《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金代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创立全真道,得到金代皇帝扶植。元太祖成吉思汗时期(1206—1227年),王喆之徒丘处机受到元朝皇帝礼敬,全真道得以迅速扩展。明代帝王迷信道教,道教一度受宠,但明中叶以后,国力衰竭,逐渐失宠。清代帝王对道教没有多少兴趣,道教从此走下坡路。

道教崇拜三清尊神,他们是由“道”人格化的最高尊神。道教以修炼为主,具体方法有服饵、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篆、房中、辟谷等,以期达到长生不老、成仙羽化。宗教仪式有斋醮、祈祷、诵经、礼忏。道观是道教举行仪式的重要场所,据文献记载隋代已有“天尊、真人石像”。我国四川绵阳玉女泉、青城山天师洞,均为隋大业年间(605—617年)的道教造像。四川安岳玄妙观有现知国内最大的唐代佛道合龕像。但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道教石窟,应为山西太原龙山石窟,它是元代太宗元年(1234年)全真教道人宋德方主持营建。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石窟,是山西省平顺县金灯寺(宝岩寺)明代像(十六世纪)和甘肃庆阳平定川的石窟(十七世纪)。这些石窟造像均是研究中国道教史有价值的资料。

二、龙山石窟

在山西省太原市西南 25 公里的龙山山巅,有一处著名的全真道教石窟,又俗称龙山石窟。龙山林木茂盛,满目青翠,秋来红叶遍野,景色宜人,是道家“自我修炼”的最佳场所。

据《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记载:宋德方“于甲午(元太宗六年,即 1234 年)游太原西山,得昊天观故址,有两石洞,皆道像”,“修葺三年,殿阁峥嵘,金碧丹雘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宋德方出资重建昊天观,在原有两洞旁再开五窟。明正德年间(1506—1521 年),人们又凿一窟,形成了现在的八窟规模。

宋德方(1183—1247 年),字广道,号披云子,山东莱州掖城(今山东掖县)人,幼出家为道,初师刘处玄,后拜于全真教首领丘处机门下,并出任教门提点。元太宗九年(1237 年)宋德方在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市)玄都观校刻道教《玄都宝藏》七八〇〇余卷。他晚年颇受元朝政府器重,赐号“玄都至道真人”,死后追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

龙山石窟现存八个洞窟,自上而下共三层,由西向东分布。龕内雕像各洞数额不同,共 40 余尊,大都保存完好。造像内容主要有元始天尊、道教三清、三天大法师、道教七真人、三皇,还有宋德方卧像等。

第 1 窟称“虚皇龕”,窟形平面略呈圆形,内正面凿元始天尊(老子)坐像,两侧面向主像立十常侍,洞顶雕刻两条盘龙。第 2 窟称“三清龕”,三清是玉清、上清、太清,道教的三位天尊。龕内正中为玉清元始天尊,左侧上清灵宝天尊,右侧太清道德天尊。两旁还有 6 位真人和 6 个侍女。第 3 窟称“卧龙龕”,内雕宋德方侧身卧像一尊,头东足西,闭目沉思。第 4 窟称“玄真龕”,主像 3 尊呈坐姿,余皆站立,共 10 余尊。第 5 窟称“三天大法师龕”。扁方形平面上凿端坐于尖拱形龕内的三天大法师像,分别是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还凿 1 尊身体修

长、侧身微曲的侍者像。第4、5窟是宋德方凿新窟时发现的元代以前的旧窟，雕工和造型显示出两种不同的风格。第6窟称“七真龕”，又名“玄门列祖洞”，分内外二室，内室凿全真道首王重阳七大弟子坐像，外室雕青龙、白虎像。第7、8窟均称“辨道龕”，其中第7窟有3尊雕像，一坐二立；窟顶雕刻龙凤、莲花图案，因龕内有披云子的自赞辞，故又称“披云子龕”。第8窟是明代雕凿的造像，原为伏羲、神农、黄帝三皇石像，俱毁。现有清代补塑泥像三尊。因窟内供奉三皇，又叫“三皇龕”。

龙山石窟自元代开凿以来，已经历7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基本保持原有风貌。雕像的造型以坐、立为主，还有卧像，装饰性图案也比较丰富。石窟规模虽然不大，但雕工朴实、刀法流畅、线条简练，给人以庄重浑厚和风格粗犷的感觉，同时具有元代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佛教石窟寺艺术截然不同，是道教石窟寺艺术的代表作。龙山石窟是元代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对研究我国道教传播和全真道教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造像内容、雕刻技艺在我国石窟寺艺术中占重要地位。

第七章 文物名胜

第一节 上古遗迹

山西境内,有传说时期的古老遗迹。这类遗迹,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环节。陶唐时期,邈远而难以求实。晋国建都,称雄于春秋,鼎峙于战国。三晋文化肇基于此,其后的灿烂辉煌,均可追溯到这里。

一、尧庙、尧陵

尧是中华民族古代传说中的圣王。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以后历代有“尧都平阳”之说。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市,《诗经》中所说的唐国即在山西境内。故尧庙和尧陵都在临汾。

(一) 尧 庙

尧庙在临汾城南5里的尧庙村。据现存于庙中的明代碑文所载,尧庙原建于汾河之西,西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年)迁至汾河东岸,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再迁至今址。《水经注》卷六“汾水”云:

“汾水又南迳白马城西。魏刑白马而筑之，故世谓之白马城，今平阳郡治。汾水又南迳平阳县故城东……水侧有尧庙，庙前有碑。《魏土地记》曰：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东原上有小台，台上有尧神屋、石碑。”这就是说，早在 1600 多年以前，临汾这个地方已有尧庙，人们在这里祭祀尧，纪念这位传颂不绝的圣王。

据说尧庙最辉煌的时期，规模盛大，占地有 750 亩之多。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或受水火之灾，或被兵燹所毁，断壁残垣，满目狼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迭经修葺重建，具备一定规模。今占地面积为 80 亩，主要建筑为五凤楼、尧井亭、广运殿以及寝宫。

五凤楼在尧庙的前部，高约 20 米，共 3 层，形制精巧，外观典雅。五凤楼这个楼名，具有帝王尊严、祥瑞荟萃、文采才华等多种涵义。唐代张崇在庐州府城（今安徽合肥）修筑城垣时建楼一座，有凤栖集于楼上，因而取名五凤楼，纪此祥瑞。后梁太祖朱温准备在洛阳建都，先派人建高楼一座，名为五凤楼，取意楼高百丈，在天半空，五凤翘翼，象征帝王之家的崇荣高华。宋代韩洎评论其兄韩溥的文章，如同绳枢草舍，自己则是修五凤楼的高手，韩溥就寄诗给他，说“助你添修五凤楼”，因此五凤楼又是文华词采的象征。尧庙中建一座五凤楼，几种象征的意义给这位圣王的形象更增添了许多光辉。而当地老百姓却愿意指实，说这座楼是尧与 4 位大臣商讨国政的地方，五凤是指 5 个人。

过五凤楼是尧井亭，高 5.4 米，六角形，亭中央有古井一眼，井水清冽。井亭旁有古柏，亭亭如盖。古柏中又有柏抱槐、柏抱楸，老树新枝缠绕依倚，妙趣横生。传说这口井是尧与其大臣凿出的历史上的第一口井，故建亭纪念。古人懂得掘井饮水，从此改变了傍河湖而居的局面，拓展了生存空间，确实值得纪念。古籍中记载，发明凿井的人是伯益，此人是尧的大臣。

井亭之后为尧庙的主体建筑广运殿。殿高 27 米，殿内有金柱

42,殿外檐柱 76,布局宏阔,气魄雄伟。殿名广运,取自《尚书·大禹谟》中伯益颂扬尧的话:“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广运是说尧的德政泽被广大,影响深远。殿门正上方又雕有 4 个大字:“民无能名。”这也是颂扬尧德的古老语言,出自《论语·泰伯》,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尧太伟大了,就如同天一样,只有尧效法了天的伟大。他的恩泽浩荡,老百姓都不知怎样称赞他才好。殿内有尧的塑像 1 尊,左右塑 4 个侍臣。

(二) 尧陵

尧陵在临汾市区东北 70 里处郭村之西,汾河水于陵南流过。临汾旧志载:“城东七十里俗谓之神林,高一百五十尺,广二百余步。旁皆山石,惟此地为平土,深丈余。其庙正殿三间,庑十间。山后有河一道。有金泰和二年碑记。”据此通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 年)碑所载,唐太宗征辽东曾驻蹕于此,因谒尧陵,遂塑己像。

陵前祠宇,历代都曾重修。中统年间(1260—1264 年),元世祖忽必烈曾命道教真人姜善信修筑尧陵,明代成化、嘉靖,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屡次缮修。明嘉靖十八年(1539 年)所刻尧陵碑,至今保存完好,可以看到当时尧陵的全貌。

现在陵冢高 50 米,绕周 80 米,矗然耸立。陵周围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四围土崖环绕,河流清浅,一派幽静。陵前祠宇修整完好,祠有山门,入门建乐楼,牌坊、厢屋、献殿、棗殿、寝殿、碑亭等建筑鳞次栉比,布局紧凑,木作细致,雕刻精美。远望红墙绿瓦,绿树成荫,掩映如画。祠内保存着十余通碑碣,从中可以考察尧陵的兴衰沿革。

二、禹门口、大禹渡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是并称的圣王。古代也有禹在山

西建都的说法,《帝王世纪》说: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不过,禹在山西的遗迹,最著名的还是与治水有关的地方。

(一) 禹 门 口

禹门口在山西河津市西北 12 公里处的黄河峡谷中。禹门原称龙门,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家住夏阳龙门。唐代诗仙李白诗云:“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还家。”已经提到了禹与龙门的关系。

当然,大禹开凿龙门的记载,比李白还要早得多。《墨子·兼爱中》即有“禹凿龙门”的记载。《吕氏春秋·爱类》有较详细的记述:“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这是说在大禹治水以前,黄河没有龙门以下的河道,水蓄不泄,一片汪洋泽国,大禹凿龙门,发吕梁,将水引至下游,导入大海,才解除了水患。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说:“龙门,河之阨,在左冯翊夏阳之北。”夏阳是陕西韩城,禹门口正在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的黄河峡谷中。

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四记载龙门,有上下两口,上口在北屈县(今山西吉县),叫孟门。该书云:“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西十里有风山。风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门山。……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濤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郦道元描述的大龙门,文采斐然,堪与他描写长江三峡的文字相媲美。

郦道元一方面记述大禹凿石,另一方面又相信水能入石,看来他倾向于认为峡谷是自然景观。不过,在他说到龙门下口时,主要是叙

述大禹的功迹：“昔者，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魏土地记》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岸上并有庙祠，祠前有石碑三所。”

如今，庙、碑已无，而将龙门称为禹门，口碑流传，是对大禹更好的纪念。

禹门早已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津，故称禹门口。现在渡口已成陈迹，其上建有三桥，铁索桥、公路桥、铁路桥并列。行人车辆往来桥上，俯瞰脚下，龙门激浪，平地震雷，情景更是壮观。

（二）大禹渡

大禹渡是山西芮城县城东南 5 公里处黄河上的一个渡口，河对岸是河南省灵宝县的禹店村。相传大禹治水，在凿开龙门之后，来到此处，于古柏树下休息，然后渡过黄河，宿于对岸，故此岸渡河处称大禹渡，对岸住宿处叫禹店村。

现在临河处保存有一通重建禹王庙碑。碑文记载，庙里有古柏，该地原名神柏峪，由于大禹治水曾栖息于此，称为大禹渡。山谷上有摩崖石刻，共 6 字：“舟于此，出水得。”而今庙已不存，古柏仍在，树干周长 3.83 米，可称合抱大树，苍翠如昔，风神依旧。渡口依然繁忙，船只如梭。

三、天马一曲村遗址晋侯墓地

在晋南翼城的天马与曲沃的曲村之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总面积达 100 万平方米的古文化遗址，称为天马一曲村遗址。在这个遗址的中心位置，近年发掘一处晋侯墓地。

晋侯墓地东西长约 150 米，南北宽约 130 米，在这个范围内分布着 16 座大型墓葬，基本上呈南北两排分列，每排又包括若干组，每组

多数由两座东西平行并列的墓组成,个别为一座或三座。

M₁、M₂ 是一对平行并列的墓,时代为西周。墓葬平面均呈“甲”字形,带有斜坡墓道,墓室在北,墓道向南,墓室平面近方形。M₁ 面积略大,M₂ 墓道较长。

M₁ 墓底距墓口深 7.46 米,有积炭。墓已被盗,墓中原貌遭破坏,仅外椁部分保存原形。但墓中仍发现铜釜铃、车轭、辖、镳、衔、戈、矛、小铜鱼、陶鬲等,在一件残铜容器片上有三行铭文。另在曲沃县公安局追缴回的文物中,有一批属于 M₁ 的器物,重要者有铜鼎、石磬等。据报道,追缴回的 M₁ 器物中有晋侯鞞器,载有一代晋侯的名字。

M₂ 亦被盜扰,在盗洞中发现数块残骨,经鉴定为 20 岁左右的女性个体。残存的随葬品有陶鬲、大口尊,铜器有鼎的口沿和足部、铜鱼等,玉器还残留有鸟、璧、蚕形饰、圭以及其他佩饰物。可以认为,M₂ 墓主为 M₁ 墓主的夫人,二墓所葬为一代晋侯及其夫人。

M₃ 与 M₃₁ 是并列平行的一对墓。M₃ 规模宏大,虽然被盜,仍出土许多重要器物。这座墓形制与 M₁ 相似,而墓道填土中有殉马的遗迹,在墓东侧有一座大型车马坑,估计是陪葬的车马坑。墓中残余的青铜器尚有壶 2、簋 2、鼎 1、兔形尊 3、编钟 2,还有铃等小件器物。墓主人尸体这一部分未被盜贼扰动,人骨架虽朽,而身上的玉器、金器等保存完好。

M₃ 墓中铜器中数件有铭文,且内容重要。壶和簋铸有大致相同的铭文,鼎内壁则是不同的铭文。编钟上也有剔刻的铭文。簋和壶上的铭文有“晋侯所作”的内容,有学者考证,晋侯斲即史籍中记载的晋侯仇,他是晋国第十一代国君文侯,他曾同秦襄公一道辅佐周平王东迁,《尚书》中有一篇《文侯之命》,是周天子嘉赏晋文侯的记录。鼎内的铭文提到的是另外一个晋侯,铭文有“晋侯苏作宝罍鼎”的内容。据《世本》所载,晋国第七代国君晋献侯名苏。史籍上关于晋献侯的活动记载不多,而 M₃ 墓中有一大批青铜器被盜卖,其中十多样刻有铭

文的编钟记述了晋侯苏的活动,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M_8 的墓主人是献侯抑或文侯,学术界尚无定论。

M_{31} 位于 M_8 西侧约2米处,二墓亦是夫妻异穴合葬墓,为一代晋侯与夫人之墓葬。 M_{31} 的随葬品很丰富,铜礼器有鼎、簋、壶、盘、盃等,盘上有简单铭文。墓主人身上佩有数百件精美的玉器、串珠等,面部覆盖有玉瞑目,玉器的器形为环、璧、璜、蝉、戈、玦以及成组的串饰。还应提到的是,在 M_{31} 西侧约1米处由北向南纵向排列着三个规格较小的墓,随葬的器物中没有铜器,仅有陶器如大口尊、鬲、罐等,玉器如璜、珠、鸟、兽等,数量也不多。墓主人的骨骼经鉴定均为女性,因此可以认为这三座应是 M_8 的陪葬墓,是晋侯的妾媵安葬于国君与夫人之侧。

M_9 和 M_{13} 是又一对并列平行的墓。 M_9 的墓室内葬车5乘,墓道内葬车2乘,随葬的青铜器也很多,遍布于棺椁之间。只是该墓的青铜器铜质极差,破碎严重,大致可看出有鼎、簋、编钟、甬铃等。墓主人身上佩带的玉饰较少,种类有鹿柄形饰,管状饰等。人骨架很粗壮,身长1.80米,是男性。 M_{13} 则是女性墓,墓的规模略小,比较特殊的是在椁盖板上有一辆随葬的车,车身已朽,车轮仍存,车的轭、衡以及辕头均为青铜所制。其他随葬品,青铜器有鼎、簋、盘、小壶,陶器有鬲、豆、罐等。墓主人胸部有蚌饰、料珠、玉璜、柄形饰等,脚端也有一组贝饰。经研究, M_9 和 M_{13} 是该墓地时代最早的一组墓,约当于西周昭王、穆王时代。

这个墓地尚未全部发掘,已经发掘的资料亦未完全发表,已知大型墓葬共8组16座,可能是埋葬着八代晋侯。另外, M_{64} 出土有晋侯邦父名字的器物。

天马一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的发现,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晋国早期都邑的探寻。晋国最初由周成王“桐叶封弟”分封于唐,《史记·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后改称

为晋,都邑有翼、故绛、曲沃几个地点(这些古地名的确切所在尚需进一步考证),由于晋侯墓地的发现,不少学者认为天马一曲村遗址的范围是晋国早期都邑所在。但遗址的发现至少为探索晋国早期的都邑提供了一个极有力的根据。

第二,为早期晋国史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M₃墓中被盗卖的10件编钟铭文有晋侯苏活动的记载,已见前述。这个墓地所出铜器中提及的晋侯名字,晋侯鞮与晋侯邦父不见于史籍记载;晋侯斲解为晋侯仇存在争论。这些既是新资料,也是新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早期晋国史研究将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第三,加深了对早期晋文化面貌的认识。通过对该墓地的发掘研究,了解到早期晋文化与陕西的宗周文化有着至为密切的联系,铜器、陶器、墓室的形制都相当接近,葬式也相同。唯一表现晋文化个性因素的是陶鬲作联裆型,而不是宗周文化的分裆型,亦不见矮足和无足鬲。由此可以推断,典型的晋文化是在迁都新田以后发展起来的。

四、晋都新田

《左传》记载,晋景公十五年(前585年)“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一直到三家分晋,新田作为晋都长达180多年。经过考古工作者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40多年不懈的努力,可以确指侯马晋国遗址即是晋都新田。这个遗址东西横跨9公里,南北纵深7公里,文化遗存非常丰富。

(一) 城址

在侯马晋国遗址内,共发现牛村、平望、台神、白店、马庄、北坞、呈王等7座古城,前4座古城密集分布于古城遗址西部,后3座分散环列于其东。

牛村古城平面略呈梯形,南北长 1340—1740 米,东西宽 1100—1400 米,南城墙有两座城门。城墙用方块夯筑成,宽 4—8 米,残存高度 0.5—1 米不等。墙外 2 米处有宽约 6 米、深 3—4 米的护城壕遗迹。沿南墙根发现有车道。后来的探测在细节方面有差异,大的方面没有修正。在牛村古城的正中部,有一座至少可以分为三级的夯土台基,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52 米,高于现今地表 6.5 米,顶部有 1 米多厚的建筑物坍塌堆积,可以看到泥条筑法的板瓦和筒瓦残片,这无疑在当时城内的一处大型宫殿基址。对牛村古城文化遗存的研究表明,该城兴建于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即晋都迁于新田的初期稍晚;废弃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约当晋都新田的中期之末。

台神古城与牛村古城并列,推测二城共用一段城墙,牛村古城的西墙与台神古城的东墙大部分是重合的。台神古城南北宽约 1000 米,东西长约 1500 米,大体呈横长方形。城外西北方向有东西并列的夯土台基,中间大而两边小,大的一座较牛村古城内台基略小,小者仅及大者之二分之一,可以看出台基的阶痕。

平望古城在牛村、台神二城的北端,其南墙已进入二城的范围。该城南北长约 1000 米,东西宽 850—1050 米,大体呈竖长方形,唯东北角外凸。城内有夯土台基,位于正中偏西部位。台基有三级,最下一级长宽各 75 米;第二级高出地面 4 米,南部正中为坡状;第三级位于第二级北半部,南北宽 35 米,东西长 45 米,顶上有 1 米多厚的建筑物坍塌堆集,其中瓦片很多,较牛村古城多出一种布纹瓦,高处距地表 8.5 米。另外在此处发现一件加工粗糙的青石残柱础。这显然是一处宫殿遗迹。

白店古城在上述三城之南,情况不详。此城的线索甚少,故近年有学者提出疑问。前述三座古城呈品字形布局,有人称这是晋都新田的独特模式。

呈王古城由南北二城组成,中间用一道夯土墙隔开,北城东墙长

167米,北墙约400米,西墙168米,南墙369米。南城很小,处于北城东南角南端,大体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约214米,南北宽约105米。北城近中部有两处夯土建筑遗迹。二城为同一时期所建,使用年代约当公元前500—前400年间,故可视作一城,为牛村等古城主体群的附属性城堡。

北坞古城由东西两座并列的古城构成。西城近方形,边长约380米,东南角向内凹缺。东城为长方形,南北长约580米,东西宽约530米,西北角向内凹缺。两城相距约10米,其间为一条大路。在东城发现17处夯土遗迹,城西南角为三座东西并列的仓庾类建筑,城西部为一般居址。西城内亦发现12处夯土遗迹。据判断,西城建成早于东城,毁弃时间则相当。

马庄古城的形制、规模与上述二处古城相似,亦由东大西小二小城组成,在二城相交处合用一道城墙,城内也有夯土台基。

有学者指出,牛村、平望、台神为晋国宫城,呈王、北坞、马庄则分属赵氏、范氏、中行氏所有,呈王古城最可能是“赵氏之宫”。

(二) 铸铜遗址

牛村古城南,发现5万多平方米的铸铜遗址,规模巨大,尤以发现陶范数量之多为罕见。

陶范共3万多块,有纹饰的约1万块,可辨认出器形的约1千块,可以配套又能复原器形者约100件。器形有鼎、豆、壶、簠、盨、鉴、舟、敦、匕、匙、铲、镞、斧、铍、环首刀、剑、箭镞、镞、镜、带钩、空首布、车马饰及各种器物附件,纹饰有饕餮纹、窃曲纹、云纹、雷纹、夔龙纹、蟠螭纹、蟠蛇纹、环带纹、垂叶纹、绶纹、贝纹、涡纹、柿蒂纹以及人形、鱼、兽(虎、熊、猪等)、鸭、鸟和金银错的花纹图案等,个别范上有文字。这些器形和纹饰具有鲜明的晋国特色,是晋国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极易辨识。解放前发现的浑源彝器和1988年太原251号大墓出土的精美铜器,绝大多数是这个铸铜遗址的产品。除山西外,在河南、

河北、陕西、内蒙、四川等省也都发现明显出自侯马铸铜遗址的铜器，其流布之广、影响之大，足以证明当时制作数量之多和制作水平之高。

详细观察，陶范又分为母范、内范和外范。母范有手制、模制两种，手制者是按照器物形状做好雏形后用刮刀修整，有花纹者则在完全阴干前将花纹刻好；模制者是用印模翻制，快捷便当。

母范是制外范用的，外范即用母范来翻制，而在完全阴干之前用刀划分为数块，如鼎为腹三、底一、盖一、耳三、腿三（或二）块，划分的份数完全由器形决定。内范也有手制和模制两种，根据器物内腔形状，复杂者手制后修整，简单者用外模翻制。母范、外范、内范做成后先阴干，然后置于范炉中烘烤。母范和外范土质细腻，掺合的砂、植物末十分均匀，烧成温度在 800 度左右。内范则土质粗糙，掺合物很不均匀，烧成温度仅 400 度左右。烧成的内外范合在一起，即可铸造铜器。礼乐器由于器形复杂，多为空心铸件，采用合范的方法，而器形简单者如斧、钺、刀、剑、箭镞等，采用单范的方法，一范还可以多次使用。

由陶范出土的情况可知，铸铜遗址内部亦有分工，各地点铸造器物种类不同，有的集中生产铲、凿等工具和空首布，有的集中生产带钩和车害，反映出规模生产的特点。另外，从器类的花纹上观察，一单元内结构、大小完全一致，可知是用印模来制作纹饰。还有母范只制成其中的一段，反复使用。总之在工艺方面有许多先进的方法。

这个大型铸铜遗址的发现，不但为认识晋文化提供了许多新资料，而且对于认识中国古代青铜器时代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提供了不少前所未见的资料，其重要性随着《侯马铸铜遗址》一书的出版将受到持久的关注。

此外，在侯马晋国遗址范围内还发现有石圭作坊、制陶作坊、骨器作坊以及作坊附近的工人居址，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

(三) 祭祀遗址

在侯马晋国遗址发现有多处祭祀遗址,如南西庄有 50 多座祭祀坑,省建一公司所在地址发现了 80 多座祭祀坑,煤灰制品厂所在地址有 200 多座祭祀坑,等等,尤以呈王路和牛村古城南两处祭祀坑与建筑基址共存,反映出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

呈王路祭祀遗址位于呈王古城东侧,有大型夯土建筑群和大量祭祀坑。形制规整的夯土建筑基址共 70 余处,均湮埋于地下,最大一块为 50×60 米。从已发掘的 3 个地点来看,建筑群体的始建年代与废弃时期为公元前 550—前 480 年左右,也就是说,晋景公迁都新田不久始建,延续使用 50—60 年左右。13 号地点发现的建筑群落最具代表性,Ⅰ号基址约为主体建筑,长 27.20 米,宽 15.20 米,表面有夯土柱础 10 个,推测原为 16 个,基址南缘外侧又有半圆形柱础 7 个。在其正西偏南,为一“匚”型基址,距Ⅰ号基址仅 0.40 米,东西长 15 米,南北宽 5 米,编为Ⅲ号,实为Ⅰ号的附属建筑。Ⅰ号基址正南是一条门道,其两侧是Ⅰ号、Ⅳ号竖长方形夯土建筑基址,Ⅰ号 22.80×7.80 米,Ⅳ号 22.60×8.10 米。门道周围可能有围墙。26 号地点发现有建筑遗迹,并发现 130 座祭祀坑,发掘 62 座,有马坑、牛坑、羊坑、狗坑、空坑,羊坑占 50%左右,各类坑大小不同。据报道,祭祀坑布局有序,形制规整,又可看出是建筑物废弃以后才举行祭祀活动的。

牛村古城南发现夯土建筑基址和祭祀坑 59 座。夯土建筑基址有主体建筑,坐北面南,长方形,东西长 20.80 米,南北宽 10.40 米。该建筑北、东、西三面环以围墙,北墙长 38 米,东西墙同为 38 米,宽 3—4 米。主体建筑南面是祭祀坑,其中有人坑 1 座,另有牛坑、马羊坑、羊坑、猪坑,而以空坑占绝大多数。

另在呈王路南著名的侯马盟誓遗址处,有 400 多座密集的祭祀坑,有 40 座出土了盟书。此处羊坑居多,牛坑、马坑较少,也有空坑。

有学者认为,呈王路与盟誓遗址的祭祀群应为文献记载的“左祖”、“右社”,牛村古城南有可能为“郊祀”遗迹。

(四) 盟誓遗址

1965年发现的侯马盟誓遗址,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极大地推动了晋国史与晋文化的研究。

侯马盟誓遗址位于牛村古城以东3.3公里的秦村西北。遗址所在区域共发现400多座祭祀坑,其中出盟书的坑有42个,集中发现于遗址西北部1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不少叠压打破关系,说明这些坑是前后不同时期掘成的。

遗址共出盟书5000余件,文字可辨识者656件,每件少者10余字,多者200余字。文字是用朱笔写在玉石片上,仅有一个坑(坑105)是墨笔书写。玉石片绝大多数为圭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

根据盟书的内容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计514件,分别出于34个坑中,内容相似,要求参盟者“事其主”、“从嘉之盟”、“守二宫”,且不能与敌对一方妥协,更不能与之结盟。各件敌视的对象不同。

第二类,只有K16:3一片,盟辞缺文较多,而记载了盟誓的月、日及月象,又有用牲记录等,被认为是唯一的一篇主盟人的誓辞。

第三类,计75件,分别出于18个坑中,这类盟书对参盟人的要求比较严格,打击对象为九氏二十一家。大多与第一类盟书共出。

第四类,计58片,集中出土于K67一坑,其内容为禁止“纳室”的誓约,有学者认为此即要求参盟者在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等剥削单位。

第五类,计13件,集中出土于K105一坑,墨笔书写,是对某些罪行加以谴责的诅咒文。

对于盟誓的主盟人、盟书的年代以及所反映的史实,学术界存在

着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反映的是公元前 424 年赵桓子逐赵献子而自立的事,盟书中的“嘉”是主盟人的名字即赵桓子,而被诛讨的赵尼则是献子赵浣。也有学者认为主盟者“子赵孟”是晋国正卿赵鞅,即著名的赵简子,“嘉”和“某”是他的尊称或讳称,而被诛讨的赵尼应是邯郸赵午之子赵稷;其事应是公元前 496 年“智伯从赵孟盟”后,赵鞅一支对邯郸赵氏以及范、中行氏的讨伐战争。另有学者认为,第 105 坑的墨书文辞是赵简子对邯郸赵氏及其同党的咒语,其余的盟书年代略晚,当在公元前 470 年前后,而此时赵氏家主是赵襄子无恤。这些盟书属于赵氏家臣,辞中主盟人赵嘉,据《世本》为襄子之子,亦即后来的赵桓子。推测此时襄子居晋阳,故由桓子在新田主盟。而盟誓中作为仇敌的赵弧等,当为逃居境外的赵午等人的余党,所以赵氏家臣结盟防止他们重返晋国。

侯马盟书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侯马即晋都新田的所在地,并且为春秋时期频见于史籍的盟誓活动提供了实物佐证,同时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一批十分宝贵的资料,而对晋国史研究的意义则更大。

晋都新田范围内还发现有大批墓葬,诸多随葬品的出土与研究为该遗址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对认识晋国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有直接的意义,兹不详述。

第二节 名山古刹

山西在《禹贡》九州中属冀州,以后一直是中原奥区,表里山河,地势雄壮。悠久的文化传统与奇特的地理条件,造就许多人文地理中的著名景观。加之佛学东传,扎根中土,僧侣远避尘嚣,尽占名山,更增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梵宫琳宇。我们选择了五岳之一恒山和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以及佛教净土宗祖庭玄中寺,略作介绍。

一、五台山—唐代古庙

五台山与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合称为四大名山，是我国最为著名的佛教胜地。山在五台县东北，由东、西、中、南、北等五台组成，东台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中台翠岩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北台最高，海拔 3058 米，号称“华北屋脊”。五台山周围 250 公里，五峰环峙，峰顶平阔如台，故称五台。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唐代高僧澄观说，五台山“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名清凉”。而在佛教经典《华严经》中的《菩萨住处品》则说：“东北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所以，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在佛教中占有特殊地位。

据说东汉永平年间(58—75 年)，五台山即建有佛教寺庙。相传台怀镇西侧山峰与古印度灵鹫山相像，所以五台山的第一座寺院名叫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不过，保存到现在的最古老的寺庙建筑是唐代的。

(一) 佛光寺

佛光寺在南台外，位于五台县城东北的佛光山腰。据《古清凉传》记载，北魏孝文帝看到此处有佛光现瑞，创建了这座寺院。隋唐时期，寺况极盛，声名远播，长安、敦煌乃至日本咸有所闻。《古清凉传》外，《高僧传》、《佛祖统纪》、《法苑珠林》等佛教经籍中均有记载。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寺院被毁。唐宣宗即位后恢复佛法，大中十一年(857 年)又获重建。其后历代修葺增补，故这座寺庙内保存了北魏、唐、金、明、清各代建筑，在建筑史上的地位尤其重要。

北魏建筑是一座祖师塔，形制古朴，青砖砌筑，六角形，共两层。第一层为空心，门开在西侧，上有火焰形券拱。第二层为实心，侧面雕

窗,假门饰火焰形券拱。

该寺的主体建筑为东大殿,建于山腰,是大中十一年唐宣宗恢复佛法后重建时的原构,也是国内保存下来的极少数唐代木构建筑之一。大殿台基甚高,殿身基础奠于山腰岩石上,后部柱础是凿山时预留出来的,故有极强的抗震能力。殿身面阔7间,进深4间。殿檐伸出深远,檐下外柱有古朴的斗拱承托梁架。斗拱体很大,结构复杂,高度约为柱高的五分之二。出檐深远,斗拱硕大,这是唐代建筑在外形上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殿内柱子排列成行,纵横有序,承托着巨大的屋顶,这种结构古称“金箱斗底槽”。佛坛占据殿内五间的宽度,上有彩塑佛教人物32尊,还有出资修殿的女施主宁公遇和工程主持人愿诚和尚的塑像,体态自然,比例协调,面部丰满,是典型的唐代风格。

东大殿前有一座唐大中十一年所造石幢,平面八角形,下为束腰式须弥座,雕乐伎和石狮,上立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顶部为宝盖及幢刹。幢上刻“女弟子宁公遇”,与东大殿大梁底皮处墨书题记相符,两处文字对确证大殿年代和研究寺史均有重要意义。前院还有一座形制、刻经相同的唐代经幢,为乾符四年(877年)所造。

金代建筑是前院的文殊殿,建于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该殿面阔7间,进深4间,屋架结构罕见,因使用横跨三间的大木材,并用斜材传递负荷,故使殿内空间增大很多。屋顶为单檐悬山式,檐下斗拱层层相叠,出挑多,斜拱宽大,外形好像怒放的花朵。殿内佛坛上有文殊菩萨及侍者塑像6尊,为金代原塑,是美术史上的重要资料。四周墙壁下部绘五百罗汉像,是明代作品。

另外,山门(即天王殿)、伽蓝殿、万善堂、香花风雨楼等,是明清所重建。整座寺院三面环山,坐东向西,因应山势,后高前低,迤迤而下。远远望去,殿阁崔嵬,高低错落,与山势浑成一体,而又别具景致。

(二) 南禅寺

南禅寺远离五台山的中心区域,位于五台县城西南 22 公里李家庄的西侧。该寺规模不大,坐北向南,山门、龙王殿、菩萨殿及大佛殿组成一个院落,另有东跨院,仅僧房数间。

大殿建于唐建中三年(782 年),有平梁下保存的墨书题记为证。此殿比佛光寺东大殿的时代更早,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唐代木构建筑。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佛寺多被毁坏,此殿因地处偏僻,故能得以保全。

大殿面阔 3 间,进深 3 间,单檐歇山式屋顶。正面设板门和直棂窗,其他三面为檐墙。殿前面有宽敞的月台。大殿梁架结构简练,屋顶举折平缓,斗拱雄健,殿内无柱,可以看出唐代建筑已有很高水平,而且已普及到偏僻山村。尤其令人惊异的是,1974—1976 年对大殿进行落架大修时,发现两根最大的木构件即四椽栿,已经开裂弯垂,施工中将屋顶的瓦件泥背拆除后,西边的四椽栿自动弹回,拆卸后经反转压平,这根大梁已完全恢复平直,东边的经反转压平仍有些弯垂。大殿的木构件经 1200 年后仍能保持这样好的弹性,真是奇迹。大殿内建有佛坛,坛上布满唐代彩塑。中为主像释迦佛,在束腰须弥座上结跏趺坐,手作禅宗拈花印。两侧及前面有弟子、菩萨、天王、童子等共 17 尊塑像,大多有莲花座承托,仅童子等地位低者赤足踩地。塑像面容丰满,神情自如,衣纹流畅,塑造手法纯熟精巧,形体、衣饰与敦煌彩塑如出一辙,与大殿木构架同为唐代佳作,弥足珍贵。

南禅寺中的其他建筑为明清所建,烘云托月,与大佛殿共同构成古老寺院的朴素清雅的格局。

二、五台山—台怀梵宫

台怀镇位于五峰环抱之中,故该镇得此佳名,同时为佛寺荟萃之

处。镇上最著名者为五大禅处：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殊像寺、罗睺寺。

（一）显通寺

显通寺位于台怀镇北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据《清凉山志》所载，该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初名大孚灵鹫寺。北魏孝文帝时扩建，因寺前有一个杂花园，又称为花园寺。唐代女皇武则天因为《华严经》中有此山名，改为大华严寺。明成祖重修，赐额“大显通寺”。清代康熙帝、乾隆帝数幸五台，撰碑题匾，赐金修葺，遂成今日规模。

显通寺面积 8 万平方米，各种建筑 400 余间，中轴线上纵列 7 座殿宇，形制各异，两厢配殿严整完备，斋堂禅院一应俱全。无量殿规模宏伟，面宽 7 间，进深 4 间，重檐歇山顶，全部用砖砌成，无一根木料；内供无量寿佛，顶部藻井及各处砖雕精美富丽。又有一座铜殿，面阔 3 间，高不足 5 米，铸造精巧。殿内四壁有铜铸小佛像万尊，中间佛台上有大铜佛。铜殿的造型、结构均是仿木构建筑，确是匠心独运，美轮美奂。据说铜殿是明朝万历年间妙峰禅师发愿铸造的。妙峰原是为峨眉山普贤菩萨铸造铜殿，殿成后，观音与文殊托梦给他，遂再发弘愿，化缘积铜，又铸两座，礼敬两位菩萨。五台山显通寺内这座铜殿，即是妙峰供养文殊菩萨的。铜殿前有铜塔两座，高 8 米，形制秀美，亦是明代万历年间所造。另有门前钟楼上的万斤铜钟，亦是镇寺之宝，敲击时声闻全山。寺内的明版藏经、华严经字塔等，都是宇内瑰宝。

（二）塔院寺

塔院寺位于显通寺南侧，原为显通寺的塔院，明代重修舍利塔时独立为寺，改称今名。

塔院寺前有明代万历年间所建木牌坊，三开间，造型雅致。寺院布局以舍利塔为中心，大雄宝殿在塔前，藏经阁在塔后，周围建有廊屋，东列禅院，别具一格。藏经阁有木制转轮藏 20 层，各层放置佛经，供信士礼拜和僧侣讽诵。各殿有塑像，均保存完好。

舍利塔是该寺的主要建筑,高50米,是一座藏式白塔。塔基座为正方形,塔身为宝瓶形,全用米浆拌和石灰砌筑而成,色泽洁白而不易染污,高耸于青山绿树之中,格外醒目。塔刹、露盘、宝珠均为铜铸,塔腰和露盘四周都悬着风铃,共252枚,微风徐来,即叮当作响,饶有幽趣。高大的白塔位于台怀诸寺之前,到台怀瞻礼之人未进镇前,即睹此塔,醒目抢眼,令人难忘,故此塔一向被看作是五台山的标志,佛教圣地的象征。

(三) 菩萨顶

菩萨顶在显通寺北侧灵鹫峰上。五台山为文殊菩萨道场,相传文殊菩萨就住在菩萨顶,所以此处又名真容院,也叫大文殊寺。寺院创建于北魏,历代重修。

明代永乐年间,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蒋全曲尔计到五台山传扬黄教,这是黄教传入五台山的开端。此后,蒙藏教徒进驻五台,大喇嘛住在菩萨顶,菩萨顶成为黄庙(俗称喇嘛庙)之首。

清代康熙帝、乾隆帝几次朝拜五台山,都住在菩萨顶,撰碑文,题匾额,大加称扬,并兴工重建。现存建筑就是清代营造,形制、装修等多参照皇宫官式制度。

菩萨顶建于灵鹫峰顶,在台怀镇上抬眼可望,全部建筑均用三彩琉璃瓦覆盖,金碧辉煌,历数百年耀眼如新,其中的孔雀蓝色尤为惹人注目。寺前筑有108级石阶,拾阶而上,过一座三间的牌坊,登顶入山门,内有天王殿、钟鼓楼、菩萨顶、大雄宝殿等主要建筑。两侧建有配殿,后部有禅院、围廊,规模严整。菩萨顶重檐歇山式屋顶,副阶周匝;大雄宝殿为庑殿顶,勾栏围绕。

寺内有康熙御碑,方座螭首,立于前院。东禅院碑亭内为乾隆御碑,系方形巨石雕成,高6米,每面宽及1米,碑文用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镌刻于四面。

(四) 殊像寺

殊像寺,得名于供奉文殊菩萨之像。寺在台怀镇杨林街西南。唐代始建,元代重建,后毁于火,明成化年间再建,即今寺。

该寺以文殊阁为中心,山门、天王殿在阁前,禅堂、方丈室置阁后,两侧有廊庑配殿。文殊阁面阔5间,进深4间,重檐歇山顶,檐下斗拱繁复,檐上三彩琉璃剪边。阁内塑像为明弘治九年(1496年)作品,万历时曾局部修补。内建宽大佛坛,文殊菩萨为骑狮像,高约9米。佛龕的背面塑三世佛,即药师、释迦、弥陀三佛。三世佛塑于文殊像背后,作为陪衬,是个特例。两侧有悬塑的五百罗汉,形象生动,亦为明代艺术珍品。

(五) 罗睺寺

罗睺寺位于显通寺东侧,是一座喇嘛庙。佛经说释迦牟尼之子叫罗睺罗,在母腹中七年不得出生,直到释迦成道时才生出来,十五岁出家,成为佛的十大弟子之一。罗睺罗简称为罗睺,该庙即以他命名。

寺在唐代初创,明弘治五年(1492年)重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特别推重喇嘛教,又多次予以修饰。现在天王殿、文殊殿、大佛殿、藏经阁、配殿、厢房、廊屋、禅院等一应俱全,保存完好。

罗睺寺的“开花献佛”最为著名。后殿中心有一座可以活动的莲台,底为木制圆形佛坛,坛上周围雕有波涛和十八罗汉过江,当中荷蒂上有木制大型莲瓣,内雕方形佛龕,四方佛分坐在佛龕中,莲台设有中轴和轮盘,绳索牵动,莲瓣可开可合,四方佛随现随隐,令人称奇,经常吸引众多观者。

寺内还有每年一度的庆典。相传农历六月十四是文殊菩萨诞辰,罗睺罗为文殊祝寿,以“跳鬼”相娱。

届时寺僧奇装异服,戴鬼面具,随着锣鼓节拍,满院子蹦跳舞蹈,从早到晚热闹一天,观者如堵。

三、五台山—其他名刹

(一) 碧山寺

碧山寺,又名普济寺,俗称广济茅篷。该寺是著名的十方禅寺。佛经称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十方,十方禅寺是允许各方高僧来做住持的禅院,又称十方刹。

寺在台怀镇东北2公里北台山麓,树木茂密,溪流潺湲,景致殊胜。相传北魏时建寺,高僧法聪法师曾在此讲经说法。明朝成化年间重建,清时又曾重修。

寺院的建筑以牌坊、山门为前哨,内分前后两院,前院有天王殿、钟鼓楼、毗卢殿(亦称雷音殿)、戒坛殿和东西配殿及厢房;后院地势高,有垂花门、藏经阁,左右为经堂、香舍。前院多为单层殿宇,后院全是重檐楼阁,雕刻精美,木作细致。前后两院是寺院主体,两侧又有方丈、禅堂、宾舍、香积等套院,布局宏畅,殿阁峥嵘,十分壮丽。

各殿的塑像虽然都是清代重装,但不乏精品。天王殿塑四大天王像,手中分持剑、琵琶、伞、蛇,象征风调雨顺。塑像高大雄壮,神态威猛。毗卢殿塑毗卢佛像,前有大梵天、帝释天立侍,两侧是十二圆觉菩萨。戒坛殿是僧侣受戒之处,殿中心有一宽大的石坛,坛上塑释迦佛像。像前又有一尊汉白玉佛像,高约1.5米,姿态庄严,雕刻精细,是印度雕造的。

(二) 南山寺

南山寺位于台怀镇南3公里的山腰处。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始建,明代嘉靖二十年(1541年)重建。当时是三座寺院,祐国寺、极乐寺、善德堂。清代增修,三寺合一,统称为南山寺。民国初年扩建,三寺的院落连成一体。现在仍能辨认各自的格局,各寺的旧名依然保留,然而内部事务统一管理。

寺区背山面水,绿树成荫。建筑依山势营造,亭台楼阁、殿宇僧舍共 300 余间,高下错落,层迭有致。入寺经一条坡道,蜿蜒而上,至 108 级石阶,登阶后是山门,门前立一砖雕影壁,作工精致,门上建钟楼,筑造精巧。至寺内游历瞻礼,一路过无数台阶,迤迳而上,殿堂楼阁目不暇接,各擅胜场,形式结构各具特点,令人有美不胜收之感。

南山寺的雕刻艺术,在五台山诸寺中独占鳌头。大雄宝殿内塑释迦佛和二弟子以及胁侍菩萨,石雕汉白玉送子观音,尤为精美。两侧的十八罗汉塑像,是明代作品,在五台山的罗汉像中属上乘之作。墙壁上所绘 84 幅佛传故事,从乘象投胎到涅槃归寂,笔力流畅,色泽浑厚,是明代原作。各殿檐下,都有精致的木雕图案,且饰以贴金彩绘,更显得雍容富丽。台阶两侧的栏板望柱,也雕有人物、故事、鸟兽、花卉等图案。殿宇的檐下坎墙或墀头下肩上,装置各类石雕人物、花卉、山水图案,内容有神话传说、戏剧人物、历史故事等,其中有许多俗世内容,使佛教的寺庙更像是一座陈列别致的石雕艺术馆。

(三) 龙泉寺

龙泉寺位于台怀镇南 5 公里的九龙岗山腰,俗称九龙岗寺。寺旁有泉,叫龙泉,寺因此而得名。初建于宋代,明朝时已毁,嘉靖年间重修,清末至民国初年再建。

入寺先经过一座影壁。影壁中嵌一块巨石雕刻,图案为文殊骑狮居中,人物花卉满布四周,构图谨严,形象生动。向北为 108 级台阶,历阶而上,即达山门,门前立汉白玉石狮一对。又有勾栏小拱桥一座,过桥为一座石牌坊,侧立旗杆一对。龙泉寺的石牌坊为民国初年石刻艺术珍品,是五台山著名景观。牌坊从基石、抱柱、斜戗到额枋、斗拱、瓦顶、脊兽等,所有的构件无一不是精雕细刻。各构件上雕刻山水、流云、人兽、花卉等,俱是玲珑剔透,令人叹为观止。

寺院为横向排列的三座院落,各有山门,自成格局,但又相互串通。主体建筑在东院,建佛殿两座,周围有配殿、厢房。中西两院为塔

院，二塔耸立，其中普济禅师塔雕造精致。塔周有倒座、厢房、献亭，围以曲廊。

寺西不远有令公塔，相传宋代杨令公由其子收遗骨葬在此处。

(四) 金阁寺

金阁寺距台怀镇 15 公里，位于五台山南台西北岭畔。寺始建于唐代，大历五年（770 年）代宗诏高僧赴五台山修功德，建立寺院，铸铜为瓦，瓦上涂金，饰佛阁为金阁，因而得名。寺内有唐代宗李豫的小像一尊，虽经后人重装，仍不失唐风。

关于金阁寺，还有一则传说。传说建寺以前，道义禅师曾在此处遇见神僧。道义于开元年间同杭州僧守真同游五台山，漫步林中，遇一童子，招引道义前往饮茶。没走多远，见一座金桥，过桥进入一座大寺，僧舍殿堂俱是金色。有老僧坐在金绳床上，道义上前叩问老僧常说何法，回答说：“春树弥陀佛，秋花观世音。”道义在寺内游览，竟有十二个院落。他后来想起同伴守真，出门去招呼他一同参观，一回头，寺院已无踪影。后人建金阁寺，与此传说有关。

金阁寺以观音阁为主体，阁身二层，重檐歇山顶，面阔 7 间，进深 6 间，四周围廊。阁内观音像是铜铸千手观音，高 17 米，挺立阁中，由下层直达上层。后人在观音像外表覆盖泥皮一层，铜像遂不显露。此举大概是战乱年代僧侣信士预防偷盗的措施。观音两侧有二十四诸天环侍，排列如同仪仗队。阁背后有毗卢殿、弥陀殿、观音殿、地藏殿、菩萨殿、药王殿等，各殿满布塑像，几近千尊。最后是大雄宝殿，塑三世佛和十八罗汉。

四、北岳恒山

恒山，又名太恒山，也称元岳、常山，是五岳中的北岳。在上古时期，有“四岳”之称，指的是方伯诸侯。约在战国时，出现“五岳”，说是

帝王巡狩的处所。传说四千年前，舜帝巡狩，来到此山，见山势雄伟，便封为“北岳”。很久以来，恒山便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五岳。

恒山绵亘数百里，西横雁门关，东跨河北省，是山西境内的一道天然屏障。主峰在浑源县城东南，海拔 2017 米。分东西两峰，东为天峰岭，西为翠屏山，双峰对峙，浑水中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恒山上古树参天，怪石嶙峋，天工献巧，有琴棋台、出云洞、紫芝峪等天造洞府，又有“岳顶松涛”、“夕阳返照”、“金鸡报晓”、“玉羊游云”等自然景观，历代游人不断，悬崖峭壁上留有许多题咏。而恒山的人文景观，古有十八胜景之说，今尚存朝殿、会仙府、九天宫、悬空寺等十多处，殿宇楼台，散布于苍松翠柏之间。

恒山的奇观，最数悬空寺。据《恒山志》记载，寺始建于北魏晚期，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全寺有楼阁殿宇 40 间，悬挂在恒山之麓金龙口西崖的峭壁上。峭壁近 90 度，陡直难攀，而古人在崖壁上凿出洞眼，插入横木作悬梁，挑出崖外，再在悬梁上铺板立柱，构筑梁架，建成殿宇楼阁。殿堂之间，以栈道相通。挑出崖壁远的建筑，其下有立柱支撑。

寺院背西面东，院内南北各有危楼对峙，既是门楼，又是碑亭，下砌砖壁承托。置身楼上，俯仰之间，听飞瀑鸣琴，瞰谷溪幽邃，浑然与山岳同体。入内有两座三层檐歇山顶殿阁，南北高下相峙，中隔断崖，架栈道连通。其上又起重檐楼阁两层，高低参差，曲尽山势之妙，又显匠心之奇。寺内主要殿堂是三官殿、三圣殿、三教殿。三官殿为道教殿宇，供天地水三神官。中国古代神话认为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在道教的神仙谱系中，有三官的位置，并有经书《元始天尊说三官宝号经》。三圣殿供释迦佛及其弟子，是佛教殿堂。而三教殿则供孔子、老子、释迦，儒释道三教合一，但释迦居中，佛教略占上风。

寺内的铜铸、铁铸、泥塑、石雕等各种人物像共 80 余尊，还有碑

刻题咏等,均具艺术文物价值。

悬空寺筑在石壁,远望如壁间挂图,登临似悬崖驻足,奇险绝伦,故栈道石壁上刻“公输天巧”四个大字。其意为该寺的建造如公输般一样构思奇妙、巧夺天工。公输般就是民间传说的鲁班。公输般是战国初年鲁国人,当时享有盛名的能工巧匠。后人以国为姓,易般为班,称为鲁班,木工等匠人都奉他为祖师。当地民谣说:“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形象地描述出悬空寺建筑的难度。寺内有一块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石碑,碑文记述当时维修悬空寺,木工们全是用绳索垂吊在山腰,更换梁木,整修支柱,上下游走,一年才修完全寺。由此可以想到,创建时会是多么艰辛危险。

五、玄中寺

玄中寺是佛教净土宗的重要寺庙,佛教史上有三位专弘净土法门的大师与该寺有密切关系。净土宗东传日本,日本僧人创立净土真宗,视玄中寺为净土祖庭。由于在国际交往中的特殊地位,这座寺院在近几十年来香火特盛,寺貌一新。

寺院初建于北魏延兴二年(472年),主持建寺的高僧为昙鸾。昙鸾是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少年时游五台山,见到神迹灵异,便出家为僧,研读大乘经典,后远游南方,向陶弘景学习仙术,返至洛阳,遇菩提流支,得到《观无量寿经》,建立起净土信仰,遂成为专修净土法门的一代宗师,有些佛教史家称昙鸾是净土宗的初祖。

净土宗同禅宗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佛教的特色,而且与禅宗的影响不相上下。净土法门倡导念佛,念阿弥陀佛即是修行,即是功德,死后可以往生西方净土。由于这种方法易知易行,故能广泛传播于民间,也影响到佛教的其他宗派。

昙鸾弘扬净土法门,声名卓著,北魏朝廷崇敬他,皇帝称他为“神

鸾”。晚年时昙鸾就在汾州创建了玄中寺。寺在今交城县西北10公里的石壁山中,所以又名石壁玄中寺。从此,玄中寺成为弘扬净土信仰的重镇。

隋朝大业五年(609年),并州僧人道绰来到玄中寺,看到记载昙鸾业绩的石碑以及昙鸾遗像,深受感动,于是尊信净土,继承昙鸾的事业,在此处劝化净业。他对净土法门在理论上亦有建树,而尤以他的精勤苦修为人称道,每日念佛至7万句,感召了许许多多的僧侣和世俗信众,大家手持念珠,口称佛号,以至于声震林谷。

道绰在玄中寺30年,其间唐太宗曾路经此处,因皇后生病,在寺中停留,还礼谒道绰,颁赐了很多珍宝。这件事,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石壁寺铁弥勒像颂》碑上有记载。玄中寺由于皇帝的大驾光临,在世俗社会自然声名鹊起,远非昔比。

道绰晚年有一个得意门生,法名善导。善导慕道绰之名,专到玄中寺修习净土法门。他后来到了长安,在京师大弘净土,把玄中寺的精神传播开来。善导也是以精勤苦修著称,曾抄写十万卷《弥陀经》,画300壁净土变相,时人誉之为“弥陀化身”、“肉身菩萨”。比之其师,可谓青出于蓝。所以,善导在净土宗中的历史地位较昙鸾与道绰更加重要,有一种说法,庐山慧远为净土初祖,善导为二祖。

玄中寺在唐代元和八年(813年)成为“天下三大戒坛”之一,朝廷责成礼部尚书李逢吉在此处建“甘露无碍义坛”,各处僧人受戒,需到这里举行佛教戒律规定的仪式,其地位之重要是显而易见的。金代泰和七年(1207年),金章宗曾亲到玄中寺瞻礼,留下亲笔题诗。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玄中寺被元世祖赐名为“龙山护国永宁十方大禅寺”,故该寺又有“永宁寺”之名。明清两代,寺院香火不绝,维修的碑记与游历的诗文题记在寺中保存了很多。

中国的佛教净土宗东传日本,十二世纪时法然创立日本的净土宗,稍后亲鸾创立日本的净土真宗,净土法门在日本的信徒日益增

多。追根溯源,以昙鸾、道绰、善导为中国三祖,特别重视玄中寺。本世纪初,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到中国寻访佛迹,找到了玄中寺,兴奋不已,认为是一大发现,为日本的净土信徒发现了祖庭。1942年,他曾组织佛教代表团到玄中寺,与中国僧侣共同举办法会,纪念昙鸾大师圆寂1400周年。

1952年,日本高僧菅原惠庆长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修复玄中寺。当时中日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民间友好往来十分重要。所以,在政府的支持下,玄中寺全面修复,并有增饰。

如今玄中寺虽在群峰环抱之中,但有公路曲折相通。坐车前往,于峰回路转中看到一座白塔,塔名秋容塔,八角两层,重檐叠出,砖座宝顶,塔身挺秀。俗名“报信塔”,预告玄中寺的方位。过一座牌楼,即是玄中寺的山门。入寺为天王殿,是明代建筑,供四大天王。后为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是重建的殿宇,面宽5间,五脊六兽悬山式屋顶,内供阿弥陀佛,也是本寺僧侣念佛的场所。其后为又一座殿院,主要建筑为七佛殿,供过去七佛,两侧是碑廊。寺院最深最高处是千佛阁,亦是重建殿阁,三间硬山式。另有东西重建配殿5间,飞檐斗拱,椽花装修,加之雕梁画栋,与各主体建筑一致。寺院内树木成荫,鲜花飘香,云烟霭霭。重修时引寺西北龙潭泉水,由地下管道输至寺中鱼池、喷泉、莲池,又增许多景致。中日两国的净土信徒经常来此参拜祖庭,也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

第三节 古代建筑瑰宝

建筑是一种文化最典型的物质表现。中国建筑在东方三大建筑体系(另外二者是印度式、阿拉伯式)中最具独立性,而且在几千年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很少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大规模

的变化,这与中国文化的一贯性和独特性完全一致。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华大部分荟萃在山西一省之内,形成了一种地域文化的特殊景观。

山西可以说是一座巨大的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迄今为止,中国已知的宋、辽、金(包括南宋)时期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共 146 座,在山西境内即有 106 座,占全国同期现存总数的 70%以上。而元、明、清时期的建筑,山西也有许多珍品。

山西的古建筑不但数量多,文物价值高,而且种类齐全,诸如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卷棚式、单檐、重檐、楼台、亭阁、桥梁、砖塔、石塔、木塔、琉璃塔、戏台、牌坊等等,应有尽有。附属于建筑的雕刻、塑像、壁画等,同建筑本身一样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同样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前节五台山的佛寺中如佛光寺、南禅寺等都是古建筑中的翘楚,已作介绍,下面再介绍几处最具代表性的古代建筑。

一、晋祠

晋祠在太原市西南 25 公里悬瓮山下晋水发源处。晋国因晋水而得名,晋国的始封君却是封于唐,称唐叔虞,其子改国号为晋,而晋祠是为纪念唐叔虞而建。北魏时人酈道元的《水经注》卷六已有记载:“《山海经》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今在县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游宦子,莫不寻梁契集,用相娱慰,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那时称唐叔虞祠,已有凉堂和飞梁等建筑。唐代即称为晋祠,宝翰亭所藏唐太宗御笔亲书《晋祠之铭并序》,可为佐证。不过,此处最古老的建筑,只存宋代圣母殿、鱼沼飞梁及金代献殿。北齐天保时创建的难老亭,为明代重修。祠内晋水之源的泉流清澈照人,周柏、隋槐老枝纵横,景色绝佳,自古及今一直是游人揽胜的好去处。

（一）圣母殿

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朝廷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为叔虞之母邑姜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圣母殿。殿在晋祠院内后端,背靠悬瓮山,前临鱼沼,雄奇伟岸。

殿建于北宋时期,明清两代虽有修补,但仍保留着宋代的形制和结构,故仍是现存的规模较大的一座宋代建筑,备受学术界关注。

圣母殿东向,面阔7间,进深6间,重檐歇山顶,黄绿色琉璃瓦剪边,雕花脊兽。殿四周施围廊,这是宋代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中“副阶周匝”的样式,也是国内现存木构建筑中最早的实物证据。殿前的廊柱上有木雕盘龙8条,增加了大殿富丽堂皇的气象。殿内采用减柱造,扩大了空间。室内采用彻上露明造,显得内部甚为高敞。斗拱用材较大,出檐深远,古朴之态宛然。而大殿的角柱升起颇为显著,上檐柱尤甚,使屋角翼然翘起,增加了屋檐的曲线,使整座建筑具有柔和的外形,此与唐代建筑的浑朴刚健有别。

圣母殿内有43尊宋代彩色塑像。主像是圣母邑姜,端坐于木制神龛内,42尊侍从像分列龛外两侧。侍从像计有宦者像5尊,侍女像33尊,女官像4尊,其中有二小像是后补,其余都是宋代原塑。圣母像凤冠蟒袍,坐凤头椅,雍容高贵。侍从像神态各异,执事有别,饮食起居,梳洗洒扫,各司其职。每个侍从像的姿态、表情尤其是眼神各有特色,使这些塑像栩栩如生。这一组雕塑,实为宋代塑像中的精品。虽然经过后代重装,原作的精神面貌尚依然如故。

（二）鱼沼飞梁

鱼沼是晋水三泉之一。沼在古代又指方形的水池,所谓“圆曰池,曲曰沼”。鱼池是泉水源头形成的方形水池,其上架一座桥,称飞梁,《水经注》中已见此名。鱼沼飞梁是池与桥合称的景观,就在圣母殿之前。

飞梁又称板桥,与圣母殿同建于北宋时。1955年,曾照原样翻

修。桥平面呈十字形,四向通到对岸,从哪一面看,均有两翼,似鸢似翔,故称飞梁。桥四周有勾栏围护凭依。桥下采用梁柱结构,水中立小八角石柱 34 根,柱础是宝装莲花式,石柱上置斗拱、梁枋,承托桥面。桥面东西连接圣母殿与献殿,南北两翼下斜到岸。桥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利用地形,不但使圣母殿前四通八达,而且起着殿前平台的作用。这种样式的桥形制独特,在我国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桥东有月台,上置铁狮一对,也是北宋时铸造。

(三) 献 殿

献殿在鱼沼飞梁前,是祭祀圣母时置供品的场所。金大定八年(1168年)始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修补,1955年照原样翻修。

献殿面阔 3 间,进深 2 间,单檐歇山顶,琉璃雕花脊。室内为彻上露明造。斗拱简洁,出檐深远。前后当心间辟门,其余各间均在槛墙之上安置直棂栅栏,使室内空旷敞明。建筑整体轻巧稳固,在风格上与主体建筑圣母殿取得了和谐一致的效果。

二、华严寺(附善化寺)

华严寺和善化寺都在大同市内,是辽、金时期的重要建筑,殿宇巍峨,宏丽壮观,景致独特。

(一) 华 严 寺

华严寺在大同城西部,始建于辽,寺内曾奉安辽代诸帝的石像、铜像,佛寺同时兼有皇室祖庙的性质。辽保大二年(1122年),寺内部分建筑被兵火所毁,后经重建,到元代初年仍为云中巨刹。明代曾重修,补塑佛像,又分为上下二寺,成新格局,保留至今。清代也曾修补。

上寺以大雄宝殿为中心。大殿始建于辽,重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年),是今天已发现的古代单檐木构建筑中体型最大的一座。殿身东向,面阔 9 间,进深 5 间,面积 1559 平方米,矗立在 4 米多高

的台基上,气势磅礴。殿檐高 9.5 米,庀殿顶,正脊上的琉璃鸱吻高达 4.5 米,北端的鸱吻是金代原物,久历风雨,仍光泽灿然。殿内有五方佛和二十诸天等明代塑像,四周壁画为清代作品。壁画总面积为 887.25 平方米,画面高达 6.4 米,天花板上的彩画竟达 973 块之多。壁画内容为佛传故事、说法图、善财童子、罗汉及千手千眼观音等,各幅之间用山石云树楼阁相连,敷色明丽,金碧辉煌,为国内所罕见。

上寺的其他建筑还有山门、过殿、观音阁、地藏阁、两厢廊庑等,组成两个院落,高低错落,衬托出大雄宝殿的雄浑壮观,整体布局和谐有序。

下寺与上寺相连,但自成一体。薄伽教藏殿是下寺中心,在砖雕二门之外,又有天王殿、南北配殿以及山门,别为一院。

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 年)。薄伽是梵语音译,意为世尊,是佛的十种尊号之一;教藏即是藏经的书橱。该殿正是以保存着辽代的藏经柜而驰名,当然,殿堂建筑本身也为建筑史家高度重视。

薄伽教藏殿亦是东向,面阔 5 间,进深 4 间,单檐歇山顶。梁架举折平缓,檐柱升起显著,出檐深远。斗拱变化多样,殿内外斗拱共有 8 种,有令拱、华拱、慢拱、瓜子拱、泥道拱等多种名目。殿内天花板为平棊,有藻井,都是辽代旧物。梁枋间彩画中的网目纹、三角柿蒂等,都是辽代的通行式样。而大殿的柱网结构与史籍中所载“金厢斗底槽”近似,内外柱同高,其上用明栿、草栿两套屋架,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相类似,是辽代建筑直接继承唐代传统的实物例证。

殿内有 31 尊辽代彩塑像,中央为三世佛,弟子、菩萨、供养童子环侍两侧,分成三组。塑像均神态生动,塑造技法娴熟,其中合掌露齿微笑的一尊胁侍菩萨面形丰满,体态优美,最为秀婉动人,可称是辽代彩塑艺术中的珍品。

殿内沿墙排列藏经的壁橱 38 间,作双层檐楼阁式,又称重楼式

壁藏,俗称藏经柜。柜分上下两层,下层为经橱,上层是佛龕,龕上有屋顶,瓦垅、脊兽、鸱吻齐备,全为木雕。而雕出的斗拱形制繁复,有17种之多,柱头斗拱为双下昂七铺作,是目前所知辽代斗拱中最复杂的一种。壁橱后窗处中断,上起天宫楼阁5间,飞越窗上,以圜桥与左右壁橱相连接,浓缩了辽代建筑的艺术风格,至为可贵。且整座壁橱处处雕镂精美,是国内罕见的辽代小木作。

(二) 善化寺

善化寺在大同城区南部,故俗称南寺。始建于唐,现存建筑基本上都是辽金遗构。该寺是全国辽金寺院中布局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处,殿宇高大,主次分明,院落开阔,时代特征鲜明。

寺院坐北向南,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前为山门,也是天王殿,金代所建;中为三圣殿,是金初的代表性木构建筑,建筑风格糅合了宋辽建筑的特点;后部高台之上为大雄宝殿,是辽代遗构,殿宽7间,深5间,高大宏敞,木结构精致美观,殿内金代塑像亦属上品;西侧普贤阁,金代重建,外观精巧,玲珑秀丽,是大同地区仅存的辽金楼阁。东侧有文殊阁遗址,大雄宝殿左右有垛殿,共同组成一所高低错落、左右对称的辽金寺院布局。

三、应县木塔

应县木塔在山西应县城内佛宫寺中,正名是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是现存最古的一座木塔,而且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塔为楼阁式,平面八角形,实为9层,而其中有4层为暗层,所以外观上只是5层,加上最下层的重檐,为6层檐。塔高67.13米,底层

直径 30 米,体型很大,但由于在各层檐上向外挑出平座和走廊,配以攒尖的塔顶及造型优美且富有向上感的塔刹,所以毫无笨重之感,反呈雄壮华美之姿。

塔身建在 4 米高的两层石砌台基上,内外两槽立柱,柱网和构件组合形成双层套筒式的平面和结构,柱头间有栏额和普柏枋,柱脚间有地袱等水平构件,内外槽之间有梁枋连接,两层套筒结合非常紧密。暗层中用大量斜撑,加强木塔结构的整体性。从细部来观察,9 层的结构又是重叠 9 层具有梁柱斗拱的完整构架,每层柱子叠接,但又向内收缩,向中心略倾斜,上下层柱子不直接贯通,而是用上层柱插在下层柱头斗拱的“叉柱造”。全塔除第一层的柱子外,没有过长过大的木料,而是通过精巧构造的技术,使 9 层建筑浑然一体,迄今 900 多年,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完整屹立。特别是塔建成 200 余年后,在元顺帝时经历了大地震 7 日,仍巍然不动,令人惊叹。

经研究得知,塔的外观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塔的总高恰等于中间层外围柱头内接圆的周长,这是造成塔身总体形象的一个重要比例数字。全塔由第一层到第四层的每层高度(第一层柱高,第二、三、四层则是包括柱、斗拱、屋檐和上层平座的总高度)都相等,因而在外形上构成有规则的韵律。各层屋檐的长度和坡度、屋檐下的斗拱、下层的外廊、顶部的攒尖顶和铁刹,比例恰当,共同组成优美的总体轮廓线。

塔内明层都塑像。头层释迦佛高大肃穆,顶部藻井深邃。该层内槽有 6 尊如来画像,画面上的飞天活泼丰满,精神流注,是壁画中不多见的佳品。三层塑四方佛,面向四方。五层中央塑释迦坐像,八尊菩萨分坐八方,该层塔心空间高敞,佛像更显庄严雍容。

前些年在整修木塔塑像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辽代文物,其中有辽代写经、刻经、木刻套色绢质佛画像等,是研究辽代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极其珍贵的资料。特别是辽代刻经中有《契丹藏》原本,使世人终

于见到了辽代大藏经的实物,尤为可贵。

四、青莲寺

青莲寺在晋城市东南 17 公里的硖石山腰。北齐时即有高僧慧远在此结室为庵,草创寺院,初名硖石寺。唐代僧侣渐多,又建上院,朝廷赐名青莲寺。北宋时上下两院分为二寺,上院被赐名福严禅院,下院仍称青莲寺。明代福严禅院复称青莲寺,下院则称古青莲寺。

(一) 古青莲寺

古青莲寺历经沧桑,隋唐规模已不可知。现仅存正殿 3 间,南殿 3 间,总面积约 600 平方米。正殿除少量宋代遗构或仿宋作法外,整体已为后世修补而失却其本来面目,唯佛坛上高大的垂腿弥勒佛,文殊、普贤二菩萨,阿难、迦叶二弟子,供养菩萨等 6 尊彩塑,仍是唐代遗物。南殿建筑亦无多大文物价值,而佛坛前部有 5 尊宋代塑像,殿内尚有唐、宋、金碑记各一通,其中唐碑《硖石寺大隋远法师遗迹记》,为唐宝历元年(825 年)镌刻。碑首线刻佛殿图(也称弥勒讲经图)一幅,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一件极有价值的珍品。

(二) 青莲寺

由古青莲寺上行里许,即为青莲寺。寺前有一坪台,坪台东西为对称二阁,其中西阁门洞前两侧,各卧形制古朴的唐代石狮一只。坪台之后为山门兼天王殿,两侧各有掖门,左右是高达三层的钟鼓楼。由掖门入寺,主寺为两进院落,由南向北为天王殿、藏经阁、释迦殿、大雄宝殿,两厢罗汉楼、地藏楼、经堂、僧舍左右对称。寺外东部高台上,原建有钟鼓、文昌阁、款月亭。寺西偏院有斋堂、方丈院、祖师殿等,现已不存。

藏经阁为单檐歇山顶楼阁式建筑,该阁现存木构件多为宋代原物,部分斗拱上尚留有宋代彩绘。该阁自宋时即贮藏佛经,元代达

700 函五千余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批藏经中的三十八卷北宋《开宝藏》曾赴京展览,后下落不明。近年在高平发现《开宝藏》两卷,经鉴定是该寺藏经。

释迦殿单檐歇山顶,殿顶举折平缓,出檐深远,正脊、垂脊、吻兽均为琉璃制作。正面明间地袱、立颊、上槛均为石作,表面线刻花卉纹饰,雕刻极为精细,四周立柱为方形抹棱石柱。殿身梁架用材硕壮,砍制规整,结构合理,与《营造法式》所载六等材相符。从石柱、门楣石刻题记可知,大殿创建于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殿内佛坛上有彩塑4尊,亦为宋代原物。

罗汉楼、地藏楼都有石柱题记,可知建于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但现存除石柱、斗拱、梁枋等保留宋代建筑风格外,其余全为清代重修样式。罗汉楼有宋塑广法天尊和十六罗汉,地藏楼有宋塑地藏菩萨和十殿阎君,但均经明代重装。罗汉楼楼下后墙中部镶嵌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罗汉碑记》石碑一通,记载十六住世罗汉及五百罗汉名号,是我国现存记载中时代最早的罗汉名号资料。

五、岩山寺

岩山寺亦称灵岩院、灵岩寺,在繁峙县东南45公里处的天岩村。寺创建于金正隆三年(1158年),元明清各代屡经修葺。现存山门、钟楼、东西配殿、南殿、禅院等。

岩山寺的文物精品集中在南殿一处。南殿为文殊殿,原为过殿,金建元修。面阔5间,进深3间,单檐歇山顶。除斗拱、梁架和瓦顶为元代翻修,其余从柱头之下的栏额、普柏枋、柱子、门窗到墙壁、台基均为金代遗物。殿内设佛坛,佛坛四周壺门内原有砖雕花卉77幅,现存49幅,刀法简朴,形象逼真,是金代原作。坛上塑像现残存9尊。正中文殊菩萨骑狮像,仅存狮身,雄壮威武,略存旧日风采。两侧各塑一

尊胁侍菩萨像,为女性,高两米多,体态修长,敞胸赤脚,装饰简洁,秀丽潇洒。左侧菩萨像前有一侍者像,着毡靴,戴毡帽,作用力牵引状,约是牵狮人。又有一对弟子像分塑两侧,态度恭顺。佛坛西南角塑一尊金刚像,披甲顶盔,神情威武。文殊菩萨背光后塑观音菩萨像,半坐半倚,神情自然,体态优美。这一组金代塑像富有唐风,是金塑中的佳作。

文殊殿四壁的壁画,共 97.98 平方米,为金大定七年(1167 年)宫廷画师王逵所作,更为珍贵。西壁画佛传故事,描绘释迦牟尼一生的事迹,画面是一组完整的宫城,宫殿在画面正中,许多人物活动场景巧妙地安排在画中。东壁为佛本生故事,内容有须阇提太子割己肉孝养父母的故事,以及鬼子母本生图、水磨图、戏婴图等。东壁绘画生活气息更为浓郁。北壁西侧绘商船遇难得救的故事,画面上商船桅杆被风吹折,500 商人惊恐万状,后被罗刹女营救,人物生动传神。商船上绘一组建筑群,重楼台阁处于云气之中,似海市蜃楼。画面很小,但是异常逼真,毫发不苟。北壁东侧绘一座寺院,院内为八角七级木塔,重檐式塔顶,在画面上高约 3 米。塔前有山门,塔底层有耳房,周围有殿阁、回廊。塔左绘城墙,马面、堞楼俱全,堞楼上尚有穹庐状敌棚,可视为当时实物的写真图。南壁仅东稍间有画,上为殿阁楼台,中为释迦牟尼为弟子说法,下为供养人像。壁画上尚有许多题记,反映画面内容、施舍人及画师和作画时间。整座殿内的壁画构图严谨,笔力刚劲,画中建筑瑰丽精巧,人物形象逼真传神,设色浑厚,技法高超,是现存金代壁画中的上乘之作。壁画中的丰富内容,也是研究金代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

六、广胜寺

广胜寺在洪洞县城东北 17 公里处,既占霍山南麓,又居霍泉源

头,山青水秀,环境优美。寺院创建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年),初名俱卢舍寺,唐代改称今名。唐大历时曾重修,元大德七年(1303年)毁于地震,又经重建。明清两代都曾修补。现寺院分为上下两寺和水神庙三处,统称广胜寺。

(一) 广胜上寺

上寺在霍山巅,由山门、飞虹塔、弥陀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和厢房、廊庑等组成。现存建筑为明代重建遗物,然而形制结构仍具有元代风格。各殿的彩塑、壁画、木作均有佳品。

弥陀殿原藏金代大藏经,后移交北京图书馆,今称《赵城藏》,弥足珍贵。

上寺的飞虹塔最负盛名,高47.31米,八角形,共13级,通体琉璃镶嵌,故俗称琉璃塔。始建于汉代,现存则是明嘉靖六年(1527年)所重建。塔身用青砖砌成,各层均有出檐,外表全用黄绿蓝三彩琉璃装饰,生光耀目。底部三层最为精致,檐下有斗拱、倚柱、佛像、菩萨、金刚、盘龙、鸟兽、花卉等各种构件和图案,制作精细,彩绘艳丽,至今色泽如新。塔中空,有设计精巧的翻转式台阶,可历阶登塔。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该地区曾经过8级大地震,飞虹塔安然无恙。其设计与装修堪称塔中瑰宝。

(二) 广胜下寺

下寺在霍山之麓,由山门、前殿、后殿、垛殿等殿堂组成。山门很高,单檐歇山顶,前后檐加出如雨搭,又似重檐楼阁,建于元代,形制独特。前殿构造亦奇,五开间殿宇,殿内仅用两根柱子。后殿建于元至大二年(1309年),面阔7间,单檐悬山顶,殿内有元代彩塑三世佛和文殊、普贤二菩萨像。殿内原有四壁壁画,1928年被盗卖,现藏在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残存于山墙上部的壁画有16平方米,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元代建殿时所作,绘艺高超,色泽明丽。两垛殿亦为元代建筑。

(三) 水神庙

水神庙与下寺仅一墙之隔,由山门(上筑舞台)、仪门、明应王殿及其两侧厢房窑洞组成。明应王殿是元代建筑,位于庙后部正中,重檐歇山顶,面阔与进深均为5间,四周有回廊。殿内塑像是元代作品,塑水神明应王及其侍者共11尊。殿内壁画满布四壁,绘祈雨、降雨及历史故事等内容,南壁东侧所绘戏剧画价值尤高,下节另有介绍。

七、永乐宫

永乐宫位于芮城县永乐镇,1959年因建三门峡水库,迁至芮城县城北3公里龙泉村东侧。原名大纯阳万寿宫,奉祠吕洞宾。永乐镇为吕洞宾诞生地,成道后称纯阳真人,为八仙之一,在元代道教全真派兴盛时,专为建宫。

此地原有吕公祠,后成道观。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观毁于火,次年敕令建宫,到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纯阳殿壁画完成,几乎历元朝一代,一直在营建装修之中。明清时曾有小规模修补,清代建宫门,其余主要建筑龙虎殿(无极门)、三清殿(无极殿)、纯阳殿(亦称混成殿、吕祖殿)、重阳殿(亦称七真殿、袭明殿)均是元代原作。整体布局开阔疏朗,规模宏敞。

龙虎殿是原永乐宫的大门,故又称无极门。殿基颇高,面阔5间,进深3间。门墩雕石狮6尊,造型生动,技法纯熟。殿内有壁画,内容为神荼、郁垒(二门神)、神将、神吏、城隍、土地等,元代画风鲜明。

三清殿是永乐宫主殿,高大宏丽,面阔7间,进深4间,庀殿顶。台基高大,殿前月台宽敞。殿内藻井华丽精美,井底处的盘龙镂空最精。殿堂的构件有彩有塑,彩绘与塑型结合,极为罕见。殿顶用黄绿蓝三彩琉璃剪边,琉璃制大鸱吻是巨龙盘绕式,施孔雀蓝色,使殿顶色泽鲜丽,光彩耀目。

三清殿内的壁画布满四壁和神龛内外,画面高 4.26 米,全长 94.68 米,全部面积有 403.3 平方米(拱眼壁画不计),像一条巨型彩画带,环绕于大殿之内。

大殿只是一幅画,名为《朝元仙杖图》,描绘道教群仙朝拜元始天尊的景象。画面中心是 8 个帝后装束的主神,高 3 米多,四周围绕 290 多个各色神仙,都有 2 米多高,排成前后 4 层。有帝君、仙伯、真人、星宿、天丁、力士、金童、玉女等各类身份不同的神仙,神情各异而倾向一致,整齐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画中线条简练流畅,笔法严谨考究,有的线条长达数米,挺拔而不失柔和。画面中人物生动,气魄宏伟,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白描技法的高超水准。

纯阳殿宽 5 间深 3 间,单檐歇山顶。殿内用柱极少,空间宽敞,天花藻井极其工巧。四壁和扇面墙上布满壁画,总名为《纯阳帝君仙游显化图》,内容是吕洞宾从降生到成仙度人的故事,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共 52 幅,连贯自然。每个故事情节之间用山水、云雾、树石等自然景物相间。画面上社会生活的场景和各阶层人物以及建筑、服饰、器物等等,是研究宋元社会的重要资料。扇面墙的背面,画钟离权度化吕洞宾的场面,人物形象十分传神,而背景山水林木,幽趣盎然。

重阳殿五开间六架椽,单檐歇山顶。殿内壁画是有关道教全真派创始人王喆以及全真七子的故事和传说。画面亦采用连环画形式,共 49 幅,绘王重阳降生到度化七真人成道。每幅画均有榜题,可据以研究绘画内容。此为研究道教史的形象资料。扇面墙背面画群仙朝拜三清的图像,主像太清、玉清、上清在上,神仙持笏板恭谒,侍女分立两侧,面庞丰润,衣带飘扬,亦是精品。

永乐宫各殿的壁画总面积达 960 平方米,题材丰富,笔法高超,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杰作。这些绘画精品的作者有幸留下了名字,三清殿壁画是元泰定二年(1325 年)河南洛阳马君祥等人所绘,纯阳殿壁画是元至正十八年(1358 年)朱好古门人张遵礼等人所绘。

第四节 戏剧文物

中国古典戏曲起源很早,它综合了歌舞、说唱以及俳优的诙谐、讽刺等艺术形式,经过漫长岁月的发育成长,至宋金时期才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而在元代进入它的成熟期。

山西的戏剧文物,多为金、元两代所遗,正是我国戏曲史上由形成至成熟的重要阶段的实物资料。

山西早期戏剧活动的遗迹较多,与本地区金、元杂剧的兴盛关系密切。这里能为杂剧在艺术上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最主要的是这里有深厚的民间艺术传统,又有适当的外来艺术因素。山西在宋金战争中是被女真较早攻占的地方,后来成为金朝统治下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当然也是金朝的腹心地带。金人攻陷汴京后,掳走各类说书、演戏、弹唱的艺人,总共有 200 多家,有的被带到燕京,有的被迁至平阳(今山西临汾)等较安全的后方地区。平阳又是诸宫调的发源地,诸宫调是用很多支不同宫调的曲子连接起来,穿插念白以演唱长篇故事的说唱文学形式,对戏剧很有影响。在这个地区,出现了戏曲史上著名的金院本,绝不是偶然的。戏剧文物多集中在临汾附近,也很能说明问题。正是由于各种条件具备,人民喜闻乐见,戏剧的演出十分频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所以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一、戏俑和壁画

戏俑发现在侯马、稷山等地的金代墓葬之中,比较多。壁画则仅见于广胜寺的水神庙。

(一) 金墓戏俑

侯马西北郊发现的董氏砖雕墓,是最早发现的宋金戏曲活动的重要实证。葬于金明昌七年(1196年)的董海墓,前后两室,仿木构砖雕,壁上雕有翎毛花卉、八仙人物、戏剧故事以及动物形象,富丽精美。葬于金大安二年(1210年)的董明墓,墓室北壁砌一座小戏台。戏台砌在墓内正屋檐上的平座之上,平座下用两根小柱支撑。平座上砌两根小八角柱,托一根大枋,枋上有柱头、补间斗拱,上为歇山式屋顶。台上有5个砖雕的戏俑,分别为生、末、净、旦、丑5种角色行当,生动活泼,真实地反映出我国早期的戏剧表演艺术。

稷山马村段氏墓地是又一处重要发现,共发现金墓14座,已发掘的有9座。这9座墓都是仿木构砖雕,墓室建筑一般为前厅后堂、左右厢房的四合院布局,表现墓主人生前豪华宏伟的住宅。与墓门相对的北壁正中间多雕板门,外加仿木构门楼,也有雕墓主人夫妇对坐设“开芳宴”;而在南壁中间多为与北壁相对应的戏楼,舞台上有人或5人正作杂剧表演,戏俑形制与董氏墓相类。其中有3座墓(M₁、M₄、M₅)的杂剧演员背后,还有“乐床子”与伴奏乐队,乐队中的乐俑持大鼓、腰鼓、拍板、横笛、鼙、篪等乐器,说明金代早期已有“乐床子”的设置,宋金杂剧的伴奏乐器已经成形,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乐床子”的用途与宋金杂剧伴奏乐器的组合与伴奏情况。

1995年在侯马东郊发现的金大安二年(1210年)晋守忠墓,墓室亦为砖雕仿木结构,而戏俑是在墓室南壁的东侧方台上,两边各有一尊砖雕狮子。为了使读者更真切地了解戏俑的情况,我们把这座墓中的五具戏俑详细介绍一下。左起第一俑头戴双脚幞头,身穿圆领窄袖长衣,下角掖起,此为副末,后代称为生的角色;左起第二俑头裹巾,束发,身着窄袖长衣,左手持物,右手拇指、食指置口中作打胡哨状,右腿微屈,左腿略抬起,此为副净,即后代的丑角;中间戏俑头戴花角幞头,身着窄袖衣,右手持一扇置左肩处,左手斜垂腹下,两腿交叉屈

立作表演状,此为旦;左起第四俑头戴幞帽,身着宽袖对襟长衫,两手抬于胸前似有所言,此为装孤,是宋金时特有的角色;左起第五俑头戴幞帽,身着圆领宽袖长衣,两手合抱一板斜置左肩处,此为末泥,扮中老年男子,相当于老生。

(二) 水神庙壁画

洪洞广胜寺的水神庙,主殿是供奉水神的明应王殿,该殿南壁东侧的元代壁画,是一幅在戏剧史上非常珍贵的元杂剧演出图。这幅画高 4.11 米,宽 3.11 米,场面宏大,比戏剧俑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戏曲兴盛的状况。

这幅壁画上方是一条横额,右边是双行小字“尧都见爱”,中间是一行大字,从右至左为“太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右边署一行小字,由上而下是“泰定元年四月日”。元代泰定元年为公元 1324 年。尧都是说平阳,演员和戏班子被平阳人所喜爱。太行可能是太行,散乐是杂剧的旧名,《都城纪胜》说宋代“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忠都秀是艺名,指的是戏班子里最著名的演员。全句是说:平阳府人们喜爱的太行山地区杂剧艺人忠都秀在这里演出。由此可以看出,很久以来,戏剧界就有当红演员挂头牌演出的传统。还可以看出,演戏在元代就挂出了招牌,演艺界很早就有了广告意识。而在水神庙内画这样一幅壁画,是人们认为神也喜欢看戏,把祭赛神灵时的演剧活动搬上壁画,让它一直与神的偶像相对,时时博取神的欢心,这样的用意也是十分有趣的。

画面上的舞台方砖铺地,舞台的后部是一幅绘着图案的帐幔,帐幔的一侧绘一个没有化装的男人,侧身轻轻地撩起帐幔,正朝台口窥视。这个人物画得非常传神,前台演出的紧张与后台的忙里偷闲均表现无遗,更使人由此想到舞台有前后台之分,使人想到后台还有多少人在活动,确实是神来之笔。

画面上的舞台人物形象共是 10 个,前排 5 人,身着戏装,正在串

演故事。居中的手持牙笏,身穿红蟒,头戴相貂,饰演一位大臣。其面目清秀,表情严肃,可以看出是女性演员在扮演男性角色。此人大约即是忠都秀。第二排4人,其中一人穿戏装,余三人没有化妆,左边第一人是司鼓,第二人手持拍板,右侧一人手执宫扇,像是跑龙套的。第三排只有一人,紧靠鼓手,正在吹笛子。

从角色的行当上看,这台戏生、旦、净、末俱全;伴奏的乐器出现在前台,有鼓,拍板和笛子;演出所用的道具,有牙笏、刀、扇子;演员化妆可以辨认的,有勾脸谱,亦有挂髯口;演出服装用官衣、靴帽、红蟒等。

这幅壁画构图严谨,设色浑厚,人物传神达意,画技既佳,又反映了元杂剧兴盛时期的情状,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二、戏台遗存

戏台是专为演戏而建,可以反映戏曲发展的状况。宋金时期,杂剧、院本出现以后,演出形式也随之从地面登上了舞台。戏台古称乐亭或乐楼,宋金时晋南一带已经建造,元代则相当普遍,而保存至今的只有元代戏台。如临汾魏村牛王庙戏台,建于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至治元年(1321年)重修;永济董村二郎庙戏台,建于元至治二年,明清间补修;翼城武池村乔泽庙戏台,元泰定元年(1324年)始建,明代局部重修;临汾东羊村后土庙戏台,建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石楼张家河圣母庙戏台,建于元至正七年;翼城四圣宫戏台,建于元代至正年间,等等。明代的戏台遗存更多,其佳者当数稷山南阳村法王庙戏台、新绛阳王村稷益庙戏台。今择元明两代的戏台各介绍一座。

(一) 牛王庙戏台

牛王庙在临汾市西北25公里处魏村。该庙始建于元代至元二十

年,大德七年(1303年)地震时被毁,至治元年重建,明、清两代都曾修补。

戏台是木构亭式建筑,平面为方形,不分前后场,前檐用两根石柱承托,柱上雕刻着牡丹和化生童子,柱侧镌创建与重修的年代。柱子梁架重叠,额枋、兰普、斗拱上下三层,好似庞大疏朗的藻井形式,精巧而又简练。顶为单檐歇山式,典雅庄重。

戏台的前面及两侧前部敞朗,作为台口,背面及两侧后部砌墙。可知此时的戏台还保留着宋金时期乐亭的古制,供三面围观,与后来的一面观乐楼不完全一样。

(二) 法王庙戏台

法王庙在稷山县西南4公里处的南阳村。此庙创建年代不详,元代重建,戏台则是明成化七年(1471年)增建。庙内保存有成化七年《创建舞庭记》石碑一通,载修建戏台的始末,并刻有庙址全图。

戏台在庙内正殿——法王殿之前,与法王殿相对,是专为酬神演戏所建。戏台平面方形,宽深均为3间,三面围廊,前面豁敞为台口。檐下斗拱为五铺作,双下昂计心造。梁架结构亦甚精巧,制作手法洗练。屋顶为十字歇山式,脊兽为琉璃制作,形象秀美,色泽亮丽。

建筑史专家认为,晋南一带的明代戏台,已用内柱分开了前场与后场,而法王庙戏台方形无内柱,仍沿袭元代乐楼的旧制,这是我国戏剧史上一项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第八章 文学艺术

三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三晋的文学艺术尤为突出,诗歌、词赋、散文、小说、书法、绘画、音乐、戏曲等,都有重要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三晋文苑

一、诗歌、词赋

三晋诗歌、词赋的创作,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乘。

(一)《诗经》中的山西诗歌

《诗经·国风》中的《魏风》、《唐风》均为山西的诗歌,反映出当时山西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和民俗风情,而且还是《国风》中较有特色的两部分。这是因为:第一,最具反抗与批判精神。《伐檀》、《硕鼠》,众人皆知,不作备述;《葛屨》、《鸛羽》对于统治者的直刺、责问,在其他诸国风诗中,十分罕见的。第二,最能表现深沉的悲苦。《园有桃》

写士之忧国,《山有枢》以旷达写悲伤,《陟岵》以家人之心写自家之心,《葛生》以荒野表现凄凉、孤寂,深刻、生动,为《国风》其他诗篇所不及。第三,内容最为广泛;刺褊的、刺贪的、刺掠夺的、刺听谗的、述怀的、忧国的、思家的、行乐的、采椒的、悼亡的、伤孤独的,以及答谢赠物的等等,丰富多采。

(二) 班婕妤(婕妤)的诗赋

班婕妤,西汉楼烦(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东)人,汉成帝即位初,被选入宫,随得宠,升为婕妤(爵视上卿,位比列侯),鸿嘉年后,赵飞燕姐妹逐渐得宠,而班则失宠,后老薨。据《隋书·经籍志》著录,班婕妤有文集一卷,今存者只有清严可均辑《全汉文》中的《自悼赋》、《捣素赋》、《报诸侄书》三篇及《文选》和《玉台新咏》中的《怨歌行》一首。

《自悼赋》、《捣素赋》这两篇写班失宠后,在长信宫时的忧思、悲伤。前者叙述了自己由得宠到失宠的过程,以及心理活动,如“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罔扃。华殿坐兮玉阶落(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写得冷冷凄凄,令人神伤。后者亦写得“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甚得《诗经》所谓“温柔敦厚”之旨,兼有“塞渊、温惠、淑慎”六字之长。《怨歌行》,亦名《怨诗》、《纨扇诗》,唐人乐府作《长信怨》,诗中借纨扇自喻,“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写蒙成帝恩幸时的情景,“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写内心的恐惧和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哀。

班婕妤虽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世,杰出的才华,使得她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故钟嵘《诗品》评之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今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尚矣。”“汉婕妤班姬诗,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给予了很高评价。

（三）郭璞、孙绰的诗赋

郭璞(276—324年),字景纯,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成年不久,为避匈奴之扰而南渡,后被王敦所杀。他是晋室南渡之际的重要作家。他写有许多赋,如《江赋》、《南郊赋》、《盐池赋》、《巫咸山赋》、《流寓赋》、《井赋》、《虬蟉赋》、《登百尺楼赋》、《龟赋》、《蜜蜂赋》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赋》,是中国文学史上山水文学的重要作品。《晋书·郭璞传》中说:“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它作为描写江海类的一代名作,被选入《昭明文选》。他的诗流传至今的共二十二首,其中十四首“游仙诗”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魏晋以来,游仙诗的创作颇为流行,其类型大略有抒情、言玄、崇仙三种,郭璞的诗三种类型俱备,内涵极为丰富,且风格峻拔,辞采瑰美,体现了当时诗歌词作的最高水平,故钟嵘称他为“中兴第一”(《诗品》),刘勰则认为“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文心雕龙·明诗》)。

孙绰(320—377年),字兴公,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县)人。早年无意仕宦,居于会稽,优游山水间十余年,标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世说新语·品藻》),作《遂初赋》表白其心志。他的代表性作品是收录于《文选》中的《天台山赋》,这篇赋极力表现出他的“投刃皆虚,目牛全无”(《文选》卷一一)的虚无思想,但词语工整佳丽,景物描写精细,堪称佳作。他还是东晋玄言诗最著名的作者,由于历史的淘汰,这些盛极一时的“寄言上德,托意玄珠”之作,大部分已不可见,现仅在残存的《文馆词林》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保存了几首,如《赠温峤》:“大朴无象,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答许询》:“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

（四）南北朝的诗文

这一时期,山西出了许多诗赋作家,如柳惔、王遵业、陆恭之、裴敬宪、裴子野、裴让之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柳惔、裴让之。

柳惔(465—517年),字文畅,祖籍河东解州(今山西运城),是齐

梁时有成就的诗人之一。他年轻时以擅长赋诗闻名,晚年在吴兴任官也作过许多诗篇,名篇《江南曲》是柳恽在汉乐府诗的影响下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五言诗。“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久不返,春华复应晚。不道新知乐,空言行路远。”(《艺文类聚》)诗中描绘了妻子见到久别丈夫时半喜半忧的复杂心理,人物刻画细致,情景交融,被视为五言律诗的滥觞。他的其他诗句,如《捣衣诗》中的“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从(梁)武帝登景阳楼》中的“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梁书·柳恽传》),以景抒情,也颇有影响。其诗文收在《柳吴兴集》中,已佚。他的少量诗文散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玉台新咏》中,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十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其诗十八首。

裴让之(?—555年),字士礼,河东闻喜人,擅长诗文,与其弟让之及皇甫亮并知名于洛下,且得时人“能赋诗,裴让之”(《北齐书·裴让之传》)的美誉。其诗作传至今日的有《有所思》、《从壮征》、《会馆宴酬南使徐陵》等,载于《艺文类聚》、《乐府诗集》中。

(五) 群星璀璨的隋唐

隋唐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尤其是唐诗,独步于这个时代。

1. 薛道衡与王绩

薛道衡(540—609年),字玄卿,隋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长于诗作。如他的《出塞诗》一首:“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鸿声”,体现出北朝文风的特点。因其多次出使江南,受南方文风影响也较深,如其《昔昔盐》一诗,辞采绮丽,对仗工整,描写铺排,极为细腻,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为千古吟诵的名句。《隋书》谓:“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可见其诗文成就之高,影响之大。薛道衡死后,尚有文集七十卷行世,后散失。明人辑有《薛司隶集》。

王绩，自称太原人，隋唐之际著名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评价甚高，认为其功绩在扭转齐梁余风，为开创唐诗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五卷本《王无功文集》所载诗歌来看，五言律体在王绩手里已初步形成，基本定型，并非成于沈佺期^①，王绩是五言律的奠基人，在诗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 初唐著名诗人——王勃、宋之问、王翰

王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初唐四杰之首，与王绩一样，在排除齐梁余风、开启唐诗新局面上功劳尤大。他的五言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杰作，人们传诵不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至今常被引用。尤其是在南昌滕王阁即兴而赋的《滕王阁序》更是千古名篇。据《唐才子传》载，“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唐才子传校笺》一)，反映出其杰出才华。今有《王子安集》传世。

宋之问(656—712年)，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今山西汾阳)人。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旧唐书·文苑中》)。他与沈佺期在齐梁沈约、庾信到初唐四杰创作发展的基础上，使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特别是遭贬岭南后，怀土思乡，忧伤度日，其诗作更是情景交融，含蓄婉转，幽怨沉郁，对仗工整，形式完美，表现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堪称当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位大家。

王翰(687—726年)，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他的诗，感情奔放，词采流丽，其《凉州词》为历代传诵名作：“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当时著名学者徐坚与张说品论文坛人物，徐问张说今之后进，文词孰贤，张说有“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笋”等语，知其文亦为时人所重。杜华亦为当时学士，

^① 参看王志华：《五言律奠基者旧说应序推翻》，见《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

其母崔氏云：“吾闻孟母三迁。吾今欲卜居，使汝与王翰为邻，足矣！”于此可见王翰当时才名。

3. 盛唐著名诗人——王之涣、薛据、王昌龄、王维

王之涣(688—742年)，字季凌，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后迁居绛州(今山西新绛)。为人豪放任侠，诗名倾动一时，惜《全唐诗》仅录存其诗六首，其中《凉州词》(一名《出塞》)和《登鹳雀楼》均可列入盛唐绝句佳作之林。

薛据，唐河东宝鼎(今山西万荣)人，为人骨鲠，有气魄，一生多坎坷，仕途不得意，但诗名极大。《唐才子传》说薛据“造句往往追凌鲍、谢”，一代诗圣杜甫盛赞薛据“赋诗宾客间，挥洒动八垠。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九家集注杜诗》)，刘长卿在诗中盛称薛据“雄辞变文名，高价喧时议。下笔盈万言，皆合古人意”(《全唐诗》第1552页)，高适也称薛据诗文为“纵横建安作”(《全唐诗》第2197页)。可见薛据在盛唐诗坛的影响之大。惜其诗集散佚，流传至今的诗极少。

王昌龄(698—756年)，字少伯，太原人，被称为“诗家夫子王江宁”(《唐才子传校笺》一)，尤擅七言绝句，被后世称作七绝圣手。其《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被誉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其他如《从军行》、《长信秋词》、《西宫春怨》、《闺怨》、《采莲曲》、《芙蓉楼送辛渐》等，皆为千古名作，《全唐诗》收其诗四卷。

王维(701—761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其诗歌具有多方面的成就，无论边塞、山水诗，还是古体近体、长篇短制均有广播人口的佳作，尤以五言律诗和绝句著称。其山水田园诗，如《汉江临泛》、《山居秋暝》等，体物精细，状写传神，色彩鲜明如画，语言清新凝练，最能代表其艺术风格，现存诗四百余首，有集传世。

4. 大历才子——耿伟、卢纶

耿伟，字洪源，河东(山西永济)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诗以清淡

质朴见长,是十才子中最接近于宋诗者,今有《耿沛集》二卷传世。

卢纶,字允信,河中蒲(今山西永济)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边塞诗颇有气势,一些绘景诗也很有特色。如组诗《和张仆射塞下曲》:“鹫翎金仆姑,燕尾绣蝥弧。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已成为诗歌史上的千古名作。《全唐诗》录存其诗五卷。

5. 晚唐著名诗人——白居易、白行简、聂夷中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太原人,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早期创作了一百多篇涉及时政的“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对社会弊端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在艺术标准上他又以通俗平易为世人所称许,因而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奠定了他跻身唐代大诗人之列的基础。白诗今存三千多首,数量之巨为唐人之冠,且无论五言、七言,长篇短制都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他自己划入“感伤诗”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千古传诵,为歌行体开辟了新路,给后来的戏剧艺术提供了素材。

白行简,白居易之弟,据《旧唐书》云:“行简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旧唐书·白行简传》)可见当时文名已盛,今《全唐诗》仅存其诗7首。

聂夷中,字坦之,唐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其诗多“警醒之辞”,“裨补政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国风》之义也”(《唐才子传》)。如其《公子家》诗:“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田家》诗:“父耕原上田,子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全唐诗》第7296页)等,均用意委婉,爱憎分明,有补于时,反映出劳动人民的悲

苦心声。聂夷中的诗所存不多,《全唐诗》仅存一卷。

6. “花间派”鼻祖——温庭筠

温庭筠(812—870年),字飞卿,本名岐,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早年即有才名,精通音律,与李商隐并称“温李”。其诗词俱佳,以词著称,历代诗论家对其诗词评价甚高,誉为“花间派”鼻祖。王拯《龙壁山房文集忏庵词序》云,词体乃李白、王建、温庭筠所创,“其文窈深幽约,善达贤人君子惘惘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论者以庭筠为独至”。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已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又载张惠言语云:“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刘熙载《艺概》更云:“温飞卿词,精妙绝人。”^①《花间集》收温词最多,达六十六首,可见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其诗也写得清婉精丽,备受时人推崇,《商山早行》诗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堪称不朽名句。今所见温庭筠诗词,唯《花间集》、《全唐诗》、《全唐文》中有所保存。

7. 司空图及其《诗品》

司空图(837—908年),河东虞乡(今山西永济东)人,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由名作《诗品》所奠定,这部诗论是唐人诗歌创作艺术审美的出色总结,对后人的诗歌创作具有极深远的影响。他把诗歌分为二十四“品”,辨析各种不同的意境和风格。他所欣赏和倡导的是一种“妙造自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境界。其诗论的核心是“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数论。他认为诗歌之所以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主要在于它把诗人的诗歌创作与欣赏者的形象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揭示出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魅力所在。他的诗说丰富和拓展了我国传统文艺批评中的“意象”、“意境”、“韵味”等美学范畴,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① 《唐宋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4页。

诗歌艺术的审美理想。

(六) 作家荟萃的金元时期

金元时期,山西籍的作家特别多,据光绪《山西通志·文苑》及其他史书载,主要有:杨云翼、冯延登、李俊民、雷渊、李献能、王子可、赵元、李汾、段克己、段成己、麻革、赵岐、郝知章、元德明、孙九鼎、王万钟、田世英、王中立、刘滋、王渥、王良臣、刘从益、秦略、卢洵、申万全、张琚、元好问、刘昂、刘撝、王特起、张益、白朴、萨都刺、王敏夫、王翼、许蜕等。下面介绍有代表性的几位:

杨云翼(1170—1228年),字之美,平定乐平(今山西昔阳)人。十分尊崇儒学,反对“不本于仁义之说而尚文辞”的写作态度,故其诗具有质朴、真率的特点,如《父老》:“老去宦情薄,秋来乡思多。遥怜桑垄在,无奈棘林何。白水青沙谷,黄云赤土坡。几时随父老,社酒太平歌。”

李俊民(1176—1260年),字用章,泽州晋城(今山西晋城)人。生平著述甚丰,但遭战火,遗弃殆尽,其散落诗文编为《庄靖集》,凡诗七卷,文三卷。李俊民在金元文坛上颇有名声,元世祖忽必烈曾对待臣说:“朕求贤三十年,唯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①。刘瀛评价其诗文说:“格律清新似东坡(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句法奇杰似山谷(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李瀚评价说:“清才雅韵,随寓发抒,流丽精华,脍炙人口”。^②

雷渊(1184—1231年),字希颜,一字季默,应州浑源(今山西浑源)人,是金代宋诗派的代表性诗人。《中州集》收其诗三十首,刘祁《归潜志》录有数首,从内容来看,其诗歌大致可分为写志抒情、咏物、

^① 清·顾嗣立编:《元诗初选集》卷四。

^② 元·刘瀛、明·李瀚撰:《庄靖先生遗集·序》,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省文献委员会1915年印本。

怀友三类,元好问在《希颜挽诗》中,评价他为“中朝第一人”。

李献能(1189—1232年),字钦叔,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人。刘祁《归潜志》说他“作诗有志于风雅,又刻意乐章”。他的文章、诗词留至今日的不多,仅就现存的一些诗词看,其词作基本以北宋婉约派词人为宗,以写景状物、抒情写意、描写儿女爱情生活中的寥落寂寞、忧伤怅惘的心情为主,也有一些为金国的灭亡忧伤感怀的作品。其一部分诗词被收入《中州集》中。

王予可(?—1232年),字南云,河东耿州(今山西吉县)人。其诗作,大致不出北宋婉约派诗人的体系,除了一些宫体诗描述宫女描金绣凤、走马游猎的闲适生活以及孤独寂寞的情感外,多数是些山水诗。如《杂诗》云:“白露河滩漫绿湄,小舟舫岸尚依稀。山回屏曲江连树,春锁人家深处归。”(元好问:《中州集》)描绘出一幅清新秀美的画面。其诗作基本沿袭宋代江西派诗人的系统,多数格调柔弱,以反映佳人淑女思亲恩爱的心情见长。

赵元(1190—?年),字宜之,号愚轩居士,定襄(今山西定襄)人。少年即有诗名,其诗作多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修城去》写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队攻陷忻州后的惨状:“倾城十万户,屠灭无移时。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干城下血。”又如《邻妇哭》:“邻妇哭,哭声苦,一家十口今存五。我亲问之亡者谁,儿郎被杀夫遭虏。邻妇哭,哭声哀,儿郎未埋夫未回。烧残破屋不暇葺,田畴失锄多草莱。邻妇哭,哭不停,应当门户无余丁。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运米云中行”,更是现实主义的佳作。

李汾(1192—1232年),字长源,山西太原人,一生以诗为业,专以唐诗为宗。其诗格调高古,气势恢宏,风云悲壮。他的《再过长安》、《雪中过虎牢》、《汴梁杂诗》等,都充满了豪爽慷慨、激越悲壮的气息。他死后,其诗友王元粹写了一首《哭李长源》的七律来悼念他,诗中说他“以才见杀人皆惜,忤物能全我未闻。李白歌诗堪应诏,陈琳书檄偶

从军”(《中州集》),对他的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段克己(1196—1254年)、段成己(1199—1279年)兄弟。克己,字复之;成己,字诚之。河东稷山(今山西稷山)人。《古今词话》载:“二段幼有才名,赵尚书秉文识诸童时,目之曰‘二妙’,大书‘双飞’二字名其居里,兄弟俱第进士,入元后皆不仕。”作为前朝的遗民,兄弟二人的作品中多有抒发江山易主的感慨,表达对故国的眷念之情。如段克己的《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长戈袅,飞鸟绝;原厌肉,川流血。叹人生此际,动生长别”,控诉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生离死别的残酷现实。后人评论段氏兄弟的词时说:“二妙词近接遗山,远宗稼轩,较诗尤为高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段克己的诗以《癸丑仲夕之夕与诸君会饮山中,感时怀旧,情见乎辞》最具意义。其子段思诚、段思温也颇著诗名。

麻革,字信之,别号贻溪,河东临晋(今山西临猗)人。著有《贻溪集》一卷,收入《元诗选》癸集中。元好问论其诗曰:“信之如六国合纵,利在同盟而敝于不相统一,有连鸡不俱栖之势。”(《贻溪集》序)他的诗不少是反映战乱之际人民痛苦生活的,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如《过陕》中:“悲风鼓角重城暮,落日关河百战秋。形胜古来须上策,尘埃岁晚只羈愁。”其晚年生活凄凉,贫病交加,这种窘况从他的诗中可得到反映,如《云中夜雨》:“四围晴立壁,一突午无烟。病卧秋风里,愁吟夜雨边。”

孙九鼎,山西定襄人,在太学时游金明作诗云:“片片桃花逐水流,东风吹上木兰舟。隔溪红粉休相认,年少孙郎不姓刘。”已显出其杰出才华。吴彦高曾赠其诗云:“孙郎有重名,谈笑取公卿。清庙瑟三叹,齐房芝九茎。”从中可看出其当时名声之高。卒年80岁。

王中立,山西岢岚人,博学强记,诗笔字画皆超绝。诗甚多,赵秉文知平定(今山西平定),赠诗云:“寄语闲闲傲浪仙,枉将诗洒污天全。黄尘遮断来时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可见其诗风。

秦略,字简夫,自号西溪老人,陵川(今山西陵川)人,少举进士不中,即以诗为业。诗尚雕刻而不见斧凿痕。年67卒,临终留诗云:“躯壳羁栖宅,儿孙邂逅恩。云山最佳处,随意著诗魂。”

元好问(1190—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是金元之际集文学之大成者。其《论诗绝句三十首》集中表现了他的文艺见解。他主张创作要以现实生活为源泉,不应“闭门觅句”。他诗歌创作中最为感人的是“丧乱诗”,如《岐阳三首》之二云:“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描写出蒙古南侵时国破家亡的深痛与惨况。其词在金代词人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摸鱼儿·问人间情是何物》等都是为人称道的佳作。

白朴(1226—1310年),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字太素,号兰谷,隰州(今山西河曲县)人。除杂剧创作外,还是著名的词人,其词作在他生前已编订成集,名曰《天籁集》,收词二百余首,多为伤时感怀之作。他的词作承袭元好问长短句的格调,跌宕沉挚,天然古朴。

萨都刺(1272—?),字天锡,号直斋,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元代著名诗人,其诗作多充满现实主义精神与爱国热情。形式独具风格,无论古体、律诗,都显得自然娴熟。时人评论说:“其豪放若天海海涛,鱼龙出没;险劲如华、泰、云门,苍翠孤耸;其刚健清丽,则如淮阴出师,百战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霁月之娉媚也”(《雁门集》序)。

(七) 明清的诗文

这一时期的山西作家也很多,主要有:薛瑄、王虎谷、常伦、张慎言、宋拯、邢大道、赵需、栗应麟、李经、郭鞏、孙承恩、郭纮、尹耕、杨峙、王臣直、宁二翰、裴邦奇、朱表抄、陈廷敬、吴雯、程之珩、徐化溥、白允彩、徐继畲、董文焕、曹润堂、赵良玉等。

薛瑄(1389—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河津县南薛里(今山西

万荣县平原村)人。他的五言、七律古诗都很出色,诗风近唐人。五古淡雅,稍近王维、韦应物;七古雄奇,颇似李、杜。五律、五绝不多,但写得很清新。

张慎言(1577—1645年),字金铭,号藐山,人称藐山先生,山西阳城人,明清之际思想家。在文学创作上,反对拟古,主张写真情,其诗文创作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不事雕饰,不尚藻丽,平淡自然。

李经,泽州阳城(今山西阳城)人,才敏工诗,碑碣文词多出其手,与沁水常伦同时称山右两才子。

陈廷敬(1639—1712年),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山人,山西泽州府(今晋城)人,清代著名学者。他的诗多为咏物、怀古、寄情之作,风格清新独特,邓之诚评价说,陈廷敬“与王士禛、汪琬为友,而诗文各不相袭。诗名不及士禛,而功深厚似过之。文摹欧、曾,一变其乡傅山、毕振姬西北之习,同时达官无能及之者”(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康熙皇帝曾称赞陈廷敬的诗“清雅醇厚,非积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也”。(李烜:《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吴雯(1644—1704年),字天章,山西永济人。他的诗作峻洁幽远,不尚声华,不求媚俗,郁葱秀拔,自露天真。王士禛曾说,自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号为仙方者,仅止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而已,清代诗人如林,而“可称仙方者,独蒲坂吴生”。诗人赵执信评价说:“千顷之波,不可清浊,天姿国色,乱头粗服,皆佳。其乡自元遗山后一人而已”(常赞春辑:《山西献征》)。有诗集《莲洋集》二十卷传世。

徐继畲(1795—1873年),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有诗258首,其诗文多饱含忧国忧民思想,如他在《啗糠词》中,把贫苦百姓的艰辛与官衙中的挥霍进行了对比。写道:“富食米,贫啗糠。细糠犹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昨行都会官衙头,粒米如珠流水沟。对之垂涎长叹息,安得淘洗持作粥”。表达了作者对贪官污吏的控诉,对贫苦百姓的深切同情。另外,他对古代诗歌也进行过认真研

究,有《古诗源评注》一书流传于世。

董文焕(1833—1877年),字尧章,号研秋,又号研樵,山西洪洞人。自幼好诗,古诗取法唐代韩愈、孟郊,宋代黄庭坚、陈师道,元代虞集,近体则依中晚唐,尤近韩、孟“苦吟”、“险语”之风,以悲飒瘦劲著名。

曹润堂(1853—1909年),原名培德,字润堂,号柘庵,山西太谷人。是一位多产诗人,“毕生精力,则在乎诗。情之所感,兴之所至,悉发诸歌咏”,朝考有《记程诗》,赴并门有《题墙集》,办垦务有《塞上吟》,《庚子记事》则一百五十首,皆手自编订。此外,钞存尚有一千二百余首,徐花农称其诗感慨苍凉,关心民隐,有杜少陵遗响。有《木石庵诗选》、《复选木石庵诗钞》等传世。

二、散文

山西的散文家很多,因篇幅所限,择其要者介绍几位。

(一) 荀子及其散文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蒲(今山西永济)人;生卒年不详。曾游学齐国的稷下,到过秦国,后来做过楚国的兰陵令,是先秦诸子中一位集大成者。其散文气势磅礴,长于说理,如《劝学》一文,运用了丰富的比喻,辞采缤纷,语句整齐、精炼,至今仍是人们学习的名篇,现有《荀子》三十二篇传世。

(二) 裴子野与温子昇

裴子野(469—530年),字幾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著名文学家,其作品清新秀美,质朴无华,“不尚丽靡之词”(《梁书·裴子野传》)。曾著《雕虫论》,对当时文章追求华丽、散文骈俪化的颓废文风进行了批评。如他的《喻虬檄心》一文,一气呵成,笔力刚劲,与堆砌典故的骈体文差别甚大,颇有秦汉遗风,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

汉三国六朝文》辑有其佚文。

温子昇(495—547年),字鹏举,白云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其文婉约清丽,南朝梁武帝萧衍非常喜欢他的文章,专门派张皋传抄,称赞温子昇为“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北史·文苑传》)。阳夏太守傅标出使吐谷浑,见其国王床头有书数卷,全是温子昇的文章,说明他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一定影响。济阴王元暉业曾自豪地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颜辄谢、舍任吐沈”(《魏书·文苑传》),虽不免溢美,但反映出温子昇的确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位作家。

(三) 杰出散文家——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其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愈评其文曰:“雄浑健雅,似司马子长。”后人将其与宋代欧阳修等誉为唐宋八大家。他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提出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并在写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炼生动的优秀散文。其说理散文结构严密、笔锋犀利,富于战斗性;寓言散文讽刺辛辣深刻;山水散文流畅清新。如《永州八记》、《黔之驴》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今有《柳宗元集》传世。

(四) 杨云翼与元好问的散文

杨云翼的散文长于论辩说理,文思流畅,结构严谨,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如《谏伐宋疏》即是一时传诵的名篇。文章从天、地、人三方面论述了当时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局势,分析了伐宋的利害关系,议论精辟,言之成理。

元好问的散文,承继唐宋古文运动的遗脉,格老气苍,根深文邃。讥讽借“隐”之名、沽名钓誉之徒的《市隐斋记》,表达乐山乐水胸襟的《济南行记》,抒发不慕名利心境的《送秦中诸人引》等,都是其散文中的佳作。《兴定庚辰太原贡士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引》是写于登进士第前一年的述志之作:

晋北号称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时,发策决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谓富矣!丧乱以来,僵仆于原野,流离于道路,计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预秋赋者乃有百人焉。从是而往,所以荣吾晋者,在吾百人而已;为吾晋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则为吾百人者,其何以自处邪?将侥幸一第,以苟活妻子邪?将靳固一命,跼蹐廉谨,死心于米盐簿书之间,以取美食大官邪?抑将为奇士,为名臣,慨然自拔于流俗,以千载自任也?使其欲为名臣奇士,以千载自任,则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虽充赋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贵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呜呼,往者已矣,来者未可期。所以荣辱吾晋者,既有任其责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文章感情充沛,洋溢着“荣吾晋”、“以千载自任”的热情与抱负。语言自然流畅,苍劲真挚,节奏明快。

(五) 薛瑄的散文

薛瑄,明代著名理学家,文学方面也有很高造诣。除了五言、七言古诗写得出色外,散文也很有造诣。如《游龙门记》、《游草堂记》、《猫说》、《捕虎答》等均属上乘,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代淳儒,瑄为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绝不以俚语破格”。

三、小 说

(一) 郭璞的志怪小说《玄中记》

《玄中记》又名《郭氏玄中记》、《元中记》,是魏晋时期博物类志怪

小说的代表作。书中涉及内容丰富,有上古神话、远国异民传说、山川奇异生物传说、精怪妖异故事等诸多方面。其中男子藏鸟羽而得妻的“姑获鸟”故事,“桃都山”、“扶桑山”、狐妖等传说,对南北朝志怪、唐人传奇以至清代《聊斋志异》等均有较大影响。其文笔“恢奇块丽,仿佛《山海》、《十洲》诸书”(叶德辉:《辑〈郭氏玄中记〉序》),今有辑佚本。

(二) 郭澄之的志人笔记体小说集《郭子》

郭澄之,字仲静,生卒年不详,东晋太原阳曲(今山西太原市北)人。擅长著述,《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文集十卷,已佚。其志人笔记体小说集《郭子》三卷,记述魏晋间名士们的言谈轶事,文笔简洁生动,虽然尚未脱离笔记体记实窠臼,但可以说已深得小说文体的意趣。

《郭子》一书,唐代犹存,贾全曾为之作注,后佚失。鲁迅先生《古小说钩沉》中辑有 80 余则佚文,可见《郭子》全书的概貌,晚出的《世说新语》有不少故事取材于《郭子》。《郭子》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三) 唐代传奇小说家——白行简、薛用弱

白行简,字知退,唐时太原人,著名传奇小说家。其作品主要有《李娃传》、《三梦记》等,其中《李娃传》最为著名。这是一篇出色的爱情小说,写荥阳公子某生,赴京应考,遇名妓李娃,两人热烈相恋。后某生资财荡尽,流落街头。李娃知某生沦为乞丐,不顾鸨母阻止,与其同居。某生发愤读书,考试连中,最后得为高官,李娃被封为汧国夫人。白行简笔下的李娃,是一个优美动人的妇女形象,她的社会地位虽然极为低下,但心志崇高,忠于爱情。小说不但艺术性高,塑造了李娃这样一个感人的艺术形象,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是对封建礼教和门阀士族制度的有力鞭挞。《李娃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甚有影响,备受推崇,后世曾多次改编为剧本,搬上戏曲舞台。

薛用弱,字中胜,生卒年不详,唐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以其撰写的《集异记》而知名。该书搜奇述异,文辞雅饬,隽永可观,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盛称“其叙述颇有文彩,胜他小说之凡鄙”,是唐人传奇中很著名的一种。《集异记》卷帙较小,全书所记故事不过16则,但因后人引用、改编,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如第十则所记王之涣、王昌龄、高适旗亭饮酒听伶官唱诗之事,尔后形成“旗亭画壁”之典。其《蔡少霞》叙陈留人蔡少霞于兖州泗水东买山筑室,深僻而居。一日溯溪而行,于美荫处不觉成寐,被褐衣鹿帻人从梦中召去,得至仙境,书紫阳真人山玄卿所撰新宫铭于碑。故事曲折动人,文笔精美,洪迈《容斋随笔》推为奇作。书中的一些其他故事,还被后人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如《集翠裘》所记狄仁杰事,清人裘琏改编成杂剧《集翠裘》;《王维》所记王维因岐王而见公主进奏《郁轮袍》,终胜张九皋而得解头事,明人王衡改编成杂剧《郁轮袍》。王之涣等“旗亭画壁”故事,演变为剧本者,有明人郑之文的《旗亭记传奇》,清人张龙文的《旗亭燕杂剧》和卢见曾的《旗亭记传奇》,于此可见《集异记》对后世影响之大。

此外,据《新唐书·艺文志》,唐代著名词人温庭筠还撰有小说《乾牒子》3卷,可惜亡佚,现在已无从探知其详。

(四) 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家——罗贯中

罗贯中(约1330—约1400年),名本、才本、道本,号“湖海散人”,太原清徐县人。一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全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等五六部长篇小说,其中尤以《三国演义》最为著名,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我国古代历史演义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三国演义》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写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止,描述了大约100年的历史。其中着重写了历时约半个世纪的魏、蜀、吴三国的兴衰过程,书中虽不乏虚构夸张、移花接木的篇章情节,但因符合社会生活实际和人物心理特征,故仍能真实、

深刻、全面地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斗争。其艺术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擅长描写战争，把惊心动魄的战争写得具有旋律节奏、富于诗情画意。还注意把人物放到矛盾冲突中，通过各自的言行，用夸张、对比、烘托、渲染等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其结构宏伟、事件复杂、人物众多，语言简洁、明快而又通俗，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正因为如此，这部历史演义小说几百年来曾以各种艺术形式广为流传，近年更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荧屏，并在其故里清徐县修建了“三国城”，供人参观游览。

罗贯中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开拓和确立了中国古代白话长篇章回小说的新体裁，使“小说”这一难入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形式正式登上了中国文学的大舞台。

（五）清代讽刺小说家——刘璋

刘璋(1667—?)，字于堂，号介符，又号烟霞散人、樵云山人等。清代阳曲(今山西太原)人。主要有《斩鬼传》、《幻中真》、《凤凰池》、《巧联珠》、《飞花艳想》等几部小说，除《斩鬼传》为社会讽刺小说外，其余均为才子佳人题材，但尤以《斩鬼传》影响较大。

《斩鬼传》，又名《说唐平鬼传》、《平鬼传》、《钟馗传》、《钟馗捉鬼传》等，共十回。书中描写了40种鬼，借鬼喻人，影射众生百相，对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丑恶现象以及陋俗弊端、人性之恶作了无情的鞭挞，借此表达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它是我国古代讽刺小说中时代较早而又有较大影响的一部作品。小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想象丰富奇特，手法巧妙浑成，语言通俗尖利，风趣盎然，寓意深刻，全面反映了作者积极的社会思想，可称是中国讽刺小说中的佳作。

刘璋的才子佳人小说大都创作于中老年，总的特点是逼真刻画现实生活，想象奇特，构思巧妙，情节曲折，文字优美。一方面充分肯定大胆纯真的爱情，另一方面，保持和发挥了追求离奇变幻、长于讽

刺幽默的鲜明风格。

山西小说,除了以上所叙之外,还有元好问《续夷坚志》四卷 202 篇,徐昆(1715—?,号柳涯,山西临汾人,清代文学家)文言短篇小说集《柳涯外编》等,也颇有影响。

山西作家创作一览表(据光绪《山西通志》制)

类别 朝代	集		诗(集、稿、文)		文(集、稿)		赋		总计	
	卷数	部数	卷数	部数	卷数	部数	卷数	部数	卷数	部数
战国	2	1							2	1
汉	22	7						2	22	9
魏	10	5							10	5
晋	194	28			1	1			195	29
南宋	28	3							28	3
南齐	16	2	1	1					17	3
南梁	72	5							72	5
后魏	139	13		1				4	139	18
北周	72	4							72	4
隋	65	5					1	2	66	7
唐	1208	68	55	17	20	2			1283	87
五代	2	1							2	1
宋	653	29	5	7	50	2			708	38
金	63	45		5					63	50
元	80	27	9	4		7		1	89	39
明	369	91	13	20	8	7		1	390	119
清	106	55	6	2	62	7			174	64
总计	3101	389	89	57	141	26	1	10	3332	482

第二节 三晋艺苑

艺术门类甚多,此处重点介绍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戏剧等几个方面。

一、书 法

(一) 侯马盟书的书法艺术

侯马盟书 1965 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发现,共 5000 多片,是用毛笔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呈朱红色,少数为墨色,字形与《魏正始三体石经》上的古文、宋代郭忠恕《汗简》一书集录的字形相似。字体风格不一,有的粗率,有的纤巧,还有蝇头小楷。同一玉片上的文字行次比较规整而大小很不一致,比较自由。从运笔上看,它是用一种弹性很强的毛笔写成,落笔较重,收笔出锋,形如蝌蚪,体现出一种“重事实,字多浑厚”的书法特征。

(二) 魏晋六朝主要书家

魏晋六朝是我国书法艺术鼎盛时代,书体的变化从篆、隶、章草蜕变出来,形成了真、行、今草书体,三晋也涌现出了不少书法名家。如卫觐、卫恒、王修、卫夫人、裴敬宪、冀俊、薛慎、柳宏等,他们在书法实践与理论上均取得了不少成就。

1. 卫恒及其《四体书势》

卫恒(?—291年),字巨山,西晋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祖父卫觐、父卫瓘均以书名世,家庭的教育与熏陶使他从小就喜欢书法,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草、隶书。同时,在长期研究书法的基础上,写成《四体书势》一文,探讨了汉字的构成、字形字体的演变,提出“书

体”和“书势”的命题,认为书势是静止的书法所显示出来的动态,具有节奏和运动感,而且由于书体之不同,书势随之发生变化,即“异体同势”,并且对西晋以前的书家进行了评论,指出了他们的得失。《四体书势》是我国书法理论的重要文献,对我们理解和欣赏中国书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卫夫人对书法的探索

卫夫人(272—349年),名铄,字茂漪,卫恒侄女,汝阴太守李矩之妻,故世称卫夫人。少好学,酷嗜书法艺术,很早即以大书法家钟繇为师,特善隶书。钟繇曾称赞其书法说:“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张怀瓘:《书断》);唐人韦续则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映水,碧海浮云”(韦续:《墨薮》),评价均极高。宋初《淳化阁帖》、北宋潘师旦在山西所刻《绛帖》、徽宗精选精刻的《大观帖》等三丛帖中,选入了卫夫人《急就帖》一件,但墨迹未流传下来,只能从三帖的拓本窥知一二。

此外,卫夫人还在书法艺术理论方面有重大建树和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撰有《笔阵图》^①一卷,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有关的书法理论,在选笔、执笔、用笔、具体笔画书写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一篇很好的书学理论著作。

3. 北周冀俊的书法

冀俊,字僧俊,生卒年不详,北周太原阳邑(今山西太谷)人。善写隶书,西魏大统初,曾应宇文泰召入大丞相府教授宇文泰的儿子宇文毓及孙子宇文贤等人隶书,而民间欲学书学之人也纷纷慕名上门,施礼求教。冀俊遂名动京城,与书学博士赵文深并得时誉,史称“当时碑牋,唯冀俊及文深而已”(《北史·儒林下》)。

^① 另有不同看法,认为《笔阵图》非出卫氏,而是唐人或稍早的书法家所撰。见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4页。

冀俊最为擅长的是模仿他人笔迹作书。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宇文泰统兵讨侯莫陈悦,命冀俊伪造魏孝武帝敕书给费也头,令其出兵助战。冀俊仿照孝武帝旧敕书的文字并舍人、主书等人的署名摹写,竟与真的没有两样,费也头接到宇文泰伪书后,竟未看出破绽,遂遵敕发兵1000人给宇文泰节制,于此可见其摹写技巧之高超。

(三) 唐宋书家

薛稷(649—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其师法于褚遂良,其字笔态遒丽,楷法精妙,但“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发展了初唐书法劲瘦媚丽而又圆腴挺拔的时代风格,是徽宗“瘦金书”的前源。后世把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一起并称为“初唐四大书家”。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把褚字发展到极境的《信行禅师碑》(全称《隋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该碑刻于武后时(684—704年),已佚,惟清代何绍基藏有宋拓孤本,现已流入日本。其他的书法作品还有《中岳碑》、《升仙太子碑》等。

王知敬,生卒年不详,唐代太原(今山西太原)人,书法造诣颇高。无论其行书、草书,均入能品,而尤以章草著名,前人评曰:“肤骨兼有,戈戟足以自卫,毛翻足以飞翻”(《书断》)。还兼善正书与署书,与当时著名书法家陈郡殷仲容号为“双绝”。其书法作品有《洛川长史贾公德政碑》、《唐卫国公李靖碑》等,笔法峻利丰秀,极具韵致。

张彦远(815—875年),字爱宾,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在书画上均有较高成就。擅长隶书,在艺术理论方面贡献尤大。编有《法书要录》一书,它是第一部书学论著丛书,编录自东汉至唐元和(806—820年)年间的书法理论著作34篇,多数具录原文,少数仅存书目,采摭繁富,精审有识,许多书法著作均赖此书得以存留。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好事者得此书及《历代名画记》,书画之事毕矣。”《法书要录》是目前研究中国书法史和书法理论的重要文献,有很高的学术性和权威性。

文彦博(1006—1097年),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累仕四朝,出将入相50余年,封潞国公,谥忠烈。文氏工书,于草法极留心。今人印有《宋文彦博三帖》,振笔挥洒,无意求工,而浑朴天然,非一般人可比。

此外,这一时期的书家还有卢知猷、陶穀、薛绍彭等。

(四) 金元书家

金元时期的书家有:王渥、元好问、赵珙、溥光、郭恭、张守大等,最为著名的是溥光。

溥光,元初高僧,字玄晖,号雪庵,俗姓李,大同(今山西大同)人,生卒年不详,活动时间约在元至元到大德、延祐年间。由赵孟頫推荐,特封昭文馆大学士,赐号玄悟大师,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师法颜、柳,宫内匾额多出其手。其理论著作有《雪庵永字八法》和《雪庵字要》,前者总结了永字八法变化三十二势,研究了起收笔法,通俗易懂,创见独到;后者介绍了大楷歌诀13首,用笔八法图和字中八病图等,在书法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溥光的传世作品有大字行楷书《山名诗》卷,字大三寸许,每行二字,字体丰硕,结体遒伟,笔法苍劲,得颜、柳二家风规,是其书法代表作。

(五) 明清书家

这一时期的书家颇多,主要有:王虎谷、常伦、朱表抄、郭纪、乔庄简公、刘居仁、翟师程、王文端、公家屏、谢陈常、梁承斋、高应元、郭世元、梁维、韩霖、王复丸、傅山、张志远、吴燧、杨二酋、徐继畲等。下面介绍有代表性的几位。

梁承斋,稷山(今山西稷山县)人,大书二尺以上最有名,小行草疏爽不密而无俗气。

高应元,太原(今山西太原)人,行草书奇逸飞动而署书尤绝。

韩霖,字雨公,号寓庵,绛州(今山西新绛)人,长身竦肩音如洪钟,为文有奇气,书法在苏、米间。

傅山(1607—1684年),原名鼎臣,字青主,号朱衣道人,山西阳曲(今太原市)人。是著名的思想家、医学家、书画家。他弱冠学晋、唐人楷法,后得赵孟頫、董其昌墨迹,临仿能乱其真,后鄙弃赵之为人,改学颜真卿,并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从他最擅长的行、草书中可体会到这种艺术情趣。如行书《丹枫阁记》(藏辽宁博物馆),笔画圆润劲健,结体壮实秀逸,兼有颜、柳与二王之气韵,是融合诸家的代表作;草书《孟浩然诗卷》(藏故宫博物院)纵逸跌宕,自由飞动,多真率之趣;其长幅作品尤其具有“笔力雄奇”的特点,《行书七言诗轴》(藏辽宁博物馆)以草写行,全幅一气呵成,笔势连绵飞动,刚劲潇洒,气势磅礴。

杨二酉(1705—1780年),字学山,号又邨,别号西园,归田后号柳南,一梅居士,晚年号梅翁,山西太原晋祠南堡人。他以“工书入直”(刘大鹏:《晋祠志》),是清乾隆时期颇负盛名的书法家。他对晋祠名胜有过不少建树。晋祠名匾“水镜台”、“悬山响玉”、“化育赞”均出自其手笔;待凤轩上“梧桐自当年剪得,凤凰于何日飞来”的楹联为他所题;先后参与了移建文昌阁、扩建文昌宫、重建七贤祠、重修柏月山房等一系列修葺工程,并铭文勒石,其中“柏月山房记”砖刻和“同乐亭记”最为著名;他还倡导和赞助了唐碑《晋祠之铭并序》的摹钩重刻工程。此外,他还提出“晋祠内外八景”之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他的曾孙杨埭将“晋祠全景诗十六首”书于文昌阁的东西榭壁上,至今墨迹清晰,完好无损,成为晋祠珍贵的文物之一。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杨二酉病逝于家乡,享年76岁。

二、绘画、雕塑

我国的绘画艺术,早在六七千年前的彩陶文化时代就开始了,到夏商周始有庙堂壁画,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大兴宫殿宙宇,壁画装

饰更盛,可惜这些宏丽的宫殿壁画随建筑物的消失已永不复见,但却能从当时的典籍中找到较为成熟的绘画理论,如孔子的“绘事后素”论、韩非的写实论等。而关于绘画的社会功能,三晋的思想家荀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荀子·礼论》),强调绘画的娱乐功能;同时他又把绘画看作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认为“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荀子·富国》)。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实物主要是岩画、帛画、漆画、铜器画、壁画以及魏晋以后的传世卷轴作品。

(一) 主要画家及其作品

1. 唐代画坛

薛稷,不仅是初唐四大书家之一,而且其绘画成就相当高。擅长花鸟、人物及杂画,尤以画鹤最为精妙,有“言鹤必称稷”(《宣和画谱》)之誉。其鹤画代表作有:《啄苔鹤图》、《顾步鹤图》、《瑞鹤图》、《戏鹤图》等。画鹤之外,其人物画和杂画也达到了很高造诣。李白曾特邀他为新安郡(今安徽歙县)西安寺画西方佛壁画一铺,被《唐朝名画录》列为神品,认为可与曹不兴、张僧繇相匹敌。此外,成都静德精舍有其人物鸟兽壁画二铺,“态状生动,乃一时之尤者也”(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工部尚书厅有其树石壁画,成都府衙院有其青牛壁画等,也都“并居神品”(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可惜这些画迹今天已荡然无存了。

王知慎,生卒年不详,唐代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大约活动时期在武后朝(684—704年),官至秘书少监。一生酷爱书画艺术,绘画师法阎立本,主要进行人物画的创作。他继承了阎立本浑健坚实的铁线描法,简练刚直,富于表现力,论者将其作品归入“妙品”。王知慎又善书法,时有“书画双绝”的美誉,但其书画作品无一见于著录流传。其兄王知敬亦有画名,史载“画与弟知慎齐名”(夏文彦:《图绘宝鉴》),

因记载简略,已不得其详。

王维,不仅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大画家,被称为“文人画宗师”。他在诗与画的成就上历来受到称颂,宋代大诗人苏轼就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唐才子传校笺》一)。王维曾向“国朝第一”的李思训学过画,还学过吴道子,其成就最高的是山水画。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有详细论述。关于王维的画迹,今天能看到的有《江山霁雪图》、《伏生授经图》、《雪溪图》等。王维的山水画对后世影响也很大,被画家们奉为“南画之祖”,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王拙,生卒年不详,唐代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大约生活在中唐时期(766—827年)。生平事迹难以索考,只知他官终剑州(今四川剑阁)刺史。素爱绘画,拜中唐著名人物画家周昉为师,专攻仕女人物,有“士女之特善也”(《唐朝名画录》)的说法。据《宣和画谱》载,王拙的绘画作品宋朝内府珍藏有10件;此外,他还擅长描绘子女菩萨一类题材的佛教人物画,惜其作品今已无存。

张彦远,不仅是晚唐了不起的书法学者,更是杰出的画史画论家。他通过自己的书画艺术实践,写成了世界上第一部绘画通史《历代名画记》。该书成书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作者对有史以来散见于诸书的画史资料进行广泛的收集与系统的整理,包蕴宏富,见解深微,被誉为画史中的《史记》。在绘画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南北朝时谢赫的“六法论”,提出了“自然”、“神”、“妙”、“能”、“谨细”五个标准,尤其是其“书画同体”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作为我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巨著的《历代名画记》,总结了前人有关绘画史和绘画理论的研究成果,继承发展了史论结合的优良传统,开创了绘画通史的科学体例,是我国绘画史和绘画理论方面的“百科全书”,为以后各类绘画著述的出现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2. 五代山水画名家、画论家——荆浩

荆浩(901—960年),字浩然,五代后梁沁水(今山西沁水县)人。他在唐末隐居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自耕而食,感受了崇山峻岭的壮美景色,画松数万本,囊括了唐人用笔用墨的经验,开创了以描写大山大水为特点的北方山水画派。其绘画题材比较广博,山水之外,楼台、人物、佛释画都很有特色。今藏台湾中山博物院的绢本水墨画《匡庐图》是其代表作。

荆浩不仅是一位独具特色的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画论家,他撰写的《笔法记》和《山水诀》^①是中国山水画理论探讨的精微之作。在《笔法记》中,他首先为山水画制定了六条创作原则,即气、韵、思、景、笔、墨;其次,提出“神”、“妙”、“奇”、“巧”四个重要概念和审评标准;第三,提出用笔四势即所谓的“筋”、“肉”、“骨”、“气”;第四,提出了无形之病与有形之病的“二病”说;第五,对画家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最后还提出关于画的似与不似,实际上也就是如何把握艺术表现神似与形似的关系。这些既是他对绘画美学问题的理论思考,又是一位艺术家就有关艺术与审美活动而进行的真实的心灵剖白。

在《山水诀》中,荆浩对山水画的一些基本法则和技法作了若干论述,他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此其法也。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皴,高与云齐,远水无波,隐隐似有,此其式也。山腰云塞,石壁泉塞,楼台树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分两歧,树看顶脖,水看岸基,此其诀也……”(《山西通志·艺术》)等等。与《笔法记》比较,《山水诀》更注重具体的画法,这既是荆浩本人长期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唐末五代山水画技法日趋成熟的表现。

荆浩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构图以全景的大山

^① 也有人认为《山水诀》不是荆浩的作品,而是托名以传的民间画家的作品。见《中国书画》,第144页。

大水的方式,揭开了中国水墨山水画史上新的一页,成为北宋水墨山水画辉煌发展的先声。

3. 两宋画坛

(1) 人物画名家

王瓘,字国器,生卒年不详,宋代太原(今山西太原)人,著名的道释人物画家,吴道子画派重要的继承人和发展者。其平生的绘画作品几乎均为壁画,但没有一件能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根据历代画家的有关评论,大致探寻他的绘画风格和艺术特点。宋代著名佛道人物画家武宗元曾说:“吾观国器之笔,则不知有吴生矣”,另一位著名画家高克明也说:“今者得国器画,何必吴生?”(刘道醇:《宋朝名画评》)说明王瓘深得吴道子的风格和技法。甚至有人说:“本朝以丹青名者,不可胜纪,惟瓘为第一”(同上),并将其人物画作品列为神品上,给予了充分肯定。

王端(?—1023年),字子正,王瓘之子,受家学熏染,酷爱绘画,在山水,墨竹、人物等领域均有一定造诣,但最有成就的是人物画。史称其“尤长写真”(夏文彦:《图绘宝鉴》),画史又称其“于佛道人马,自为绝格”(《宋朝名画评》),说明其道释人物画成就也很高。

王居正,生卒年不详,河东(今山西永济)人。长于贵族士女画,师法唐代周昉。其传世作品有《调鹦鹉士女图》、《绿窗蕉雨图》以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纺车图》等。

乔仲常,山西永济人,工杂画,尤长道释人物,师著名画家李公麟,今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后赤壁赋图》卷,纸本,白描,画东坡游赤壁故事,按苏文所述依次描写,人物或行或止,均极简率生动;林木树石用笔柔秀而恣意,或干或湿,并画出月下人物倒影,尤为新颖。

(2) 山水画名家

高克明,生卒年不详,宋代绛州(今山西新绛)人。宋真宗景德中

(1004—1007年)游京师,大中祥符中(1008—1016年)入图画院,宋仁宗时奉诏作壁画,升为翰林待诏。皇祐元年(1023年)创作《三朝训鉴图》,画三朝盛德凡一百事。《宋朝名画评》将其作品列为妙品第一,认为“高克明铺成景物,自成一家,当代少有”。他除擅长山水外,道释鬼神、人马屋木、花卉翎毛、禽鱼畜兽等,也“皆造高妙”(《宣和画谱》)。但其画今不易见,美国纽约市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溪山雪意图》卷,传为高克明作。

王诜(1036—?年),字晋卿,山西太原人,居开封,为宋初功臣王全彬之后。一生致力于诗文、书法、绘画,尤以山水画成就最高。其山水画主要是宗承李成的水墨山水,青绿着色法则师法李思训,画风秀雅清润,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他的画在当时被尊为文人画的典范。其传世的代表作有:《渔村小雪图》(故宫博物院藏),《烟江叠嶂图》青绿、水墨各一卷(均藏上海博物馆)。

萧照,字东生,生卒年不详,宋代濩泽(今山西阳城)人,主要活动在北宋末南宋初。他自幼酷爱绘画艺术,山水画师法李唐,尤其喜欢描绘奇峰怪石、峰峦峭拔的景色,开创了南宋画院水墨苍劲的山水画派。其画作见于著录的有:《清溪图》、《幽洞图》、《春江烟雨图》、《山居图》等。同时,他还从事大型山水壁画的创作,最著名的是孤山凉堂壁画。他除山水画外,其他如人物、舟车、屋舍等亦皆造精妙,尤以人物画造诣为高。

马远,字遥父,一作子钦,又作后甫,号钦山,生卒年不详,河中(今山西永济)人,世称“马河中”。马远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与李唐、刘松年、夏珪并称“南宋四大家”,一生所涉及的绘画门类比较广泛,其中尤以山水画成就最大。他画山水,善于以偏概全,小中见大,往往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以表现广大空间,故时人称为“马一角”;在用笔上扩大了斧劈皴法,画山石用笔直扫,水墨俱下,见棱见角,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踏歌图》是流传至今的马远山水画代表

作。除山水画外,其他人物、花鸟亦擅长,重要作品有:《华灯侍宴图》、《梅石溪凫图》、《孔丘像》、《欢梅图》、《石壁看云图》、《高阁听秋图》等。

(3) 花鸟画名家——马麟

马麟,马远子,生卒年不详,其画题材广泛,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而尤以花鸟为佳。花鸟画是马麟毕生功力所聚,凡梅、兰、竹、草、飞蝶、蟾蜍,无不出现在他的笔下,他更注重生活情趣的表达。其代表作如《暮雪寒禽图》、《层叠冰绡图》等均为花鸟画精品。

(4) 著名画论画理家——郭若虚

郭若虚,生卒年不详,宋代太原人,平生酷嗜绘画艺术,尤精于画论画理。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郭若虚撰成《图画见闻志》6卷。该书以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卷《叙论》是第一部分,包括16篇专文,叙述绘画理论问题,集中反映了作者对绘画艺术的见解主张。第二部分为卷二到卷四的《记艺》,这一部分汇录了自唐会昌元年(841年)至宋熙宁七年(1074年)200余年间的重要画家共284人的小传。卷五、卷六分别为《故事拾遗》和《近事》,组成第三部分。前者记叙了唐及后梁、前蜀画家轶事27则,后者记叙北宋、后蜀、辽及高丽画家轶事32则。内容包括画家的生平、师承、交往以及民族间的绘画交流,为我们研究唐宋画史及画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是一部上承《历代名画记》,下启《画继》的重要的中国绘画史著作,其绘画理论和美学思想对以后文人画的兴盛产生了很大作用,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 金元画坛

这一时期,绘画理论与实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绘画名家,也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美学理论。三晋的代表人物有:王庭筠、王曼庆、马天来、王中立、李山、溥光、朱好古、郝经、李侗等。

王庭筠(1155—1202年),字子端,号黄华,河东(今山西永济)

人。金代最著名的书画家,尤其擅长画山水、古木、竹石,墨竹最为著名。其代表作《幽竹枯槎图》,从立意、构图和笔墨上看,与苏轼、文同、米芾一脉相传,潇洒老健的画风为后世崇仰,元代画家汤垕曾评价说:“上逼古人,胸次不在元章(米芾)之下”(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其人物画亦很精当。

王曼庆,生卒年不详,王庭筠之子。他继承家学,一生工诗能书而兼绘画,以绘画成就最高,擅长墨竹、树石,其代表作为《岁寒三友图》,即“松竹梅图”,该图笔意潇洒,是典型的文人画作品。由于王曼庆的绘画作品中文人画的意味较重,在元代很有影响,元代墨竹大家李衍最初学画,专师法王曼庆。王曼庆偶尔也画山水,但成就远在墨竹、树石之下。

李山,生卒年不详,金代平阳(今山西临汾)人。现收藏于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的《风雪杉松图》是其代表作。作品北方风格尤为突出,受北宋郭熙、王诜两家影响为多,洗去了南宋院画习气。

溥光,不仅是著名书法家,在绘画上也颇有成就。清《图绘宝鉴》谓其“山水学关仝,墨竹学文湖州”(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其山水多寒林野渡、云雾山顶,笔简气壮,景少境胜,墨竹则孤姿清致,点划入神,“俱成佳趣”(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但其真迹今已无存。

朱好古,生卒年不详,元代禽昌(今山西襄汾)人,在绘画方面擅长山水与人物题材,风格精致工巧,所绘人物,宛然如生,与其同乡张茂卿、杨云瑞同享盛名,时号“襄陵三画”(乾隆《平阳府志》)。在道释人物画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朱好古与张伯渊共同为兴化寺(在今山西稷山县)绘画,这组壁画现在保存下来的完整画面还有八大明王像和弥勒佛像,描绘极为工细,堪称元代佛教人物画的杰作。

李侗,字士弘,号峤真逸,元代河东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画竹名家,官至集贤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画竹学文同,评者谓其墨竹与李衍

相伯仲。

郝经(1223—1275年),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人,提出了“内游”的美学观点。所谓“内游”即指画家本人的主体修养及对社会人生的感悟。他专门写过一篇《内游》,对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但过分强调自身修养而轻视社会实践。此外,郝经在《静华君墨竹赋》中,提出了心与目、理与物、神与俗等几对矛盾,强调心、理、神,作者的思想(心)不能满足于表面所见(目),而要表现出事物的内在规律(理)、生机(神),不是机械地描摹物象;表现要合于作者的理想,而不是简单地迎合俗人之见。如果画竹一节一叶的照抄真竹的颜色、描摹外形,无异乎东施效颦,根本抓不到事物的本质,这些不失为水墨画的经典评论。

5. 明清画坛

明清时期,三晋也涌现出了不少绘画名家,主要有:翟师程、郭世元、张英、陈璉、王顺、胡良、万瑄、傅山、王含光、王适、赵文征、宋葆淳、张道渥、何道生等。

张英,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幼颖悟,不事师傅,善画人物翎毛,尤工戏墨,号平水翁,有編集画谱行世,平阳知府樊莹有“溪山不减王摩诘,台阁无惭董伯仁”之句。

宋葆淳(1748—约1825年),字帅初,号芝山,晚号倦陬,又曾自署约斋,清西安邑(今山西运城)人。在金石考据、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均有成就,以绘画成就最高。他一生主要从事山水画的创作,运笔奇肆飘逸,用墨淋漓尽致,苍秀嫣润,意态雄杰,脱尽尘俗之气,代表作为《水墨山水便面》图。除山水画外,在花鸟、人物、界画等方面也有一些作品传世,据《清画家诗史》、《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等记载,他的作品有:《湘管斋图》、《寒林钟馗图》、《写“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句意图》、《天寒有鹤守梅花图》、《三十六芙蓉楼图》、《细雨骑驴入剑门图》等。

张道渥(1756—?),字水屋,一字封紫,号竹畦,自称张风子,山西浮山县人,或曰浑源人。其一生主要成就在文学艺术方面,他的诗歌、书法、绘画时称“三绝”。其画风清逸豪放,秀润雅洁,生平用力最多的是山水画,现存作品不多,见于著录的有:《水墨山水小册》、《华山图》、《寒林雅集图》、《秋山行旅图》、《戒坛潭柘二寺图》等。

何道生(1766—1806年),字立之,号兰士,一作字兰士,号菊人,山西灵石县人,清代画家。其画清秀飘逸,文弱雅淡。平生喜绘山水,间作兰竹,他的作品被画史列入“逸品”,作品见于著录的有水墨山水小卷、竹兰(小幅)等。另外,他还是清代山西的著名诗人,有《双藤书屋诗集》刊行于世。

(二) 壁画、漆画、铜器画

山西地下地上文化遗存极为丰富,保存至今的数量也很多,下面介绍典型的几种。

1. 墓葬壁画

(1) 平陆枣园村汉墓壁画

墓室顶部绘有云气、星辰、太阳(内有金乌)、月亮(内有蟾蜍)、白鹤、青龙、白虎、玄武等。墓室北壁西部绘《耒耕图》,绘有山峦田野,农人驾黄牛,用耒车播种,田头树枝上悬方形物,状似鸟笼,一人蹲下督工,大路上有牛车奔走。西壁北部绘一短衣赤足的农人扶犁扬鞭,驱两牛耕田。北壁东部绘《坞壁图》,在起伏的岗峦中绘有坞壁,生动地再现了地主庄园生产劳动和其他方面活动的场景。

(2) 离石县马茂庄、杨家坪东汉画像石

为东汉桓帝时期,以简练的写真手法刻绘出车马行列、神话故事、瑞鸟瑞兽,以及反映北方生活的骆驼、耕牛等题材,形态生动,具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

(3) 太原南郊北齐娄叡墓壁画

约200平方米,以绚丽斑斓的大型长卷形式分布于墓道、甬道和

天井部位。画面结构布局严密,内容为反映墓主人生活的显赫场面或死后的空幻境界。大致分“鞍马游骑”、“祥瑞与天象”等,表现技法纯熟,线条洗练,形象生动,着色绚丽,是我国艺术史上北齐绘画的精品。

(4) 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壁画

墓室壁画分墓顶和墓壁两部分。墓顶为习见的“四神”、“星象图”,墓壁中绘有8幅“树下老人图”,为其他地区唐墓中少见。

(5) 绛县金墓壁画

墓四壁皆有图画,绘郭巨、孟宗、董永等行孝事迹,这是汉族封建统治向来作为礼教宣传的题材,足见金人的统治思想亦受汉人很大影响。墓中还绘有墓主夫妇对坐及男女侍仆,又有炊事、挑水等杂役活动,说明金人在生活习惯上也颇受汉人影响。

2. 寺观壁画

山西目前保存的寺观壁画计27259.52平方米,从唐代开始至清代,从未间断,传世之作比比皆是,如唐代五台县佛光寺东大殿拱眼壁及佛座背面壁上,五代平顺县大云院正殿,宋代高平县开化寺正殿,辽代灵邱县觉山寺塔内壁,金代朔县崇福寺弥陀殿、繁峙县岩山寺前殿,元代芮城县永乐宫四座大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稷山县青龙寺腰殿,明代浑源县永安寺大雄宝殿、汾阳县田村圣母庙大殿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作。其中尤以繁峙岩山寺壁画和永乐宫壁画为最。

(1) 繁峙县岩山寺金代壁画

金代王逵作,满壁绘佛传故事,线描的水平、重彩的敷设,人物、建筑、山水等故事情节的结构,连壁大幅,远远超过任何卷轴作品。尽管画的是佛家故事,但不离人间的生活细节,如宫阙、婴戏、赶驴、游骑、宫中女乐、水磨、泗人、海市蜃楼诸画题,是画家王逵自身生活、师承、技法综合起来得出的艺术效果,堪称稀世之宝。

(2) 芮城县永乐宫元代壁画

该壁画为金元时代道教中的新教派全真教的人物画,其构图宏大严整,造型庄严准确,笔墨挺拔流畅,敷彩富丽堂皇,内容丰富多采,是中国古代道教人物壁画光辉成就的突出范例。现存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内所绘壁画为世人所瞩目。

三清殿是永乐宫的主殿,壁画完成于1325年,全部壁画作为一个整体是《朝元图》,即朝谒道教最高主宰元始天尊。其浩大的人物行列中有帝王装束者、有文臣装束者、有皇后妃嫔装束者、有贵妇、闺秀装束者,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富于变化,连每个人物所穿的鞋、靴都无一雷同。

纯阳殿壁画完成于1358年,作者是山西元代著名画家朱好古的门人张遵礼、李弘宜、田德新、曹德敏、王士彦、王椿、张秀实、卫德8人,绝大多数是山西人。描写的是吕洞宾神游显化的故事。画工将其一生的事迹巧妙地穿插组织在一个有整体感的大构图里,每幅之间用山石、云树自然隔开,再现了当时道、释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形象生动。其中尤以独幅人物画《钟离权度化吕洞宾》水平最高。重阳殿壁画描写王重阳一生事迹,水平不及前两殿。

3. 漆画、铜器画

1966年大同市石家寨出土的北魏司马金龙墓中有五块完整的木板屏风漆画,根据西汉刘向《列女传》内容绘出,如汉成帝、汉成帝班婕妤、李充妻、卫灵公、卫灵公妻等人物及故事。18幅画皆有文字题记和榜题,以儒学士人宣扬的帝王将相、烈女孝子、高人贤士的故事,标榜鲜卑贵族“汉化”政策的成就。“其绘画风格颇近于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人物晤对通神,色彩富丽,略有渲染,线条勾勒工整,属铁线描”^①。人物设计改变了中心人物明显大于陪衬人物的传

^① 张安治主编:《中国美术全集》。

统,一方面中心人物与陪衬人物大小差距不很大,一方面减少陪衬人物,使构图简明,主题突出。

铜器画分为铜器镶嵌画和铜器锥刻画,前者主要装饰于形体较大、器壁较厚的青铜器外壁面;后者主要装饰器壁较薄的青铜器,多刻在内壁面上。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的匜即是带有锥刻画的青铜器。

(三) 雕 塑

1. 玉雕

玉雕艺术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雕塑艺术的代表。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有玉铲、玉琮、玉瑗等礼器和装饰品,尤其有一把玉梳,与大汶口和青龙泉等地出土的象牙梳极为相似,雕刻颇精。

2. 陶塑与木雕

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出土的陶俑,形体较小,身高仅5厘米,如在14号墓发现有18件陶俑,男女兼有,造型极其简单,仅有轮廓。长子战国墓中出土了木俑,高68厘米,风格造型与楚文化的木俑有显著差别,采用的是泥木结合的形式,俑的头部自耳前削成平面,然后用泥塑出面容,可惜泥塑皆已脱落,这是唯一见于北方的木俑。

3. 青铜雕

浑源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晚期的牺尊,是典型的青铜动物雕塑。通体作牛形而不十分写实,周身以模印方法施加了华美的兽面纹饰,并在牛颈和牛背上的容器口沿部分饰以一圈造型很生动的牛、虎、豹等浮雕。背上开三穴以座锅来作为温酒器,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审美观念的新变化。

4. 彩塑

山西保存下来的彩塑,自唐开始至清从未间断,是研究我国彩塑发展史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大多为佛教内容。唐代彩塑主要保存在五台县佛光寺东大殿、南禅寺大殿,晋城市青莲寺等地。这些彩塑庄

重丰满、造型生动,极富时代感。五代时的彩塑主要保存在平遥县镇国寺万佛殿内,其技法与特色,大体继承了唐代风格。宋代彩塑的代表作有:太原市晋祠圣母殿内侍女像,晋城市二仙庙,长子法兴寺、崇庆寺等寺观内的塑像。其风格和特点与唐代截然不同,它清癯俏逸,人物刻画十分细腻。

辽金时期,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大融合,山西又是各族交汇之地,故在彩塑上也表现出这一特色。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有大同市下华严寺薄迦教藏经殿、善化寺大雄宝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的佛教塑像。元代彩塑风格与辽金比较近似,其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有五台县广济寺大佛殿,晋城市玉皇庙西配殿及中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大殿及水神庙等处的佛、道教塑像,其中当数晋城市玉皇庙西配殿内二十八星宿像最为精彩。

明清两代彩塑造像,数量上可谓登峰造极,山西共有 11630 尊,精致者难以数计,如平遥县双林寺各殿的彩塑,隰县小西天大雄殿,长治市观音堂的悬塑,灵石县资寿寺大殿,蒲县东岳庙大殿及地狱塑像等较为驰名。

石雕有专章论述,此不赘。

三、音 乐

山西是中国音乐文化发源地之一,不少地方如万荣县荆村、太原市义井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乐器——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埙,特别是东下冯遗址出土的一件由细砂岩打制而成的完整的石磬,上部对钻一悬孔,敲击声音清脆,说明那里很早就出现了音乐艺术的萌芽。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于山西一带的《大章》、《大韶》、《大夏》等乐舞具有很高水平,在春秋时期十分盛行,以致孔子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并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的感叹。正因为这优秀的音乐传统

和浑厚的文化底蕴,三晋大地产生了不少音乐家,在音乐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荀子的音乐理论

先秦儒家中,荀子的乐论最为系统,是真正的集大成者。他从“人性恶”这个根本命题出发,主张用礼约束人性、用乐调理人性,以维系社会关系。

他肯定人们的正常的音乐活动,认为目好色、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人的天性,是用不着学就会的。人生有欲望,欲不可得则要追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怕乱,故制礼义以分之,以调养人之欲,满足人的追求,使物与欲相持相长,所以礼就是“养”。而音乐在“养”人之欲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先王立乐之道,是为不使邪汗之气与人相接。君臣上下在宗庙中听乐,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睦亲热;乡里老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此所谓“钟鼓管磬,琴瑟竿笙,所以养耳也”(《荀子·礼论》)。因此,听雅颂之声,志意则会开扩;执干戚而舞,习其俯仰屈伸的舞姿,容貌就变得端严。按照乐舞的行列位置,对准乐舞的节奏,人们的行列就端正了,进退就整齐了。所以乐对外可用以征伐讨逆,对内则起促进谦让团结的作用。乐是体现人类中正和平的自然关系的,是人们为了满足感情的需要必不可少的。先王的欢乐与愤怒都可以通过音乐得到表现,所以他欢乐时人民跟着高兴,愤怒时暴乱的人感到害怕。音乐对人的影响十分深刻,感化人非常迅速,所以先王很谨慎地对待它。先王重视礼乐而蔑视邪音,因为礼乐废弛、邪音兴起是国家危亡削弱、招致侮辱的重要根源。

荀子对音乐如此重视,也并非一味强调娱乐,他的前提是“重己轻物”,即要把个人修养放在首位,不要使自己为物所役,不要被感官享乐所左右。

(二) 春秋大音乐家——师旷

师旷,名旷,字子野,晋国音乐大师,今山西洪洞人,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晋国悼、平年间。他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又称瞑臣,是当时著名的大音乐家,以“师旷之聪”闻名于世。

师旷在艺术方面取得了极高造诣,不仅琴技高超,还“甚知音律”(《庄子·齐物论》)。《洪洞县志》云:“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故在先秦文献中,常以师旷代表音感特别敏锐的人。晋平公曾铸大钟,众乐工都以为音律和谐,惟师旷言不调,师旷的判断后来果然为齐国乐师师涓所证实。其深邃的艺术修养和精湛的技艺,使其成为当时各国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家。史载,他曾到过开封,在那里筑台演乐,至今遗址“吹台”尚存(乾隆《祥符县志·艺文》)。其艺术著作可考的有明朱权《神奇秘谱》所载的《阳春》、《白雪》等歌曲。此外,师旷还是一位以乐匡君的政治活动家和博通古今的学者,时称“多闻”。

(三) 南朝“二柳”

柳世隆(442—491年),字彦绪,原籍河东解州(今山西运城)人,其高祖柳卓时自本郡迁至襄阳(今湖北襄阳),历仕南朝宋、齐两代,官至尚书令,具有卓越的音乐才能,弹得一手好琴。在当时士大夫尚雅好乐的风气下,他晚年“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南史·柳元景传》)。并且能够自己作曲弹奏,他独创的“柳公双琐”指法,不但被公认为当时最高水平的演奏技巧,而且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柳恽,柳世隆之子,深受其父指点和熏陶,后又拜著名琴手嵇元荣、羊盖为师,因而其琴技精湛,天下闻名。一次竟陵王萧子良在院内摆酒设宴,将晋代宰相谢安曾用过的鸣琴摆在座侧,请柳恽弹奏,他以娴熟的技艺奏出悦耳动听的琴声,使在场的人都陶醉了,萧子良赞叹说:“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辰。岂止当世称奇,足可追踪古烈”(《梁书·柳恽传》)。又一次,柳恽赋诗未就,以笔敲琴,附近的客人过来,用筷子一起敲打,琴中发出悲哀的音乐,使柳恽

为之一惊,于是制为雅音,从此敲琴演奏便开始了。柳恽弹琴善于推陈出新,他论述琴法,“以今声转弃古法”(《南史·柳元景传》),著有《清调论》。其兄柳惔,字文通,亦通晓音律。

(四) 其他音乐家及乐书

除以上几位,山西音乐家还有:北魏的裴敬宪(闻喜人)、北周的斛斯徵(大同人);隋代的翟汲(绛县人);唐代的唐彦谦(太原人)、王维;明代的郭纪(大同人)等。

据清光绪十八年刊本《山西通志》卷一七五《经籍》载,属于山西人撰著的乐书有:晋裴秀《乐论》,隋王通《乐论》十卷,唐吕渭《广陵止息谱》一卷,明袁万里《律吕解增注》、左立德《累琬斋新宫》、郭希汤《律吕问》,清范尔梅《乐律考》等。

四、戏 曲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的戏剧艺术。世界史上有三种最古老的戏剧——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前两种早已寿终正寝,只有中国戏曲一枝独秀,至今生命之树长青。山西尤其是晋南地区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摇篮,以曲作家众多、地方戏种繁盛、戏曲文物丰富著称于世,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首创诸宫调的说唱艺人——孔三传

孔三传,生卒年不详,泽州(今山西晋城)人,主要活动在宋神宗熙宁年间至宋徽宗大观年间(1068—1110年),其生平事迹已不可考,根据极为简略的记载,可知他当时在汴京(今河南开封)瓦肆、勾栏中献艺,“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王灼:《碧鸡漫志》),主要是把唐宋以来的词调、大曲、缠达、唱赚及北方流行的民间乐曲按声律归入不同的宫调,以同一宫调的曲牌联成套曲,再把各种套曲

缀成长篇,用以演唱故事。史载,孔三传本人有《耍孩儿(耍秀才)诸宫调》,又“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梦粱录》),但其作品今已失传。

诸宫调的出现,为后世的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直到元代,虽然诸宫调式微衰落,但其曲调对北方杂剧的形成仍起重要作用,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其乐曲组织和曲白结合的形式,直接影响了戏曲的体制,孔三传也因此被公认为一位杰出的、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艺术家。

(二) 山西曲作家

曲分为南曲和北曲,我们这里指的是北曲。北曲又有散曲和杂剧之别,散曲又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历史上山西出了不少曲作家,为戏曲艺术的兴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主要曲作家有:

白朴,元杂剧四大家之一。有杂剧十六种,全存者仅《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与关汉卿《拜月亭》、王实甫《西厢记》、郑光祖《倩女离魂》合称元杂剧的四大爱情剧)、《董秀英花月东墙记》3种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的残折,均收入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一书中。白朴的剧作题材多出自历史传说,剧情多为才人韵事。他善于利用历史题材,敷演故事,因旧题,创新意,词采优美,曲语和谐动人,情意深切绵长。此外,白朴散曲由清朝杨友敬掇拾,附于《天籁集》(白朴词作集)之后,名曰“摭遗”,共收小令三十六种,套数四曲。

刘致(约1258—1334年),字时中,号逋斋,石州宁乡(今山西中阳)人,元代著名散曲家。代言体套曲《双调·新水令·代马诉冤》是其早年代表作。另有套曲《上高监司》两首,一改散曲吟风弄月、感事伤时之风,以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为特色,首开以散曲陈言风气的先河,引起很大反响,被广为传颂。

乔吉(?—1345年),一名乔吉甫,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山西太原(今太原市)人,元朝中期著名散曲家和杂剧家。其作

品之多,在元代曲作家中名列前茅,他的散曲集《乔梦符小令》和小令集《文湖州词集》共收其小令二百十首,套数十一曲。他的杂剧作品多以爱情、婚姻为题材,写过十二种,传世的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玉箫女两世姻缘》3种。

石君宝,生卒年不详,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元代早期重要剧作家,主要活动于蒙古太宗窝阔台到世祖忽必烈至元以前。他一生作剧十多种,今存者有《鲁大夫秋胡戏妻》、《李亚仙诗酒曲江池》、《诸宫调风月紫云庭》三种。其中尤以《鲁大夫秋胡戏妻》为佳。该剧集中全力塑造了梅英忠于爱情、热爱生活、坚守贞操的完美形象,揭露和鞭笞了秋胡卑劣自私的行为。无论从内容、结构上,还是从语言方面来看,均取得了很大成就。

李行道,字潜夫,生卒年不详,山西绛州(今新绛)人。元杂剧前期重要作家。留传至今的只有《灰栏记》一种。全剧通过张海棠与马员外原妻间的矛盾冲突为线索,展示了多方面的社会问题,着力刻画了张海棠不甘忍受屈辱,反抗恶势力的性格,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十九世纪初,《灰栏记》先后被译成法、英、德文,在西方世界流传,可以说,李行道也是世界知名的杂剧家。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人,生卒年不详,曾以儒生补杭州路吏,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和散曲家,与关、马、白齐名,号称元代四大杂剧家。所作杂剧十八种,完整保留至今的有《迷青琐倩女离魂》、《梅香骗翰林风月》、《醉思乡王粲登楼》、《辅成王周公摄政》、《虎牢关三战吕布》等八种。其剧目主要以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和历史故事为题材。所创作的《倩女离魂》,在元杂剧中是最富浪漫情调的一部,故事离奇,又使人觉得合情合理,是元杂剧四大爱情剧之一。除了杂剧外,还写过一些曲词,留至今日的有小令六首,套数二曲。

常伦(1492—1525年),字明卿,号楼居子,其先曲沃人,后徙居沁水,明代散曲家。他崇尚黄老,政治上很不得志,在《写情集》中抒发

了失意与狂放相糅的矛盾心态和复杂情怀。

此外,山西曲作家还有元好问、罗贯中、傅山、王沂、王介石、宋建魁、范鹤年、徐昆、傅隐、刘元一、徐见贤、范驹、汾上谁庵、五台山农等。

(三) 山西地方戏

1. 剧种

明清以来,山西地区的演戏活动一直兴盛不衰,形成了很多剧种,主要有:

(1) 四大梆子戏

南路梆子:又称蒲剧,是四大梆子戏中形成时间最早、发展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剧种。蒲州在明代是全国闻名的大商埠、大盐市,经济富裕、商业繁荣、交通发达、民风淳古,文化水平也很高,“献戏报赛,相延已久”,有深厚的民间艺术传统。金元时期这里盛行院本、杂剧,元末明初北曲遗响与土生土长的锣鼓杂戏、俚曲野调融会,便产生出富有乡土气息的蒲州梆子。蒲州梆子剧目丰富,达五百多个,它善于用特技和富有激情的大动作表现人物,唱腔高亢激越、朴实奔放,锣鼓经、牌子曲也丰富多采。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同时还向外发展,传到本省中、北部及其他省份,与当地声腔结合演变出不少剧种。

中路梆子:又称太原梆子、晋剧,是由蒲州梆子向晋中流传与当地民间曲调、地方秧歌、说唱艺术等结合而产生,大约形成于清同、光年间。晋剧唱腔丰富,包括乱弹、腔儿、曲子(昆曲、越调等)。传统剧目有四百余本,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七月、人民、吕梁三大晋剧社,为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上党梆子:上党地区也有深厚的戏曲传统,宋代就出现了首创诸宫调的孔三传,地方小戏、俗曲与晋南、晋中流入本地的梆子腔汇合,产生上党梆子。它是由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组成,梆子腔占主导

地位,是唱腔结构较为开放的戏曲剧种。上党梆子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两个流派:州府(泽州)派风格稳健、委婉、秀丽;潞府派风格豪迈、奔放、雄壮。上党梆子也流传到河北、山东,演变为当地剧种。

北路梆子:由蒲剧演变而来,形成于明清之际,兴盛于清末民初。在发展中形成三大流派:“代州道”(小北路)以忻、代二州为中心,风格精巧;“云州道”(大北路)以大同为中心,风格舒展;“蔚州道”以蔚州为中心,风格刚健。北路梆子再往北出张家口,即称口梆子,是最早的河北梆子。

(2) 道情戏

大致形成于清代,辛亥革命后盛行。分为晋北道情、临县道情、洪洞道情、永济道情四路。其剧目主要为道化升仙、修贤劝善、民间生活、历史故事四类。

(3) 秧歌戏

包括雁北秧歌、祁太秧歌(晋中秧歌)、太原秧歌、泽州秧歌、壶关秧歌等十几个地方秧歌。

(4) 碗碗腔

清末由陕西传入,分为流行于晋南和晋中的两路,其音乐幽雅清新,演唱既有“欢音”,又有“苦音”,较为丰富。

(5) 其他地方性小戏

主要有对子戏、二人台、繁峙蹦蹦、凤台小戏、蛤蟆喻、晋南眉户、拉话戏、平陆高腔、芮城拉呼戏、上党落子、上党皮簧、耍孩儿、跳戏、弦子腔、弦儿戏、阳高戏、左权小花戏、罗罗腔、孝义皮腔、河东线腔等。

(6) “化石”剧种

如锣鼓杂戏、万荣青阳腔、赛赛等。这是比较原始古朴的戏曲形式。

2. 戏曲文物

所谓戏曲文物,是指存留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有关戏曲的历史文化遗物,包括舞台建筑、绘画雕刻、碑铭题记、传抄或版印的剧本、资料,以及各种墓葬遗物等。山西的戏曲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繁富,舞台、碑记、戏雕、戏俑、模型、抄本,以至线刻、壁画,一应俱全,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

(1) 舞台

在山西,保存着元明清时期的戏台 2886 座,其中金元时期的 20 多座。现在保存完好的有临汾魏村牛王庙元至元二十年(1283 年)戏台、临汾王曲村东岳庙元初戏台、永济董村二郎庙元至治二年(1322 年)戏台、翼城武池村乔泽庙元泰定元年(1324 年)戏台、临汾东羊村东岳庙元至正五年(1345 年)戏台、翼城曹公村四圣宫元至正年间(1341—1368 年)戏台、运城三路里村三官庙元代戏台、石楼殿山寺圣母庙元代重修戏台 8 座,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元代舞台实物。另外,晋城冶底村天齐庙金代舞楼、沁水郭壁村崔府君庙宋金舞楼、阳城屯城东岳庙金代戏台、沁水龙王寺元代戏台、洪洞景村牛王庙元至正三年(1343 年)戏台等也残存戏台石柱和石础。这些舞台多采用乐楼形式,平面呈方形,三面有墙,正面为台口,无前后场之分。建筑结构为“井”字形框架,枋上施斗拱,顶部有单檐歇山顶,十字歇山顶,戏台大小不等,结构各有特色。从全国现存元代戏台实物来看,临汾魏村三王庙戏台建造时间为最早,翼城武池村乔泽庙戏台面积最大(94 平方米)。明清戏台在山西就几乎遍布于各地区,总计有 2800 多座,比较典型的如介休袄神楼内戏台、万荣后土庙品字形戏台等等。

(2) 戏雕、戏俑、线刻、壁画

目前已发现的主要有“稷山马村段氏墓群的金代戏雕(六组)、稷山苗圃金代戏雕、稷山化峪苹果园金代戏雕(二组)、侯马董明墓、金大安二年(1210 年)戏台模型及戏俑(一组 5 个)、襄汾南董金代散乐砖雕、曲沃曲村金元散乐砖雕、新绛吴岭庄卫家墓元至元十六年

(1279年)戏雕、新绛寨里村赵氏墓元至大四年(1311年)戏雕、垣曲古城金元戏雕(二组)、芮城永乐宫所藏潘德冲石椁元前期(1274年)戏曲线刻、浮山上东村宋代杂剧单人壁画、运城西里庄元代戏剧壁画、新绛吴岭庄卫家墓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戏剧壁画、洪洞明应王殿元泰定元年(1324年)戏曲壁画等。其中尤以稷山马村段氏墓群的金代戏雕和洪洞明应王殿元代戏曲壁画最为著名。

稷山马村段氏墓群发现宋金墓葬15座,已发掘9座,其中6座保存有大量戏雕,所刻除角色外,还有演出场面,人物或坐或立,举手投足,彼此呼应,相互交流,富有动感,反映出当时戏曲演出技艺的成熟。洪洞县明应王殿戏剧壁画,画幅面积达12平方米,题为“尧都见爱 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 泰定元年四月日”,画面彩绘了当时戏曲演出前各种演员、乐队、后台工作人员“亮台”的形象,所用布景(帐额)、道具、服饰、化妆等,对我们研究元代戏曲演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 珍贵抄本的发现

早在五十年代,在山西万荣即发现了明清时期的青阳腔剧本。近几年,又相继发现了明万历二年(1574年)抄写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又名《周乐星图本正传四十曲宫调》)和清宣统元年(1909年)抄写的《扇鼓神谱》。前者记载了明中叶山西农村迎神赛社时上演的各种歌、舞、曲、剧名目二百四十五种;后者记录了古代雩祭活动内容、形式、礼仪规范等。这些为研究中国戏曲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九章 盐池文化

我国天然盐湖不止一处，形成时间大体相当，然而这些盐湖大都偏居于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的青海、宁夏、甘肃、内蒙、新疆等地，在古代中国很难利用，独有河东盐池地处华夏民族发源的中心地带，便于利用。所以运城盐池在华夏文明史上有它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它对炎黄子孙的繁衍和强盛是有巨大贡献的。一位叫宫崎市定的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最古的文明，实兴起于河东盐池附近，我想夏、商、周三代的国都大体上都位于消费池盐的地区，毫无疑问，盐池就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春秋战国直到唐宋这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运城池盐始终供应京师重地的消费，多次得到“贡盐”、“御盐”之封。

中国封建政权定都北京之前，历代盐法盐制几乎都出自河东解州盐池，后来，盐池依然是全国的几大盐区之一，为封建经济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它又作为中国最大的无机盐化工基地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运城盐池在兴建盐务专城、盐务专学、盐池禁垣以及管理制度等等方面，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第一节 运城盐池与河东文化

一、关于盐池的传说和神话

运城盐池的历史非常久远,古老的地方必然会有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盐池神话传说大体都是关于盐池形成方面的。

首先是神牛造盐池的传说。古时候,盐是一种珍稀物品,据说人间少有,天宫也不多。天宫有头渴望多吃些盐的神牛,一次竟偷食了天宫也不富裕的食盐,惹恼了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玉皇法纪严明,就把神牛打入人间。性喜食盐的神牛来到人间后,执意要在人间营造一个盐池,于是它去了塞外草原,去了江南水乡,最后来到古老的中条山,卧在山脚底下,身躯化作一汪盐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神牛造盐池的说法在盐池周围的广大地区流传很广。这则美丽的神话歌颂了神牛的勇敢无畏和牺牲精神,也是人们按照希望和理想所塑造的动听故事。

关于麒麟造盐池的神话。相传古时有只麒麟曾出现在古龙门(今山西河津)附近。当地人不识麒麟,视为怪物,聚众驱赶它,麒麟无奈,撒了几滴尿便离开了龙门,这几滴尿后来变成了盐碱滩地。这头麒麟又来到沉寂的中条山下,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于是就有了盐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麒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不管这关于麒麟造盐池的传说多么离奇,我们对古人神赐宝池的传说依然是有兴趣的。

关于蚩尤造盐池的神话就更加有趣了,这要从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说起。黄帝是父系社会时诸夏部落群所结成的部落联盟首领,传说他属有熊氏部族。这个氏族最初兴起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岐水流域,经过长期发展,逐步东迁到河南新郑一带,组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当

时东方夷族部落群的发展也很快,活动在大野泽(鲁西的沼泽地带)周围的蚩尤氏,成为这一部落联盟的首领。在各自都欲向外扩张的情况下,东西双方冲突加剧了,夷、夏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最后在河济之间浊水充斥散漫的涿鹿原野一决胜负。传说蚩尤相貌奇特,“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剑戟,头有角”,“八肱八趾”,有兄弟81人,以金作兵器,能呼风唤雨。蚩尤挑起了战端,黄帝应战出征,“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泰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元女也,子欲何为?’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矣焉。”^① 黄帝得了元女神授兵法,在涿鹿将蚩尤彻底打败,蚩尤被大卸身首,卧血中冀。黄帝成了古老英雄时代的第一个英雄人物,被崇奉为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与蚩尤的这一次大战通常称涿鹿之战,具体地址在阪泉。对于阪泉的位置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在今河北涿鹿东南。《晋太康地志》载:“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一说在今山西运城盐池附近。光绪《山西通志》言:“蚩尤城今名从善村,本即古解城也,地之所以名解,以蚩尤体解得名,见《路史》。《黄帝经序》云:‘尤之血化为卤’,……《皇览》亦言帝杀蚩尤,身体异处,故别葬之。”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辨证一》中是这样讲的:“解州盐泽方一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之血。”据说,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所以“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述异记》卷上)。今盐池南有蚩尤城,相传是蚩尤的葬地。蚩尤城又称池牛村,后改名从善村,村东南的中条山脚下还有蚩尤冢,这些都可以作为有力的佐证。远古时期,盐为战争之因屡见不鲜,如果从食盐对人体的巨大贡献考虑的话,黄帝与蚩尤争夺盐池的可能性或许要大一些,阪泉

^① 《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

在盐池附近之说很有些道理。这是盐池神授之第三种说法。

古老的神话传说赋予运城盐池瑰丽迷人甚至于惊心动魄的文化色彩,然而神话毕竟是神话,我们还是要从科学的角度来探索运城盐池的由来。

二、盐池的地质构造与历史

运城盐池是我国最古老的盐湖之一,约有 4000 余年的历史。早在几千万年前,受地质构造运动的推动,即喜马拉雅山构造运动的作用,在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发生了大面积的地层陆相沉积,这次地壳变化,波及至峨眉山岭,并延伸到陕西的一部分地方,并由此形成了中条山北面一个有大量盐类物质沉淀的天然盐湖,构成盐池原始湖泊的雏形。到新生代第四期,地壳再次大变化,中条山发生垂直升降运动,中条山北麓断裂,形成狭长的陷落地带,从此便形成了盐池。盐池位于这一带的最低处,每遇山洪暴发,湖里便积满了水,水里含有大量的盐类物质,这些盐类与早期的淤积层结合后,经长期蒸发沉淀,结成很厚的盐板,生成盐。

史书记载,“盐池亦曰盐泽,在安邑、解州间,河东道所治运城之南,东西五十五里,南北七里”(《山西通志·盐法略》)。准确说来,运城盐池的地理位置在东经 $110^{\circ}50'00''$ — $110^{\circ}07'00''$ 、北纬 $34^{\circ}54'00''$ — $34^{\circ}04'00''$ 之间,用今天的地名作参照来说,盐池北傍运城,南靠中条山,东临夏县,西依解州。全池东西长 30 公里,南北宽 2.5 到 5 公里不等,面积 120 多平方公里。位于山西省南部晋南盆地最低处,池中海拔 320 米。属于季风气候带,冬季多西北风,夏季多东南风,存贮在盐畦内达到饱和的卤水,在冬季刮上一夜西北风,池卤遇冷结晶,第二日盐花就会布满池中,到了夏季东南风吹来,烈日蒸晒,卤水自然成盐。是国内外罕有的产盐宝池。《水经注》中有这样一段话:“今池

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惟山水暴至,雨澍潢潦奔洪,则盐池且耗。帮公私共竭水,防其淫滥,谓之盐水,亦谓之为竭水。《山海经》谓之‘盐贩之泽’也。”这盐泽到底包括哪些部分,还需要作一点解释。运城盐池由几个大小不等的盐池组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东池在安邑境,面积最大,亦称大盐池,是古代河东盐池的主体,也是我们今天一般意义上的运城盐池。对于东池的面积,历代都有记录,大致是周围60公里左右,东池是主要的产盐区,因此上筑有禁垣、马道、隍堑,以资保障。西池在解州境内。《水经注》称:“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元和郡县图志》言:“女盐池,在县西北三里,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盐味少苦,不及县东大池盐。”西池是盐滩洼池,产盐不及大池,盐质也难与东池盐相比,所以历史上的西池开停不定,大多是在东池遇灾无法满足需求时开晒,晚清年间,西池就变成了一个蓄水的荒滩。另外还有盛产私盐的六小池,唐开元以后,隶属女盐池,产盐不及西池,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为私人开晒。

运城盐池古称河东盐池,是因为战国、秦、汉时河东指今天的山西南部,唐以后泛指山西全省之故。称其为解州盐池,是由于盐池全部在解州管辖范围内。所以盐池所产之盐有解盐、河东盐之称。

三、盐池与尧、舜、禹建都

盐池对炎黄子孙的文明有巨大的贡献。史书记载,帝王建都始于尧,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禹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尧、舜、禹三代都将都城建于古代河东一隅,即黄帝部族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这主要为盐池的缘故。从盐业史研究成果看,盐的发现发明时期已很难考证,但是关于人类最早的制盐方法却

认识一致,那就是天日晒蒸所得之粗盐。这种盐的来源有二:一是海水被日光蒸晒成盐,一是池卤被日光蒸晒所成之盐。运城盐池当属于后面一种。而且古代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是以盐作为交易通货的,它是一种充当货币、祭祀又有食用价值的物质。所以国都建在一个产盐地区是很有说服力的。

《帝王世纪》载:“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括地志》说尧都“在翼城县西二十里”。《后汉书·郡国志》载:河东郡第三县为平阳,尧都于此。《晋地理志》说:“平阳郡第一县为平阳,《注》云旧尧都。”再则虞舜都于蒲坂,《方輿纪要》载:“蒲州古蒲坂,舜都也。”《寰宇记·郡国志》云:“州南二里有蒲坂城,舜所都也。”《宋山川记》说:“蒲坂城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史记·五帝本纪》也讲,“舜居妫汭,内行弥谨”,《辞海》解释妫汭“在今山西永济南,源出历山,西流入河。……《水经注》:‘历山,洧(即妫)汭二水出焉。南曰洧水,北曰汭水。’按此水同归异源,实为一水,不可强分。”并释“虞”为“传说中远古部落名,即有虞氏。居于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舜乃其领袖”。《尚书·尧典》也有尧将二女子虞舜的记载,“禧隆二女于妫汭”。今日的历山,还有舜王坪,司马迁也讲:“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鱼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东汉文学家蔡邕在他的《琴操·思亲操》中写道:“舜耕历山,思慕父母,见鸱与母俱飞相哺食,益以感思,因而作歌。”舜帝带着尧帝赐予的琴作歌,所以才会有舜抚琴而作“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的《南风歌》。关于禹都安邑的记载就更多了。《帝王世纪》说:“禹或居安邑。”《汉书·地理志》载:“禹自平阳迁安邑。”从平阳迁安邑或从蒲坂迁安邑,总之是离盐池更近了一些。《水经注》载:“安邑,禹都也,故晋邑。秦置河东郡,王莽更名洮阳县,曰河东也。”《通典》:“夏县汉安邑县地。盖以夏禹所都为名。夏都安邑城,在今县北十五里。”《夏本纪》说:“帝相出居商丘,

少康复归安邑。”一个“复”字，尽可道出至少禹曾定都安邑的史实。安邑旧有的禹王城，为大中小三座城址。《后汉书·郡国志》有这样一段话：“沃土之民不才，汉兴少有名，大衣冠三世皆衰绝也。”虽说并不客观全面，却也说出河东是尧、舜、禹三代兴盛之地的事实。现已出土春秋战国时的大量文物以及石刻等各种记载，对三代建都河东一隅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佐证，在此不一一列举。

虽然对尧、舜、禹建都晋南一带说法不一，但三个帝王都有建都河东之说，这就不是无稽之说了。那时说是帝王之都，实在不过是部落聚集的中心罢了。河东作为三代帝王的活动中心，其意义非同一般。

第二节 昔日辉煌的河东盐池

一、猗顿与盐池

说到早期的运城盐池，无疑会提到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气的人物，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鼎鼎有名的越国大夫范蠡。当年越被吴打败后，退保会稽（今浙江绍兴），范蠡为亡国之君越王勾践献策，将越国美女西施献给吴王，求得吴王夫差免其一死，范蠡也入吴为质。范蠡归国后，与大夫文种共商大计，埋头备战。勾践卧薪尝胆整整十年后，灭掉吴国，一雪耻辱。灭吴以后，相传范蠡携带西施泛舟五湖之上，不知所终。不过不少史书都说范蠡此后改名易姓，开始经商，号称鸱夷子皮，游到齐国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地，治产积居，富至万万，成为春秋战国时最大的富翁，人称陶朱公。朱公既富且乐于施舍，“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陶）朱公富，往而问述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牝。’于是（顿）乃适西河（今晋

南),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货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这是《史记·集解》引《孔丛子》的话。而在《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猗顿最具实质性的只有一句话,即“猗顿用鹽盐起。”也就是说司马迁是倾向于猗顿从盐池起家,而后才“货拟王公,驰名天下,与王者埒富”。关于这位赫赫有名的战国大商人的致富过程尽管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以鹽盐起,一说是以畜牧起,然而对他积累财富时曾问经于范蠡、对他致富的地点在猗氏(今山西运城属地)是毫无疑问的。猗顿是中国史书记载最早的与盐池有关的人物,而且他的富有与盐池的关系最为直接,即便他是牧六畜而至富有,那也因为他发财的地方在一个有盐池的猗氏而不是别的任何地方。猗顿把富有与盐池早早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在追溯盐池历史时,无疑要提到猗顿和他的师傅范蠡这两位春秋战国时的著名人物。猗顿无疑是山西最早的商人,他经营盐业致富之后,又成为非常有名的古代珠宝商。古书《淮南子·汜论训》载:“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这就是说,这位起家盐池的富商还以识别珠宝玉石而著称于世。有人称猗顿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他能聚财也能散财,因此得到后世人的赞颂。当地传说猗顿有三子,长子王寮,次子王景,季子王鑑,现在临猗县城南还有以这三个名字而命名的村子,特别是在王寮村还有猗顿墓,人们以此来纪念这位与盐池有特殊关系的人物。

二、专卖制度下的运城盐池

我国盐法,始于战国齐之管子,数千年来,变革多次,或倡无税,或主征税,或行专卖,而运城盐池自古以来,就为国家直接占有,由政府出面集工捞采,官方只付给捞盐人少量的报酬,生产运销全由国家经营。秦汉以前大体不征盐税,但有盐贡,这种盐贡本身就含有税赋

的意义。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任管仲为相,管仲把盐政管理视为强国富民之首策,“禁北海之众,无聚庸煮盐,于是盐为官业”。管子认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升加一疆,釜百也”(《汉书·食货志》);秦始皇统一之后,盐铁之利 20 倍于古。盐铁专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对盐铁这两类与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行业的特殊政策。这种专卖制是从加强中央对全国的经济控制来考虑的。汉初,弛山海之禁,国无赋而用饶。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于是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往往占有矿山和海滩,或采矿冶铁,或煮海制盐,“专山泽之饶”,操纵冶铁煮盐大权。这不仅影响中央财政的收入,而且也助长了分裂割据势力。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政府,由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产铁之地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官或铁官,管理盐铁事务。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煮盐,“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22 年)定盐法,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立盐法,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是为官卖之始。西汉武帝称河东为股肱之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 110 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斡天下盐铁。全国置盐官的地方有 28 郡,河东、太原居其二,各郡国盐官河东居其首。汉武帝死后第六年,在许多人参与的一次有关专卖的辩论之后,国家取消了酒的专卖,盐铁专卖则一直沿续了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有几次小的变动,但总的趋势还是国家控制盐池。

唐开元六年(718 年)姜师度任河中尹,“安邑盐池(即解池)渐涸,师度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旧唐书·良吏传下》)。唐时用士兵开垦盐池,说明盐池为官所有。唐肃宗乾元

元年(758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实施盐专卖制度,采取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政策。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将全国盐区置东西两道盐铁使,刘晏充东部淮南、浙江东西、湖南、山南东道盐铁使,第五琦充京畿、关内、河东、山南西道盐铁使。设安邑、解县两池榷运使。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周世宗对侍臣说:“朕览食末盐州郡,犯私盐多于颗盐界分,况末盐煎炼搬费用,倍于颗盐,今宜分割曹、宋十余州,令食解州颗盐。”(光绪《山西通志·盐法略下》)皇帝亲自过问盐池事宜,令食用海盐的曹、宋十余州县食解州颗盐,可见盐池在当时的地位。宋代盐户和盐丁领取工本,替官制盐,按丁交官,解池及其周围盐畦的所有权也归国家,由朝廷在当地设置专院或专司,有时也命地方漕臣和知州代朝廷兼管。盐业资源时为三种所有制形式——国家官有制、盐民私有制和官民共同所有制的情况下,解州东西两盐池则归朝廷所有。在盐池实行劳役制,畦户畦夫在官府的管理下,按规定的盐额进行生产。解州畦户畦夫的制盐定额,通常是按年计算的。比如宋初解州安邑池畦户的种盐岁额,是每户1000席,即116500斤。一户畦户政府每年给钱4万,即40贯,每日每名畦夫给米2升。即便是在某些地方军阀混战的短时期内,盐池还是属于国家,如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年),河中王重荣与田令孜争夺盐池,重荣召晋兵进犯京师,僖宗逃往凤翔,地方军阀只是暂时控制了解池。盐铁专卖对运城盐池的产运销是十分有利的,统治者常常对盐池官盐给予特别的关照。比如在宋崇宁时,盐池产盐味苦,河北、京东等地的海盐乘势侵入河东盐的运销区域,“以盐各利一方,故解盐止行本路。东南鬻海利博,行于数路。既复行解盐,商旅苦于折阅,即改如旧”(《宋史·食货》)。海盐倾销池盐领地后,官方出面进行干涉,以保证池盐的生产运销。宋代盐商凭钞运销食盐制度也是从解州开始实行的。庆历八年(1048年),主管解池盐务的范祥因宋初折中法遭破坏而变通办法,改行盐钞,即政府发给商人领盐运销的凭证,令商人

付现,按钱领钞。发钞多少,视盐场产量而定,钞中载明盐量及价格,商人持钞至产地交验,领盐运销。此法推行60余年,又为引法所取代,政府向盐商发引收钱或粮,实际上是变相的专卖制。

三、名人说盐池

相传在很久以前,中原有位尊者来到了盐池,望着能够生财养民的百里盐滩,他的感想很多,一时兴起,抚琴瑟而放歌喉:“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这首歌的作者就是有三代帝王之称的虞舜,这样就产生了第一首有文字记载的盐池诗赋。以后历代文人雅士都为盐池挥墨献宝。

不少史家考证,东晋著名文学家郭璞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河道水系著作《水经》的作者。西晋末南渡,依司马睿任著作佐郎,迁尚书郎。郭璞博学多才,好古文奇字,后以卜筮谏阻王敦谋反被杀。这位在盐池文化熏陶下生长的人为我们留下了记载盐池的文字。他的《盐池赋》里有这样一段话:“水润下以作咸,莫斯盐之最灵,傍峻岳以发源,……兹池之所产,带神邑之名岳,吸灵润于河汾,总膏液乎浍涿。”既有对河东盐池成盐的叙述,又不乏对盐池的赞美。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为运城盐池留有一篇辞藻华丽优美的赋体文。柳宗元说起与自己有着地缘关系的盐池很有感情,他在《晋问》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猗氏之盐,晋宝之大者也。人之赖之与谷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则见沟塍畦畹之交错轮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涣兮鳞鳞,邇弥纷属,不知其垠,俄然决源醞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曲延布,……偃然成渊,潏然成川,观之者徒见浩浩之水,而莫知其及。神液阴漉,甘卤密起,孕灵富媪,不爱其美,无声无形,嫖结迅诡,回眸一瞬,积雪百里,鼎鼎霏霏,奋僂离析,锻圭椎璧,眩转的砾,乍似陨星及地,明灭相射,冰裂雹碎,巖崿增益,大者

印累，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萤骇电走，亘步盈车，方尺数斗，于是哀敛合集，举而堆之，皓皓乎县圃之巍巍，皦乎滢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骇化变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后驴羸牛马之运，西出秦陇，南过樊邓，北极燕代，东逾周宋，家获作咸之利，人被六气之用，和钧兵食，以征以贡，其赉天下也。与海分功，可谓有济矣，若是何如？”（《山西名贤辑要》卷七）

金末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写了一首《虞坂行》：“虞坂盘盘上青石，石上车踪深一尺。当时骐驎知奈何，千古英雄泪横臆。龙盘污泥易所叹，麟出非时圣为泣。元龟竞坠余且纲，老凤常饥竹花食。天生神物似有意，验以乖逢何足惜。孙阳骐驎不并有，世万亿中时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辕下一鸣人已识。我行坂路多阅马，敢谓群空如冀北。孙阳已矣谁汝知？努力盐车莫称屈。”这位文学大家将盐池的许多神话传说融入自己的诗歌，借以抒发对盐池的热爱和赞美之情感。他在诗中提到了麒麟、元龟、老凤等灵物，提到了古代以善相马而著称的孙阳伯乐，并以盐池为天生神物讴歌大自然对河东的慷慨厚赐。

关于伯乐还有一段传说故事。古时盐池的盐运至河南省时，要经安邑、夏县，再入平陆，到茅津古渡，然后装船运到河南。平陆县古城东北50里处有一个叫虞坂（今山西平陆青石槽）的地方，据说是昔日孙阳伯乐从盐车下来识千里马的地方，伯乐相马乃古今传诵之美谈，元好问将伯乐识马的地方用诗句确定在盐池，赋予了盐池一笔文化财富。

还有一位名叫刘敏宽的明代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也留下了一篇《盐池赋》。他写道：“惟兹盐池，不疏不辟，肇判鸿蒙，参井之分，阴阳之宫，股肱之域，郇瑕之封，唐都之南，虞畿之东，稷山之址，禹甸之中。局圜麓而偃仰，伏河曲而灵通，纵迹横遥，幅员百里，垣缭雉列，斥埃峦峙，若孟若盆，如砥如矢，蓄幽壤之重泉，涵天潢之注水。元玉簇而根盘，坚冰萃而床起。中条崒嶭抱其前，孤山巉峩踞其后，太行巍岵

绵其左，雷首岫鐔箕其右。外则渠堰绣错澎湃而滌洄，内则崖壑星罗纷沓而輻辳……”优美的文字，流畅的笔调，赋予盐池以独特的神韵和魅力。

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作咸篇》记载：“山西解池，供晋豫诸郡县。……其城外有深堞，周遭禁御。池水深聚处其色缘沉，土人种盐者，池旁耕池为畦陇，引清水入所耕畦中，忌浊水参入，即于淀盐脉。凡引水种盐，春间即为之，久则水成赤色，待夏秋之交，南风大起，则一宵结成，名曰颗盐，即古志所谓大盐也。以海水煎者细碎，而此成粒颗，故得大名。此盐凝结之后，扫起即成食味。种盐之人，积扫一石交官，得钱数十文而已。”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大学者顾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谈盐池。这位晚年卜居华阴、最后卒于曲沃（今山西曲沃县）的开清代朴学先风的名人不愧为精通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以及历史百家的大家，在他看来治盐就得先治水，“解盐藉主水以生，缘客水而败。主水乃池泉之蓄，斥卤之膏液。客水乃山潦之涨泛，渠渎之浸冲。只知是盐成于风日，不假煎沥，不知堤防稍亏，溃决已甚，素者污，醇者漓，凝者纾矣。故治水即所以治盐。然客水有远近，设防有疏密，贻患有大小，而施功有缓急。大抵池形若腰盆，东西长而南北短。南枕条山，雨水易迫，然非泉渊所出，且横亘有护宝堤，为仞高厚，倚山有桑园、龙王、赵家湾、大小李、西姚诸堰，纵有飞瀑，亦各容阻，甚至毁墙而已，多不能入。北缘旷壤平丘，与水隔绝。二隅无为虑。”

顾炎武通过对盐池实地考察，谈了自己对盐池主客水的认识，提出了很有操作性的治水方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有关盐池的诗歌词赋很多，大多收录在《河东盐法备览·艺文志》中。

四、天日晒盐和垦畦浇晒法

远在尧舜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发了运城盐池,并且把盐池视作生活必需品和财赋的重要来源。最初人们把盐湖里天然结晶的盐取出食用,以后逐步进入了有组织的生产,对湖内自然生成的盐组织人力捞采,春秋战国时代,运城盐池的生产基本上是“天然结晶,集工捞采”,盐池生产方式从自然结晶到垦畦浇晒法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运城盐池的早期生产是比较原始的。天日晒盐对自然条件的要求很高,多雨地带不适宜,渗水地貌不适宜,必须温度湿度都达到要求,且有适当风力推动,方能“堆集工捞采,收取自然之利”。盐池的南面,夏秋间多起大风,凭藉日晒风吹,池中卤水经自然蒸发后达到饱和程度而结晶成盐,然后由官方出面组织人力捞采。一次采集之后,池水还会再次结晶,于是再次采集,再次结晶,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山洪暴发之际,为防止洪水没入盐池,官督农夫筑堰堵截,以保持盐卤的浓度和纯度。

顾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说过“周官有苦盐,不炼而成”的话,苦盐就是运城池盐,不炼就是不经过煎煮之意。虽然中国早有海盐,也就是司马迁说的山东食海盐,山西食池盐,但海盐是要经过煮炼方才成盐,与无须煎煮的池盐相比自然费工费力。而运城盐池的这种因地利、乘天时、不假人力的天日晒晒法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盐业生产方式。以注《水经》流芳百世的著名地理学家酈道元在他的《水经注》里这样讲:“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山西通志·盐法略》也有记载:“河东大盐池,名分为两,实即一池。凡池皆水,而此池之水,其味咸,鳞介不育,其性温,隆冬不冰,或曰此海眼也。葱岭之东

有海焉，曰盐泽，河流所注，不溢不涸。此池亦名盐泽，是穹于山川，生此奥区，以粒我蒸民。”这就是说，古时盐池完全依靠自然结晶，集工捞采，因为盐池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同时也有便于成盐的优越气候条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运城盐池的生产逐渐加入了人力。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千百年的实践，盐池生产方式在唐代有了重大突破，这就是垦畦浇晒的出现。垦畦浇晒制盐，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同时加助人力的比较科学的生产方法。盐池出盐，先种沃水于池，种盐于畦，日以暄之，雨以润之，风以结之，而盐遂成。南有风洞，风自洞出，为南风。夏月治畦得南风，而举体皆清，工人种畦得南风，而所收倍入。

垦畦浇晒的工序是很严格的，到了宋代，垦畦浇晒法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这种大范围种盐是宋代开始的。具体说来，“每岁二月一日畦工入畦，盖庵、治畦、淘沟，俟薰风一至，引水浇晒。浇者，灌之以水，晒则曝之以日也，先用桔槔挹水注于畦之首段，时以铁杙搅之，日曝味作，挹注次段，首段另注新水。次段水咸，色赤，挹移三段。俟其澄清，开门腾隅，以灌四段。段段开灌，悉依前法。要俾清流盈科而进，极乎产盐之畦而止，水深不过一二寸。以时，水面上盐花浮上，若凝脂胶雪，乃用木杙遍搨，谓之搨花。花落水底，一俟风力震荡，逼以烈日，映水视之，如编贝然，则盐成矣。”（《河东盐法备览·坐商门》）从时间上讲，“岁以仲春之朔开畦工。三月，治须毕。四月南风发，沃种，至八月乃罢。是时仍攬池盐，以充课引。盖畦盐者，人成之人收之者也；池盐者，天成之人收之者也。足国者，每两取而不偏弃。”（《盐城汇纂》卷五）垦畦浇晒法的出现是人对自然一定程度上的征服，标志着运城盐池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时期。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盐池产量。

五、古代盐池的历史地位

运城盐池所产之盐古名为“鹽”，字亦作“苦”，有出盐直用而不必煮煎之意。《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载：“鹽出于盐池，今之颗盐是也。”又说：“鹽虽是盐，惟此池之盐独名为鹽，余盐不名鹽也。”《周礼》载：周成王初年，“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王之膳羞，共其饴盐；后及世子，亦如之。凡其事，煮鹽以待戒令。”这里说到了几种盐，苦盐产于运城盐池，散盐产于齐鲁海滨，形盐和饴盐产自西北地区。自夏禹起中国始有盐贡，迄于商周，盐贡没有中断。自古以来，许多民族都认为盐不仅是调味佐食之品，而且也有造福辟邪之功效。运城盐池在周代属于晋国，临近周王室所在地，运城盐池的苦盐进入周王室之后，被视作珍品，周穆王曾到安邑视察盐池，那时的祭祀活动相当隆重，运城苦盐作为祭祀用品，可见苦盐当时在众多盐中的特别地位和运城盐池的重要性。有记载说：“昔宿沙氏煮海为盐，故海盐即以宿沙氏为神。河东，鹽盐池也，初称神曰鹽宗。”（《河东盐法备览·盐池门》）春秋战国时，晋国据有盐池，在诸侯称霸过程中，占据了很有利的地位。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盐池归属魏国。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年），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史记·秦本纪》），盐池归秦。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盐池是主要的产盐区，盐池的收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秦统一后，盐铁之利20倍于古，运城盐的销路扩大了许多。西汉武帝时，用桑弘羊等建议实行盐业专卖，河东居其首，武帝视河东为股肱之地。《后汉书·郡国志》将河东郡位列仅次于河南、河内二郡的显要位置，因为河东郡有铁有盐池，引杨佺期《洛阳记》里的话：“河东盐池长七十里，广七里，水气紫色有别，御盐。四面刻如印齿文章，字妙不可述。”其中特别提到盐池之盐为御盐。东汉献帝时，孝廉刘陶上奏：“窃以比年以来良苗

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岂谓钱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后汉书·食货志》）这里说的鹽泛指食盐，可见当时人是非常熟悉鹽的。

盐池历来为官府所有，盐池所入悉供官用。隋末年间，李渊父子起兵太原，在暂时失利高祖欲弃河东谨守关西的情况下，“太宗上表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高祖于是悉发关中兵，以益之。”（《旧唐书·太宗本纪》）唐太宗李世民这里说河东殷实一语，自然是指河东有赖于盐池而富之故。唐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莅盐池，河东盐池的地位益形显赫。《新唐书·食货四》载：“唐有盐池十八，而蒲州安邑、解县有五，总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唐肃宗乾元初年，盐铁使刘晏改革盐法税收制，此时全国盐税每年仅四十万缗，仅仅过了20余年，到代宗大历末年，国家就因刘晏榷盐法的实施而岁得盐利达600余万缗，当时国家赋税盐利居半，河东盐池所得为150万缗，相当于全国盐税的四分之一，地位不可谓不重。所以国家制定盐法时，将江淮之盐全部归属盐铁使，河东盐池却仍隶度支司，专供国用军需。代宗大历年间，又赐名宝应池，显示了盐池的重要地位。河东盐的价格通常也较它盐为贵，德宗贞元四年（788年）间，江淮盐为每斗310钱后又加增60钱时，两池盐每斗为钱370。顺宗时，减江淮盐价每斗为250钱时，两池盐价每斗300钱。可以看出，运城盐池在唐宋时期对国家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盐政沿革看，“自唐开元迄五代末二百五十余年间，盐法数变，遂为专卖制度，越及宋初因而不改，然则宋之盐法源于五代，五代盐法，肇始两池，推行于滨棣诸州，两池区域殆亦盐法之先导欤。”（《中国盐政沿革史》）《宋史·食货志》载：“盐之类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颗盐，周官所谓鹽盐也；鬻海鬻井鬻鱣而成者曰末盐，周官所谓散盐也。……安邑池每岁岁种盐千席，解池减二十席，以给本州及三京。京东

之济兖曹濮单郢州、广济军，京西之滑郑陈颖汝许孟州，陕西之河中府、陕虢州、庆成军，河东之晋绛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怀州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南者，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识，候望以晓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则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阳军，陕西则京兆凤翔府、同华耀乾商泾源邠宁仪渭鄜坊丹延环庆秦陇凤阶成州，保安镇戎军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颗、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至道二年(996年)两池得盐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盐池在宋太宗至道初年的产盐量折算合43517992斤。产量之大、销区之广决定了运城盐池在宋代的地位实在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宋末年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修复盐池，“开二千四百余畦，百官皆贺”，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两池漫生盐，募人倍力采取，且议加赏。继生红盐，百官皆贺。”宋代鼎鼎有名的包拯任陕西转运使时，曾兼理河东盐务。“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宋史·包拯传》)。元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在晋、陕、豫中原一带，盐池所产之盐要供应京师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运城盐池的地位也就显耀一些。到元明清三代，随着中央政权中心的转移，运城盐池历代为御盐供应京师的历史结束了，盐池的地位因政治的因素而有所下降。

第三节 封建社会后期的盐池

一、从盐氏到盐务专城运城的设立

古代中国以盐字命名的州县不少，这些地方也大都出产食盐，如西魏置盐亭县(四川东部)，东晋有盐城(在今江苏东部)，隋置盐山县(今河北东南部)，唐置盐州(治所在今陕西定边)，明有盐边县(清代

改盐边厅,今四川盐边县)、盐井卫(清改盐源县,在四川境)等,但解州盐池所在地早在秦时就有盐氏之称。而且,运城是我国唯一的因盐务需要建立的一座专门城池,它是元代经营盐池的一大建树。

运城古称“盐氏城”,《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四年(前303年),取蒲坂,蒲坂在《括地志》中被认为是尧舜故都,昭襄王取蒲坂后的当年,彗星见,第二年,魏王到应亭朝见昭襄王,秦将蒲坂复归魏国。这里讲的是秦昭襄王恐上天降罪于己,将蒲坂夺而复予的故事。那是群雄并立争霸激烈的岁月,十一年(前296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中山此时属赵,故云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史记》正义解:盐氏地因盐之故而有城,又名司盐城,在蒲州、安邑县,是根据掌盐之官被称作盐氏地的。关于“司盐城”一名,实际上缘于汉初,武帝时全国28郡设盐官,驻盐池的河东盐官为河东均输长,居全国盐官之首,所以运城在汉时名为司盐城,以后还称监盐城。“监”与“司”两字在此的意义是一样的,都以管理监督盐池产运销的官员职能而命名。不过,这时的城实际上没有任何城池建筑,府州县衙都不在此,仅是朝廷盐官的管辖区域而已。唐宋时期,虽然运城盐池极受重视,却没有在这里建造城池。历代虽有榷估之政,有行榷之吏,却没有专门的司盐公署。

“元太宗时(为南宋理宗当政,大约在1229—1241年间),姚行简绘图献议,始立司于池北之路村。延祐间(1315—1319年),仁宗以淫雨败池,减免引钞十之六七,民怀帝德,更名路村为圣惠镇,时犹未有城也。”及至“元末,运使那海德俊再迁圣惠镇,筑凤凰城以资保障,而运治始立,名曰运城。城周九里一十三步,广袤各四之一,高二十四尺。旧制为门者五,与今稍异”(《河东盐法备览·运治门》)。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设立运城前,盐池所在地叫路村,亦即潞村,后来又名圣惠镇。按《辞海》释解,潞氏单称潞或路,古族名,春秋时赤狄的一支,分布在今山西潞城县东北,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并入晋

国。而运城建城以前称潞村,与这支赤狄的活动也许有关。不过之所以将这座新建的盐城称为运城,是因为盐池之盐运销邻省四面八方之故。运城建成后,起初也只是盐务官署,地方行政机关并不在此设衙,这座盐池上的城址“东至安邑县十五里,西至解州四十里,南至平陆县五十里,北至猗氏县六十里,东南至夏县五十里,西南至芮城县一百里,西北至临晋县一百里,东北至闻喜县一百里,又东北至太原府九百二十里,至京师一千九百四十五里”(《河东盐法备览·运治门》)。其后,明清两代又多次增修,使运城城池更加完备、巩固,逐渐发展为河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民国4年(1916年)安邑县衙移至运城,运城开始成为一级政府所在地。

河东出现一座业盐专城是盐池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它符合当时盐池产运销诸多事务的需要,而且也是因为盐池独有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河东盐法备览·运治门》是这样讲的:“天下盐治不一,举无专城,河东何以独有专城?盖煮海者商灶延绵沙际,千里相望,如淮、浙、长芦皆非一州一邑之地。故但居要临之,而所附皆通大邑,已有提纲挈领之势。若河东产盐于池,向立盐司于解州。秦、晋、豫三省商民群萃一城,每患地小不足以容,城之特建,势使然也。”

二、元明清的盐池管理体系

蒙古贵族尚未占有运城盐池时,元太宗就“立平阳府征收课税所,从实办课,每盐四十斤,得银一两。”平阳府即今日之临汾,距运城不远。待到元政权完全控制盐池,便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初立陕西转运司,仍置解盐司于路村(今运城的前身)。……二十三年,改立陕西都转运兼办盐酒醋竹等课。……(延祐)六年,改陕西运司为河东解盐等处都转运盐使司,直隶中书省”(《元史·食货志》)。元代盐池盐务机构的庞大和功能,较之前代有增无减,这是元代统治阶级

出于控制盐利、增加赋税收入的考虑而设置。都转运盐使司由盐运使掌管,盐池分为八场,后又裁并为四场,每场设场官一员,生产由官府征调民夫捞采,捞盐归官,商人则从官府买上盐引,然后运销各地。元代的盐丁既服劳役,又服兵役,盐丁报酬低下,缺乏生产积极性。

明代“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洪武初诸产盐地次第设官。都转运盐使(司)六:‘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山东、曰福建、曰河东。’运城盐池作为国家设立都转运盐使司的六大盐区而有着自己的稳固地位。在盐司下面,设立了分支机构:“河东所辖解盐,初设东场分司于安邑。成祖时,增设西场于解州,寻复并于东。正统六年(1441年)复置西场分司。弘治二年(1489年)增置中场分司。”(《明史·食货四》)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明代政府因此也特别重视盐业经济,为了加强对盐池的控制和监察,除了常设盐务机构外,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令山西按察使分巡该道官兼巡视运城盐池。成化十年(1474年)始于河东差监察御史一员”,监察御史是中央派出的监督运城盐池盐务的官员,权力很重。明代盐池的常设管理机构是河东都转运盐使司,设“都转运使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人,判官无定员”(《明史·职官四》)。明代盐池官员的配备较前代更为完备,从而加强了对池盐的产、运、销管理,维护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明代盐池生产仍然沿袭宋、元的做法,征集盐户、盐丁到盐池服役。但是,明代盐户盐丁的数量大大超过前代,“明初于蒲、解等州县编审盐户八千五百八十五户,定盐丁二万二百二十名”。到明代万历四年(1576年)还有丁夫“一万四千七百”。明代后期采取了募民捞采和鼓励运商捞采的办法,较之征调盐丁服役捞盐的办法是一种进步,所以在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盐池的产盐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产盐28000万多斤。这是运城盐池亘古以来产量最大的一年。

清代的运城盐务机构设置和官员配备与明代大致相同,设河东

陕西都转运盐使司,统管盐池事务。在此机构上,由巡抚大员任盐政,河东道兼理盐务。据《河东盐法备览·官职门》记载,河东陕西都转运盐使司设运使一员,运同一员,运副一员,运判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库大使一员,东、西、中三场各设大使一员,巡检三员(清代设三巡检司,即盐池巡检司、长乐巡检司、圣惠巡检司),分驻解州州判一员。此外清政府还设立了运卫营,武装护卫盐池。可以说,清政府在盐池配备的护盐护税防止走私的武装力量是有史以来队伍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清初顺治六年(1649年)盐池实行畦归商种,政府将盐场畦地租让给盐商,盐商雇工浇晒,政府只向盐商征收畦课(食盐生产税)。这是盐池生产制度的一次大变革。

三、盐池特有的“老和尚”管理制度

提到盐池,就要谈到老和尚,在盐池一带,无人不晓老和尚,对于盐场和盐工来说,盐场的老板东家是幕后操纵者,盐场管理生产的却是每个盐场的老和尚,老和尚即是盐场的总工头,同时也是盐场的技术权威。

运城盐池的盐场工头和技术指导被称为老和尚,是有很长的历史和久远的传说。据说,远在隋朝末年,盐池当地人还没有掌握晒盐技术。离盐池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太寺巷的地方,太寺巷北端有座兴宝寺,寺里聚集了许多云游和尚。和尚们在一次结伴出游时,发现了天日成盐的宝池,主持便率领众和尚移住盐池捞采。和尚们常年呆在盐池,在盐池周边搭起庵棚,撑起窝铺,经过长期的实际操练,摸索到了一套晒盐的技术,这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垦畦浇晒法。日久天长,和尚就成了浇晒池盐的技术顾问和权威。到了大唐贞观年间,官府想方设法要把盐池经营权从和尚手中夺回,经过多次交涉后,双方达成协议,商定盐池由官府经营,但庵户的名称不能改变,以表示盐池晒

盐技术是和尚发明的。同时议定,每一庵户今后必须供养一名和尚,由和尚指导和掌握生产的各个环节,久而久之,老和尚这个称号就成了盐号里掌握晒盐技术权威者的专用名称。说是老和尚,并不单指和尚老,一定意义上说是指这种制度和习惯的久远。老和尚在年迈体衰时,就将自己的晒盐技术传给盐场那些勤恳干活且又聪明好学的能人,这样盐池晒盐的技术便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关于老和尚的传说,有一些可信度比较高的佐证。比如,盐池的许多设施和工具都与和尚有关,盐商经营的盐畦习惯上叫“号”,也称“庵”;盐场里供人们休息和看守盐料的小工棚叫“小庵”,负责盐场管理经营的老板当地人称作“庵户”;盐场以铺为单位划分,据说缘于和尚经营晒盐时就在晒场搭盖了窝铺休息,每个铺与铺之间的距离,则是依据每个和尚所分管的产盐范围而设置,可以说是和尚间所划分的经营范围。

老和尚这一称谓在明清时已被广泛使用。当时的盐场,都有一名被称作老和尚的人来管理生产事务。同时,盐场也以老和尚为中心,建立了一套非常严密且近于残酷的盐场封建把头制度,这种制度下的盐工和工头之间,等级森严,难以逾越。盐场的老和尚就是最大的工头,副工头是“老伴”,也就是老和尚的助手,老伴下面设有二掌锨、三甲曹、四排子、小师傅等共为六级工头的宝塔般监工体系,盐工称此六级工头为压在头上的六层楼。一般的盐场设一名老和尚,两名老伴,三至六等工头的设置则依盐场的规模大小来定,通常一个二三百人的盐场要有三四十个这样的大小工头来管理。许多年来,盐池就有这样的口头禅:“掌柜的管庵,老和尚管滩。”这是对盐场老板制定盐场大政方针而老和尚管理具体生产事务的准确概括。老和尚既要懂得精通晒盐的各个环节和工序,也就是从整畦、制卤到晒盐、归料的各道关键活计,又要负责组织盐民生产,所以从来没有外行出身的人可以充当这老和尚的角色,但是,老和尚又几乎全是文盲,他们的技

术完全凭借长期从事生产的直观经验,盐池生产各个环节的转换,全凭老和尚的一双眼和一双手,卤水搭配、进水出水、晒盐结晶完全依靠老和尚的眼力,这对盐池生产的发展和进步是有阻碍作用的。

四、盐池生产技术的缓慢进步

垦畦浇晒法曾给运城盐池的生产带来了空前的大发展,然而在元朝将近140年间,盐池生产出现了一段时期内的大倒退。蒙古贵族是在元太宗窝阔台三年即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占据运城盐池的。此后他们放弃了已有的垦畦浇晒而采取了从前的天日成盐、集工捞采之原始生产方式。元人王纬说:“前代解盐,垦畦沃水种之,今则不烦人力而自成。”(《河东盐法备览·艺文门》)元代正史也记录道:“河东之盐……每岁五月,场官伺池盐生结,令夫搬攬盐花。其法必值亢阳,池盐方就,或遇阴雨,则不能成矣。”“有因自凝结而取者,解池之颗盐也。”(《元史·食货志》)这就是被称作攬取的元代解盐生产方式,是生产的倒退。因此元代的运城池盐产盐量急剧下降,由唐代通常年景产盐4000余万斤、宋代产盐7000余万斤,下降到元世祖至元十年(南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年产2500余万斤,后来在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年)产盐最多的一年方达到184500引,约合7380万斤,与宋代平常年间的产量相当。与此同时,运城盐池的盐产量在全国盐产总量的比重也迅速下降,一些过去食用解盐的地方,如陕西、河南的部分地区,改食韦红盐和沧盐,这是元代盐池生产萎缩的必然结果。

明初对盐池的政策较元代要进步得多,特别是恢复垦畦浇晒,同时也不放弃捞采,就是一般史书中讲的“且种且攬”,一方面恢复垦畦浇晒,一方面仍然依靠天日成盐集工捞采,两种方法并行不悖。这种且种且捞的生产方式维持了百余年,此后盐池生产方式主要是垦畦

浇晒,较之宋代又有所发展,特别是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通常年景的盐池产盐量也在宋代的7000余万斤之上,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和三十一年盐池的产量均在62万引,一引以200斤计,合12400万斤,在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盐池的产盐量是1440700引,合28814万斤,是宋代平常年景产盐量的将近四倍。盐池生产达到了相当规模。“明初于蒲、解等州县编审盐户八千五百八十五户,定盐丁二万二百二十名,每二十名立料头一人,捞盐千引为一料。”(《河东盐法备览·坐商门》)明代盐池从事盐业生产的盐户、盐丁数大大超过了宋、元两个时期,而且盐丁在生产过程中有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即二十人有一料头,也就是我们在老和尚问题中谈到的最低级的工头。

自垦畦浇晒法出现后,盐池生产方式很少变化,盐池独特的成盐条件决定了它的生产方式。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载:“盐之所产不同,解州之盐风水所结,宁夏之盐刮地得之,淮、浙之盐熬波,川、滇之盐汲井,闽、粤之盐积卤,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山东之盐有煎有晒。”黑河被淹之前,池盐产量一般都在一亿斤左右,如乾隆十年产盐11823万斤,十一年产盐14480万斤,十八年产盐21120万斤,十九年产盐10560万斤。此后,盐池生产由于卤源——黑河的彻底淹没而被迫改变。清中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运城一带秋雨连绵,山洪陡涨,洪水夹带着大量泥沙将黑河淹没,盐池生产出现空前危机。官方和盐商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先后几次挑挖黑河,终因河床淤泥过深、土质疏松、前挖后塌等因素而放弃,但在挑挖黑河的过程中,却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就是东场坐商刘阜和创打井浇晒法和蓄积卤水的溇沱出现了。清中叶以后,运城盐池制盐依靠的是盐池的溇沱。卤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与从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黑河相比,显然溇沱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此后盐池生产受到影响,特别是盐的质量从此下降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以后,盐池生产

基本转入正常,但终不如黑河取卤晒盐工省物美。到晚清光绪六、七年(1880、1881年)间,东场坐商李传典又发明了掘井取卤的新方法,这种卤井是在北方水井基础上的一种改进,从卤井中取来的卤水较之溇沱卤水的质量高、浓度大,但卤井对地形条件的要求比较高,只能在盐池东场的一部分可以打井,中场和西场根本无法推广这项技术,即便东场也是溇沱、卤井并用。溇沱和卤井在后期盐池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明清运城盐池的各项文化建设事业

一、运学的兴起发展和书院建设

盐池教育事业的兴盛表现在盐务专学——运学的兴办和发展,以及与盐池相关的河东等书院的相继创立。运城最早的盐务专学是在元大德三年(1299年)由河东运使奥屯茂创办的,取名“运学”,学宫设在运治东南。此时的运学只是一所由运城盐务官府创建,接纳盐商和盐丁子弟入学就读的普通学府。这是为适应从事盐业生产运销的商民子弟读书需要而设,因为在运学建立前,盐商子弟都是就近在州县地方学宫读书,运学设立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学校。元代建立的运学在元末明初战乱期间停办,“洪武初,运籍生员分附解、安二学,而运学废。正统己未(1439年)运使韩伟请于朝,复旧制”,停废70余年的运学得以重兴。重建的运学校舍规模较大,“原基东西阔五十步,南北长一百八九十步,计地三十九亩三分有奇,中为大成殿,殿前东西两庑。又前为戟门,门外名宦、乡贤祠分左右,泮水流其中,棂星巍其上,殿后为明伦堂,又后为敬一亭,东为崇圣祠,又东为尊经阁,为仰德祠,为射圃、观德堂”(《河东盐法备览·学校门》)。运城专学的建

立,在中国盐业和运城盐池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对运城的教育事业也有很好的影响。正如《河东盐法备览》中所说,“天下运司有五,惟河东有专学”。在盐务专城中设立盐务专学,这在全国的产盐区又是一个创举,而运学的产生与运城盐务专城的建立有同样的原因,即盐池的集中生产运销之故。

河东书院在运城北五里,明正德九年(1514年)间由巡盐御史张士隆建。河东书院历几十年不衰,明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朝,议禁毁书院,河东御史李廷观以院内祀尧、舜、禹三圣,改为三圣祠,得免厄运。后又易名崇圣馆,再复河东书院名。乾隆四十八年运使沈业富修复书院,道光二年(1821年)盐法道张大镛续捐经费,大加葺修,定陕、豫商籍,河东三十六属民籍生童,均准送书院读书。河东书院当时在运城一带的影响是很好的,所以明清历届河东盐池的官员都十分重视这所书院的建设。此外还有如弘运书院等其他书院,也得到当地盐务机构的光顾。弘运书院在运城学宫东,明天启三年(1623年)御史李日宣建,为邑人曹于汴讲学之地,后为商籍子弟肄业之所。明清两代对书院是很重视的,康熙五十八年,河东道和明详准,将藩库存储的盐池生息银拨归弘运书院,作为书院的经费。运城以盐务专城为依托,先后建立了众多的学宫、书院,这在当时的其他州县是不能相比的。

二、盐池禁垣、渠堰的兴修和盐池古迹

与盐池关系最为密切的建筑物就要数盐池周边的禁墙了,禁墙的修筑使得运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盐务专城。远在唐朝的时候,环绕盐池就修扎了“壕篱”,“壕篱者,盐池之堤禁”。即禁垣之意。到了宋代,募兵百人,以“护宝都”而缉私盐。同时在唐代的基础上,濒池设“拦马短墙”,自安邑介村抵解州,围立环合,但短垣仅及肩,实在不能

完全御盗。这“壕篱”和“拦马短墙”的作用都在于防御私盐贩的盗盐，保护国家正常的盐税收入。明代初期，国家为解决北方边军的粮饷而实行开中，运城盐池占地理优势，受益匪浅，在纳粮销盐的经济活动中非常活跃，盐池产量激增，盐利收入倍增，盐池的护围更加重要，官方曾先后两次大规模修建禁墙。明代中叶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由巡盐御史王臣经理盐池，“塞东西二门，另辟中门，以总出入。又于马墙之外，筑设禁垣一周，计长一万七千四百二十二丈。高低随乎地势，东西南北不一。其制大率高一丈并三尺为度，基厚八尺及丈有三尺，渐次而上。顶厚六尺、八尺不等。禁墙之外有马道，以便往来。马道之外有隍堑，以蓄野水，深阔皆丈。垣内外又置铺舍，以居逻卒。”（《河东盐法备览·盐池门》）这次工程历时3年，动用人力物力都是空前的。这一工程的完成，使得百里盐滩成了一座业盐城堡，环池仅开一中门供人出入，禁闭森严。但是这种状况于盐业发展很不利，池盐运输不便。所以在明成化年间，御史吴珍请准再开东西两门，加上中禁门，共开三门。三场出入，各从其便。此后三门制度便沿续下来。中禁门与运城相对，名佑宝门；东禁门距安邑县五里，名育宝门；西禁门距解州十里，名成宝门。三门以佑宝、育宝、成宝取名，包含着吉祥如意的意思。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河东巡盐御史熊兰征调民夫3万余人，耗时半年，加固增厚禁墙，加厚至一丈五尺，加高至二丈余，挖深隍堑并加宽至一丈五尺，在禁门上建楼，禁墙内筑铺，分别驻兵把守、巡视。使禁墙马道隍堑更为巩固壮观。禁墙从唐代草创，宋代继修，明代建成，清代续修，前后经过千余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起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盐城。禁墙的修筑，一是基本防止了盗盐走私，二是有利于官府对盐丁的管理和统治，增加了税收，三是对防止客水灌池保护盐池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修建维护盐池堤堰是保证盐池正常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运城盐池历代都有水利工程。这些渠堰工程主要有：盐池北面的护

池主渠姚暹渠的开凿和维修。隋朝大业年间(605—618年),都水监姚暹在水丰渠的基础上重新开凿,渠身宽二丈四尺,底宽二丈,深一丈二、三尺不等,全长131里,东起夏县王峪口,历安邑、解州、虞乡等地,会合东南一带的山水后,注入永济五姓湖,向西流入黄河,姚暹渠承担着盐池分洪的支柱作用,所以历代官府和盐商都非常重视对姚暹渠的维护。疏通涑水河是另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涑水河在姚暹渠之北,源出闻喜县东山,流经夏县、安邑、临猗,入五姓湖,再经永济流入黄河。由于该河地势高于姚暹渠,每遇雨涝,河水溢出河槽,就会注入姚暹渠,渠中水溢,就会殃及盐池,所以对涑水河的疏通是一项经常的工程。另外,在盐池周围还修筑了多条护池堤堰,如池东的白沙、李绰、雷鸣、白家、黑龙、东禁六堰,池西的五龙、硝池、七郎、卓刀、长乐五堰。

三、盐池诸神与庙宇

盐池名胜古迹是盐池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宝应灵庆池的来历。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运城一带秋雨连绵,积水(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客水)漫入盐池,食盐味苦。时为河东租庸盐铁侍御史崔陞时担心盐户减税,便祈祷上天保佑,结果盐池“红盐自生,盈掬倾筐,或茧或栗,形攒伏虎,色彻丹砂,灵贶休徵,古未之有”(《河东盐法备览·盐池门》)。崔陞时把奏折编得天花乱坠,吹得神乎其神,经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奏报唐代宗,代宗生疑,派谏议大夫蒋镇前去核查,蒋镇或许是畏惧韩滉,或许是得了韩滉的好处,回京后就向代宗大模大样贺喜,并证实盐池生瑞不是韩滉无端编造,他说自己看到了盐池所产瑞盐,并请求在盐池设神祠祭神,代宗高兴之余便顺水推舟敕封盐池为宝应灵庆池,封池神为宝应灵庆公。从整个过程来看,盐池封神是在韩滉、蒋镇两人操纵下上演的一幕喜

剧,但在当时却非同小可,因为有天子的认同和册封,于是在传说当年舜抚琴作歌的盐池之畔卧云岗上修建了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池神庙,供奉池神灵庆公。

唐代封神之后,以后各代代有封许。如宋朝徽宗年间就封东池神为资宝公,西池神为惠康公,后又进封为王,提高了池神的地位。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赐池神庙为“宏济祠”。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给东西池神加封,东池神为永泽资宝王,西池神为广济惠康王,并刻石立碑为记。明初朱元璋登帝位不久,就在洪武初年(1368年)正盐池神号为“盐池之神”,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又赐庙号为“灵佑”,并对神庙多次修复。清代雍正五年(1727年)经清世宗钦定加封为“昭惠裕阜盐池之神”,规定每年三、六、九月朔日祭神。

在运城盐池周围,以池神庙为中心还排列着其他众神之庙宇。在盐池的卧云岗池神庙前修建的海光楼、地宝天成坊、歌薰楼,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体。这是盐池经济发展派生出的文化成果。众多的建筑还有:风神庙,是专为祭祠中条山的风给盐池成盐造成独特成盐条件而设;甘泉庙是因其水质甜美、冬夏不竭而设;另外也有日神庙、雨神庙、土地祠、关帝庙等一般的庙宇。遗憾的是,池神庙以及其他的庙宇建筑不少都在多年的战火乱世中毁坏,现在只剩下池神庙里的主体建筑了。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封神和庙宇情况只能来自于古书留下的记载。

四、盐池的慈善业

运城盐池大规模兴办慈善业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清代嘉庆年间,运城开设过一个规模不大的养济院,收养当地一些鳏寡孤独者,这是运城慈善事业的开始。然而运城盐池的慈善业主要是在清朝中晚期才兴起的,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较大的发展。管理盐池

的各级官吏,为了博得一个体恤民情的名声,慷慨解“盐池”之囊,或由盐商资助,兴办了一些救济福利事业。于是这些善举就同河东盐业有了最直接的关系。

(一) 育 婴 堂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河东道李百龄捐养廉银 2300 两兴办运城育婴堂。在李道台的倡导和“表率”作用下,河东官商又合捐 2000 两银,作为育婴堂的创办经费。这 4300 两银,以 4000 两为本生息,备日后育婴堂支出费用,仅以 300 两在运城路家巷购地建堂。按当时当地的生活水准测算,育婴堂可以收养大约百名孤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河东道冯煦又捐银 1000 两给育婴堂,并责成解州州判与盐官共同办理育婴堂。以后堂址几番迁移,最后在城内万家巷扎下堂址,直至清末不变。

(二) 粥 厂

这是一个专门向贫民、乞丐发放粥食的机构。运城人口众多,贫苦百姓和乞丐不少,旧时每逢隆冬季节,一些老弱病残就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同治三年(1864年)河东道杨宝臣在任时,捐了些养廉银买米,同时倡导督促当地的官商士绅捐资买米,设厂放粥。这个机构在每年寒冬腊月和春季青黄不接的日子里,赈济那些无以为生者,还将筹到的剩余资金置办一些棉衣,接济一部分忍饥受冻无家可归的人。盐商和绅士自愿捐助的方法维持粥厂两年多以后,道台恐怕临时捐募粥厂难以长久,就下令河东坐运两商在放盐时加银,每年 1500 两,具体事务由盐商经办,这项善举就一直办了下去。

(三) 同 善 局

是河东道杨宝臣在同治三年(1864年)的又一善举。设置同善局的目的是埋葬那些无人认领暴尸街头的贫者。对该项善举,运城绅商踊跃捐资。同善局照粥厂章程办理,遇有街头露毙者,由局方买棺、入殓、下葬。

(四) 养病所

光绪十五年(1889年)设。当年运城疾疫流行,河东道迈拉逊责成专人在城南宏教寺医治有病盐工。三年后,护理河东道吴鸿恩恐疮疫流行盐池,责成盐池各场坐商出资,对盐工进行检疫,并派专人监督检查。说是医治疫病的养病所,不如说是检疫所更为贴切。

(五) 习艺所

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所址在运城城内谢家巷,由河东道陈际唐倡办。这是一个改造犯罪情节较轻的罪犯的场所,犯人在这里学习织毯、织袋或其他的手艺,以便出所后可以自食其力。不过,习艺所的规模和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就当时的这些慈善救济事业的规模来说,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福利事业的需求,也只能是最低限度的救济,但这些机构毕竟还是解决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小部分问题,也可以说是盐池的官与商结合办理的一些公益事业,这些所局厂院同时还具有相当的文化色彩。

第五节 二十世纪死而复生的盐池

一、畸形的民国盐务管理机构

(一) 河东临时盐政处

1911年的辛亥革命向没落的封建王朝发起了猛烈攻击,腐朽的清朝政权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山西、陕西两省革命军兵临运城,秦军前锋锄刀队沿着姚暹渠大堤爬上城墙,攻进城里,横行盐池的清军盐捕、运安营官兵以及守城的团练勇丁在秦晋联军的夹击下四处逃散。经过反复,运城失而复得,河东军政府旋即成立。2月22日,河东临时革命政府召集当地开明士绅与各界人士协商后,决

定建立民国第一个管理运城盐务的机构——河东临时盐政处。临时盐政处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盐务机构，暂时负责盐池产运销事宜。该机构设有总理、协理和若干办事人员，这个机构成立之际，商人感到时局不稳，纷纷采取观望的暧昧态度。盐池产销处于无秩序、无生气、产销无法正常进行的状态下，盐业生产几乎陷于瘫痪。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河东临时盐政处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恢复生产，比如向产销环节投入适量资金，对晚清税制进行变革，减免各种规费，在过去开放盐池东西中三禁门的基础上增开南禁门，缩短运程。盐池生产又出现一线生机。不幸的是，视盐池为利藪的封建军阀在刚刚结束了与清军的斗争后，就开始了内部的争夺，盐池成为军阀角逐的重要目标。

（二）军阀对盐池的追逐

1912年初，陕西地方实力派依仗在革命中有功于运城，前来交涉盐池重新分配事宜，提出与山西共享盐池之利、陕西自办运销、盐课加价所得由两省均匀分配等项要求，陕西军阀在交涉过程中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便准备诉诸武力来强行解决盐池问题。5月，陕西方面以“助剿土匪”为由，将部队开进了运城，胁迫山西交出部分盐利。有武力作后盾的谈判中，秦军官兵一律佩戴起“秦军政府河东军”的袖标，随时准备攻占盐池。为使盐池免遭战火，山西方面做出了让步，秦晋双方终于达成了重新分配盐利的协议，河东当局以拨给陕西24万石食盐和免征陕西当年盐课银10万两的代价，换取了陕西军队撤离运城。秦军前脚走，阎锡山军队后脚进，7月间，阎锡山向临时盐政处的总理、协理颁发了委任状，10月，以省议会的名义，责令组建新的盐务机构，以取代河东临时盐政处。不料，袁世凯的手伸得更长更快，在阎锡山的盐务局筹备就绪之际，袁世凯于1913年1月颁布政令，全国各盐区统归中央财政接管，同时，由民国中央财政部向各盐区统一派遣盐运使，组建盐运使署，阎锡山被迫收敛了对盐池

的野心。

（三）河东盐运使署

1913年2月，河东盐运使署正式成立。运使署设东、西、中三场场务局，设督销局、安邑管运所以及各禁门称放局，同时在黄河左右岸各设掣验局所三个，这些机构是管理盐池生产、运销、税收、缉私等各项事务的权力部门。但是，盐运使署独掌运城盐池的时间相当短暂，当年的6月间，帝国主义便直接插手盐池，成立了以控制运城盐池为目的的河东盐务稽核分所，对运使署的权力造成极大的威胁。此后，运使署在与稽核分所打了长达一年的争权夺利的“擂台赛”，节节败退，不得不放手由洋人控制这造福人民的宝池。

二、帝国主义与运城盐池

袁世凯窃夺民国临时大总统权力后，决心以武力消灭南方各省革命力量。为了筹措军费，以中国盐务为抵押，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一笔以消灭革命党人为目的、断送中国盐务主权的借款合同于1913年4月正式开始生效了。其中规定：在北京设立盐务稽核总所，作为代表中国征收盐税以偿还借款的总机构。在各产盐区，设立盐务稽核分所，中国人为经理，洋人为协理，有关产盐区收支款项必须有分所经协理双方签字方能生效。同时，各盐区征收的盐税款项，必须存入五国银行团指定银行，不经总办会办共同签字，单方不得提用。通过善后大借款，列强各国以借款的形式买到了控制中国盐业的特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更加深了一步。

根据善后借款合同，民国中央政府颁发了盐务稽核分所章程，对即将成立的列强盐务机构的职能明确划定，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凌驾于运使署之上的盐务管理机构。因为从各区引票发放、秤放盐斤到各

产盐区的收支情况以及报告运署、运司所属人员的行踪等,都在稽核分所的管辖和监督下。河东盐务稽核分所于1913年6月在运城正式成立。此后短短的一年内,盐务稽核分所在与河东运使署经过一番斗争几次较量,利用经济上对民国政府的制约,挤走几任不听分所协理摆布的运使,如第一任运使是杨葆昂,稽核分所协理柏理稳在总所会办丁恩的支持下,加紧幕后活动,迫使当局调离了杨某。第二位运使高景祺到任后,只在运城停留短短的两三个月,又被挤走。在各次斗争中,稽核分所的权力和地位得到提高。这里是河东稽核分所历任洋员的简单情况。柏理稳(G. Baldwin),英国人,1913年到分所任协理。伊凡士(A. F. Evens),英国人,1915年4月至1920年9月任分所协理。巴斯克(A. S. BasKett),英国人,1916年7月任稽核总所会计,后任河东分所协理,1931年因病回国。伽尔玛(A. Gialrna),英国人,1931年任分所协理,1932年因渎职被撤职。哈尔曼(W. G. Harmen),英国人,1924年至1935年10月在中国,历任稽核总所办事员、长芦芦斗支所助理员、淮北分所和河东分所代理协理等职。纽伦(A. E. Newlanle),英国人,1929年入稽核总所,后任河东分所协理,1935年3月在运城病故。葛费纳(G. L. Gafferena),法国人,1935年任河东分所代理协理。雷司(B. Reiss),俄国人,曾任俄国驻华公使馆员、河东分所代理协理、江西盐务管理局副局长等职。柏克(G. K. B. Berg),挪威人,1917年至1938年5月历任泰州支所助理员、晋北收税局收税官、河东和长芦稽核分所协理等职。从上述九名洋员的情况看,河东稽核分所基本上是被英国人控制的。在河东盐务稽核分所控制下的盐池业得不到发展,这与当初成立稽核所时洋员大肆鼓吹由外国人管理盐务可以改变中国盐务落后状况的“初衷”相去甚远,洋员们关心的只是掠夺盐池财富。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盐池,从生产上讲,生产率依然低下,生产技术得不到改进,管理中沿用落后封闭的老和尚制度,因此在其他各大盐区有多种盐产品问世时,运城盐池

依然只有食用粗盐,盐池的化工资源始终未能得到规模性开发。与宋明时盐池的大规模生产相比较,这时的盐池呈现一副凋零败落的景象。据二十年代日本东亚同文会出版发行的《中国分省全志》第十七卷《山西省志》载:“其称为盐田的地方,东西宽约一华里,南北长约三华里,外观恰似水退去一半的沿地。目前产盐的只不过是其北侧的一部分。盐田的盐结晶时,宛如结冰的稻田,而且低地上的盐畦亦酷似稻畦。晒盐时,用桶汲取附近的卤水注入畦中,使水深三四寸,放置数日后,水面开始结晶,这时于畦边挖沟,排出下部之水,然后将结晶部分耙集畦的中央堆积起来,然后再把各畦盐集中起来,堆成高四米左右的盐堆。盐堆三面用花秸泥涂死,一面苫以苇席,白天则掀掉苫席,让日光曝晒,并等候外来盐商收购运走。这样制成的盐结晶坚硬,色黄质粗,须进一步加工精制,方能获得精盐。但粗盐已能满足一般需要,因而附近盐商仅备有二三口精制大锅。盐田北侧有五、六家盐商分散在几处,各自拥有自己的盐田,从事晒盐生产。”可以看出,帝国主义控制下盐池的衰败和经营的惨淡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

1937年7月全国范围的抗战爆发,1938年3月4日,日军占领运城,盐池沦陷。管理盐池的华员洋员纷纷撤退,稽核分所的活动随之结束。日军进占运城后,指使当地汉奸出面组建了完全由日军操纵的河东盐务管理局,局长由汉奸充当,副局长是日本人。日军占领盐池后,明火执仗开始了对盐池洗劫,盐池各场的存盐、食粮、工具、器物大量损毁,盐商携资逃跑,盐工远走他乡,盐场存盐损失高达10万吨之多。日军占领盐池的当年,偌大的盐池竟然颗粒未收。盐场生产能力大大下降,每年产盐仅有两万吨左右,大体与唐宋年间的产盐量相当。盐池荒畦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到1945年年底,549号注册畦地中荒畦高达459号,占全池总数的六分之五。完全有理由说,日伪统治盐池时期,盐的产运销没有章法,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侵华战

争的需要随时改变，食盐统配，产销脱节，一切都纳入了日军经济运行的轨制上。日伪统治时期，日军窃夺的盐池物资很难用准确的数字计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无法还清的债务。

三、盐工的革命斗争和盐池的解放

盐池生产史上，有过官制和民制两种办法。实行官制时期，也就是元代以前的一两千年里，由官府征调农夫服役，下池劳动的人被称为盐丁或畦丁。盐池曾有过集工捞采和雇工浇晒两种官府管理下的生产制度，这时实行的多是劳役制，劳役制下的盐工，没有人身自由，他们要在最恶劣的气候和最严酷的监督下，完成日额或岁额任务。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盐池生产由官府晒制改畦归商种，盐丁为雇佣工所取代。盐池雇工主要有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多来自河南、山东，每年农历的正月底二月初到场，十月完场后离去。短工则多为当地人，大多在产盐旺季来场，十月完场后回家。不论长工短工，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的重活。“上工天不明，下工满天星，半夜叫来半夜起，一年四季没黑明。”这首在盐池流传很广的歌谣就是对盐池工人被迫超时限劳作的真实写照。特别是从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盐工的双重剥削压迫，盐池老板经理和老和尚为首的各级工头对盐工的恣意欺凌压榨，盐工的苦难加深了。抗战前担任河东盐务管理局局长的蔡国器谈到盐工的苦难时说：“自春徂冬，四时操作不息。除其领工之人俗称老和尚者待遇稍优外，普通工人大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食多糟糠，衣不蔽体，厩居原野，室若蜗庐。冬则朔风凛冽，胼手胝足，夏则烈日薰蒸，炙肌灼肤。疾病乏医药之资，伤亡无抚恤之费。曩日工资，月仅八钱三分，今则增至二元六角至三元不等。每届盛夏之时，中暑而暴卒者比比皆是，情形悲惨，不堪言

状。”^① 盐工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折磨,还要忍受老板与老和尚对他们精神上的摧残,工头们凭借主子的信任,对盐工滥施淫威,同时盐工在经济上也不得不忍受老板们的剥削敲榨。有压迫就会有反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盐池工人阶级迅速觉悟了,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进入盐池后,盐工的斗争从自发的行动转为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斗争,取得了一次次斗争的胜利。起初他们用消极怠工、损毁工具等的简单斗争来抗议剥削者的压迫,在一百多人的盐场里,一天损毁的工具竟然达到了二三十件,有时工人还用逃跑或直接找工头拚命的方式进行反抗,但事后吃亏的总是盐工。盐工在多次自发的斗争中增长了才干和知识,懂得了团结斗争的道理。在二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影响下,盐池出现了盐工争取权益的罢工斗争。1925年秋,运城平民中等学校的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了运城人民的反对增加盐税斗争,市民、商人和盐工都自觉卷入了学生斗争的行列。1927年春夏,运城地方党组织向盐池派出4个秘密工作小组,同时进入几个盐场展开工作。1928年夏秋间,党组织策划了第二年春季的盐场罢工运动。在盐池产盐最多的东场,3个盐场的上千名盐工同时举行罢工,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盐工的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盐池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踊跃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运城沦陷时,盐池各场有大批存盐,政府发出抢运食盐的号召,盐工协同盐池附近的百姓与当局一道抢运食盐,尽管有宪兵队和便衣队的严密监视和巡逻护守,日伪军不时乱抓盐工,但是已经觉悟的盐工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持续两年的抢运食盐斗争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据国民政府盐务总局的统计,1938年6月到1940年7月两年多的时间里,从盐池抢运的食盐总数达到22634

^① 蔡国器,《潞安纪要·盐工生活之状况》,转引自《盐务汇刊》1935年第68期。

吨,这是当时河东盐务管理局的一大政绩。从1941年起,日伪军加强了对盐池的封锁,抢运食盐的斗争被迫停止,盐工从间接的斗争转向直接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他们配合抗日游击队袭击了敌人的运盐队,在盐池附近的从善村、庙前村等地机智灵活地袭击日伪盐警,不少盐工投奔了抗日游击队,利用熟悉盐池地形的优势,带领当地游击队在盐池周围频繁活动,给盐池和附近的敌人造成一定威胁,敌人为此常常担惊受怕,活动起来也更加小心。由于有广大盐工的密切配合和积极参加,游击队一次次准确地打击了盐池的日伪盐警。

八年抗战结束了,日本侵略者从盐池撤走了,阎锡山、蒋介石的军队又相继占据了盐池。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盐池工人以新的姿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为了配合运城解放战役,中共地方组织派人到盐池展开工作,组织指导盐工的革命斗争。1947年4月间,人民解放军太岳部队为配合陕甘宁战事和渡河南进战役,向运城的蒋阎军队发起攻击。盐商纷纷弃场逃跑,蒋阎军队打算抢走存盐后毁掉盐池。为了避免盐池遭到不幸,党组织发动盐工组成护场队,护场队员们白天坚守岗位,看守存盐,护卫盐场,晚上抢运食盐出池。在盐工的周密防卫下,敌人抢劫毁坏盐池的阴谋落了空。在运城解放的前夕,盐工积极为解放军带路送信,运输弹药,烧水做饭,看护伤员,不少盐工火线参军,奔赴战场。盐工运送食盐出池,支援了山西、陕西、河南等省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当地老百姓。1947年间,盐工响应党组织的号召,突击运盐出池,就是在运城被围困的时候,盐工运盐的工作也没有中断过。据粗略估算,这一时期盐池支援后方人民的食盐达27500多吨。当年12月底,解放军第一次占领盐池,在部队撤离运城之前,曾与解放军并肩战斗的400多名盐工跟随大部队加入了运城解放战役。1948年2月8日,运城解放了,盐池解放了,饱经沧桑的盐池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古老的盐池获得了新生。

四、新中国的无机盐化工基地

运城盐池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根据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纲领,确定了运城盐池“发展国营,扶持合作经营”的基本方针,并依照“没收盐池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的政策,宣布没收了一批官僚资本和汉奸经营的盐厂,组建了第一批国营盐厂5个,同时将一些负债累累申请停业的私营盐厂接管改组为国营盐厂。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运城盐池已经有了14个国营盐厂。这一批国营盐厂的建立,为运城盐池日后的转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于私营盐厂,党和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扶持措施,对30余家私营盐厂仅在1948年就给予低息贷款119551万元(冀钞),解决工具、牲畜、车辆等物资的缺乏,并折价偿还了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从各盐厂运走的食盐价款,这就使这些处于困境中的盐厂积极恢复生产,支援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由于党和政府确立了对盐池的正确方针政策,实施了有利于盐池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办法,废除了封建把头制下的“老和尚”管理制,依靠工人阶级,调整生产关系,特别是充分发挥国营盐厂的骨干作用,调动了私营盐厂的积极性,盐池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从1948年全池产盐36823吨,到1949年产盐72537吨,以后又有上升,到1955年全池产盐达到了81379吨,在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发展中迈出了大的步伐。在资本主义私营盐厂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对运城盐池的旧式盐场因势利导进行了改造,为这些盐场走上公私合营道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1955年,运城盐池出现了第一家公私合营的盐厂,这就是私营鸿益盐厂和裕成厚盐厂率先申请成立的鸿裕盐厂,当年生产形势喜人。在鸿裕的带动下,其他私营盐厂纷纷加入公私合营的盐厂,到1956年初,运城盐池的私营盐厂全部并入鸿裕盐厂。

1958年7月,由运城盐务分局、运城化工厂和公私合营鸿裕盐厂三个单位企业合并,组成了运城盐业化工局,这是一个由盐务行政机关转为生产企业的机构,是一个今后注定要综合利用盐池资源的大型国有企业。党和政府对运城盐池的综合开发利用十分重视,先后由中央、山西省和运城盐化局组织技术力量认真勘测,对运城盐池在食盐生产中渐渐显露出劣势的情况认真分析,果断地作出盐池由以生产食用粗盐为主转为发展化学工业为主的决定,从而使古老的盐池重新焕发活力,成为我国无机盐化学工业基地,在化工生产领域独领风骚。

第十章 煤铁的开发与冶炼

山西位于我国地形阶梯中的第二阶梯中部的的前沿地带,为一山地地形高原。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 88.4%。高原内部起伏不平,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地中地质结构复杂,地层较为齐全,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目前,在世界上已知的 150 多种有用矿石中,山西就有 120 多种,其中煤、铁、铝矾土、耐火粘土、珍珠岩、镓、沸石等七种矿产居全国之首。

煤炭是山西第一大支柱产业。山西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素有“煤海”之称。

1985 年底,我国地质工作者探明,山西省煤田面积为 61829 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39.6%,遍布全省 94 个县(市、区),煤炭储量 2238.66 亿吨,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作为能源大省,山西源源不断地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输送工业食粮,并且远销欧、亚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铁矿是山西的另一大产业。

山西铁矿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铁矿类型多,分布广,埋藏浅,易冶炼。据 1985 年底统计,已有铁矿产地 111 处,分布在全省 57 个县境内,累计探明能利用的储量达 30.36 亿吨,居全国第四位。

第一节 晋煤的发现、采掘和利用

一、晋煤的认识和开发

山西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并利用煤炭的地区。在山西平定县东南25公里处,有一座山,名叫东浮山,山上石头呈红褐色,相传这里是女娲补天的遗灶。东浮山顶有座庙,称女娲庙。明代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陆深写了《浮山遗灶记》石碑,至今仍存在女娲庙内。陆深还在其所著《河汾燕闲录》中说:“石炭即煤也。东北人谓之植,南人谓之煤,山西人谓之石炭。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今其遗灶在平定之浮山,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陆深这一观点,得到明末学者顾炎武的赞同。同意这一观点的还有明朝人甄敬。

据太原晋祠一带的老百姓传说,当地人们用煤的时间可上溯到“晋阳城”时代,晋阳城建筑在公元前487年前。当时盖宫殿时用的铜柱子、砖瓦都是用当地开采的煤炭烧制成的。

据春秋末战国初所著《山海经·北山经》载:“孟门之山……多涅石。……贲闻之山……多涅石。”涅石是产于山西晋南和晋东南的一种煤炭。“贲闻之山”泛指山西境内东部的煤田,“孟门之山”指山西吉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发掘中,曾发现有一些随葬铜器被煤炭压碎,可见此墓正好在煤层中,当时人们掘墓时,应该掘到了煤炭。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山西人认识煤炭,使用煤炭历史悠久,在春秋战国时已有文字记载晋煤,而山西最早发现煤炭的时间,应当比记载的时间要早。

秦汉时期,山西处于“天下之中”,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

富有煤铁矿藏的三晋地区,已将煤炭用于冶铁了。《北史·王劭传》记载,王劭在做晋阳县令时曾说:“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火。”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灤水条》载:“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火山东溪在今大同口泉。北魏时期,山西人民已懂得燃煤,并将煤应用于日常生活和手工业生产,这一时期,晋煤的开发还不普遍。

唐开成五年(804年),日本僧人圆仁前往长安途中,看到太原附近普遍用煤烧饭的情形……出城西行三、四里,到石山名为晋山,遍地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求而燃,料理饭食,极有火势”(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在民间,煤还被用作治疗一种疮的药物,有的地方还用煤来写字、作画,故又称煤为石墨。山西浑源有用煤雕刻烟斗和其他日用品的习俗。

1958年秋,在长治发现一唐代舍利棺,舍利收藏在一方形石函内,石函放在填满煤的坑里,煤可以起到隔水和干燥的作用,说明唐代山西人民对煤炭性能的认识已是较深刻了。《旧五代史》卷五二载:唐末李克用与朱全忠部发生战争,克用部李嗣昭被朱军围困在潞州(今长治),盐炭断绝,形势危急。后城中“盐炭自生”方才解围。褚人获《坚瓠集》亦载:“李嗣昭守上党,为汴人所围,城中盐炭俱尽。……掘得石炭,晋已自将解围,躬奠其地,立二庙曰盐神炭神,世崇奉之。”这说明,山西上党地区很早就烧煤,且把盐、炭尊为神,更反映出在当地人民心目中,炭和盐同样重要,同样是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物品。据唐代《太原县志》载:“风峪在县西五里许……出石炭。”太原煤炭蕴藏丰富,埋藏浅,一些较浅煤层已被采空。解放后,地质工作者在太原进行煤田勘探时认为,“远自唐宋年间即有土窑开采”。由此可以看出,早在隋唐五代时期,山西煤炭的开采就已初具规模。

到了宋代,山西已成为我国主要产煤地区之一。《宋史·食货志》载:“河东铁炭最盛。”这一时期,煤炭在山西人民生活中也更为普

及。北宋李昭遘说：“河东民烧石炭，家有囊橐之具。”（《文献通考》卷九）囊橐为鼓风工具。由于煤炭业的发展，宋时开始对采煤、销煤收税。在太原，卖一驮炭，抽十斤税。大同地区一年中榷煤炭课有100多锭（《元史·食货志》）。同时实行官卖。雍正《山西通史》载：“宋崇宁末，官卖石炭，增卖二十余场，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并在产煤区设立机构，掌管煤炭的开采和销售，向采煤窑户和卖煤人课税。由于课税重，窑户苦不堪言，一些地方官员也代窑户向当局请求减免煤税。陈尧佐任河东路转运使时，就曾上疏朝廷奏请免除炭税。宋代，在山西阳泉地区还出现了一种用无烟煤作燃料和还原剂的方炉坩埚炼铁法。如今，在山西阳泉地区，用坩埚炼铁的遗迹随处可见，许多农户的院墙都是用废坩埚砌成的。不少农田的边墙也是利用废坩埚垒成的，人们修路挖土也常能从地表深处挖出埋藏久远的破坩埚来。由此可知，宋代山西煤炭业发展已有长足进步。

元代，山西采煤业已相当广泛。《元一统志》在叙述盂县物产时说：“炭窑十三处，去县南招贤村，岁办官课。”（《永乐大典》卷五二〇一）可见当时开采之盛。元代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写到：“契丹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之时，与炭无异，其火候，且较木薪为佳。若夜间燃火，次晨不息，其质优良。至今全境，不燃他物。所产木材固多，然不用以烧，盖石之火力足，而其价亦廉于木也。”“黑石”自然是指煤炭，“炭”应是指木炭。马可·波罗游历欧亚两洲，见闻非常广博，对我国已经广泛使用的煤炭表示惊讶，说明当时欧洲人对煤炭还是生疏的。

二、晋煤的广泛开采与行销

明清山西开始大面积开采煤炭，成为全国产煤最多的一个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晋煤的开采和运销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据《明一统志》载：“太原、阳曲、榆次、寿阳、清源、交城、静乐、霍县、吉州、临汾、洪洞、浮山、汾西、岳阳、翼城、河津、灵石、泽州、阳城等地都产煤。”大同早在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煤炭就供居民、军队烧用。万历年间，高平县唐安镇一个煤窑，还发生过瓦斯爆炸事故。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山西平定老百姓已普遍把煤炭用于炊事方面。平定城内“酿家尤甚”，煤渣倒入嘉河内，久之堆积成山，阻塞河道。盛夏，山水骤发，河水猛涨，两岸居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夏，曾因此造成严重水患。这些事实，反映了当时民用煤炭消费之巨。在煤炭开采技术上，已较好地掌握了勘探矿藏之法，乾隆《平定州志》记载：“土人每视山上石脉，即知炭之有无，穿地至三四十丈者，其坚者，椎之难碎，燃之耐久，故平定皆有火炕。”在煤炭采掘方法上，是“凿山为穴，横入十余丈取之”，“人从其下施钁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另外，将煤进行分类，按煤的硬度分为：块煤、碎煤、煤面。到清代，按煤的性质分为：肥煤、煨煤、蓝炭(焦炭)。明清煤的用途已相当广泛，冶铁、铸钱、烧石灰、烧砖、烧陶瓷、酿酒、制药等都离不开煤炭，并且已知道了从煤炭中提取黑矾、硫磺等。炼焦炭的技术与近代相差无几，雍正《山西通志》卷一〇〇中有“霍山以南炭硬而多烟，内含油，燃之则融结为一，作枯炭最良”的记载。山西人还将自己用焦炭冶铁的技术传授给其他省。据乾隆《博山县志》卷四载：“考石可作铁，其始乡人不知也。康熙二年，孙文定公召山右人至此，乃得融铸之法。”博山在今山东。说明山东用焦炭冶铁是由山西传去的。

随着煤炭生产的发展和煤炭需求量的增加，晋煤销售也开始发展起来。销售形式主要有二，一是在城镇开办煤店，将从煤窑批发回来的煤零售给顾客；二是直接去煤窑驮煤，运入城镇转售用户。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负责煤炭交易的炭牙。乡宁、大同、阳曲等地都为数不

少。明清时，晋煤外销数量相当可观，主要销往陕西、河南、内蒙等地。光绪《平遥县志》载：康熙时“晋之炭铁枣酒及诸土产之物，车推舟载，日贩于秦。”雍正《泽州府志》载：“其输市中州者，惟铁与煤，日不绝于途。”由于山西煤炭运销市场的扩大，民营煤窑发展很快。咸丰元年（1851年）后的50多年里，仅平定、太原、阳曲、潞城等45个县就有稍具规模的小煤窑240处，仅光绪年间（1875—1908年）就开办215处。这些煤窑的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都十分落后，主要靠镐、锹、锤、钎、拖筐，掘出的煤炭还得靠人背或牲口驮，有竖井的地方，则用辘轳提升到地面，坑内照明是用内装胡麻油的铁葫芦或磁葫芦灯，劳动时，工人将灯顶在头上，或衔在口中，托于手上，劳动生产率很低，每人每天的采煤量大约为400斤左右。此时小煤窑的形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季节性煤窑，这种窑往往是农闲开，农忙关，有煤则取，煤竭而止。另一种是长期固定性煤窑。这种窑一般规模都比较大，工人少则十几人，多则数百人。煤窑多是由地主、商人投资兴办。山西不少地主在自己土地上发现有煤炭后，就出资或伙同别人进行开发，从此弃农经矿，转为煤窑主。至于商人租赁山地开办煤窑的，就更多了。他们不仅在本省开办煤窑，甚至到外省去开办。山西榆次商人李鹏程、鲁大就曾在河北宛平县清水涧租地伙开煤窑。这时煤窑窑主与工人的关系属雇佣关系，雇工的工银由窑主与雇工议定。

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撞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不久列强便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山西。

1870年、1871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两次来到山西，先后去过晋城、临汾、清徐、大同、五台、太原、安邑、永济等地，通过实地勘查，写出了关于山西煤炭资源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山西煤炭“可供世界二千年之用”，并把山西煤田与当时号称世界煤田之美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煤田作了比较，认为山西省煤田面积广，“且该省之煤采掘易，而需费廉，尤有发达之望。无烟煤是一种性质之优，不亚于本雪佛

尼,所产每吨之值只一先令,皆数立方之大块也”^①。李希霍汾的调查报告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各列强对山西煤炭的注意。英国国会甚至为如何攫取山西煤炭开了辩论会。1897年春,英国、意大利等国资本家在伦敦成立了福公司,并在天津设立办事处。1898年5月21日,山西商务局和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及运转各色矿产章程”,福公司以向山西商务局提供1000万元借款为条件,获得了在山西采矿的权利。

福公司野心勃勃,在山西经营期间,不准中国人在其划定境内开采煤炭,强行封闭正在开采的煤窑,并在山西平定测绘地图,占山开矿。福公司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行径,立即激起了平定人民、山西各界人士、海外留学生及开明官吏的极大愤慨,一个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终于爆发。山西大学堂组织数千人的游行队伍,在海子边示威,抗议英国侵略者。同时向山西巡抚呈上禀帖,指出:“山西僻处北隅,阻山带河,无海湾商港之利以发达商业。所恃以争存于念纪中者,惟此数千年蕴蓄未劈之矿产耳。故矿存则山西存,矿亡则山西亡。”^②远隔重洋的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一位叫李培仁的山西籍留日青年蹈海自尽,以身殉矿。在太原举行的李培仁追悼会规模空前,太原市民空巷前去悼祭,文瀛湖畔黑压压一片人海,宣读李培仁绝命书时,群情激愤,无不掉泪。这一事件,将争矿运动推向高潮。一些有威望的人士认为,除非自办矿务不能挽回危局、平息民愤,要求批准创建保晋矿务公司,并推举祁县著名票号商渠本翘为总经理。1907年,山西保晋公司正式成立,废止了与福公司签订的所有章程,同时收回了福公司已购置的全部厂房、机器等设备。山西争矿运动至此取得了胜利。以山西争矿运动为先声,继而后起的有安徽、山东、东

^① 高士林,《中国矿业论》。

^② 《山西矿务档案》。

北三省、四川、陕西等地,山西人民的争矿运动为中国近代工业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保晋公司成立后,特别注重与外强抗争,保护本民族利益,明确规定,只收华股,不收洋股。总公司设在海子边,本号在阳泉。大同、晋城、寿阳、石家庄、保定、北京等处设立分公司或分销处。在发展过程中,保晋公司逐步向机械化迈进,购置了汽车、发电机、锅炉、矿车,铺设轻轨、架空索道等,为山西煤炭工业向近代工业转化奠定了基础。保晋公司的矿区分布在山西省的几个主要产煤区,寿阳有2处,大同有7处,平定有6处,晋城有1处。继保晋公司之后,平定、阳泉一带又相继成立了建昌、富昌、中孚、中兴、广懋、济生等一批煤炭公司。大同地区组建了宝恒、裕晋、保丰、保华、同泰、同宝、恒义等40多家煤炭公司。据平定、太原、阳曲、潞城等45个县调查,这一时期省内已有初具规模的手工煤窑513处。太原西山沟沟有煤矿,长治、阳城、晋城等地煤矿也迅速发展,著名的有晋城南村煤矿、潞城石圪节煤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山西煤炭业又有所发展。《中国矿业纪要(第二次)》称:“小窑之所在,几无县无之。”其土法小矿之产额已有100余万吨,到1934年,“山西全省煤矿公司及大小煤窑……计有一千四百二十五家。尚有散处各地之小煤窑,时开时歇,无法调查,为数当属不少”(《中国实业志·山西》)。民国初年,在生产组织和劳动分工方面,基本上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典型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11页)。以太原西山地区煤窑为例,管理人员分为:掌柜、先生(会计)、米面掌柜、卖炭人、窑头(技术员)、拖头(运输头目);生产工人分为:砍手(采煤工)、走尺寸(掘进工)、坑下杂工、背手(运煤工)、照巷(维修工)、绞手(竖井提升工)等。这一时期,煤炭采掘作业除原有的平窑和斜窑外,又出现了专门开采地下深处煤层的筒子窑,即竖井。有些竖井深达百米,一些煤矿还备有抽水机、卷扬机、发电机等设备。由于有了较细的劳动分工,技术设备能力有较大

发展,由此,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统计,仅保晋公司1913年煤炭产量就达12万吨,到1918年增加到30至40万吨,分别销往石家庄、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济南等地。初步推算,晋煤外运1915年为25万吨,1923、1924年均有40多万吨。与此同时,晋煤开始跻身国际市场。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晋煤被誉为“煤中皇后”,受到世界各国青睐。1917年晋煤首次出口,销往日本和香港。1920年,晋煤出口突破万吨。1923年,晋煤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4748吨,主要销往日本、美国、香港等地。

三、山西煤文化

千百年来,山西人民采煤掘煤,靠煤烧饭、取暖,靠煤炼铜冶铁、烧砖制陶,与煤结下了不解之缘,煤已经渗透到山西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山西人民离不开煤,对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逐步演变成了一种地方习俗,这些习俗反映出山西人民对煤的感情及崇拜。每逢农历大年三十,山西老百姓要迎请灶王爷,祈盼来年灶火旺,不愁吃喝。晚上还要用大炭垒成塔一样的垛点着,名曰点旺火,大人小孩都围着旺火燃放鞭炮。山西平定一带正月十五元宵节闹红火要点棒槌火。明中叶陆深的《浮山遗灶记》载:“岁上元之夕,无论大小,家家置一炉,当户高五、六尺许,实以杂石,附以石炭,至夜炼之达旦,火焰焰燃,光气上属,天为之赤,至今不废也,是谓之补天。”山西各地普遍有这种风俗。乾隆《寿阳县志》载:“上元前后三日,坊肆里巷,俱于门前塑泥作弥勒、判官、狮子及棒槌等样,围石炭焚之,通宵不息,名曰塔火。”道光《大同县志》载:“元旦家家凿炭为薪,磊磊高起,状若小浮图,及时发之,名曰旺火。”道光《直隶霍州志》载:“元旦夙兴,炽炭庭中,曰兴旺火,祀神。”道光《赵城县志》载:“上元炽炭于庭中,曰兴旺火。”描绘了当时山西各地人民点燃炭火的民俗。宋金时期,山西还有

用煤炭殉葬的习俗,这在山西洪洞县场堆村金代墓葬遗址和稷山县南宋末期墓葬遗址中都有发现。这些民间习俗,与当地人民开采煤炭、利用煤炭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第二节 山西铁冶

一、铁的开采和利用

铁是山西的又一矿产资源。山西铁矿分布广,浅藏易炼,有“山西式铁矿”之称。我国文献可考的用铁记载始于春秋。《管子·海王》篇、《国语·齐语》有关于齐国用铁的记载。而山西用铁也早在春秋时期,《左传》载:周敬王七年(前 513 年)“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晋国用铁的记录是我国春秋时用铁记载中最为明确的一次。晋国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这说明当时人们产铁已属不少。范宣子所铸刑书是继郑子产之后的一部成文法。晋国能用铁铸鼎,又能将如此复杂的文字刻在鼎上,说明当时的冶铁技术已具有一定水平。山西博物馆现存义井出土的铁凿、铁斧、铁刀据鉴定是出于春秋时期。

到了战国时,铁器的运用已十分普遍。1955 年在山西长治分水岭发现的战国墓中,有很多铁制农具,如凿、锛、镢、铲、镢斧等 20 多件。战国时铁器已用到日用品上。在山西侯马东周烧陶窑址中还发现了铁针,在山西左云县发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的铁权。战国时铁的分布已很广,在山西的“白马之山”(孟县东南)、维龙之山(白马之山南三百里处)、柘山(今晋中地区)、淩山(今蒲县南)都有铁矿。《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几个靠冶铁致富的例子,其中有两个在山西。“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宛孔氏之

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卓氏赖铁致富,宛孔氏以铁为业,可见当时山西地区冶铁之盛。

另外,根据文献记载,战国时的铁已用于兵器制造。《史记·魏公子列传》说:信陵君的食客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韩非子·南面》有:“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受重盾而豫戒也。”又《韩非子·内储说上》:“夫矢来有镞,则积铁以备一镞,矢来无镞为铁室以尽备之,备之则体不伤。”《战国策·韩策》载战国有“铁幕”。但在山西两周考古发掘中铁器的发现总的说来为数不多,而铁兵器几乎没有发现。大量的出土物还是青铜制品,青铜礼器尤多。这说明,战国时的铁器主要用于农具,日常用品、铁兵器不多,礼器则几乎不用铁器,可能是古代人把铁视为“恶金”之故。

汉代,我国冶铁事业已很发达。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在全国设立“铁官”,实行官卖,管理冶铁。山西地区的安邑、皮氏(今河津县境内)、平阳(今临汾境内)、绛、大陵(今文水县东北),均设有铁官。这一时期,山西冶铁主要集中在晋南汾河谷地,晋中太原盆地与晋东南上党盆地,尤以晋南汾河谷地最为发达,冶炼水平也最高。雁北地区也有铁冶。1990年山西考古研究所在右玉县高墙柜乡善家村墓地出土铁器77件,计出有镞2、斧2、锤头1、锄1、刀14、矛4、铁镞17件、腰带饰1组、马衔1,带卡1和剪1等。个别器物因腐蚀残碎难以辨认。由于铁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以及技术上的不断进步,使炼钢技术的出现成为必然。战国时期,我国某些地方就已发明炼钢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铁和钢的生产更发展起来。北齐时的綦毋怀文就是造钢刀的能手。他已能用物理方法锤炼生铁,使它成钢。并在热处理上使用“淬炼法”。这是钢铁技术上的大进步。綦毋怀文常说他曾在晋阳为监官,可见他的活动与晋阳关系之密切。《北史》载:“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是其遗法。作刀犹甚快利,但不能顿截三十札也。”襄国就是今河北邢台县,这一带钢铁手工业生产和山西晋东南地区保持着

密切联系,其很多铁原料是由山西运去再加工制造的。同时,这两地历史上来往交通就比较发达。北齐广泛在各地设官冶炼。山西地区有武安(沁水县东)、白涧(山西阳城)、晋阳、原仇(山西孟县)等。可以看出,北齐时,山西已成为全国冶铁的主要地区。

唐代,山西地区冶铁事业进一步发展,冶铁地区更加扩大,有岳阳(今山西安泽)、翼城、昌宁(今山西乡宁)、温泉(今山西隰县)、孟、交城、绵上(山西沁源)、玄池(今山西静乐)、秀容(今山西忻州)、五台、阳城等地。冶铁总的数量占到全国总数的32%,居全国第二。据《太平广记》卷一一四记载:隋朝开皇年间(581—600年)僧人澄空曾在晋阳集资铸造一尊70尺高的铁佛像。唐杜佑《通典》载:“河东有蒲津关,大唐开元十二年于黄河两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四,并前后铁柱十六。其牛下并铁柱连腹,入地丈余。”《唐会要》、《蒲州府志》、《朝邑县志》也均有记载。到金元时,浮桥毁于战火。在《金史》、《永济县志》亦有明确记载。山西考古工作者于1991年对其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存有唐代蒲津渡口铁牛四尊,身长3米,高1.9米,每牛由一铁人驱策。又有铁山两座,南北排列,铁山下又有径粗0.4、长3米多的铁柱埋入地下。另外,在遗址的东北部还有大铁柱7根。据测定,修筑这座桥,铁牛、铁人、铁山、铁柱加起来要用几十万斤铁。见于记载的隋唐铁器还有沁源县五凤村三官庙中隋开皇年铸的铁佛像,孟县高神山唐贞观元年(627年)铸的铁钟,临汾县大云寺贞观中铸的铁佛头像。大同普恩寺后唐清泰三年(936年)铸的铁钟。由于铁器生产增多,铁货交易也频繁起来,一些官吏也插手贩运铁器以营利。山西潞安府在唐代已是各种铁货的集散地了。

二、冶铁规模及行销

宋代山西地区已是我国一个主要产铁区,民间铁矿业日渐兴盛,

山西榆次、五台、平定、晋州(今临汾一带)、石州(今离石)、泽州(今晋城)、威胜军(今沁县)等地均有冶铁。北宋产铁四监中的大通监就在今交城县境内。大通监下设十二冶、二十四务,分别掌管各产铁地区的开采、冶炼事宜。宋代铸造的铁器物较多,工艺也很精美,如晋祠铁人、铁狮,荣河县铁人,乡宁、闻喜、武乡、曲沃等地均存有不少铁钟,这些铁钟高达两米以上。宋代山西还是全国铸造铁钱的基地之一。宋统治者为了弥补军费之不足,常在河东路铸钱。太原、五台、平定、交城都有铸铁钱点,尤以交城出铁好,用于铸钱最佳。山西不但在当时大铸铁钱,而且在其他地区铸铁钱感到用铁不足时,就用山西的铁来补给。宋代山西的铁除用于制造器物、铸钱和为北方兄弟民族使用外,还将一部分铁运到附近地区作为炼钢的原料。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予出使至磁州(今河北磁县)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但取精铁煅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明莹,磨之黯然,青而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生也。磁州锻坊乃山西铁也,晋铁之多钢即此可见。

辽金时,山西北部冶铁也有较大发展,大同府的铁还被列为贡铁。这一时期,山西北部地区铁器的运用也很广泛。农业、畜牧业、交通、生活及宗教等方面都离不开铁。现存的辽金铁器有:应县木塔上立的铁刹,为1059年辽道宗清宁二年(1059年)所造。天镇县夏家沟地窑出土物中,辽金时代铁器很多,种类有:铡刀、车辖、轂圈、羊毛剪、车穿等物,可见铁器运用之普遍。此外,徐沟、潞城、晋城、代县、陵川、河津、介休、乡宁等地均有辽金出土铁物。元代对铁器和铁冶的生产,采取了政府管理的办法,将铁制手工业者集中起来进行冶炼制造。元太宗八年(1236年),设冶铁炉于大同,将各州县冶炼户760家集中到大同炼铁。这种办法,将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集中起来进行冶炼,便于管理。次年,又在交城县设点,集中各州县冶炼户

1000多,规模较前更大。元统治者还在山西地区设置专管冶铁的官吏。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设立河东都提举司掌管河东全路的铁冶,管理着河东8个铁冶,这8个铁冶是:大通、兴国、惠民、利国、益国、闰富和两个丰宁冶。第二年,又在五台县设置铁冶提举司。山西博物馆现存山西省元代出土铁器有:斧头、斧锤、铲刀、胶锅、柄腿铁锅、镢头、铁锁、秤锤、绳鞭穗、手铐、狼牙锤、钩兵、刀、矛。《临汾县志》载:城内东岳庙有元代十八罗汉铁像。另外,在山西的繁峙、太谷等地有元代铸的铁钟。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冶铁,无论规模、产量、技术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成为当时中国冶铁生产的发达地区之一。明代山西的铁矿产地有32州县,即晋城、长治、壶关、平定、盂县、榆次、孝义、平遥、汾西、临汾、洪洞、翼城、高平、阳城、交城、太原、阳曲、五台、吉县、朔州、山阴、繁峙、右玉、永和、乡宁、稷山、绛县、怀仁、清源、静乐、介休、灵石,占当时全国246个铁矿产地的12.6%,居全国第一位。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年),在全国设立了13个铁冶所,山西就有5个。吉州(今乡宁)有2个,太原有1个,晋城有1个,潞安有1个,全国冶铁所每年要供给国家746万余斤铁,山西地区所属冶铁所每年提供给明政府的铁不下200万斤。明代较出名的铁是交城县产的铁,叫做“云子铁”,专门用来制造兵器。民间小规模冶铁并无断绝。《续通典》说:“令民得自采炼每三十分取其二。”政府从中征税。山西小规模手工业冶铁业在地区分布上较前增多。平定、朔州、潞安、泽州、太原、交城、榆次、繁峙、五台、临汾、洪洞、乡宁、怀仁、孝义、平遥、壶关、高平、阳城、灵石、介休等均有铁冶。山西潞安府铸造的铁鼎还远销山东。当时一些铁器上都铸有铸造者的名字,如现存大同市下华严寺天顺六年(1462年)造的一口钟,用铁3300斤,上刻有:“铸匠:曹贵、男曹仲清、次男曹荣、曹仲英”。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铸铁钟,高约1.5米,刻有一万余字及鸟兽花纹,现置晋祠庙钟楼,钟上亦有铸者姓名,

这样的文物,太原、大同、五台、盂县、介休等地均有发现。从器物所铸文字中可看出,当时的手工业制铁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家庭成员充当主要劳动力。

清代,山西手工制铁已很发达,无论是铁产品的数量还是工艺均达到相当水平,一些地方还成为我国主要产铁供铁区之一,对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起了一定作用。1725年至1809年,清政府每年在山西征用“平铁”、“好铁”,数额较大。雍正三年(1725年)征用平铁80498斤,雍正十年(1732年)又增加“好铁”23678斤,嘉庆十四年(1809年)改为20万斤。据记载,雍正八年(1730年)陵川县有铁钉铺12家。乾隆、嘉庆年间,长治荫城镇成为铁货集散中心,每年铁货交易额都在1000多万两。道光年间,晋城全县就有生铁炉1000多座,熟铁炉100多座,铸锅炉400多座。那时,山西的“潞铁”、“平铁”是很出名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来山西考察后说:“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以前,是有几亿的人是从凤台县(晋城)取得铁的供应的。……大阳(晋城大阳镇)的针供应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且远销中亚一带。”^①山西保德、晋南新绛、平定等地,冶铁都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清代山西生产的铁钉,销路很好,光绪《山西通志》卷一〇〇载:“潞铁作钉,为南省造船所必须,取其易生锈也。”清代山西手工铸铁业规模还不小,仍是以家庭生产为主,但有分工协作,铸铁手工工人已作为一种固定职业而存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的入侵,山西地区的手工业受到打击,直接原因就是外国输入的铁迅速增加,排挤了土铁市场。以铁和针为例,1867年至1894年的20多年中,铁和针的进口量就增加了15倍还多。外国资本主义还在中国开办炼铁企业,或是以投资、贷款等方式控制中国钢铁企业。一英国人曾计算过山西铁业的

^① 《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卷二。

利润：“今山西炉家所用之铁条，极贱之价，据云每吨英银五十九先令；苟日后用之者益多，价为之涨，英公司可将此等铁条每吨以六十四先令出售。”^①山西煤铁开采权曾被清政府出卖，后经山西人民力争，才于1908年赎回自办。处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山西近代新式炼铁业受到限制。山西铁器的销售量和总产量大大减少，原来销售到全国的山西铁货，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销路只限于中国北部了。晋城一带的铁针最盛时行销全国各地，但在洋货排挤下也趋于冷落。

山西制铁业衰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清政府的勒索。咸丰时，太平天国革命兴起，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在各地搜刮铁产，制造兵器。咸丰四年（1854年）命山西省每年办解“高生铁”100万斤，直到1859年才停止。这种勒索更加速了近代冶铁手工业的衰败。清初以来，制铁已有多种苛捐杂税及官吏的勒索，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摊派，这是促使山西手工业衰败的又一重要原因。1852年，清政府放宽了开矿限制，山西采矿制铁又有新起色，出现了许多新的冶铁点。左权县石港富保堂铁厂即开设于咸丰四年，每年产生铁180吨，规模相当大。晋城的大阳镇和高平县是冶炼生铁的中心。制造铁器和锻造熟铁以晋城的南村、阳城县和潞安为盛，仅南村一地就有铁作坊100多家。晋城小铁铺就有几百家，并且相互间有着分工，每个铺子各做一种铁器，潞安亦有很多，制成品有：铁丝、铁钉、平锅、蒸锅、犁面、铁箍以及各种铁具。成品运到河南清化镇，然后转运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湖南、湖北、江苏等地销售。当时，从晋城、潞安通往河南的道路上运输铁货的车辆来往穿梭，络绎不绝，到1902年，山西高平有铁矿炉一百五六十座，每日出铁七八万斤，年产铁一万五千吨左右。长治南乡有炉二三十座，每日每炉出铁三四百斤，年产万斤上下。长治的荫城镇是当时铁货生产和交易中心，有铁行30多家，制铁器的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

炉 300 多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在山西大量收购生铁原料,各种铁板曾销往日本,这一时期,山西铁产品的价格有所提高。1919 年前夕,山西手工业制铁的分布主要以这五个区域为主:

(1) 平、孟铁矿

1919 年前,平定有开采铁矿的铁矿窑 14 家,昔阳有 6 家,阳泉和保晋铁厂属新式冶炼。和顺有炼铁厂 3 家,每厂有生、熟铁炉各 4 座。每炉可炼生铁 1000 斤,3 家铁厂每年共产铁 640 吨,左权有铁厂 3 家,每年产铁货 560 吨左右,所制农业器具,除供应本地外,还销往河北、河南等省。

(2) 太原西山铁矿

在今太原市西山王封、河口镇一带,均是土法采炼,炉体较大,每炉可炼熟铁三四千斤,王封镇当时有 5 个制铁厂,每年约炼熟铁货 41 吨,河口镇有炼铁厂 16 家,每年可制铁货 165 吨,产品销往晋中、晋西及陕西一带。太原市晋源镇柳峪一带也产铁,柳峪有铁厂 1 家,年产铁 18 吨左右。交城县狮子河亦有小规模采炼,年产多者万斤,少者数千斤。

(3) 隰县铁矿

隰县东北一带小规模炼铁很多,较有名的铁厂有 44 家,方炉比晋城、高平等地大,每炉可出生铁 5000 斤,每年共产生铁约 2000 吨左右。熟铁行销陕西、洪赵、太原、汾阳等地。乡宁、闻喜也有产铁。

(4) 临县铁矿

临县铁产以招贤沟最著名,有铁厂 17 座,每厂有工人 4 至 8 人,以铸造生铁器具为主,如锅、壶之类。每年约产 2600 多吨,产品除本地消化外,还销往离山、陕西、绥德地区。保德县的铁匠铺村是当时主要产铁区,沿用土法炼制,炼生铁用槽炉,中阳县亦有小规模开采。

(5) 高长铁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治一带是山西铁货业交易中心,仅长治

荫城镇每年铁货交易额就达二百余万元。每年成交生铁货 5 万吨左右,熟铁货 3600 吨左右。长治当时有铁厂 2 家,生铁炉 13 座,炒铁炉 2 座,年产铁 1160 余吨。壶关仓县有铁厂 11 家,各厂共有生铁炉 22 座,每年产铁 333 吨。陵川县有铁厂 12 家,各有生铁炉 2 座,年产生铁 500 余吨。晋城铁业在当时无论从规模还是技术工艺上讲都堪称上流。共有生铁炉 400 余座,熟铁炉 50 余座,铸锅炉 200 余座。1916 至 1917 年间,晋城有方炉约 470 座,炆炉 62 座,条炉 248 座,锅货炉 150 座,铧炉 13 座,碎货炉约 1500 余座,每年生产铁货 34000 吨左右,从事冶铁的工人约 12000 余人。如果再加上运输、货栈、临时工、挖矿工以及家庭短期副业的人在内,约有 10 万人。高平有炼铁炉 62 座,年产量约在 15000 吨以上。

在经营方面,规模不大。临县招贤沟有 17 家铁厂,平均资本 369 元多,各厂人数 4 至 8 人。太原王封镇和河口镇共有炼铁厂 21 家,平均资本为 116 元多。

在管理方面,铁厂设有经理、采购、会计等职,工人均是半工半农,农忙时参加农业生产,农闲时开工炼铁,铁业工人工资很低,《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载:“查晋省在十年前工资极为低廉,其数皆以制钱或小洋计算,普通工资不供食者大约每日制钱六千文至八千文。”各地铁价不统一,税收也不同,除冶铁收费外,采矿石也收税,省里要税,县里也要税,还有各种摊派,1914 年山西地区的矿区税、矿产税达 42315 元。1918 年以后,外国输入我国的钢铁数量又多起来,国内的机械冶铁也迅速发展,山西制铁手工业产量有所下降,但在制成品的加工、品种种类及铸造工艺上都有了非常喜人的进步。产品品种有:农具、运输工具、锥子、剃头刀、鞋钉、家具钉、桶圈、茶壶、笼等各种产品至少在 2000 种以上。以晋城生产的铁锁为例,有圆锁、方锁、侯马锁、五道箍锁、炮锁、顶方锁、牛圪铃锁、小方锁、牛蛋锁等十余种,产品不仅供当地人民使用,且远销河南、山东及南方各省。仅晋

城一地,每年输出铁货值洋 147 万余元,长治荫城镇铁货交易额每年达 40 多万。全县参加炼铁或间接炼铁人员几乎占到三分之一。当时的手工制铁大致有这样两种经营方式:一是资方经营铁炉,雇用工人进行生产,这种方式比小手工业规模大。二是分散经营,这种形式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有时也雇用少数工人,所用生产工具十分简单。

山西手工制铁工人的工资很低,每日工资最高者为 0.21 元(不供伙食),普通者为 0.16 元,最低者只有 0.1 元。与邻省制铁工人相比,山西制铁工人的工资是最低的。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社会地位低,被看成是“下等劳动之业”,工人生病不给工资,生产达不到规定标准或请假过了期都要扣工资。产品滞销时无工资,产品价格下降时,工人工资也自然下浮。

三、铁的铸造技术及工艺

春秋时,晋国就能用铁来制造斧、刀、凿等手工产品,并且已能够将成文法典铸于铁鼎之上。

汉代,山西地区冶铁手工艺已有相当水平。从出土文物看,不但制作生产工具,而且制作生活用品。例如,在太原出土的汉代铁压袖、铁镜,在太原卧虎沟出土的铁戟,在永济薛家崖出土的锯条,五台山阎家寨的汉代铁釜。

北齐时,曾在晋阳为监馆的綦毋怀文发明了“锤炼法”与“淬炼法”,使铁成钢,这是冶铁史上划时代的大进步。

唐代,山西的冶炼制造工艺达到较高水平,出现了许多驰名全国的精品。太原剪刀就非常有名,杜甫及卢纶都曾作诗赞美并州剪刀。杜甫诗曰:“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卢纶诗曰:“并刀难缩竟何人,每成此物如有神。”除剪刀外,太原制造的铜镜、铁镜均被

列为朝廷贡品。唐代乔琳亦曾作《铁镜赋》来赞美太原铁镜。开元十九年(731年)在蒲津(今风陵渡)建造蒲津桥,铸铁牛四只及驱牛铁人。考古工作者经仔细观察分析,发现当时铸铁牛时,是先将铸铁块叠置牛腹内,然后,将融化了的铁水浇灌其中,使铁牛与铁块熔为一体,巧妙而科学地解决了巨型实体铸件冶铸技术,也反映了当时山西冶铁铸造技术水平的高超。

宋代山西地区在冶铁技术上发明了用炭作燃料,采用土方炉炼铁,炼出“百炼钢”和“灌钢”。铸造也达到较高水平。晋祠圣母殿前莲花台上的4个铁人,有3个是北宋时铸造的,这几个铁人比真人还高,是用几块铁焊接在一起的。绍圣四年(1097年)铸的那个铁人腹部铸有109个字,姿态英武,久不生锈。可见当时翻砂、浇铸、冶炼、焊接已达到相当水平。晋祠圣母殿前飞梁桥头上有铁狮一对,上刻有宋政和八年铭文。荣河县铁人较晋祠铁人稍早,共8个,较晋祠铁人低。宋代,除铸铁人外,在乡宁、闻喜、武乡、曲沃等地均铸有不少铁钟,这些铁钟高度均达2米以上。

辽金和元代,山西人民用于生活的铁器逐渐增多,种类有:铡刀、车辖、轂圈、羊毛剪、车穿、铁锁、秤锤、手铐、狼牙锤、钩兵、刀、矛等。

明代,在冶炼技术上又有发展,“地下土圆炉炼钢法”,就是明代在山西潞安创建的。这种冶炼法设备简便,不用坩埚冶炼,在干燥的红土地下挖6尺深的坑来冶炼,用这种方法冶炼的钢富有延性,可以拔成钢丝,用作制针的材料。在勘探铁矿方面,明代山西的铁矿工,已懂得根据矿山泥土表面颜色(赤褐色)判断地下有铁矿储藏的勘探方法。明人宋应星说:山西铁矿工用“土面浮出墨块”方法勘探铁矿。还说:“凡土锭铁,土面浮出墨块,形似秤锤,遥望宛如如铁,捻之则碎土。……山西平阳则皆砂铁之数也。凡砂铁,一抛土膜即现其形,取来淘洗,入炉剪炼,熔化之后与锭铁无二也。”(《天工开物·五金》)明代山西不仅已普遍使用煤冶铁,而且用焦炭炼铁,大大提高了炼铁效

率。在铸造工艺上,不仅种类繁多,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铁钟、铁牛、铁狮等艺术品,且铸造技术工艺很见水平,特别是潞锅,物美价廉,颇受北方少数民族喜爱,成为明代山西地区周边贸易的重要交换物资。

清代山西铸造的铁器更多,工艺也更精美,现收藏于山西博物馆的铁缸,即是乾隆四十一年(1746年)铸造的,高1米,直径1米,用多块铁焊接而成,滴水不漏,反映了清代精良的焊接技术。道光年间,以生产“邢肉刀”著名的“邢铁炉”,在太原龙王庙街经营,买卖兴隆。

近代山西手工制铁在开采、冶炼、铸造等方面又有新的提高。在采矿方面,从地面往下挖坑道,有竖井也有斜井,矿井深度有几丈或20丈不等。最深的竖井深达百米。山西铁矿因埋藏浅,容易发现和开采,所以,一般开采无定点,哪里有矿就在那里开采。冶炼方面,均使用方炉冶炼。方炉由两层坩埚组成,每层150个,每个坩埚长约一尺一寸半,直径约五寸,坩埚内放置拳头大小的矿石和煤块,坩埚与坩埚之间,坩埚与地面之间都填充有煤块,用2至4人操纵风箱鼓风。制造用具时,就把铁水从坩埚里倒在地上凝成薄铁片,再熔铸成生铁器。锻造熟铁,就让铁水在坩埚中冷却,然后打碎坩埚取出再加锻制。铸造方面,也是用坩埚,把生铁打成碎块放进去,熔化后将铁水倒入模型中,制成各种铁器。铁器种类多达2000种以上。

第十一章 山西商人

第一节 古代晋商

一、地域与物产

山西古称冀州，虞舜分置并州，夏亦为冀州，周曰并州，成王时，封叔虞为唐国，后改晋国。春秋时仍为晋国，战国三家分晋以后，山西北部为赵地，太原为赵国都城，南部分别隶属韩、魏。秦置太原、上党、河东、云中、雁门、代等郡。西汉元封年间归置并州，时内蒙部分地区归并州、朔方刺史部，设朔方、五原、云中三郡。东汉袭之，朔方、五原、云中三郡归至并州，建安十八年(213年)时废并州，归至冀州。三国时，魏黄初元年(220年)复置并州，晋仍因之，永嘉以后，即公元312年以后，为戎狄领有。北魏皇始元年(396年)仍置并州，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改司州为恒州，另分朔、晋、显、蔚、建等五州。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山西有并、朔、恒、肆(北达繁峙，南抵阳曲，东起静乐、宁武，西至五台、孟县)、汾五州，北魏末永熙年间(532—534年)改朔州为云州。北齐合州置省。后周建德五年(576年)平齐，置并州总管府。隋统一后，于开皇二年(582年)废总管府，

设河北道行台，次年罢郡为州，九年废行台，设并州总管。大业元年（605年）罢府，三年改诸州为郡，属冀州刺史。大业八年（612年）山西有河东、长平、河内、临汾、上党、西河、龙泉、文城、太原、离石、楼烦、雁门、马邑（治所在今朔州）、定襄（包括长城以北的和林格尔、呼和浩特等地）十四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复改诸郡为州，置并州总管府，另分置蒲州、潞州两个总管府。开元年间分置河东道，天宝以后，设河东、河中、泽潞等三节度使。五代时，晋于天福初年割蔚、朔、云、应等州与辽。北宋时山西境的大部分地区属河东路，北部为西京道属。云州属辽后，辽新设西京道，但宋宣和四年（1122年）复归宋所有，改称云中府路。七年，二路同入于金，为河东、西京二路。再过五年，分河东为南北路。元置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治所在大同，领大同、冀宁、晋宁三路）与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治冀宁，领大同、冀宁、晋宁三路）。大同路包括今天内蒙的包头、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等地，冀宁治所在太原，晋宁在临汾，统属中书省。明洪武元年（1368年）置山西行中书省于太原，区划与今日的山西大体相同，当时繁峙、宁武、偏关以北地方和内蒙的呼和浩特等地属山西行都司的范围，治所在大同。清代沿袭此制为山西省，分设四道（冀宁、河东、雁平、归绥）九府（太原、潞安、汾州、泽州、平阳、蒲州、大同、宁武、朔平）、十直隶州（平定、沁州、辽州、霍州、解州、绛州、隰州、忻州、代州、保德州）、六厅（绥远城厅、归化城厅、萨拉齐厅、托克托城厅、和林格尔厅、宁远厅）。光绪《山西通志·风土记》载：“夫山西，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之外蔽，而句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形成了鲜明且富有特色的自然环境。民国地方行政区划大体沿袭清制。为地方行政管辖之便，民国政府把长城以北地方，如原属山西的丰镇、兴和、陶林、凉城和原属直隶省的多伦、张北（旧张家口）、独石等地划归兴和道，并将旧归绥道的一部分划为绥远道，使之成为与省制相分离的特别行政区，设

都统加以统辖。至此山西的版图基本固定为今天的模式。

南北长、东西狭的山西自古山多土瘠天寒，纯农业经济几乎养活不了这一方土地上的人。正如《晋乘搜略》卷二载：“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士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太原以南多服贾远方，或数年不归，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太原以北，岗陵邱阜，硗薄难耕，乡同民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待命，无平地活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兼拙于远营，终岁不出里门，甘食蔬糲，亦势之使然，而或厌其嗜，或病其节啬，皆未深悉西人之苦，原其不得已之初心也。”不过晋省也因其狭长的地区而形成了明显特色的经济带。晋南以盛产盐、铁和绸成为富商的集聚地，矿产分布均衡，农副产品品种齐全，又使得山西南北都有可供买卖之物品，当代山西则因煤炭工业而成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地瘠民穷，然而丰富的煤、铁、盐等资源，又成为山西商人发展的有利条件。明人顾炎武说：绫，太原、平阳、潞安（今长治）三府及汾、泽（今晋城）二州俱出；绸，潞安、泽州皆有；帕，出平阳府，潞安、泽州都有，惟蒲州府（今永济）及高平县米山出者尤佳；铁，各处都有，冶惟阳城俱出尤广……铜，代州凤游谷及垣曲县北山俱出；又潞安府长治县有炉；锡，交城、平陆、阳城俱出；瓷器，霍、吉、隰三州及赵城、汾西、岳阳、河津等县俱有窑（《肇域志·山西》）。

二、历史悠久的山西商人

古代晋国是商业比较发达的诸侯国，曾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较高的商业文化，晋商在我国商业发展史上有很大成就，博得历代学士文人和商贾大家的称赞。

山西最早的商人见之于史书的有计然、猗顿、白圭等人。《史记·

集解》引徐广之言：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筭。”裴駮按语：“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很明白，这是说计然祖籍晋国，系晋国贵族之后，曾经商为贾，是晋国最早最有名的商人，后来南游越国，越大夫范蠡师从，计然授予范蠡经商理财之术，强国富民之道。计然指点范蠡经商之诀窍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所以范蠡在帮助越王灭吴之后，用计然之策，变名易姓，治产积居，富至万万，成为春秋时期最大的富翁。司马迁还记述了晋国的另一著名商人猗顿，关于这位大商的笔墨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猗顿用鹽盐起……而与王者埒富。”却表达得再明白不过，由此可以知道古老的山西那时已经有了闻名全国的大商人。《史记·集解》称：“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陶）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牴（母畜、五畜总称）。’（顿）于是乃适西河（今晋南），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货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这里说的陶朱公就是前面说的越国大夫范蠡，猗顿在范蠡的启迪下发了财致了富。也有人讲猗顿也是我国最早的珠宝商人，《淮南子·汜论训》载：“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的说法。关于猗顿致富的途径说法有二，一是以盐致富，一是畜牧而发，不管猗顿以何种方法致富，他都是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有了成就的，这是古代山西的一位懂经营善理财的能手。

《史记·货殖列传》里有这样的记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正义》解：种在恒州石邑县北，盖蔚州也。代今代州）。种、代，石北也（《集解》徐广曰：石邑县也，在常山）。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慎伎。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僇悍，而武灵王

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西贾上党（泽潞等州），北贾赵、中山。”这就是说，山西人经商的地域是比较广泛的。在古老的三晋大地上留佳话的又一位大商人是战国时的白圭。对于他的籍贯，我们了解不多，正史只说他是周人，但因为他和李悝同时担任魏文侯的国卿，我们认为白圭是三晋商人的可能性很大，他的经商活动范围大约在今天晋南一带的魏国疆域。当时李悝治农，白圭佐商，白圭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战略思想，建议魏文侯“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他的这一经商诀窍，成为后世历代商贾恪守不渝的生意经。

三、晋国的商业

这里说的晋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山西概念。春秋时期，晋国为了运销他国的剩余产品，曾采取“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大大激发了晋人经商的热情，朝野上下出现了经商热潮，打破了从前那种“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粟”的经济僵局，以致晋南绛邑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晋国自公元前十一世纪初叶周成王封叔虞为唐侯起，到公元前678年晋武公以旁支取代晋国国君的几百年间，基本上处于“百里偏侯”的闭塞时期。这时期关于晋国的记载不多。直到公元前676年曲沃武公之子献公执政后，伐国拓土，并吞翟、虢、虞、冀、黎、郇、董、韩、魏、贾十个小国，把国境扩展到黄河西岸和南岸，获得解芮之盐、垂棘之璧、屈产之乘，晋国开始走上富足之路。又过了40年，晋文公当政，晋国经济快速发展，“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晋国商业从此发达兴旺，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阶层——晋国商人。这时出现的商人是官商，当时晋文公采纳了狐偃之谋，行被庐之法，推行“工商食官”制度，由公室统一经营管理工商业，这是一种官营工商的体制，从而出现了晋国历史上最

早的官办工商业,也产生了一批最早的“商官”。文献上虽然没有发现公开委派商官的记载,但献公时参与铲除“桓庄之族”、后来又担任“城绛”的建筑以扩建绛都任务的,身为晋国大司徒和大司空要职的士芳,既要担负城建工程,就必须经管征调大量的建筑物资。晋悼公时,身为司马的魏绛就建议悼公“戎狄荐处,贵货而易土,予之赏获其土,其利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穡人成功”(《国语·晋语》)。晋国与戎狄之间的贸易,主要以丝麻织品、陶器、食盐、粮黍、日用工具换取皮革、马牛等畜产品,魏绛出使戎狄进行和戎活动时往往就肩负着物资交易、互通有无的使命。公元前584年,晋景公派出从楚国投奔晋国被封为邢公的申公巫出使吴国,申公巫教了吴人乘甲射御及战阵之法。晋国盛产木材、竹、谷、野旄、玉石及铜、铁之类,吴有鱼、盐、黄金等物,申公巫使吴之后,出现晋、吴和睦相处的几十年睦邻友好关系,这种友好也是建立在双方物质利益交换基础上的。晋国形成“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国语·晋语》)。

从出土的文物中也可以看出古代晋国商业的繁荣景象。比如晋国在广泛的商品交换活动中,就产生了作为流通媒介的早期货币,已发现的晋国货币有:西周的贝币,春秋的铜质仿贝和包色金贝以及原始布、空首布。有人统计,考古学家和古币研究工作者从各种古代钱币中辨识出290多枚晋国各地铸造的布币,其中发现铸有“智”(临猗)、“留”(屯留)、“示”(祁县)、“同”“是”(沁县)、“虞”(平陆)、“亘”(垣曲)、“古”(运城)、“吕”(霍县)等字样的钱币,不过也不排除晋国国君、公卿、大夫在各自封地上铸造使用货币的情况。《后汉书·独行传》就有太原人王烈避地辽东经商作贾的记载。日本人佐伯富认为: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附近匈奴遗址发掘的瓷器,证明了汉代的太原至和林之间有一条古代的商路。《后汉书·第五伦传》载:第五伦曾载盐往来太原、上党之间。第五伦是与刘晏齐名的理财专家,

这则史料说明当时大宗物品的调运是由官商进行的，一般商人只是做点事关小民生计的小买卖。魏晋南北朝以来，山西是全国政治军事活动的一大中心，商业活动也相对频繁一些，就是在封建政权或地方割据势力称雄的时代，商人也积极参与对政权的支持。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就曾委用“家世货殖，资累巨万”《魏书·莫含传》的繁峙商人莫含为从事，后来，莫含又受北魏猗卢之聘，常参与北魏的军国大事。

四、唐宋时期晋商的贸易活动

隋代山西的晋阳，是黄河流域仅次于长安、洛阳的政治、军事中心，商业活动是很频繁的。唐时因太原为李唐创业的基地，受到各君王的重视，特别是李唐王朝打江山的岁月里，曾得到山西商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武则天的父亲就是从商人起家的。武士彠由商而官的事迹新旧唐书都有记载，武士彠对李氏父子起兵在财力上给予了有力支持，所以在李唐政权中也获得了莫大的殊荣。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研究宋代商业的过程中发现：宋代发达的商业，基本上可以由显著的城市化现象、全国性市场网络形成与农业的商品经济化等许多方面得到证实，当时，粮、盐、香药以及绢等产品已经作为主要的流通物资而出现在市场上了。宋代山西的商业在全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大的飞跃。仅太原境内就有五台、平定、榆次、交城几处冶铁之地，而交城是全国性的一个冶铁中心。太原制造的铜镜，畅销全国各地，被列为山西的贡品。太原城的南关一带，逐渐形成了工商业集中的区域。有的学者认为：近代太原的米市街、南市街、柴市街、菜市街，就是宋代的米、柴、菜与日用品的交易市场。当时的太原商人也很活跃，据《宋史·夏竦传》载：夏竦“在并州使其仆贸易……积家财累巨万”。《宋史·张永德传》记载：“永德……并州阳曲人，家世饶财……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出徼外市羊。”张永德财大气粗，当

宋太祖娶孝明皇后时,曾出缗钱金帛数千相助,所以“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元代山西的商业也是相当繁荣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道:“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更加出名。这些军械,专供皇家的军队使用,十分便利。这地方葡萄数目很多,葡萄产量十分高,其他水果也很丰富。由于大量种植桑树,养蚕业极为发达。”(《马可·波罗游记》第37章)

第二节 步入全盛的山西商人

一、晋帮商人的崛起

明清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在全中国范围内成为一支劲旅,与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密切相关的,这也就是本章谈到山西行政区划的主要原因。晋商在明初崛起,主要是这样几个因素促成的。

第一、开中法的实施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明初,朱元璋为巩固其政权,多次出兵塞北,在扫除北元残余势力方面花了不少人力物力。明政府在北边实行了诸如民屯、军屯政策,开中制也是解决边镇屯兵军饷的主要手段。《明史·食货志》载:“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开中制的实质是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国家换取盐的专卖权,控制食盐产销的国家政权机构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出榜召商。应召商人则把政府需要的粮食实物代为输送到边防哨所,换取盐引,凭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并在指定行盐地区销售,这套制度就称作开中。开中制最初实行于山西大同。洪武三年(1370年)山西行省建议:“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陵县)运至太和岭(在今山西马邑),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

目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史·食货志》)当年九月,明政府召募商人往洛阳、开封、怀庆(今沁阳)、西安、凤翔、临汾等地输粮而与之盐。并规定输粮至洛阳一石五斗、开封及陈桥仓二石五斗、西安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输米西安、凤翔二府二石,河南、平阳、怀庆三府二石五斗和蒲、解、陕三州三石者,给解盐一引。洪武四年(1371年)又规定:“输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洛阳)、陈州诸仓,计道里远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明史·食货志》)明朝的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宁夏、甘肃、延绥、固原、蓟州九边驻军地,除甘肃、固原、蓟州三镇外的其他六边镇均可换河东盐引。纳米开中实施后,商人因运粮至边路远费繁,就在边境雇人耕种生产粮食,商屯应运而生。商屯的出现,于国于民于商均有便利之处。“商人自募民耕种塞下,得粟以输边,有偿盐之利,无运粟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力,便二;兵卒就地受粟,无和籴之扰,无侵渔之弊,便三;不烦转输,如坐得刍粮,以佐军兴,又国家所称为大便者。”(《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一)山西位于长城内侧,明代的北方边镇均在长城沿线,九边镇之首的大同和山西镇均在境内,宣大总督所辖宣府、大同两镇的宣府也邻近山西之地,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大同在北边的重要地位,马文升讲过:“我之所恃以捍御北瞄者,惟大同、宣府二镇,以为藩篱。”(《明经世文编》卷六四)当时大同、宣府的军队布置最多,九边镇驻军超过10万的有三处,据永乐年间的统计数字为:宣府官兵151452人,大同135778人,固原126919人,兵多马多,所需军饷数额巨大。于是,山西商人以临接边镇的优势,捷足先登,大同、宣府和西北边镇成为山西商人的活跃之地。曾任延绥巡抚的涂宗浚说:“召集山西商人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前去江南投司,领引发卖。”(《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七)由于当时报中地点在九边,因而盐商主要由沿边商人组成,“其中秦、晋的富户逐渐垄断了报中特权,形成明代最早兴起的

地方商人”^①。不论是输粮还是纳米开中，商人所得盐利都是很可观的。山西商人集粮、盐商于一身，在开中制初始时就占了地利人和之先而兴起于商界。

第二、山西的地理条件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便利。古代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马一类的物资主要取自北方蒙古地区，而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山西位于两个不同经济区域的中间地带，山西商人有南北区域的物资交换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从汉代起，就有着蒙古草原通向中亚和北亚的两条商道：即东起辽东，经燕山、阴山北麓，西奔戈壁阿尔泰山，走天山北麓到中亚；或经漠北高原、西伯利亚高原到欧洲，有人称之为“草原丝绸之路”^②。在这草原丝绸之路上，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山西商人。到了元代，北方各国由陆路通商者，就以大同、宣府为通商口岸，经山西等地运去了大量的物品。到了明代，明朝与蒙古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南北物资交流活动始终没有中断。隆庆年间，明朝与北方蒙古俺答封贡议和互市的活动中，山西官商合体家族成员的活动也是不容忽视的。蒙汉议和、开边互市协议达成之后，官府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其中不乏山西商人。

第三、山西丰富的盐铁等资源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物质保障。开中制实施后，解州盐池就成了宣府、大同纳粟开中盐场。《河东盐法志》卷6载：“明洪武河东运使岁办盐引分拨山西、河南，分盐开中于宣大，凡遇开中盐粮，务要量其彼处米价贵贱及道路远近险易定夺则例，立案具奏，出榜给发，各司府并运司张挂召商中纳，仍先编置勘合并底簿发各该布政司并都司卫分及收粮衙门收掌，如遇客商纳粮完，填写所纳粮并该支行盐数目，会客商赍赴各该运司及盐课提举司昭

① 薛宗正：《明代盐商的历史演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② 陆思贤：《关于草原丝绸之路》，《内蒙古社联学刊》1991年第9期。

照数支盐,其底簿发各运司及盐课提举司收掌,候盐客商纳米完资,执勘合到,比对殊墨字号相同,照数行场支盐。”这也就是说,开中以后,解州池盐的产运销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运城盐池的产盐量因此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平常年间的产盐量也在7000余万斤之上,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年)、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和三十一年(1552年)的产量均在620000引,一引200斤计,合1.24亿斤,而在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产盐量为1440700引,合2.88亿余斤。这是宋代平常年产量的将近四倍。明初盐户达到8000多,盐丁20000多。万历时“准半报以恤久困,每十车,五车工本,五车自报,”天启时“劝民自备工本浇晒,每十车,准三车工本”(《天下郡国利病书·山西》)。这种产品分配比例,激发了商人经营的积极性。开中纳粟改为开中纳银后,盐利倍增,盐商人数竟至500余家。而明代山西冶铁生产,无论其规模、产量、技术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成为当时中国冶铁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明代山西的铁矿产地有32州县,即晋城、长治、壶关、平定、盂县、榆次、孝义、平遥、汾西、临汾、洪洞、翼城、高平、阳城、交城、太原、阳曲、五台、吉县、朔州、山阴、繁峙、右玉、永和、乡宁、稷山、绛县、怀仁、清源、静乐、介休、灵石,占当时全国246个铁矿产地的12.6%,居全国第一。明初全国有官营铁冶所13处,其中在山西设置的官营铁冶所就有5处,即洪武七年置的平阳府吉州富国、丰国二冶,太原府大通冶,潞州润国冶,泽州益国冶,除大通冶在洪武三十年罢置外,其余四矿皆在洪武十八年罢。洪武初,全省生铁产量居全国第五位,其中山西交城云子铁质地优良,善为兵器,所以政府规定,山西每年上交云子铁10万斤作为兵器之用。由于官营不善,洪武后期政府被迫取消官营,允许民营,官收课税,每三十分取其二。民营铁冶迅速在山西发展起来,如阳城、太原、平遥、盂县、交城、安邑、大同等地都有了民营铁冶,山西的铁产量大幅度上升。在冶铁生产中,普遍使用煤冶铁,而且还用焦炭炼铁,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同时,在铸造工艺上,种类繁多,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铁钏、铁牛、铁狮等艺术品,深受蒙古牧民的欢迎,是明代北方边镇马市的重要交换物资。潞绸是山西又一项重要资源。明代北方丝绸业中心是山西潞安府,这里出产的潞绸以质地精美闻名于世。由于产品质量好,受到市场的欢迎,产量日增,上贡数额在产量比例中逐渐退居次要。到嘉靖、万历时,潞绸成为全国畅销商品。明人郭子章说:“潞城机杼斗巧,织作纯丽,衣被天下。”(《郭青螺先生遗书》卷一六)当时年产潞绸在10万匹以上。其花色丰富多采,不仅流行于广大汉族地区,也为北方蒙古牧民所喜爱。顺治《潞安府志》载:明代潞绸除“贡筐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行于外夷,号称利藪”。山西还是我国最早发现利用且资源特别丰富的煤炭地区。煤区广布,煤质优良,是明代产煤最多的一个省。山西高平“独煤甲于天下”。政府对煤炭的开采管制较其他金属矿松弛,一般只抽税,甚至有免税的时候。煤炭的生产和作为商品的流通发展很快,省内的贩卖自然不必多说,开始出现了由山西贩煤到北京发卖的商人。其他手工业在明代的山西也很发达,《明一统志》记载:山西代州、保德、曲沃、翼城、闻喜、垣曲产铜;交城、平陆产锡;临县产铅。矾产山西太行山一带,最盛者山西晋州(今临汾)。明代山西物产为山西商人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明代晋商的活动及其特点

明代山西商人主要长途贩运盐、粮、绸缎、铁器等物品。开中以后,山西商人特别踊跃,吕楠《赠秦宣府序》中有这样的记载:“夫宣府朝廷之门户也。……两淮、长芦、河东诸盐商皆业于此。”涂宗浚《边盐壅滞疏》中有这样的论述:“……延镇(延绥)兵马云屯,赖召买盐引接济军需,岁有常额。往时,召集山西商人,乐认淮浙二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前去江南投司,领盐发卖。盐法疏通,边商获得,二百年来,未

闻壅滞。”(《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七)两淮、两浙盐的行盐地,大体是直隶以及江西、湖广、贵州、浙江各布政司的辖区,山西商人的足迹无疑会遍布这些地域。万历《扬州府志·盐法志》载:“内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籍淮扬者,专买边引,下场支盐,过桥霸上堆候掣,亦官为定盐价,以转卖于水商。”明中叶开中制由纳粮改为纳银后,许多山西商人乘时随势转为内商,所以才会出现认淮浙盐引的情况。明人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五杂俎》)隆庆五年(1571年)与蒙古俺答议和后,不仅确保了明朝的长城沿线较长时间的和平,而且汉蒙之间开展了广泛的通商贸易。从这一年起至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政府先后在长城沿线开设马市13处,即宣府的张家口,大同的守口堡、得胜堡、新平堡,山西的水泉营,延绥的红山边墙暗门,宁夏的清水营、中卫、左浪、高沟寨和铧尖墩,甘肃的洪水堡、扁都口。据统计,在宣府、大同、山西(偏关)三镇,隆庆五年官市马7030匹,万历二年(1574年)官市马27000匹,万历十一年(1583年)官市马45000匹,隆庆、万历年间官市马一直处于上升势头。在开设官市的同时,民市也发展起来。民市自永乐年间就已经出现,但由于政府的限制,发展缓慢。隆庆五年明政府允许“官市毕,听民私市”,互市商品范围很广,内地以缎、绸、布、绢、棉、针线、梳篦、米、盐、糖、果、梭布、水獭、羊皮、金交换蒙古牧民的马、牛、羊、驼等大宗牲畜和皮毛用品,山西的潞锅特别受人欢迎,许多山西商人在互市中获取了厚利。隆庆五年民市贸易中的牲畜贸易额是很大的,起初民市贸易每年一次,后来发展到每月一次,月市外还有临时的小市。任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山西蒲州人王崇古讲道:“近访得北直隶、山西各处商贩,连年市获夷马,喂养有节,旋即膘壮,率得厚利。”(《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八)

明中叶以来,随着开中制的解体,晋商改变了经营战略和方向:

业盐的边商转为内商；经营项目由盐粮布生意转为多种经营；活动范围由纳粟开中地区转向全国各地发展；商人朋合为帮的组织形式出现。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变法，将开中纳粟改为纳银，商屯解体，边商衰败，内商兴起，大部分晋商转为专门业盐的内商。明人胡世宁说：“今山陕富民，多为中盐旅居淮浙。”（《明经世文编》卷一三六）以致北边出现“山西之大贾皆去，土著之资本几何”（《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七）的状况。在两淮盐集中地扬州，嘉靖、万历时有数百山陕商人，寄寓扬州的盐商，当时以秦晋商人势力最大。同治《两淮盐法志》载：“乔承统，字继之，山西襄陵人，明季贡生，父养冲，中盐，卒于扬州。”“李承式，字敬甫，其先山西大同人，中盐于扬州，承式登嘉靖三十五年进士。”“高帮佐，字以道，同山西襄陵人，随父中盐于扬州。”“杨义，字定元，号昆岳，山西洪洞人，其先业盐淮南。”蒲州人王瑶“货盐淮浙苏湖间，往返数年，资乃丰。”（韩邦奇：《苑落集》卷六）当然业淮盐的西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明中叶以后，山西商人仍牢牢把持着长芦盐区和解州盐区的产销。山西商人在盐业领域里，活跃在淮盐、芦盐、解盐的生产运销领域。同时，山西商人的经营范围扩大了许多，除盐铁外，还集中在粮食、棉布、丝绸、茶、绒货、颜料、煤炭、木材、烟草等各行各业。万历时曾有大同土商任光裕等因加派而纷纷告苦，说宣府为朝廷北门，河东诸盐商皆业于此地。明人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里讲道：“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及开则市者纷至，如赶集然。”明代浙东地区盛产丝绸，吸引了众多山西商人到这里收购贩卖，明人张瀚《松窗梦语》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缁帛者，必走浙之东也。”山西商人向更远的地方进发，由纳粟开中地区推向全国各地，在秦陇、辽东、北京、天津甚至长江流域都有基地，明人葛守礼说：“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过半。”（《葛瑞肃公家训》卷上）北京的颜料、纸张、干果、油、铜、铁、锡、炭、杂货等经营，多为山西人，在湖北、四川境内也有许多山西商人积极活动，甚至有了山西

商人“贩于海外”的说法。可见明代中后期山西商人的足迹真可谓是“半天下”了。

三、闻名海内外的清代晋商

顺治元年，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向皇帝进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清世祖实录》卷五）果然，顺治初年清政府把明末在张家口贸易、助清军有功的八家山西商人封为皇商，让他们正式入籍内务府，并赐居张家口主持张家口商务。历经明代200多年发展壮大晋商队伍，无论是经营经验，还是商业资本的积累，都趋于成熟，山西商人成为与徽商称雄并立的一大商帮，至此，晋商发展至全盛时期。

从清初至清末，晋商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晋商是旅蒙商人中的主力军，也是恰克图国际贸易的垄断商，及至票号问世，山西商人执清代金融之牛耳，起着清代中央银行的作用。康熙年间，清政府为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放宽与蒙古贸易的禁令，汉族商人被允许随军贸易，以解决北进清军的军需粮饷。由此开始了清代山西商人与蒙古各部的贸易活动。晋商利用驼队深入蒙古地区贸易，以多伦诺尔、张家口、归化城三处台站开辟了三条商道，用较为廉价的绸布、茶叶、烟酒和金属器皿及工具，换取各类牲畜、毛皮等畜产品和珍贵兽皮、药材。到“清代中期，蒙古地区商品交换贸易大权完全控制在与清政府官吏有勾结的旅蒙晋商手里，他们得到了官府支持，有恃无恐。”（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库伦（乌兰巴托）、多伦诺尔（今多伦）等地，山西商人开设了数以百千计的固定商点，在交易旺季，晋商以数万骆驼和牛马车投入运输，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道：“山西行商有车帮。晋中行商运货来关外诸

地,虑有盗,往往结为车帮。……每帮多者百余辆,……一御者可御十余车。”康熙年间兴起的山西大盛魁商号,专门组织销售蒙人所需商品和采购蒙古畜牧产品,每年运往蒙古地区仅砖茶3万箱以上,生烟2000多囤(每囤180包,每包1斤),从蒙古赶回的羊上百万只。晋商还通过蒙古草原,开辟了通往新疆的商路,足迹之远、胆识之大都堪称清代商界之首。晋商在清代对恰克图贸易的垄断是晋商经营国际性贸易的最大胜利。恰克图从雍正五年(1727年)起成为清代中俄边境贸易城,位于库伦北,清人松筠的《绥服纪略》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山西商人是最早赴恰克图的贸易商,也是恰克图最大的贸易商,清末路覆仁在《外蒙古纪闻》中写下了他的见闻,说当时几条街上的主要商号“都是晋帮商人”,经营的货物以红茶、砖茶、白绸为大宗。恰克图贸易的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其次是太谷县北洸村曹家。嘉庆五年(1800年)以后,中俄两方都有扩大贸易的要求,恰克图贸易进入繁荣时期。山西商人在此开设商号60余家,货物主要是茶叶,其次是绸缎和棉布,俄方是毛皮和呢绒、铁制品、牲畜等。晋商在国内声名鹊起,“京师大贾多晋人”,“都中设立帐局者,山西商人最夥”(《山西票号史料》第45页)。咸丰时京城当铺159家,山西商人开办的就有109家。嘉庆时,“放京债者,山西人居多,折扣最甚”(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101页)。在天津的盐业、当铺、颜料庄、栈房、烟草、杂货、票号中,有许多是山西商人开办的铺号。天津金融行业里,山西商人的势力很大,有人认为天津是山西票号的发祥地,当时平遥、祁县、太谷三帮都在天津设有票号,在东北地区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的记载(雍正《泽州府志》卷三七)。齐齐哈尔“商贩多晋人,铺户多杂货铺,客居应用无不备……”(《黑龙江外记》卷六)。光绪《山西通志》关于山西商人远走他乡游商各地的记载不少,清人徐继畲也有过山

西富户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的话。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客居扬州的山西盐商的活动。扬州是著名的两淮盐商集中地,当时有“南安北亢”一说,亢氏为“晋商魁首,家临汾,宅第连云,宛如世家”^①。据《扬州画舫录》载:“亢园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亢氏在扬州业盐时,与扬州盐务商总安麓村齐名,其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乾隆时,在扬州业盐的山西、安徽富商有100多家,资本总额在七八千万两,比万历时在扬州业盐的秦、晋、徽三帮商人的资本总额增加了一倍,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盛世的国库存银不过是7000万两,真可谓是富可敌国了。

清代山西商人在称雄国内的同时,积极向国外拓展市场。顺治二年(1645年)曾有山西商人东渡日本贸易,据江南巡抚奏称:“看得洋商乔复初等,其籍有山陕徽浙,于明季弘光元年(即顺治二年)三月初一日纳税给引,由定海出关。初十日,吴淞挂号泛海而达日本长崎。于今年正月初三日由日本开行。……所携货物,俱于长崎贸易而来。”(《明清史料》已编第1本)山西商人与日本贸易过程中,开始出现了“船帮”,“船帮”是康熙中期由著名山西皇商介休范氏家族首开其端,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由于范氏采办洋铜失利,山西“船帮”由盛转衰,与日本的贸易渐渐让位于沿海商人。晋商“驼帮”则是对俄贸易中的一支劲旅,十九世纪中叶,恰克图渐渐失去中俄通商口岸地位,贸易走向衰落,山西商人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呈请清政府批准“由恰克图出向俄边,即由俄卖与西洋诸商”。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奕訢奏准:“令西商领票运茶前往,先行试办。”山西商人大举入俄境展开边贸,在莫斯科、

^① 《康熙南巡秘记》,转引自葛贤慧、张证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赤塔、新西伯利亚等十几个俄国较大的城市里，设立商号分店分庄。聂昌麟的《太谷曹家资本兴衰记》载：曹家设在莫斯科的商号是锦泰亨，主要经营曲绸，锦泰亨每年可运销曲绸 12000 余匹，价值白银 36 万余两。当时做此生意的商号有 120 余家，锦泰亨是其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同时锦泰亨兼营绸缎绫罗绢纱以及茶叶，回手货是金沙、呢绒、毯之类的东西。山西大盛魁商号曾“独家以自己的骆驼队驮运茶货深入到俄国内地销售，结果它取得厚利”（《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12 辑）。山西汾阳人牛允宽开设的“壁光发”贸易中心，生意兴隆，盛极一时，对发展中俄、中蒙贸易有一定的贡献，并与英、美、法、德都有贸易关系。

四、山西票号

关于山西票号产生的年代，说法不一，主要有明末清初说、康熙朝说、乾嘉时期说和道光初年说。对于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为中国票号鼻祖，人们没有疑义。日升昌票号前身是平遥达蒲村李氏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嘉庆后期总经理是雷履泰，雷氏先在所属商号间以会票运现，后来就兼营起汇兑业务，大约在嘉庆道光年间，雷氏把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取名日升昌，是希望票号有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之意。因此说，山西票号最晚在道光初年已经出现。

日升昌票号开张后，业务发展迅猛，道光三十年（1850 年）间，就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十八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光绪十二年（1886 年）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市建立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 14 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一个帐期就获利 583762 两银。在日升昌

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投资票号。介休侯氏联合原日升昌副经理毛鸿将自己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几年间,获利丰厚。当时山西的票号有10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山西票号在光绪年间达到鼎盛,从过去的十来家发展到三十家左右。当时上海的主要票号都是山西人开办,票号遍及全国80多个城镇。与此同时,山西商人还在国外如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和日本大阪、神户、横滨、东京等地设立了票号。随着票号业务的发展,在山西票号界内还出现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票商。山西票号的业务活动主要是:对商号钱庄存放款,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汇兑京饷,汇兑海防经费,汇兑铁路经费,汇解协饷,汇兑河工经费,解赴赈款,借垫款项给各省及税关,汇兑庚子赔款,承办“四国借款”。诸如上述种种,山西票号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清代中央银行的职能。在山西票号影响下,江浙商人从同治年间起也开始建设票号,与晋帮票商一争高低。

五、清末晋商的衰落

辉煌五百年的山西商人在清末走向了衰落。衰败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贸易受挫。十九世纪中叶起,俄国获得一系列特权,深入中国内地攫取特产和推销商品。同治五年(1866年)俄国取得免征茶叶半税的权利,俄商贩运成本大大降低,在曾经是山西商人垄断的湖北、湖南茶叶贸易区建立茶栈,直接收购茶叶。俄商贩茶业务大宗成交,几年间的贸易额增加几倍,亏累的山西茶商转入他地,到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图的晋帮商号由盛时的120多家只剩4家,晋商要求清政府给予深入俄国境内的权利,并为了降

低成本,与俄商长期竞争,再次要求放宽边贸政策,走水路与俄争夺茶叶贸易,却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晋商处于被动中,与俄茶叶贸易量日减,到光绪末宣统初,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机制茶在成本、产量、质量几方面都占了优势,同时俄国政府对俄境华商征收重税,晋商在对俄茶叶商战中败北。第二、捐输、战乱,对山西商人是雪上加霜。山西商人几百年的资本积累固然可以炫耀天下,但清朝政府的各种摊派捐输从富有的山西商人手中掠夺了巨额白银。乾隆时,因大小金川起义,河东盐商捐助军饷 110 万两;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一次就向山西商人派捐 218 万两;道光年间,为筹措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向山西绅商派捐 200 余万两;咸丰间,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向全国各省以捐借名义筹积近 425 万两,其中山西捐银 287 万两,占全国捐银总额近 70%。从乾隆到咸丰百余年间,山西商人的大宗捐输已逾千万两之巨。近代百年,内外战争对山西商人打击沉重,比如,在太平天国时期,清军在山西商号密集的汉口时进时退,汉口不断遭受兵燹之灾,山西商人目标较大,致使汉口的山西会馆被烧,商号票号被抢,两次鸦片战争,给在京津的山西商号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世纪之交的庚子之变中,京城有 200 多家当铺遭劫,其中山西当铺占 90%;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也给山西商人造成很大的骚扰……接连不断的灾难使山西商人损失惨重,在内外战乱中被迫停业倒闭的商号各地都有,几百年的富庶毁于一时。第三、山西票商墨守成规,在清末银行改组时坐失良机。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天津官银号,山西票号拒不奉命。一年后,户部尚书鹿钟霖奉命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邀山西票号参加,票号总部既不入股,也不派人,就是在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后,再次发出邀请,山西票号还是没有参与,两次失去机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票号界有影响的平遥蔚字五联号的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联合山西近代企业创始人渠本翘与其他一些票庄的经理,要求总部

改组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不为所动,票号各家群龙无首,改组银行计划搁浅。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经借垫银款给各省承担庚子赔款汇解任务的山西票号毫无准备,放出的款项无力收回,存款者又挤兑现银,山西票号蒙受重大损失。此时总号向北京当局申办银行,国务总理熊希龄对晋商要求予以支持,同意政府出面担保向国外借款,不料,熊内阁很快倒台,恰逢欧战爆发,贷款一事成了泡影。先是坐失机遇,后来是机遇不佳,山西票号终未能挽回已去的大势。此外,还有其他客观的因素:首先,明清山西商人是封建政治的附庸,依附封建政权而兴起,又随着封建政权的衰亡而衰落;其次,江浙财团的兴起也是造成晋商步入绝境的一个原因。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线路的改变对山西商人的活动也产生很大影响。总之,进入二十世纪后,山西商人已由全盛的顶峰跌落下来。

六、山西商人创办近代企业

说到山西近代企业,无疑要谈起贡献最大的祁县富商渠本翘。这是一位爱国的开明绅商,也是山西最早的近代企业的创始者。还是在光绪年间,山西布政使胡聘之开设了官办的火柴局,但营业状况不佳,十余年后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渠本翘拉同乡乔雨亭入伙,作价接管火柴局,更名双福火柴公司,由官办转为民营,火柴生产能力大增,在双福公司影响下,1915年闻喜商人段连岭等集资创办荣昌火柴公司,1916年平遥商人赵鸿漠等创办金井火柴公司,1924年平遥富商冀全义等创办昆仑火柴公司,时人称此为山西火柴工业的黄金时代。

清末民初,山西商人在赎回矿权斗争中,以保护矿产资源、开办近代采煤企业形式,取得与帝国主义列强斗争的胜利。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朝当局将山西盂县、潞安(长治)、泽州(晋城)、平定、平

阳(临汾)五处煤铁矿权出卖给英国福公司,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英商在平定勘测和霸占矿地时,终于爆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运动。渠本翘等爱国绅商出面向山西各票号借银150万两,赎回矿权。两年后,山西商人、士绅组织了保晋矿务有限公司,推举渠本翘担任公司总经理,刘笃敬为副总经理,这是山西规模最大的民营采煤企业,对后世采矿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后山西商人又创办了电灯、纺织、面粉等一系列轻工企业,并在铁路交通等项建设中迈出了步子。但此时山西与江浙闽粤等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慢了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山西商人暂时退出了领导全国商界的舞台。

与此同时,洋货大量涌入山西南北各城镇。在太原这个省会城市里,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商场和店堂,如以出售京广货物、金银首饰、钟表眼镜为主兼营古董和服务的大中市、开化市,大型绸布庄,亨得利钟表眼镜店,华泰厚服装店,清和元饭店,林香斋饭店,乐仁堂药店等方便人们吃穿用的商店。还有钱庄、银号的大量涌现。过去的一些大商号大多进入了惨淡经营,康熙年间由太谷王相卿、祁县张杰和史大学三人合伙创办的大盛魁商号,曾是山西商人的大家,是乌里雅苏台最著名的商号,历经240多年,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告歇业,这是一个从清初活跃至民国的大商号。

第三节 晋商启示录

一、晋商商业观与经商艺术

山西商人拼搏商海的结果,是从明代中后期“非数十万不称富”到清代“百万者比比皆是”。山西商人纵横天下,驰骋商海,靠的是信念,靠的是谋略。明清山西商人对从商与入仕、力农等同看待,明代山

西蒲州籍商人王文显训诫儿子说：“夫商与上，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李梦阳：《空同集·王文显墓志铭》）他认为，正当的商业活动与万人师表的士大夫相比，在道德方面毫不逊色。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中有这样一段话：“假如厕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认为业商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较之他业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清代时，“山西地方风俗却向往经商。这种风俗，与其说是清初特有，勿宁说自明代以来已有”（[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阅后批复：“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转引自《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清末民初时，山西有这样的民谣：“生子可作商，不羨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此说虽有些偏颇，却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山西人重商并非虚文。

经商是一门艺术，明清晋商的成就之所以引起世人瞩目，与他们经商过程中运用战略战术巧妙得当是分不开的。我们将晋商的经营艺术主要归纳为几点：审时度势、薄利多销、诚信专一、慎待相与、节俭自律以及灵活机动。山西商人能审时度势最主要就在于明初及时抓了机遇，情况发生变化后，山西商人及时调整战略，积极活动，四处奔波，从边商转为内商、外商，为日后晋商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开中被迫停止后，清代中后期又一跃而为全国票商之盟主，由此出现晋商五百年的辉煌历史。薄利多销、重视信誉是晋商经营中的又一招术，比如祁县乔氏在包头开设的复字商号，做生意从不缺斤短两，

不掺假图利,复字商号的斗秤,比市面上所用之斗都要略让一些给顾客,于是包头市民都愿意买复字商号的米面,生意越做越好,达到了薄利快销的目的。慎待相与,则是晋商能够与有商业关系者善始善终,“慎”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与其他商号初交时要慎重,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这是山西商人义利相通价值观的体现。勤劳节俭也是山西人普遍具有的美德,在山西商人的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具体经营中,晋帮商人有着严密的组织管理制度,如经理负责制、学徒制、人身顶股制、账簿制度等等。以上种种都是山西商人在商场上克敌致胜的法宝。

二、晋商的进取、敬业、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之所以在明清时期能取得最大的成就,与山西商人的进取、敬业、群体精神是分不开的。

进取是由利益趋动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原始属性的精神动力。而山西地脊天寒、百姓勤劳俭朴则是山西商人进取的基本动力。清人纪晓岚就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积蓄有资,始归纳妇。”(《阅微草堂笔记》)颇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迈气概。他们顶风冒雪走沙漠、踩波踏浪行万里创建业绩,充分表现了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如此的壮举需要何等的气魄,何等的毅力。明清商人东渡日本、韩国,南抵南洋,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识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年前往包头要经过“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的杀虎口,但晋商毫不退缩,越去越多,走西口就是当年晋商离别家乡、离别亲人、不

畏艰险只身外出闯天下的真实写照。

敬业是立业之本,敬业是事业有成的保证,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在实践中的体现。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天寒风烈等恶劣的自然环境及小生产方式决定了山西人的勤劳俭朴,刘健在《屯留记》中指出:“其地在万水之中,险狭而硗薄,民力田勤苦,岁获不及他郡之半,故土俗称纯俭,其势然也。”山西地瘠民贫勤劳节俭的风俗习惯,使许多山西商人能够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敢于冒险,自强不息,白手起家而终成大业。明清两代几百年间,山西甚至有“以商为本”之说,长途贩运,万里行贾,习以为常,这种“贸迁四方”的精神正是山西商人重商敬业精神的表现。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年)“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韩邦奇:《苑落集》卷六)当徽商以沿江、沿河、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晋商却别出蹊径,默默地开拓着西北、蒙古以至中俄边境上的恰克图贸易,困难之大、艰险之多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他们走西口、过草原、越沙漠、渡海洋,踏出数以千万里计的一条条商路,积累了数以千万两计的一批批财富,谱写了山西商人辉煌灿烂的篇章。

群体精神是山西商人重视发挥集体力量的一种深层凝聚力量,也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制度的乡里之谊、亲友之情彼此团结在一起,以会馆维系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人和达到合作或互补,讲义气,讲帮靠,用群体精神协调各商号间的矛盾,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山西商人内部组织的初步形成是在明代中叶,《长芦盐法志·沿革》载:“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这里的纲就是以商人籍贯来区别的行帮形式,而在这长芦五帮商人中,山西商人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可

见他们是通过纲的组织形式,来垄断长芦盐业的。祁县大德通票号号规中就有一条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量自重,无得放肆。”和衷共济的群体精神是山西商人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晋帮商人形成于明代,一个帮字突出了山西商人是作为群体在商海作战,也说明山西商人在明清两代结为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晋商的群体精神在经营活动中的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伙计制在明代晋商中很普遍,明人沈思孝说:“(山西商人)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有大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焉肯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沈思孝:《晋录》)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这一形式是在第一种形式基础上以地域乡人为纽带组成的群体,如山西商人对全国来说为晋帮,但在内部又有泽潞帮、太原帮、临襄帮、汾州帮以及清末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等分支。其三是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联号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如平遥蔚字号票号组织等,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出资者为身股,出力者为人股。以上几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山西商人的竞争力。

三、晋商的活动促进了经济、城镇和文化的发展

山西商人通过他们的商业和金融经营活动,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山西商人深入蒙古大草原贩运内地

商品,又把蒙古地方的商品贩运到全国各地,密切了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旅蒙商进入蒙古后,自觉不自觉地把内地生活方式、先进技术和文化传入蒙古草原,如一些兼营手工业的旅蒙商把熟皮子、擀毡子技术带给蒙民,对蒙民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互通有无的经济关系,也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蒙古草原成了内地手工业、农产品销售的广阔市场,又刺激了内地加工业的发展与繁荣。山西商人的活动,也推动了山西与长江南北、东北西北的广泛联系,正如明人李长鼎所说:“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李长鼎集》卷一九)山西人善酿,杏花村汾酒味道醇美,历史悠久,据说是清代山西商人把佳酿技术带到了贵州,贵州茅台“依汾酒制法而兴”。^①

晋商的活动对明清一些城镇的兴起和繁荣起了推动作用。晋商活动范围广,时间久,在几百年的经营活动中,特别是长途贩运、设铺开店对于一些地方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山西北边的大同,明初只是九边重镇,由于商人的活动而出现“繁华富庶,不下江南”的景象,山西南边的运城,元末还是一个有城无市村落,因为盐池之故,明初开中后,商贾纷纷前来取盐,经过200年的发展,到清代前期时,运城“商民辐辏,烟火万家”。平遥、太谷、祁县原只是山西晋中的一般县城,由于票号的兴起,三县城成为闻名海内外的金融城市。库伦(乌兰巴托)“康熙年间,有山西商人来此经商,共有十二家,当地商会之组织,即为十二家各举一商董,称为二甲首”(《内蒙地志》)。直到咸丰年间,从东营子到西库伦,商号皆为晋商开办。包头城至今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谣,复盛公是指山西祁县的乔姓商人。乾隆间乔家创业者乔贵发来到萨拉齐厅(今包头市,时属山西辖境),用多年的积蓄,建立了第一座复盛公铺号,后来又增加复盛西、复盛全

^① 欧阳源:《名贵的土特产》,载《祖国的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等商号。乔氏几乎垄断了包头的商业和金融。后经过乔超五、乔致庸、乔映霞等几代人的努力,到1923年包头开始设治局,三年后才有关治。张家口原是一片荒野,山西商人最早到此,清入关前,就有16家商人为其服务并及时运送物资,其中有8家是山西商人,这8家后被封为皇商,“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道光《万全县志·志余》),张家口在清代始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兑换而归,又有直往恰克图地方交易者,货物多为紫貂猞猁”(秦武域:《闻见瓣香录》甲卷)。当年张家口有山西茶商百余家之多,乾隆时张家口已有“塞上商埠”、“塞上皮都”的美称。

山西商人的经商活动,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无疑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山西商人很看重业商,但他们发达之后,依然很重视子弟的教育。祁县乔家不仅经商有方,而且尊师重教,乔氏以家塾形式延师教读,对教师十分优待,“如每位教师有二名书童侍奉,每饭必有一位主人陪同,逢年过节盛宴执行,宴请亲朋必设教师正席”。榆次常氏也一直重视延请名师教育子弟。从康熙年间的常吉入邑为秀才,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也是废科举之年)近200年间,常氏有秀才、贡生、举人、监生等学子176人,入仕者132人。常氏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办私塾17所,开创了一个家族办学最多的记录,而且在他们开设的学校中,留下了山西最早的农村新学堂、山西最早的女子学堂等记录。祁县富商渠本翘也曾在家乡创办了山西省第一所女子学校。除广建学校外,遍布各地的山西会馆如开封的山陕会馆、洛阳的潞泽会馆、苏州的全晋会馆等,多是宏伟的建筑,成为当地古代建筑财富。山西商人的民居建筑也很有特色,集中体现了我国北方居民住宅的建筑风格,所以至今还流传着“皇家看故宫,民间看乔家”的说法。乔家大院曾被我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

称作“清代民居建筑艺术的一颗明珠”。从建筑方面来说,具有代表性的祁县乔家大院、祁县渠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和榆次常家大院一类的民居对我们考察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借鉴和帮助。当时晋中的许多商家住宅都是大院套小院的四合院,建筑风格精湛高雅,富丽堂皇的大院里有二三百间房舍,榆次常家当年有1500余间房,仅楼房就有40余座。另外,商号都挂有名重一时的书法家的笔墨,而且请良工雕刻,油漆,贴金。这种金字匾牌的制作和悬挂,表现了相当高的文化层次,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其他还有实物幌子、招牌等,形成了一种古老的中国式的商业氛围,对增加商号的信誉和知名度,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晋商的启示

山西商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人,不过作为以地域为主而形成经商之风的晋帮商人是元代以后的事情了,作为明清两代国内最大的商帮之一,晋商崛起于明初,鼎盛于清代,五百年间,山西边商、内商、外商、票商的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支商界劲旅活跃于明清时期各个地方的经济活动中,曾在漫长的五个世纪里为封建经济、文化、城市的繁荣发展有过巨大的贡献。晋商留给我们的的是精神,是启迪。晋商重商立业、敢为天下先的信念,不畏艰辛、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善于经营、生财有道的管理,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山西商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启示。

第一、善于抓住机遇。明清晋商的兴起在于他们及时抓住了机遇,利用开中时地临北边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大胆挺进商业要地,由此取得了先人一步之成功。而晋商的衰落,恰恰也在于清末山西票号未能适时改组银行,在清末政治军事的大风浪冲击中翻船落马,将大好的机会一再错过。

第二、解放思想,敢于为天下先。在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重农轻商、重儒轻商的情况下,晋商敢于向传统挑战,敢于为天下先,把业商视为值得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来做,弃儒经商者比比皆是。这是晋商的豪迈气概所致,也是晋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有着强烈的市场意识,有着强烈的致富愿望,所以才能够离乡背井、抛妻别子远走他乡,走西口、闯关东今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我们不能不为晋商的气魄胆识所折服。

第三、创造环境,勇于开拓进取,富于经营管理。山西商人的辉煌来之不易,靠的是几代人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靠的是一批又一批能人志士的智慧和谋略,靠的是地缘、人缘结成的商人群体的奋力拼搏。

明清晋商所到之处,多能由小到大发展地方经济,从集市发展为工商业城镇。历史上的山西商人善商、能市,今天从事商业经营者应发扬晋商精神。

第十二章 书院文化

山西书院出现较晚,又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山西书院一经出现,便迅即形成自己的文化氛围,并对三晋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山西书院,据今天能见到的史籍记载,萌芽于北宋时期。就有关山西的各种地方志统计,山西历史上共有书院 218 所,其中宋建 1 所,辽建 1 所,金建 1 所,元建 14 所,明建 59 所,清建 142 所。我们可以把山西书院的发展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宋辽金元的滥觞与发轫时期;明代的成长时期;清代的繁荣时期;近代的衰败时期。其中,每个时期山西书院的发展又经历了不同的曲折过程,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形势相关。

第一节 宋辽金元的书院初创时期

北宋时期,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复苏,全国书院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如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岳麓书院,宋真宗御赐匾额,是其成为道学湖湘派的活动基地。咸平五年(1002年),白鹿洞书院创建,在此前后石鼓、应天书院也相继建立,并称为“四大

书院”，成为朱熹、陆九渊等硕儒论辩、讲学的主要场所，学术空气日显浓烈。在此影响和鼓舞下，金华丽泽书院、浙江东阳石洞书院、武夷书院、紫阳书院、象山书院、石坡书院、五峰书院、包山书院先后创建。宋中叶以后，辽翰林学士邢抱朴在山西应州（今应县）建立龙首书院，开启了山西创建书院的先河。

邢抱朴，辽应州人。其父简，辽穆宗时任刑部郎中。抱朴幼年聪明颖悟，好学博古，保宁初（969年），任政事舍人，知制诰，后迁翰林学士，加礼部侍郎。统和四年（986年），宋辽雁北大战后，宋军南撤，辽主派遣抱朴赴应州处理善后。其回朝后升户部尚书。不久，奉命修《实录》，事毕拜参知政事，由枢密使韩德让推荐巡视全国，地方官升迁贬谪由其全权处置，成为辽朝权重一时的大臣。抱朴弟抱质也在辽朝为官，两人皆有才名。邢家兄弟成才与其母教子有方是分不开的，其母陈氏，能吟诗作赋，人称女秀才，死后赐赠鲁国夫人。今应县县城西南有“一经楼”古迹，即陈氏课子读书处。邢抱朴可能就是在赴应州处理善后或巡视全国时在家乡创建了龙首书院，具体时间已无考。靖康年间（1125—1127年），长治建立了雄山书院，这正是宋金交战时期，北宋徽、钦二帝被金人俘往北方，高宗南渡建立南宋。后金时期，刘撝、苏保衡在浑源州（今山西浑源县）创建了翠屏书院。尽管因为战乱，这一时期山西书院数量甚少，但这一从无到有的创建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朝统一后，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以巩固统治，积极引导理学北传，并先后行文各按察司“体覆山长”（《大元典章》卷九）。兼之当时山西已由边陲变为腹里，为了居重驭轻，元政府对于北方士子科举考试乃至书院建设都格外关心。由此，山西书院数量骤然增多，终元之世，除修复宋建长治雄山书院外，还新建了14所书院，它们分别是：

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蒲州首阳书院；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黎城沧溪书院；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夏县涑水书

院；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年），临汾晋山书院；泰定间（1324—1327年），绛县涑阳书院；至正间（1341—1367年）陵川文忠（又名望洛）书院、夏县温公书院，以及未详具体创建年代的榆次源池书院、屯留藕泽（又名藕池）书院、平定冠山书院、平定松峰书院、解州裕斋书院、闻喜董泽书院和汾阳卜山书院。

这些书院主要分布于今山西太原以南地区的运城、临汾、长治地区，反映出晋南、晋东南地区文化发达的事实，正好契合了晋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即由南向北扩散。

这些书院在创建者当中，官民兼有，并且得到了最高统治者支持，如卜山书院就由皇帝御赐匾额。由于政府和士人的共同重视，许多书院从兴建时就规模宏大，资金充裕，生徒众多，藏书丰富。如儒士李桓修复雄山书院后，“殿庑斋堂，略仿郡学，有田二顷，以资讲学费”。新建涑水书院：“堂七楹，中设司马文正公像，颜曰粹德堂，左延宾，右延师，阐斋五，聚邑士之俊。”“游息之所，讲肄之师，庖廩井廓，靡不具备，复入田亩若干，岁入以贍”（雍正《山西通志》卷三五、三六）。在冠山书院内，“藏书万卷”。黎城知县白谦不仅倡建沧溪书院，还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首出藏书，为吏民倡。又规羸息，市经史子集共四千二百二十七卷，资士人观阅”（雍正《山西通志》卷三五、三六）。

山西书院分布基本合理，书院内的各种设施都较为完善。由宋迄元，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山西书院与全国相比较为落后的局面得以改观，从而为明清时期山西书院的更大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书院的初步发展时期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明朝统治基本稳定

后,为了以传统儒家学说控制人们的思想,明太祖朱元璋即下令修复山东曲阜尼山、洙泗两所书院,使文化颓败之风气开始复苏。受此影响,在地方官吏主持下,山西首先修复了平定冠山书院,明人陈凤梧作《游冠山书院诗碣》,记载了该书院的历史沿革与景况,还提到元尚书左丞齐国吕公思诚曾于冠山书院就读,故乃名声大振。但是,为时不久,明朝政府的书院政策发生逆转,“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弟子员归于道学”(雍正《宁波府志》卷九),一下子使百余年间山西书院沉寂无闻。至成化时,山西新建书院只有平定州(今山西平定县)石楼(嘉山)书院1所。弘治以后,由于封建文化渐趋繁荣,主要是由于各级官学日益腐败,“朔旦诣学,谒先师已事而退,终岁未闻登堂讲课,学宫颓垣,灌莽不一顾”(嘉靖《惠州志略·学校》),这种状况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士子的求学要求,这样,书院才重新引起一些学者和开明官吏的重视,纷纷谋求修复与重建,以弥补文化教育设施的不足。弘治、正德间,一些前代书院如临汾晋山书院、蒲州首阳书院、黎城沧溪书院等相继兴复,同时又创建了一批新书院,主要有:弘治元年(1488年),河津文清书院;弘治二年,偏关儋林(又称凤山)书院;弘治八年大同务学书院及弘治间襄汾姑汾书院、荣河(今山西万荣县)大宁(又名大安)书院、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崇理书院;正德二年(1507年)吉州(今山西吉县)文城书院;正德六年浑源石溪书院;正德九年运城河东书院及永济河中书院。

这些书院的相继建成,成为一支具有雄厚实力的教育机构。明人张仲修撰《河东书院志》七卷,现已佚,《千顷堂书目》卷八“地理类下”著录此书。明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人马理(进士及第)撰《河东书院藏书楼记》,正德九年七月初六日立石,即河东书院落成。河东书院是由侍御张仲修所建,散佚的《河东书院志》可能会全面地记录该书院的情况。《河东书院藏书楼记》碑石,现保存在运城县大渠乡政府院内。明宁州(今江西修水)人吕经,字道夫。正德进士,曾任蒲州同知,著有

《河中书院图记》一卷，亦已佚，《千顷堂书目》卷八“地理类下”也予著录。就我们能见到的史料看，弘治正德间，山西书院建设已经摆脱了百余年间的沉寂状态，开始复苏并逐渐进入发展高潮。

嘉靖时期，由于湛若水、王守仁等学术大师四处讲学，极大地推动了各地书院的建立。嘉靖至万历间的近百年中，山西各地书院星罗棋布，遍布三晋大地。嘉靖朝山西新建书院 13 所，它们分别是：

嘉靖元年（1522 年），太谷凤山（又名繁穰）书院、汾州仰高书院、解州解梁书院；嘉靖十一年，翼城丽泽书院；嘉靖十二年，翼城绵山书院；嘉靖十三年，洪洞丽泽书院；嘉靖十四年，太平（今山西襄汾县）龙门书院；嘉靖四十年大同六中书院及未详建于何年的洪洞相观书院、荣河三凤书院、长治东山书院、高平晋城书院及运城正学书院。

万历朝新建书院 11 所，它们分别是：

万历六年（1578 年），沁水凤原书院；万历十八年，介休绵山书院；万历十九年，襄垣秦晋书院；万历二十五年，平定州寿阳（又名受川）书院；万历三十二年，壶关尚友（又名尚文）书院；万历四十年，保德州（今山西保德县）见龙书院、芮城子夏（又名文学）书院；万历四十七年长治文昌（别称共学、起文、上党）书院，以及不详具体兴建年代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白公书院、泽州（今山西晋城市）体仁书院及霍州正学（又名霍山）书院。

明潞州（今山西长治市）人仇楫撰《东山书院仪节》一书，散佚不存，《千顷堂书目》卷十一“儒家类”著录。此类书目碑刻都详细记载了该地书院的情况，由于时代久远，已湮没不存。

嘉靖万历间，山西各地除新建了大批书院外，还于嘉靖三年修复榆次源池书院。万历四十二年修复汾阳卜山书院两所前代书院。此外，山西还存在太原晋阳（曾称三立、河汾）书院、太原晋溪书院、大宁北寨书院、偏关关西书院、榆次涂州书院、浑源凤山书院、崞县（今山西原平市）石桥书院、崞县宁文书院、赵城云龙（又名罗云、龙云）书

院、阳城聚奎书院、交城通济书院、交城一禹书院、蒲州济南关公书院、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书院、汾阳文昌书院、平遥乡土书院、介休景贤书院、介休三贤书院等 18 所书院。尽管这些书院我们无法从史籍中了解到它们具体的兴建时间,也无法知道它们的规模,但各地方志确有记载,经考证,它们大多数建于嘉靖、万历时期。明阳曲人王道行撰《三立祠考》,就记载河汾书院内有三立祠,便是史证。这一时期山西书院总数不下 50 余所,是山西书院发展达到了高峰。

山西 50 余所书院的分布情况:运城地区有 12 所,长治地区有 8 所,临汾地区有 10 所,霍州至太原地区包括平定州有 18 所,太原以北至大同地区有 9 所。这种分布状况基本合理。由南向北倾斜,显然反映出太原是山西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区,晋南及晋东南地区是山西文化发达地区,晋北则相对落后,但比起前代已有较快的发展。

天启以后,明朝政治日益腐败,加之战争与天灾连年,统治集团内部争斗加剧,天启五年(1625 年),阉党魁首魏忠贤矫诏尽毁天下书院,使山西几乎所有书院移作他用,山西文化教育发展遭到了灭顶之灾。魏忠贤倒台后,明朝曾下令恢复书院,但恢复者寥寥无几。至于新建书院唯天启初运城启弘书院、天启三年运城弘运书院、天启五年垣曲勉庸书院、天启六年洪洞澄瀛书院和长子廉山书院 5 所。几年后,李自成起义爆发,明朝政权摇摇欲坠,再无心支持书院发展。终崇祯朝,山西新建书院只有翼城翔山书院 1 所,而且规模极小。一时间,山西书院数量跌到了弘治以来的最低点。随着明朝的灭亡,山西书院陷入了绝境。

第三节 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

十七世纪中叶,明王朝内外交困,终于灭亡。清兵入关,建立起了

长达 260 多年的清王朝封建统治。综观山西书院在有清一代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这样四个时期,即顺治时的压抑期,康乾时的急剧发展期,嘉道时的日益腐朽期和同光时的最后废止期。

一、顺治时的压抑期

清朝入关的第一个皇帝是顺治,顺治时期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清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完成统一。为了防止汉族广大士人利用书院进行反清联络、宣传活动,而且借鉴明末士大夫凭藉学院讲学互相结党攻讦,削弱统治根基的历史教训,对各种书院一度采取严加禁绝的政策。像傅山,他是山西阳曲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作为明朝遗民,明亡后,他利用了书院、讲坛积极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一度颇有声势。顺治九年(1652年),清政府向全国学宫颁行卧碑,要求“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卷一七)。但是马上得天下,必须佐文以治天下,只凭武力镇压是无法维护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的。清政府也深知这个道理,因此,为了满足人们的文化要求,也为了给清政府培养人才,清朝规定:“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廩饩养贍,提学按临日造姓名册申报查考。”(《钦定学政全书·义学事例》)顺治后期,政权逐渐巩固,出于笼络汉族士人的政治需要,清政府的书院禁令开始松动、缓解。顺治十四年(1667年),清政府批准恢复衡阳石鼓书院,书院发展出现转机。但由于清初的压抑政策,终顺治一朝,山西并无一所新建书院,山西书院发展还未摆脱羁绊。

二、康乾时的大发展期

康熙皇帝即位,清朝开始走向繁荣。康熙帝“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对书院发展采取了积极的态度,“特命各省并建书院”(乾隆《续修河南通志》卷三九),并先后给全国 10 余所书院赐匾赐书,极大地推动了书院的发展。在此形势下,山西各级政府官吏及广大人民,迅速掀起修复、创建书院热潮。不长时间,前朝旧书院如太原晋阳书院、太平龙门书院、永济河中书院、运城河东书院等 11 所书院相继修复。与此同时,一大批新书院破土兴建,在康熙当政的 60 年间,山西共新建书院 27 所,使山西书院一下达到近 40 所,几乎接近明朝书院数量。这 27 所新建书院分别是:

康熙元年(1662 年),闻喜涑水书院;康熙三年,长治心水(又名五龙、莲池)书院;康熙四年,绛州启光书院;康熙九年,闻喜义仓书院;康熙十一年,交城卢川书院;康熙十二年,祁县昭余书院;康熙十七年,交城卦山书院;康熙十八年,徐沟(今山西清徐县)金河书院;康熙二十年,洪洞讲学书院和武乡韩山书院;康熙二十四年,汾州棠荫(又名西河)书院;康熙二十五年,岳阳开运书院;康熙二十七年,孝义凤山书院和临县凤山书院;康熙二十八年,河津龙门书院;康熙三十六年,蒲州崇实书院和万泉(今山西万荣)清风书院;康熙四十二年,平遥西河书院;康熙四十六年,永和楼山(又名楼川)书院;康熙四十七年,隰州(今山西隰县)紫川书院;康熙五十一年,太平谦益书院和翼城绍文书院;康熙五十七年,临汾正谊(又称平阳)书院;康熙六十一年,浮山神木书院及未详具体创建年代的翼城扶风书院、广灵延陵书院和太行图南书院。

雍正帝由于是在皇室争斗中夺取皇位的,即位后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曾一度改变康熙皇帝积极扶持、引导书院发展的政策,

下令“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钦定学政全书·义学事例》）。对一些地方官吏奏请设立书院之议，严加拒绝。但是，由于康熙朝长期的政治安定局面，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崇文观念已深入人心，不少地方官员及士人仍违旨径直建立书院，并在各方面予以资助。就山西一省而言，数年间还兴建了 6 所新书院：

雍正元年（1723 年），平陆虞城书院和洪洞玉峰书院；雍正二年，洪洞慎交书院、绛州东雍书院、榆次魏榆书院和马邑（今山西朔州）檀台书院。

乾隆《平陆县志》卷四载：“虞城书院在平陆县治东城内，由县令梁迪倡议，邑绅士筹建，借旧御史行署院址创办。但不久废弃。”由于各地兴建书院不已，使最高统治者的压制政策形同虚文。鉴于此，雍正帝放弃了原来的消极堵塞政策，改用积极扶持并于扶持之中予以控制的策略，于雍正十一年诏谕全国，由各省督抚于省会各建书院 1 所，并各赐金 1000 两，以为师生膏火之需。根据这个谕旨精神，山西巡抚将太原三立书院重加修缮，更名晋阳书院，以为全省士子肄业之所。关于晋阳书院，由于它在山西书院发展史及文化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此予以详细叙列。

明嘉靖九年（1530 年），由山西按察司副使陈讲倡议，利用原巡抚衙门旧址建立了一所“河汾书院”，并于书院内筑起“三贤堂”，祀奉曾在河汾生长并讲学的名贤学者王通、司马光和薛瑄，以“三贤”作为士子学习的榜样。万历七年（1579 年），张居正当政，诏毁天下书院，河汾书院即行停办。二十一年，山西巡抚魏允贞于太原府右所街建“三立祠”，将山西历代名贤王通等 55 人奉祀祠内，并招收弟子讲学。这实际使书院得以恢复，不久便改称“三立书院”。崇祯七年（1634 年），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从考生中择优者 250 人入“三立祠”学习，并以自己的部分薪俸补助贫寒学生，朝夕劝课，深受学生拥戴。十六

年,山西巡抚蔡懋德又对三立书院进行整饬,延聘知州魏权中,举人韩霖、桑拱阳及傅山等来院讲学,使书院学术气氛更加浓烈。

明朝书院存在着自由讲学、讲求实学的传统和评论朝政、裁量人物的“清议”之风,对当时社会风气影响极大,因而引起当权官僚特别是那些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权贵的嫉恨。魏允贞、袁继咸当时都是反对权宦的清流和地方实力派,他们直言敢谏,勇于任事,得到学生和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与同情。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庚子科乡试,三立书院学员中举者达50余人,说明该书院的教学质量是相当高的。崇祯九年,袁继咸因遭诬陷被逮至北京,以傅山、薛宗周为首的山西青年百余人,徒步上京为其鸣冤辩白,使袁案得以平反。“三立书院”学生薛宗周、王如金等,在明亡后,都参加了反清复明活动。

明清之际,由于太原府屡经战乱,三立书院便颓废不可收拾。清兵入关后,清政府害怕书院传播反清复明思想,提出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使山西书院一度沉寂无闻。顺治十七年,山西巡抚白汝梅于太原府城东南侯家巷购地另建“三立祠”70余间,恢复三立书院(即今太原市公安局所在地)。至雍正十一年,正式改名晋阳书院。

乾隆即位,由于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清朝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所以其书院政策愈益开放。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他再次颁诏,要求提高书院在各地教育机构中的地位,认为书院“实即古代侯国之学”,应为一方教育和学术研究之中心,各省督抚须加强控制,慎选山长、生徒,并对其中优秀者“酌量议叙”,“荐举一二”,以示鼓舞。不久,乾隆帝又下令修复京师金台书院,并多次向各地著名书院颁赐书籍、银两,但凡巡幸各地,必到书院查考,并于各地书院中选拔高才俊杰之士加以考试,授予官职,极大地鼓舞了书院的创办和生徒的刻苦进取。在此宽松的环境中,山西不只旧有书院普遍修复、拓建,而且新建书院也空前增多。据统计,乾隆一朝,山西新建书院达57所,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真正使山西书院走上了黄

金发展期。受此影响,不少社学、义学也统名书院,更使此风大长。现将乾隆新建书院按创建年代列出:

乾隆四年(1739年):宁武鹤鸣书院;乾隆七年:永济永乐书院、阳城同文书院、榆社箕山(又名箕城)书院;乾隆九年:蒲县崇文书院、辽州崇山书院;乾隆十年:绛州桂林书院;乾隆十二年:安邑条山书院、曲沃乐昌(又名从教)书院;乾隆十三年:交城养正书院、榆次二贤书院;乾隆十四年:沁州铜鞮书院;乾隆十五年:赵城简城书院、五寨清涟书院;乾隆十六年:定襄晋昌书院、静乐恒麓书院;乾隆十七年:沁源琴泉书院、垣曲弦歌书院;乾隆十八年:屯留传经书院、天镇培风(又名紫阳)书院;乾隆十九年:榆次明经书院、浑源州恒麓书院、乐平沾城(又名文昌)书院;乾隆二十年:襄垣古韩书院、高平崇正书院;乾隆二十一年:交城菁峨书院、潞城卢山书院、繁峙北灵书院;乾隆二十二年:适县秀水书院、河曲宿文书院;乾隆二十三年:黎城东阳书院、壶关壶林书院;乾隆二十四年:朔州朔州书院、灵石竹林书院、夏县养正书院;乾隆二十六年:蒲州河东书院;乾隆二十七年:朔平华林书院、左云宝凤书院、平陆傅岩书院、芮城西河书院、临晋桑泉书院、沁水碧峰书院;乾隆二十八年:文水武陵(又名武林)书院、稷山思文书院;乾隆二十九年:猗氏郇阳书院、万泉方山书院、永宁州龙山书院、闻喜香山书院;乾隆三十四年:绛州华灵(又称教山)书院;乾隆三十五年:和顺云龙书院、阳城仰山书院;乾隆三十六年:翼城许公书院;乾隆四十年:忻州秀容书院、崞县崞阳书院;乾隆四十二年:五台崇实书院;乾隆五十一年:五台斗山书院;乾隆五十六年:荣河汾阳书院。

这种情况显示,山西书院几乎于乾隆当政60年间,平均每年建1所书院。而且晋北一些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地方,也开始起步并追赶发达地区,特别是一些历史上从未有过书院的县也开始建起了书院,如左云、繁峙等。这说明山西的文化教育取得了整体发展的良好形势。

康乾时期,山西书院不仅数量多,而且还以资金充裕、规模宏大、规制完备而著称。各地每建1所书院,大抵皆由官员捐俸、缙绅摊款并以所入置田收取租金,保证后继经费不断。为了搞好教学,皆聘山长1人主持讲席,监院1人管理诸务。书院每月有官、斋二课,生以超、特、壶,童以上、中、次,给予膏火奖励,即今天的奖学金、助学金之类。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创建的翼城绍文书院,“规模颇宏敞,每年由县聘请山长,于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等日课试阅卷,评定甲、乙,优给膏火,以资鼓励”(民国《翼城县志》卷一七)。乾隆时临晋桑泉书院,“规模颇宏敞,讲堂左右壁,开列朱子白鹿洞教条及程董二先生学则”(民国《临晋县志》卷五)。太谷凤山书院,官绅捐银二万两,“前后交商生息,以供师生膏火之需”(民国《阳曲县志》卷四)。建于乾隆二十七年的平陆傅岩书院,由知州言汝泗倡议,平陆县绅士创建,位于平陆县治东门外,先利用荐花公馆旧基创办。后平陆人杜汝愚曾捐地1.5亩,作为书院拓兴院址。平陆县令韩夔典、李友洙、王怡先后督理其事。该书院占地共8亩余,有正房6座,学舍厢房9座,共计45间,大门3楹,东西耳房各1楹,讲堂3楹,藏书楼3楹,俱南向。东西学舍,前6楹,后10楹,西偏傅相祠3楹,照应3楹,还有附属凉亭、鱼池、燕室、庖舍等,其周围清泉环绕,林木郁葱,负山面河,实据一邑胜地。山西书院因为经费充盈,脩脯优厚,所以一些名师如戴震、段玉裁等多被聘至山西讲学,对当时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气氛的活跃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嘉、道、咸时期

此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全国不少地区如河南、湖北、陕西、四川、江苏等省在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下,书院毁坏以尽。与这些省区相比,山西地区战乱较少,局面相对安定,书院数量不

仅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因为政治腐败和资金日益短缺,明显地已经开始呈显出了衰败气象。具体表现为:(1)新建书院数量明显减少。据统计,嘉、道、咸三朝 66 年间,山西新建书院只有嘉庆九年(1804 年),沁县石渠书院;嘉庆十一年,五寨芦秀书院;嘉庆二十五年,槐音书院;道光元年(1821 年),永济蒲阳书院和昔阳少山书院;道光五年,太原晋泉(又名桐封)书院和永济敬敷书院;道光八年,平遥古陶书院;道光十二年,乡宁鄂水书院;道光二十四年,平遥超山书院;道光二十七年,襄垣漳川书院;道光三十年,曲沃从教书院;咸丰四年(1854 年)吉州吉昌书院和怀仁锦屏书院等 14 所。

三朝所建书院仅当乾隆 1 朝所建书院的四分之一。在这些书院中,一些书院规模非常小,如沁县石渠书院。沁县人杨士奇撰立《创修石渠书院碑记》载,石渠书院由沁县石渠村常铎、常录兄弟创建,并割饶沃为膏火之费,使一乡子弟皆入学问业。说明石渠书院仅相当于一所现在的村办小学,还是私人性质的。此碑现存于安泽县和顺镇石渠村庙。还有些书院从创建开始,就为经费艰涩所困扰,无法正常维持。平定槐音书院,位于平定冠山西南,始建于嘉庆二十五年四月,至道光四年才落成,平定人张蒲壁撰立的《冠山槐音书院记》碑说,此书院由张佩芳募资倡修,规制与平定冠山书院相伯仲,但无疑由于经费拮据,绵延两朝才落成。清曲沃知县舍山人晏宗望撰立的《续输平阳府晋山书院暨曲沃从教书院经费题名碑》说,平阳府有晋山书院,曲沃离府治远,子弟入学难,因于县建从教书院,晋山书院经费由各州县补给,从教书院经费则靠田地房产出佃收取租金维持,后租金难取,只得靠绅士捐赠维持,因此更加困难,所以凡有捐赠者便立碑以示彰扬。此碑现存曲沃县中学校内。嘉、道、咸时期,还修复过一些书院,但为数不多,平定知州吴安祖撰立的《重修冠山书院碑记》,嘉庆十八年立石,现存平定师范院内。这种情况显示,山西创建书院的盛况已

经不再。(1)因为吏治腐败而导致书院师资水平整体下降,使得不少书院已经徒具形式。不少书院山长皆由上司勒荐,不学无术,干支束脩。至于招收生徒,其间也是弊端种种。虽然嘉道二朝最高统治者也曾屡次下令予以整顿,一些书院也据此重订条规,但收效甚微。(2)经费短绌,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嘉道以来,一方面由于鸦片输入,大量白银外流及内外战争频仍,政府与缙绅捐助大大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天灾肆虐,民不聊生,佃客拖欠或逃漏书院田租之事不断发生。因而,不少书院都处于半死不活状态,雍正中所建的洪洞玉峰书院,至嘉庆以后因“佃种拖欠,久渐废弛”(民国《洪洞县志》卷一〇)。岳阳开运书院,“岁遭大祿,土田荒废,佃役流亡,每岁所收,入不敷出,几有废弛之虞”(民国《岳阳县志》卷三)。万泉方山书院,自道光三年重修后,不长时间即“学舍倾圮、废坠者六十余间”(民国《万泉县志》卷三)。平陆傅岩书院,咸丰后“各乡租田因大祿,佃户逃亡,多半无著”(《平陆续志》卷二)。这样,嘉道咸时期,山西约有数十所书院先后废弃,幸存者也是岌岌可危,勉强度日了。山西书院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四、同光时期

太平天国起义和北方捻军起义先后被清政府镇压下去,清朝虽然勉强保住了政权,但已经没有能力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了。出于“安定”人心的目的,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清理书院财产,招揽人才,企图恢复旧有的书院。这样,山西书院数量一度回升,但毕竟是夕阳西下,暮色渐深了。然就新建书院而言,仍达到了41所,在全国范围来讲,还是比较有成效的。这41所书院中,同治朝有4所,分别是:

同治元年(1862年),绛州汾南书院;同治十一年,归化启秀(长白)书院和虞乡王官书院,及同治中孝义中阳书院。

光绪朝 37 所,多数不详始建年代,参差罗列如下:

光绪三年(1877年),乐平皋州书院;光绪十一年太原令德书院和归化古丰书院;及太原崇修书院、太原汉山书院、榆次凤鸣书院、徐沟梗阳书院、交城积秀书院、岢岚州芦阳书院、兴县崞山书院、洪洞养正书院和万安镇书院、浮山陆公书院、岳阳石渠书院和运昌书院、汾西凤池书院、屯留麟山书院、石楼仰山书院、宁乡凤鸣书院、泽州明道书院、高平宗程书院、凤台怀仁书院、应州金城书院、灵邱太白书院、阳高云阳书院、神池规观华书院、朔平玉林书院、朔州鄯阳书院、平鲁固山书院、静乐岑山书院、保德州蓬峰书院、河曲河阳书院、芮城申义书院、绛县华岩书院、垣曲亳城书院、大宁振文书院和和顺梁余书院。

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变法自强,改革陈旧的教育体制成为朝野上下共同的呼声,全国不少地区纷纷开始兴办新学,但因山西距离清政府政治中心较近,书院建设仍在封建教育轨道上艰难滑行,不是“仿粤之学海堂,浙之诂经精舍”,“专治古学”(光绪《山西通志》卷七六),就是在理学、八股和科举考试的泥沼中团团打转。至于购置时务书籍,讲授新学者更为罕见。

第四节 书院的败亡与近代山西教育

清朝的书院,在初期虽尚重视义理与经世之学,但从康熙时起,朝野上下即大肆推崇程朱理学。雍正时,朱熹的信徒王珣曾在晋阳书院当了 10 余年山长,道光十三年的山长李榕经与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四年的山长李用清,也都是恪守朱子学说的理学家。当清政府把书院控制在手中以后,书院的教学重心便转向考课。乾隆十年,礼部曾议准书院每月之课仍以八股文为主,所以,当时书院虽然是作为一种官办学校,但其目的仍在于控制知识界的思想,把青年引向奔竞科举之

途,书院成了科举的补习场所。

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开明士绅和官吏,提倡“西学”,希望达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

甲午中日战争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僚、地主及商人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形成了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了救亡图强,力主改变穷途末路的科举制度,发展“新学”。山西令德堂的山长杨深秀也力倡废科举,并成为名垂青史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当时的书院制度已成强弩之末,“有名无实者十居八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等在《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中指出:“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请求改变书院制度。胡聘之等还具体提出:(1)裁汰书院学生名额;(2)修订原有书院章程;(3)改革课程设置,诗文等课酌量并减,除经史外,兼学算学、格致(包括天文、地舆、农务、兵事及其他有用之学);(4)另立水师、武备、船炮、器械及工技制造等类学堂。并建议以令德堂为改革试点,对“才能超越,新法通明,兼达时务”的学生,“咨送总理衙门考试,以备器使”;学有心得,算法通晓者,派赴府属各书院传习知识,予以推广。此奏经光绪帝批准施行。“百日维新”期间,胡聘之又上奏折准将令德堂改为山西省省会学堂,书院院长改为学堂总教习,再聘西学副教习2人,按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西并课。除经史为必修课外,增设经济日课4门(包括政治时务、农工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令学生任选1门。学生人数亦由原来的50名扩增到了120名。同时,还在太原成立了储材馆和武备学堂,山西新式学校开始萌生。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太原令德堂被天主教教士安怀珍、刘博弟等强占,作为临时教堂或宿舍,使令德堂被迫中途停办。山西大学堂成

立,才将令德堂的肄业生转入山西大学堂,并接受了部分晋阳书院的学生。当时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基本是令德堂的继续。中学专斋的总理谷如墉和教习田应璜、张友桐、董化时等,也都是令德堂早年的毕业生,令德堂实际上为中学专斋的创建准备了教学和师资条件。

山西近代教育是从山西大学堂的设立开始的。义和团运动中,山西教案特别严重。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于光绪二十七年春分兵四路进迫山西,形成“联军压境、全省岌岌”(岑春煊: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奏折》)的严重形势,天主教徒强占令德堂,并向新任巡抚岑春煊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在此情况下,岑接受山西洋务局督办沈敦和的建议,电请曾于光绪三年至十二年在山西传教的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山西:“议结教案”,同时,全国议和全权大臣奕劻和李鸿章也邀请李提摩太入京,“设法找一个除进兵山西以外的赔恤办法”(《苏惠廉:《李提摩太传》)。

1901年3月26日,李提摩太由上海抵京,经协商向李鸿章提交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提出以山西赔款在太原设立一所中西大学堂,具体是:“共罚全省银五十九万两,每年交出五万两,以十年为期,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九)李鸿章立即对此表示赞同,并将延聘教习、安排课程和管理经费等事,全交李提摩太负责,同时电告岑春煊照此办理。由于当时娘子关一带局势不平静,李提摩太无法入山西,便转道返回上海。6月,以耶稣教士敦崇礼、文阿德等8人为代表来晋安葬被杀教士及商讨创办中西大学堂事。由于山西官绅坚持取消“罚款”字样和严禁在校内宣讲耶稣教义,未能达成协议。由于李提摩太多次电催,山西才于8月派出洋务局提调周之骧赴沪与李面谈。山西官绅认为“订课程、聘教习、选学

生,均由彼主持”是侵我主权,但李仍坚持己见。为了及早结束教案,缓和局势,双方于10月在上海议定《创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其中重申“十年之后,学堂房室及一切书籍仪器,概归晋省,并不估值”。第六条还明确提出:“中西大学堂与省晋大学堂一样看待。”旨在强调教育主权。

就在与李提摩太商谈设立中西大学堂的同时,山西根据光绪帝二十七年所下兴学诏“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朝东华录》卷一六九),于1902年初,由山西巡抚岑春煊奏准设立山西大学堂,3月,委姚文栋为督办,高燮曾为总教习,谷如墉为副总教习,筹办开学,以令德堂、晋阳书院学生、教师为主,校址设在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今太原市人民公园内)。山西大学堂的成立,不仅开创了山西教育的新纪元,而且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1902年4月3日,李提摩太偕同他所聘请的总教习敦崇礼等及6位中国教习,抵达太原,正式开办中西大学堂。由于山西大学堂已经成立,李提摩太便建议将两校合并办理,经过反复磋商,于6月7日签订新合同23条,中西大学堂改名西学专斋,山西大学堂部分改称中学专斋,西学专斋的临时校址在皇华馆学台衙门西院的皇华别墅,姚文栋辞去督办职,沈敦和接任督办,原晋阳书院山长谷如墉任中斋总理,李提摩太任西斋总理。6月26日,西斋正式开课。

1903年春,山西大学堂于侯家巷购得民地200余亩,修建新校舍,由西斋总教习敦崇礼负责施工,次年秋竣工,建成校舍200余间,包括藏书楼、阅报室、仪器室、物理和化学试验室、博物院、体育场、办公室、会议室及宿舍、伙房等样样俱全,“诚不愧为大学之名焉,其构造不为不善,布置不为不工。总之,大学一堂,建筑完备,已无遗憾,人才荟萃,大有可观。”为了解决西斋教学所急需的教材,李提摩太还设

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使山西大学堂更加完善。

山西大学堂初期,中斋未设大学专门分科,只设高等科,课程只有经、史、政、艺4科,西斋只有预科,但数学、理化、博物、音、美等科目齐全。1904年,新任学台宝熙对学堂进行整顿,于1906年开办法律、矿学、格致3个专门科,1908年又开办工程科,山西大学堂教学内容日益完备。至辛亥革命前的10年间,山西大学堂共毕业学生500余人,培养出续桐溪、温寿泉、谷思慎、景定成、张士秀、赵戴文、王用宾、贾景德、杨兆泰、马骏、赵丕廉等一批影响山西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山西新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在山西的发动,主要得力于山西大学堂培养了一批才干之士。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山西大学堂改名为山西大学校,监督改称校长,并取消了中西两斋的名称。民国初年,全国公立大学仍只有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和山西大学校3所。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山西大学校被称为国立第三大学,可见其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山西大学堂真正成了山西文化教育的中心,奠定了它在山西近代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

参 考 文 献

“二十四史”有关部分。

《十三经注疏》。

《诸子集成》。

《国语》。

《战国策》。

《汉魏丛书》。

《明经世文编》。

《元和姓纂》。

《风俗通》。

《姓苑》。

明成化《山西通志》。

光绪《山西通志》。

《晋乘蒐略》。

《晋政辑要》。

《平定州志》。

《太原县志》。

《代县志》。

《翼城县志》。

《阳曲县志》。

《平陆县志》。

《洪洞县志》。

《新绛县志》。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山西考古》第 1 辑，山西人民出版社。

《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6 年版。

《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南京政府实业部：《中国实业志》(山西省)，1936 年。

《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

《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年版。

《山西古代建筑通览》，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国矿务档案》。

《山西能源经济》。

乔志强：《山西制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三晋文化研究论丛》第 1 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史国强：《中国姓氏起源》，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陈明远：《中国姓氏大全》，北京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国家谱纵横谈》，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乾隆《河东盐法备览》。

孙丽萍：《晚清民国的河东盐业》，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郝树侯：《太原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

《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张海鹏：《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 1993 年版。

[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

《三晋一百名人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净土古刹玄中寺》，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名胜与历史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李孟存：《晋国史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殷墟书契前编》。

《炎黄渊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